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7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章开沅　罗福惠　严昌洪
本卷编者　章开沅　（法）白吉尔

出版策划　王建辉　刘道清
常务编辑　李尔钢　王建槐　杨正光
责任编辑　杨正光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编者说明

一、本卷是辛亥革命前后法国政府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选辑，系法国著名史学家白吉尔教授慷慨提供。全卷共分两个部分，上编为法国外交部档案，下编为法国陆军部档案。所收文件的时间范围是1903—1913年。

二、本卷收编的文件包括三类：(1)法国驻华外交官员、军事情报人员与法国外交部、陆军部之间来往信函、电报；(2)法国驻安南总督及驻日、英等国使节有关中国问题的函电；(3)法国有关机构所收集的有关中国时局的报刊摘要等资料。

三、本卷所收文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中国的政局。其中包括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及思想主张；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起义，特别是孙中山在西南、两广地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国各地的社会政治状况及群众反抗斗争；清政府的政治动向；保路风潮；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的革命风潮。第二方面，中国的经济形势。诸如对中国土地资源状况的考察；中国对外借款问题；路矿勘探及修筑计划；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等等。第三方面，中外关系。如革命党人在西南起义所引起的中外交涉；列强对中国政局的反应及干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与控制；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与干涉；列强与清政府的合作与矛盾等等。

四、在选编文件时，其原有的文件编号已被打乱，所以，本卷按时间顺序对文件进行了重新排列，并将原件的编号在篇尾标出。本卷采用了文件原有的标题，未作改动。部分文件只采用了有关部分，还有少数文件缺附件，文中不再一一出注说明。

五、与文件有关的人物，编译者略加注释，部分人名、地名的法文原文在页下注出。

六、本卷由李莉翻译，乐正、宋安华编校。章开沅教授指导整个译校过程，并审阅全部译稿。

目录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上编　法国外交部档案

一九〇三年

1. 广西借款问题

外交部商务司给法国政务司的通知(1903年8月4日,巴黎)……………… (1)

一九〇五年

2. 日本人在海南

博安致外交部长先生(1905年1月24日,海口)…………………………… (2)

3. 与孙逸仙的谈话

(1905年2月9日)……………………………………………………………… (3)

4. 海南岛问题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1905年2月18日,巴黎)…………………………… (5)

5. 与孙逸仙的谈话

(1905年5月18日)…………………………………………………………… (7)

6. 关于9月24日谋刺案的情报

吕班致外交部长先生(1905年10月5日,北京)…………………………… (8)

7. 关于煽动者孙逸仙

吕班致外交部长先生(1905年11月1日,北京)…………………………… (8)

8. 关于东方汇理银行和兴办一家法中银行的通知

(1905年12月13日)………………………………………………………… (9)

9. 政府对东方汇理银行的要求 …………………………………………… (12)

10. 上海罢市

吕班致外交部(1905年12月18日,北京)………………………………… (15)

11. 就东方汇理银行对1905年12月13日通知的意见所作的答复 …………（15）
附：东方汇理银行行长致外交部长办公厅副主任贝特罗先生（1905年12月21日，巴黎）…………（16）
一九〇六年
12. 1905年12月18日至20日骚动后的上海形势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月8日，上海）…………（17）
13. 重逢希庇斯赖先生；法中贸易协定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月14日，上海）…………（19）
附：(1)有关贵州省的情况 …………（20）
(2)贵州简介 …………（21）
14. 关于上海保安警察部雇员建立互救及退职会的计划
内务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月17日，巴黎）…………（22）
15. 上海骚乱的新传闻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月18日，上海）…………（22）
16. 中国事务
克拉弗利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2月9日，巴黎）…………（23）
17. 关于中国最近几次骚乱的诏书
吕班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3月20日，北京）…………（25）
附：中国外务部主事庆亲王殿下致法国公使吕班先生（1906年3月7日）
…………（25）
18. 中国的形势及留洋回国学生的情况
克拉弗利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3月24日，巴黎）…………（26）
19. 关于委托海军中尉朱热和柯诺先生在海南岛进行考察的记要
（1906年3月30日）…………（27）
附：(1)1877年以来的贸易发展（1904年2月11日《贸易导报》）…………（29）
(2)现有地图 …………（30）
20. 孙逸仙博士途经上海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4月22日，上海）…………（31）
21. 总形势
顾瑞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5月17日，北京）…………（33）
22. 关于孙逸仙
甘司东致印支总督先生（1906年6月15日，广州）…………（34）
23. 关于孙逸仙
甘司东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6年6月15日，广州）…………（35）
24. 孙逸仙的情况

甘司东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6月27日,广州)…………………………(36)
25. 六亿法郎借款计划
法国驻华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7月11日,北京)…………………(36)
26. 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的一个处理计划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8月10日,北京)…………………………(37)
27. 中国新闻界在云南问题上的反法运动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8月31日,北京)…………………………(38)
28. 法国在云南的商业利益
法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1906年10月,巴黎)………………………………(38)
29. 论未来东京湾法国商品对中国的输出 ……………………………………(39)
30. 关于孙逸仙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0月4日,上海)…………………………(44)
31. 各省总督的借款计划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0月9日,北京)…………………………(45)
32. 总形势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0月15日,北京) ………………………(46)
33. 情报处及革命党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0月18日,北京) ………………………(47)
34. 中国革命党人在印度支那购买武器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1906年11月9日,巴黎)……………………………(48)
35. 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的处理问题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1月16日,北京) ………………………(48)
附: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殿下致法国公使巴思德先生急件〔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1906年11月5日)〕 ……………………………………(48)

一九〇七年

36. 中国改革家孙逸仙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年1月22日,巴黎)………………………(49)
附:外交部电文副本(No3)(1907年2月1日,上海) ………………………(50)
37. 要求上海公共租界交出两名中国革命党人事件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年1月24日,北京)…………………………(50)
38. 一个法国军官在武昌作的一次演讲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7年2月25日,汉口)……………………(51)
39. 云南省留法学生给云贵总督的信
驻广州领事馆致外交部(1907年5月17日,广州)…………………………(52)
40. 外交部政治事务司给外交部长的纪要

(1907 年 5 月 22 日,巴黎)…………………………………………………………(52)
41. 关于上海领事法庭法官问题的商讨
外交部政治事务司给外交部长的纪要(1907 年 6 月 8 日,巴黎)…………(55)
42. 孙逸仙和中国骚乱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6 月 13 日,北京)……………………………(56)
43. 关于孙逸仙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先生(1907 年 6 月 20 日,巴黎)…………………………(57)
44. 煽动分子孙逸仙问题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6 月 20 日,巴黎)…………………………(57)
45. 关于煽动分子孙逸仙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先生(1907 年 6 月 24 日,巴黎)…………………………(58)
46. 关于孙文活动的正式通告(急件)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7 年 6 月 29 日,北京)………………………(58)
47. 关于孙逸仙问题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7 月 10 日,北京)……………………………(59)
48. 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活动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7 月 30 日,北京)……………………………(59)
49. 革命运动和印度支那的中国人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8 月 31 日,北京)……………………………(60)
附:中国外务部正式通告(急件)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07 年 8 月 21 日,北京)………(62)
50. 总形势;同柔克义先生的谈话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8 月 31 日,北京)……………………………(63)
51. 在印度支那引渡中国人
(1907 年 10 月)…………………………………………………………………(64)
52. 东京边界上的叛乱分子
甘司东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 年 12 月 9 日,广州)……………………………(66)
53. 关于中国南方的骚乱,对在印度支那属地上的避难者应采取的立场 ……(67)
一九〇八年
54. 日本与中国
热拉尔致外交部(1908 年 1 月 10 日,东京)……………………………………(70)
55. 关于中国报纸《新世纪报》
驻海口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2 月 1 日,海口)………(71)
56. 中国—东京边界上的中国革命者
(1908 年 2 月 3 日,蒙自)………………………………………………………(71)

57. 中国的骚乱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年2月14日,巴黎)……………………(72)
58. 关于中法合作弹压中国革命党的备忘录
中国外务部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年3月15日,北京)………………(72)
59. 华俄道胜银行……………………………………………………(73)
60. 关于可能在远东创办一所法国商业银行的通知……………………(77)
61. 关于建立中国劝业银行联合会的合同
(1908年4月)……………………………………………………(81)
62. 未来中国劝业银行中的中方合股人名单……………………………(82)
63. 中国政府的处境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年4月2日,北京)……………………(82)
64. 抵制日本
甘司东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年4月13日,广州)……………………(83)
65. 北京局势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年4月17日,北京)……………………(85)
66. 上海报纸关于财政方面的报道
(1908年4月22日)………………………………………………(85)
67. 关于革命党人的暴动企图
云南交涉使致法国驻云南领事先生(1908年4月25日,昆明)…………(85)
68. 革命党攻占老街
侯耀致外交部(1908年5月2日,老街)………………………………(86)
69. 革命党攻占河口
中国政府致中国驻法公使(1908年5月4日,北京)……………………(87)
70. 关于河口起事
中国外务部致中国驻法公使(1908年5月4日,北京)…………………(87)
71. 关于河口事件
巴思德致外交部(1908年5月4日,北京)……………………………(88)
72. 照会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年5月6日,北京)…………………(88)
73. 关于河口暴动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1908年5月6日,北京)………………(90)
74. 革命党人攻克河口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年5月7日,蒙自)……………………(90)
75. 关于河口事件
殖民部致法印度支那总督(1908年5月7日,巴黎)……………………(91)

76. 关于河口事件的照会

刘式训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5 月 9 日,巴黎) …………………………… (91)

77. 关于河口暴动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1908 年 5 月 11 日,北京)………………… (92)

78. 云南骚乱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5 月 15 日,北京)………………………… (93)

79. 关于河口事件问题

毕盛致中国驻法公使先生(1908 年 5 月 18 日,巴黎)……………………… (93)

80. 关于由东方汇理银行支持在中国建立一个常设工业机构的问题

外交部政治和商业事务司(1908 年 5 月 18 日) …………………………… (94)

81. 云南、广西两省的骚乱

殖民部(1908 年 5 月 22 日,巴黎)………………………………………… (95)

82. 对付中国革命党人的问题

殖民部代理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5 月 22 日,巴黎)……………… (95)

83. 云南和广西的骚乱

殖民部代理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5 月 22 日,巴黎)……………… (96)

84. 关于孙逸仙

殖民部转外交部(1908 年 5 月 23 日,巴黎)……………………………… (98)

85. 云南暴动和 5 月 24 日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的集会

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5 月 28 日,东京)………………………… (98)

86. 普隆事件

博努尔致殖民部(1908 年 6 月 4 日,河内) ……………………………… (99)

87. 普隆事件

毕盛致法印支总督先生(1908 年 6 月 7 日,巴黎) ……………………… (100)

88. 供外交部长用的摘录

(1908 年 6 月 8 日,巴黎) ………………………………………………… (100)

89. 关于普隆事件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1908 年 6 月 8 日,北京) ……………… (103)

90. 关于云南问题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11 日,巴黎)…………………… (103)

91. 关于普隆事件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1908 年 6 月 13 日,北京)……………… (104)

92. 关于普隆事件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15 日,北京)………………… (105)

93. 关于普隆事件

中国外务部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15 日,北京)………………(106)
94. 关于普隆事件
中国外务部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15 日,北京)………………(106)
95. 关于普隆事件的备忘录
刘式训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6 月 15 日,巴黎)………………………(107)
96. 关于普隆事件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16 日,巴黎)……………………(108)
97. 关于河口事件
《伦敦和中国电讯报》消息摘译(1908 年 6 月 16 日)……………………(108)
98. 关于普隆事件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17 日,巴黎)……………………(109)
附:备忘录(1908 年 6 月 17 日)…………………………………………(109)
99. 关于边境革命党人的活动
毕盛致中国驻法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20 日,巴黎)……………………(110)
100. 关于普隆事件
刘式训致外交部长斯蒂芬·皮尚先生(1908 年 6 月 26 日,巴黎)………(111)
101. 日本报界对普隆事件的评论;与林董伯爵的会谈
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6 月 27 日,东京)……………………(112)
102. 关于普隆事件
毕盛致中国驻法公使先生(1908 年 6 月 29 日,巴黎)……………………(113)
103. 中国南方的骚乱和法国的要求
外交部长工作参考材料摘要(1908 年 6 月 30 日,巴黎)…………………(113)
104. 法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
保尔·康盘致外交部(1908 年 7 月 1 日,伦敦)…………………………(119)
附:备忘录(1908 年 7 月 1 日,巴黎)……………………………………(119)
105. 总形势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7 月 9 日,北京)………………………(120)
106. 法国人在云南革命党人事件中的处境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7 月 10 日,北京)……………………(121)
107. 中国的骚乱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先生(1908 年 7 月 16 日,巴黎)……………………(122)
108. 关于普隆事件的调查
法国驻华使馆致外交部(1908 年 7 月 28 日,北京)……………………(123)
109. 关于普隆事件的索赔问题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08 年 7 月 29 日,巴黎)……………………(123)

110. 关于中国革命党人的情况
毕盛致殖民部长先生(1908 年 7 月 29 日,巴黎) …………………………… (124)
111. 被捕的中国革命者的处理问题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8 月 8 日,巴黎)……………………… (125)
112. 英国对法国向中国所提要求的态度
毕盛致法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先生(1908 年 8 月 14 日,巴黎) ………… (126)
113. 中国革命者放逐新加坡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8 月 27 日,巴黎) …………………… (128)
114. 关于普隆事件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1908 年 8 月 29 日,巴黎) …………………………… (128)
115. 日本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9 月 28 日,东京) ……………………… (129)
116. 驱逐孙逸仙
毕盛致殖民部长先生(1908 年 10 月 21 日,巴黎)………………………… (130)
117. 云南对外商的开放问题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10 月 30 日,北京)……………………… (132)
118. 关于普隆事件的处理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1908 年 11 月 1 日,北京) ……………………… (133)
119. 光绪皇帝之死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 (134)
120. 中国局势
各国报纸摘要 ………………………………………………………………… (134)
121. 西太后驾崩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190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 (136)
122. 皇太后之死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 (136)
123. 关于云南开放的备忘录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12 月 9 日,北京) ……………………… (137)
124. 中国改革者孙逸仙在曼谷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08 年 12 月 10 日,曼谷)……………………… (139)
一九〇九年
125. 袁世凯失宠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1 月 4 日,北京)………………………… (142)
126. 1909 年 1 月 4 日的法中协定 ……………………………………………… (143)
127. 中国的新主

来自德国报界和情报局的材料(1909 年 1 月 26 日)…………………………(143)
128. 中国皇帝的葬礼
藩荪纳致外交部(1909 年 2 月 9 日,北京)…………………………………(144)
129. 唐绍仪特使的使命
法国驻华公使馆致外交部(1909 年 2 月 9 日,北京)…………………………(145)
130. 处理中国革命党人的办法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1909 年 2 月 12 日,巴黎)…………………………(146)
131. 扩大法租界的要求
巨籁达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09 年 3 月 9 日,上海)……………(146)
132. 扩大上海法租界的要求
藩荪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3 月 24 日,北京)…………………………(148)
133. 上海法租界的扩大计划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1909 年 5 月 20 日,巴黎)……………………(148)
134. 关于中国的现代教育
(1909 年 5 月 28 日,上海)…………………………………………………(149)
135. 广州的欧洲租界问题
法驻广州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6 月 30 日,广州)…………………(149)
136. 关于上海租界的扩大问题
藩荪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7 月 13 日,北京)…………………………(152)
137. 北京新政府情况
藩荪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8 月 2 日,北京)…………………………(153)
138. 中国订购火炮
藩荪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8 月 24 日,北京)…………………………(154)
139. 业国麟先生寄来的做商标的中国画
给政治和商业事务司的通知(1909 年 9 月 11 日,巴黎)……………………(155)
附:(1)可作远东产品商标及标签的第一组中国画
业国麟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7 月 23 日,芝罘)…………………(155)
(2)可作法国产品商标用的中国画
迪布依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 年 8 月 31 日,巴黎)…………………(156)
140. 订购火炮的情况
藩荪纳致外交部(1909 年 9 月 14 日,北京)………………………………(156)
141.《泰晤士报》对远东及澳大利亚事务的态度
康盘致外交部(1909 年 9 月 23 日,伦敦)…………………………………(157)
142. 9 月 4 日中日协定和日本在高丽和满洲的处境
热拉尔致外交部(1909 年 9 月 29 日,东京)………………………………(158)

143. 1909年9月4日中日协定第二款
藩荪纳致外交部(1909年10月21日,北京)…………………………(159)
144. 煽动者孙逸仙
法国驻华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年11月10日,北京)………………(159)
145. 中国的铁路贷款
财政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年11月24日,巴黎)……………………(160)
附:(1)1905年利率为5%的一千二百万法郎中国贷款遵照中国皇帝陛下
1905年8月13日诏书发行……………………………………(161)
(2)北京合同的节录(1905年8月13日)…………………………(162)
(3)致中国铁路筹划公司(1905年9月27日,布鲁塞尔)……………(162)
(4)中国铁路筹划会(1905年9月30日,巴黎)………………………(162)
(5)简介 ……………………………………………………………(163)
(6)中国借款问题
法国驻英国大使馆致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906年2月26日,伦敦)
……………………………………………………………………(163)
146. 华俄道胜银行的特别使命
乔治·路易致外交部(1909年11月27日,圣彼得堡)……………………(164)
147. 中国青年的精神状态
德·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09年12月25日,北京)…………………(165)
一九一〇年
148. 广州叛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年2月20日,北京)………………………(166)
149. 中国的事变和政局
(1910年4月2日31号函附件)……………………………………(167)
150. 谋刺摄政王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年4月7日,北京)…………………………(169)
151. 广西骚乱
索西纳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年4月25日,北海)………………………(170)
152. 中国对法国进出口贸易表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年4月26日,北京)………………………(170)
153. 1910年前三个月在中国发生的混乱和骚动
《顺天时报》摘要(1910年4月26日)………………………………(174)
154. 中国的骚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年5月6日,北京)…………………………(175)
155. 中国的形势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10 年 5 月 6 日,上海)…………………… (176)

156. 湖南骚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 年 5 月 19 日,北京) …………………… (177)

157. 中国外务部的法国事务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 年 5 月 24 日,北京) …………………… (180)

158. 革命党人致各公使馆的信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 年 6 月 3 日,北京)…………………… (181)

附:三江(江西、江苏、安徽)革命军总司令徐正贤致法国驻北京公使阁下函 …………………… (182)

159. 广东的革命党人

法国驻广州领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10 年 6 月 15 日,广州) ……… (182)

附:关于洪索其人

香港便衣探长汉森致香港警察局督察总长(1910 年 6 月 13 日) …… (184)

160. 中国的形势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 年 6 月 18 日,北京) …………………… (185)

161. 威胁云南的危险警报

《危言报》摘要(1910 年 7 月 19 日)…………………… (186)

162. 莱阳暴动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0 年 7 月 31 日,北京) …………………… (186)

163. 中国革命党人的情况

奥古尔致法国常驻中国高级外交代表(1910 年 8 月 1 日,河内)………… (187)

164. 印度支那和中国风潮

印度支那总督致殖民部长先生(1910 年 8 月 30 日,西贡) ……………… (188)

165. 上海的会审公廨

马士理致外交部(1910 年 10 月 30 日,北京)…………………… (191)

一九一一年

166. 铁路风潮:抗议集会;外国人的安全;民众情绪;宜昌印象

每月汇报第七号(1911 年 6 月,重庆)…………………… (192)

附:在各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所作的决议 …………………… (195)

167. 关于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国的权利问题

中国驻法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6 月 13 日,巴黎) ……………… (197)

附: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正文 …………………… (197)

168. 南宁的革命党人

普安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6 月 24 日,南宁) …………………… (198)

169. 关于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国的权利问题

行政和技术司致政治和商业司的通知(1911 年 6 月 28 日,巴黎) ……… (199)
170. 南宁的反法情绪
法国驻南宁代表致亚洲事务处副处长先生(1911 年 8 月 10 日,南宁) … (200)
171. 上海局势
喇伯第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9 月 22 日,上海) ……………………… (201)
172. 广东的革命党人
伯威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9 月 23 日,广州) …………… (202)
173. 中国政府近况和四川战况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9 日,北京) ……………………… (205)
174. 湖北的革命事件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16 日,北京)……………………… (207)
175. 扬子江风潮
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16 日,天津)…………… (209)
176. 中国近况
喇伯第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17 日,上海)……………………… (210)
177. 云南情况
法国驻云南代表致法国驻华公使馆(1911 年 10 月 17 日,云南)………… (214)
178. 香港的中国居民同情革命党人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19 日,香港)
……………………………………………………………………… (215)
179. 厦门形势
陆公德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0 月 20 日,厦门)………… (217)
180. 汉口的革命事件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0 月 20 日,汉口)…………… (218)
181. 金融危机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0 月 20 日,上海)………… (219)
182. 湖北的革命事件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20 日,北京)……………………… (220)
183. 鸦片调查和总形势
法国驻福州负责人致法国驻华公使馆(1911 年 10 月 21 日,福州)……… (222)
184.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24 日,北京)……………………… (222)
185. 中国近况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0 月 25 日,上海)………… (224)
186. 中国的骚乱、银行发出的电报

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26 日,天津)…………… (226)
187.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0 月 27 日,北京)………………………… (228)
188. 中国政局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1 月 11 日,北京)………………………… (229)
189. 政治形势,上海的临时政府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1 月 13 日,上海)………… (229)
190. 直隶省情况
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1 月 20 日,天津)…………… (232)
191. 云南近况
萨洛致法国殖民部(1911 年 11 月 21 日,西贡)…………………………… (233)
192.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1 月 21 日,北京)………………………… (234)
193.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1 日,北京) ………………………… (235)
194. 攻克南京,革命党人的处境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2 月 5 日,上海) ………… (236)
195. 革命运动;摄政王辞职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8 日,北京) ………………………… (237)
196. 南方铁路
塞尔夫致法国驻河口领事(1911 年 12 月 11 日,巴黎)…………………… (239)
197. 南方铁路
塞尔夫致法国驻河口领事(1911 年 12 月 11 日,巴黎)…………………… (239)
198. 责任内阁的境况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11 日,北京)………………………… (240)
199. 革命运动;上海会谈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15 日,北京)………………………… (240)
200. 云南骚乱,伍廷芳的措施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17 日,北京)………………………… (242)
201. 武昌情况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 年 12 月 18 日,汉口)…………… (242)
202. 孙逸仙在香港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22 日,香港)
……………………………………………………………………………… (244)
附:(1)孙逸仙访问记(1911 年 12 月 22 日《华南早报》) ………………… (244)

(2)荷马里将军访问记(1911 年 12 月 21 日《香港电讯》) …………………… (245)
203. 上海谈判和朝廷让位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29 日，北京)……………………………… (246)
一九一二年
204. 中国西部的动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2 年 1 月 15 日，北京) ……………………………… (247)
205. 中国政局与列强反应
外交部长致法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华盛顿大使(1912 年 1 月 27 日，巴黎) ……………………………………………………………………… (248)
206. 在中国建立银行的计划
(1912 年 1 月) ……………………………………………………………… (249)
207. 出售日本武器给中国革命党人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代办致外交部长先生(1912 年 2 月 2 日，东京)……… (251)
208. 中国事务：政府和舆论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代办致外交部长先生(1912 年 2 月 11 日，东京) …… (252)
209. 退位诏书在武昌的反应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1912 年 2 月 15 日，汉口) ………………………… (253)
210. 法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其与列强军力的比较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1912 年 2 月 15 日，巴黎) ………………………… (253)
211. 民国总统易人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2 年 2 月 16 日，北京) ……………………… (256)
212. 汉口租界的扩大计划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1912 年 3 月 14 日，北京) ……………………… (256)
一九一三年
213. 黎元洪都督会见各国领事
陆公德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1913 年 1 月 25 日，汉口) ………………… (258)
下编 法国陆军部档案
一九〇六年
1. 1905 年 12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1 月 5 日，天津)………………… (260)
2. 1906 年 1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2 月 4 日，天津)………………… (266)
3. 关于煽动分子孙逸仙和布加卑上尉

参议院主席兼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1906 年 2 月 17 日,巴黎) …………… (271)
4. 1906 年 2 月总报告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3 月 4 日,天津)………………… (271)
5. 1906 年 3—4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5 月 10 日,天津) ……………… (276)
6. 1906 年 5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5 月 30 日,天津) ……………… (290)
7. 与印度支那毗邻的中国各省及中华帝国的概况
(1906 年 6 月 20 日制订,副本) ………………………………………… (295)
8. 1906 年 6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7 月 5 日,天津)………………… (302)
9. 1906 年 7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8 月 3 日,天津)………………… (309)
10. 1906 年 8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9 月 2 日,天津) ……………… (313)
11. 1906 年 9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10 月 2 日,天津)……………… (325)
12. 秘密会社;中国政府对法国的正式抗议;在中国的情报处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10 月 16 日,北京) …………… (332)
13. 秘密会社;外务部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11 月 13 日,北京) …………… (335)
14. 关于情报处及革命党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 年 12 月 7 日,北京)……………………… (335)
附:中国的帮会与中国情报处(概要) ……………………………………… (336)
一九〇七年
15. 骚乱;秘密会社的骚动;地方官吏被暗杀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1907 年 7 月 20 日,北京)……………… (338)
一九〇八年
16. 中国南部的革命运动;广西南部的骚乱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1908年1月6日,北京) ………………… (341)
一九一〇年
17. 军事改组
马士理致毕盛先生(1910年1月10日,北京)………………………………… (344)
一九一一年
18. 广州革命暴动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6月19日,北京)……………………… (347)
19. 中国国内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9月16日,北京)……………………… (349)
20. 革命起义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16日,北京) …………………… (351)
21. 革命起义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0日,北京) …………………… (355)
22. 中国发生的事件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1日,巴黎) …………………… (359)
23. 中国发生的事件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2日,巴黎) …………………… (359)
24. 革命起义;10月20日至23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3日,北京) …………………… (360)
25. 中国的叛乱;日本的态度
贝尔当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3日,东京) ……………………… (361)
26. 有关中国革命党人骚乱的最新消息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4日,巴黎) …………………… (363)
27. 中国的革命骚乱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6日,巴黎) …………………… (363)
28. 革命起义;10月23日至30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30日,北京) …………………… (363)
29. 朝廷决定性的让步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0月31日,北京) …………………… (366)
30. 革命起义;10月31日至11月5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1月6日,北京)……………………… (367)
31. 革命的进展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1月9日,北京)……………………… (369)
32. 革命起义;11月10日至16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1月16日,北京) …………………… (372)

33. 雷让德尔使团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1 月 23 日,北京) …………………… (374)
34. 革命起义;11 月 17 日至 26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1 月 27 日,北京) …………………… (375)
35. 中国的革命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1 月 27 日,巴黎) …………………… (379)
36. 革命起义;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1 日,北京)…………………… (379)
37. 中国的骚乱;日本采取的军事措施
贝尔当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5 日,东京)…………………… (381)
38. 革命起义;12 月 1 日至 7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7 日,北京)…………………… (383)
39. 山西的战事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17 日,北京) …………………… (386)
40. 1911 年 11 月汉口的战斗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26 日,北京) …………………… (390)
41. 12 月 29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 年 12 月 29 日,北京) …………………… (395)
一九一二年
42. 1912 年 1 月 8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1 月 8 日,北京) …………………… (399)
43. 1 月 15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1 月 15 日,北京)…………………… (402)
44. 1 月 22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1 月 22 日,北京)…………………… (404)
45. 1 月 29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1 月 29 日,北京)…………………… (407)
46. 2 月 25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2 月 25 日,北京)…………………… (410)
47. 北京的骚乱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3 月 1 日,北京) …………………… (412)
48. 3 月 4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3 月 4 日,北京) …………………… (413)
49. 日本出售武器给中国革命者
参议院议长兼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 年 3 月 5 日,巴黎) ……… (415)

附：日本出售武器给中国革命者
格罗斯致参议院议长兼外交部长先生(1912年2月2日,东京)……… (415)
50. 外国在中国的兵力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年3月22日,北京)……………………… (416)

上编　法国外交部档案

一九〇三年

1. 广西借款问题
外交部商务司给法国政务司的通知

（1903 年 8 月 4 日，巴黎）

广西巡抚王大人①的一名代表于 1903 年 1 月前往上海，商谈一笔三十万两银子的贷款，我驻上海领事帮他联系了东方国际公司的代表人鲁法尔②先生。

他们已制定了一个合同的草案。东方公司给予贷款一百万法郎，利率 7.5%，王的代表则同意把广西省四个地区的所有矿山租借给东方公司。这四个区尚未确定。勘探时间为两年，从中国这一地区的骚乱完全平定之日开始算起。就在这些谈判进行期间，上海有两家德国商号先后开业，即阿尔诺·卡尔堡公司和卡劳维奇③公司。阿尔诺·卡尔堡商号不愿接受王大人的提议，但根据上海最近获悉的情报称，以柏林德意志银行为名，为德意志银行的下属的卡劳维奇公司已答应借给广西巡抚一笔三十万两白银的款子，这笔款子的一半由现金支付，另一半将用 1877 型毛瑟枪五千一百枝顶替；每枝枪配一百发子弹，以每千发二十八两计算。全部货款在广州交付。

商定的借款不必经皇上御批，以盐税的盈余为担保即可。

---

① 王大人，指王之春。——译者

② 东方国际公司（La Compaghie internationale d'orient）；鲁法尔（Rouffart）。——译者

③ 阿尔诺·卡尔堡（Arnold karbelg）；卡劳维奇（Carlowitz）。——译者

由于巨籁达①先生的急件未提及由卡劳维奇公司缔结的合同中有关矿产特权的租借问题，商务裁判司无法知道在该合同中，关于1897年6月12日法中公约的条款是否得到遵守；根据公约规定，凡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开矿，中国保证约请法国工程师和实业家前来帮助。

此外，商务司则就以前情报与近日来自上海的情报不完全相符的部分向我国驻柏林大使和驻北京公使询问过有关这一消息的财政业务的情况。

〔外交部　商务司〕

一九〇五年

2. 日本人在海南
博安②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5年1月24日，海口）

我曾报告阁下给日本人发放海南岛沿海地区某些点的签证情况。

目前事件仿佛不允许实现这个计划。相反，住在岛上的寥寥几个日本国民并不是不活跃的。差不多在两个月以前，几个从香港来的人到了海口。其中一人很可能持有其政府的指令，造访道台后就走了。另一个是和尚，在琼州留下了。他开设了一座佛塔，收了二十来名门徒。这些人交了六元大洋（十五法郎）入门费，从而得到他们师父的半官方性保护。在带有官方性质的问题中，日本人迄今一直更愿意找英国领事馆帮忙。他们打算办一所学校，学校里不仅教他们的日语，还教英语。他们还想建一所医院和一个手工技艺职业学校（工艺局）。为此目的，他们在本地区显要人物中拉关系。在此，我应再说一个情况。很久以来，琼州的书店同目前许多中国城市的书店一样，大量出售日本书籍、地图、供中国人阅读的翻译和改编读物。有些居民，他们人数不多，但也不是最没有教养的人，他们的头脑便浸透了被如此传播的思想。官员和民众依然无动于衷。然而也不可能不了解日本民族为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中华帝国最僻远的地区而进行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

〔外交部　政治事务司　No1　（抄件）〕

① 巨籁达（Ratard），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译者

② 博安（Point），时为法国驻海口代理副领事。——译者

3. 与孙逸仙的谈话

（1905 年 2 月 9 日）

一月前抵达伦敦的中国革命党人、改革运动的著名领袖①已来巴黎作短期逗留。我们知道这位有名望的煽动者在中国南方诸省中拥有赫赫权势，以及他如何三次试图在这些省份发动起义（1895、1900、1903 年）。目前广西的暴动便是在他的领导下，由他的党提供基金，由他的拥护者们进行的。广西的暴动两年来使官兵受困、束手无策。所以，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觉得，尽管他的声明有点奇怪且带着颠覆性，把它们收集起来却有一定意义。所以，我们在此对那些声明作一简短陈述。②

一、孙逸仙的纲领，华南各省的联邦共和国

孙逸仙的政治纲领可归纳成三个主要目标：

1. 废除满洲人的外族皇朝。

2. 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包括广东、广西、贵州和湖南四省。

3. 仿照欧洲模式，借鉴日本倒幕运动以来完成的业绩，改革中国的制度。

我们知道，民族的统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一个中国人的真正祖国以他所在的省的边界为限。因此，孙和他的拥护者们对中国的另外十四个省不感兴趣，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另外，他们也担心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中国后会导致最后的失败。北方各省皇朝力量较强，非他们用武之地。

孙逸仙认为，华南合众国应采用与美利坚合众国相仿的共和形式。但开始必须是军事独裁，即由“军政府”维持秩序和保证中央机构的正常运转。然后，这个政府才有可能将它的一部分权力分配给每个县里的文职人员，那时才是“国民政府”时期。

最后，在约十五年后，居民的国民教育已相当圆满，他们自己已能与政府合作，那时将取消军事政权，各个县将接受某种政体，并组成联邦。那将是“国民政府”的最后阶段。

二、孙逸仙打算如何使未来的华南联邦共和国得到承认

孙逸仙认为他纲领中的军事部分是最容易做到的。他提请注意说，广西的暴动者们在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战斗，他们不可能得到武器弹药的供应。他们获得军火的办法惟有从敌人手中夺取。然而他们三年来坚持斗争，多次击败所有的讨伐部队，包括从帝国的

① 指孙中山。——译者

② 此文签名似是侯耀。——原注　侯耀（Réau），法国驻蒙自领事。——译者

四面八方派来的部队。

孙逸仙打算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到广西去,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作建立革命政府的第一次尝试,然后向广东进发并夺取广州。他希望通过在福建和湖北边界上的牵制攻击,恫吓这两个省的巡抚,迫使他们向他妥协,承认华南联邦政府的存在。这时联邦政府便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明确的国际地位,它就有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了。

三、孙逸仙对目前战争的后果的假设,为什么法国应帮助革命党人的改革

孙逸仙考虑了日本对俄战争在最终获得胜利或是遭到失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如果获胜,日本便将成为在中国占优势的列强之一,满清政府将成为其掌握的听话的工具,从南到北,从广州到北京,日本人想怎么干便能怎么干。

革命党将不得不对付领导帝国政治的日本人。那时,按孙逸仙的说法,法国从其亚洲政策的利益和其印度支那帝国的安全考虑,将支持改革派的努力。对于日本已取得的对中国政府的影响,表现为在南方边界上的灵活政策,法国将不可能视若无睹。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俄军获胜,孙逸仙肯定,被赶回岛国的日本人将像他们已经做过的那样支持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在南方寻求补偿。(我们认为,他这么说的根据是最近他看到的一些日本政治家的声明。)日本的这种干预在孙看来是有害的,因为它将使革命运动丧失民族主义的特性。孙逸仙仿佛很希望排除日本的干预。他认为,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的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法国能够轻而易举地起到与日本相同的作用,从而防止日本的干预。

四、按照孙逸仙的看法,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协助革命党人进行改革

两种方式:

1. 秘密的:以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让必需的军需品通过东京①地区边界。中国政府不会指责法国的态度,因为它对其他公开牵涉进去的国家并没提出过任何抗议。孙逸仙例举了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给予他们的支持,爵士对广东起义的准备工作视而不见,他曾允许中国密探向英国警署告发的革命党人在被捕前离开殖民地。他还例举了香港和广州的德国商人在他们的领事的默许下,多次出售武器的事实。最后他还比较隐晦地暗示了日本人从前提供过的银钱上的帮助。

2. 实在的:法国政府为革命党人谋求武器和现金上的援助,或者使他们得以签订巨额贷款。孙援引库坦、劳安贷款为先例,这笔在纽约与一些大资本家签订的古巴贷款,使

① 此东京为河内,非日本东京。——译者

古巴暴乱运动能延续抵抗，直至美国出面干预。

五、为什么孙逸仙特别需要法国的帮助

鉴于未来的华南共和国将同它的邻邦印度支那保持关系，孙逸仙认为他首先必须请求我们的帮助。目前还有一些更紧迫的原由促使他这么做。迄今为止，香港一直是革命运动组织的中心所在地，英国政府方面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

然而，孙逸仙认为香港岛太小，离广州太近，他的拥护者们感到在那里不安全。两广总督的打手们也确实曾多次暗杀或绑架过改革派的知名人士。广州当局很容易得知购买和运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军火一运进中国，当局便毫无困难地把它们截下了。

相反，广阔的印度支那边界和广州湾海港却为广西叛乱者提供了安全秘密地引进军需品的良好基地。

我们很想了解孙逸仙的那些计划的准备工作达到了何等程度，我们特别怂恿他声明广西暴乱、攻取广州和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的发展情况。我们从而确认，这位革命党领袖曾十分仔细地研究过各种不同问题，为了获得成功，他们仿佛商讨过最细微的方面。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人们相信，欧洲人的安全将得到充分的保证，黑社会的会党成员目前已十分遵守纪律，不用害怕有任何过火的行为，等等。

按照他的说法，行动决定下来后，目前不愿与官兵有任何接触的广西叛乱者将发动进攻，击溃官兵，继而进入广东。广东省所有拥护改革的人和数目甚众的黑社会会党成员将公开表态，大批起义，与叛军汇合。预定在孙逸仙指挥下行动的朋友们将从马来亚、马六甲、新加坡、香港等地出发走上他们相应的岗位。如此构成的军队将秩序井然地向广州进发。孙逸仙相信胜券在握。他甚至希望在广州城下不要发生战斗，希望在保证官员们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他们会迅即出来谈判，为革命军不流血地进城提供方便。他肯定地说："广州的秩序不会被扰乱。"

孙逸仙深信，只有实现他的计划，才能使中国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他认为中央政府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在全国各个地方持续出现的骚乱将同过去一样，导致未来的外国干涉和中国的重新被瓜分。由于南方共和国的建立，满清政府将不得不修正它的统治方式，以保住对其他各省的权力。因此，孙逸仙尽管有他的革命纲领，仍声称这是一个真正的"和平因素"。

4. 海南岛问题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

（1905 年 2 月 18 日，巴黎）

在 1904 年 10 月 5 日一函中，您给我转来了法国驻海口副领事馆一份报告的抄件，该

报告指出了派一水道测量考察团赴海南岛负责研究铺前①湾水情的好处。

我曾把这份报告转给印度支那总督先生，并请他告诉我，他觉得博安先生的建议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他刚回复我说，他曾在1904年6月10日就这个问题给法国驻华公使先生去过一份报告。

根据博②先生转交给我的这份报告的分析，当时，布朗谢③先生为海口主管人，继那份报告后，他曾在哈杜安④先生的赞助下，在广州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其宗旨是开发海南岛的工业和矿产。原公共工程部官员莫洛⑤先生研究过建立一条连接海口和岛内各县城的铁路的情况。但是，海口港的缺陷使莫洛先生十分震惊，他让一位远洋轮船长罗斯⑥先生考察避海风，尤其是避冬季季风条件较好的铺前海湾。几次探测测定发现那里的海底允许大海船一直到离陆地很近的地方停靠。人们立即想到在铺前挖掘一个深水港，并朝这个港口伸出一条铁路分岔。有关这些计划，总督政府拥有莫洛先生和罗斯先生绘制的三份地图。

1. 让·莫洛先生的从海口到嘉积⑦的十五万分之一比例线路草图。

2. 1903年对铺前海湾进行勘测的十五万分之一比例探测图。

3. 1904年制定的一万六千分之一比例的铺前港地图，上有以米为单位标出的退潮时最低的水深数。

据博先生说，那些成果足以让我们了解到铺前港的价值，这位高级官员还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再次赴海南岛进行水道测量考察。

他还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暂时放弃我们有关海南岛的那些计划，因为执行这些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的后果：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中国政府会抓住这个机会，对外开放铺前，结果，当出现良机，我们可以要求一个抵押或取得一项补偿作为允许其他列强也获得利益的时候，这便会妨碍我们的行动。

北部的铺前海湾和南部的榆林港海湾似乎是我们在这个大岛屿上能够占领的仅有的两个点，所以，如果为形势所迫，我们必须介入该岛，那么，我们还是先为了未来把它们保留下来为好。

盼能告诉我您对这种后果的看法，它对博先生的建议可能会显得是持保留态度的。

(签字)⑧

〔殖民部　二司二处〕

---

① 铺前(Pochin)。——译者

② 博(Beau)，时为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译者

③ 布朗谢(Blanchet)。——译者

④ 哈杜安(Hardouin)。——译者

⑤ 莫洛(Moreau)。——译者

⑥ 罗斯(Roses)。——译者

⑦ 嘉积(Katcheck)。——译者

⑧ 原件有签字，但无法辨认，下同。——译者

5. 与孙逸仙的谈话

（1905 年 5 月 18 日）

自 2 月 9 日我们第一次谈话后，孙逸仙返回伦敦，并在柏林作了一次短期旅行。毫无疑问，他希望在柏林取得他在伦敦和巴黎未能得到的支持和援助。可以想象，他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接待。

孙承认广西暴动正处于低潮。但他声称目前的暂时平静是由于下了特殊命令；当形势变得更为有利的时候，革命运动将带着新的活力东山再起。

他十分明确地暗示了日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直至今日，日本人本来应对叛乱提供援款，为叛乱推波助澜。要想从事实和某些迹象推断出日本的这一合作，我们需要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而孙的承认正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据。

然而，日本政府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不再支持改革党。这一立场的变化与日军在满洲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是相吻合的。

犹如孙在今年 2 月假设日本获胜的时候所预料的那样（见上件），日本天皇政府在北京已变得权势赫赫、无所不能，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力，已经不再觉得策动南方分离主义运动还有什么用处。相反，他们倒是希望改革党和皇朝政府和解。通过日本人的干预，孙逸仙和他的朋友、党的领袖们不仅将得到宽恕，而且还能享有高官厚禄。当日本人能够把这种和解引为自己的荣誉时，他们在北京的影响也将得到相应的扩大。

幸亏有孙逸仙的多方指点，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理解日本在中国的宣传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和有效。我们确实知道日本的公职人员跑遍中国各省，一些日本军官以教官身份几乎代替了各地的欧洲军官，而在整个帝国各主要学校里，都有日本教师协助中国教学人员工作，直至云贵边陲。日本影响之所以能得到那么迅速的扩大，是因为民众对这些新来的人并不抱仇视态度。改革党通过大量的密使，更有各会党数不清的分支，轻而易举地便能在人民中造成有利于日本人的舆论倾向，以此对日本人给予自己的支持表示感谢。

鉴于当前日本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孙逸仙认为改革党已不必再为日本在中国的公职人员做事。改革党人和会党给日本宣传提供过的这种协作，孙逸仙表示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他重又发表了一番有关团结一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和中国南方的利益相关联的观点，声称：“广西、云南各省的老百姓实在是很仇视法国人的。我们能很容易地使我们的人明白应该如何重视同你们的友谊，迅速地把这种敌对思想改变成对你们的政策和工商业的最大利益大有裨益的好感。”

孙逸仙提出可为我所用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文人，一是被他称作“骚动分子”的人们，即流浪汉和盲目服从会党首领的可怜的苦力。文人、乡村塾师可以任意指挥麇集在他们周围的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普遍倾向的主宰。

作为孙逸仙将向我们确保的这种协作的交换，他希望获得援款，用以取代日本人拒绝给予他的那些款额。他没有给我们详细说明这些援款的性质。根据这位改革派领袖的看

法,我们已经确切地阐述了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为他的党提供方便(参考2月纪要之四)。

侯耀

6. 关于9月24日谋刺案的情报
吕班[①]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5年10月5日,北京)

袁世凯的巡警部队刚在北京宝善寺内逮捕六名24日谋刺案[②]的肇事者,后者正在那里夜议。

谋刺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天津派出的密探便收到了在车站被炸死的陌生人的照片,他仿佛就是谋杀案的肇事者。

侦探们开始在这座中国城市里搜寻,首先在一些声名狼藉的地方。昨天,他们在一个叫"燕伶"[③]的歌妓院里出示凶手尸体的照片,名妓李芝[④]看到照片后表现出神色异常,然后他们迫使她招供,导致当天逮捕到其余六名同案犯。

死者何人从而也得以验明。此人姓贾[⑤],三十岁,天津人氏,曾留学日本。这正如我在9月份呈报阁下的急件中所述及的情况所导致的结果。

在其他五人中,有一个是广西会党的领袖,他们全都曾留学日本。

由于这次逮捕,改革派各界、尤其是身为大学生者人人自危。大学生中有很多人加入秘密帮会,并曾轻率地读过无政府主义的散页印刷品《浪子好》[⑥]。

仿佛所有的人都在担心被谋反者可能泄露的情况牵涉进去。最保守的人们认为,巡警部队的发现将危及他们期望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已经得到了朝廷的允诺。

〔法国驻北京公使馆 政务司 No152〕

7. 关于煽动者孙逸仙
吕班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5年11月1日,北京)

阁下已了解孙逸仙的所谓改革主义的阴谋,此人近几年来在中国各省煽动反王朝骚

① 吕班(Dubail),法国驻华公使。——译者

② 此案即为革命志士吴樾炸清廷出洋五大臣案。——译者

③ 燕伶(Yen Lin)。——译者

④ 李芝(Li tze)。——译者

⑤ 贾(Kia)。——译者

⑥ 浪子好(Lang tse H'ao)。——译者

乱，为此目的，他一直设法依靠外国列强。由于遭到中国警察局追捕，此人只得不断地在一切具有双重条件的领土上寻找避身之地：既靠近他想进行活动的地区，又执行着外国司法权力，该权力能保护他不致受到他的本国威胁。

这个阴谋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属于大不列颠的殖民地避难，然而，英国政府或是意识到孙逸仙努力的徒劳，或是担心重演从前康有为出现于新加坡所引起的麻烦，它要求孙离开香港。同样，一直是孙的可靠庇护所的日本，最近也让孙明白日本现在不再容许他进行阴谋活动，并劝他离开日本。

因此，孙逸仙离开了香港。他可能打算重新求助于广东沿海侨民的慷慨，那些侨民过去曾给他提供过很大数目的援款。另外，这也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殖民地，约两年半以前，他在同我香港领事馆代办和印度支那总督府一高级官员会谈之后，曾来到河内，要求让供应广西造反的武器和装备在东京通过。他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接待，因为当时博先生叫人告诉我，他认为我们能给此人的全部帮助就是保护他的生命，这对他已经是够重要的帮助了。因此，这次他又来到我们这儿寻找避难。不过，也许他还有其他目的，因为我了解到他在横滨市与印度支那的一位杰出人士进行了会谈，后者目前正在远东旅行。他们的会谈很快就被日本官员知悉，日本立即将此事告诉了中国政府。

孙逸仙在经过香港时曾与布加卑①上尉进行过会谈。后者受命于一个情报机构(对此我尚未接到部里的任何通知)，已与好些孙逸仙的同党联系。此外，中国政府对此事也并非一无所知。

我认为，对我而言，我们与孙逸仙搅在一起毫无好处。当然，孙曾经在某段时间中得到过他的许多南方同胞的好感，但是现在他的会员正在一天天减少，同时他的资金也将告罄，当初相信他的信仰的人，信心也日渐衰退。

〔外交部　政治局信笺　No166〕

8. 关于东方汇理银行和兴办一家法中银行的通知

(1905 年 12 月 13 日)

对东方汇理银行目前呈报政府审核的增加资本的要求，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需要作严肃的保留。

东方汇理银行仿佛就是从这种思想中得到启发的：政府的责任就是使它的股东们富起来。承认该银行有发行特权使它具有相当于它库存流通券预备金三倍的、能产生利息的信用货币流通。所以它资金的整个增加额对它来说相当于使它允许达到的金额增加三倍。面对这么巨大的优势，政府当然要了解享有这个优势的银行在为法国的普遍利益上

① 布加卑(Boucabeille)。——译者

或者我在远东的国民个人的利益上是否充分地作出了相等的贡献。

我们可以肯定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各部机关所收到大量对此的申诉和要求，简直已使人毋庸置疑。

外交部对印度支那事务是不管的。银行在这个国家的某些令人吃惊的管理方法应引起殖民部门的注意。例如在西贡，分行以12%的比例借钱给"扯弟"①，这些人是大高利贷者，对本地人和小公务员们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吸血鬼；另一方面却完全拒绝借点儿钱给其他人，尤其是法国人。而且，远东其他银行给往来账户的存款利息从来是2.5，西贡分行却什么都不给。它提出来的理由是由于它是国家银行，所以不能这么做。令人恼火的是，它的特权地位居然使它能够拒绝给予法国人与香港上海银行印度支那各分行所给予的相等的利息。从而，一方面，它为高利贷者提供大量资金，让他们干不利于本地人和我同胞的勾当；另一方面，它却无情地不让存款入它的库房。在这两个事实之间有着令人不快的关联。

像丰丹商号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个商号在云南接下了大宗的买卖，由于东方汇理银行的反对使它不能在那座城市里建立代理行，从而不得不找里昂银行帮忙。里昂银行给它的条件比那家拥有特权的大银行有利得多。

鉴于我们只能管与中国有关的事务，对此不便多说。但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

1. 东方汇理银行在这个国家的业务历来是最引人注目的；

2. 我国和我国国民在这个国家的普通利益没有得到东方汇理银行应该提供的支持。

该行于1898年，在外交部的紧急要求下，建立第一个中国分行，即上海分行。外交部为了迫使它这么做，行使了招标细则赋予它的权利。而该行这么做是很不情愿的。在它的第一份报告中，该行宣称由于它受到粗暴的压力才开办这个营业所，它根本就不希望在那里做什么正儿八经的交易。英国在远东的报纸全部转载了这份报告。下面的事实将证明它的预言兑现到了何等程度：该行曾给它的上海分行输入本金三百万法郎。自此以后它已收回全部资本，而去年该分行的红利达近四十五万银元(一百多万法郎)。

当外交部要求它承担义务建立广州分行和汉口分行的时候，人们看到那种抵制故态复萌，又是那些悲观的预见和对这些预见的惋惜。在汉口，财政稽核米舍罗③留下明确指令，对批发商不开往来账户，不做票据汇兑，不做商号证券买卖。银行业务全部被操纵在本地买办手中，他们完完全全地专做中国式的高利贷生意。然而，这个分行从第一年起就赢利8%。

今天，该行开出很高的让与价，因其被迫接受招标细则的新后果，应政府要求开办北京和天津营业所。这一次开设新的分行很可能会重演前几次的历史，实际上是该行不愿担任何风险，不愿作出任何牺牲。

如果说政府要在中国建立仿佛最能满足其继续的行动计划的金融机构，导致它这么

---

① 扯弟(Chetis)。——译者

② 丰丹商号(La maison Fontaine)。——译者

③ 米舍罗(Michelot)。——译者

做的理由显然是期待在国家和国民的普遍和特殊利益方面得到有效的帮助。这个希望没有实现。

从普遍利益的观点看，这种失望来源于该银行的组织机构。例如它不像汇丰银行，或者甚至也不像俄中银行那样，有一个躯体和一个脑袋，而是一系列账台，没有总体观，也没有一致的方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还会谈到。

从特殊利益的观点看，该行为我国在中国的侨民提供的方便还不如那些外国银行。一方面，它拒绝为它的顾客们提供系统的帮助；另一方面，就它所作出的那点帮助而言，顾客们在其他银行更容易得到。

该行对顾客执行其章程中关于没有签字拒绝借款的条文时严格得像犹太人。实际上，我们应该把中国的顾客分为三类：(1)他们有毋庸置疑的清偿能力，可以毫不担心地给予他们期限宽松的贷款；(2)地位可靠的批发商，对他们我们总可以给予固定期限的信贷；(3)资产不足的商人，他们在银行里始终应有与他们提取价值相等的抵押物，或至少有足以清偿的保证，或以货物为直接担保。然而，东方汇理银行把它所有的顾客统统归入这第三类人中去了。

因此，该行拒绝给一些可靠的单位以丝毫的通融余地，如东方新闻社(中国惟一的法文报纸《中国回声报》的出版者)，凡尔依先生，蒙东南货行①(上海最大的法国商号)。

相反，当它通过它的买办借钱给中国各银行时，它执行上述那条规定则表现得十分好商量，没有签字契约的贷款也照样同意。英国银行通常以6%的利率(因中国而降低的利率)借钱给他们国家的那些大商号，如怡和，太古，由后者再以4%的手续补贴费投放给中国人。东方汇理银行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国侨民像这样的好处。它自己以10%至12%的利率直接借款给中国人，小心戒备地收取利息。

在该行开户的顾客必须小心绝不要超出他们的保证金。上海最可靠的商号之一加亚尔②公司，就是因为账目超过了四万元，银行便粗暴地限令他们在数小时内予以补足。像这样的要求对于以九十天汇票付款的商人来说未免过分，他们不得不用现金同银行结清一切业务。而当对方是公务人员，生活在内地的领事、医生的时候，这种要求还要更苛刻些。如果他们从住得很远的府邸通过中国银行家开出汇票，即使票面只超过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账目十块银元，汇票便会被无情地打回来，绝不顾及这样做的后果会对他们在本地银行的信用带来多大的损害(例如在成都的勒让德尔医生和许多有一定清偿能力的公职人员的遭遇)。如果把这种严格得太过分的章程的难以理解的执行同英国银行那么宽容大度的做法相比较，那真是太残酷了。后者不仅对英国国民如此，对外国公职人员也如此(以邦斯·唐蒂先生为例，他穿过云南省前往缅甸，他签了字英国银行就贷款给他)。

最后，东方汇理银行从来就拒绝在法国人承包的工业事务中入股。例外地，它答应在“法商长江航运公司”中入股三分之一。到该实践许诺的时候，它就溜之大吉，使这家公司

① 东方新闻社(La Presse Orientale)；中国回声报(L'Echo de Chine)；凡尔依(Vernon)；蒙东南货行(L'epicerie Mondon)。——译者

② 加亚尔(Gaillard)。——译者

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幸好公司在中国商人那里(通过外国传教士团)找到了法国特权银行拒绝给予的帮助。

东方汇理银行老是搬出它发行银行的地位来为它斤斤计较、心胸狭隘和畏首畏尾的行为辩护。从而使政府确信它的巨大优势远非变得对法国造成损害,相反普遍有利。银行应遵照下文指定的方式作出安排,以结束这种不能容许的情况。

我们要求的绝不是银行办不到的事情,而是为我国侨民做到各地二三家外国银行所做的事;也就是说以尽可能优厚的条件转让法国商号的证券,而不是为它的股东们一味地寻求高额股息;也就是说帮助法国企业,而不是只考虑持续增加它的储备基金;也就是指定在中国的资本代理者,而不是任资本分散在许许多多的惟利是图的小代理行中。这样安排会变得对该银行有利,因为,在中国,一家正正经经的银行做亏本生意或丢了钱的先例还不曾有过。

9. 政府对东方汇理银行的要求

一、联合审查小组

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四川和福建诸省撷取了为某些专门利益建立的联合企业合同中所规定的利益。对所有这些地方,联合审查小组在管理和诚意上受到严肃批评后,已经失去勇气,它们没有别的想法,只想把这些单位拥有的权利移回给几家英国公司。这些权利毕竟还是有些价值,既然它们找到了买主。公使馆和各领事馆对这些企业的有力支持,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只落得公开承认的无力或无能,丢脸地承认我们的对手比我们强,外交部觉得这是不好的。在明知付出昂贵代价才得到的企业里至少保住相等部分利益,为此利益作出所需的金钱上的努力,仿佛并不是像东方汇理银行这样得到国家优待的机构所力不能及的。那些企业就好像是收藏品,人们保留着它们,等待着它们的实际价值得到确认。东方汇理银行扶持这些企业能导致联盟银行的加入。况且,所需的款额很大,人们常常只是要求它名义上的加入,以唤起中国资本的信任。

二、创办一家"法中银行"专门负责中国业务

东方汇理银行并无任何总体计划便来到中国,按外交部下达的指示建起一个个相互之间无任何联系的分行。今天,正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利益之大,所以要求将它们集中,正是这个机构具有的重要性需要从它分出一部分力量。实际上,银行的章程并不是针对各分行的情况制订的,所以那些分行每时每刻都会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遇到不便和障碍。另一方面,东方汇理银行享有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它拥有的从数字上体现的可使用资金,使人期望它能和新建银行之间建立起最密切的关系;新银行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扩展,

它的高级领导最好仍委托那些人担任。

新银行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呢？

政府给它指出了两个作用：法国金融的普遍利益在中国的代表，为在中国的法国人的特殊利益和本地的公众利益服务，成为方便和有力的经济手段。

1. 法国金融的一般利益。

中国和中国人的主要需要是银钱。能在中国起到作用的主要力量便是立即交付的现金的力量。

这种货物出产得最多的国家是法国，所以，法国通常应能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为了使用这种力量，必须拥有使用它们的资格。为了完整地使用这股力量，必须使这种资格是惟一的。而为了使这种使用完全符合引起它的需要，就必须使这种资格充分地看到那些需要，和在可能范围内自由支配银钱。

占有优越地位的汇丰银行便是在这种基础上建成的。对德国而言，德华银行的情况也如此。正是这些原则保证了华俄道胜银行好几年的成功。今天，法国受命来改变这个广阔的帝国，它应该以竞争国为榜样，把自身的利益把握在自己手中，再不能长此疏忽了。法国资本再不能长久地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定代表，能够进行个人和直接的行动。新银行将成为在中国的代表，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国整个资本力量的使者和代理人。它以这个资格，将从中国政府中获得其竞争对手们很难能与之匹敌的权力。近期内中国肯定需要在很大范围内请求外国贷款。如果法国想在这些贷款和将来可能准予的种种特许中取得应得的一份，它首先应当着力于建造工具，作为行动开展所必须的金融机器，犹如在锯木头以前，先得有一把锯子。

2. 法国人的特殊利益。银行章程的放宽。同本地公众更加密切的接触。

我们已经提出了东方汇理银行专有的章程和执行这些章程时的极其严格的做法，对该行客户造成不便的理由和不妥之处。新银行将十分必要地以最宽容、最灵活的方式起草它的章程，以便应付各种可能性，应付中国似确已有之的迅捷的经济改革可能引起的种种变化。

至于它今后的活动范围，只要参照上海的各家英国银行所做的工作，指出新银行在同样限度内应该做到的便能加以确定了：

英国银行在远东：对地方公司的证券，根据股票性质，按股票市场价格的30%到70%给予贷款；

对仓库担保，根据货物性质按60%到80%给予贷款；

对提单(出口)，根据货物性质按40%到70%给予贷款。

对财产证书或抵押给予贷款的情况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进行抵押权的登记，而只是以接受抵押的银行或个人的名义进行财产的过户。)

各银行根据做丝绸和茶叶贸易的商号、公司的大小，在季节到来的时候开办三十万至八十万两的信贷。客商前往内地采购，货物存放在银行指定的堆栈里。银行保留随时核实存放货物份额的权利。

新银行应借款给中国各地方当局，尤其是应把借款给总督视作它业务中最有意义的

一部分，德国银行先就明智地这样做了，接着英国银行也这样做了。这是东方汇理银行迄今都刻板地不愿做的。

它在起草章程时还应做到，使欧洲金融的便捷在最大程度上为本地公众效劳。它应千方百计地同中国公众进行最广泛和最密切的接触。在这个问题上，将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它作出一整套有益的和细致的建议。

三、新银行的组织

新银行的高级领导自然可以留在巴黎。重要的是在上海应组成一个地方领导机构，要使这个机构拥有最大程度的主动性和权力，它将指挥在中国的所有分行。

在中国的经理应有不用请示可作出决定的权力，至少在一定的资本比例限度内。如果有人对这个比例提出异议，说它轻率和危险，我们可以指出这是以东方汇理银行的某些业务，如汇寄货币中所进行的实际活动为依据的。实际上，当它的某个分行行长预见到外汇率将降低时，他应当负责把大量汇款发往法国。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否还要求上海的亨琪奥先生或香港的梅埃①先生的出纳处账目每晚都得准确平衡呢？有时这位或那位行长的信贷或亏损会出现超过二百万元的情况，而银行对完全违反其章程的行为视而不见。既然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可以让行长们如此自由，那么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可以这么办，尤其是如果我们聘用的人办事谨慎、经验丰富和了解该国国情。

另外，除上海的行长外，最重要的是要准备一位政治行长，安居北京帝国政府的所在地，这位行长应起到与从前华俄道胜银行的普科蒂洛夫②所曾起到的相同的作用。其实，这个组织方式是模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提出的。汇丰银行有一位行长在北京，此人即约翰・希里埃③爵士，他的活跃和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德华银行同样有一位前任外交官为代表，他就是科尔德④先生。

总之，新银行的目的可概述为下列三点：

1. 给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各银行营业部门以目前它们所没有的方向和组织上的统一；

2. 给予迄今为止尚四散的法国资本以常设的代表，以及与它们的数值相适应的统一的行动；

3. 通过新章程为法国商业公众争取更大的方便，或许还能同本地公众发生更广泛的和更密切的接触。

---

① 亨琪奥(Hengiot)；梅埃(Meyer)。——译者

② 普科蒂洛夫(Pokotilow)。——译者

③ 约翰・希里埃(Joho Hillier)。——译者

④ 科尔德(Cordes)。——译者

10. 上海罢市
吕班致外交部

（1905 年 12 月 18 日，北京）

由于上海会审公廨发生了一起事件，中国商人在公共租界普遍罢市；南京路和虹口出现骚乱甚至冲突。法租界仍平安无事，但我已要求海军司令派一艘战舰到上海，并请他指示舰长，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不准水兵登陆。我已提醒总理衙门，立即采取措施，刻不容缓，否则，中国政府将承担全部责任。我曾与英、俄、德公使共同商讨。

吕班

〔外交部　No107〕

11. 就东方汇理银行对 1905 年 12 月 13 日通知的意见所作的答复

东方汇理银行在 12 月 13 日通知上作的旁批并没有接触到这个文件的实质。文件提出的关于组成一个专门银行负责法国在中国的金融事务的一般论据成立无疑，从而，可以说，他们虽不同意它的结论，却承认它的说服力。

东方汇理银行的按语长达十六页，其中十五页用于讨论 12 月 13 日以文件名义发出的通知所提出和述及的特殊情况和事件。这些例子只是起个说明作用，只是附加部分，可以把它们从整体中去掉而不损及通知的实质。该行对某些论证驳之以相反的证明，把讨论引导到这类特殊的争执情况上的很大不妥，使人们根本弄不清楚所讲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问题并不在于了解该行在西贡同三四家如斯帕里台尔公司、德尼斯兄弟公司等欧洲大商号的往来账户情况，而是要知道它对那些小存户是否也提供例如像汇丰银行在中国各个港口所提供的那种方便。同样，我们也没有否认银行与封丹商号有业务来往，我们谈到的只是云南省的特别情况，等等。

12 月 13 日通知中的证明并不是轻率地提出来的，它们无非是转述了从有关人士或十分了解情况的特殊的人们口中收集来的声明。如果要加以核实，势必要进行长时间的、由于银行与客户间地位不平等而特别困难的调查。客户的怨言很多，我们只是例举一二，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了。而且问题也不是要作一个对银行以往管理的调查，我们承认银行在掌管它的利益和它的股东们的利益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当家。但是政府自然应从较大的方面着眼看待问题，考虑东方汇理银行是否充分起到了、是否能够起到目前情况下人们所期待的在中国的银行、一个国家在中国的“金融设施”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12 月 13 日通知中加以说明的问题如下：对中国的金融事务和印度支那的金融事务加以区分的必要性，在中国针对法国金融的普遍利益设立专门受委托的常驻代理的必要

性，在中国事务中它应起到的不只是一个发行银行的作用的必要性，在中国种种业务中大幅度独立局部领导的必要性。

部长的希望，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作为法国资本代理人的坚强的金融地位，它在这个国家里有它的基础和很大范围上的领导职能。“东方汇理银行”的名称本身、它享有的特权，将永远是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原因，将使中国人老是把它看作一个外国政府的工具。这是一个外国团体，它竭力想适应本来不适于它的环境，它不是符合一个特殊世界的种种需要的机关，它是这个世界的不合法产物。在中国的东方汇理银行，那是一系列四散的账台，取决于一个遥远的领导机构，一个在不同地方有其自由的活动范围的组织，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联系，仅仅受到最狭窄的地方性事务的限制，并从而支配着它们的必然是人们常常而且是不无理由地指称为法国在国外贸易的特点的那种“小业主思想”。相反，“汇丰银行”则是一个精明的统一体，它有总体目标和思想，有某种气质、毅力和行动，有传统和政策。

法国必须在中国树立让中国政府看来足以与英国和德国匹敌的形象。为了显露头角，它必须存在，然而，在上海、汉口、广州存在着不少英国银行，在中国却不存在法国银行。

其次，东方汇理银行是一家发行银行，不可否认，这一事实为它带来了特殊的地位，以及不再有任何存在理由的束缚。既然有在中国不存在导致这些束缚的特权，我们在 12 月 13 日通知中提到了必须双重签署的例子。该银行声称它在上海的手续同其他外国银行一样。然而，问题是要知道它是否以同样的比例、同样的方便程度开放信贷资源。

另外，1905 年 12 月 13 日通知中关于纯粹大都会性质的、刻板地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领导弊病的意见仍然全部成立。行动和创举应尽可能地就在对事物进行认识和体验的地点进行。

最后，中国目前正处于彻底的改革之中。由于它要建造铁路，它便需要用国外借来的钱财建立符合新需要的金融机关。所以从现在起，法国就应该注意要在中国拥有一个精明得足以了解新的形势和灵活得足以利用这个形势的金融代表。

附：

东方汇理银行行长致外交部长办公厅副主任贝特罗先生

（1905 年 12 月 21 日，巴黎）

亲爱的先生：

明天星期五，我绝对不可能去看您了，因为我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但我将很乐意在星期六应您的召唤，如果您能来电告诉我几点钟能够接待我的话。

犹如我已荣幸地告诉您的，我完全听从您的吩咐，以商榷在您给我的两份通知中提及的那些不同点。然而，有一点却是我不可能再接触的，那便是关于建立法中银行的问题。

我们的董事会在昨天的会议上，艾里·多瓦塞尔男爵报告了你们12月13日的通知和我们有幸于前天与内阁总理先生进行的会谈的内容，董事会对这个问题已明确表态。全体到会董事一致通过，由董事会决定，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东方汇理银行都不能因前一天向鲁维埃先生提出的那些理由参与创办这家新银行。而且，属于我们董事会的各信贷机构代表也明确宣布，巴黎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家贴现银行、银行总公司、工业信贷银行均不能给这家法中银行的建成提供资金和人力上的帮助。

所以，您瞧，从今以后，我已无权讨论这个由我们董事会表决最终了结了的问题，对此表决我个人只能服从。

最后，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纯属我个人的意见：

在你们的两份通知中，你们曾数次地提到东方汇理银行的小业主思想和不精明，何以你们又那么特别地希望恰恰是由东方汇理银行来创办一家法中银行呢？我觉得这似乎不很符合逻辑。

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斯塔尼斯拉斯·西蒙(签字)

一九〇六年

12. 1905年12月18日至20日
骚动后的上海形势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1月8日，上海）

德尚·德·喇伯第①先生在1905年12月22日他的政治急件No27中，已向阁下精确而忠实地汇报了当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发生的那些十分严重的事件。

他给部里描绘的情景并无夸大之处。然而，他忘了一件事，那便是在那些对外国租界来说是那么严重的日子里，他所保持住的冷静和沉着，以及他采取的措施的睿智。这些措施既避开了一切可能的意外，又不会触怒情绪十分激动的中国群众，避免了使法租界也面临毗邻租界遭到的那种危难。我真心诚意地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这位临时的同事对部里所委派给他的法国在上海的殖民区重任当之无愧，在此，我为能够给他作证而高兴。

所以，这个月第一日，我重又领导这里的工作时，觉得具体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但我发

① 德尚·德·喇伯第(Dejean de la Batie)。——译者

现人们的心里还是混乱的。乍看起来,英国人仿佛想通过展开他们从军舰登陆的部队,通过他们报刊上那些夸张性的文章,继续他们对上海的特殊意图。从他们那方面说,他们正努力以某种方式让人承认他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这是在玩火。因为,只要他们一暴露鲸吞这个港口的意图,欧洲列强便会群起而攻之,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整个长江流域。

我不难看出,在我不在位的十个月里,这里的中国老百姓对白人的态度显然普遍地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承认,我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快的变化。这无疑是那场倒霉的战争给我们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这场战争,极其深刻地动摇了黄种人的各不同民族及民众的各个阶层。欧洲人的威望烟消云散,好像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再也不必去考虑他们了。然而,依我个人来看,这是中国派往日本各大学留学的一万名学生在领导公共事务中开始产生了影响,这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这些往往正值年富力强的留学生被日本人硬性灌输那些最错误、最有害并且也是最富于阴谋的概念,让他们在国内煽起对外国人的仇恨。他们返回自己的故省后,变成了既积极又危险的反欧宣传者。目前在公共租界印刷的所有的中文报纸全都公开进行这种反欧宣传,印完后又成捆成包地向中国国内发行。

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是各列强需要十分注意的。因为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构成所谓"爱国主义演说家"的党派的新因素,我们可以发现最初是对美国的抵制,接着最严重的,便是引起上海骚乱。

如果英国人还想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会审公廨的运动坚持下去,如果他们把对他们的国民有利的赔款问题继续坚持到底,一句话,如果他们让他们随时能够借助暴力来解决最近那些事件的后果问题的想法,在中国民众中继续流传下去,那么,我们可以料定,中国人将作出一定的反抗,而我们则需准备应付任何意外事件。

不过,我相信,由于目前在我们的锚地停泊着大量战舰,老百姓们的示威活动将不会像最近发生的那几次那样大张旗鼓和剑拔弩张,但是,反对欧洲人的效果很可能要大得多。

依我看,毫不奇怪,一旦需要,上海舆论的煽动者们甚至还会突然组织极为严酷的对欧洲人的普遍抵制,以使我们港口上的商务和海事活动完全瘫痪,甚至不让我们获得我们的日常物质生活所需,在两三天内就使我们实际上不得不听凭中国民众的摆布。反美抵制的完全胜利,组织这次抵制的轻而易举,这个措施的延伸,它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香港、九龙、新加坡,甚至爪哇的中国移民中的效力都使我想到,如果英国人在目前悬而未决的关于最近的几次骚乱的谈判中不善于或不愿意谨慎行事的话,我们在上海的那些租界随时都可能遭到周围的中国人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知道欧洲人在这里的人数还不到一万,我们淹没在八十几万中国人中间,我们的处境如何可想而知。

不管怎么样,在整个这次危险的风潮中,居然还残存着一个令法国人慰藉的事实,那便是我们租界上的秩序未曾有一时被扰乱,我们还看到中文告示,要群众尊重法租界,甚至还劝在公共租界上感到害怕的中国人家庭到我们这里来避难。最后,我们女同胞的马车如果在公共租界遭到攻击或粗暴对待,她的车夫只要机灵一些,对激昂的群众大喝一声说车子里是一位法国女人,人群马上会放行,一切进攻立即便会停止。

在目前的形势下,对我们这种宝贵的豁免权,在许多人,甚至在上海的许多人看来都

是不可理解的豁免权，究竟受惠于什么原因呢？对此，犹如我在对法国侨民们作的元旦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由于我在此就任五年来，在同中国当局的关系中，始终奉行的完整的主持公道、无私和以理服人的政策；那是由于我力求以友好和与人为善的方式同中国当局协商解决出现在法租界和与我们租界有一半多边界相交的中国市区之间的讼端；那是因为在黄浦江的疏理工程中我给他们帮的忙；那是因为在"苏报"案中我和我国驻北京公使所持的态度；最后，还由于我善于赢得这里同我打交道的各级官员的尊重和尊敬。例如道台本人，在我一返回上海他就来对我进行的拜访中，他一方面合情合理地暗暗提到在公共租界发生的那些骚乱，一方面向我肯定了他的敬重。

我在法国公使馆看到过我的同事利埃贝尔①先生的一份报告。这位先生在调往香港之际，指责我在上海推行令人恼怒的、违背我国利益的政策。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是对他谎言的再好不过的最彻底的否定。实际上它们不正在最大程度上证明我待人的态度是对的吗？我在这里生活的五年中，还从来没有任何一次争执是我没有立即同中国地方当局合作解决的，我也从来没有对巴黎、或者对我国驻北京公使馆说过任何一句抱怨那些我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中国官员。

最后，我不禁要在这里表示对德·喇伯第先生的全部感激之情，感谢他完好无损地保住了我同中国人一起辛勤开创的精神状况。他以必不可少的十分谨慎的态度处理事务，以免因他所不得不采取的某个预防措施而稍稍损及中国当局对我们的诚意和信赖。在他主管上海总领事馆工作期间，他为法国利益而做的那些并非小事情。我也一心要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想法报告阁下。

巨籁达(签字)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政治司　No1〕

13. 重逢希庇斯赖②先生；法中贸易协定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1 月 14 日，上海）

昨天，帝国海关专员，正在进行各贸易条约谈判的中国全权代表的副使希庇斯赖先生，以向我表示欢迎为借口前来造访，他实际上是想从我口中了解，法国政府打算什么时候进行关于我们的贸易协定展期问题的会谈。

我急忙对他声明说，我对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图一无所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我国驻北京公使馆毫无疑问会把我们的意图告知外务部的。

希庇斯赖先生还就我们在未来的谈判中的态度提了好几个问题，我回答他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实在无权奉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插手。

---

① 利埃贝尔(Liebert)。——译者

② 希庇斯赖(Hippisley)。——译者

接着，他谈到政教分离问题，问我是不是觉得，现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法规已彻底明确地得到实行，我们对传教使团不必再给予保护。我对他声明说，我不了解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图，不过，纵观我国历史可以发现，即使是在危机时期同教皇国完全断绝了关系，我们仍没有稍减在非基督教国家里实行宗教保护的政策。我还说，我们认为，保护政策的实行，不仅仅是出于教皇的意旨，而且正是遵照法国同有关国家政府订立的条约行事，尤其是同中国。我觉得，尽管我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参加这方面讨论的法国谈判代表肯定会独立思考，完全是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办事的，只是我对这些指示的总方向、内容，甚至它是不是存在都完全不知道。

希庇斯赖先生在离去的时候显得很窘迫，因为他在关于我们未来的行动问题上连一点迹象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得到。宗教保护政策显然是他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很可能成为我们的谈判代表以逸待劳地等候中国全权代表们提出建议的好条件。我觉得希庇斯赖先生的活动是值得向部里汇报的。

巨籁达(签字)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商务司　No5〕

附：

(1)有关贵州省的情况

贵州省值得我方特别注意，因为它地处中国西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我印度支那属地内侧大地的中心；还因为它的土地出产和矿藏资源；最后从人种学观点看，它今天仍然是顽固抵制汉人同化的策源地。

有不少旅游者曾经游历贵州。这个地方虽然相当荒凉，而且尤其同云南一样，崎岖不平，公路却很多，纵横交错，通往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这便是人们为什么在那里画下许多路线图的原因。英国人贝勃、布尔纳、何塞、帕克和克拉克①曾穿越这个省或游览了四川边界。在我们法国探险者中，弗朗索瓦先生和博韦先生、热尔韦—库泰尔蒙夫妇、里凯先生和富瓦②子爵曾走过了人们走得最多的道路，尤其是里昂传教使团，在这个省里认真地做了工作。

然而，人们对贵州的了解仍然是不够的，主要是对它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土著部落居住的地区。这些部落以比较特殊的方式盘居在该省靠近湖南和广东、广西和云南，最后是靠近四川省部分形成的拐角里。在这些部落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苗仔③，苗仔在那里仿佛有自己的扩展中心。自称为“傣姆波”④的苗仔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点。他们的语

---

① 贝勃(Beber)；布尔纳(Bourne)；何塞(Hosie)；帕克(Paker)；克拉克(Clark)。——译者

② 弗朗索瓦(Francois)；博韦(Beauvais)；热尔韦一库泰尔蒙(GervaiseCurtellemont)；里凯(Riquez)；富瓦(Foy)。——译者

③ 苗仔(Miao－ze)。——译者

④ 傣姆波(Tai Mpeo)。——译者

言接近印度支那语，即傣语、老挝语和暹罗语，但是“傣姆波”们比讲上述民族语的印度支那百姓更强壮、更活跃。他们头脑聪明，心灵手巧，仿照汉人学做一手好工艺，特别是泥水匠、石匠等。如果法国人要在西部中国建立土木工程方面的大企业的话，研究一下如何利用苗仔提供的劳动力显然是很有实际价值的。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些建筑公司在云南工地上迄今遭遇到了哪些困难，必须为那些工地提供从邻近各省招来的工人。

把补充里昂传教使团工作的有关当地特产的情报收集起来，同样将是很有好处的，大多数特产已经成了重要外贸商品。首先，例如油料、生漆和清漆，以及野蚕丝，还有没食子和某些兽皮(如麝猫)。这些商品一般经过四川市场，所以常常使人搞错了产地。它们多数由土著出售给汉人掮客，因而很难得到它们的样品，价格也抬高了。就产地作出精确的统计可能会有助于交易的进行，从而使交易迅速得到它应有的发展。

同样，我们还能从土著那里了解到必要的情况，以便绘制地下资源图，那里蕴藏着朱砂、汞、锑、煤、铁、铜、锌、含银铅、硫和硝石，在石灰岩高地还能找到价值颇高的大理石。

我们刚刚勾勒了开发贵州的粗略线条。系统地开发贵州将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它需要进行初步的勘测，确定主要据点，准备建筑道路，尤其是通往土著地区的道路。

我们建议把这些预备性的调查工作委托我国驻四川领事邦斯·唐蒂①先生办理，因为贵州在他的裁判管辖区内。唐蒂先生目前在巴黎休假，他将于年底返回成都住所。他得到外交部同意，自告奋勇选择路线，以便使他能够起草一份符合上述要求的报告。他的巡视将持续约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要查遍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尤其是以前还没去过的地区，与以前走过的道路交叉的路线。我们认为不必再重提我国驻成都领事的资格了，它们很自然地说明应由他来进行这次考察，这是他十五年来在广西、云南、四川进行的，使他荣获地理协会和商业地理协会颁发的各种奖赏的考察的补充。我们只是要说一下，他对中国西部地区土著的情况特别了解，学会了他们的土语。特别是贵州的苗仔，他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2)贵州简介

贵州是一个内地省份，它南面有广西，北面是四川，西接云南，南临湖南，面积近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七百万。所以，它是中国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省之一。

从自然地理情况来看，贵州像一座拉长的金字塔(平均高度一千五百米，西南部有一些一千八百米和二千五百米的山脊)，一个山顶四面坡，流水顺坡而下，南面注入西江，其他三面注入长江。这种地形说明了土生土长的苗仔为什么要称这个地区是“给焦”②即“上游地区”的原因了，汉文的贵州显然是这个称呼的音译，意义并不相符。

汉人正式地把这个省掌管起来的时间并不长，那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400年左右)。以前这里的土著独立生活，苗仔一直是这里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很可能是赶走了

① 帮斯·唐蒂(Bons. d'Anty)。——译者

② 给焦(kei tciau)。——译者

在他们之前生活在这里的印度尼西亚类型的人民后定居下来的，我们找到了他们留下的许多痕迹(卡杜、布拉①等)。同样还应提到某些很小的民族，瑶、僇僇。

贵州地貌与四川和云南相似，它表面覆盖着一层黏土或皱褶很深的砂岩，在背斜的中心石灰岩底层结构上，上覆岩层因为矫正而变得显而易见。

贵州气候属亚热带，山谷中相当炎热、潮湿，雾气弥漫，对健康有所危害。

14. 关于上海保安警察部雇员建立互救及退职会的计划

内务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1月17日，巴黎)

承蒙您将我驻上海总领事的一封函件转给商业、工业、邮电部长先生，鉴于该函询问有关上海市保安警察部雇员建立互救会的计划的情况，那位部长认为此事属于我的职权范围，又把信转给了我。

我荣幸地给您附上有关互救会的1898年4月1日法令一份和遵照此法令起草的章程样本一份，请您将它们转给希望在这些文件中找到想了解的内容的有关人士。

随信附上您转来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函件。

〔法国内务部　情报处〕

15. 上海骚乱的新传闻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1月18日，上海)

继本月8日我的第一函之后，我应向阁下报告，上海的精神状况，尤其是在本地老百姓中，很慢也很难恢复平静。春节越来越近，引起不安的原因却依然存在。各国租界到处都可以看到手写的布告，预告着令人担忧的骚乱。我外松内紧，采取必要措施，以免引起公众的注意。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公共租界市政当局和它好闹事的秘书布朗②先生。他们对去年12月18日和20日骚动期间法租界平安无事和完好无损十分恼火。他们还是愿意看到我们也遭受攻击。即在今天早上，证实为公共租界市议会的武力外交政策的卫道士《字林西报》还发表了一篇概要说明(附件No1)，我不得不把这篇东西的刊登归咎于那种令人不快的思想状况。

---

① 卡杜(khatou)；布拉(poulag)。——译者

② 布朗(Bland)。——译者

我们租界这几天专门派出警戒的秘密警察、中国市政府的警察以及散布在中国市区的大量基督教徒，都根本没看到过英国报纸所提到的所谓反法告示，也没听到过有关传闻。这个情况我在此毋需多说。

我们的水兵除了他们平日该做的在陆地上操练，我要求一切照原来的方式进行，以便让中国民众觉得形势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东西。我让费特①先生找《字林西报》主编询问情况，这位主编没能给我满意的答复，原因当然就不必说了。

我让那几名换防的殖民地陆军士兵随明天的邮船出发，他们是德·喇伯第先生为防备万一留住在顾家宅②军营的。我认为，有"笛卡尔号"在这里，我们就万无一失了。另外，我也和我们战舰舰长谈妥，以免因那些事件感到意外。

巨籁达(签字)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政治司　No2〕

16. 中国事务

克拉弗利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2 月 9 日，巴黎)

在我以前的信里已经提到了最近发生的好几次事件，尤其是去年 11 月 25 日的信(废除粤汉铁路的特许权)和 12 月 23 日的信(No185③，废除苏州、上海、杭州铁路特许权的表现)。这种种事件特别表现出使天朝政府和主要人物越来越兴奋的政策，这个政策可以概括成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把中国还给中国人。《伦敦和中国电讯报》在今年 1 月 15 日社论中就此问题发表了下面的想法：

"中国政府——我们在各省里看到的肯定也是如此——仿佛正在努力实施把中国还给中国人的政策。《泰晤士报》驻上海通讯记者提到了两个性质够严重的情况。前一个与上海的河运服务(上海河工道)有关，根据约定，将由一个国际事务所领导执行。嗣后，它又因 1905 年 9 月列强的允诺而作了修改。当时，大家商妥用一个协议取代 1901 年议定书的条文，根据这个议定书，中国应自理费用承办这个工程，因为航运事务管理(管理委员会)将由上海道台和海关专员负责，由列强承认的一名总工程师④协助工作，而财政管理应接受领事使团监督。现在，两江总督正式通知建立一个所谓的航运局，并任命了该局的本地官员和一个外国秘书、前美国总领事戈德努⑤先生，总督本人保留了河运总督。像这

① 费特(Feit)。——译者

② 顾家宅(koukaza)。——译者

③ 领事馆司。——原注

④ 我在去年 12 月 12 日的函(No175)中已作汇报，荷兰工程师德·利克(De Rijke)于 1905 年 10 月被任命担负此职。——原注

⑤ 戈德努(Goodnou)。——译者

样的安排，列强是不大可能同意的，它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一重要工作。

“另一表现出目前那种动向的情况存在于下面这个事实中，经与江苏、浙江两省巡抚会商后，沈大人①正式宣布取消英国关于修筑沪杭铁路的特许权，并宣布浙江当局已接到修筑此路的圣谕。中国政府为了表示自己对反洋人风潮的调和态度，居然无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这个特许权是在 1898 年为补偿在卢汉②事件中的言而无信无条件地给予英国的；第二，中国的各省当局既没有办法，又没有愿望建造这些铁路。”

在关于计划中的广州到汉口的铁路问题，今年 1 月 29 日的《伦敦和中国电讯报》披露了下面的情况：

两广总督为征集汉口铁路的资金而作的课税计划打乱了商人、社会显要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各商人同业公会决定采取报复措施举行罢市，而总督则威胁要砍带头闹事者的脑袋。在这种情况下，从上海派出了三艘中国炮艇。

另一方面，就在这一期上，题为《中国的新精神》的社论特别有趣地提到了日本人对于大朝人目前态度的看法，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正如日本报纸《日日新闻》驻北京通讯记者所强调指出的，中国虽然还没能力建造它自己的铁路，却既不力争，又不让人有任何可能恢复已经授予的特许。我们应该指出，从广州到汉口的铁路已经在外国的帮助下，回到他们的手中。现在他们要捞回天津到镇江铁路的特许和取消一个英国联合企业在河南省开矿的优先权。这位通讯记者提出，抵制美国货和廉州③之辱都是这被他称作当然是对中国人的利益而言令人十分遗憾的运动的一部分……”

（由于这家报纸仿佛已成了当今西园寺内阁的半官方喉舌，所以这种意见就更值得注意了。）④

还是在这一期《伦敦和中国电讯报》的北京和天津栏里有消息说：

有些迹象表示唐绍仪将担任广州到汉口铁路的中国代理人和上海到南京铁路的总理。沈道台已正式通知北京，有关沪宁铁路的资料全已收集和整理成册，并将寄呈唐绍仪审阅。

显然，英国人不会同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企业里接受一个敌视他们的人担任沪宁线的中国总理。对唐的这两个任命如果成立，那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说英国人在粤汉线业务上的利益是不会被牺牲的。况且，可以预期在那些利益中，很大一部分最终是要保留下来的。事实上，不管目前的表现怎么样，有两个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特许权是中国当局用香港政府给的预支基金向美国人赎回的；另一方面，普遍认为，中国人自己是不可能找到必要的资金来完成这个企业的。

埃德·克拉弗利（签字）

〔政治司 No2〕

① 沈大人，可能指沈云沛，时为邮传部侍郎。——译者

② 即卢沟桥（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原注

③ 廉州（lien-tcheou）。——译者

④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批语。——译者

17. 关于中国最近几次骚乱的诏书

吕班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3月20日，北京）

在列强外交代表的压力下，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道诏书，要求全国民众保持平静，要求各省政府保护洋人。

这道诏书证明了政府最良好的愿望，但对骚乱的严厉镇压、尤其是各省高级官员的免职或调任，却给人以与这个有点平庸的文件完全不同的印象。中国肯定普遍地感到不安，流言蜂起并传遍四面八方，何止令人感到担忧。昨天，我还不得不提请外务部注意河南一个秘密帮会的活动。该帮会公开集会，其纲领露骨地包括有毁坏铁路和电报线，驱逐洋人和推翻清皇朝等内容。

吕班（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政务司　No28〕

附：

中国外务部主事庆亲王殿下致法国公使吕班先生

（1906年3月7日）

我荣幸地呈交阁下一份诏书的印刷件，这份诏书是陛下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906年3月5日）颁发的。

（附上文件）

诏　书

〔公使馆办公室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906年3月5日）收到〕

真诚与融洽是各国家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首要基础，皇朝政府与东西方各国保持贸易关系，缔结条约，充分表现出它的真诚和公正，相互友好信赖的关系无疑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肯定并不存在任何不和睦之处。各国也从自己角度曾对这种友谊作出过热情的帮助，从而巩固了中外之间的和平。这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朕获悉近日来流言蜚起，不可逆料的严重暴力行为突然出现，因为有人造谣说要驱逐洋人。尽管这些谣传与事实毫不相符，它们却在民众中引起持续的不安。而如果寻根溯源，我们可以肯定，散布这些流言的是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是乱党们在兴风作浪。其目的，是要使我们良好的国际关系破裂，还是想在我们人民的心中引起愤怒？真是卑鄙阴险，居心叵测。然而，从普遍和平的观点来看，其后果十分严重，使朕不得不清楚明确地

作一一解释，以便消除误会或猜疑。

我们正经历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种种困难需要我们依靠所有国家以世界和平为目标的相互团结。为什么恰恰要在这种时候，我们自己去招来猜疑和不信任而破坏这种和平呢？

目前在我们帝国，所有的人，从君王到他的大臣，只应有一个思虑：努力打破成规，向懒散作斗争，致力于妥善管理，热情现实地施行确乎有效的治理，使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各地学生应清楚什么是忠君爱国，应修身养性，改正错误，认真致力于自己的学业，等候政府召唤他们为国效劳，从而变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们在遵循朕批准的学校规则，注意纪律，注意自重，特别不可干预外交政策、妄加议论。国家肯定应当牢固地统一和集中，但也不应有任何仇恨洋人的感情；我们肯定应该保障和捍卫我们的权利，但也不应有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如果读书人对这一点都不懂，在他们的头脑中缺乏睿智，头脑简单的愚民又能到哪儿去寻找带路人呢？而如果寻衅作乱的人乘机捣乱，对地方不是要带来祸害吗？

朕命令，即自此谕公布之日起，各满族将军、都督以及各省巡抚，务必叮嘱自己的文武属员提高警惕，切实做到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各国传教使团。倘若有何不满分子突然出现，当局就应发挥国法的作用。倘若有人散布谣言，企图制造混乱，或者无节制地进行罪恶活动，则应将这些肯定不会恪尽义务、遵守法规的人立即逮捕，予以审理和惩处。如果由于预防和保护的措施不力，导致发生严重事故，地方当局必将受到严厉惩处。

所有的满族将军、总督和巡抚应及早发布告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良好秩序，自咎以往，警惕将来，以防不测，协同政府同友邻保持良好关系，为百姓保障太平。

钦此。

18. 中国的形势及留洋回国学生的情况
克拉弗利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3 月 24 日，巴黎）

3 月 19 日《泰晤士报》以《中国的排外运动》为题，在最新消息栏刊登了该报驻上海特派记者 3 月 18 日发出的急件，急件中说：

“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处处起着重要的和恶劣的作用。”

上海站记者的一封信详尽地描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它肯定了《泰晤士报》急件中的大部分说法，仿佛构成了在这个急件基础上的发挥。

“目前中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且肯定是这些力量中最活跃的一股，是为数众多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外得到培养成长，带着满腔的改革热情返回故土；他们正在使整个中国都感到他们的存在。迄今为止，从最高的官职到乡村塾师的职务均由按成规传统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和学究们担任，这些人构成一个强有力的阶层，一律反对任何对旧制度的改变或改革。然而现在，读书人的权势开始被在外国造就的大批学究所褫夺，后者善于顺应新

的意愿，那种突然产生的对现代知识的新的意愿。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新派学究们的影响比旧阶层的更有害处。他们中很多人只受到一年或仅仅几年教育，他们无知而自信，还以为什么都通晓、睿智无边。他们的主要目标有三个。首先，他们希望对中国来一个彻底的改革，引进欧洲影响。他们想要立即进行这个可怕的变革，却并不考虑现有条件、旧的信仰、习俗和偏见。第二，他们的目标是反对清王朝。很多人希望满洲皇朝退位和建立共和国。由于满洲皇朝还远没有失去普遍中国人的人心，并且早就不被人看作是一个外族皇朝，所以，纲领的这一条要想实现，那就非得以一场可怕的内战为代价。第三，学生们想要做到排除一切外国影响。日本是放在他们眼前的典范，使他们重新集合起来的呼声是'把中国还给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推行过程中，他们比最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更仇视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他们反对给外国人的任何铁路特许权，反对任何矿务辛迪加。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在目前，则是废除治外法权。他们同所有的搞理论的人们(理论主义者)一样，对重重障碍一无所知，并且鄙视折衷。中国要建造它所需的铁路，既没有钱，又没有工程师，然而来自外国的钱和指导却都将是不可容忍的。中国没有代议制政府的经验，然而，居然要给中国人民一个共和国。很多学生想要掀起一场1900年那样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希望在一片混乱中，既吓倒外国人，又推翻北京政府。他们即将利用受他们支配的新闻界，煽起某种危险思想，煽起中国群氓的偏见，而这些偏见一经煽起便不容易再加以控制了。其实，留学生们在传播新思想和鼓励改革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中有很多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得到像袁世凯这样的进步总督的招募，让他们帮助由他们发起的改革，或就任在北京的各个政府职务。很多人作为教师在新学堂里作出优异成绩，这些新学堂开始在全国发挥作用。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各地逛荡，他们是十足的煽动者，而他们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

埃德·克拉弗利(签字)

〔政治司　No16〕

19. 关于委托海军中尉朱热和柯诺[①]先生在海南岛进行考察的记要

(1906年3月30日)

勘探和系统地研究海南岛的情况对法国有何裨益已不必赘述。

本记要旨在说明现有的有关海南岛地理和经济状况的资料之不够精确。

海军中尉朱热先生和柯诺先生以前在长江上游的警戒水域供职，他们曾在那里进行过重要的水道测量工程。显然他们是被专门指定来完成这次考察任务的，而且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以前的工作中得到证实的才干和专门学识，还因为他们的毅力和禀性赢得了看

① 朱热(Juge)；柯诺(Conneau)。——译者

到过他们工作的我国驻四川领事邦斯·安迪先生的全部信任。他们为自己找了一个对中国的事物已十分熟悉的海军军医结伴而行。

考察团打算利用崖州谷和卡寨谷,利用洋浦和海口的河流横穿过海南岛。很可能使海岛腹地难以接近和不可进入的传说变得比较切合实际一些。一边就地查核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考察生产和河道的适航性;一边使当地人习惯同欧洲人,尤其是同法国人的接触,这将是很有好处的。

考察团至少有二万法郎,在六至八个月时间里便能完成这些工作。请求亚洲法国委员支持的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也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中有一个曾于1897年在海口住过两个月,占领时期又曾在赣州待过四个月。另一个曾在赣州小住半年。1905年,他们俩都曾在四川完成过一项水道测量任务。挑选的医生曾在赣州作战(博物学学士),他将能特别注意地质和植物学方面的工作。

由于从来还没有人横穿过海岛,所以海岛腹地的情况完全不为人所知。考察团准备从海口出发,穿过中央山地,利用那些河流提供的方便进入之处,首先到达榆林港,然后按海岸测绘图(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先后进入该地的四个自然区。所有这些活动基本上将具有和平的、科学的和商业的性质。

最近获悉的有关海南岛地理和经济状况的资料。

地理状况:提一下已知的几个距离,一方面,它到北海或到广州湾基本上等距离(六小时);另一方面,它同海防和广州之间的距离差不多相等(十二小时左右),以及它到西贡和上海的路程也相等(两天)。也就是说,它在法国势力范围的中心。

面积:四万公里(周长),其中已了解和开发的部分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人口:来自沿海各地,有福建人、汕头人、广州人、高州人。

中部土著,独立部落,为黎族或苗族。

总共近五百万居民(《贸易导报》,1904年2月11日)。

山岳形态学:这部分情况很少为人所知,以至于那些海南岛地图在该岛山脉(五指山)的地理方位上都标得矛盾百出(见附已版地图名单)。

水文地理学:重要河流十条,全部发源于中心山地,其中只有一条进行过水道测量,并且只测量了它流程的一半(1898年由殖民部长委托印度支那局发行的地图)。其他几条全部画的虚线,并且是按照十分古老的中国地图画的。

气候:考察不完全。下文引自1898年5月14日科学杂志《自然界》:"而且,海南岛的气候对欧洲人来说是很好的。一方面,地势低矮的沙质海滨有些嶙峋悬岩峭然壁立,犬牙交错,有时都是呈凹形的绵延海湾,它们后面常常隐藏着泥沼池塘;另一方面,中部的崇山峻岭和中央高地的气候对身体健康十分有益。在那些高山之巅,不断能感到一股习习凉风,怪不得那些定居岛上的美国传教士们在中央高地的西坡靠近那大的地方创办了一个疗养院……我们的同胞,被东京湾和交趾支那的热病损害了健康的同胞,在那里将很容易地使得到康复。他们迄今为止仍不得不返回法国或前往日本休养,而面对这长途跋涉他们往往退缩,结果为此不慎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将可以就近,在几乎是热带气候中找到欧洲的温度,使他们能够……这便是把这座所谓'中国窥视我亚洲领地的眼睛'的岛屿

变为法国殖民地的又一条理由,而如果它被另一个列强所占的话,将损及我宏伟的远东帝国的安全。”

附:

(1)1877年以来的贸易发展

(1904年2月11日《贸易导报》)

1877年……………1203323海关两		
1893年……………2890881海关两		
1898年……………3684908海关两	(两:3.34)	
1900年……………4432822海关两		
1902年……………5573871海关两		

1903年,由于大米进口量减少而略微降低。是年海南岛收成非常好。

物产:沿海地带(尤其是北部和西北部),畜牧业(猪和牛),农产品。法国马蒂①公司的货运有相当大一部分便是这些产品。

海岛内部情况了解甚少,然而根据传教士或探险家们提供的少量资料来看,那里应是矿藏和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实际上,《自然界》便说起过“东方医生们十分欣赏的珍贵树种,如‘鹰木’和‘小豆蔻’”。毋庸置疑,岛上还出产其他珍贵树木,为欧洲人更欣赏的树木,然而,由于住在内地野蛮人不知道如何利用,致使那些自然资源未得到开发。那里的土地上还生长大量的靛蓝植物和一些棉花,地上地下的物产利用情况也差不多。

《自然界》:“矿产资源并不比我们前面例举的物产稍有逊色。地下矿藏极其丰富,我们简直在地面附近就能找到大量的铜矿、锡矿、含银的铝。煤层也已被发现。最后,在那些河流的砂砾里蕴含着很多片状金。

“…………

“到处都有一些,而主要是在海岛两岸的感恩地区,当地人捡到一些宝石,诸如祖母绿、黄玉、石榴石、红宝石、蓝宝石等等,这些宝石大多数都很小,但也找到过几颗相当大的。”

这些说法部分地得到了马德劳尔②先生在《法国海外和殖民地杂志》③的文章的进一步肯定(1902年4月)。

出口:主要是蔗糖、猪、家禽,可能的话还有大米。东京湾荒年时很大一部分大米来自海南岛。

进口:有时进口大米、石油、棉织品、鸦片。

---

① 马蒂(Marty)。——译者

② 马德劳尔(Madrolle)。——译者

③ 法国海外和殖民地杂志(Revue francaise de l'etranger et des colonies)。——译者

人口外流:必须阻止人口外流——

1901 年………………外流 16986 人

1902 年………………外流 26560 人

使民众从事开发岛内资源和建造交通线路的活动。

居民:沿海地带民众温和、勤劳,中部民众未经开化(1904 年法国副领事侯耀)。

(2)现有地图

1. 海滨

海军水文测量科已发行下列地图:

北海岸:

从海口到庇亚角①(1885)。

从澄迈到抱虎角(1882)。

从临高到平茂(1882)。

海口(1879)(根据一幅英国的测量图)。

洋浦(1881)(英国海军部拥有一幅海南岛的海峡图)。

南海岸:

一幅简略测量图,只能用作堆坳沙②水蛇岬的指南图(1818)。

陵水海湾近似图(1817)。

1889 年绘制的三亚海湾和波纳③岛测量图。

俄国人绘制的加阿龙海湾测量图。

榆林港图(1817—1860)及英国人于 1882 年出版的校订版。

西海岸:

小金字塔(1889)和海岛④简略测量图(1881)。

所以海南岛的边线只是在北部的庇亚角和抱虎角确定了一部分。

在南部海岸,只有三亚、加阿龙和榆林港的情况是清楚的,不过还必须用准确的三角测量把它们联结起来。

东海岸的情况一无所知,而西海岸也只有两个点已经有了测量图。

2. 内地

关于海南岛内地的情况,1904 年 1 月版题为《西尼亚书库》的著作提供了已发表作品的名单。其中最有趣的是 1899 年耶稣教传教士热雷米亚瑟夫⑤在日内瓦地理协会作的

① 庇亚角(cap pillar)。——译者

② 堆坳沙(Tuiosa)。——译者

③ 波纳(Poneut)。——译者

④ 海岛(Hoi—tao)。——译者

⑤ 热雷米亚瑟夫(Jeremiassew)。——译者

一个报告；一篇发表在1902年4月号《法国海外和殖民地杂志》上的文章；发表在《自然界》上由弗朗西斯·默里①先生署名的一篇摘要；尤其是马德劳尔先生发表的作品：

1897年7月1日：海南，中国的殖民：外交与殖民问题；

1896年和1898年：商业地理协会通报；

1898年：地理协会报告和通报，附地图若干；

海南和邻近的大陆沿海地带（查拉麦尔，1900）。

在附于本报告的草图中，我们将看到德·马德劳尔先生于1896年走过的路线。他想深入岛内的努力失败了，经过不幸的尝试后，他不得不半途折回，尔后走遍该岛的沿海地带。由于他单枪匹马，又没有精密仪器，他所绘制的、将成为后来者们的宝贵指南的测量图上标的却都是不精确的近似数，只成为一幅真正的地图所需要的大概内容。

20. 孙逸仙博士途经上海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4月22日，上海）

中国著名的煽动家旅途中用了高野②的假名，最近他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轮船"波利尼西亚号"经过上海前往日本。

当然，中国当局对他在吴淞口逗留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自他在法国和英国同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政治家会晤后，他前往东京无疑是要为中国革命党力争博得目前日本当政的自由党内阁某些成员的好感。

他将得到日本政府怎样的接待呢？这却很难预料，因为中国总的局势显得那么混乱。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日本不会感情用事，它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

日本天皇政府是与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暴动、经受过某种在革命党推动下的革新图强的中国（而这个革命党的领袖们观点激烈，他们怀着真诚的信念，相信能推动他们的幅员广大的国家走向欧化文明）打交道合适，还是仍如现在这样，同一个衰退的皇朝来往，同一个无生气的、对来自国外的任何推动力量都没有多大积极抵抗力量的民族交往，同一个对外界事物毫无正当认识的老迈年高的皇太后、一群腐败的惟利是图的官吏和一个没有力量没有毅力没有权威的皇帝打交道好呢？全部问题即在于此。如果我们了解到隐隐约约反映在奥库玛③伯爵的报告里的、由最近那场战争所引起的日本的欲望有多大，那么，目前的中国显然是最合适的。而如果日本还注意到了高野博士，那也只是想用甜言蜜语力图使他依附自己，使它在这场赌博中当需要满足目前已那么难以掩饰的贪欲的时候，多一

---

① 弗朗西斯·默里（Francis Mury）。——译者

② 高野（TakaNo），为孙逸仙的日文假名。——译者

③ 奥库玛（Okuma）。——译者

张王牌。

"拳民"最近的溃败①,可惜对官僚阶层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也承认失败,可是却把最近的失败与1900年的失败混同起来,没有把失败的原因归纳成自己不是欧洲军队的对手,而仅仅推诿于缺乏准备。而且,他们心中的这个信念还因为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而更加坚定,因为,对中国人而言,他们绝不能有一刻允许存在这样的想法,即他们作为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人已经做到了的,他们竟做不到。因而,他们现在正作出巨大的努力,要创建一支军队,并且很可能要重建海军。成千上万的学生被派往日本,在日本的各个大学里学习战胜欧洲人的本领,而数百日本教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整顿各省军队、培养军官和士官生,以及在各省政府里担任技术顾问。袁世凯总督便已经有了一支这样的军队,在最近几次当着欧洲各国武官的面进行的操练中,它还表现得相当有气势,促使各地总督也想效仿着建立日本式的军队。改革精神慢慢深入人心。各省的秀才们都组成了社团,抵制外国人的任何要求。民众的倾向变得同1900年暴乱前那样的仇视欧洲人,目前使用的口号"还我河山"一语道出了这种局面。1900年和1901年受到欧洲军队最猛烈攻击的朝廷摇摆不定,确实不知何去何从,它一方面允许人们作上述各项军备,提供有关武器,另一方面自己仿佛对把中国引向未知的前途的这场运动不十分放心,它对各国委派驻北京的公使几次三番作出最和平的,最不好战的保证。朝廷方面的这种踌躇使它成了改革派计划的绊脚石,高野博士和他的新派信徒们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将很可能是推翻满清皇朝。用什么来代替目前的政府形式呢,共和国?或者,找一个明朝的后裔,让他重登祖宗的宝座?他能左右他的信奉者们吗?而一旦中国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他能够阻止对欧洲人的大批屠杀吗?

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从我所获得的情报来看,我相信高野博士想建立一个共和国,他答应保证外国人的安全。但是,麇集在中国的可怕而无知的群众还不认识他,他会不会穷于应付?这是很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肯定不会有任何力量来保护外国人。

那么,那时处于如此严重的事态之中的日本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英国人认为,他们的这个盟国,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最强盛的国家,拥有一支随时作好准备、立即可以使用,最强大武装力量的日本,将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宪兵,将以列国的名义,在中国完成绥靖者的职责。这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日本明确表示支持革命党,站在中国改革派前面领导运动,事情又会变得怎么样呢?另一方面,即便不是这样,即使是如英国所希望的那样,日军在广阔的亚洲大陆登陆散开,是为了对革命作战,他们是否会不得不在中国常年驻扎下来,确保就各种观点而言的协调一致,担任实际上的领导和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为它自身的利益建立起世界上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强大的国家呢?这便是高野博士目前在日本作一般性访问所引起的一些十分严重、十分可怕的问题。如果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他会在四五个月以后发起大革命,从根基上动摇中国,推翻清皇朝,建立他梦寐以求的新局面,那么我们便将亲眼目睹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变。不管怎么样,我还颇不相信革命党能取

① 似指1906年2月的南昌教案。——译者

得最后的胜利，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日本都将是这一事件中惟一的获利者。

巨籁达(签名)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政务处　No14〕

21. 总 形 势
顾瑞[①]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5月17日，北京）

公使馆最近接到的情报证明，南昌事件和因这些事件迟迟未得处理所引起的骚动尚未在江西得到平息，并且还蔓延到了安徽和河南两省。另外，来自南方的消息，说明帝国这一部分地区的局势仿佛很不稳定。

必须承认，只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件，全国和平的局面便会一触即溃。中国人带着即刻改革的毫无理由的非分之想，砸碎了使大家俯首贴耳的陈旧枷锁，还来不及用一种真正的民族情感来取代它们。一个中国人对我说："我们在新房子建成以前，先摧毁了旧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在连工程图都还没定下来之前。为了说明改革的益处，新式知识分子和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们便开始证明当前这种社会组织的罪恶。这是容易办到的，罪恶也都千真万确。这种社会组织受到人们的蔑视。于是，人人都寻找能使中国尽快独立于世界民族的方法，效法日本便在他们看来成了必然的途径。但是，在如何进行这种改革的方法问题上，人人的意见都不一致。

在中央政府方面，它担心如果坚持反对的话，会被潮流卷走，于是草草采取笨拙的改良措施，这些措施既不能为它取得本国国民们的赞同，又常常引起外国人的不满，结果使骚乱有增无减。我们先后看到的警察、军队、国民教育、国家考试、海关设施等等的改革便是如此。大家根本就不能肯定公众的思想是否能领会所有这些新事物，或者公众的思想是否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混乱。在帝国本身的几次会议上，许多党派互相角逐，有依附于目前情态的旧官吏，而按新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则焦急地等待着为他们空出位置；其中有袁世凯的朋友，也有他的敌人。清皇朝在所有这一切的包围之中摇摇欲坠、奄奄一息，耳目不明、无法行动，寻找它找不到的据点。必要时能够使所有渴望变化的人取得一致的只有一个也许是已经明白了的方法，那便是推翻清皇朝。因为那些以"把中国还给中国人"为口号的人们把外国人在帝国的存在，以及所谓由于外国人的苛求而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的负担的责任归咎于满洲人。最不可逆料的局势便可能引起这场危机，例如皇太后和皇帝的死，这两件事如果几乎同时发生，而又没有一个坚定果断的人作好了攫取政权的准备，那就有危险了。然而中国人一旦掌握了中国，他们又会把中国变化成什么样子呢？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已经表现出地方主义的种种倾向，每个民族、每个宗派都想要使运动

① 顾瑞(F. Gouget)，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译者

转向自己的独家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外国人将大大地遭罪，但他们却是这场内战的最小的受害者。中国无疑将遭受长时期的内战之苦，从它的历史我们可以预见到这场内战的惨状。而如果形势不揭示出那个负有天命的人，使一切恢复秩序，那么我们也许将看到这个国家在来自内部的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四分五裂，从而实现“瓜分中国”。

这些都是一般的设想，并不是预言，但只要我们研究一下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我们自然会有这些想法。而且应该承认，对这个变化，欧洲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正是欧洲在说明那些方法的裨益之前，便急急忙忙地把那些中国不想要的方法强加给它。因为正是欧洲，在1900年动乱之后，粗暴而又没有决心地干预这个国家，接着，在它的利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保障前，便懈怠了，松了手。真可以说，每个列强都随时准备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而弃共同行动于不顾，殊不知，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取得的胜利却正是全体列强的失败。

顾瑞(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政务处　No49〕

22. 关于孙逸仙

甘司东[1]致印支总督先生

(1906年6月15日，广州)

我荣幸地向您进一步肯定我的20号电，并向您汇报引起我发出此电的奇事。

昨天，我接待了总督的幕僚温宗尧道台和广州警务公所领导人之一杨士成[2]统领的访问。杨先生让我摈退能听懂我们谈话的北京仆人后，向我提出了一个我看是他早已有所了解的问题，即有关刑事方面的时效在法国是怎样规定的。我给他翻译了诉讼法典第六百三十七条：“公诉和民事诉讼……十年后由于时效而被解除……”尔后，我问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他回答我说：“那是因为总督想请求逮捕和引渡一个十一年前犯下罪行的罪犯。”由于我补充说，时效是从最后一次预审或起诉之日算起的，温先生立即笑着补充说：“此人名叫孙逸仙，又名孙文。他被我们盯上了。我们知道他穿着西服，搭乘本月十二日离开香港的萨拉齐号轮船。他住在44、46或65、67号舱房。总督请您要求西贡当局逮捕并引渡他。总督将把谋杀案的证人派往西贡，前去验明。”

我回答他说他们找我找得太晚了。如果衙门眼线说的迹象是假的，那便可能造成任意逮捕，要是那个旅客并不曾打算到西贡去，他便会控告非法扣押，因为延误了他的旅行。

由于我同他们的关系很熟，所以我也笑着补充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孙逸仙是一个政治

① 甘司东(G. Kahu)，时任法国驻广州领事。——译者

② 杨士成(Yang Si－Chen)。——译者

煽动者,而不是普通的罪犯,而像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能引渡的。

温道台对我说:"如果那个家伙继续旅行,那我们便就此作罢,不过我们很希望知道事态的发展。"他问杨统领是与他一起走,或是还有事同我商量,之后却立即告退了。杨统领留了下来。他以个人帮忙的名义十分机密地要求我不要提出逮捕,因为他很可能被总督派遣同证人们一起前往西贡,他身体很不舒服,害怕旅途劳顿。

我没费什么劲便理解了温、杨二位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无疑是按照总督的指令行动的。

在目前情况下逮捕孙逸仙可能会导致一场暴动,他们并不想逮捕。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煽动者在两广附近活动,因此孙的被跟踪是当然的。

也就是因为这双重原因,我在昨天的电报里冒昧地向阁下指出"让孙逸仙留在印度支那或逮捕他显得同样地危险"。

甘司东(签名)

〔广州 41 号政治急件附件二 (机密)〕

23. 关于孙逸仙
甘司东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6 年 6 月 15 日,广州)

我荣幸地向您进一步肯定我的第 17 号电。同信附上我给博先生的电报和急件的抄件,这份抄件将向您作出有关解释。

目前在中国南方无疑地存在着暴乱的因素。暴乱煽动者和政府当权者同样都不怎么排外,所以外国人似乎无所谓采取支持或反对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态度。

香港政府的态度是不正常的。它有办法,它的法律也允许它出来阻止中国秘密会党的活动,但它却按兵不动。广州总督的一名书记官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半官方报纸《粤东报》上,这篇文章赞扬两天前印度支那总督政府禁止输入在香港印刷的"假改良派的骗人"报刊。不管英国政府对煽动者们的宽容有什么理由,这种宽容在一个治安工作很容易做的岛屿上并不如在像中国这样的大陆上那样具有弊害。

孙逸仙曾到过美国、法国、西贡,最近他曾在日本。他肯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招收了会员。他同样可能在东京各大学听课的年轻人中吸收会员。我曾多次寄上他们在这里出售的出版物,供公使馆分析之用。这些出版物是他们在日本的证明,它们都是激烈地反对法国的。如果在两广发生了无论何种性质的骚乱,它们都可能在毗邻地区作出呼应,由于它们普遍的倾向是民族主义的,不管它们的原始目的是什么,最终必然会影响到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对煽动者们保持严格的中立是有好处的,而且最理想的是让孙逸仙离去。这便是我冒昧向博先生指出的内容。

甘司东(签名)

〔广州 41 号急件附件三 No76〕

24. 孙逸仙的情况
甘司东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6月27日,广州)

博先生刚给我转来一份电报的抄件,报文如下:西贡,6月18日。总督府总督大人。河内。"孙逸仙在一名日本籍广州人的陪同下,化名高野博士,确实在从香港到新加坡的邮船上。他在保证于第二天前往新加坡后,访问了西贡的几个中国人。高野在堤岸颇有名气,他拥有产业,用的是笙萌①这个名字。他也在进行煽动。无论如何,我还是会派人前去搜索,看看高野或笙萌是否藏在那里。"

我已通知总督说,他要求引渡的那个人已不在印度支那。

关于孙逸仙的情况我还得知一些新的细节。他从日本起便被人跟踪。在中国当局的要求下,香港总督派出两名密探,以阻止孙在法国邮船经过时下船。

温道台,也就是以总督名义曾来要求我让人逮捕孙的两个人之一一对我坦白说,孙逸仙是他的童年朋友,他们还曾在香港的同一所学校里读过书。

孙曾通过医学博士考试。但他一直忙于政务。他在美国、檀香山、新加坡、香港和广州有许多信奉者,他是个反清革命家。他把自己的巨额家产中的最大部分都用来作宣传费用了。

目前,地方当局已对煽动者们采取了严密措施。昨天,人们曾担心他们趁端午节之际发起骚乱,警务公所上下都保持警惕,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

甘司东(签名)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　政务处　No43〕

25. 六亿法郎借款计划
法国驻华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7月11日,北京)

目前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直隶总督袁世凯,近来使他的那个省发生了巨大的飞跃。然而,他不得不支出的费用,尤其是为美化天津、组织和维持他的军队而支出的费用,使他手头十分拮据,他的财政预算负债过多。按照中国的方式,他首先借助于敲诈勒索,无情地搜括民脂民膏,武力攫取华东铁路收入。但尽管敲诈者的力量强大,这些敲诈勒索也只能是一时之计。这样便导致袁世凯开始考虑借外债。

① 笙萌(Sinh Manh)。——译者

阁下也许知道，有一个法国资本家财团预计到该总督的困难，已在同他谈判，准备给他一笔六亿法郎的债务。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障碍。要求"还我河山"的民族运动在其种种表现中，对同外国签订借债一事表现出敌对态度。大量银子必须运出这个国家以偿付利息，被老百姓视作他们贫困的原因。目前，尤其是在某些已令人预感到饥馑的县份里，民族主义报刊已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运动，这场运动反对掠夺中国人民如此之多钱财的外国人，反对允许这些钱财外流的帝国官吏。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懂得，如果由他本人出面缔结借款，他将有失去民望的危险。他看到过广州的同僚在朝夕之间便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试图为建造粤汉铁路筹集必要的资金，而那又是把一个与民族自尊息息相关的企业归还给中国人的问题。所以，袁世凯隐身在财政大臣的后面，他一面亲自参加商谈，一面却力求把铁良往前面推，以便在借款问题达成协议后，应对人民负责的是铁良。

然而，尽管袁世凯老奸巨猾，金融界仍不相信、至少在一段时期里并不相信他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对一场为舆论所如此强调的运动不可能不受到惩罚。而只要这个运动不发生导致它偏移中心的意外，金融家们对我肯定地说，这笔债务便不能达成协议。

〔法国驻华公使馆　商务司　No61〕

26. 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的一个处理计划
巴思德①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8 月 10 日，北京）

继我的前任的急件 No433 之后，我荣幸地给您寄上我的同行们致庆亲王的外交急件抄本。这份急件是对中国政府关于在处理上海的会审公廨问题中应作的改革方面给予的反提案的答复。

正如阁下在审阅这个文件中将能看到的那样，各列强外交代表对不断反复的讨论已感到厌倦。他们声明自己远非要求新的特权，如果帝国政府不能接受他们呈交的决定性文本的话，他们将无条件地坚持 1868 年章程和既定惯例。

我一如既往不介入这个行动。然而我们不能对此问题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很难设想中国人将继续听任我国租界实行他们已在毗邻租界予以变更的惯例。再者，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同我们也发生争论，没有关于混合司法权的正式文件，还将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境地。

〔法国驻华公使馆　商业事务司　No74〕

---

① 巴思德(Bapst)，法国驻华公使。——译者

27. 中国新闻界在云南问题上的反法运动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8 月 31 日，北京）

公使馆已多次向阁下报告中国新闻界把法国和它的政治作为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在南昌事件发生的时候。您无疑会在每半个月寄给部里的本地报纸摘要中注意到，好几个月来，人们对云贵总督群起而攻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责他支持法国对云南的看法。人们抓住机会，夸大省里法国人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妄加评论，每天都在揭露所谓印度支那对云南的觊觎。他们一会儿批评总督以过高的特殊礼节接待我国领事，一会儿又散布铁路工程师们都是伪装的军官的流言。他们说，博先生的蒙自之行是将攻取此镇的信号。而苦力们在铁路工程中将会受到的虐待更是恒定不变的指责内容。以至使我感到应要求外务部结束这种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到一定的时候会形成对法国十分不利的舆论运动，从而使有些事务难以处理。

我并不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作出的保证的意义抱很大的幻想，但是我的行动至少向中国政府证明了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像它所常常希望相信的那样盲目。一旦这些笔战变成风潮和骚乱的起因，中国政府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

有人说，中国应当颁布一项有关新闻的法令。在目前情况下，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有这方面的需要，因为政府在它愿意的时候，尽可以镇压记者们的出格行为。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中，当问题针对的是外国人，尤其是当攻击是由那些学生发起的时候，严厉是不行的。有一点，把它提出来也许不谓无益，那便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报刊都表明了中国驻法国公使是天天散布的、有关我们在云南问题上的谣言的主要挑动者。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政务司　No17〕

28. 法国在云南的商业利益
法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
（1906 年 10 月，巴黎）

印度支那商业联合会常务董事吕西彦·封丹①先生最近交给我部一份陈情书，此件同时也转报了贵部。该联合会在陈情书中要求印度支那总督政府方面对它扩大云南业务和发展向该省输入法国产品给予必要的促进。

---

① 吕西彦·封丹(Lucien Fontaine)。——译者

贵部深知底细，只有贵部能够审查封丹先生的这些要求。我未经深入考虑，但我觉得应该提请您认真注意，通过目前正在修筑的铁路运入云南的货物尽可能地应是法国产品，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为法国工商业确保这个销售市场，作为对印度支那政府和纳税人为修建这条深入内地的铁路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的补偿。

从这个方面考虑，为印度支那政府在云南收买鸦片对销售法国产品显然应能产生有效的帮助。到那时，我觉得在将要通过的契约里，最好规定鸦片供应的得标人应具有法国驻蒙自领事馆或其他法国外交单位发给的证书，证明他在这些地区进口了来自法国的商品，商品价值相当或至少已达到法国殖民政府将向他购买的鸦片总额的一半。

贵部若能研究诸如此类的办法，我将十分高兴，它将有利于在印度支那保住殖民部铸造的硬货币，并且将保证我国产品在云南市场上的优势地位，香港的英国商人已经在打这个市场的算盘，这是我部在华南地区的官员们对我多次指出过的。

29. 论未来东京湾法国商品对中国的输出

当我们研究我国将来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这个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得不承认法国在行动方法上是不及英国和德国的。

与我们相比，英国具有运输工具较多和已经取得经济地位的优势。实际上，中国人很久以来就已经习惯与英国人谈生意，接受他们的货物。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力量很强的民族身上，诸如此类的习惯是很难根除的。

德国比法国更关心它对外贸易的发展，它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最不露痕迹的出口津贴，以鼓励工业家和商人研究新的市场，它即以这样的方式补偿他们为进行这种研究和随之而来的渗入所作出的牺牲。

法国则既没有英国的海运力量和已得地位，又没有德国给予它国民的鼓励措施。另一方面，法国几乎专一生产高档物品，价格昂贵，它不得不把这些商品输入一些情况不明的市场，它在新的形势下挣扎，必须对一切进行妥善的安排。

在云南，除了英国，法国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然而，正如我们刚才述及的，由于中国人惯于和英国人做买卖，英国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地位，所有输入云南的消费品全都来自香港。过去，这些商品全部取道四川。现在，它们部分地经红河过境，而很快由于海防—老街—云南省铁路的建成和因而导致的频繁联系，香港将在云南所有的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

况且英国人清楚地估计到了法国耗资二亿修成的云南铁路将给他们带来何等的方便。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 1906 年 7 月 19 日《贸易委员会报》刊登的英国驻河内领事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云南省很富裕，足以保证完成铁路修建的财政支出。这是无关紧要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省相当富裕，可以购买数量甚大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在两三天内从海防运到那里，而不再需要陆路水路长途跋涉，既花钱，又有危险。"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法国在云南的进口将有很大规模的发展。而且,毫无疑问,在这些商品中将有很大一部分是英国出产和从香港发出的。

未来的贸易不管是由法国产品或是由其他外国产品构成,无疑都将满足该铁路运输业务的需要,并且有朝一日促成它的兴旺发达。然而铁路运输的兴隆发达并不是法国在那里寻求达到的惟一和主要的目标。进一步的目标更为广大、更为普遍,那便是为法国的工业产品找到一个销售市场。

由于距离上的最接近,法国占领东京湾这个惟一与云南接壤的欧洲殖民地显得特别有利。然而若要利用这个优势,政府应给予法国贸易的不仅是鼓励,而且是必要的物质帮助。

政府虽然没有给予外贸津贴,它手中却有一件相当有力的武器,那便是向印度支那土著购买必须的鸦片。如何使用这件武器?问题是做五百万法郎的交换,我们希望他们引进和接受五百万法郎的法国商品。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朝夕之间便能够取得的,要取得这样的结果必须有长期的努力和耐心的配合。

输入云南的产品首先是10号棉纱、纺织物品、五金制品和一些无关紧要的货物。应该让海防和南溪的工厂生产合适的10号棉纱。它们可以利用厂里的废料搀和清和棉花来生产这种棉纱,而为了获得清和棉花,还应给土著贷款,让他们去种植、去栽培。如果我们能够考虑进行这些活动所必须的期限,那便需要绕过市场,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前一年到一年半为这种交易作准备。

构成输入云南的补额商品主要是织物,其中我们可以在本地的法国商号找到一部分,但那也需要绕过市场,提前半年到一年。

关于云南土著使用的织物问题,我们必须分别取样,了解它们的需求幅度,再带回成套商品,建议各法国工厂生产,告诉它们不要怕生产这些商品要作出的牺牲,这类业务将有巨大的发展。

在法国工业还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例如缝纫针、缝纫机等等,那就需要对这些商品进行考察研究,暂时先从德国和英国购进。这样做,至少法国航运公司得以代替英国公司承担运输业务。

要做到用法国货取代云南需要的棉纱以外的商品,没有十到十五年时间的研究和牺牲是不行的。这些牺牲有朝一日会给整个法国工业带来利润,它们具有普遍意义。然而正因为它们有普遍利益,它们的费用便不能由一家商号独自承担,这个道理是十分清楚的。它要求做到下列各点:

如果法国想在云南为它的产品找到主顾,政府就不应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而应努力主导事态变化。政府应利用自己能掌握的一切武器。它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恰恰正是专卖局所需的鸦片购买。

普遍意义要求鸦片的购买委任一家法国商行办理,并订立一个长期性合同。这家商号尽可能应是一家长期的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雄厚,在对它作出殖民预算利益所要求的一切保证的同时,应要求它满足待创办机构的某些条件,要求它输入某些商品。

在云南没有设置机构的东京湾殖民公众可以要求别人让他们对每种买进物投标,海

关用这样的办法有时可以从中得到相当于买价的利益。但是这样做便错了，因为得标人应于三个月内交出所需的大量鸦片，他没有时间进行我们上面提到的研究。况且我们也不能够要求他作出一家拥有大量资金和很有前途的实力雄厚的公司将能作出的牺牲。

由于没有时间研究可能的交换，得标人将用货币偿付他的供应品，这些货币流入中国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因政府的失策而导致的结果，直接违背它在其他地方为阻止货币外流而制定的法令。

再者，得标人个人赢得的利润将被他积聚起来，以便尽快地到法国去享用，而一家建立在云南的股份有限公司则不然，政府将同它通过一份契约，它将尽可能地用商品偿付鸦片，因为那样对它有利。又由于它是为了比如做五十年生意才兴办的，它的利润将被用在对法国贸易进一步渗入这个地区的新的研究工作和扩大业务上。

我们可不能说，由谁买和如何由云南买进鸦片都无关紧要。谋求的结果得到了，我们还能得到一种补偿，即能使法国商品得以引进和交换。不。因为除非在云南有立即可以交付的库存货，而鸦片购买者又强迫中国人把这些库存鸦片卖给他们，否则中国人宁肯把他的鸦片卖给在香港付款的商人。从而导致的后果是在香港付给他的货币被他用来在香港购买英国商品了。

所以，我们重复一次，法国对云南出口的未来要求给予长期建立在云南的一家富裕、实力雄厚的股份有限公司以鸦片合同，要求这份合同具有一定年限的有效期。

海关为这家公司供应的鸦片选择招标的办法，显然这倒是民主的方法，但并不适宜于开发中的新地区。这种时候，海关没有算计到让中国人沾了光。实际上，在云南开业的中国人都属于一些有很多分支的庞大公司。一个分支是设在香港的业务代理人，另一个是在海防的货物过境代理人，第三个便安设在云南。

现在，这种种机构都因法国在蒙自开办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而感到很不舒服。香港机构的利益受到了这个进口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者的损害。这个竞争者自己办理直至云南省内的货物过境和运输事宜，从而同时给设立在海防专办运往云南的货物过境的分支以打击。最后，云南的中国人不得不同这家法国洋行洽谈生意，出售鸦片和从这家洋行购买它进口的法国货物，来作为交换。

像这样的竞争者不应得到发展，远不是发展，而应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消灭。

以最近发生的事情为例。中国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设法夺取印度支那贸易联合会在蒙自的经理，很可能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家联合会在云南已有六年历史，它是在印度支那总督和当时的公使坚决要求下建立的，除目前的名称外还用过其他名称。近三年来，它持有为满足印度支那的需要供应鸦片的合同。

第一年，它亏损了约二十万法郎，后来的两年它幸好有所赢利，但在这段时期里，它对需着手营造的商业铁路作了初步的研究。它收集了本地使用的物品，在欧洲访问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那些工厂企业，建议它们生产这些物品；它试探了法国各家航运公司，希望为这些货物的运输取得特惠运价。简言之，它为把法国商品引进云南市场达到一定程度时将进行的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接着,印度支那商业联合会在东京湾和印度市场签订了数目很大的棉纱合同,在法国则争取到了本色和漂白棉纺织试制品的供应。终于,它的计划不止一次地得到实施,因为在1905年间,它曾使一百多万法郎的法国产品被云南进口。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铺平道路后,海关却招呼也不打一个、突然终止印度支那商业联合会的合同,联合会根据可靠人士的意见还痴心地认为除非有明确通知,这个合同能一年年延续下去呢。海关还对新的购买物采取部分招标的办法,交付期限又十分迫近。

印度支那贸易联合会因此,也因为它的库存货物是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这个事实而蒙受巨大损失,损失额几乎相当于它在两年时间里贩卖鸦片获得的利润。这还能看作是个别利益问题吗?如果要坚持这种看法,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普遍利益问题吧。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种招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的(1906年8月20日曾进行过一次),以及它对法国工商业的普遍利益造成了怎么样的后果。

召请的商行是不是在云南设立了机构?

不是。他们不管什么商号都召请。而且,由于它这一次是要在几个月内提供一千箱鸦片,价值相当一百万法郎,所以十分明显,几乎全部得用银币付款,这些银币到了中国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又发表一道道法令,禁止法国银币外流,因为铸造银币的代价是那么高。

其中的矛盾十分明显。

确实,海关偶尔能够找到比它付给印支商联更为有利的价钱。但是这种利益是怎么造成的呢?它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深谋远虑的外交政策,他们拼命想消灭法国竞争者,为此准备作出一切牺牲;另一方面,是由于饥荒造成的鸦片跌价,鸦片价格猛跌,一直在跌,现在还在跌。

这个结果是带有欺骗性的,它开始时给人以假相。最后获利的情况肯定既是例外的、又是暂时的。

政府部门既然知道同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订立的鸦片合同所意味的普遍利益,又怎么会一时看不清这些利益了呢?

原因是有人抱怨,那些人全都把供应鸦片看作是捞取一大笔佣金的惟一机会,他们想要使这笔佣金归自已所有,却又既不为此作出任何牺牲,又不曾拥有它的一张证券。

这些不满者在传教会的报纸《未来东京湾》中找到了他们的代言人,原因我们将在后文中说明。

在那些不满者中,有一些是大销售商场的老板。应该说,印度支那商业联合会曾经使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他们硬说政府通过鸦片合同保证了印支商联的赢利,即使印支商联亏本销售都能赚钱,从而指责政府应对此负责。这纯粹是竞争者的妒忌。这种怨言和巴黎的"廉价商场"或"费利克斯·保丹公司"四周那些商店的牢骚如出一辙。

这种断言实在荒谬。即使确实如此,人家也可以说政府不能不关心商业侨民的成败。当然,消费者侨民肯定有与销售者侨民同样的或更多的权利得到政府的关怀。

话这么说,《未来东京湾》又为什么汇集了不满者们反对印支商联的一切怨言呢?

鲁瓦奈①先生告诉我们说，传教会垄断了上海的所有报刊，我们可以告诉他，传教会在东京湾也这么做了。继《未来东京湾》之后，他们还需要得到《海防邮报》。

总督博先生对这种独揽感到恼火，他寻找一个忠诚的侨民，想要赎买这份报纸，保住对传教会的独立。印支商联理解他。传教会却不原谅他，它让人告诉印支商联说，《邮报》的政策是它不喜欢的，因而将有场大论战。印支商联解释说它早已把《邮报》转手出去了，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它的政策，于是只好大战一场了。

《未来东京湾》处处获胜。

1905 年，蒙帕查②先生得以战胜共和党候选人梅特达尔③先生而被任命为高参便是传教会办成功的。由于梅特达尔先生是大囤积居奇者印支商联的律师，这便成了传教会对他发起的攻击的基本内容。

从那时起，《未来》报编辑洛莫尼埃④先生成了农业公会主席，取代了迪舍萌⑤先生。

《未来》的心腹大多数进了商会，印支商联由于它给予政府的支持而不得不受众多攻讦之苦。所以，当最近接到的消息似乎指出政府准备随手地甩掉印支商联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不容易办到的。

总之，看不到普遍利益，扼杀为使法国产品渗透云南而作的最初和惟一的努力，输出法国货币，在新的打击上吃亏，凡此种种，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使传教会如愿以偿和让中国人占便宜，这便是对海关采取的最新措施的小结。

1906 年 8 月 10 日招标的结果报告为这幅图画更增添了一些生动的细节。

得标的并不是哪一个提出请求的商人或企业家，他们仍在叫屈，其激烈程度一如既往。因为得标人正是两个月前在突然中断合同后辞职的印支商联在蒙自的经理，他的辞职正是为了投标，经过堂而皇之的不光彩的竞争后他当了得标人。

印支商联曾一时以为是对它不满的某个竞争者雇用了它在蒙自的经理。然而，印支商联妨碍的首先是中国人，正是中国人收买了在蒙自的印支商联经理富贝尔⑥先生，导致他离职，选择他为他们到海关去投标。他们收到的法国大洋的付款，将使他们能随意到什么地方去购买棉纱、纺织品和各种货物。这是他们重新获得的彻底的自由，对香港从而也对英国有利，对所有的中国居间商人有利。

于此期间，印支商联在蒙自保留着无从脱手的七十五万法郎的棉纱，这是它在 1906 年初作为全年买进物向海防工厂订购下来的，还有富贝尔辞职前预期能脱手而买下的一千箱鸦片。

显然，印支商联不能继续单独地作出总之由法国工商业来获取主要利益的牺牲了。

① 鲁瓦奈(Rouanet)。——译者
② 蒙帕查(Monpezat)。——译者
③ 梅特达尔(Mettetal)。——译者
④ 洛莫尼埃(Loumonier)。——译者
⑤ 迪舍萌(Duchemin)。——译者
⑥ 富贝尔(Foubert)。——译者

如果它坚持的论点得不到承认，如果它得不到一份合同，一份不是一年而是长期的合同，使它能够让法国工厂生产中国人需要的产品，让中国人习惯于消费法国商标的产品(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印支商联便只有撤离和放弃它在云南的阵地。或者至少它得与传教会言归于好，同之洽谈确实是它并不怎么打算做的事情。或者甚至于为了继续进行它在云南的交易活动，和香港的某家英国大商号缔结合同或协定，均摊盈亏。这后一种方法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很久以来不少人对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不用费什么劲，不用作什么研究，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家像印支商联这样的、对它的股东负有直接责任的公司，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能够考虑走这条道路是否妥当的问题的，因为另一条道路、比较爱国而又赚钱较少的道路被政府考虑形势时使用的新精神堵死了。

附必要时可为本报告依据的情报和资料：
同印支商联签订的合同的由来。——它的历史
关于它的解释的争议
云南常用物品一览表
这些物品中已在法国找到的物品的名单
这些物品中已在德国找到的物品的名单
这些物品中已在英国找到的物品的名单
同海运公司和装卸公司进行的关于直接发往云南的货物联运问题的洽谈情况
《未来东京湾》合订本
传教会给印支商联的几封信
《贸易委员会报》的文章

〔外交部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商务处〕

30. 关于孙逸仙
巨籁达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10 月 4 日，上海)

我在法国邮船公司都兰号邮船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去日本的高野博士的名字后，采取了必要措施，让同情他的事业的人对他进行了采访，以便补足我以前，在今年 4 月 22 日的第 14 号急件中，转交给阁下的情报。

孙逸仙，又称高野博士，从新加坡来，直接前往东京。他当然不敢在此上岸，在吴淞口停靠期间，他一直待在船上。

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总形势和精神状况对于他所支持的事业都相当好。他肯定地说他的信奉者人数与日俱增。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起码的资金，他被迫推迟发起革命的日期。

其实他作过金钱上的呼吁,最后一次向公众提出的要求发表在报上,以一元票据的形式,许诺在革命成功后归还十元。这次呼吁仿佛收效不大,伟大的革命家在这方面显得相当失望。

他前往日本,将在日本停留三四个月,以观察即将发生的事态变化,尤其是要同在日本上学的大量中国留学生进行接触,这些留学生几乎全部是他的信徒。他的目的仿佛是要把他们按省份组织成精悍的地方宣传单位。他的注意力将全部放在这项组织工作上。

巡抚周馥被派往广州丝毫没有引起孙的不安。他了解此人年高力衰,他还宣称已在此人周围安排上了完全服从于他的人。

孙知道目前自己的支持者们受到严密的监视,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因此,对他们说来,万分秘密和谨慎是绝对必要的,这便使宣传工作十分不方便。

从总的情况来看,孙逸仙对他的计划能否在最近成功已不如上次经过上海的时候那么有信心了,他大不如过去那么乐观。这种新的作风是不是他故意做出来的,以便使交谈者有所怀疑而更巧妙地掩盖事实真相呢? 这正是不可辨别之处。不管怎样,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同总的形势,同皇帝和皇太后在国内知识阶层、尤其是在开放港重新获得民望显然是吻合的。后者颁布了一道圣谕,接受在不久的将来为中华帝国制定一套宪法的原则。这道圣谕同样受到中国在新加坡、巴塔维亚和海峡地区移民的欢迎,它很可能就是使对高野博士的宏业必不可少的会费来源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高野博士绝对不知道自己已为我派去的人所采访。

巨籁达(签名)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政务处 No35〕

31. 各省总督的借款计划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10 月 9 日,北京)

为答复阁下的 No80 号急件,我谨告知阁下,以法国某资本家财团的名义与铁良和袁世凯洽谈借款事宜的那个人是德·马尔托①先生,他是好几家法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然而由于所提出的条件在袁世凯看来终究是太苛刻了,袁中断了谈判。

就在这时候,我收到发自巴黎的一位银行家的来信,德·马尔托先生曾对我说过这位银行家是上述财团的负责人。银行家告诉我说,他本人和与他合作经商的商号都不曾给过德·马尔托先生什么任务。我颇不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中国人不会幼稚到还没有查实中间人的代理权便同他进行谈判。我倒是认为那些打算乘总督匮乏之机捞上一票的法国资本家已经失望了,他们现在否认自己的委托人,以便做出对此一无所知的样子。

① 德·马尔托(De. Marteau)。——译者

上海的沙杳龙①兄弟与此计划毫无关系,况且,他们目前的处境也相当困难。日俄战争期间他们在满洲积累军需品,为此已债台高筑。因而除了整顿其殖民地食品商行,他们是不可能顾及其他事务的。他们的法中银行计划已完全落空。

当前,兑现的借款计划只有一个,那便是两湖总督为汉口附近的公共工程向印度支那银行借的六十万两银子。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商务司　No99〕

32. 总形势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10月15日,北京)

今年夏天,这里有很多关于在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爆发反清起义的传说,我当时认为没必要用所有这些传说去吸引阁下的注意力,而现在,我为自己的克制感到庆幸。因为,革命运动的大头目孙逸仙现在从他藏身的新加坡宣布说,由于缺乏资金,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计划中的起义。

然而,革命党人所缺的并不是金钱。他们可以订立大量的武器合同、用重金收买许多人作内应。放弃起义是因为他们的计划走漏了风声。政府已采取有力措施,要严厉地、甚至残酷地镇压任何造反的企图。总督端方和袁世凯在进行礼节性访问时就曾对我本人声言说,为了维持对当今皇上的服从,他们随时准备毫不客气地让好几百人的人头落地。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今年秋天不会有重大行动了。然而仍有可能发生谋刺那些捍卫满清皇朝的高级官员的孤立案件,故而官吏们都十分小心地采取了种种应变措施。目前尤其引起人们担心的是袭击袁世凯和两湖总督张之洞的重大阴谋,为此,警察局已采取特别措施。

阁下已经从我的第69号电得知,由法国陆军部特别处招募的我占领军的几位军官,由于他们行为的愚蠢和冒失,已被中国当局视作孙逸仙阴谋的参加者。幸好我中断了同该特别处的一切联系,拒收并退回了他们开始时想要我过目的情报,这样我便有完全的自由去回答他们向我提出的意见,因为我对所谓的参与一无所知,我拒不接受这些意见。我真希望武官同样能表现出明显的不参与。可是陆军部长先生却更希望他同特别处之间存在着接触。所以现在,当有人向他暗示或提出有关特别处的勾结活动的问题时,他的处境便比我尴尬得多。

再者,就算孙逸仙的计划有一天能够成功,中国南方以某种形式变得不再依附北方,甚至目前的帝国是完全的一边倒,清皇朝被推翻,并由一个共和国或某个完全由中国人组

① 沙杳龙(Chazalon)。——译者

成的政府所代替，我不知道这个变化能有什么值得我们庆幸的地方。改革主义分子，不管他们眼下对外国人有多么温柔体贴，我担心，他们在民族观念上，比当前这个软弱而无威望的政府更加强硬。如果他们真的取得了政权，他们一方面将乐于借用外国人的文明和活动方式中的许多东西，一方面会更加有力得多地对外国人进行战斗。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政务处　No41〕

33. 情报处及革命党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年10月18日，北京)

上星期一，我在公使馆接待了外务部成员那桐和瞿鸿禨的来访。

在几句闲聊及寒暄之后，这些先生把谈话引向孙逸仙煽动暴乱的阴谋，以及此人与外国驻华军队的某些军官串通之事。然后他们紧紧抓住这个题目，告诉了我好几个法国人的名字。他们由警察截取的信件中了解到，这些人与秘密会社有联系，并且还有人看到过他们与反清朝的阴谋分子密谈。

当然，我回答说，这些信件是捏造的；军官们的确在中国内地旅行过，但是既然他们曾让外务部仔细查看过护照，旅行也就没有秘密可言。如果说别人看见过他们与可疑者或受牵连者在一起，这类接触也仅仅只是偶然的心血来潮所致。所以，不应以这类随意的相遇为依据。无论如何，我们的军官与革命运动没有任何接触。

我还补充说，我们曾向中国政府提示孙逸仙的密使企图在东京购买武器，这已经表明了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关切。

那桐在感谢布罗尼先生和我的答复的同时，请求我不要放弃这样的关切态度，并问我是否已确切了解到我驻华部队中某位军官的偏离行为，他要求我叫人提醒该军官，使之明确了解外国人对于中国主权和统治王朝的应有的尊重。

不应再存幻想了，人们已经突然间发现了陆军部所属的专门情报处与孙逸仙及反王朝党的关系的秘密。如果该情报处最终被中国政府发现了踪迹，我如同刚到中国时所做的那样，保留不承认它的权利。目前已揭露的情况还不致使公使馆感到为难，但如果同类的阴谋行为仍由同样的人继续下去，处境可能会变得尴尬。

〔No147〕

34. 中国革命党人在印度支那购买武器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

(1906 年 11 月 9 日,巴黎)

您在 10 月 27 日的信中转给我法国驻北京公使寄给您的一份情报,根据这份情报来看,中国革命党人正争取在印度支那购买一些武器。

同时,您还对我指出,在中国目前的舆论状况下,不要让人家指责我们帮助满清皇朝仇敌的犯罪活动谋求好处。

我谨告知您,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因此,我在今天的急件中,要求印度支那总督紧急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孙逸仙的信奉者们在我殖民地获得补给。

〔殖民部　政务司〕

35. 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的处理问题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6 年 11 月 16 日,北京)

继今年 8 月 10 日的第 74 号急件之后,我荣幸地在此函中给阁下寄上庆亲王给我的信的译文。庆亲王肯定是搞错了,因为我并没有在我的同行们写给外务部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章程的改革问题的外交急件上签字。

正如阁下在阅读这一文件中可以注意到的,中国政府答应放弃它的大多数反提案意见,同意试行两年新章程,以便研究它的实际价值。

〔法国驻华公使馆　商务司　No123〕

附:1906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商事急件 No123 之附件

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殿下致
法国公使巴思德先生急件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1906 年 11 月 5 日)〕

正式答复: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1906 年 8 月 10 日),我接到阁下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章程的变更意见的正式通知,通知说:“我们可以接受南方各港的高级专员提出的某些修正案,但其余的我们不得不予以否认。……如附呈阁下的修订文本仍不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

那么,我们只有指示驻上海领事严格按照1869年的规章条例和近三十年来同地方上一致认可的惯例办事……"

我部曾就此问题征询南方各港高级专员的意见,九月六日(即10月23日),我接到他的答复如下:

"关于牵涉到洋人利益的事务问题,鉴于原来的规章条例已形成一定的程序,我建议删去(提到这个问题的段落)。在第五条里,最好用'延用'二字代替'与',用'并'字把两个句子联成一句。章程将试行两年,在这两年期间,如因它而引起异议或纠纷,则我们应考虑对它进行修订。"

由于在1905年10月由外交使团长、奥地利公使齐干①男爵递交我部的共同照会所附的章程中,第四条文句的第一部分只提到了"除与中国人有关的事务外"而没有提到牵涉到外国人利益的问题,所以当然最好恢复第一次交给我的文本中的原始提法。至于第五条,前面提到的变动和增字将使文字表达更为清楚。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从我们方面,我们可以放弃以前提出的增加内容或解释性的照会。此章程将试行两年,在这两年里,如果它引起实施上的异议或纠纷,则我们应该重新进行会谈,再作修订。

如能赐复,不胜感激。

一九〇七年

36. 中国改革家孙逸仙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年1月22日,巴黎)

今年10月8日您曾告知我说,根据中国驻巴黎公使给贵部的一份情报,煽动分子孙逸仙在印度支那力求颁发利率极高的一元票证。

您还说,刘②先生要求您促成必要措施的实施,以便在可能的范围内,不让这一行动得逞。

我荣幸地告诉您,我已去电印度支那总督,向他询问有关此事的情况,他回答我说,已进行调查,未发现有关此事的任何迹象。

〔殖民部　政治司〕

① 齐干(Qikam)。——译者

② 刘,刘式训,时任清朝驻法国、西班牙公使。——译者

附：

外交部电文副本(No3)

(1907年2月1日,上海)

据可靠消息,煽动分子孙逸仙目前正同中国南方省的一名高级军事长官进行谈判,洽商在那几个省立即掀起一场暴动的事宜。这场暴动目前就取决于那名官员是否接受孙向其提出的建议了。举行这次暴动的同时,长江流域的暴乱将死灰复燃。

已通知北京。

巨籁达(签字)

37. 要求上海公共租界交出两名中国革命党人事件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年1月24日,北京)

在第24号急件中,我曾向阁下提到过中国当局要求交出两名中国人一事。这两名中国人现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被指控为犯有革命阴谋活动。

租界巡捕房逮捕了这两个人,然而各国领事在没有收到他们驻北京的外交代表的正式指示之前,不愿意采取进一步措施和将他们交出。因而各国使团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不需要去出席这个会议(我们在那个租界里拥有与其他列强同等的权利)①,因为法国在上海有它特有的租界。然而,如果有某个住在我们租界里的中国人被他的政府怀疑犯有阴谋罪并为此提出要求,毗邻租界很可能如以前那样作出与我们相反的决定。因此,我仔细聆听了同行们的评议。

同行们经过一番商讨,作出结论,被控告人首先应在租界会审公廨受审,会审公廨验明到案人的身份后,应检查中国当局对他们提出控告的罪行是否符合重罪或刑事罪,如果符合,则同意将被控告人交给中国当局。

我认为,从严格的法律上来说,这个决定符合引渡的一般手续,是无可指摘的。然而,鉴于中国人对政治犯的残酷行为,我个人觉得,如果事实确凿的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被捕并应交给中国官方的话,那将是我最厌恶去做的事。因此,我曾吩咐巨籁达先生,如果有朝一日风闻中国当局暴露出一点向我们索要他们的某个国民的意图,他一定要抢先一步,让那个人离开这里(好)②。实际上,只要及时远离,我们就能避免对中国政府方面的越权,

①②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手写体批语。——译者

又免得做下把人交给一些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的恨事。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中国处　No28〕

38. 一个法国军官在武昌作的一次演讲
喇伯第[1]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7 年 2 月 25 日,汉口)

在上个月给您的报告中,我曾向您提到过一个姓刘[2]的人的被捕和受审情况。这位革命党人的诉讼还没有结束。他开始时曾在美国传教士们那里避难,美国传教士们把他视作自己的基督教徒,对他的命运十分关心。这个人所受到的指控中最严重的罪行起源于他同一个外国人的关系,那个外国人于去年 7 月途经武昌时曾在美国基督教布道团建立的学校里作过一次讲演。那个外国人尚未被辨认出来,但由于人们说他是法国人,美国传教士杰尔曼[3]神甫便来找我询问有关此人的情况。为此,他还给了我一张此外国人在学校里作讲演时拍下的相片。相片上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刘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们被该校学生围在中间。

我回答杰尔曼神甫说我不认得此人。但实际上,我当即就认出了他,他是布加卑考察团的奥琪尔[4]上尉。而且,当局知道他的中国名字(音译为"欧儿罗"),并肯定,不用多久便会知道他是谁。他所作的演讲内容仿佛是法国大革命,并乘此机会对中国现状作了许多影射。其中有一句话大致如此:"跑遍了你们美丽的国土,尤其是欣赏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长江流域风光后,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居然还在忍受满清的桎梏!"

遗憾的是,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情况是确切的。去年 7 月,奥琪尔上尉确实到过汉口,并在汉口逗留了两周。我也承认,他的不慎并不怎么令我感到意外。我曾在东京住过相当久,在那里,我学会了了解我们在印度支那的那些军官的精神状态,领教过他们的下意识。无意之中他们会使自己的国家蒙受不白之冤,使人以为它在执行一种实际上它从来没有执行过的政策。

德尚·德·喇伯第(签字)

〔1907 年 3 月 17 日急件附件　(机密)〕

---

① 时为法国驻汉口领事。——译者

② 刘,刘静庵,为湖北革命组织日知会领导人。——译者

③ 杰尔曼(Gilman)。——译者

④ 奥琪尔(Ozil)。——译者

39. 云南省留法学生给云贵总督的信
驻广州领事馆致外交部
(1907 年 5 月 17 日,广州)

为了继续学业,我们住在法国已经很久了,我们没有闲暇去关心别的问题。然而读了那些报纸和各位政界要人发表的谈话后,我们警觉起来,这些文章使我们理解了法国对中国的政治观点。随着我们在法国逗留的时间的延续,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我们为此而感到的耻辱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那实际上说明我国形势日迫一日地变得更加紧急。这里我们仅仅向您报告几条新闻,给您举个例子,这些新闻将使您理解法国在云南问题上的看法。

1. 法国有一份周报,名字叫《殖民地报》。这份报上常常谈到云南省,仿佛从此以后云南省便被当成了法国的一个殖民地。最近我们在报上读到:"丁总督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但他已经离任,代替他的是岑总督。岑总督很有经验,但对我们不友好,不过,我们也不怕他。"

2. 去年夏天,法国曾组织过一个殖民地展览会。他们给云南保留了一个位置,在云南室门上已经写上了"云南"两个中国字。我们请中国驻巴黎公使刘先生要求展览会主任去掉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去掉了,但是云南省的产品仍然陈列在法国殖民地展览会上。

3. 去年,法国政府曾授予它的新任驻云南领事以公使的荣誉职衔,这预示着人们不久将对他实授其权,那时他便将同印度支那总督(他也是公使衔)相仿了。法国人的城府是很深的,他们怕总督职衔会引起注意,选择了公使这个比较不引人注意的称号。

在这三件事中,前两件使我们了解到法国民众的意见,而最后一件则清楚说明了政府的态度。目前法国民众和政府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云南省,大家都在议论云南,所有的报刊都在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这一切颇能说明问题。可是在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仿佛对此都没有意识到。

1907 年 5 月 14 日发表于《安亚报》①

40. 外交部政治事务司给外交部长的纪要
(1907 年 5 月 22 日,巴黎)

在今年 4 月 11 日的急件中,巨籁达先生再度向部里指出目前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执法情况所导致的十分严重的弊病,它既表现为案件繁多,又表现为这些案件日益复

① 安亚报(Ngan－Ya)。——译者

杂,从而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法官。还可以说,我们的官员同移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会因为不得不审判我国侨民而受到损伤,官员们的威望降低了。

我国驻上海总领事说,今年1、2、3这三个月里,他和他的代理领事应用于整个领事馆工作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作日中,有一百一十五个工作日完全被法律事务(预审、庭讯、判决)所占用,还不算调停各方和与律师(上海目前有五名律师)商谈的时间。本来只是附带的司法职责竟至妨碍我国领事完成商业和政治代表的使命。

从我国领事处理棘手案件的能力来看,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由如巨籁达先生这样富有经验的官员作出的重要判决,几乎全都被西贡的上诉法庭宣布无效或重新审理,这种情况有必要重提一下。

好几个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很难协调领事和司法职责,另派了一些职业法官给它们的领事,在上海组成一个法庭,并为这个法庭保留了行使法律的权力。

我们不久还将从我们的角度研究解决远东司法问题的总办法。但是,从现在起就必须采取临时措施,以对上海总领事馆发生的情况实行一些补救措施。

巨籁达先生提出的两个办法遭到完全的否定:一个代理领事会陷入与他的领导同样的处境,而他的经验更少,威望又比较低;一个印度支那法官行使我总领事的司法权力委托不可能不引起争议,最近在曼谷进行的试验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职业法官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派往上海才能有所裨益,即能让他按照1681年、1778年敕令和1836年5月28日、1852年7月8日决定在中国的领事司法权限行使的法令来行使他的职务。

为了找到法律上的先例,我们必须上溯到1861年,当时,外交部研究了帮助我国驻治外法权国家的那些为司法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领事们、尤其是驻亚历山大领事的办法。一个由专家们组成的委员会指出了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给那些被确认为需要的单位增加一名法官,因为每建立一个新的职务都需要有一道专门的政令。1863年12月5日的一道政令规定在亚历山大设立了一名领事法官。

该政令条文如下:当法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不在或不能分身的时候,司法职务可由一名法官担任,其名称为领事法官。领事法官在外交部长的提议基础上,经征询司法部长的意见后,通过政令任命。领事法官隶属外交部,服从领事条例。领事法官协助领事,作为第一陪审官代替显要人物之一主持法庭。领事法官年龄至少三十岁,法学士,在法国或殖民地已担任过五年法律职司。

这个先例和这些条文在用到未来的政令中去时再作些更动便能适用于上海的情况了。实际上,要符合在中国行使裁判权的种种法令和法律上的规定,派往上海的法官必须由外交部长任命。1836年法律第二条便是这样说的:"在领事馆放假期间和领事不在或不能分身的情况下,召请前来接替、代理或代表领事的官员将行使现法律赋予领事的职责。"

而只有外交部长才能任命接替、代理、代表领事的人。但我们觉得领事法官这个名称没有保留的意义,因为它会引起误解。派往上海的法官将接替、代理或代表总领事进行法官的工作,而不是领事工作。

我们只要政令中规定在上海的司法职责将由一名法官担任，这名法官将被称作“领事法庭法官”，他将按照新政令要求和不能分身的总领事的命令主持法庭，这后一条措施是遵循1836年法令中上述的第二条精神而产生的。在文字上最好写成司法职责将由法官担任，而不是1863年12月5日政令中的可由，而且将这种职责一劳永逸地授予法官，以避免冲突和摩擦。同是出于这种理由，我们不可规定法官主持法庭时是作为第一陪审官在协助总领事。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保留有关法官的年龄、学衔和本职业工作经历的条文不变。（年龄为三十周岁以上，应是法学士，至少已在法国或殖民地担任过五年法律职司。）

关于法官的任命，我们可以采用1863年政令规定的形式，即：“上海领事法庭法官将在外交部长建议的基础上，经征询司法部长的意见后，通过政令任命。”增添征询殖民部长的意见。因为，上海的法官应尽可能地从印度支那的代理法官中产生，并保留在殖民地法官范围内的晋升，犹如在此之前对待外交部调往中国任职的印度支那官员的办法那样。

如果部长同意上述建议，则可同时提请司法部长和殖民部长讨论确定应由哪个部，殖民部还是外交部解决给上海任命法官的问题，并准备以政府行政条例的方式发一道关于上述法官任命问题的政令和一个决定。

政令草案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基于外交部长的报告，

鉴于1681年敕令，

鉴于1778年6月敕令，尤其是第一、六、七、八各条，

鉴于1836年5月28日法令，尤其是第二条，

鉴于1852年7月8日法令，

鉴于1863年12月5日政令，

行政法院已同意，

发布政令：

第一条，由1778年6月敕令、1836年5月28日法令和1852年7月8日法令授予我国在中国领事的关于民事和商事或刑事方面的司法职责，在上海，将由一名法官代总领事履行，其职衔为领事法庭法官。

第二条，如果领事法庭法官不在、请假或休假，本政令第一条授予他的司法职责将由总领事、或由总领事或总领事馆主管人专门指定的总领事馆官员担任。

第三条，领事法庭法官将在外交部长建议的基础上，经征询司法部长和殖民部长的意见后，通过政令任命。他将接受外交部长和殖民部长的领导，有关殖民地司法人员的规定对他将是适用的。

第四条，被任命为领事法庭法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龄为三十周岁以上；

(二)获得法学士学位；

(三)至少已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或殖民地担任过五年法律职司，或在共和国的某法院或某法庭当过十年律师。

第五条，在公开的礼仪中领事法庭法官的地位直接在总领事或担任总领事职司的官员之下。

第六条，本政令由外交部长和殖民部长负责执行，并将载入法律公报。

×月×日订于巴黎。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外交部长：　　殖民部长：

41. 关于上海领事法庭法官问题的商讨
外交部政治事务司给外交部长的纪要

(1907 年 6 月 8 日，巴黎)

建议在上海设一名领事法庭法官、以减轻我国总领事日益繁忙的司法事务的纪要，只要求部长原则上的赞同，上海总领事馆的司法事务已经吸引了五名律师在它的管辖区工作。

部长作出赞同意见后，这个问题即将呈报司法部。司法部从它的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然后转呈殖民部，以便同该部达成一致。

三个部之间取得的这一协议，将以在亚历山大设立一名领事法官的 1861 年政令为蓝本略作更动，作为行政法院的政令批准。

至于领事法庭法官的任用，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此人将从印度支那法官中借用，并仍将留在殖民地范围内。外交部只要负责分担一部分生活费用的津贴，这笔费用并不高。这种情况的处理方法就同对待印度支那民事救济会的医生或殖民军军医的办法一样，或者还同对待我殖民地派往中国各地的教师、商务专员或其他公务人员的办法一样。

我们可以相信，如此形成的司法单位将消除现有制度的弊端，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凡是向西贡法院提出上报的上海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全被撤销。

外交部长的批示

我觉得在政治事务司的纪要里提出的解决办法，重大的不妥之处多于有利的地方。

受命负责上海司法职务的法官须具有国外工作的实际经验、精通英语，他应既具备职业上的技能，又有廉洁奉公、善于待人接物及行为上无可指摘等优点。

我很怀疑我们能否在殖民地法官或决定移民国外者中很容易地找到这样的人。

加之，这位法官完全脱离总领事的职权范围，总领事的地位从而降低，如果发生冲突引起变故，其后果会是最令人不快的。

再者,这位同本来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分开的法官,有一天势必以他的工作为理由提出进入外交或领事级别的要求,从而将产生新的难题。

领事裁判权存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它理所当然地在国外享有最好的声誉,因上诉而撤销的我国领事们作出的判决的比例低于大都市法庭第一审被上诉法院撤销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并没有必要采取所提出的办法。只要立即派人补上目前在上海空缺的第二个代理领事的职位就可以了。

毕盛①(签字)

42.孙逸仙和中国骚乱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 年 6 月 13 日,北京)

我已告知阁下,中国政府向我们提出把煽动分子孙逸仙交给他们的要求。

确实,近一个月来,许多县城,尤其在中华帝国南部和中部,有相当严重的风潮使社会秩序发生混乱。有时那是由于地方官吏在捐税征收中敲诈勒索所引起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应该承认,它们另有起因,那便是民众对满清皇朝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推翻它的愿望。幸亏正规军没有同造反者们勾结一气,才使镇压行动未遭遇很大的困难。

直至目前,据我所知,我们还不需要为法国人鸣冤叫屈,因为法国人在人身和财产上都未遭受损失。例如,受我们保护的传教使团便丝毫未损,而德国和美国的使团都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祸害。

孙逸仙真的如外务部说的那样是一切革命运动的灵魂吗?我个人认为,这个按照欧洲方式生活在国外的煽动分子的作用被过分地夸大了,如果他在中国冒险,那他还远远不能激起人们对一个正在进行一场苦战的党派领袖应有的狂热崇拜。他太注意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其他人却在冒着风险。可是,中国政府终究是用他的名字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的,而给这个人以庇护就成了中国政府眼里明显的敌对行为。所以如果我们不想使中国政府不满,那我们就得同孙和他的事业分开。也许是我弄错了,反正我不能相信,我重申一遍,我不能相信孙逸仙是一股有前途的力量,同他联合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即使满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会被请来当中国的领导人。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139〕

① 毕盛(Pichon),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43. 关于孙逸仙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先生①

（1907 年 6 月 20 日，巴黎）

本月 18 日，您转来印度支那总督关于中国政府反对孙逸仙在我殖民地和担心马德望会发生骚乱的两份电报。

关于孙逸仙问题和马德望局势问题，我已分别于本月 14 日和 17 日给您写过两封信，您的情报为我那两封信中的问题提供了参考，我谨向您表示感谢。

〔法国外交部　No271〕

44. 煽动分子孙逸仙问题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 年 6 月 20 日，巴黎）

您于本月 14 日发来的急件告诉我，外务部正式向我驻北京公使抱怨中国人孙逸仙在河内一事，并请求逮捕和引渡这个煽动分子。

从收到这份情况报告起，我就在酝酿给印度支那总督的电文，提请他注意外务部的活动，并询问他对应该采取的措施的看法。

然而，正要发出这份电稿时，我收到博先生的电报，我即将此电送您一阅。

这位高级官员要我注意外务部对我驻北京公使提出的、关于煽动分子孙逸仙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抗议。

博先生又说，这位要人于前段时期确实因穿越东京地区前往云南而引起过注意，但目前已失去了他的踪迹。

而且，他还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被指控为暴乱煽动者、而又多次受到英国和日本礼遇的人交给中国政府。如果再次见到孙逸仙的话，他将谨慎地请他离开印度支那。（我们不正是这么说的吗？）②

我完全同意总督的看法，但是在把我的观点告诉他之前，我希望先收到您肯定的答复，说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殖民部　二司二处〕

---

① 原件系手写体。——译者

②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手写体批语。——译者

45. 关于煽动分子孙逸仙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先生

（1907 年 6 月 24 日，巴黎）

来函通知我您已收到我本月 14 日给您的急件。我在那份急件里曾告诉您，外务部正式向共和国驻北京代表抱怨煽动分子孙逸仙现在河内，并要求予以逮捕和引渡。您告诉我说印度支那总督已向您报告那位要人失踪，也许已去云南。您又说，博先生认为，要我们把一个仅仅被指控为政治煽动分子的人交给中国政府是不可能的。但他决定，一旦孙逸仙试图返回印度支那，他便即刻请他离开我们的这个属地。

对于您在情况通报中向我表示的愿望，我谨作答如下，我与您本人一样，在对孙逸仙应采取的行动问题上，同意博先生的看法。

毕盛

〔法国外交部　No280〕

46. 关于孙文活动的正式通告（急件）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7 年 6 月 29 日，北京）

五月十五日（6 月 25 日），我收到云贵总督电报如下：

"根据我的秘密情报，孙文在十来人陪同下，于上月廿一日（7 月 1 日①）到达河内，住在一个欧洲人开的武田②客栈里。四天后，他又重赴海防，在那里过了三天，接着，从海防去新加坡和虎海③。有不少两广人参加了会议，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讨论。

"据安南人说，孙的信奉者数量很多，有人保护他，使他得以自由来往。有人向我报告说，他的活动是由于收到叛匪同党的信，向他报告已攻克三座城市，并请求援助，他当时急遣他的两名副手，苏林④赴广东，关仁甫去荷阳⑤。他本人赴新加坡，很可能也是为实现他的计划而去谋求帮助。"

叛匪孙文在其同党的帮助下不时从一处流窜到另一处，把他驱逐出这块土地，他便立即到另一块土地上去了。然而他的活动领域很少超出南海诸地区的范围，诸如印度支那、

① 时间有误。——译者
② 武田（Wou－tien）。——译者
③ 虎海（Ho－Hai）。——译者
④ 苏林（Sou－Lin）。——译者
⑤ 荷阳（Ho－yang）。——译者

交趾支那、西贡、河内、新加坡和香港，这都是他近几年来跑得最多的地方。

然而，当一个如此不肖的中国国民，像这样把友邦领土变成叛匪巢穴和阴谋的策源地，我相信，法国不可能不赞同由如此可恶的行径所引起的愤慨之情和强烈谴责。

在本月二日（即6月12日）一函中，我已向阁下述及该叛匪兴风作浪的罪恶行径。今天，我想我应该对那个报告作一补充。我在这封信里附上在吉隆坡发行的一种手券的复制品，这是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转交给我的，是叛匪孙某扩大煽动的明证。

因此，我恳请阁下再次去电印度支那总督，请总督下令，当那个叛匪头子或其党羽一旦来到印度支那总督辖下，即予拘捕和送交中国地方当局，他们将对案情作出裁决，铲除祸根，以保国家平安。而你们这样做，也便给了我们一个可贵的证明，证明你们的协和情感和真挚的友谊。

我给英国驻北京公使先生也去了一文，请他给他属下人员发出指令，让他们积极和秘密地寻找和逮捕孙文。除此之外，我给阁下发出这份正式通告，敬请阁下赐一答复。

〔法国驻中国公使馆　157号急件附件〕

47. 关于孙逸仙问题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年7月10日，北京）

继上月13日我的139号急件之后，现谨给阁下寄上我刚收到的外务部关于煽动分子孙逸仙的第二个照会的译文。

犹如阁下所能看到的，外务部重新提出要求：如果孙再次出现在印度支那，即要将他逮捕并交给中国当局。对此要求我来作答复，因为在我前几次去外务部时，他们未曾提出过这一点。

我的英国同行因受一个正式的引渡条约约束，在关于香港领地问题上答复道，他已把中国政府的请求转告香港总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将按照两国之间订立的法律原则处理这个请求。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157〕

48. 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活动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年7月30日，北京）

我在离开北京前对各国同行所作的告别访问，使我得以对各公使馆与外务部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情况作一大概了解。根据我收集到的情报来看，我觉得可以说到处的情况

都是停滞不前的。鉴于政府日趋衰败,来日不可预卜,外务部已不愿意再作出任何重要的决策。

当然,俄国公使总算解决了因俄国向中国政府要求归还北满领土而引起的细小的地方性争端。然而,这种本来就已经是缓慢而困难的交割,还是在领土归还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做的。总之,事情所牵涉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细节问题,大多数不需要得到皇帝的认可。另外,璞科蒂①要应付的只有一个中国对手,他专门负责满洲问题,有权自行决定(恕我啰嗦),对俄国公使馆提出的要求可以不予受理。

相反,正在与外务部交涉的德国和英国公使馆,六个月来仿佛并没能使自己的谈判得到尺寸进展。德国公使馆在为天津至镇江(浦口)的铁路问题争论不休,而这条铁路的特许权问题是早在 1904 年达成的协议中就仿佛已经决定了的。中国人竟把这些全部推翻了。

至于英国公使馆,他们在谈判中的遭遇也并不幸运,他们所交涉的是矿藏开采特许权的自由使用问题,他们希望能保证英国侨民早就取得的这个权利。在帝国的各个地方,目前有一股民众势力趋向于剥夺英国人的这些特许权,尽管公使团多次抗议,外务部总说它无法控制、爱莫能助。

面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停滞状态,列强在中国的官方活动速度必然降低,而所有的公使馆都明显地处于无所事事时期。然而人人都清楚,这个时期随时会突然结束。由于革命党骚乱一直在扩大,而对骚乱采取的措施又仿佛至今收效甚微,在相当短的时期里发生政治动乱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向阁下述及日本在目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在政府活动方面完全按兵不动,它的公使离开北京已将近两个月,其代办奉命把需与外务部交涉的日本事务高高挂起。然而私人活动却变本加厉,中国的日本报刊越来越过分地刺激民众的情绪,而自日俄战争后大批涌往此地的特务继续积极地工作着。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173〕

49. 革命运动和印度支那的中国人
藩荪纳②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 年 8 月 31 日,北京)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得以借此机会与阁下谈谈一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两名因侵吞军饷军备而被撤职查办的中国军官现正在东京避难。

他们曾是中国政府方面要求引渡的对象,中国政府通过公使馆向印度支那总督提出引渡要求,但总督没有给予答复,理由是对这两名军官的指控与革命运动有关。

① 璞科蒂(Pokotilow),时为俄国驻华公使。——译者

② 藩荪纳(Boissonnas),时为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译者

然而，由于布加卑考察团的不正当活动在中国政府的心目中留下的疑虑，同样也由于法日协议的发表所引起的不安和新闻界对我们的指责。我曾认为应对博先生强调，令其尽可能地满足中国政府。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拒绝应当说明理由，使中国当局不至于怀疑我们的诚意，这样比较好。

我很担心，总督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相反地会加深对这种诚意的怀疑。

其实，阁下还可以一读公使馆和总督府之间就这个问题交换的信件和电文，再作判断，我已给阁下附上这些文件的抄件。

根据1886年的天津条约第十七款，中国政府要求引渡因侵吞公款而于追捕中的军官梁修全和李治贵①。

总督府开始只是答复说天津条约中并没有提到过指责梁和李的那些情况中的任何一条，所以他们不能受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然而，十七款并没有开列出可能导致引渡犯罪者的巨细罪名，该款只是说：

“中国罪犯或被指控为犯有轻重罪行的中国人，凡在安南寻求避难者，将应中国当局的要求，和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予以追查、逮捕和引渡。在引渡方面享有优惠国待遇的国家，只要可能做到，便可从法国引渡它们的国民。”

这一款在引渡问题上给予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而当中国政府根据这段文字向我们要求引渡它的一个国民的时候，简单地用天津条约中未提及指责被控告者的罪状作为我们拒绝受理的原因，我认为是不足的。

再说总督府完全可以为它的拒绝找到一条更好的理由，但它开始时没想到。它发现梁从来没被逮捕过，这便是不把他交出去的一条正当理由，只是想到这条理由的时候迟了一些，公使馆已经不可能提出它来而又不使外务部对我们的诚意产生怀疑。

总督府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相信它。当然，这种不信任感是令人遗憾的，它也许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它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正视它，而一些像梁的引渡这样的事件又不能驱散这种感觉。

实际上，印度支那并不想交出梁和李，因为他们与革命运动有牵连。我们是不应当引渡政治犯，但是，对刑事犯，是不是因为他们参加了革命党而一个也不予引渡呢？同这个党进行联系，处处都显得在照顾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明智？

梁某案件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如何解释1886年条约的第十七款？

另一个是政治上的，我们对清皇朝和革命党的指导路线应是什么？

我不知道清皇朝在中国还能统治多久，但是目前它还统治着中国。我们要打交道的是清皇朝的政府。我们在这个国家要维护和发展巨大的利益，这只有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可能做到。我们怎么能为了同革命党玩弄天知道什么手段，或甚至只是给人这么一种印象，而丧失中国政府的好感呢？

---

① 梁修全(Leang Sieou－Tch'oun)；李治贵(Li Che－kouei)。——译者

不管有理没理,中国政府以为我们在偏袒革命党人。

我们难道不应该消除印象,消除一个感到自己受到巨大威胁、一心一意只想战胜革命的政府的这种印象,这个取消一切计划、一切改革,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即阻止革命的政府的这种印象吗?

当然,我们可以支持革命,这是一种政策。这是日本的政策,日本正准备利用革命,可我们呢?

阁下也许能在如此之大的问题和引渡一个中国军官之间发现一种十分微弱的联系。在帝国政府的心目中,却有着一种十分密切的联系。

如果因我们的政策而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就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只要各种事务尚在北京洽谈,诸如梁某的事端便会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带来某种损害。那么,有朝一日这些事务会不会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洽谈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作出许多假定,大胆提出种种设想,我却还是不大相信某一次什么革命会使孙逸仙和他的拥护者们获得政权。

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北方,那里有首都,有政府的所在地。孙逸仙离北京太远了,他在北京怎么也说不上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也许他能发动南方造反,使南北分离,可到了那一天,他会十分需要我们中立。因此,早早地便用如此不谨慎的照顾去求得他的青睐,我觉得很没有必要。

如果阁下也如此感觉的话,那么您也许会认为,在不背离宽大为怀的传统、不放弃有关引渡的原则的前提下,有必要向印度支那总督指出,今后在执行 1886 年条约第十七款时法国政府认为应遵循怎样的思想。

蒲荪纳(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局　No190〕

附:

中国外务部正式通告(急件)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07 年 8 月 21 日,北京)

今年七月十二日(1907 年 8 月 20 日),我收到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来电,电文如下:

"龙州道台来电云,法国当局审讯了梁修全和与他同时被法国军事当局逮捕的五十人,梁修全声明他是一个革命的煽动者,法国当局据此而下结论为政治罪,并逐渐释放了被捕者。

"考虑到梁是一名因贪污公款而革职的犯官,以及控告证据可以转报法国领事,我们十分希望您能正式请求法国驻京公使先生,电告印度支那总督拘留囚徒,并按条约规定把他们交给我们。"

缺席被告人前军官梁修全的案情已于上月十一日和三十日(7月20日和8月8日)我部签发的两份急件中报知法国公使馆,迄今未见答复。在那两份急件中,我也曾请您去电印度支那总督,让他按照条约规定把罪犯交给中国官方。

今天,鉴于上面转抄的两广高级当局的新报告,考虑到前军官梁修全系因盗用公款构成犯罪事实,而包括所控告的全部证据的档案可以转报法国领事,这是一个与政治罪截然不同的案情,因为被控告人狡猾地耍了一个花招就简单地将他释放是不应该的。鉴于这么做有违反印度支那边界问题的有关条约之处,因此,我请求代办先生尽快去电印度支那总督先生,对他再加强调,请按照条约规定,拘留囚犯梁修全及其同伙,并把他们交给中国,以证明公正和友谊。

又,如蒙答复,不胜感激。

50. 总形势;同柔克义[①]先生的谈话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年8月31日,北京)

国事不宁,内阁混乱,这八个字很能说明皇太后最近颁布的几道前后不连贯的圣谕所造成的形势的特点。

人们今晚不知道明天谁当阁员;人们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不断地进行阁部人事变换。颐和园宫墙里,在一个沦落成幽灵状态的皇帝周围,在一个年逾七旬,由于偏瘫而口歪鼻斜、但统治之心却执拗不变的皇太后周围,正进行着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争斗。

接二连三但又前后矛盾的圣谕不时告诉我们谁是当日的胜利者,然而,归根到底却没有谁占上风,争斗还在继续。

在各国驻北京的代表中,美国公使柔克义先生是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之一,也许还是最理解中国的人,他的经历我就不用向阁下赘述了。

最后柔克义先生对我说:"我给我们政府打的报告每一份都是以这些话结束的:我给你们写下的是我今天的看法,我相信它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过几天,它就很可能不确实了。"

我问他说:"那么您今天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中国的形势的确严重,这不仅是由于革命党人力量大,更是由于政府的衰败。

"政府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倘使发生什么事变,一次普通的谋杀,皇太后身故,便将引起一片恐慌和混乱。中国政府不会再反抗,它很衰弱,从来也没有这么衰弱过。它很清楚危机四伏。它感受到了老百姓的不满对它的威胁,感受到了在它周围缔结的、既不听取它的意见又在保证其独立自主的那些国际协定对它的威胁。它眼下有高丽作为榜样,这

---

① 柔克义(Rockhill)。——译者

个榜样使它感到震惊。它甚至看到了解救的办法：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只是，如果说它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应该达到的目标，事实上它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它。

"各人提出各人的解救办法，从而导致了那些圣谕接二连三地颁布，却又互相矛盾。

"人们相信袁世凯。此人的确很聪明。他能把有才能的人搜罗在自己身边，这便是他的主要优点。但他自己却不清醒。他能够组织起几个师，能比别人更好地治理他的总督管辖区。然而，订出一个深远的改革规划、领导这个规划的实施却要求具有技术上的学识，他没有，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有。

"至于张之洞，他的声望是很高的，因为他是中国的第一流学者，还因为他在汉口发表了权威性的意见。如果有朝一日他到了北京，他的名望就需要担很大的风险了。"

以上便是忠实地转述了柔克义先生今天的看法。也许明天就不是这个看法了，因为巨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皇太后已下诏让袁世凯和张之洞进京。据说要颁布一个宪法，选定一位嗣君，老太后准备让位了。这是街头巷尾的传说。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便是走投无路的朝廷在恳请中国人中的两位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出仕入相。

结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潘荪纳(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中国处　No191〕

51. 在印度支那引渡中国人

(1907 年 10 月)

1886 年 4 月 25 日，在法中贸易条约的谈判中，北京政府曾要求在这个条约中加入相互引渡罪犯的条款。

从中国引渡法国罪犯的问题，实际上已由 1858 年天津条约第三十八款予以解决，该款规定我侨民事务按治外法权处理，只要此法规用明确条款扩大到受我保护的安南人就可以了。然而，引渡在印度支那领土寻求避难的中国罪犯问题则尚待解决。

帝国全权代表李鸿章曾为此提出两份草案，而这两份草案先后被法国全权代表科戈尔唐①先生所否定了。

第一个草案按照 1860 年 11 月 14 日中俄条约第八(或七)款条文规定，将中方要求引渡的任何中国人交给中国官员。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法国只引渡触犯普通法的刑事罪犯。

第二个草案仿照 1858 年 6 月 26 日英中条约有关引渡在香港避难的罪犯的第二十一款。这一款行文模糊，对"罪犯"一词缺乏定义，容易引起诸如发生在英中官方之间的那种争论。

---

① 科戈尔唐(Cogordan)。——译者

李鸿章确曾提出可列举导致引渡的罪名，但科戈尔唐先生强调了这么一份不完整的罪名表的不妥之处和不可能性，鉴于立法和确定这份表的分歧，中方全权代表只得作罢。

有一种格式大家都表示同意，它既能满足帝国政府的要求，又符合我国的公法条例。它将使法国官员能够拒绝引渡政治犯或在中国被视作犯罪但在我国不受法律惩处的人。

双方定下的、构成1886年4月25日条约第十七款的条文如下："中国罪犯或被指控犯有轻重罪行的中国人，凡在安南寻求避难者，将应中国当局的要求和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予以追查、逮捕和引渡。在引渡方面享有优惠国待遇的国家，只要可能做到，便可从法国引渡他们的国民。"

如果考虑到中国法典，且不说它的惩罚之严，也没规定任何时效，而且镇压范围竟可株连九族，那么我们就能明白我们的中国侨民可以从科戈尔唐先生使之通过的引渡条款中得出多大的好处了。

然而，应该承认，在实际中，上述条款的实行是十分随便的。在法国占领的初期，东京的司法部门组织尚待完善，尤其是在靠近边界的各个地区。某些文武官员，不谙诉讼程序，接受或拒绝引渡要求，均只看提出要求的是某某友好的官员或敌意的官员，或引渡要求涉及的中国人在本地区的印象好坏。在引渡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事先验明被引渡者正身，并不查实他们是否有罪，或援引为他们的罪状的是否即是可导致引渡的罪状。

东京平定后，管理条例有所改变，司法裁判权交由专业法官行使，于是，形势发生了变化。

然而，由于引渡是以一种行政措施的形式出现的，而这种行政措施按照仍然有效的1875年的一份通函，经检察官通知后，在殖民地一直为总督所采用。政治上的考虑可能影响总督的决定，使他根据照顾是否有利的原则，对中国官方作出通融与否的姿态。在引渡问题上先后作出的表面看来矛盾的决定，原因也便在于此。我们还可以说，印度支那政府对帝国当局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高傲态度，使人对这些要求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念，似乎那是我们的责任。印度支那总督政府如继续如此容易地答应中国的引渡要求，很可能会激起法国舆论界的反对，这是他们首先应该重视的。而且，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还会引起中国侨民的惊慌不安。中国侨民对我殖民地的发展那么有用，他们信赖我们的保护。况且今天，他们通过越来越多地来到印度支那的实业家，对我法律担保了解得十分精确。

如果我们想结束引渡要求，那么我们只须要求引渡须按规定程式提出就行了，这是至今还没有做到的。因为帝国官吏仿佛还不清楚引渡条款触及的范围，还不会在了解法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引渡协定后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他们不知道为支持引渡要求可发出带有罪状的拘票，说明援用条约的详细条文（"诉讼事件"），他们不知道包括发拘票的诉讼程序，尽管有1886年条约的第十七款规定，他们却不注意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需拘捕或引渡者的犯罪证据。强调严格履行手续，我们便可能摆脱所有的引渡要求。但诸如此类的解决办法很可能落空。

可以这么说，这种办法会成为对犯罪者的一种鼓励，他们竟至会把东京看作避难场所，大批而来，从而对我们自己造成损害。另外，还需担心中国的报复，他们会保护来自印度支那的歹徒，重新给予庇护，就如他们对待那些海盗集团那样，海盗们幸亏有边界那边

的官民作同谋，才得以在我领土上长期活动。从这些方面考虑，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最好还是继续过去的习惯做法，不过只是在关于普通刑事犯的引渡问题上。

对于革命党人，或者因政治罪或与政治事件相关联的罪行而被追究的个人，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公法规定和执行我们的专门条款，也就是说拒绝引渡。况且，向帝国当局证明我们的行动符合 1886 年条约的规定、我们完全保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件难事。

这样，法律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剩下需要我们考虑的便是，中国政府怀疑我们帮助革命党反对满清皇朝的阴谋活动，他们很可能反过来给我们制造各种困难。我们是否有可能使他们感到满意，比如，让那些策动中国暴乱，通过云南、广西和广东边境为暴乱输送武器装备和军火的人离开我们的殖民地。这些人一般地说也并不比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更有好感，似乎并没有必要对他们特别宽容。

52. 东京边界上的叛乱分子
甘司东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7 年 12 月 9 日，广州）

一段时期以来，谣传中国革命者准备袭击边界防御工事，甚至龙州要塞。在上次的急件中，我曾向阁下呈报总督谈这个问题的一封信的译文。今晨，我又收到波洛非①博士 11 月 28 日的一封私信，现摘录于下："最近一段时期，我印度支那、尤其是军事区域的问题很多。在东京，人们异口同声地说龙州即将遭到革命者的攻击，我们的这个地区正在酝酿着最严重的事件。……我不相信革命者已能作出这么大的动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道台采取一切应变措施。他接受了建议，给边界所有的哨所增添了大量兵员。"

然而，革命者们还是作了一些尝试。下面是我先后收到的波洛非博士发来的电报，这也是我仅有的一些情报：

"达伦②，1907 年 12 月 3 日，下午 4 时；广州，12 月 4 日，下午 5 时。中国革命者已攻取南关哨所和防御工事，龙州吃紧。如若士兵与革命者汇合，形势将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应让中国当局保证我国侨民经由尚能通行的道路安全撤往东京。请通过达伦与我联系，因为同龙州的正常通讯已中断。"

"比尼③，1907 年 12 月 5 日，下午 7 时；广州，12 月 7 日，中午。革命运动仿佛未向龙州方向发展。在南关革命者手中的堡垒仅剩一个。道台保证欧洲殖民地的安全。"

"达伦，1907 年 12 月 6 日，下午 6 时；广州，1907 年 12 月 7 日，中午。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新情况。道台相信饥饿将迫使革命者手中的堡垒降服。然而，我认为，如果真如传说的某些中国军官实际上效忠革命事业的话，那么还得提防难料的严重事变，我觉得应该

① 波洛非(Polofi)。——译者
② 达伦(Talong)。——译者
③ 比尼(Binhi)。——译者

使大多数居民是外国人的欧洲殖民地放心，要通知他们，一旦情况恶化，我将让中国当局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他们从尚能畅通的道路撤出。"

"龙州，1907年12月7日，下午4时50分；广州，12月8日，晨10时。来电接悉。南关革命者的力量仿佛越来越弱。真市①地区群情激昂。在这方面，如果革命者获得成功的话，难免也会发生混乱。带倾向性的谣言传遍了整个龙州地区，说我们支持革命行动。"

由此可见，革命者并未从军队方面得到任何帮助，所以，道台没费多大力气便控制了这次骚动。至于欧洲移民向东京撤退的问题，我在向法国公使先生汇报后，就只能让我们的代理人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夺了。再者，我们完全可以信赖波洛非博士的见识和镇定。

我一获悉有关所发生的事件的情况，便立即通知了总督。总督立即派魏晗②先生来我处，要求我给印度支那总督先生拍发急电，请他下令在边界上实行最严格的警戒。我当即给博先生发了电报。博先生回答我说，在这个方面，已经下达了最严格的命令，我方哨所将解除所有企图越境的叛乱分子的武装。另一方面，我给波洛非博士去了电报，让他在这一点上给龙州当局作出最肯定的保证。魏晗先生来访后，总督又来信重申他已由他的信使向我提出过的要求。我曾认为应对这封信中的某些措辞提出异议，因为此信竟把东京说成叛匪巢穴。魏晗先生曾向我表示，这其实也正是总督的想法。我给这位大员的复信抄件见附，敬请阁下查阅。

我真想在复信中加上一笔说，我们的诚意能否继续维持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履行它对我们的承诺的诚意。然而，在没有得到特别指示的情况下，我认为还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十分有效，但也容易出乱子。不过，如果不把这一点写出来，甚至不说出来，而只是给个暗示，也许仍是一个不坏的办法。

53. 关于中国南方的骚乱，对在印度支那属地上的避难者应采取的立场

A. 原　则

中国南方的混乱局势以及主要是由孙逸仙在南方的追随者们掀起的蔓延于整个帝国的革命骚动，在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引发了大量事端。这些事端或关系到解除在我领土上避难的造反者武装的办法问题，或涉及应否将被指控为严重或普通刑事罪犯、而我们却认为是政治避难者的人交给帝国当局的问题。

鉴于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和我印度支那边界安全对我们的重要意义，阐明适用于可能出现的各种人的原则以给予时刻都在怀疑我们与那些不驯良分子串通一气的中国政府

① 真市(Chan－Se)。——译者

② 魏晗(Wei－Han)。——译者

以最大程度的安全感,至关紧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逾越我们的公法和国际法准则所划定的界限。

对于那些可能影响印度支那和中国关系的人,有必要按情况把他们区分为:

Ⅰ.交战者

Ⅱ.叛乱分子

Ⅲ.海盗

Ⅳ.革命者

Ⅰ.交战者

1.交战状态是指一个省或国家的一个部分起来反对合法的统治或君权。

2.这是一种邻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自由评判的事实上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状态,只要它未经正式声明的承认。

它原则上应具备:

a)一个等级森严的武装组织,进行反对合法秩序的斗争,并实行战争法。

b)这场斗争应相当严酷,已危及最高权力。

3.承认交战状态的后果是置交战双方于平等地位。

a)因此,双方避难者在中立领土上均被视作战俘并被拘禁。

b)拘禁的责任与战俘看守费的偿付问题无关。

c)拘禁费由战胜方面和得以恢复主权者偿付,不管这个最高权力对双方战俘意味着什么。

4.中国南方的事件尚未严重到危及中国主权的程度,法国方面也还没有必要承认其为交战状态,因而我们尚不存在拘禁起义者的严格责任。

Ⅱ.叛乱分子

1.叛乱是一种不如需要承认为交战状态的冲突那么尖锐和严重的冲突。

叛乱的存在需要有下列条件:

a)一个矛头指向主权,而不是指向私有财产的武装组织。

b)斗争尚未严重到危及合法主权的程度。

2.叛乱是一种事实上的状态,它本质上不应为一个中立国家的正式承认所认可,也不需实行国际战争法的普通法。

3.避难中的叛乱分子可能受到下列待遇:

a)避难国可将他们视作普通刑事犯,将他们交出。

倘若他们人数众多,而且看来已对其敌手实行了他们自己所承受的战争规则,则这个办法永远不会采用。

b)避难国完全可以将他们作政治犯处理,即将他们置于简单的监视之下,以免他们产生危害,甚或将他们驱逐出境。

如果叛乱分子人数众多,那么这种方法同前一种一样难以实行,因为它可能引起有关

国家方面的某些抗议。

c)叛乱分子能够被拘禁和作为战俘处理。这是好得多的解决方法，最人道、最合乎逻辑，也最不会引起抗议。

目前情况下，中国政府理应为我们采用这种方法而向我们偿付拘禁费用。

Ⅲ.海　盗

1.海盗行径是一种手持武器的斗争状态，矛头不是指向合法主权，而是指向私有财产。对海盗集团和叛乱集团不能等量齐观。

2.这是一种普通刑事罪，罪犯原则上应予引渡，而所有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乐于看到他们被镇压。

3.海盗避难国对海盗无任何法律上的义务，它可以按自己的法规处理海盗。它可随意惩处之，或将其交出而无须顾及其命运。

交出肯定是摆脱海盗的最好的方法。

Ⅳ.革命者

1.他们是政治煽动者，一般通过密谋和个别行动的途径行事，旨在推翻现存主权。

2.在避难情况下，不能把他们交给请求国，除非他们同时因普通刑事罪而受到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引渡国应查明请求国援引的理由并非骗局，并且，他们只能就作为提出引渡要求的理由受到审判。

对这些人的判断将特别困难，如果他们是属于另一种文明的人的话。这时他们与我们会有很大的心态差异，而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给予我们的保证也将不够充分。

3.这种类别的政治避难者可以被无条件地驱逐出境。

如果允许他们居留，则应对他们实行监督，使他们无法危害他们逃离的那个国家的政府。

4.避难国在避难者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保持中立。因此，如果这类人数量众多，则可通过管理措施来拘禁他们。

B.实际解决办法

在实际案例中，很难知道叛乱分子是否曾犯有海盗行为，或者海盗是否同时追逐某种政治目的。就革命者而言，同样很难知道他们只是密谋反对政府，或同时也有直接行动罪，犯有属于政治范畴、却又伤害了个人的行凶案。

然而，我们必须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1.这样做显然符合我们的政治利益，即同东京的邻国保持一种大体过得去的、甚至真诚的关系。

2.我东京边界的防卫问题迫使我们对武装团伙采取有效措施。

3.法中政治协定本是以维持与我们的印度支那领土接壤的中国边境省份的秩序为宗

旨的。

4. 把从纯原则上说是难以解决的,而又必须有一个事实上的解决方法的中国革命者问题重新纳入已提出的解决方法中,看来是应当的。

至于殖民部指出的那些已发展到出现中国叛乱分子夺取罗什堡垒和进攻南关要塞等情况的最近的骚乱,我们可以——

1. 对避难的叛乱分子采取直接措施;

2. 同中国政府协商一个既能使他们满意,又不损害我们的原则的解决办法。

今后,在对在我们的领土上避难的叛乱分子考虑采取直接的解决方法时,应注意:

1.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准许中国军队到我们的领土上来对叛乱分子行使某种追及权;

2. 不得释放或驱逐叛乱分子,以免让他们得以与广西境内正在活动的团伙重聚;

3. 必须立即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拘禁起来。

在北京协商的解决办法当以下列各条为基础:

1. 我们将建议尽可能扩大"叛乱"这个概念的范围,将它援用在印度支那避难的一切革命者身上,以便指控他们犯有手持武器的叛乱行为;

2. 叛乱分子和这一类的革命者将被拘禁;

3. 看守费将由中国政府负担;

4. 拘禁时间不能没有限定,但也不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内。

拘禁期限问题不属于原则问题,它首先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对偿付因拘禁措施造成的支出所作出的承诺,而我们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使中国政府感到满意,使他们在中国革命者要在东京找一个根据地这个问题上得以放心,从而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成见。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 政治处 No61〕

一九〇八年

54. 日本与中国
热拉尔[①]致外交部

(1908 年 1 月 10 日,东京)

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始终如故。中国政府在解释和落实 1905 年 12 月 22 日

① 热拉尔(Gerard),法国驻日本大使。——译者

的中日条约中、在为明确和补足这一条约的各个条款而进行的所有谈判中，表现出了被日本政府认为不仅是难以调和，而且几乎是不友善的和敌对的情绪。今天，两国政府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是间岛问题，即中国和高丽的边界问题，以及满洲铁路问题。

在边界问题上，继续进行着外务部和日本帝国驻北京公使馆之间的讨论以及照会的交换，而问题的解决却依然显得遥遥无期。

至于满洲铁路问题，由于这些线路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日本对此加以最大的关注。而中国政府却违背诺言，准备特许一家英国辛迪加建造一条从新民屯经伐口门到齐齐哈尔的铁路线，并一直可以延长到黑龙江，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衔接。这条线路将夺走东满的买卖，并能用于旨在反对日本的战略目标。因此，日本政府用最强烈的措辞提出抗议。然而，中国的英国报刊认为这个抗议是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又一次破坏。

日本政府了解这些舆论表示的重要性，但也必须考虑到，它尽管心平气和，却不能允许缩小或否认它从条约取得的利益和特权，也不能允许损及那些条约使它获得的地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和它所听从的挑动，只能鼓励和肯定日本政府所下定的坚定决心。

热拉尔(签字)

〔法国外交部　No7〕

55. 关于中国报纸《新世纪报》
驻海口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2月1日，海口)

上月21日，印度支那总督在来信中告诉我说，中华帝国政府曾要求法国当局帮助阻止在巴黎出版的一份革命党人报纸《新世纪报》在中国的发行。

博先生告诉我说，公使馆已为此给直属首都管辖的在华法国邮局下达指令。他要求我指示海口的印度支那邮局按照华盛顿协议规定，在封卷好寄来的这份报纸上批注"中国禁止发行"的字样，把它们全部作为死邮件退回。

我立即遵从，并下令我埠邮政局长絮比拉先生照此办理。絮比拉先生已向我保证此命令将得到认真执行。

保罗(签字)

〔法国驻海口副领事馆　政治商务司亚洲处　No406〕

56. 中国—东京边界上的中国革命者

(1908年2月3日，蒙自)

对所谓在东京避难的中国革命者阴谋反对云南问题所作的一次调查已能证实，镇南

关事件以来，由云南铁路营造公司招收的好几千名广西苦力中，只有六十余名可被视作来自叛乱军队。

该省当局旨在令人相信我方曾参与革命阴谋的断言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已得到肯定。他们历来反对雇用两广工人，其目的似是为本省苦力保住为线路所规定的工程工作的权利不为邻近各省所得。

目前，一切都已恢复正常，在招募工人问题上，营造公司与当局已迅速做到谅解。

侯耀（签字）

〔1908 年 3 月 19 日　No5〕

57. 中国的骚乱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2 月 14 日，巴黎）

我荣幸地向您进一步肯定印度支那总督刚发来的关于拘禁在河内的中国革命党人的电报。这批革命党人共五十八名，他们隐约表现出了想要逃跑的意图；修会会长担心骚动，坚决要求把他们送往新加坡。

博先生已下令加强警戒，并建议，如发生逃跑，则把这些政治避难者关进昆仑岛，但并不对他们施以苦役。

鉴于印度支那总督所提到的情况，我荣幸地请您注意在有关这些革命党人的关押期限问题上应该尽快同中国取得相互谅解。

若能使我尽早答复博先生，我将十分感激。

（签字）

〔殖民部　政治和行政事务司　亚洲局〕

58. 关于中法合作弹压中国革命党的备忘录
中国外务部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 年 3 月 15 日，北京）

阁下在正月二十七日（2 月 28 日）的一份外交急件中提到印度支那总督下令拘禁革命党纯系诚意措施，就弹压革命党阴谋活动而言，尚须安排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

鉴于边界警戒和搜捕歹徒等已订入混合治安条例的细则，所以今天在确定补充规则的时候，使只要补充该条例规定中可能存在的不完整之处即可，为此目的，我们建议确定以下五条：

1. 法国当局一经获悉革命党或其他人在印度支那土地上作旨在损及中国安宁的集结或集会，当立即积极致力于驱散这些集会或集结；类似情况经中国当局向法国哨所指出，

或通过领事告知后，也应进行同样的工作。

2. 法国当局严厉禁止和镇压在印度支那及其属地上的口头和书面的一切可能在中国引起暴力行动和扰乱安宁的反皇朝或革命的宣传，以及一切杜撰和传播谣言、蛊惑煽动中国侨民的行为。对主要肇事者将严惩不贷。至于对他们当处何刑，我们请求法国政府颁发一个专门的规定。

3. 凡在中国曾以武装反对官兵，或曾扰乱中国社会安宁和治安，目前或以后在法国领土上避难的任何个人，应立即予以拘禁；拘禁所需一应费用的账目当然将由法国当局事先告知中国当局，由中国当局负责偿付。另一方面，如果革命党人将被驱逐出境，当永远禁止他们在印度支那及其属地上通行，并应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些个人不可能重新越过中国边界。

4. 凡在中国因抢劫或海盗行为、或其他任何触犯普通法的轻重罪行而成为罪犯者，将按照中法条约第三十二款规定，自中国官方出示该案卷宗起即予引渡，将其交中国当局以进行法律诉究。如果被控告人援引政治罪进行抗辩，则对刑事罪情状当作特别认真细致的审查，使罪犯不能用提出假借口的方法逃避法庭诉讼。

5. 若有不怀好意之徒偷运军火，两国边界当局应采取积极认真的措施予以阻止，从而禁绝走私和军需供应。

〔北京致殖民部亚洲处外交急件　No78 附件〕

59. 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有许多分行，这些分行可被分成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行和莫斯科分行，继而是巴黎；另一方面是伦敦分行。美洲的两个营业所，印度两个营业所，接着是俄国在亚洲部分的一些集团，包括哈尔滨、海参崴和撒马尔罕三个重要的分行和大量小营业所，最后是中国集团，以上海为该系统的中心，包括天津、汉口、北京和香港。并且，在横滨还有一个小营业所。

我们且不说彼得堡和它的莫斯科附属银行，因为那是总行所在地。

在巴黎处理的是纯粹银行的业务，平均营业额很大，总之生意兴隆。迫于形势，巴黎是惟一的法国人在工作人员中占绝大多数的分行。由于这个根本不被人重视的因素，这个明确地、也许并不过分地说是被其他地方银行贬低了的因素，使巴黎分行的工作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和兢兢业业，账目一直十分清楚，局势也很稳定，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也就行了。

伦敦几年来只有一个分行，并且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况且，银行缔造者罗茨坦先生觉得在那里只有几个客户，找一家最大的英国银行更为可取、更加有利，这种密切的关系有时可以使它们成为对华俄道胜银行的巨大支持，而又使他得以节省下建造自己的设施的巨款。不过，伦敦分行的存在还是有它的理由的。虽然说它的成绩并不突出，但它却作为通信者为其他分行帮了忙。

在纽约和旧金山，用在它们身上的费用全都白费了。这两个分行一向亏本。除非是给它们事情做，例如，并不属于华俄道胜银行业务范畴的欧洲和美洲间的套汇事务，否则它们永远都不可能付清自己的、再说也是十分巨大的费用。旧金山分行应该为海参崴提供一定量的业务，为香港提供一定量的外汇交易，但它使前者完全失望，而使后者满足的比例也太微不足道了。

印度分行的存在也毫无意义，但是费用毕竟很有节制，而且，在这个国家里有自己的代理人做汇兑交易毕竟不能说毫无益处。

亚洲地区的俄国分行(土耳其斯坦)几乎只做商品投机生意，而且是比较危险的投机生意：棉花、丝绸等等，有大发其财的年头，也有大亏其本的财政年度。我们在那里看到过这种罕见的景象，一个大投机商被任命为分行集团的行长，他继续做他的投机生意，有时是为银行做，有时是为自己做，有时一半为银行、一半为自己做。不可避免的事故发生了，商人行长破产，银行遭受重大损失。然而银行在那个地区并没有竞争对手，如果它能改变一下那种奇特的安排，多冒些险，那么它在那里应该能取得成功。

在北方，华俄道胜银行有两个大分行，哈尔滨分行和海参崴分行，它们除了同中国进行大宗外汇交易外，在这两座越来越重要的城市里还应该找得到其他令人满意的银行事务可做。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结果毫无例外地令人伤心了。哈尔滨分行在一看便知道靠不住的情况下把几百万卢布抛进了管理不当的建造磨坊的巨额交易之中，这场可悲的交易以巨大的损失告终，而且还不算这个在当时造成极大轰动的事件所引起的纠纷和信誉扫地。

海参崴分行也从来没有获利的现象。尽管华俄道胜银行的许多分行都在争先恐后地夺取糟蹋钱财的第一把交椅，桂冠很可能还应当属于海参崴分行。那里不合规定的事情应有尽有，失望和挫折层出不穷。他们曾在肉类装载上搞投机，结果大亏血本。而应该偿还某银行作为库存预告的汇票，他们却从来没有支付过。总之，由于应予谴责的玩忽职守，由于荒唐的、很可能是不诚实的管理，也由于同其他地方一样的商品投机，这个分行一直都在赔本。

除了这两个中心以外，在西伯利亚和满洲还有很多、也许是太多的营业所，对这些营业所的进展情况我们就知道得不多了，但它们主要是做商品交易的。这些多少有点像小铺子的营业所有时地处偏远市镇，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它们是否也有存在的理由呢？不管怎么样，它们办得好坏对全年赢利的构成从来有什么显著的影响。这一事实便充分说明了最初随着俄国在远东影响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银行出现变故，使这种影响的发展化为乌有，或至少使之完全停顿下来的原因。西伯利亚分行和俄罗斯分行之间的交易相对是有限的，而且，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竞争者总少不了，这些竞争者以它们在欧洲及俄国数量较多的营业所和比较专门的组织，大大缩小了华俄道胜银行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范围。俄国和远东之间的国际贸易几乎等于零，除了俄国人在中国购买的茶叶。而华俄道胜银行，从它创建时起，就把扩大营业额的希望寄托在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上，那样的话，它对这个省的政府部门来说还能担起国家银行的角色。

尽管这样也还是不行的，就在俄国占领大连港的时候，从准国家银行的角色中肯定得

益的那些营业所，除了赔本仍然从未有过其他结果。原因仍然在于管理状况恶劣，常常是不诚实，使赢得的利益消失在贪污舞弊或不谨慎和玩忽职守造成的损失中。

即使是在俄国占优势的时期，在这些几乎可以说转为对华俄道胜银行的活动有利的地区，该银行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不过，还是有好几年十分繁荣的时期，股东们得到很高股息。原因一方面是那些可悲的营业活动未经暴露，被明显搀假的资产负债表掩盖过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除了大量一无收获或尽在赔本的营业所之外，还有一些长期保持繁荣状态、给银行的年利润带来最巨大部分的分行。彼得堡总行和巴黎分行虽然菲薄但还可以的收益，对这种年利润而言只能算是小小的补充。这些兴旺发达的分行便是中国的那些营业所。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这种繁荣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

就在华俄道胜银行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们在自己国家的侨民那里得到大量的客户和存户的时候，俄国在中国的贸易除少数例外，几乎等于零。因而，华俄道胜银行主要是同法国人和德国人开展业务活动。而如果它同某个英国商行做成一笔交易，那几乎总是或因为它的行市比与它竞争的银行有利，或者当问题涉及贷款或信贷时，英国客户已经终结了他在英国银行的信用，已经到了英国银行认为从理智上说只能到此为止的极度界限了，尤其是这后一种情况为多。尽管有这巨大的劣势，华俄道胜银行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营业额和相应的利润，这有些是因为俄国政府长期以来以很低的低息存款形成给予它的种种方便，而另外，也因为它在上海拥有一些熟悉汇兑的技术专家。那些套汇人所进行的外汇交易活动确实蕴含着很大的冒险性，但它并不像我们乍一看所设想的那么危险，只要把握这些活动的人十分干练，精通套汇就没有问题。所以，近十四年来，上海分行最大部分就是靠它的汇兑业务生存下来的，而它在这方面的利润最明显地维持着华俄道胜银行的收益。只要能保证有品行、无可置疑的第一流汇兑专家在为它工作，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上海的外汇交易仍将继续是该银行有成效的、足够的业务的基础。在这些专门业务上始终能够有利地增加那些比较实在的交易，信贷及经过深思熟虑和在合理范围内的贷款。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在中国加入工业证券发行的可能性，这种业务类型显然将大有希望。为进行这种业务活动，银行必须有十分稳定的地位，它的信用必须能得到许多人的好感和充分的信赖，只要有点儿分寸，办事谨慎，对它说来要在中国也好，欧洲也好，主要地是在法国取得人们的好感，并不是一件难事。

不幸的是银行的“啰嗦事已经太多了”。在远东，人们对它和它那些古怪的行为议论得太多了，至少可以说，在欧洲，大家对它那些灾难性的，不愉快的事情太了解了。根本就不用提上海分行新近由于危机或倒闭所遭受的损失，或者最近一段时期引起纷纷议论的大量冒险活动。

上海并不是孤独的，它这个组首先还包括汉口。汉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并且似乎确实将有很大的发展。对华俄道胜银行而言，汉口之重要还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存在着许多很大的俄国商行，主要经营茶叶出口。天津也有大量的进口贸易。

除这些分行外，还有两个分行是值得专门研究的：香港，远东最重要的港口，初看仿佛应是华俄道胜银行特别要进行活动的中心。然而香港分行几届领导在任期间都遭到了很大的亏损，他们的理由是很难同英国竞争。至于北京，那里确实没有生意可做，因为那里

没有客户。并不是每一家银行都认为仅仅为了掌管各公使馆人员的往来账目就应该在首都建一个分行的。谁都知道那些分行不过是一些表面摆设，在每个分行后面都有一个尽可能巧妙选择出来的重要人物在努力活动，这个人常常是从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中派遣出来的，他竭力想要获得的不是日常往来账户，而是铁路特许权或其他东西。在这些恩赐中，华俄道胜银行曾很占便宜，但从日常事务的观点考虑，这个地方毫无益处。而由于香港分行老是亏本，所以这个银行的巨额利润的来源至今都是以上海分行为主，加上汉口分行和天津分行提供的。

可惜小营业所只是起了辅助上海分行的作用。它们常常想除了一切听从上海指挥的汇兑交易外，还以各种不同的业务形式表现出各自的积极性。它们似乎一直把这些业务进行得很漂亮，成果也颇大，然而实际上，这些业务中有很多只是不可原谅的轻率行为。例如 1907 年发现的隐藏在给富裕商人贷款面目下的巨大诈骗。全部损失大得骇人，以至为了作出部分补偿，该银行首先不得不动用整个 1907 年期间在其他合法交易中所得到的全部利润，接着，又从储备基金中提取了一笔一千万法郎的款额。像这样的贪污舞弊，若不是那些分行工作人员的招聘做得太糟糕，是不可能出现的。自那些事故以后，他们决定对所有的业务活动都采取比较重大的预防措施。他们任命了一些稽核员，尤其是花了很多费用，高薪请来贝尔让达尔先生，委任他改组所有的科室。结果，改组的内容主要只是一大摞一大摞的文牍和给某些有后台的人加工资，根本就没有工作上和人事上的改革。不必再费笔墨赘述上海目前的活动了。我们很难设想，一个领导部门怎么会在危机正盛的时期同一些经纪人的商行，即想在投机活动中寻找正当贸易所再也得不到的东西的德国和其他国家商行冒这么大的险。至于银行工作人员，他们什么国籍的都有，是随便招聘来的，它不断出现的丑闻为本地好论长道短的专栏提供了资料。在这些人中有的公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而有的则借下一笔笔债。

在华俄道胜银行中，最使法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尽管法国资本构成银行资本的大多数，银行职员中却几乎完全没有我们的同胞，没有一个法国人担任该银行的高级职务。十分明显，华俄道胜银行的领导人把法国人看成了天生没有任何才能的笨蛋。银行薪金很高，行里有很多受大人物保护的人，他们尽管没有经验，而且常常也没有工作热情，但待遇却很优厚。上海分行的工资总额共四十五万法郎，其中四名欧洲领导人分去了二十四万，行里一共也仅仅只有两名法国职员，他俩的薪金加到一起才一万八千六百法郎左右。

法国显然有不少可以信任的人，他们精通银行问题，他们可以对在中国的银行的处境作一个不偏不倚的审查，我们还可以交由他们裁决那里的管理是否实在糟糕，及法国人是不是被排斥在外，或者被限制在低级职务中，所谓进行中的改组是否只是一场滑稽戏，那些费用和额外开支是否都是无用地和过分地花去的，最后，是否应该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进行深刻的改革。我国的银行正是在我们的同胞中找到能够保证银行业务得到重大发展的工作人员的，银行业务的发展不管在哪一方面也不亚于任何外国银行。

60. 关于可能在远东创办一所法国商业银行的通知

概述，引论

最近几年来，外交部的某些官员，以及定居在远东各港口的主要法国商贾曾提出，在我们向中国、高丽、日本、暹罗湾，甚至印度支那的经济扩张所必不可少的活动手段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那便是在这些地区连一所法国商业银行都没有。而十年来，这些地区经济地位的提高速度惊人，工业发展不久便将出现不可思议的飞跃。

新银行将开展的业务的性质，它的行动范围

大家都承认，在那些远东国家里，法国资本只要投放得当，将得到有利得多、也方便得多的使用。尤其在中国，铁路网逐日扩大。已有线路（北京—天津—山海关—牛庄，京汉，广州—三水，山东铁路等等）自通车以来所得收益大大高于原先最乐观的估计①。所以，正在修筑中的或近期内将修筑的铁路（山西铁路，广州—汉口，广州—九龙，汉口—成都，两广铁路网，广州—福建铁路，沪宁线等等）将导致极为有利的金融交易。尽可能多地直接参加这种交易对我们将大有益处。开发矿产虽利益小一些，发展情况也差不多。

尽管日俄战争使中国出现了有些“民族主义”的精神状态，明智的中国人、尤其是某些高级官员已经开始了解他们不能完全没有外国人，并且他们还将在长时期内需要外国人的经济技术援助。在这一方面，我看一年、最多两年内将大有用武之地。

在比较专门的有关铁路业务方面，一年半以前以中国铁路公司②为名组成的英法财团肯定兼顾不了整个铁路网的修建。所以，另外好几个财团也将会有它们的位置。另外，法国在远东的一所大型商业银行的作用不会只限于工业事务。它在有适当担保的情况下（如“厘金”，盐税或鸦片税收入等等），确实还可以答应借钱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贷款的用途为承办公共工程（装设港口，疏浚河道和港外进口水道，码头，桥梁，道路，可饮用水的引导，下水道，电力照明，有轨电车）或购买军火和修建海陆工事（堡垒、武器、订购战舰）。在给予贷款的时候，可以规定其中一部分以待定形式用于完成这类工程。这类工程目前已开始在中国兴办，尤其在南方（广州的水道和码头等等）。

有关银行同样还能参加主要开放港（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等）欧洲各国租界里的收益较大的大宗土地和房屋交易，参加组建贸易或航运公司、房地产公司，给欧洲人或中

---

① 尤其是京汉线的利润，比原先期待中的高出八倍。——原注

② 中国铁路公司（Chinese Central Railways CY）。——译者

国人有抵押贷款(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十五的利率)、贷款预支款,等等。最后,同所有在远东的银行那样,它可以办理汇兑,在这个与金本位相比之下货币值可变的地区,汇兑已是银行的"日常事务"①。另一方面,存在大量采矿工业的创办和其他可能引起有利可图的发行证券的交易。再者,最近在法国和暹罗湾、后又在法国和日本之间签订的条约,将使人们为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发生兴趣的金融交易得以良好发展提供很大的方便。

即使是在印度支那,新银行也可以按照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长期以来采用的基本原则组织农业信贷,使银行起到十分有利和极其有成效的作用。可以在西贡和海丰的河里设置庞大的"谷物升降仓",大米可以集中在那里,然后做大宗的储备券交易。

应在新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目前建立在远东的惟一的法国金融机构东方汇理银行,由于政府所规定章程,几乎不可能进行上面大略提到的任何业务活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东方汇理银行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银行,从而,我们不该指责它把自己的一般活动范围限制在几乎只是进行汇兑和货物抵押借款上。况且,该银行在中国各大商业中心城市先后建立起来的分行,一般地说,经营得不错,管理也很谨慎。从这方面考虑,我们不能再有别的要求了。然而也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指望得到其他东西,才越来越想在东方汇理银行之外再建立一个行动比较自由的银行,而且有可能得到东方汇理银行的支持和赞助,让新银行来从事我们在远东的国家银行被其限制性很大的章程所禁止的交易。

两家银行远不是互相竞争、相互妨碍,而应一致行动、互相支持。东方汇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的商业银行起到法国银行在这里对一些私人银行所起的担保作用。

另一方面,说我们主张创建的新的金融机构会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华俄道胜银行的竞争也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从一开始起,完全可以就两个银行各自保留的活动范围达成协议。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可以保留它在华北和满洲的专有地盘,而新的法国银行则给自己保留日本、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法属印度支那和暹罗湾。

总行所在地的选择,应授予远东总经理的职权

作出这样的假定后,我觉得(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有必要把新机构的总行所在地设立在远东,最好是上海,这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另外在香港、广州、汉口、天津、日本和印度支那设立分行。实际上,这类银行如果董事会不能随时集中,研究提到它面前的交易,从而立即作出决定,便不可能有把握地做好生意,便不可能对它的许多外国竞争者进

① 银价持续降跌二十五年后,于1903年开始上升,给大多数在远东的欧洲银行迄今采用的体制带来根本的变化,这体制使它们几乎全都局限于汇兑业务。今天,它们最关心的是在欧洲人和本地商界投资。——原注

行有效的斗争。如果它的行长(或常务董事)一遇到稍微重要一些的情况就得向巴黎请示,这种体制的结果常常是大量时间的浪费,几乎肯定造成失败。不应忘记,汇丰银行的总行所在地不是在伦敦,而是在香港,正因如此,它在近十年至十二年间能够如此方便地参与中国和日本的多次贷款活动,贷款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贷款修筑铁路,等等。十分明显,正是这些贷款使英国在远东的这个大金融设施获得大量利润,使它的股票从发行时的一百二十五元发展到今天的标价近九百元。

远东其他的外国银行虽说也取得十分可观的利润,却没有一家能取得可与此比拟的发展。这一事实,依我看来,是由于这些银行①在中国和日本只有或大或小的"分行",它们虽说有时也给分行的行长们留有确实是很大的回旋余地,但这些分行毕竟不可能对一个像汇丰银行这样本地有总行的机构进行旗鼓相当的斗争。

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我可以肯定,现在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已经有组成银行董事会的理想成员。在这个董事会的组成中,法国人可以占多数(三或四名,其中例如东方汇理银行分行行长,拉辛、阿克曼公司经理之一,原法租界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布鲁诺先生),还有少数外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甚至中国人,只要对业务确实有利)。

借此机会,我要提一下汇丰银行董事会今年由十人组成,其中六名英国人或英国臣民,四名德国人。1907 年董事会的董事长甚至还是一个德国人。也许,我们可以不必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例如,董事长应永远在将建立的银行的法国董事中选择产生。

如果我们认为关于新银行的总行所在地设在远东的办法并不可能完全实现,那么,至少,在上海的总行长应有足够的职权,在听取就地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意见后,不必请示巴黎便可作出一切十分紧急的决定,不管这些决定有多么重要。若他认为某事务能产生有利结果,并且将此事呈报法国委托人所导致的延迟不会引起重大妨害,他才应采取请示的方式行事。

资本数目的确定,中国人参加的好处

依我们的看法,新银行的资本从一开始起便应定为二千万至三千万法郎。这个银行可以是法国现有某银行的分行,或者是为加入这个组合而汇集在一起的法国银行集团的分行。

必要时,人们可以给东方汇理银行,甚至华俄道胜银行的股东们保留部分股票。最后,还可以要求与新企业的成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中国人出一部分资金。

---

① 两家英国银行:皇家特许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银行,印度商业银行;一家德国银行:德华银行;一家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两家荷兰银行:荷兰汉代尔—马特夏皮与荷兰印度—汉代尔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和华比银行。——原注

法国贸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法国向远东输出资本可能带来的利益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的轻率行动在上海、尤其在香港引起的贸易危机显然只是暂时性的。实际上，中国一般的贸易活动仍在不断高涨，帝国海关的统计数表足以为此作证①。

而且，由于目前日本人的胜利所引起的对外国人参与中国土地事务的相当敌对的精神氛围，却朝着对我们的利益越来越有利的方向逐渐起着变化。

因此，从现在起就应当为马上将变得相对容易的交易准备条件了。并且，只要抛开一切政治上的不可告人的想法，只考虑为中国人提供资金、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必要时提供工业家等援助，这些交易必然能得到极大的报酬。

我们应当明确，例如京汉线这样的铁路特许权的条约，我们是不可能再签订的了，然而，我们将可以用中国政府与"中英公司"最近就九龙到广州铁路的修筑问题签署的新协定为典范：由"中英公司"负责发放中国政府的公债，这个公司将为一家中国公司修筑铁路，并提供器材设备，铁路本身将作为贷款的典押，直至债务全部清偿为止。在整个分期偿还期间，构成铁路所有者的中国公司接受一名英国总工程师和一名同是英国人的会计稽核员的双重领导，以保证顺利的经营和财务管理。

即使缩小到这种作用，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对我们的资本而言仍然能产生特别丰硕的成果。而且，由于资本已经成了我们向远东输出的几乎是惟一的商品②，现在显然应是考虑在另一种形式下恢复平衡的时候了，那便是建立必要的金融机构，以便在这个地区，用法国的钱，产生在欧洲、甚至在美洲都已变得很难获取的收益。

远东总行长或常务董事的选择

然而，毋庸讳言，即使在这个方面，竞争也进行得越来越激烈。而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历来言而有信，却仍然必须注意不要轻率地同他们达成交易。另外，在同他们进行谈判时，大量的手法和丰富的经验也还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将建立的新银行特别应该选择好它的总行长（或常务董事），这显然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这位总行长应该能像使用法语一样流利地讲和写英语（英语是远东的商业语言），他必须通过在这些国家的长期居留，使他对将开展活动的社会各界取得了深刻的认

① 1905年中国和所有外国的贸易总额超出六亿七千六百万海关两，即二十五亿多法郎，它正好是1895年贸易数的两倍。——原注

② 对中国顾客说来太昂贵、太奢侈的法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量十分有限，而我们从中华帝国购买的原材料（生丝、未经加工的皮革、竹草等编织物、茶叶、头发、猪鬃等等）却耗资巨大。每年在中国销售的法国商品额勉强达到一千万法郎，而中国出口到法国的产品好歹每年的价值都要达到二亿法郎左右。——原注

识，同时，他还必须十分了解近十年来在中国、日本、高丽、印度支那和暹罗湾创办和筹划的主要金融、工业和贸易企业。

（签字）

61. 关于建立中国劝业银行联合会的合同

（1908 年 4 月）

为建立一个劝业银行，参加签订合同的张季直大人和他的中国合股人为一方，德·马尔托先生和维·霍夫曼①先生为另一方，双方一致同意拟定下列条款，以留作将来的证据。

一、状元出身的张季直大人及其他中国股票发起人承认外国股票发起人德·马尔托先生和霍夫曼先生已于 1907 年 6 月 1 日与伦敦著名金融家佩吕吉亚②先生规定了的外国资本为五百万法郎。

二、鉴于此种情况，中国股东发起人宣布愿将他们的资金与外国股东发起人的资金合并，以创办上述的劝业银行。本合同的目的为认可这个一致意见。

三、该银行的资金交付后，状元出身的张季直大人（如有意外事故，当为另一中国合股人）的董事长资格将得到承认，张大人应向中国政府报告该银行宗旨为帮助中国的工商企业，凡此类事务必将事先同他们探讨磋商。

四、中外股东发起人将各交付资金总额为一千万法郎的半数。在向欧洲寄出本契约的十星期后，外国股东发起人将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交纳五百万法郎，即他们应交付的份额。在拨出这笔外国基金十五天后，中国股东发起人应将一百万法郎存入华俄道胜银行。其余部分，即四百万法郎，将于上述一百万法郎交付三个月后全部存入华俄道胜银行。

五、已议定上述银行的名称为“中国劝业银行”。它将在中国的农工商部登记注册。同中国人的讼端将按中国商事法典处理，同外国人的讼端将按外国法典解决。

六、上述银行的主要目标是把外国资本引进中国，以帮助中国的工商企业。所以，上述银行将能给此类企业以基金贷款。

七、上述银行业务首先应在中国处理。它的主要机构将设在上海，一些分行将同时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创建。

八、资本的外国部分五百万法郎一经在上海交付，本合同即将正式生效。

本合同只是临时合同，万一爆发战争或非常事件，本合同即不能用作依据。

本合同文书已以外国合股人的名义和中国合股人的名义宣读和通过。

副本与原文无误

S. 德·马尔托

---

① 德·马尔托（De Marteau）；维·霍夫曼（W. Hoffmann）。——译者

② 佩吕吉亚（Perugia）。——译者

62. 未来中国劝业银行中的中方合股人名单

银行所在地将在上海,中国合股人在此企业中已认购他们的份额五百万法郎。

一、张季直是中国文人(北京翰林院学士),江苏北部铁路经理,他总理通州各厂,有棉纺织厂、榨油厂、面粉厂、通州船坞铁工厂、几家锯木厂、一家印刷厂,任通州市和附近地区二百七十所学校的董事长。最近,于1908年4月,张季直大人已由中国政府奖以爵位。

二、许久香,道台,曾任徐州道台,他总理徐州各厂,有彩色玻璃厂、面粉厂、油厂、水泥厂、砖瓦厂等等。他是从清江浦到海州铁路南段的经理,是江苏省在京士绅领袖,曾为修筑苏州—杭州—宁波铁路出任代表,同中国铁路公司谈判借款问题。

三、蒯礼卿,道台,作为钦差任中国留欧学生监督,安徽铁路经理和该省士绅领袖。

四、曾严卿,道台,上海商会总理,总理该市造纸业各厂。

五、汤蛰仙,北京翰林院学士,浙江铁路总理,并总理杭湖各厂。

六、朱孝澜,曾任江西省藩台,目前是江苏各银行行长。

七、窦以珏是东海各厂的副经理,安徽士绅领袖,安徽铁路第二经理。

八、朱志尧是上海油厂和制革厂的经理,安庆道台。

九、严信厚,商会总理,是以"吉祥庄"的名字闻名的中国三十家钱庄总理之一。

十、倪咏裳,苏州仁和钱庄总理。

十一、席正甫是上海北市中国钱庄总理。

抄件与原文无误

德·马尔托

1908年4月23日,李经羲加入中方委员会,签认十万两。他是李鹤章的儿子,原广西巡抚。

63. 中国政府的处境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4月2日,北京)

近几天来,中国朝廷和政府处于一片惊慌之中。北京民众思想界中的才智之士确实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满族统治,这种情形的表现也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明显,致使太后和高级官员们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惊受怕。

例如,近半个月来,一场场故意引起的火灾焚毁了政府的办公楼和好几幢满族人的住宅,此情此景令人联想到1830年法国革命的前奏。而我们仍在担心那些隐身人还会继续进行这类谋害活动。警方确实逮捕了许多人,力求能使镇压产生效果。然而,据说警方本

身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镇压将会迷失方向。

同时，在好几个部、尤其是外务部里，他们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雇员把他们所能够获得的一切文件和官方机密出卖给一些外国公使馆，各报指出俄国公使馆和已故璞科第先生就曾从这种叛国活动中获利。总之这是确有其事的。但是人们还在悄悄议论说，日本是主要的得利者。

以前我曾向阁下提到过日本公使馆与北京甚至外省的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了解革命党的活动显然不是他们惟一的动机。而中国政府——不管日本大臣林董男爵对它表示得有多么友好，认定日本公使馆鼓励反对清皇朝的运动，以便在此制造混乱，为日本提供介入的借口。最近孙逸仙返回日本，这件事恰好为中国政府对其邻邦的不怀好意的看法更增添了一个新的迹象。故而，因对俄国之战所引起的对日本的那些崇拜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深深的怀疑，即使是前不久还十分亲日的人都怀疑。如果日本人继续这么蔑视中国，对中国不怀好意，这种怀疑很可能还会变为仇恨。

朝廷所感到的威胁，以及在最近几次广西风潮中我们对中国如此正确、如此乐于效劳的态度与日本的阴谋之间的明显对比，全都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指望，只要当今政府近期内不受到太大的震动，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它来实现我们的好几个愿望。对我们说来，惟一要紧的是不要发生太严重的骚乱，以免使当今政府的活动陷入瘫痪。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84〕

64. 抵制日本

甘司东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4 月 13 日，广州）

同信附上中国报刊上关于抵制日本的一些文章摘要。近日来最稀奇的是广州仕女的示威游行。近万名仕女穿着孝服，冒着倾盆大雨，在西郊的一座庙宇里集会，为民族所蒙受的耻辱而哭泣，发誓不再购买日货，并激励丈夫、兄弟为国效力。

然而形势仍然十分平静，发表在欧洲报刊上的某些文章说，民众十分兴奋的情绪将使局势危险化，并可能需要为维持秩序派出部队。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找到任何依据。犹如我在上次急件中所提到的那样，反对日本的运动进行得十分审慎，不再举行乱哄哄的示威活动了。然而，虽说报刊几乎保持缄默，却不可从此得出结论说已经出现了某种懈怠。相反，抵制运动在坚持，开始在这里引起日本人的不安。然而，由于它仿佛不会向中国北部发展，普遍的抵制并不一定会形成，遭受的损失也将仍然是有限的。至于思想上的影响，当然是相当明显的。

关于“二辰丸”事件的抵制运动。

在南海地区的好几个重要村庄和顺德地区的程村①举行了几次反对日本的集会。

传说广州妇女不久将组织一次大会。

日本商人继续在广州街头兜售一些便宜的小商品。市商会散发了通报，嘱咐老百姓不要打扰他们。并请求警察局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商人。

估计每天从日本进口的煤价值一万美元。山西籍商人给市商会写信，说在他们的省里有大量的煤矿层，煤的质量比日本煤好得多，建议集资开采。两个广州商人也建议商会组织一家公司，开采广东省的煤矿。

纺织品同业公司决定不再购买日本货。

政府将不会接受总督的辞职，而也许会电告他采取措施，以保护日本人和他们的贸易活动。

上星期天，4 月 5 日，在陈家祠堂举行了广州仕女的一次大会。尽管天气不好，仍有一万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好几个人演说，其中之一劝告与会者不要购买日本货，要她们在戒指上刻上纪念国耻的字样。

梧州商人电告市商会说，他们在昨天的会议上决定组织地方产品展销，以改进地方工业。

1908 年 4 月 8 日，根据日本公使的要求，外务部电告总督，在需要的时候，用武力镇压任何反对日本的运动……根据另一份电报，外务部也许将通知日本公使，在广州禁止开办地方产品展销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次展销旨在促进地方工业、缩减日本产品的进口。

香港商人在一次会上决定，取消在日本订下的货物。

广州记者协会宣布，它不可能在预订合同期满之前中断刊登日本广告。

市商会的一次会议决定要求政府建立一个众议院；决定进行一次地方产品统计，以便使工业形势有所好转；并决定通过绘画和诗歌，使人们永远记住中国所蒙受的耻辱。

1908 年 4 月 9 日，总督决定解除保贲②号巡洋舰舰长吴金荣③的职务。

兴宁发生数次反日游行。

总督致电外务部，请求关于镇压抵制的训示。

《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昨日访问总督和水师李提督，谈有关抵制问题。

1908 年 4 月 10 日，据报道，两名外务部官员因泄露机密而被捕，他们原准备把一份发给广州总督的，有关"二辰丸"案的机密电文报告给日本公使馆。而由于这次泄密，外务部还将不得不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作出让步。

广州商人在西德尼④和旧金山的客户已接到命令，不再用日本船只发送他们接订下的货物。

关于同列强关系的报刊摘要。

〔法国外交部　No46〕

① 程村(Tch'en ts'uen)。——译者

② 保贲(Pao－Pi)。——译者

③ 吴金荣(Ou－King－Yong)。——译者

④ 西德尼(Sidney)。——译者

65. 北京局势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4 月 17 日，北京）

半月一次的邮班过去了，而北京的不安未见稍减。

满族人的住宅在继续遭到火灾，只是发生的次数也许少一些了。出现了新的迹象，有人开始向各方面人士投寄恐吓信，尤其是港沪银行收到了好几封。1900 年，这个银行曾是第一批被火焚的设施之一，当时拳民还刚刚开始作占领城市的准备工作。

震动朝廷的恐怖，星期二还明显地表现在朝廷害怕民众。那一天，皇帝要穿过北京城前往天坛祭祀天地。一切安全措施均已采取，而护卫队也已准备完毕，直至最后一刻，皇帝突然宣布不出宫了，无声无息地主持祭祀的是他的一个堂兄弟。

追捕革命党的工作在继续进行。但是人们怀疑这项工作在进行中是否严格区分良莠，怀疑它能否阻止新的谋害活动的发生。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96〕

66. 上海报纸关于财政方面的报道
（1908 年 4 月 22 日）

1. 财政部电告各省当权者不再让外国银行的纸币在国内流通。（1908 年 4 月 28 日全部报纸）

2. 财政部电告总督和巡抚，查询外国银行纸币的流通情况。（1908 年 4 月 27 日《东方时报》）

3. 上海道台得知外国商人决定不接受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后，给领事使团使团长一函，请他让洋人们收回这个只会损害贸易情况的决定。（1908 年 4 月 22 日《午报》）

67. 关于革命党人的暴动企图
云南交涉使致法国驻云南领事先生
（1908 年 4 月 25 日，昆明）

我们接到来自边界的最新消息说，革命党人企图在云南掀起暴乱。在新坡①，好几百

① 新坡(Sin－po)。——译者

人已化装潜入敦南①。那地方离老街只有十几里。

目前革命党人正藏身边界，企图在那里制造动乱，我们从您的前任得到保证将采取措施，他曾去电印度支那总督，要求派出军队和警察以阻止（革命党人越过边界），并与云南军队协作行动。考虑到这些情况，你们这样做正表明了你们的关心，你们使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现在打家劫舍的风又要刮起来了，新坡离老街很近，如果它在边界沿线引起丝毫反响，肯定总督府便将不得安宁。

如果来自东京湾、潜入云南的革命党人破坏铁路工程，云南省府将很难为此承担责任。

邮局十分清楚地了解印度支那总督府确保禁绝抢劫行为的意志和维持安宁的愿望，它绝不会让事态发展到骚乱的程度。

然而，如果说这些流言尚未得到证实，那么关茀臣等罪犯藏匿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始终在考虑掀起一场革命却并不假。而既然我们接到了这些消息，我们便有必要做好防御准备，以便减轻灾祸。领事先生，我们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给您写信的，请您把我们的愿望转告印度支那总督和老街行政长官，我们希望增加城防军，以便让巡警军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和手段来核实情况、逮捕那些罪犯。

如能抓到关匪，我们同样十分感激。

交涉使署

〔政治商务司急件　No19 附件　（译文）〕

68. 革命党攻占老街
侯耀致外交部
（1908 年 5 月 2 日，老街）

4 月 30 日晚，革命党人攻占老街，正规军已与他们联合。三名官员被执行死刑，八名被杀，十五名受伤。

迄今为止，革命党一直尊重欧洲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蒙自的联系被切断，传说这座城市已同样受革命党人控制。

我经过老街，将取道南溪，明晨抵蒙自。

侯耀（签字）

〔外交部〕

① 敦南（Tun－nan）。——译者

69. 革命党攻占河口
中国政府致中国驻法公使
（1908 年 5 月 4 日，北京）

收到云南总督一电，电文如下：

“河口，信奉孙文的叛匪进攻了各要塞并受到正规军的包抄袭击。战斗中……这股叛匪自从在镇南关（或称南关，“中国的大门”）吃了败仗后至今始终未被驱散。数股叛匪秘密隐藏在安南，停留在河口以外的土地上。……全部……来自安南。

“皇上刚颁发了一道圣旨，命令云南总督派出开化总兵白金柱亲自率部克期前往……以便在短期内平乱。”

除云南总督方面派兵去河口进行防御和弹压外，我们请求您从另一方面，立即要求法国政府迅速下令印度支那总督按针对混合警察的规定，严令老街当局有效地进行……

〔外交部　（绝密）〕

70. 关于河口起事
中国外务部致中国驻法公使
（1908 年 5 月 4 日，北京）

云南总督电告我们说，河口有一股孙文（孙逸仙）的党徒前来进攻要塞，官兵努力应战，目前战斗正激烈地继续着。

他还提请我们注意说，这股叛匪不是别人，正是在南关被击败的那些人，他们曾在东京湾避难，并多次出现在河口边界外进行窥探、等待有利时机发起攻击。

圣上已下旨命令云南总督立即派开化总兵白金柱率部驰援。

同样，在河口方面，云南军队将采取一切镇压和防御措施。

至于东京湾方面，请您要求共和国政府能够对印度支那总督下达必要的指令，请他按两国边界现行的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命令老街军事当局注意监视和逮捕逃亡叛匪。请您要求法国政府下令东京湾边界一切权力机构加强警戒，不要使好意地接待为叛匪的再次进攻提供了帮助。这样，我们两国的边界才能有安宁，我们的友好关系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外交部〕

71. 关于河口事件
巴思德致外交部
（1908年5月4日，北京）

继36号电。

叛军一直掌握着老街，他们砍了老街行政长官的头。但另一方面，南溪，我们的铁路完好无损，今晨火车仍在运行，请将此消息转告公司。蒙自平安无事。

巴思德（签字）

〔法国外交部　No37〕

72. 照　会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年5月6日，北京）

我已多次荣幸地请阁下下令阻止革命党人进攻云南的试探。

今天，我收到云贵总督四月初五日（即5月4日）发来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电报，电文如下：

"革命党匪帮的头目是孙逸仙的两名主要副手，名叫关弗臣和黄和顺。关弗臣不久前是云南边界上大名鼎鼎的强盗，他有在东京湾避难的习惯。去年，他与另一个叫梁兰泉的罪犯同时在东京湾被捕，贵州、云南两省府曾几次提出将他引渡的要求，对此法方一直拒不作答。不久前，王镇邦指出那个关弗臣仍然在云南边界进行革命宣传和准备行动后，我们把这一情报转告了法国领事，请他电告两广①总督采取措施，领事表面允诺，实际上什么也没做。最近几天，罗武领事经过已被叛匪占领的河口镇时，关、黄二头目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下交给领事一封信，领事也公然按照这封信下达他的指令。从而，十分清楚地说明他对叛匪听之任之，对他们的情况是了解的……

"去年腊月（1908年1月），我已曾把一些报告电告阁下，我从那些报告得知叛匪正驻扎在印度支那边界的芭蕉坪和另一些地方，也即离河口不到三十里。由于河口同印度支那的宝成②只相隔一条河或几十尺远，王镇邦担心叛匪秘密渡河，经常派出小分队进行夜间巡逻。所以当我们得知有好几千革命党人打着旗号明目张胆地经过铁路桥从老街直接而来时，我们怎么能不感到惊讶呢！而法律还规定在印度支那的外国侨民禁止携带任何武器，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叛匪所配备的精良武器，那些快发枪炮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路人皆知。

① 原文如此，很可能是"印度支那"之误。——译者

② 宝成（Pao—cheng），老街。——译者

"根据我接二连三收到的报告，尽管匪众是顺着铁道线而来的，火车却仍正常运行，而且，罗武也是坐火车经过的。

"简而言之，现在叛匪已携带武器来到我国国土，我们自然只有派出部队，迅捷而毫不容情地切断他们的通道，并给他们以有力的攻击。说实话，这些革命党人大胆而果断，加之人数众多，然而，如果我们对其腹背夹攻、力追穷寇，那么清洗他们的窠穴、抓住他们的头目是不难办到的。不幸的是他们在印度支那有可靠的藏身之处，他们可以随意来去，法国当局并不加以阻拦。他们要来进攻我们了？我们没法儿阻止他们进攻。他们要撤退了？我们又不可能追击。我们束手无策。这种局面已不可挽回，而且它也并不局限于广西、云南边界，它对整个中国都是一种巨大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

"对云南省来说，局势之危难更因为正规军和叛匪的战斗是在铁道线上进行的，叛匪从这条路得到武器和援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暂停工程和火车运行似乎不大行得通。因此，我只能请求贵部提醒法国政府，请法国政府下令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对叛匪采取严肃的行动。以后如果再得到确切消息说法国人秘密支持和帮助了叛匪，或者对他们听之任之，法国政府便应对云南省所遭受的损失负责。最后，关于运行中的火车，该省权力机关将委派代表和兵勇，在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对这些火车进行检查，以尽我们捍卫地区秩序和公众安宁的职责。"

另一份初六日(5 月 5 日)，仍是由云贵总督发来的电报，报文如下：

"道台增厚来电告诉我一个情报，这个情报是从河口逃难出来的电报局长(蒙自)向他提供的。根据这个情报所说，叛匪的军粮是直接从东京湾运来的，法国人让他们完全自由地运送武器，这都是那位局长亲眼目睹的。道台补充说，他听说已有几千叛匪经东京湾日夜兼程而来。

"因此，叛匪有一条完全准备好了的铁道线为他们提供最方便的交通手段。他们有人员、粮食和武器供应取之不竭的来源。他们已经反客为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云南省铁路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十分清楚、十分明确，所以，我只能请求贵部及早去询问是什么原因，以免继续出现这种情况。

"我还得知，当叛匪进攻河口要塞的时候，一个有四条线的法国军官来劝说王镇邦投降。王断然拒绝，后遭叛匪杀害。另一方面，一名法国官员似曾对人说过有一个叫底波阿的外国官员同叛匪们在一起。这一情况令人更为不安。"

鉴于上面转载的那些情报并考虑到革命党人在印度支那的罪恶行径和印度支那法国人的态度严重损及我们两国边界地区的良好秩序和治安，从而可能影响到法国的名声和我们两国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我谨请求阁下尽可能迅速地去电法国政府和印度支那总督府，要求印度支那法国当局认真行动，对被证实曾听任不管或犯有纵容罪的公职人员一律严惩不贷，并且使中国正规军最终可以在任何有利时刻登上在云南行驶的火车进行检查。

我还应该说明，以后，如果发现法国人确实秘密地支持和帮助了叛匪，或者听任他们自由行动，法国政府应为目前各事件中云南省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

如蒙阁下赐复，不胜感激。

这是重要的。

73. 关于河口暴动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

（1908 年 5 月 6 日，北京）

收到殿下的来信。殿下在信中告诉我有关叛乱分子攻陷河口的情况，向我转达了云南总督阁下的意见，对此我不能不提出异议。

锡良阁下的粗枝大叶和无所挂虑是河口暴动的主要起因。他指责印度支那总督府，是在企图推卸责任。如果中国的防军行动比较积极、指挥比较得当，它早就应该发现中国的煽动者们对河口守备部队所做的工作了，而一个深思熟虑的总督很快便能清楚这种宣传的影响。锡良阁下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发现。而当应能预料到的暴动发生的时候，他又指责旁人。

对锡良阁下的指责我并不感到意外，他对凡属于法国的事物都要责怪，他这种病态的怪癖长久以来人人皆知。我感到遗憾的是，外务部竟对我照搬这位官员的非难之辞。

殿下知道，与此相反，印度支那为瓦解反对皇帝陛下的友邦政府的暴乱企图已尽了一切可能。它最近还在老街拘捕了一定数量的显然与河口叛匪串通一气的中国人。它还给仍然忠于皇室的、得以逃出河口来到法国土地上的中国官员以慷慨的保护。

法国政府忠实履行 1895 年中越边界会巡章程的条例，而如果在过多的情况下，这个条例被搁置一边，那是因为某些中国官员玩忽职守，同锡良总督一样没有尽到责任。

至于我，将继续把我接到的有关河口事件的一切消息及时报告殿下。

巴思德（签字）

〔（抄件）〕

74. 革命党人攻克河口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 年 5 月 7 日，蒙自）

我国驻蒙自代表给部里发了一份报告，详述 4 月 30 日中国革命党人攻占河口的情况。这次袭击是由孙逸仙的主要助手关弗臣指挥的。关住在东京湾达一年多，蒙自道台曾于 1907 年 8 月要求对他进行引渡。中国当局似乎对革命党人的计划十分清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当局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预见能力。

住在河口的法国人在事件进行过程中没有一个受到骚扰，革命党人的告示最完全地保证了欧洲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侯耀先生和他的意大利同职者为了避免撤离铁路建筑工地，认为可以给他们的同胞们发一份通报，通报中，他们建议自己的同胞保持镇定，避免与现有各方的

任何一方发生牵连，充满信心地等待事件的结束。

侯耀（签字）

〔法国驻中国公使馆　No8〕

75. 关于河口事件
殖民部致法印度支那总督

（1908年5月7日，巴黎）

中国驻巴黎公使转给外交部一份电报，宣称进攻河口要塞的叛军即是在南关败北的孙逸仙的党徒，他们在东京湾避难，他们曾多次从那儿出发窜至边境的另一端。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对边界严密监视，逮捕在我国领土上发现的所有叛匪，不让他们滥用我们的好意接待以准备进攻。

现向您进一步肯定以前的指令：必要时采取行动，不要使中国政府对我们有任何不安之心。请您让东京湾地方政府对边界实行有效的警戒，阻止叛匪团伙在我领土上避难，拘捕一切可疑分子并禁止在大城镇进行任何革命宣传，需要时驱逐任何已确实证明与叛匪持有联系的个人。应当避免任何边界冲突，特别是要向中国证明，尽管南方各省政府提供了故意歪曲的情报，我们仍然没有帮助、甚至鼓励叛乱分子的意图。

政务和行政事务司司长

R. 伐塞尔（签名）

〔殖民部办公室　No112〕

76. 关于河口事件的照会
刘式训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5月9日，巴黎）

部长先生：

我荣幸地转呈阁下一份新的、关于河口事件的普通照会。

我请求阁下费心一阅并使我能够尽早地向我国政府汇报活动情况。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十分恭顺的仆人

刘式训

普　通　照　会

继1908年5月4日急件之后，外务部于5月7日又给中国驻巴黎公使先生一电，告

诉他有关河口事件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情况均由云贵总督府提供。公使先生迅即将此转致法国外交部,具体内容如下:

河口骚乱的肇事者们的头目是孙文的两名副手,名叫关莆臣和王和顺。关长期以来便是中国南方边界地区有名的叛匪,自越过边界后逃脱了中国当局的追捕。中国当局曾多次要求印度支那总督府对他进行引渡,但一直未得到满足。

关自从取得行动自由后,不断在印度支那土地上招兵买马,组织征讨云南。河口警察分局副局长曾把这情况报告总督,总督找过几次法国领事,希望印度支那总督府禁止这些秘密活动。他只得到了一些没有下文的许诺。

叛匪占领河口后,侯耀领事便能得到他们的通融,从他们的头目那里接受一份证书,可以自由出入该镇。

这股匪徒仿佛是去年冬天在东京湾地界内离河口三十里左右的芭蕉坪组成的,他们的人数有好几千,经老街,通过铁路桥到达河口。可见,法国军事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对叛匪保持了通融的态度。河口叛匪目前已兵分三路,向南溪、坝洒和其他地方进发。

他们还宣传说另有援军正在东京湾顺铁路赶往河口。

帝国政府认为,让法国政府也了解这些情况,对两个毗邻国家都有好处,希望法国政府下令对此进行调查,如情况确凿,惩处玩忽职守或与叛匪同流合污的犯官。

外务部就此问题奉告法国驻北京代表后,委托中国公使对毕盛阁下也作出同样行动。

同时,外务部还向巴思德先生宣布,中国为了避免骚乱,认为有必要对运行在中国领土上的火车派出巡警,巡警在各站上车以便有效地警戒叛匪活动,希望法国政府在这一点上也能同意帝国政府的做法。

1908年5月9日,巴黎

〔中华帝国公使馆　No204〕

77. 关于河口暴动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

(1908年5月11日,北京)

大人:

尽管我并没有把向外务部提出的对法国驻蒙自领事和印度支那总督府的非难、殿下在本月6日的信中告知我的非难看得很重,鉴于它们的来源,我曾去了解有关的情况。今天,我能向殿下担保,这些非难都是没有根据的。

曾有个别几个中国人得以走过连接老街和河口的铁桥,前去会合长久以来在河口镇准备暴动的革命党人。但是要说看到了数千武装和革命党人列队走过此桥开往河口,那才是白日做梦。锡良阁下提到所谓负责那座桥警戒的巡逻队和分遣队,如果他们让叛匪这么过了桥而又不报告河口的民政和军事当局,那他们也太不尽职了。

侯耀先生到印度支那去接他的家属,回蒙自时确实搭乘南溪的火车,当时革命党已攻

下河口，但他绝没有同革命党的头目们会晤。侯耀先生有他们颁发的证件，他还把这个证件给蒙自道台的代理者看过，那是老街一位商贾收到的某种像通行证一样的东西，无非是说侯耀先生可以在铁路上通行，不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各国冒险家加入中国革命党人的队伍是有可能的，但是锡良阁下对事实真相作了令人不愉快的歪曲，把这些冒险家都变成了法国军官。锡良阁下这样做，这是他的手法的继续。他感到自己受到目前事件的严重牵连，于是指责别人以便推卸自己的责任。

与此相反，印度支那政府继续采取十分积极的措施，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叛匪。例如，它刚派出两连步兵前往云南边界增援负责镇压革命党阴谋的防军。

巴思德(签字)

78. 云南骚乱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5 月 15 日，北京)

我国公使在云南骚乱中采取的行动准则，同最近的广西事件中遵循外交部指示的准则毫无区别。再者，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南溪山谷的革命党人中相当大的部分，也就是构成在龙州地区遭到正规军追捕的会党的那些人。这同样是中国当局的想法，然而中国当局却故意装出认为那些叛乱分子借道我国国土从一省跑到另一省的样子，云贵总督竟至还敢就此问题向外务部递交了一份攻击印度支那总督府的立场的指控书，力求把首先应归咎于军队蹩脚透顶的组织和他们同革命党沆瀣一气的责任推诿给印度支那政府。

巴思德先生对这些谰言提出了异议，并提醒中国政府，我国在广西事件中的态度足以说明我国对中国所保持的真实感情。另外，某些中国报纸也开始议论到云南省官员，因他们对策划中的事件的无知，或因他们玩忽职守，未加以阻止而应负的责任。

巴思德

〔外交部　No119〕

79. 关于河口事件问题

毕盛致中国驻法公使先生

(1908 年 5 月 18 日，巴黎)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部于本月 14 日发出的普通照会，我荣幸地告知您，根据印度支那代理总督新近发来的电报消息，在南溪的中国叛乱分子装备低劣，人数不超过几百。

另一方面，印度支那总督再次增加了边界上的法国军队，以阻止云南、广西的革命党人前往我领土避难。

另外,博努尔先生通知我说,在河内的中国商人经证实与革命党人确有关系后,按照我部和殖民部协商一致的决议,已被催促即刻离开东京湾,印度支那政府都没来得及考虑这样的措施是否会影响地方商业和损及我法国同胞的利益。

在广东边界,离东兴不远的平寮①据点指挥官报告说,一支法国侦察部队在试图逮捕一伙十八名革命党人时遭到枪击。战斗中一名狙击兵下士受伤,两名革命党人被击毙,另两名被俘,余者在杀害了一名向法国据点指挥官报告有革命党人的妇女和两名儿童后逃走。

像这样的事实,如果需要的话,足以证明某些官员(为了掩盖他们本身的无能和由他们负责的机构之涣散)指控法国当局讨好革命党人的错误。法国当局对帝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正确,这是不容否认和不应该加以怀疑的。

〔法国外交部　政治与商务司　(抄件)〕

80. 关于由东方汇理银行支持在中国建立一个常设工业机构的问题

外交部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1908 年 5 月 18 日)

公债事务在中国的表现方式特殊,我们只能就其本身而进行考虑:发行公债是为了建设大型公用事业,债主不仅可拥有监督资金使用的权利,而且有权在这些企业中与中国人合作,把最大部分的订货交由他们的同胞工业家们去承揽。

然而却没有一家银行,或者为了一次金融活动而特地组织起来的银行团能从这些权利和权力中得益。为此,还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常设在中国,同中国政府保持不断的联系,从而能集中起产生于连续行动的各种特惠,逐步巩固它的声望和信誉。

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法国拥有十分巨大的力量,东方汇理银行是它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代表。然而,不管是从它的经济利益来看,还是从它总的政治影响而言,它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最近进行的法英谈判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缺少一个像"英中公司"那样的机构,东方汇理银行只好参加一些别人的活动,担任一些廉价的二流角色,不管是同英国人,或者是同俄国人甚至同比利时人所进行的交易中,它都被迫处于次要地位,而它的财政资源本来应能保证它在大量事务中占优势地位。

从我们在中国的长期而不利的经历中,明显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放弃通过一家银行或一个银行团、一桩生意建立一家公司,就事论事地处理每一行动的方法。为了使法国利益得到捍卫,使得在中国的交易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洽谈解决,经纪人必须由同一个金融设施担当,并为它增设一个常设的工业机构。

① 平寮(Ping Liao)。——译者

几年前在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赞助下，为在中国继续进行大型公用工程企业而由东方汇理银行和汇丰银行通过的那些协定，特别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家纯属法国的公司（类似“法中公司”），由它继续行使属于东方汇理银行财团的权利，它将能同英中公司或其他任何外国公司直接订立其他协定。

这家公司将使法国人能由自己来体现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捍卫和发展这些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使直接或间接地与由它处理的商业事务的优势相得益彰。

这家公司创办之所以显得更为迫切是因为，如果法英财团将缔结用于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贷款协定的话，法国还没有一个与“英中公司”的地位相当的机关能与中国政府商谈，能够指派代表、为中国人提供法方合作者、接受和实施应由法国承担的器材订购份额。

法国政府十分重视立即创建这家公司的问题，因为它对本国侨民在外国公司中的利益沦为次等理所当然地感到不满，而在目前事态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得到改变的。

81. 云南、广西两省的骚乱

殖　民　部

（1908 年 5 月 22 日，巴黎）

殖民部转发博努尔先生的一份电报，这位高级官员在电报里再一次和最强烈地抗议了中国在有关我们对云南、广西两省骚乱的态度方面发表的言论。在另一份电报里，博努尔先生正好报告了我军在广东边界与中国革命党人发生遭遇战的情况。

印度支那总督也从他那个角度提请注意说，我们为中国当局所做的事已超出条约所规定的范围。而云贵总督请他转达在这个问题上对巴黎的感谢正好证明了他这个论断。

不管怎样，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误会，还是应该明确两国政府各自的义务，殖民部代理部长也准备如中国政府所要求的，用一个新的条约补充关于混合警察局的章程，以再次证明我们的诚意。

〔1908 年 5 月 23 日　No758　（保留）〕

82. 对付中国革命党人的问题

殖民部代理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5 月 22 日，巴黎）

承蒙您的好意，在 4 月 16 日 372 号急件中，转来中国政府交给我国驻北京代表的一份关于弹压中国—安南边界革命党或反皇朝阴谋活动的备忘录。

您同时又要求我告诉您我对这一文件中所提建议的看法，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授权巴思德先生副署条款。

在提出这方面的看法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征求印度支那总督的意见，请他告诉我是不

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这位高级官员刚回答我说，中国政府的这份备忘录从总体上说他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在某些地方作些更动。

结合您在上述4月16日急件中附来的草案上用红笔作的修改，考虑到那些变动，可能采纳的文本如下：

第一条（除您指出的那些，别无改动①）。

第二条，法国当局将严厉禁止和镇压通过新闻或其他出版形式所作的一切反皇朝或革命的宣传。主要肇事者将被驱逐出境，或按照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章程和它同各外国列强签订的协议予以起诉。如有必要，将吊销给予用本地语言发表文章的报刊出版许可证。

第三条，在法国土地上来往或将来往的武装叛乱分子及武装叛乱集团均将被解除武装并拘禁。经由法国政府确定拘禁时期并一般在由它通知中国政府后，被拘禁者将被驱逐出境。拘禁所需一应费用的账目……（本条款其余部分没有变动）。

第四条，凡在中国犯有抢劫或海盗行为、或其他触犯普通法的轻重罪行的犯罪个体，如有必要，将按照1886年4月25日协议第十七条规定，经办理引渡手续后予以引渡并交给上述中国当局。中国当局应把案件的完整卷宗随同其引渡申请书一起交给总督。

博努尔先生还要求对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话"如果被控告人援引政治罪进行抗辩"作如下补充："或与一条政治罪有关联的罪行进行抗辩。"

第五条（无变动）。

在保留这些更动的情况下，我荣幸地告知您我同意您的建议，批准中国政府提交我驻北京代表的这份议定书。

（签字）

〔殖民部政治和行政事务司　亚洲局〕

83. 云南和广西的骚乱

殖民部代理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5月22日，巴黎）

承蒙您在本月14日441号急件中，转来您对中国驻巴黎公使先生于本月9日交给您由您当天就给我们传达的口头照会的答复。

这一以博努尔先生5月10日电报所提供的情报为基础的答复，充分证实了我们的诚意和中国谰言的错误。我荣幸地既以我个人的名义，又以总督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

另外，这位高级官员再次和最强烈地抗议上述谰言，他于5月15日来电中提出了这

① "革命党或其他人"改为"革命党或叛乱分子"；"在印度支那土地上"后划去原有的"或在归属地区，如河内、西贡"；"当立即积极致力"改为"将致力"。——译者

个抗议，我已非正式地向您转呈了这份电报。本函再次附上那份电报的抄件，以及同日另一份电报的抄件，博努尔先生在这一份电报里报告了我军和中国革命党人在广东边界上刚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这两份文件将使您能够完整和精确地驳斥中国公使带来的指控。您在上述5月12日的照会中，突出了法国政府的诚意和印度支那当局为反对中国革命党人所作的持续努力，而这两份文件进一步明确地证实了您那个照会中的结论。

值此机会，我还应该告诉您，我已给博先生转去您5月3日的急件，在这份急件里，您批驳了东京湾代理最高驻扎官的一份报告中的几处错误，那份报告是我于4月27日转呈给您的。

印度支那总督先生援引他在今年2月12日的报告中展开的论述（那份报告我也转报过您），提请我注意说，德・米里伯尔①先生个人的判断绝不损及我们历来向中国当局作为基本出发点提出的事实，他还提醒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为中国当局做了几乎所有我们可能做到的一切，而且也许还超出了条约规定我们应该做到的范围。

至于法国炮兵上尉帮助叛乱分子一事，这确实令人遗憾。可是，博先生既没有办法阻止他，又不可能惩罚他，因为这位军官目前已不在军中，他已同东京湾来得最早的一位移民合作，在开发边界附近的一片租借地。您一定会像我一样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件曾使您那么公正地感到激动的事情，它的严重性竟大大地减弱了。再者，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中国政府方面的任何异议，依我看来，它比中国正规军多次对我军官和侨民犯下的侵害罪要轻得多。

不管怎么样，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诸如此类的误会，还是有必要把两国政府各自应尽的义务明确下来。而为了向中国再次证明我们的诚意，我准备如中国所要求的，用一个新协议补充混合治安条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荣幸地同时给您寄上一份特别急件。

就在我要给您寄发这份急件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新的有线电报，发出日期是本月16日，这份电报同时也直接转给了您。在这份电报中，印度支那总督告知我说云贵总督请他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为他提供了情报，也因为印度支那总督府的符合国际法的真诚态度。

犹如您将能看到的，这位中国高级官员所表示的感情只能以最绝对的方式进一步证明我以上所告诉您的拙见。

（签字）

〔殖民部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亚洲局〕

① 德・米里伯尔（De Miribel）。——译者

84. 关于孙逸仙
殖民部转外交部
（1908 年 5 月 23 日，巴黎）

殖民部转来"法国保卫人权同盟"一信，信中抗议印度支那总督作出的禁止中国人孙逸仙在我殖民地逗留的决定。

殖民地代理总督希望了解部里对他在这个问题上应如何答复德·普雷桑塞①先生的意见。

〔法国外交部 No790〕

85. 云南暴动和 5 月 24 日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的集会
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5 月 28 日，东京）

目前中国南方表现出来的造反行动，自从在两广发生后，今天已发展到云南省。日本当地报界仍在认真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在日本，尤其是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正如应预料到的那样，不顾事先对他们作出的警告，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发泄自己的政治和革命激情。

本月 24 日，有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在神田区的剧院"近畿馆"聚会。这次私人"聚会"的目的是抗议满清皇朝，并且，特别是抗议北京政府为了与云南造反者作战请求印度支那军队帮助的措施。根据 5 月 24 日聚会的"领导人"某个姓章的先生对地方报刊透露的内幕，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是从东京出版的《云南杂志》上得知请求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帮助的消息的。这条消息由柏林电告上海，上海港又转达给了这份杂志。愤怒的学生顾不得对上述来源的这条消息加以核实，便准备对一系列的决议进行表决，决议的正文已转载于东京各报。决议的内容包括一份云南独立宣言、一份要求中国所有的省帮助革命军的紧急呼吁和一份给法国政府的通知，声明云南不承认从即日起在中国政府和共和国政府之间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协定。

在当日的每周一次的接见中，我援引了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对林董外务相谈到了这次"聚会"，谈到中国学生继续在东京印发的一些出版物，我以前已经对他指出过这些出版物锋芒毕露。林董伯爵对我说，5 月 24 日"聚会"尽管是私人性质的，却没能逃过日本政府

① 德·普雷桑塞(De Pressense)。——译者

的注意，警察局已采取措施镇压任何公然的示威活动，并且已下达命令，对中国学生，对他们的会议和出版物进行尽可能严密的监视。林董伯爵还补充说，如有必要，如属形势所需，内阁将考虑是否向议会提交一份法令草案，扩大警察局和政府在这些不同方面上的权限。在这期间，不仅对中国学生，而且对学校、俱乐部、餐馆、剧院、聚会地点、印刷厂和书店发出新的严肃警告，以防止构成滥用日本接待和对一个外国政府犯下过失的一切行为的发生，禁止散发这类文章。在这方面，我答应林董伯爵，把在日本用汉字印刷的、所有有影射和攻击共和国政府在印度支那或在中国的政策的小册子和文章统统转报给他。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林董伯爵不加掩饰地向我表示出应该加倍警惕地注意观察目前中国各省、甚至北京的局势。他强调了在这段时期里，对于在亚洲大陆上有利害关系的列强，尤其是对于由1905年和1907年条约联结起来的列强，存在着在适当的时候共同商讨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问题。林董伯爵觉得，由于目前的北京政府里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国务活动家，所以这种警惕性和协调一致便显得更为必要。召请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位前总督进京曾被看作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可是现在，他们二位同样地失去了影响、信誉和权力。不管是在满人中间，还是在汉人中间，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或担当起如恭亲王、李鸿章或荣禄这样的国务活动家的角色。所以，在必要时和这种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有关列强要想保护中国和自己免受事件或骚乱的后果的影响，可能将遇到比以往更多的困难。而皇太后去世或皇帝驾崩或选择皇位继承人的角逐均可能引起这种骚乱。

热拉尔（签名）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亚洲局　No84〕

86．普隆事件
博努尔致殖民部

（1908年6月4日，河内）

218—普隆①边界哨所指挥官6月3日电：

“魏果②中尉在边界附近侦察时遭到中国正规军卑鄙地杀害，他当时正在解除革命党人的武装；四名狙击手被打死，六名失踪。”③

这一事件不是因为出了差错或者误会，据普隆哨所指挥官说，中国正规军官兵二千名，曾对我所谓纵容革命党人表示不满，并声称要进攻普隆哨所。而且他们后来还向第二批法国侦察部队开枪射击。

当天被民政和军事当局逮捕和拘禁在东京湾的革命党人人数达七百，证明了我们的

① 普隆（Pha－Long）。——译者

② 魏果（Weigaud）。——译者

③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一百四十六页记载，“当革军退入越南之际，清兵闻讯追击，误伤法国大尉威根一人”，当指此事。——译者

态度是真诚的，我们的协作是有效的。

我一方面让总督府出面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和给予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请法国驻北京公使向外务部提出此案。

我给高级驻扎官下达了指令，让老街边界专员要求河口中国专员赔礼道歉，并要求他采取一切措施惩办凶手，避免在边界上的任何地方重演类似事件。两连援军已当即从附近哨所出发赴普隆。失踪的军官和狙击兵的尸体还没有找回来。我将继续向您报告。

博努尔

〔殖民部　电报 No51〕

87. 普隆事件
毕盛致法印支总督先生

（1908 年 6 月 7 日，巴黎）

我回答您的 51 号电。

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在东京湾土地上，正在为帝国政府做其非常迫切地要求他们做到的事——解除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时，遭到杀害，此事将引起舆论界的极度愤慨。

除惩处凶犯和给予受害者家属以应有的物质赔偿外，共和国政府要求得到与中国政府的严重责任相称的补偿。

您告诉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等待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对我们的诚意，我们在解决那些最简单的事务时都遭遇到的重重困难已经使这种诚意令人生疑。

除解决通常问题外，我准备同殖民部长研究我们能够提出的专门赔礼项目，并打算于星期二将此案提交部长会议。

毕盛

88. 供外交部长用的摘录

（1908 年 6 月 8 日，巴黎）

一名法国军官和六名士兵，在靠近云南边界的东京湾领土上，正在解除中国叛乱分子的武装的时候遭到杀害，此事同时证明了我们对中国的态度的光明正大、我们的支持的有效性，和中国当局的组织不当、该省军队的无纪律以及锡良总督在云南制造和扩大敌对的思想状态。此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和十分重要的机会，乘此机会可以解决一定数量的搁置很久的问题。

首先可以提出来的毋庸研究地合乎逻辑的要求是对凶手严惩不贷（且不说应给受害者家属理所当然的物质赔偿，赔偿金额将由印度支那确定，并不容争议）。问题是要惩办的不仅是直接和具体的凶手，而且要追根溯源，直至锡良总督。因为我们在云南所遭遇到

的这种思想状态——最近又得到可悲证明的思想状态——是由锡良总督造成的。把他调离势在必行,我们早就对他带来的那些官员怨声载道。由于我们对那些铁证如山的弊病所作的申诉,终于得以调换了云南按察使(大法官)和蒙自道台。撤掉锡良,云南政府的更新便完成了。因为撤掉锡良,也就去掉了云南敌对和反法的因素。锡良有害于我们的睦邻关系和不利于我们已取得的矿山开采特许权和建造铁路的特权。

同时,我们还能利用这个机会,明确云南企业联合会和岭南公司①的因地方当局缺乏诚意而未能兑现的权利,使他们尊重有关这两个单位的原有契约。我们还将要求赔偿被无理扣押的印度支那的鸦片。是不是还需要对云南提出更多的要求?既然罪行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是否能要求解决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平息我们在华南的怨言?印度支那总督早就考虑把我们的边界移到高踞于东京湾之上的悬崖峭壁上,这样我们便囊括了地形极为复杂的南溪峡谷,便有了一条易守易警戒的边界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荆棘从生、山岭起伏,中国又在那里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不管这类解决方法有多么理想和多么正当,它都不能采用,因为它与我们一次次宣称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声明背道而驰,可能会给我们以后同中国的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除调整边界外,我们是否应该提出铁路方面的要求,例如要求把云南省的路线延长到成都的特许权?这一延长将是十分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海防—老街—云南省铁路发挥出它的全部经济价值。同样,这也能很容易地证明它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将使中国富庶的西部地区走出与世隔绝的境地,为它提供一条比长江更实用、更有利的交通线路。长江多次被急流切断,几乎不能通商。然而,这条路的特许权本来就可以视作我们老街到云南省的铁路于 1900 年开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和云南地方当局那么多次表示赎买这条铁路的愿望为我们的谈判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不久,等铁路修建完毕后,我们很可能做到使他们偿付大部分费用和为成都到老街的铁路组成一个中法联合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一项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特许权而用尽我们的诉讼理由,这实在并不高明。

不离开铁路线,难道我们就不能要求偿付由最近这次叛乱、6 月 3 日倒霉的枪声带来流血的结局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然而,苦力们弃之不管的几处工地和停驶数天的火车所能说明的损失,与一项如此崇高的要求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会使这项要求失去诚挚的性质而显得像滥加利用。由于中国的责任而需偿付的赔款是不会受到十分的反对的,用不着把它们放在首位,给予它们所不应有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不提云南,我们就不能要求在我南方边界上进一步肯定以前的那些铁路条约了吗?例如由于法弗斯—里尔放弃此事而已经不用了的谅山—龙州—南宁—广州条件。或者执行那些明确的条文?如关于遭遇到广西民众反对的北海—南宁铁路的那些约定。不管如何设想,在这些方面要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十分严肃地需要维护我们的权利。所以,倒不如把这个问题留待于同中国政府的普通洽商中

① 英、法两国曾于 1899 年获得对云南澂江、临安、开化、楚雄等府的铅、锡等矿藏的开采权,并组织了隆兴公司,但矿藏实际未采。——译者

再解决。中国政府十分担心南方的革命宣传，我们可以对他们说明如果不联通两广和印度支那的铁路就不可能征服革命党人的道理。中国政府关于在印度支那设立领事馆和其他方面的要求，为法国取得这类特许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

总之，鉴于我们有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所作的种种声明在先，以及中国舆论和政府对触及中国和东京湾的共同边界的一切都抱着极端不信任的态度，我们在其他方面可能获得、而且是比较容易地获得较多的东西，我们摆出的姿态最好是对中国人说，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对于他们怀疑我们对云南有觊觎之心的问心无愧，我们对云南（已取得的权利除外）、甚至中国南方将不提出任何要求。

让我们从其他方面提出要求，并且，不要停留在解决一些小问题上，以免喧宾夺主，因为搀入次要问题而冲淡了我们的主要要求。让我们要求中国明确地证明他们对我们的诚意，这种由于我们在解决那些最简单的问题时不断遇到困难而变得令人怀疑的诚意。

我们希望从外务部得到的、作为它对我们友好情感表示的特许权，应针对一个完全属于法国的、同时又有益于中国公众的事务。目前法英小组顺利谈判中的粤汉线不属此例。目前以我们的权利不被完全否认为前提在进行讨论的法比共同签署的京汉线条约的展期问题也不属于这个范畴。

山西铁路从太原府到西安府的延长（六百公里，相当于一笔一亿二千万的费用）仿佛能够符合我们的愿望。1908 年 3 月 1 日开始通车的山西铁路建造代价是四千五百万（法国出四千万，中国出五百万）。它已经成了完全属于法国的事务（俄华银行已完全退出）。鉴于异乎寻常的速度和价廉物美，它颇得中国的青睐。我国公使馆目前正依据庆亲王于 1904 年发表的一个声明，力争将特许权一直延长到西安府。

延长山西铁路的要求似乎完全有可能得到满足，它虽然是一项重要的特许权，却不会在中国政府中引起反感。而且它还具有比其他特许权更为实际的特点，因为“法国中国铁路建造和开发公司”的工程师和承包人整套人马都是现成的，该公司已采取一切措施可为中国提供所需的资本，法国在中国的主要商务的居间人东方汇理银行可以为此提供服务。

我们可以为我国驻北京公使保留说明其看法和提出对法国政府的要求是否适时的意见的权力，因为他深知底细，可以就地作出判断，同时电令巴思德先生，可以指示他提出下列要求：

1. 惩办凶手；
2. 调走锡良总督；
3. 给受害者家属以应有的物质补偿；
4. 解决在云南的某些事务，希望能明确我们的权利并确保它们能得到尊重；
5. 延长山西铁路。

以前的解决办法，尤其是 1875 年英国人解决马嘉理事件的办法，证明了我们的要求是很有节制的，并且考虑到了中国的舆论状况和一个大帝国的正当的敏感之处。

89. 关于普隆事件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
（1908 年 6 月 8 日，北京）

大人：

在进一步肯定我星期五送交外务部的情报的同时，我遗憾地报告殿下，本月 3 日，一队中国官兵在法国领土上的普隆哨所附近，攻击了正在为确保边界而执行侦察的一小分队法国人。指挥法国小分队的中尉和他的六名士兵被中国士兵用枪口顶着杀死，另有四名士兵受伤。

对于在法国领土上执行任务的身穿军装的法国军官和士兵被毫无道理地横加杀害，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背叛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国官兵又向另一同是在普隆附近执行任务的法国小分队开枪射击，而幸好这一次没有伤亡。又，6 月 4 日，艾店哨所的中国官兵越过边界，抢劫了安南人的支马①村。

这些痛心的事实发生在法国政府为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最近在广西、云南两省发生的暴乱而做了大量工作之后，这需要对肇事者严惩不贷，并作出彻底的赔偿。

我相信，中国政府在了解到这些事实的反响后，一定会很快地公开表现出它对这些事件的斥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北京公使馆致亚洲处急件 No142 的附件〕

90. 关于云南问题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 年 6 月 11 日，巴黎）

续电 38。

共和国政府决定要求：

1. 惩办凶手；

2. 调走应对军队的无纪律和敌意负责的锡良总督；

3. 给受害者家属以应有的物质补偿；

4. 尊重和确保我在云南的云南矿业联合会、岭南公司、铁路警察的权利，解决因任意扣押而应向印度支那商会作出的赔款问题；

---

① 支马(Chima)。——译者

5. 接受由于骚乱对铁道工程的影响在调查后确认合理的赔偿的原则；

6. 在文末所指出的条件下延长山西铁路。

两年来，法国一直给中国以最周到的支持。它封锁边界禁止运入武器，驱散企图在它领土上组成的革命党团伙，解除想在东京湾避难的叛乱分子的武装，并把他们拘禁起来，目前在押的叛乱分子人数有七百多名。对此友好的帮助，中国的省政权以怨报德，他们的报告使北京对我们一直怀着不信任的态度，对解决我们毋庸置疑地有权解决的事务十分不利，而边界上时闻枪声。法国由于这种以怨报德的行为已经心灰意冷。魏果中尉和六名士兵在法国土地上惨遭杀害，加之一个法国村庄遭劫，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耐心。而且，最近在谅山附近又发生了一次事端，中国正规军抢劫了那里的一个法国小镇。对这件事，我请您同样不要提出任何确切的意见。

启发我们提出那些赔偿要求的崇高感情不应有任何地方使人对我们的意图产生怀疑。所以，尽管犯罪地点是在边界上，只要把边界线移到俯瞰东京湾的高地上，我们便能免遭现在所不得不忍受着的侵犯，法国政府却坚持不在这方面提任何要求。为了尊重中国的舆论和再次证明它对被人诬称怀有觊觎之心的地区的绝对无私，它决定对中国南方除尊重已取得的权利外，不要求任何东西。

然而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外务部表示它对我们的友好感情，它为使我们忘却两年来我们在北京时时处处遇到的无诚意表现所准备付出的代价，给法国舆论界作出不可否认的信任的保证。这只需要它让我们延长山西铁路便能做到。在要求这项特许权以前，您要使他们明白这一点。

建造山西铁路的工程是一件完全属于法国的事务，由于异乎寻常的速度和价廉物美的建造工程，以及它对中国而言的公益性，已使中国政府完全满意。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赏识我们的无私态度，对我们节制的赔偿要求给予好评，因为我们最大程度地考虑到了一个大帝国的舆论状态和正当的敏感之处。中国政府肯定愿意通过采用这种方法迅速满足应给予我们的赔偿，从记忆中抹去这一切，因为拖延下去只会损及我们的睦邻和信赖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中国比对于我们更为珍贵。

毕盛(签名)

91. 关于普隆事件
巴思德致中国外务部主事阁下

(1908 年 6 月 13 日，北京)

大人：

中国正规军士兵最近几次在法国领土上对一些法国人犯下的侵害罪使中国政府应负有严重责任，我吁请殿下注意已有五天，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不幸的是这些侵犯罪并非孤立的事件，它们是锡良总督从开始到达云南起便开展起来的系统的反对法国运动的后果。我不需要提醒殿下，一年以来，我无奈不断向殿下提出

控告，控告总督和他的属员越权或拒绝审判，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对法国人而言的罪人的行为。在这段时期里，法国政府不断地拿出明显的证据，证实自己对中国政府的诚意，帮助中国政府弹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中国边界沿线的暴乱，因此该省各级官员的行为更应受到斥责。我们把在印度支那的中国煽动分子统统驱逐出境；我们解除了在我国领土上找到的所有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并把他们监押起来，从而使他们不可能再损害帝国政府。目前我们已关押了七百多革命党人。

对正在追捕革命党人的一名法国军官和他的六名士兵的杀害，朝另一法国巡逻队放的排枪，最后还有对支马的一个法国村的抢劫和纵火，凡此种种由中国正规军士兵犯下的侵害罪，已经使法国政府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为了弥补一年来累积起来的这种种损失，也为了防止这些事件的重演，法国政府要求帝国政府：(1)惩办普隆和支马两案的罪犯；(2)调走锡良总督；(3)给予上述各案的受害者赔款二十五万法郎；(4)尊重和保障在云南的法国人的特许权利，尤其是给岭南公司、云南矿业联合会和铁路公司的特许权利。关于铁路公司，法国政府特别要求中国政府在进行对等调查后能同意制定赔偿原则，因为地方当局的敌意或他们对保障地区治安的疏忽延误了铁路工程的进度，破坏了筑路工地，给该铁路公司造成了损失。

法国政府十分注意尊重中国的公众舆论，为了再一次证明它对有时被人指责为垂涎三尺的云南省绝无私念，愿意除尊重已取得的权利外，对中华帝国的南部不提出任何要求。法国政府主要是要中国政府表明它对我们的友好感情，给予法国和法国的公众舆论一个信赖的证明，同我们在近期来从它这方面经常遭遇到的恶意决裂。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同意法国关于把山西铁路一直延长到西安府的请求做到这一点，就像它不久前同意德国和英国修筑津浦线那样。

大人，我完全有理由希望中国政府高度评价法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的无私和随和的性质，高度评价它赔偿要求的节制。

我相信，中国政府是会意识到法国政府对中国舆论状态和一个伟大帝国的敏感之处的深切照顾的，它一定会愿意通过迅速满足它应偿付法国的要求，尽快消除它以前给我们两国的睦邻和信赖关系造成的损失，直至从记忆中抹去它们的影响。

巴思德

〔北京公使馆致亚洲处急件　No144 的附件一〕

92. 关于普隆事件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 年 6 月 15 日，北京）

前不久，阁下递交我部一份照会，详述在中国—安南边境发生的一次侵犯事件，并称于该事件中有一名法国军官和数名土著步兵受伤云云。帝国政府为此感到不安和十分遗憾。

我部当即电告云贵总督，令其进行调查，采取措施。该大员呈报我云，法国驻蒙自领事曾要求指派一名代表，协同法国教授德特利①进行调查工作，我部已去电指派蒙自海关道台高而谦担任此职。

然而，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当吁请阁下要求贵国政府尽快指派一名地位相当的官员，会同高道台对云南和广西事件的真实情况仔细进行调查，以使那些事件能尽早得到处理。

93. 关于普隆事件
中国外务部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年6月15日，北京）

我们荣幸地收到阁下于本月十六日（6月14日）递交给我们的急件，由此得知导致数名法国人和安南人在中国南方被杀死或受伤那一事件。我们同样深切地感到事件的严重性，并为此感到遗憾和痛惜。

法国驻云南领事已用急件向云贵总督正式提出要求，要求指派一名代表与领事指派的代表一起前往现场，负责进行一次调查。我部已致函阁下，请阁下要求贵国政府任命一名与中国代表高而谦道台爵位相当的代表与高道台一起进行深入的调查。

我们迫切希望就地阻止事态发展，迅速、圆满地处理这一事件。而为了达到这一结果，派代表查清数名法国人和安南人为何和被谁击毙击伤，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因此，只有在我们收到调查报告后，我们才能详细答复阁下的这一急件。

94. 关于普隆事件
中国外务部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年6月15日，北京）

自收到阁下告诉我们有关法国的支马村抢劫案的急件后，我们迅即电讯广西总督。该大员今日复电如下：

"边境道台来电云，本月六日晚，在安南境内名叫派赞②的地方的西乡③公司遭到抢劫，该地距艾店④数里，故法国当局怀疑此劫案系艾店哨所驻军所为。我当即派出一名代表赴当地进行认真调查。同时，我指令边境道台告知法国驻龙州领事，并请他转达印度支

① 德特利(Detrie)。——译者
② 派赞(Paitchan)。——译者
③ 西乡(Saihiang)。——译者
④ 艾店(Ai－tien)。——译者

那总督和在谅山的法国当局，向他们保证，若类似事件确实发生，我们一定严惩不贷。

"我收到黄忠立总兵多份报告，由这些报告可知，当晚，(艾店)驻军曾听到派赞方向数声枪响，他们以为自己将受到叛匪攻击，立即进行了击退进攻的战斗准备，但丝毫未曾擅越边界。嗣后，还吁请安南当局在发生抢劫的地方进行搜查。安南当局在肇事地点找到了歹徒丢弃的弹壳，这些弹壳均只能用于三发式步枪，而我边防部队从未配备过这类枪支。这便足以证明凶案并非这些部队所作。况且，法国当局不曾有任何明确证据能说明这些部队越境和进行抢劫。

"我已再次电告边境道台，要他请龙州领事给予确凿证据，以使调查能进行到底，以及一旦真相大白，能采取恰当措施。"

目前除将这些情况告知阁下外，我们还可以荣幸地知会您我们已电告广西总督，令其继续进行调查并把情况告诉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已通知高而谦道台，命他务必与法国政府指派的代表一起进行公正的调查，并向我们呈报调查结果，以使我们能够作出处理。

95. 关于普隆事件的备忘录
刘式训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6 月 15 日，巴黎)

自令人遗憾的普隆事件后，法国驻蒙自领事要求云贵总督就地进行一次共同调查，并指定德特利教授为法方代表。外务部方面也已指派了蒙自道台高而谦先生。

昨天，巴思德先生在向外务部呈交法国政府的要求时宣布不承认蒙自领事选择的代表。当时帝国政府建议他为这次调查任务另选一位更有资格的官员。

鉴于边界上发生的事件实属偶然和意外，帝国政府和云南、广西两省的高级权力机关对此深表遗憾。一旦调查开始、确定责任所在后，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当即作出公正决定，绝不做任何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有丝毫影响的事。而且，帝国政府对法国逮捕了大批途经东京湾地界的叛匪深表感激。这正是昨天外务部已向法国驻北京外交使节口头声明的内容。

但是，它也希望法国政府考虑事件是突然发生的，情况意外，能就事件本身的范围处理和解决问题，不要提出与本问题无任何关系的要求。

中国公使根据政府的命令，荣幸地将上述内容转达外交部长毕盛阁下，并恳求他对此予以考虑。

96. 关于普隆事件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 年 6 月 16 日，巴黎）

我答复您的 55 号电。

同意调查，并指定雷鲁达①先生为代表，给予他十分明确的指令，并请他去河内向总督了解情况后即刻启程。指示伯韦②先生去广州会合，把会豪③主管工作留给医生，除非他有异议。

中国公使向我递交了一份表示遗憾的备忘录，称这次谋害案件为“意外的事件”，表示了政府就事论事处理这一事件的愿望，希望不要提出与问题无关的要求。

我打算反驳这种说法，请您同等地强调在边界上发生的谋杀，两年来我们在北京和在南方各省遭遇到的无诚意，以及帝国政府如果还想保持同法国的良好关系和法国对反对革命党人的支持的话，明确证明它的友好感情的必要性。

毕盛

〔法国外交部 No42〕

97. 关于河口事件
《伦敦和中国电讯报》消息摘译
（1908 年 6 月 16 日）

孙文博士率二千人从东京湾进入中国，攻占河口镇，向四川、广东、广西派出密使。云贵总督锡良（蒙古人）采取的措施。邻省总督的措施。（5 月 23 日）

中国南部的革命运动
我驻北京记者来稿（5 月 24 日）

如果我们根据电报和其他途径发来的报告作出判断的话，目前在云南省南部的反清叛乱每天都在发展。这次行动的头目是大名鼎鼎的孙文博士，又名孙逸仙，他来自安南和东京湾，同 4 月份加入的约二千名会员一起越过边界，并占领了河口镇。叛军威胁云南省南部的两个重镇蒙自和灵安，而官兵由于缺乏纪律和现代武器实际上已惊慌失措。这位

---

① 雷鲁达（Reoudart）。——译者

② 伯韦（Beauvais）。——译者

③ 会豪（Hoihao），原文不清晰。——译者

革命博士已向贵州、四川、广东和广西派出秘密使者，通知反君主政体者、秘密会社的其他信徒和声名狼藉的人重新起来反对当今皇朝，希望能在北京建立一个纯粹中国人的政府，把中国群众从残酷的满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叛乱者纲领的要点中，如同那些通报所发表的，有保护外国人、不干涉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不进入他们的居住区等，同别的暴乱分子不同。别的暴乱分子曾攻击传教使团和外国传教士，并抢劫外国产业，企图引起满清政府同列强的纠纷。人们担心在北京的那部分不安分的伊斯兰教徒和在甘肃、新疆和贵州的土著也会加入反对政府的斗争，除非尽可能立即把叛乱镇压下去。

云贵两省总督锡良（蒙古人）现在（5月24日）在前线亲自督阵，征讨叛军。毗邻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已接到命令，令他们派出军队发送武器、疾速向锡良驰援。这是自近五十年前太平军造反以来最大的、反对现今皇朝的暴动。根据云南来电声称，孙文博士集中了三万多人马对付官兵，然而这个数字很可能是被夸大了的。法国曾提议给予（中国）军事上的帮助，但被谢绝了。

98. 关于普隆事件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年6月17日，巴黎）

请您本人译电。

作为对中国公使备忘录的回答，我告诉刘（式训）说我们同意进行针对普隆和支马案件的调查，但是，从现在起，我们等候中国作出一个表示诚意的保证。

您也许已注意到我觉得开始时只提出前五个要求为好，我们要争取在预备性措施中得到延长山西铁路的特许权，作为无偿的、可以降低我们的要求的特许权。

您可以非正式地、作为个人建议劝外务部把这个问题分离出来，指出由其本身发展而来的山西特许权将使其他各点上的谈判较容易进行，并且不在最后解决普隆事件的协定中提明这一点。

绝密：外务部正力求深入了解，因为您的活动给它留下印象，仿佛您在执行与您的个人感情相违背的指令。

毕盛

〔外交部　No43〕

附：

备　忘　录

（1908年6月17日）

中国公使遵照其本国政府的命令，于本月15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

中国政府对普隆凶案表示遗憾,并且,另一方面,对逮捕在东京湾寻求避难的叛乱分子表示了感谢。

共和国政府高度评价了这些遗憾和感谢的表示,但是,它不能把中国官兵在法国领土上杀戮我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视作"意外事件"。这次凶案性质特别严重,因为魏果中尉在遭到中国士兵袭击时,正尽心尽力地忙于满足中国政府的迫切愿望:逮捕革命党人。当时的情景不容有任何怀疑。

这个罪行的性质可惜不能因认为它是偶然和孤立的事件而减轻,既然它是中国官兵在法国边界上犯下的一系列凶案的继续和结果,最后的一次是在法国军官被害后,发生在谅山附近的支马。法国政府尽管很愿意考虑帝国政府的遗憾,它却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这一事件,不顾它周围的加重罪刑的一切情状而把它抽象起来看待。

华南各省当局对法国的不甚友好的态度,他们给外务部的所有报告中使用的带有倾向性的笔调,报界的敌意,以及我们的有十分充足理由的大小要求在北京往往不见下文,而其他列强的要求则得到重视,这一切,使共和国政府对帝国政府的友好措施的实际情况渐渐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疑虑感。共和国政府方面却利用一切机会在南部边界上给予中国以热心的支持。单单用语言,不管有多么真诚,已经不可能驱散这种印象。只有中国作出确实的行动以证实诚意,才能为两国人民关系的最大利益改变这种印象。法国从今天起便等待着这个行动。

至于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查,尽管在罪行发生后一个多月才由两位有资格的代表就地进行此类活动,这将更加延缓解决的时间,而只有中国政府的迅速主动,这种解决才有其全部意义。共和国政府愿意借此机会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它的克制,并答复外务部的要求,接受这最后一次保证,并给巴思德先生发出相应的指令。

99. 关于边境革命党人的活动
毕盛致中国驻法公使先生

(1908 年 6 月 20 日,巴黎)

6 月 16 日,印度支那总督曾电告殖民部,骚扰云南的中国革党人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瞒过边界监督哨所潜入法国领地,在靠安平社和洱沱①的地方集结起两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队伍。另一方面,大量来自云南的没有武装的中国人进入东京地区腹地。

为了保证对法国领土的尊重,我们已向军队和自卫队司令官下达命令,使用武力逮捕革命党人并解除他们的武装。我们已派增援部队以保证这些指令的切实执行。

这些情况的结果可能是:蔓延在华南各省和印度支那边界上地方性骚乱将破坏我殖民地的治安秩序。

① 洱沱(Nh'edo)。——译者

外交部长急于将上述情况告知中国公使,以答复他6月19日普通照会,并请他告诉帝国政府,云南行政领导没有能力解决叛乱问题,因而请帝国政府下达正式命令,使云贵总督采取有力措施以维持治安,并使法国领地免遭云南革命党人侵犯。

法国驻北京公使已接到必要指令,由他知会外务部并将外交部长对备忘录和中国公使普通照会的答复带去。

〔外交部 (抄件)〕

100. 关于普隆事件
刘式训致外交部长斯蒂芬·皮尚[①]先生

(1908年6月26日,巴黎)

遵照您在6月20日普通照会中表达的愿望,我已将您对中国南方各省骚乱状况和云南行政管理的意见呈报北京政府。按照阁下的看法,云南政府是没有能力结束叛乱的。

外务部完全不同意阁下的观点,尤其是后一观点。

自来自东京地界的叛匪攻陷河口、巴沙和南溪以来,锡良总督率三路飞骑,给叛匪以最有力的打击,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夺回了三处失地。帝国政府对平乱结果十分满意,认为这个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总督治理有方。

尽管东京当局作了与事实相反的报告,叛匪却曾不断以东京领土为作战基地和藏身场所,以此而言,总督更不应受到责难。我在9月4日和9日、6月19日的照会里述及的情况颇能说明,叛匪在东京地区受到了非法的款待,并在那里从事着种种秘密勾当。

再者,除了武装叛匪可以在铁桥上自由通行,他们的军需补给可以在欧洲人、中国人和老街土著的眼皮下公然进行(这都是印度支那的法国报刊自己确认的事实,而法国当局也认为对此不曾加以阻拦)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如下一些情况,我国政府令我向阁下陈述,请阁下评判。

1. 今年5月1日,叛匪头子王和顺骑着马,率领一帮武装匪徒从老街走到河口,大摇大摆地给叛匪头子关蒴臣送去统领将印。

2. 自叛匪在云南地界遭到溃败以来,王和顺等头目再度经过东京地界,目前呆在老街,依然逍遥法外。

东京当局如此暧昧的态度证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指令,不管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均未得到执行。

帝国政府担心这种局面的继续,不仅会对帝国南方各省构成长久的威胁,对印度支那同样也是一大危险。在本月20日的照会中,蒙阁下告知在安平社和洱沱附近有两大股中国武装叛匪,另有大量非武装中国人正向东京地区腹地移动。再度越过东京边界的叛匪,

① 斯蒂芬·皮尚(Stephen Pichon)。——译者

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叛匪攻陷河口时的人数。按您5月12日照会所云，约百余人。此数字显然是给阁下的报告中的一个谬误。不管怎样，叛乱臣民既然能如此汇集起来，其责任毫无疑问应由法国当局承担，法国当局的宽容态度肯定有助于吸引他们，而绝不能把这种责任推诿于总督的治理，因为他的权力是不能越过边界的。

本人奉我国政府命令，向阁下转达上述内容，作为对阁下以前几份照会的答复，并请阁下为了我们两国各自的利益，采取措施，避免曾使云南惨遭蹂躏并将给东京带来恶果的局面重新出现。

〔外交部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No213〕

101. 日本报界对普隆事件的评论；与林董伯爵的会谈

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6月27日，东京）

5月28日(84号)我曾向阁下汇报了我那天同林董伯爵会谈有关云南暴动事件及其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煽起的冲动的情况。

标志着暴动结束的严重事件，中国官兵对我负责警戒和保卫边界的印度支那军队小分队的攻击，共和国驻北京公使当即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凡此种种，均成了此地报界和舆论持续关心和评论的对象。

本地报纸的评论对法国有利，同情法国，半官方机关报《日本邮报》在转载这些评论的同时，承认共和国政府和印度支那总督府在履行对中国的睦邻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正大光明，承认今天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的法律依据。东京的某些报纸对要求之一保留看法，那便是对太原府到西安的铁路特许权的要求。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邮报》强调说，正是这个要求证明了法国在请求得到它应得的赔偿时，又如何把赔偿变得对中华帝国和它的具体发展有利。

林董伯爵在本月25日每周例行的接见中，主动对我谈起了云南事件和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他用极其热忱的措辞赞扬了我们在暴乱前、暴乱期间和暴乱后的十分正确的态度，以及我们提出的有充分依据的公正的赔偿要求。他还说，处理中国事务的长期经验早就向他证明、每天都还在向他证明，对一个本身就常常连最基本的责任概念都没有、甚至不清楚自己眼下的利益是什么的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是何其必要。

热拉尔(签名)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 亚洲处 No99〕

102. 关于普隆事件
毕盛致中国驻法公使先生
（1908 年 6 月 29 日，巴黎）

我荣幸地收到您本月 26 日的公函，这份公函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促使我提出异议。巴思德先生已奉命把我方的异议带给中国外务部——须知，与最近几次事件的处理有关的谈判理应在北京，在这类会谈所需要的真诚和谦恭的情况下进行。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对锡良总督衙门的意见只能维持不变，该总督显然反对法国人在云南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并且应对我们所控告的严重凶案负责。他继续留任云南政府领导不利于维持应当存在于法中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

正当我军逮捕和解除革命党人的武装的时候，我一名军官和数名士兵在东京湾地界遭到中国正规军的杀戮。帝国政府曾于 6 月 22 日对此表示遗憾，并且在 6 月 15 日的备忘录中，您又就印度支那总督府对中国政府的宝贵支持向我表示了感激之情。然而，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就在这些表示之后，你们居然又像在每次荒谬的调查后所做的那样，提出了这些极不准确且带有偏见的论点。

共和国政府的指令已不折不扣地得到了执行，印度支那总督府对中国边界当局的态度始终是忠实的、宽厚的。法国政府已经为解除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在普隆和平明①献出过法国人的宝贵的生命，它没有料到居然还会有人否认如此明显的事实。如果革命党人得到了我们对他们的反清宣传的支持，他们是不会对我们的士兵开枪的。

在这样的意图支配下继续进行讨论已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所接受的调查将再次证明法国的真诚和中国政府官员应承担的严重责任。我们坚信我们将得到我们应得到的全部赔偿。

毕盛（签名）

103. 中国南方的骚乱和法国的要求
外交部长工作参考材料摘要
（1908 年 6 月 30 日，巴黎）

最近在中国—安南边界上发生的事件：普隆凶案（中国官兵在我领土上杀死正在逮捕中国叛乱分子的法国中尉一名，军人数名）和攻击平明（革命党人向我军开枪，打死想要解除他们武装的军官两名和大批安南士兵），既证明了我们对中国的态度的光明正大，我们

① 平明(Bang Mang)。——译者

为睦邻中国而效劳,又说明了中国对我们所负有的重大责任。

我们给中国的支持不管怎么讲都是正确的,因为革命党人不是交战者(当国家的一部分起来反对这个国家的合法君主并拥有一个执行战争法的机构的时候,才存在交战状态)。中国南方的骚乱起始于钦州居民反对增加捐税的风潮。骚乱从来就没有真正带上国家的性质,它由于有倒戈的士兵和惯匪的加入,有想利用民众不满的孙逸仙的信奉者的支持才得以扩展。叛乱在南方三省广东、广西、云南(攻占广州、东镇①、东兴、镇南关和河口)曾取得过短暂的成功,但是由于缺乏一致性、财源、武器和我方的任何帮助,迄今它还没有取得胜利。

再者,我们也不应对革命党人的倾向抱有幻想,他们是明确地反对皇朝、反对洋人的。革命党的最初几个声明便具有这方面的特点。但是,为了保住我们宽厚的中立和老百姓的中立,他们只表示出对满清皇朝的仇恨,放过了洋人和民众,并且在报界和学生的宣传下产生的有点矫揉造作的民族感情中寻求支撑点。如果我们不考虑任何法律问题,支持革命党人,那么,我们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可能便会回过头来反对我们,在东京湾的百姓中传播危险的动乱。东京湾的百姓已经感受到这个震动整个中国的运动的深沉反响。

再者,我们也只能同中国的合法政府进行交往。因为联结我们两国的不仅有法律的一般原则和普遍惯例,而且有睦邻关系的专门条约,尤其是 1895 年 6 月 20 日关于中国—安南边界由两国代表出于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混合警察局问题的协议。

因此,尽管由于共同边界地域广阔、山峦起伏、荆棘丛生更兼人迹罕见,我们所接受的对中国政府的职责极难尽到,我们还是没有容许革命党人把我们的领土用作行动基地和避难所。

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来没有因为中国再三的坚决要求而引渡过革命党人,因为引渡违反我国的法律原则,同中国法典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缺乏种种保证是不相容的。但是,除此之处,我们满足了中国的一切要求。我们阻止在我领土上结成团伙,解除在我领土上的革命党人和避难者的武装,把他们逮捕和拘禁起来,我们还对武器、军火走私者封锁海陆边界,在沿芒街到海防的海岸线上,我们坚持派出一个巡洋舰队加以警戒,我们把了解到的一切可疑活动的情况告诉边界官员,最后,我们还禁止孙逸仙踏上印度支那土地和驱逐叛乱分子的头目,甚至包括在河内的革命派串通的奸商。这种种措施,且不说因它们而导致的高昂费用,使我国完全赞同革命的中国移民感到不满,并引起了人权同盟的声明和社会主义者报刊如《人道报》的攻击。

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确切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卓有成效的支持。我们可以提起 1907 年 11 月 14 日作的对镇南关情况的意见,1907 年 12 月 2 日镇南关发生事变(广州总督的公函可以作证,当时中国官员不愿相信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提起给东兴官兵付出作为拖欠军饷的预支款,当时在我国领土芒街避难的指挥官还担心这批军饷会落到叛乱分子的手中。我们曾逮捕一个确实证明在老街走私武器的欧洲人。我们还先后驱逐过一

① 东镇(Tong－tcheng)。——译者

些企图从芒街或海防运进武器装备、地图、旗帜、伪币的革命党人。从1907年12月份起，我们在安世①逮捕了六十名叛乱分子，逐步逮捕和拘禁撤退到东京湾的七百多名革命党人(一千名)②，这些人尚在扣押之中。南溪事件期间，我们准许云南官员在我列车上通行以检查可疑旅客。目前我们还在洽谈为弹压在我领土上的叛乱分子可以采用的切实可行的诉讼程序问题，等等。

那么多次宝贵的帮助、条约和协定的忠实执行以及从来不讨价还价的额外支持，作为交换，我们本应能够指望中国的感激，或者至少能够指望他们尊重我们的权利，指望他们的诚意。

事实却完全相反。敌视我们的事端不断增多。两年来，我们在中国南方各省的帝国当局那里遇上的是最大的无诚意和出奇的坏心肠。他们巧妙地组织了一场反法新闻运动。为了引起民众舆论对我们的反感，他们把我们说成准备入侵云南和广西，准备剥夺老百姓的所有权，强占他们的财产和迫害他们。报界还不时作些细节报道：龙州遭突袭失陷，法军驰驱云南省，烧杀劫掠。官员们看到我们被诬蔑、处处行动不便，他们再高兴不过了；我们是不可能指望他们出面来为这些不符合逻辑的新闻辟谣的。

在他们那个方面，那种敌意也有具体的表现。他们不顾1898年协定和1903年条约规定，阻止招募铁路苦力，而这是铁路涨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与铁路公司的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使铁路公司催促我们确保其不受中国的阻挠。他们不顾我国和意大利驻蒙自领事的多次要求，放任铁路上的罪犯逍遥法外，使好几个意大利侨民遭到暗杀、虐待和抢劫。去年，属于印度支那贸易联合会的一列货车被非法拦截、任意课以捐税(违反有关这个问题的专门协定)，并被扣押了好几个月，而我们至今还得不到惩办犯官和对我同胞所遭受的损失的赔偿。在云南有一家英法矿业特许公司，前蒙自道台在黎安附近让人逮捕了正同公司谈生意的矿主，不让他与公司谈判。这位官员被责令为出售牛口③矿而在北京签订的条约进行调停后，自己组织了一个中国矿业公司，进行竞争。

在广西，他们拒不执行1895年协定特许的建造谅山到龙州铁路的条文。他们甚至阻挠建造以北海为起点的那几条铁路。他们并不否认协定，而是把老百姓的反对放在前面，以便拖延或取消协定的执行，一旦需要，还煽起当地人的仇恨。高级官员建议他们的国民把外国人从一切企业中排挤出去，并自告奋勇愿为他们帮忙。各省当局的恶劣意图在北京产生了它们的反响，我们的异议一贯地得不到答复，而我们的请求则从来都被否决。他们不进行对双方都有益的真诚协作，却在继续拒绝与我们协商，如同他们与比利时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所进行的那种协商。

去年，他们为京汉铁路的部分建造工程谈判借款，如没有巴黎市场的金融协作，这项借款是办不成的。然而在谈判的时候，他们吁请除法国外的所有资本家的帮助。而当法国人按照同英国人的协议应该参加谈判时，他们又规定不提法国人的名字。

---

① 安世(Yenthe)。——译者

②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眉批。——译者

③ 牛口(N'ieouK'o)。——译者

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合作建造了一条通往平陆的铁路(起自河南府开封),其大部分资本属于法国。总工程师一直由法国人担任。然而,他刚离开公司,铁路和交通大臣便正式要求由一名比利时人而不是法国人来代替他的职务。

我国侨民最近完成了山西铁路从正定到太原府的建筑工程,工程和价格情况均特别令人满意。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条铁路一直延长到西安府的特许权,工程师、工人、器材设备全都到达现场。未来的铁路将给民众以最好的服务。铁路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将留给中国负责。然而,由中国铁路营造和开发公司提出,我国公使推荐的要求却得不到答复,而这恰恰发生在帝国政府刚同英国和德国解决了一系列有关铁路的问题之后,计有高伦①一广州铁路、津浦铁路、沪宁铁路和苏州—杭州—宁波铁路。在最近的几次事件中,他们在广州、云南和北京谴责我们帮助叛乱分子,让在中国活动的团伙任意通过,不执行1895年协定等。每当有一项谴责明确提出,它便被我们所要求的与此矛盾的调查结果所澄清,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感谢我们的支持。这种一贯的敌视态度不久便显出恶果,即对我侵犯的大量增加。12月7日,三名在东登附近的法国领土上散步的军官遭到边界另一边据点里的中国官兵枪击;12月9日,中国发射四枚炮弹,在距东登二十米处爆炸,有两枚在南会②附近爆炸;同日,一名上尉和一名邮局职员在东圻③附近遭到枪击。我们早就谈妥,武装官兵因其很难与叛乱分子相区分,是不许越过边界的,或者,如果他们已经越过界线,为了缩小差别,他们应由一支法国军队护送。然而,在整个3月份中,他们侵入边境,携带武器、行李和火炮任意穿越我领土,既未得到允许,又无事先通知。

5月15日,我们在平寮逮捕投奔革命党人的逃兵时,有一名下士受伤,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惨遭杀戮。诸如这类攻击说都说不完。这便说明了6月3日暴行为什么使我们忍无可忍。6月3日,一名法国军官和六名法国士兵在解除一群中国叛乱分子的武装时,在法国领土上被中国官兵杀死。

几天后在平明,两名法国军官和两名中士以及许多安南狙击手,为保卫中国领土,在力求解除一批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时被杀害。

这两次惨案具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在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士兵和军官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他们是为帝国政府的利益而倒下的。这两次惨案的区别便在于,前者我们的人受了中国官兵之害。这一点在进行我们为当作最后一次诚意的证明而接受的对立调查之前,即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承认。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犯下凶杀案的是革命党人(其实在他们的队伍里有很多投敌的士兵)。镇压出现在我们领土上的革命党人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的军队也足以迫使他们就范。但是我们不愿意做两面都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同时挨中国官兵和革命党的枪子儿,而且恶劣至极地被外省和首都当局斥责为同叛匪串通一气。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而那接二连三的矛盾结局也明显而无情地证明不再忍耐的必要性。

---

① 高伦(Kao Loun)。——译者

② 南会(Nan-hoay)。——译者

③ 东圻(Dong-khê)。——译者

我们证明了我们的诚意，证明了我们充分的权利和对中国的许多帮助。我们不能再像在云南和北京那样得不偿失了。对过去，我们需要得到无可争辩的补偿，而对未来，也应规定确切的保证。

对于过去的事，我们要求惩办罪犯，不仅惩办具体的、直接的凶手（我们根本就不在乎那几个狂热小人的脑袋），而且要惩办真正的凶犯、应对骚乱和民众的思想状况负责的公职人员。

我们还希望得到给最近数次凶案的受害者以应有的赔款和赔偿我们的几家公司所遭受的损失，计有印度支那贸易联合会和铁路公司。

对于未来，我们希望在云南获得对正式条约规定我们所拥有的权利予以尊重的保证，希望不再阻挠云南矿业联合会和黎安公司执行他们应有的权利，确保铁路警察的工作和惩办罪犯。

但是这些现场的补赎是不够的。政府的无诚意首先使我们在北京受到损害。我们只要求得到像其他列强一样的待遇，只是我们希望中国给予我们其公开声称的对我们的友好情感的标志，用中国政府一个主动的无偿的行为，解决那些旷日持久的谈判之一，证明使我们在北京受到损害的那种仇视敌意已告终结。用哪一项特许权标志这友好的报答，则由中国自己选择。

锡良总督自到任云南以来，以排外、无能、畏首畏尾和生性恶毒著称，他的调离势在必行。他的品行说明应该执行1901年2月1日颁发的圣谕，1901年9月7日的议定书第十条也预见到他那种情况而宣布："各省或地区总督、巡抚和其他官员应对其所辖地区的秩序负责，一旦发生新的反对外国人的风潮或其他违反条约的行为，而又未能当即弹压、使罪犯得以逍遥法外时，这些官员将被立即撤职，并不得另任新的职务或授以新的显要地位。"

我们所要求的补赎是合法的，它可以使我们忘掉原蒙自道台的晋升。原蒙自道台因一贯怀有敌意和违反条约而负有使我们受损害的罪责，他没有被撤去职务，而在这个锡良的提议下反而升任云南按察使，这对我们的惩办要求是十足的挑衅和嘲弄。

给受害者的赔款应当从宽计算。不幸的魏果中尉是家中长子，这个家庭有他的寡母和好几个妹妹，全靠他的饷银接济她们。和他一起遭到不幸的士兵们也留下了妻子儿女和二老双亲。平明的士兵尽管不是倒在中国正规军的枪弹下，他们却同样是在为帝国政府的利益解除革命党人的武装时倒下的。帝国政府应该与对普隆事件的受害者家属那样一视同仁地给他们的家属以抚恤金，并当引以为荣。

云南骚乱中断了铁路工程、破坏了工地、导致工人四散，从而为铁路公司造成直接的和间接的重大损失。法国官方和一些个人（外交部代表一名，印度支那代表一名，铁路公司受委托人一名）将进行一次正式的调查，他们将完全公平合理地估计出中国应负责的损失赔偿总金额。这在国际关系和各国内部政策中是习以为常的事，而偿付赔款的原则是不容商讨的。

帝国政府和新任总督应下达严格命令，今后不准在云南省出现侵犯我们有明文规定

的那些权利的情况，立即满足云南矿业联合会的要求(尼库科①事件)，满足有英国人合股的岭南公司的要求(释放因同法国商人谈生意而被监禁的矿主)，赔偿1907年因非法扣押货物而使印度支那贸易联合会遭受的损失，有效地保证铁路警察的工作(必要时由我国军队协作)，并给予我驻云南府和蒙自的外事代表和意大利驻蒙自领事所指出的、在铁路沿线发生的凶案的受害者以公平的赔偿。

最后，我们为中国政府效力，并且准备继续帮助中国政府，作为对我们的感谢，中国政府应该具体地向我们证明它的诚意。我们在北京遭遇到的敌意持续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如普隆凶案之类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修正已划定的、对我们不利的中国—安南边界，因为在与我们的领土接壤的中国方面有着荆棘丛生的高山，在那里很容易进行入侵和突袭的准备工作。我们同样可以要求例如延长云南省到成都的铁路线，条件尚待讨论确定；或者要求执行与修筑铁路有关的协议，即由法国公司或法中公司修筑广西至广东的铁路，龙州至南宁铁路，或北海至西江铁路。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没有这么做。修正边界尽管那么有益，却有不妥之处，它同我们一再重复的开诚布公地维护中国完整性的原则声明仿佛是相抵触的。它还可能引起其他列强以防止类似我们已遭受的事件为借口，提出同样性质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想要照顾帝国政府的敏感之处和中国的公众舆论，消除所谓我们在觊觎广西、云南两省的错误偏见。就这种观点而言，我们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表明我们的无私感情，我们甚至避免要求执行与南方铁路有关的原有条约和协定。

我们仅仅要求得到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待遇，给予我们以其他国家最近得到的那种铁路合同，即中国保持对铁路的领导和管理。这类特许不带有任何政治性。我们早就考虑到了目前进行中的谈判之一：山西谈判。我们对山西有某种优先权，目前正在争论之中。中国人若能向我们提出愿意加快承认我们的权利，那他们真是特别地开了窍。第一段铁路刚刚完成，价格和施工情况都是再好不过的了，工程师、工人和设施现已由中国支配。

对问题的全面介绍能使我们对形势有十分确切的了解。我们已经在中国南方边界上对它作出过最可贵的帮助，并且，我们可以继续这么做。然而，迄今为止，中国除了在口头上，而且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才道谢，实际上却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它从来就以怨报德，不仅在现场，在与印度支那毗邻的省份里，而且在北京，它都拒不接受我们极其合情合理的要求。

像这种态度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因为有革命党人的存在而蒙受损失，结果只是在帮助一个怀有恶意和敌意的邻邦，这种种弊病应该用建立真挚的关系来纠正，用我们能从同中国的光明正大的合作中获得的利益来加以补偿。这种合作对中国说来其实比对我们更珍贵。

我们的要求是合法的和有节制的。如果中国拒绝对我们的无私和克制作出相应的行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恢复严格按规定办事的中立态度。我们再不能老

---

① 尼库科(Nicouk'o)。——译者

是扮演一个受骗者的角色。我们不应该为权力的胜利，为遵守我们的诺言和给予一个不顾正义、违背协定、处处表现出了对我们的无诚意的国家以友好帮助而牺牲人的宝贵生命。

如果中国政府试图继续逃避偿付它对我们欠下的债，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采用一切行动手段和压力，让它对现实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并迫使它尊重我们的权利，像看待西方其他列强一样看待我们。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104. 法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
保尔·康盘[①]致外交部

（1908 年 7 月 1 日，伦敦）

我国驻伦敦大使同外交大臣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他向外交大臣说明了值此东京湾事件之际，我们向中国提出那些要求的原因。

尽管他应该知道朱尔典爵士的电报，巴思德先生在 6 月 25 日的通告中也曾暗示过这份电报，但格雷爵士却并没有把在我边境发生的事件与欧洲人在中国遭到杀害相比较，保尔·康盘先生如听到这种比较是会当即指出的。再者，我们的外交代表也正在等待时机，准备对英国驻北京公使的轻率言论表示异议。

关于用与英国人有关的云南—四川铁路取代纯属法国人的山西铁路问题，康盘先生认为他只有在时机恰当时候，用友好的影射的形式谈及此事。

最后，我国大使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接受日本人的合作，对于我们在中国事务的结局自然是有损害的。

保尔·康盘

〔法国外交部　No266〕

附：

备　忘　录

（1908 年 7 月 1 日，巴黎）

在 6 月 24 日的外交招待会上，外交部长先生曾希望引起帝国政府对普隆事件后通过巴思德先生在北京提出的那些要求的注意，特别是关于锡良总督的调任问题。

中国公使向帝国政府转达了谈话的内容，帝国政府刚委托刘式训先生向外交部长阁

---

① 保尔·康盘（Paul Cambon），法国驻伦敦大使。——译者

下转达其看法：

由于云南南部的骚乱很快就得以平定，法国侨民方面并没有遭受到生命财产的损失，建设中的铁路线也没有遭受到物质上的损失。帝国政府觉得，总督十分圆满地做到了保护外国人，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对法国不大友好的思想的证据。因此，它认为不必对总督进行指责性的调任。另一方面，鉴于官员调任是内政措施，不容外国干预，帝国政府希望共和国政府不要进行这种干预。

105. 总形势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7 月 9 日，北京）

阁下在第 48 号电中，告诉我您同日本驻巴黎大使的一次谈话的情况，根据这次谈话，目前改良派在中国正取得进展，中国政府的处境可能会变得相当困难。

公使馆曾多次与阁下谈起过革命党的宣传，今年春天，我还在信函中提到过在北京发生的一定数量的谋刺事件，它们显然也将被这种宣传引以为证。肯定，在帝国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大量的对清皇朝的不满。然而，尽管有日本大使所表示的见解，尽管我也承认日本人由于与不满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络，而比其他外国人更了解反对满清皇朝分子的实际力量，但我还是不能认为满清皇朝目前当真有什么危险。当然，反清叛乱可以发生许多次，但依我看来，这些叛乱都将相当迅速地被镇压下去。我们可用刚刚在云南发生的事为证，这个省的常规军力量薄弱，令人没有好感，而这个省的民众据说已成熟，可以举行普遍起义。第一次暴乱取得成功。但革命党人不会利用他们的成功。在别的省份里，镇压还将进行得更加迅速。

这是因为，在中国，不满分子之间并不团结一致。孙逸仙在外国可以自诩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革命党的领袖，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很狭小的范围里的阴谋家，而且没有能力作出任何大胆的行动，因为他太爱惜自己的生命，不会冒险向前。而他的“武装起来”的号召发出了多年，却从来未能在他的大旗下集结起足够数量的战士，作出些略能持久的事情来。

由于缺乏领袖和四分五裂，革命党并不显得十分可怕。而满清皇朝，不管它动摇到何等程度，也并不更像处于下台的前夕。皇帝目前正在病中，明天也许会驾崩，我相信皇太后能够没多大障碍地为他指定一个继承人而如果皇太后也仙逝了，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满清亲王相当快地掌握住大权，并使之无可争议。宫廷革命是有可能的，然而我并不以为革命党能在短期内推翻当今皇朝。

自然，我重复一遍，日本人会作出其他预测。他们希望看到中国一片混乱，以便从中浑水摸鱼，他们是很愿意使这种希望变成事实的。而且，我们知道，一有时机，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助内讧者们一臂之力。例如，在最近的几次云南事件中，已证实有相当数量的密使混迹于革命党人里，有人甚至说其中有一个日本将级军官，他是来从战术和战略上给向

蒙自进发的叛军出谋划策的。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169〕

106. 法国人在云南革命党人事件中的处境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7 月 10 日，北京)

中国公使呈交阁下的那些照会同我的电报一样，使阁下了解了中国当局的策略，他们为了推卸因云南骚乱和骚乱后果引起的应对我们承担的责任，以攻为守，狡猾地指责我们与叛乱分子勾结一气。在他们看来，像这种含沙射影的话应能把骚乱的首要原因推诿在我们身上，从而使我们因为在那些事件中遭受到的损失而能够提出来的赔偿要求均成为不可受理。

我在给外务部的外交急件里驳斥了他们发表的所谓印度支那官员偏袒革命党人的说法。这些急件我已转呈阁下。外务部在锡良的挑唆下，控告侯耀先生曾同叛乱分子会谈。我早已要求我国驻蒙自领事向我汇报此事，但当时我没有接到他的报告。侯耀先生 5 月 4 日的急件(此件已直接呈报阁下)所提到的那些情况使事情水落石出。我从而可以肯定，我们的外交代表没有同起义者的领袖们有过任何会见，他只是在经过老街的时候，接受了一份个人的安全通行证，是他们方面通过一个叫杜博阿①的普通法国人交给他的。在最近的这几次骚乱中，杜博阿的角色十分可疑，但是他的行为并不能转而成为指责侯耀先生的理由。侯耀先生抵达蒙自后还曾把这份通行证给道台看过，这一事实说明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锡良居心叵测歪曲了这个事实，然而，道台给总督补送了报告的修正第一个文本，这件事本来似乎已经了结。外务部在它的指责中也已不再提及此事。迄今为止，他们还没对我谈起过侯耀先生发出的那些通报。通报文字上显然有些欠推敲，然而，如有必要，从它们维持南溪工地安定这个目的考虑，对外务部倒是不难解释的。

然而，如果说侯耀先生本人与此事并无关联，革命党人已经从居住在印度支那的人们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却是千真万确，而印度支那报界也确实没有放过在革命党人和合法政府官员之间进行对后者颇乏谀辞的比较机会。叛乱分子确实曾经得到过侨居河内的法国人方面的帮助，帮助他们的法国人也许正是那些表现得最急于要求得到因骚乱引起的损失作出赔偿的人。然而，那些普通个人同革命党人的真真假假的勾结，以及在革命党人队伍中有好些外国冒险家存在的情况，均不能作为反对法国政府的事实。我曾对外务部证实过十分明显的区别，而且，外务部也已不再提及有关没有官方性质的安南和法国个人问题的控告。如果它试图援引这些人的行为，那我就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而仅仅满足于

① 杜博阿(Dubois)。——译者

同过去那样,肯定法国政府的文武官员的行动自始至终都完全正确。从国际关系的观点上看,我们没有什么可被指责的地方。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166〕

107. 中国的骚乱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先生

(1908年7月16日,巴黎)

您在本月9日的信中向我通报了印度支那总督为制止来自与我殖民地毗邻的中国省份的武装团伙入侵法国领土而采取的措施。

同时,您告诉我,由于不再把他们视作本来意义上的革命者,而只把他们视作一些海盗团伙,博努尔先生认为已不可能继续按照我们两部协定的措施来对待他们,并主张在东京地界上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

最后,博努尔先生表明了他的意图。他要让那些被海盗触犯普通法的罪行弄得惊恐不安的欧洲侨民放下心来,并且要抽出某些增补保安部队,将一部分在押叛乱分子解往柬埔寨和交趾支那,以使他们在东京拘禁点的数目缩减到六百余人。

我部同您一样,认为上述团伙靠盗窃和抢劫为生,其成员实非中国叛乱分子(我们两部协定的措施所涉及者),而纯系海盗,宜以最严厉手段律之。我部完全赞同博努尔先生采取的有力的预防措施,并对他在这种情况下所持的态度表示赞赏;中国政府也将从中间接地大收其益。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正因为我们坚决阻止在我领土上的中国难民将我领土用作反对中国南方各省的作战基地,那些与我们做买卖的团伙才会掉过头来反对我们,对我们充满敌意。

为从中国取得对他们正规军犯我边境行为的赔偿,我驻北京公使现正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地方当局的捏造指控和外务部的无理指责,意在诋毁印度支那总督政府对革命者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只要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向中国政府明确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不顾中国的恶意,继续用最明显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忠实与慷慨——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我边境地区忠实地履行睦邻义务,并慷慨地向中国政府提供支持。

然而,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拒不承认我们的无私,并用肆无忌惮地侵犯我权益的行为来报答我们的帮助,如果他们不满足我们提出的正当要求,我们很可能将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将对它表示出较少的善意,而对它国内的敌人表现出较多的宽容。在边界附近大量被拘禁的中国人的存在不可能不使北京政府三思。因为它害怕他们的种种活动,当时就曾迫不及待地同意拘禁他们。

因此,我认为目前暂缓将他们押解到我亚洲属地的南部是有利的,尽管将叛乱分子囚禁在东京会造成困难和耗费较大。

实际上,我同意您关于必须用我们可能使用的一切手段阻止武装团伙进入东京的分

析意见，并完全支持博努尔先生关于尽可能快地加强我印度支那占领部队的力量的建议。

毕盛(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亚洲处〕

108. 关于普隆事件的调查

法国驻华使馆致外交部

（1908 年 7 月 28 日，北京）

法国报告人在普隆地区所作的现场调查，其结论之正确已为中国代表承认。此结论确认：

一、6 月 2 日，一队中国官兵在 22 号和 23 号界石之间侵犯东京湾边境，他们曾向正忙于解除暴乱分子武装的法国中尉魏果和他的狙击手们开火。尽管魏果中尉曾不断地对中国正规军高喊不要开枪，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份，中国官兵仍继续对他和他的士兵射击。所以法国人处于合法自卫地位。然而中尉并没有让他的士兵回击，而宁愿躲进一个谷仓以避开枪击。可是，中国正规军又冲进谷仓，用枪口顶着他射击，他从容就义。同时被杀的有他的三名士兵。另被杀死在谷仓附近的三名士兵遭到中国正规军截肢。

二、另有一些中国正规军同样越过国界，守候在东京湾领土的新蔡①高地上，他们于第二天，即 6 月 3 日，攻击了从普隆公路边的法国村庄老卡②前来增援的法国侦察队。

三、继这些凶案后对普隆地区各个村庄的抢劫和对农民的杀戮。

〔法国外交部　亚洲处〕

109. 关于普隆事件的索赔问题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08 年 7 月 29 日，巴黎）

我回答您的 73 号电。

请等候雷鲁达先生对普隆和支马进行调查，您得到雷提供的一切情况并知道为云南铁路赔偿定下的确切数目后，再考虑对外务部提出赔偿要求时应注意的威慑问题。

届时，您可提出我们不宜分开的总的赔偿要求。如果您得不到满足，我们直接的行动方式将是一百一百地释放革命党人。我目前要求将他们继续拘禁在东京湾。而我们长期的压力方式将是在革命党和中国之间严守中立，而不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政府的南部边境对它作出的支持。

---

① 新蔡(Sin－Tchai)。——译者

② 老卡(LaoKa)。——译者

在提出我们的要求之前，您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性的谈话探明您的同行们的态度，他们会按照您提供的情况随时给中国政府提出明智的建议。

您没有看错，我们的赔偿要求虽然牵涉到了过去，最主要的却是希望得到中国对我们好感的实在表示，以保障我们将在南方的合作的效力。

正在进行中的铁路谈判为中国提供了理想的机会。请同您的英国同行商谈，因为有关粤汉线和京汉线的谈判接二连三的中止必然会导致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在山西铁路不成的情况下，支持英法合营的四川铁路。

请告诉我您对上面提出的进行方式的感想。

毕盛(签名)

〔外交部电报　No59〕

110. 关于中国革命党人的情况
毕盛致殖民部长先生

(1908年7月29日，巴黎)

在本月27日一信中，您给我附来了博努尔先生的一份电报(284号)，该电述及对东京湾北部的中国革命党人采取的行动。

一般地说，我认为继续通过行政措施拘禁被我军捕获的改革主义分子和革命党人，这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弊。目前，将海盗交给中国一事亦不应因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而停下来。

我在7月16日一信中，曾从我们同中国的谈判和向中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来看，强调了在东京湾继续成批拘禁中国人对我们而言的重要意义。就这个观点而言，我请您注意7月26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说，一些革命党人将被押解到柬埔寨和老挝，另一批送往交趾支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博努尔先生提出的把一些革命党人驱逐出境或取得海峡殖民团体的同意把他们押送到新加坡的设想，同样应推迟到新命令下达之后再进行。

我刚给共和国驻北京公使下达指示，要他得到下列情报后再重新提出总的赔偿要求；分别提出有不妥之处。

1. 得到我方代表雷鲁达先生同中国代表在普隆和支马一起进行的调查后提供的一切情况和证据；

2. 得到根据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和外交部三方代表的现场评估(云南铁路公司可对它的代表作出指示，以加快研究问题的速度)所作出的、由于目前各事件使云南铁路遭受的损失数目，以及雷鲁达先生对在云南的各家法国公司和贸易单位因骚乱而提出的不同要求的意见。

双方代表一旦确定应给予铁路方面的赔款数目后，印度支那总督应将此情况通知贵部，同时也通知我国驻北京公使。届时，我们将共同确定应向中国提出的确切要求。最理

想的是巴思德先生和博努尔先生之间已经完美地建立起来的接触能继续下去，他们之间情报的迅速交流和应该存在的合作一致，能够构成解决目前问题的最可贵的因素之一。

法国公使掌握的情况最完全，并了解我们借以确定应为铁路提出的要求的数据，他可以引证我国军队在东京湾对在我国领土上避难的革命党人所进行的强有力的镇压，他能够同外务部进行彻底的商讨并取得对我们的要求的确切答复。如果这个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政府将考虑对中国南方的慷慨支援政策是否应缩减到最狭隘意义上的遵守边界协议，甚至目前拘禁在东京湾的革命党人将以百人一批，在他们保证不利用自由武装反对中国的情况下予以释放。那时，我们当然更需要区分革命党人招募的海盗、刑事犯罪分子和纯粹的改革主义分子了。考虑到问题是要在需要的时候对中国造成影响，博努尔先生和巴思德先生可以相互通气，统一意见，使这项措施具有一视同仁和最最实在的特征。其他措施在必要的时候同样也应由我们两个部协商采取。

因最近结束的普隆调查证明了的中国所承受的无可推诿的责任的严重性，中国政府所关心的不失去我们在华南的支持，及它迫切希望我们签署在印度支那建立领事馆的申请，以及另一方面，在远东问题上与我们签有协约的各列强外交代表对它的明智劝告，我们可以希望，这些因素足以使中国下决心，不仅给予我们所要求的补偿，而且给予我们期待得到的满足。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111. 被捕的中国革命者的处理问题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8 月 8 日，巴黎）

7 月 29 日第 653 号急件收悉。关于中国应付法国在云南的各个企业的赔款，及对于在我领土上被捕的中国革命党人和海盗宜采取的措施，蒙您告知了您的看法。

我想尽快向您通报，按照尊意，我已致电印度支那总督，请他在把特命代表所估算的为云南铁路公司在该地区骚乱中蒙受的损失而应向中国政府提出的索赔总额报告我驻北京公使的同时，也通报于我。

至于对已被俘获或今后将被俘获的革命党人和海盗的处理问题，我同样认为，除了拘禁他们，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然而，正如我已向您陈述过的，由于这些人在东京的数目相当大，拘禁的办法可能使他们在土著居民中挑起骚动，因而十分不妥，另外，我们还将因此支出巨额看守费用，大批部队也将受到牵制。

当然，倘若我们能够肯定中国的革命运动在短期内就将得到平息，必要时我们是可以考虑维持原状的。然而，新近发生的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向我们表明，在我领土上活动的中国团伙越来越大胆，我们不得不加强镇压，结果也许会使本来已经很大的囚犯人数进一步大幅度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同意印度支那总督先生的意见，坚持认为

将被我们一批批抓获的叛乱分子和海盗无限期收容在我殖民地毗邻中国的部分，不可能不严重威胁我属地的安全。

至于您打算提出的建议，即让被囚禁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在具押保证不利用他们的自由武装反对中国的情况下，以百人一组恢复他们的自由，对此我觉得存在着严重的不妥之处，并实际上很难执行。

其实，且不说在革命党人和海盗以及由革命者招募的普通罪犯之间作出区别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应考虑，如果我们把俘虏们送往中国边境，那与把他们交给中国完全是一回事。那么，我们就得担心中国当局对他们处以我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所不能容忍的刑罚，我们将因此而承担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责任。如果相反，我们在河内或东京地区的任何一个城市释放这些俘虏，那就会给我们自己种下叛乱和盗匪活动的祸根，后患无穷。

出于此种种理由，我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如决定把已在和将在我领土上被解除武装的中国革命党人以及在东京地区被俘获的海盗，拘禁在印度支那的另一部分地区，或者，如果新加坡政府肯同意接纳他们的话，把他们送往海峡新殖民地。

如这条原则得以认可，我觉得应给印度支那总督先生以完全的执行自由。让他就地判断为捍卫我殖民地利益、保障我殖民地的安宁应采取何种措施比较妥善。

盼您迅即告诉我在上述各个方面，我们的看法是否一致，以便让我能给博努力先生下达他所要求的指示。

〔殖民部　亚洲局〕

112. 英国对法国向中国所提要求的态度
毕盛致法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先生

（1908 年 8 月 14 日，巴黎）

7 月 23 日，康益先生转给我爱德华·格雷爵士前一天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6 月 30 日，康益先生以在中国的英国人对于法国因中国正规军在边界犯下的凶杀案提出的要求所持的态度递交了一份照会，格雷爵士的备忘录便是对这份照会作出的答复。

我颇感兴趣地读了这份报告。报告力图把英国人说成是始终注意遵守对我们的诺言，力争使法国财团也加入借款国的。我制止了对此而作的声明。况且，我觉得，当前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位首席大臣讨论那个文件中的论点，着手对英国外交部提及的事作细细审查是无益的。加之，文件中提及的法英两国财团的竞争早已成了往事，对它的研究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无谓的争论，因为目前在两国金融家之间，显然已经就今后的粤汉线谈判达成了以尊重对法国所许的诺言为基础的谅解。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不应对可作多种解释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我却觉得，至少，指出这份照会结尾的结论是必要的。

爱德华·格雷爵士递交的备忘录仿佛把这一点是看作既成事实的，那便是在为建造粤汉铁路而作的贷款问题上，外务部显得比张之洞更愿意吸收法国参加，他要求我们不要让英国政府也遭受张的无诚意之苦。那是一种印象，它并不反映事物的全部实质。如果

张之洞自认为与英国财团的关系较深，对它的好感更胜于对法国，但他也最终地表示过准备接受法国参加谈判。如果您在最近同英国外交部的会谈中能够抓住机会，澄清这十分重要的问题，如实说明事实真相，我将非常感激。

不管张之洞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2 月 19 日，我驻北京公使前去探望他时，他曾正式表示同意外务部的意见，如果中国政府必须请求某个金融机构帮忙，而与其选择其他机构，不如选择英中公司的话，如果英国财团又表示愿意同法国财团合伙，让法国财团也参加签订借款契约，那么，中国政府准备立即依从这个愿望。

今天，这个声明显得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根据巴思德先生 7 月 21 日的电报说，帝国政府刚任命张之洞为粤汉铁路总监，授予他全权以加速修筑这条被各省公司之间的意见分歧所延误的铁路线。

这样的措施显然表明中断了一段时期的借款谈判已处于重新举行的前夕。因而，对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出他们的愿望也正是时候了。

我在 6 月 29 日和 7 月 1 日的两封信中，在告诉您我们给我国驻北京公使下达的指令的大意的同时，已曾给您指出，如果说，鉴于我们要求得到赔偿的惨案的特殊性质，我们曾提出过完全属法国事务、而又不带有政治色彩的山西铁路的特许权的想法，为了证明我们的诚意和便于你们安排，我们也准备接受外务部将会对我们提出的其他特许权以取代这项特许。然而，在这方面，却不应由我们去采取主动，而应由英国政府代表去向中国政府提议给予我们其他的好处。

考虑到谈判初期布朗德①先生或约翰·朱尔典爵士表示的英国人的那些愿望，他们对未能利用我们为法英有关铁路问题的协约提出的要求而感到遗憾，我们准备同意用四川到汉口的铁路取代山西铁路。从而，我们希望能使英国财团感到满意。

然而，为了使这一策略有可能获得成效，约翰·朱尔典爵士应该给外务部明确的印象，他谴责抵制那些要求的行为，因为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觉得那些要求既公正又克制。英国公使不管摆出其他任何姿态，都可能在实际上使中国人觉得圣詹姆斯内阁不赞同我们的要求，从而间接地鼓励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为准则。

我们同意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证明了我们的和解观念，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比英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更好些，可令人惊疑的是在一个与他们的关系那么直接的问题上，他们竟表现出无动于衷，而在这一事务中毫无利害关系的东京内阁和彼得堡内阁，却表现出随时准备在外务部给我们的行动以有力的支持。

我已经告诉您，林董伯爵愿为我们提供协作的情况。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应该接受这些建议，日本外务大臣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却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充分肯定了我们在这一事件中所提要求的克制态度和我们对处理这个问题的修正，这是热拉尔先生在刚给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的。您可以考虑谨慎地对他们作出在日本国如此热情的态度和英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所持的态度之间的比较。

---

① 布朗德(Bland)。——译者

请您抓住最近的有关粤汉铁路问题的谈话机会，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知英国外交部。确实，要紧的是给予约翰·朱尔典爵士发出明确的意向，使他下决心结束保留态度。他向外务部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支持它的拖延政策，也就是对我们的要求能得到接受和法英两国在中国的利益的重大成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外交部 政治与商务司 No908 （抄件）〕

113. 中国革命者放逐新加坡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8月27日，巴黎）

蒙您发来8月10日第679号急件，使我获悉在贵部和英国驻巴黎使馆之间为印度支那遣送中国革命者去新加坡一事所交换的信函情况。

我已把那些事情告诉印度支那总督先生，他刚给我来电云：弗朗西斯·伯蒂①爵士指称的事件系由误会引起，日前此误会已冰释。

博努尔先生解释说，参照与香港政府达成的有关印度支那当局有权向英国领地解送被驱逐的中国人，只是事先要通知英国当局的协议，他曾决定把六十名中国叛乱分子遣送新加坡。由于交趾支那主管部门延误了给法国驻新加坡领事下达关于那些中国人出发日期的通知，海峡政府未能及时接到有关通知。

印度支那总督让法国领事向安德生②爵士就此问题作了解释。7月6日，海峡政府为向他们作出说明一事感谢了博努尔先生，并向他表达了他们对印度支那政府的友好感情，同时告诉了他今后他们可以在怎样的条件下接纳限定数量的被驱逐出印度支那的革命党人并提供保障。

因此，海峡政府和印度支那政府之间已就所采用的程序问题达成完全的谅解。将被逐出印度支那的革命党人遣送新加坡的工作，今后均将遵照英国当局的要求进行。

〔殖民部 亚洲局〕

114. 关于普隆事件

殖民部长致外交部长

（1908年8月29日，巴黎）

继我的前几次通知之后，我有幸在此函中转上印度支那总督先生刚给我寄来的报告抄件，报告内容是关于正在进行中的、为向中国争取普隆凶案后应予我们的合理赔偿和解

① 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译者

② 安德生(Anderson)。——译者

决给予云南铁路公司的赔款问题的谈判情况的。

博努尔先生认为我们不宜同时寻求解决这两件事，或至少最好不要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以便在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云南公司所蒙受的损失的同时，明确地向中国政府表示出我们所注意的、所重视的不是一名法国军官的被杀害，而是1903年10月29日协定的第十五款，因此，即使没有发生令人遗憾的普隆事件，我们仍然可能向它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以后倘若重又出现妨碍这家公司的工作正常进行的情况的话，也将作同样的处理。

…………①

这样，我们便能避免博努尔先生所担忧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请您对这些可能情况特别注意。

另一方面，为尽可能精确地确定给云南公司造成的损失，需要进行的调查必然要用上很多时间，并且颇难处理，这样便会延误普隆凶案的处理。

…………②

因而，我将十分感激您考虑印度支那总督的建议，我对这些建议完全同意，并请您指令我国驻中国代表加快速度最终解决普隆案件。

〔总之，博努尔先生的信纯系无的放矢。普隆调查已告结束，中国人承认了他们的责任(钱都已经交付了!)。而铁路事件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博努尔先生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是一些，他便应该知道，由于事情进行缓慢，把这些事一件件解决还不如一起解决更为容易，这样做有利于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又是避免不了的。〕③

〔外交部　政务司　(抄件)〕

115. 日本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年9月28日，东京)

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外务相在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不仅是正常的，而且还是尽可能友好信赖的关系。

新内阁总理似乎从来就不赞成林董前外务相的态度，再说，他对这个人也没有任何个人的好感，同样，对原外务相在各种场合谈及中国事务时所用的论调，他也是反对的。

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外务相从一开始便肯定了他们想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通融的政策

① 眉批字迹不清，大意是：殖民部和博努尔先生的无知。博努尔先生不知道在普隆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巴思德先生的来函，巴思德先生早就提出了云南公司所蒙受的损失，而云南总督也知道至少已经成为问题的这些损失情况……——译者

② 眉批大意：对铁路受损的调查和普隆的调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普隆事件的调查已在中国人参加的情况下解决了……——译者

③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眉批。——译者

的愿望,这种政策将较多地考虑他们的同种关系、语言文化的亲缘关系和利益的一致性。

新任驻北京公使将于10月8日离开东京,总理大臣和外务相抓住伊集院先生即将出发赴任的机会,在9月25日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使内阁会议全体成员批准了日本天皇派往中国朝廷新任代表的指令。

在这个问题上,一点消息也没有公布,连非正式的消息都没有,好像日本政府的愿望是要把所有的、与中国政府悬而未决的问题归并成某种整体,并同中国政府商谈出一个总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下,各种各样争论中的问题将通过互相让步而求得一个大体的解决方法。两国政府之间尚未解决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有两个,间岛的中国和高丽的边界问题与新民屯到阀口门的铁路问题。尽管这两个争论的问题对象迥异,日本政府还是有可能通过折衷的办法予以同时解决。这倒并不是因为小村外务相本人曾是1905年12月22日在北京达成的条约的谈判代表和签署者,不是因为他比林董伯爵更准备允许中国政府建造将与南满线发生令人不快的竞争的铁路。而是因为小村外务相也许将在1905年12月22日条约的第六款和第七款,以及1907年4月15日铁路协定的条文中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基础,使中国政府放弃建造上述新民屯到阀口门这条线路。也有可能在间岛争端中恰好出现什么机会,得以给中国政府放弃新阀线以补偿。

日本政府强烈希望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有所发展并具有新的特点,这显然是不容怀疑的。林董伯爵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是一种思想,确切地说是一些欧洲式的倾向,犹如1902年和1905年同英国签订的条约和1907年同法国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所证明的那样。而今天,小村外务相和桂太郎首相在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方向上,所服从的是一种也许是比较亚洲式的倾向。他们努力选择最合适的方式,以免导致危机和舆论运动,例如解决"二辰丸"案的办法,或有可能引起议论的办法。

热拉尔(签字)

〔外交部　亚洲处　No148〕

116. 驱逐孙逸仙
毕盛致殖民部长先生
(1908年10月21日,巴黎)

10月16日,您再次要我注意人权同盟为革命党人孙逸仙上次在我殖民地逗留期间遭到驱逐一事向您提出的抗议。

您同时要我告诉您,我对于应该怎样答复德·普雷桑塞[①]先生的看法。

我想可以提请这位众议员注意,孙逸仙已自由地多次居住印度支那,而没有遭到殖民当局的任何非难,因为殖民当局相信他在那里对我们并无不妥之处。然而,如果说庇护和

---

① 德·普雷桑塞(De Pressene)。——译者

避难权应被视作、尤其是被法国这样一个自由强国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也须以要求按国际公法的惯例提供保障的人承担相应的义务为条件。

这些义务中最不可推却的、不容许任何例外的一条，便是避难者不得把避难国变成他反对那个他声称在与之作斗争的政府的政治或军事活动的基地。给予庇护的国家有责任使自己和使避难者恪守中立，这便是它对与它和平相处的各个国家必须遵循的法则。避难者如违背上述准则，他将受到的惟一制裁便是丧失避难权，也就是说行政上的驱逐。

如此看来，我们对孙逸仙采取的措施是有充分道理的。这个革命党人远不满足于他在我领土上能够得到的人身安全，他不断地往来于日本、香港、河内、西贡和新加坡之间，与以他为当然领袖的那个党继续不断地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借助于他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上享有的慷慨庇护，不断地、千方百计地攻击中国的主权，尤其是给中国南方的叛乱分子运送武器弹药、派出代表和破坏分子。

1907 年 12 月使广西边境沾染鲜血的骚乱（攻克南关要塞）和 1908 年 5 月的云南骚乱（攻克河口）全都出自这个煽动者的阴谋诡计。我殖民地被叛乱者们用作了出发点，或者军需基地。孙逸仙前几次在我殖民地上公然居留时，利用印度支那总督政府的宽宏大量，巧妙地秘密隐居河内而长期不为这个首都的警察局所知，这些曾导致中国政府在北京、广州、云南和巴黎作出过一次次最紧急抗议，缘由是孙逸仙从我们的好意中获得间接的支持使中国遭受了损害。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因孙逸仙和他的信奉者们在我国领土上和我们同中国的共同边界上的活动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您也知道，当我们因侵犯边境事件提出赔偿要求时，中国当局无视我们的最明确的否认，硬说我们对煽动者们的照顾可能对革命运动提供的支持，已构成了他们拒绝赔偿的理由。

况且，中国政府对孙逸仙和他的信奉者们提出的要求并不只是驱逐，而是由法国和中国之间签订的条约规定了的、纯粹的引渡，因为这个国家提出他们犯有普通刑事罪。在这一点上，我部已极其明确地告诉中国当局，诸如此类的任何引渡，不管是对孙逸仙，还是对他的信奉者，都是不能允许的。

革命党人的骚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从中国方面看是如此；从法国方面来看，这些骚动的危害同样是极大的。正如博努尔先生曾多次提请注意的那样，实际上常常不可能区别革命党人和普通的海盗，而且以孙逸仙的名义在中国南方各省展开的攻势失败后，那些到我境内避难的团伙肆无忌惮地行凶，犯下了大量的抢劫案，使我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代价，并不得不采取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

有鉴如此，我认为对于这位政治避难者——在人权同盟看来其惟一罪行就是助长了符合法国人民政治理想的种种民主期望，印度支那总督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毫无意义的冷酷无情，在关于这个中国人的问题上，总督已经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国际公法规则，而驱逐此人，只是他对中国尽了一项最起码的义务。

毕盛（签字）

〔外交部 亚洲司〕

117. 云南对外商的开放问题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10 月 30 日，北京）

外交部驻云南府代表给我转来他于 8 月 29 日呈报阁下的报告，报告述及云南府对外商开放问题，划定法国租界或国际租界和选择适于建造领事馆的土地问题。

我同他一样认为，现在便考虑这些问题是有好处的，因为从现在起两年时间内，机车十之八九要开进云南府。我国代表在和地方当局进行的一些半官方的和预备性的会谈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然而当时那些地方政府认为处理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并且没有进入真正的讨论，因而推迟了呈报中央政府的时间。

我觉得，分别处理和布尔热瓦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问题比较妥当，因为在那些问题之间并不存在他认为可能的联系。实际上，一个城市对外商开放丝毫也不会引起需要建立租界的问题。某一座中国城市的开放，这在那些条约的条文中早已有所预见和明确规定了，而剥夺中国当局的治安和行政权利的外国租界的建立，却是过去因为中国人的软弱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这种情况除北京的使馆区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协定的认可，它是某些条文极为广义的解释的结果，根据这些条文，地方政府在一个开放城市里指定"最适于建立外国人的住宅和他们能够修建教堂、医院、济贫院、学校和公墓的地区"。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天津条约，第十款。

关于云南对外商开放的问题，我认为要紧的是从现在起便向帝国政府提出要求。如果我们继续耽搁，那么，中国人便可能会抢在我们前头，他们会做出恩赐和宽容的样子，主动提出云南府的商业开放，而由于中国政府的行动是自愿的和自发的，便会有种种限制伴随着这一措施，给赢利造成更大的困难。前几年，中国人在满洲、湖北、山东各省开设的"商业中心"的体制便属于这种情况。这个体制的目的无非在于取代各条约所规定的有关贸易方面的完全平等，它划出外国人在这座城市中某个地区的居住权范围，要他们服从特殊的治安和司法条例。针对他们的人权法而规定各项权利的条例，是一个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有助于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的制度。

由我们自己把云南府的开放问题提交中国政府，我们便使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正确的要求，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各个条约早已预见和规定了的体制，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是很难找到脱身之计或通过种种限制予以回避的。

至于在云南府开辟一个法国租界或国际租界的问题，毋庸讳言，要从中国人手中争得这个租界极其困难，尤其是在当前，由于某些列强对他们屈尊俯就而使他们飘飘然，越来越爱找外国人的茬儿。中国人不久便将考虑取消目前存在的外国租界，你怎么可能使他们准许开辟一个新的呢！

我完全赞成布尔热瓦先生关于尽早选择一块土地，以便在该城开放时就能建造领事馆的意见。如果我们到云南府开放后再进行这个选择，那么购买土地的耗费必然更加巨大，对外国人想要的土地必不可少地会展开投机倒把活动。让一个中国人出面或借天主

教传教使团的名义购买，是目前可行的办法，只要能做到严守秘密。

英国人就是这样为自己准备了一块土地，以便在城市开放后建造自己未来的领事大楼。我强调了为避免将来受到苛求而购买土地的迫切性，然而，我却很难对地点的选择发表一些看法。我还是赞同布尔热瓦先生所作的考虑，觉得不要把法国领事大厦放在郊区，而是放在商业中心为好，这样，便于我们的领事和领事馆人员出于工作需要而在城里进行活动，也便于法国商人和侨民前往办事，使他们不用考虑到路途问题。

阁下若能考虑这些问题，并且如果认为恰当的话，应就这个方面问题同外务部进行的谈判作出指示，我将十分荣幸。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271〕

118. 关于普隆事件的处理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

（1908 年 11 月 1 日，北京）

七月十一日，阁下曾给我们一份急件，述及一名法国军官和数名法国士兵被因追捕叛匪误闯入法国领土的中国官兵击毙或打伤的事件。对此急件，我们已于七月十三日逐点作了答复，并声明，罪犯一经审判，必当严正法纪。十月初六日（10 月 30 日），我们接到云贵总督一份电报报告，该员在报告中提出了对负有责任的军官和行凶士兵应作的惩处意见。圣上当即下达谕旨：

"朕收到锡良总督关于云南官兵在东京湾边界肇事的奏本。今年五月（5 月）①，我国士兵在追捕叛匪中由于不清楚边界线而肇成了严重的纵火抢劫事件。下级军官和士兵虽然是在无恶意的情况下犯下一桩桩罪行，却不能逃脱应有的惩罚。杨清贵因让叛匪占领他的哨所和临阵脱逃已被斩首示众，因此他的问题便已不复存在，但是于焕章和王开仁也同样罪孽深重，他们也当立即正法。王有财、许德魁监禁五年尔后释放。副将姜万隆和俾将彭开升革黜功名。姜万隆将发配充军以赎前愆，彭开升监禁一年。知县宋智焜和总兵胡天佑即予废黜，宋某永不录用其他职务。总兵王洪顺革职留用以补前过。凡此种种惩前毖后。余者按锡良大人奏章处理。着主管部院依此从事。"

现将圣谕抄件转呈阁下，通知阁下是恰当的。

我们已经把阁下要求的赔款总额全数交付阁下，请阁下把它转交给有关人士，现在圣上又颁发谕旨，给罪犯以严厉的惩处，因此，此案当就此视作了结。

我们请求阁下将此情况呈报法国政府。

〔北京致亚洲处急件的附件〕

① 原文如此。——译者

119. 光绪皇帝之死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

近两天的电报已告知阁下光绪皇帝之死。陛下龙体始终十分虚弱，今年夏天的酷暑使他特别难受，哮喘发得比往常都厉害。有时，由于衰弱之极，他不得不取消大多数与外界的礼仪性接触。阁下记得，去年 9 月，我们的海军分舰队司令未能觐见皇帝，原因也在于此。

差不多一个月前，陛下回到冬宫（暖香阁），健康状况更加趋于衰竭，已经到了经不住一点意外的程度。而这种意外终于以肠梗阻的形式出现。由于中国的习惯阻止医生使用也许能为皇帝排除阻塞的有效药物，而皇帝本人也再无必需的力量恢复其器官功能的正常活动。他于四十八小时后死亡。

在皇帝弥留期间，皇太后发布了两道懿旨。一道是任命先帝的兄弟醇亲王为帝国摄政亲王，另一道则指定新摄政亲王之子溥仪为皇位继承人。

新皇帝生于 1906 年 2 月 11 日，现年两岁半。他的父亲醇亲王现年二十八岁，1901 年曾出使柏林，给德国皇帝带去中国皇帝和中国政府对克林德男爵被刺的哀悼。他由此出名。1898 年，他与荣禄之女结婚，荣禄当时是北直隶总督，他与慈禧太后政变的主要工具袁世凯一起反对自己的侄儿光绪皇帝。

光绪死时三十八岁，他的一生几乎是在他伯母的控制和监护下度过的。他试图获取自由，但却被套上了更加严酷的桎梏。事与愿违的婚姻，不断地受挫折，据说甚至还受虐待，那么他的死，如果传闻属实的话，则是他遭受的最后一次苦难。他的侄儿和继承者将被视作是他前任皇帝同治的继承者，而不是他的继承者。同治帝死于 1875 年，没有子女。由于他也没有留下子女，所以他也将如三十三岁的同治帝一样，没有香火供奉。而对祖宗的祭祀，是所有信孔教的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亲生或过继的后裔所期待的东西。

巴思德（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295〕

120. 中国局势
各国报纸摘要

德 国 报 界

《国民报》

《柏林第一手新闻报》　11 月 15 日

好几份德国报纸转载了下面这份上海的有线电报。

中日关系不会有所好转。北京政府最近宣称它将不再派出留日学生。日本教师和军事教官大量减少。

美国影响将乘虚而入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合众国同他们的传教团太团结一致，必然会引起天朝人士的怀疑。今天得宠的是受民族主义派保护的溥仪亲王，而不是美国人所期望的溥伦亲王。

《柏林第一手新闻报》 11月14日

该报认为最近北京发生了一场宫廷悲剧。皇帝无能力治理国家，太后年迈，也许还对改革怀有恶感。八旗领袖、各省藩镇和最有力量的正宗亲王们聚会议事，认为最好改换君主。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喜欢干净利索。满洲人感到相当懊恼的是，帝国内还有一些明朝的继承者。

《柏林日报》 11月15日

《柏林日报》与《科隆报》都谈到了太后由于担心政变，令北军中的满洲师开抵北京，她还在兵部、禁卫军和警察部队中安排了满洲人当领导。但是她的计划仿佛失败了。她的死亡与可怜的光绪的死亡同时来到，绝非简单的偶然的结果。

英国报界

《泰晤士报》11月16日

据《泰晤士报》评论，中国体质脆弱的皇帝和精力充沛的皇太后的同时谢世，可能对中华帝国产生严重的后果。继承问题仿佛已经安排妥当，然而一个长时间的摄政时期即将开始。很难预料将显示出哪些新的影响，以及那些影响将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正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难题之一。西方思想家尚难以确定的一些奇怪的势力正在中国起作用。很可能，满清皇朝无可争辩的稳定再不会持续很久了。从某些征象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潜在的革命运动与满清统治势不两立。“把中国还给中国人”的呼声将来还可能改变意义，变成反对满洲人的大声疾呼。皇太后死亡之后，必然会有政策上的某些变更。我们应予考虑的将不再是那个旧中国。曾使中国和东方局势动荡不安的不明确的骚乱，可能导致出乎意料的后果。

鉴于中华帝国拥有广阔的物质资源和千百万不知疲劳的劳动者，未来的中国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要求并取得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必须战胜许多困难，但他们国家的发展是必然无疑的。中国人不再具有他们祖先的好战思想，实际上的黄祸则首先是威胁西方工业的经济方面的祸害。

《泰晤士报》

根据《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报道，人们一致认为新太后完全没有威望。相反，荣禄

的遗孀、新摄政王的岳母则是一个性格刚毅的妇人。她是已故太后的朋友，她对新政体肯定将产生重大影响。

121. 西太后驾崩
庆亲王致法国驻华公使
（190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

本月廿二日（1908 年 11 月 15 日）未刻（2 时），皇太后陛下驾崩。我等太后奴才及全民上下沉浸于万分悲痛之中。鉴于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相信贵国也必与我们同哀。

我们旋即向您发出正式通知，并请求您通知贵国政府。

〔北京公使馆致亚洲处急件　No296 之附件 No1〕

122. 皇太后之死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

皇太后继她的皇侄光绪帝死后间隔不到二十四小时，于昨天星期日下午 3 时去世。几天来她感到有点不适，是由于着凉而患痢疾，但无任何迹象能令人预料到她会有这么迅速的结果。官方报纸发表了正式文件，此件加盖了新皇帝的玉玺，它仿佛是太后懿旨的最后表现。我在下面附有这个文件的译文。太后想要令人相信，她的不适因看到光绪皇帝之死而突然加剧，这位亲爱的皇娘终因支持不住丧失爱侄的悲哀而一命归天。

不用说，公众对这位独断专横的太后的死因始终是有疑问的，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她的死不只是由于疾病的作用。前天，人们让我们相信她还能颁发诏书，任命醇亲王为帝国摄政，指定小亲王溥仪为皇位继承人，接着又为溥仪登基表示庆贺。颁发这些诏书的结果是剥夺了她自己的大权，因为她没有为自己保留与醇亲王共同摄政的权利。而就在颁发这些诏书后，她竟无缘无故地去世了。

不管怎样，她的去世对新政体倒是大有裨益，因为这位性格暴躁、爱统治人的妇人的存在，终究是经常引起麻烦的原因。所以，不管官方如何声明，流传颇广的说法却是，有人在她与外界隔绝的病房里强行取得建立新秩序的诏书后，按照中国古老的习俗，给了她一片薄薄的金子，她不得不吞服金子，金片卡住喉咙，把她窒息了。

巴思德（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296〕

123. 关于云南开放的备忘录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12 月 9 日，北京）

就事实本身而言，云南府的贸易开放并不包括开辟租界和建造领事馆大厦。

一、关于领事馆大厦，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以往在中国建造领事馆大厦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它们都是在各个港口开放很久后才在这些港口建造起来的。在这些港口中最早开放的广州，领事曾被安置在一艘船上、一个代理商行的办事处里、最后在广州衙门里办公，一直到 1883 年，接着在沙面租了一幢房子。我国在中国各个港口的领事馆的安设情况大致如此。

尽快在云南府建造一座领事大厦是合算的，但并不是必须的。它的好处在于把迄今为止一直是暂时的安顿变成最终的安置，在于马上可以省下租金和不断搬家的搬家费和临时租赁来的房屋的修葺费，在于目前和将来都能保证不受地方官员和产业主的苛求和恶意之害，尤其是考虑到土地可能涨价。对此，部里已采取措施。我部已于 1908 年 12 月 7 日一信中授权研究购买最适合建立领事馆的土地的草案。

二、两个不同的问题需要考虑，云南府的开放问题和开辟一个租界的问题。正因为后一个问题并不是前一个问题的结果，因此它们更需要分开处理。

云南府的开放。铁路修筑成功很可能导致云南府的商埠开放。一条原则上要到八十年以后才考虑赎买的铁路，由于这条铁路的员工们组成的法国移民的存在，一定会要求在一个治外法权国家里有他们所从属的权力机关。另外，同意港口开放对中国人很有好处，通过开放，他们将能按照他们的策略，以夷制夷，用其他外国人来对抗法国人，从而保证自己免于接受特别的要求。

然而，我们也不必担心中国人会突然作出对我们可能有妨碍的决定。云南府的开放是早在 1887 年 6 月 23 日就作为在印度支那建立中国领事馆的一个后果答应了我们的，只要有关政府在建立领事馆的适当时机上达成协议。

中国人在商埠开放上采取主动，将使他们丧失朝思暮想的在印度支那建立中国领事馆的互惠特权。另一方面，商埠开放既然是已经答应的东西，它便只能按照过去为老港口开放签定的条件才能办理，看来，中国人是不可能执行他们曾试图在长沙、济南府和满洲各地采用的规章制度的。在长沙和济南府，多少还有一些有利害关系者同意这么办，一方面是日本人，另一方面是德国人。在其他地点，中国人自己提出港口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充分理由颁发新的章程，只要那些章程不触及外国人的总的成文法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条款。在前一点上是不会发生争议的，然而对第二点本身却可能提出异议。给外国人划定地区界限会有它的弊病，一旦规定的地方都已占用后，便有可能缩小新来者所要求的地盘。

中国人在 1905 年所作的、撇开 1844 年和 1858 年条约对港口开放规定的条件开放云

南府的尝试，按照他们所谓给长沙、济南府和其他地方强制规定的条文开放云南府的尝试并没有下文。英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而我们自己也不会给予同意。中国人恐怕预料到了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是行不通的，他们大概认为云南府的开放还为时过早，或因考虑到中国驻印度支那领事馆问题得到解决前就开放云南府的不利之处而退缩了。究竟是什么问题，很难说清楚，反正，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停顿。

我们商谈港口开放条件的形势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显然将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

促进云南府开放对我们是否有利？我们先天地便能作出否定的结论。英国政府同我们一样在云南安置了一名外事代表，这既是出于最惠国条款的一般性执行，更是因为根据一项特别协定，中国承认英国同法国一样，在云南这个与上述两个欧洲强国毗邻的省份里有特殊的地位。

只有意大利是我们自己冒冒失失地怂恿它在蒙自安排了一位领事，因为铁路上要雇用它的侨民，为了便于解决这些人同公司和当地人的争议，条约各国在云南还设有外事代表，而且以后，有代表的国家越少，事情便越有利。

我们与英国在有关云南和四川事务方面达成过一项协议，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认为英国像我们一样在云南府有外交代表有什么妨害。但是，我们并不愿意让其他外国人甚至在铁路修筑成之前便到云南来寻找发财的机会，在政治、工业和贸易方面同我们展开竞争，这对我们和英国都没有好处（我们如果要求改变目前情势，无论如何都应与英国协商）。

铁路修筑成以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届时，云南开放对我国侨民将是有利的。再者，中国人、与门户开放有利益关系的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拥护者都将提出这个要求，并且毫无疑问地将获得成功。

那时，我们便能打出我们掌握的王牌（同意在印度支那建立中国领事馆，以后的铁路转让的可能性），以便取得在有利情况下的港口开放。

也许，从现在起我们就能结合这些问题开始谈判，但是必须规定到铁路筑成后才能宣布港口开放，也就是说在我们拥有对我们的对手足够的优势以后。

至于按照上海和天津租界的模式开辟租界的要求，这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肯定将是很难达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我国侨民可以随意在他们想要的和能够做到的地方租借。就本义而言的租界到处都有的是，只要那些地方对做生意有利。如果相反，生意没有着落，那时再把买进的土地卖出去或临时出让就不行了。

对外国侨民说来，起居安适和健康问题显然很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同地方政府合作，他们对这类事已越来越关心，我们可以请他们订立外国人能够接受的治安和道路管理的一般规章制度。当然还有对轻罪、甚至包括外国人犯下的轻罪的惩处必须有各国领事的参与和同意的规章制度。

巴思德（签名）

124. 中国改革者孙逸仙在曼谷

马士理①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8 年 12 月 10 日，曼谷）

中国改革者孙逸仙博士在曼谷已有十来天了。这是他第二次在暹罗湾逗留。部里应当记得博先生 1903 年 11 月 28 日第 42 号函件转给布瓦索纳先生的一份报告。当时博先生是印度支那总督。在那份报告里，博先生提请注意此人在东京湾、交趾支那和暹罗湾小住的情况，指出他为了在殖民地方面给自己寻求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所作的试探，因为他没有这种支持便不可能在南部中国完成任何政治行动，博先生还指出了如果我们表现出支持孙的那些计划会有什么不妥之处。

同年 12 月 31 日，布瓦索纳先生在第 122 号函件中也向部里提到了孙逸仙于 5 月份曾在曼谷逗留的情况，提到他同尹可洪②建立关系，以争取尹的帮助，准备在云南举行暴动的情况。尹是一个受法国保护的中国人。

正如我们的代办所指出的，孙逸仙的访问似乎收效不大。事实上，五年多以来，这位中国改革者仿佛没把他在暹罗湾的同胞放在心上。

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因素在曼谷的重要地位。据最近所作的对中国人口的统计，估计在暹罗湾的天朝人数有将近三百万。这里的数目比较含糊，人们肯定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二百万，因为每三年对他们征收一次的"中国人头税"，仿佛很少有达到一百五十万中国人的。然而，侨居此地的人数却在逐年递增。南部中国和曼谷各港口之间的苦力运动总以有利于暹罗湾的大量盈余而告终。例如 1906 年进入暹罗湾的有一万九千中国人，而且没有人从那里出来。1907 年，"劳埃德船舶协会"③和"日本邮船会社"④之间的票价战争使渡费下跌，结果迁入比迁出多三万六千单位。1908 年，这一特殊原因没有了，可是，侨居暹罗湾的中国人数目仍在增长。这里所说的中国人仅指纯粹的中国人，全都来自中国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不过应当指出，改革者试图选择的场地云南却没有加入这一运动。

曼谷的中国人相对地比较安定。然而，他们仿佛属于这个民族的渣滓。他们懒惰得不可思议，而他们在手工上的笨拙可以同他们的奢望和放肆成正比。中国人在曼谷的工作质量之差，即便只是苦力的搬运都超过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程度，只有在当小商小贩或撬门人户为盗时，他们才发挥出某种积极性和才干。

他们中难得有脱出平庸、甚至脱出卑劣的人，如果说，原则上在中国人这堆材料中仿

---

① 马士理（De Margerie），时任法国驻曼谷公使。——译者

② 尹可洪（Yi－Ko－Hong）。——译者

③ 劳埃德船舶协会（Norddeutscher）。——译者

④ 日本邮船会社（yusen Kainha）。——译者

佛应该有很多可为改革派和革命党人所利用的捣乱分子,但好几条原因却使得这群人变得没有活力了。

首先,中国人在这里既是自由的,又受到十分严密的监视。在他们的工作、生意中,感觉不到什么力量。人们感到在物质生活的每一细枝末节上都需要他们,因而照顾他们。暹罗湾的制度对他们来说甚至充满好意。相反,警察局却在追捕那些地下帮会,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公害,从不放过把他们认为不宜呆在曼谷的人们送回中国的机会,或者在严密监视下流放边省。总之,这里的中国人对不属于他们物质生活的眼前利益的东西显得相当冷漠,而且由于天生的惰性,他们肯定看不到关心中国政体的变化有什么好处,况且他们定居暹罗湾,享受着自由政体带来的利益,并没有暴政和官吏们的剥削。

另一方面,犹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有少数中国人在这里真的发了财。这同我们在其他地方例如新加坡看到的毫无相似之处。因而,也只能有极少数有资格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才能领导运动,带动本身分裂成帮派、相互公开争斗的群众。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孙逸仙再度出现了。他作为中国一暹罗报(《华暹日报》)主编陈景华的客人,开始只是参加在某些同胞家里举行的知己聚会,对他们讲讲他的想法,以及由于皇帝和太后去世为实现这些想法提供的新机遇。

陈景华是一个热情的改革主义者,他主张使用革命的手段,然而暹罗湾政府早就对他有言在先,希望不要看到他的报纸成为暴力手段的宣传捍卫者,不要向这里的人们作可能在暹罗湾中国人中间引起风潮的挑动。人们并不禁止他严肃地议论对一个人人皆知十分腐败的政府所应进行的改革,然而,人们并不想使曼谷成为政治煽动的策源地,给北京政府留下责难的借口,从而坚持它一再重复的尝试,希望暹罗允许它在曼谷设立外交代表。

所以,那份中国报纸对孙逸仙的到来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直至本月5日,《暹罗观察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后,它才出来略微热忱地为这位改革者辩护。

那篇文章确乎相当激烈地攻击了孙逸仙,公开指责他在曼谷的中国人中间挑起混乱。我们知道,最近,即在孙逸仙离新加坡赴曼谷的第二天,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中间,由要不要为死去的皇帝和太后守孝的意见分歧引起了相当严重的骚动。《暹罗观察家》提出了这一巧合,十分明确地谴责这位改革者的煽动,并提请注意刑法典新近颁布的关于侮辱和阴谋反对外国君主问题的新规定,威胁孙逸仙将受到暹罗法律的严惩。《暹罗观察家》是暹罗官方意见的喉舌,所以人们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暹罗政府的手笔。更因为还有一些明显的理由,比如,在一次比较公开的、在曼谷的广州人开办的医院里举行的会议上——这次会议孙逸仙也参加了——当警察局认为有些发言中出现了会连累人的倾向时,便要求与会者结束了会议。

事实上,《暹罗观察家》的那篇文章是由一些拥戴满清皇朝的中国反动分子写的,他们干得相当巧妙,使暹罗湾政府随之也插手此事,并非正式地让孙逸仙知道它希望孙缩短在曼谷的逗留期。我秘密地得知,这个意见是通过美国公使馆转达给中国改革者的。

孙逸仙为了反驳《暹罗观察家》的非难，借用了《暹罗自由报》，这份报纸属法国人皮亚莱①先生所有。孙让该报声言，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如果说他议论了应该对中国进行的改革，一个自由国家的政府怎么能责备他呢？这个政府本身还曾为摆脱中国的桎梏而进行过斗争，现在北京政府尽管表面上做出友好的样子，实际上还在把暹罗当成“叛逆”。所以，暹罗对无非是按它的榜样行事的中国改革派只能有同情之感等等。

这篇手法巧妙而又有点开诚布公的论文，并没能改变暹罗湾政府的谨慎态度，而事实上，孙逸仙也十分愿意立即离开曼谷。

这位中国改革者从一到达这里起就表示了要法国公使接见的强烈愿望。我并不认为应该对他立即作出答复，因为我想先了解一下他的态度。经他再三坚持，我答应接待他，但我首先提请他注意，由于法国政府和当今的北京政府保持着合法关系，我只能以完全私人的名义接待他，还因为我有理由料想他完全受自由主义思想、公正和无私的驱使，我才接待他，因为法国正是希望看到这些思想在全世界实行。

事实上，孙逸仙是一个纯真的革命家。在我们的谈话中间，他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但这也是一个由英国自由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革命家，他用政治术语表达出他那些灼热如火的计划。他的外表显得很有教养，但并不带有欧洲人的那种外露激情，因为这同东方人的平和风度是不相容的。他使人同他一接触便产生莫大的好感。他的仪表既潇洒又高雅，他的面貌并不带着很明显的黄种人的特点，显得开朗而又神采奕奕。显然，他能吸引的不只是一个交谈者。

他声称，期待北京政府在中国发起或配合改革只是无益的幻想，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用于糊弄人民和外国人的信念的表象，而要想把暴政、贪污和浪费一扫而光，就必须对既定政体采用暴力，况且，满清皇朝不合法地占据着中国南方，中国人觉醒和自强的时刻已经到了，北京的事态不能再持续下去，宫廷的阴谋本身便足以摧毁宫廷，并从而证明南方的分立主义是正义的，应促进它的成功。他主张以共和形式，建立联邦制度，同美国那样，但也许更多地强调联邦的权力。另外，他还说，官僚阶层已经太腐败了，不可能为未来的政府提供干部，但是在其他地方将能找到卓越的干部人才。

他当然用赞扬的语句谈到了法国和印度支那。他仿佛甚至想让人知道，他本人就有许多地方对印度支那十分满意。由于我不知道自东京湾边界上发生的那些严重事件以来，总督政府对他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对改革派煽动者们采取的驱逐措施，我真不理解孙逸仙这么说的意图是什么。他只是补充说，我们驻扎在老街地区不是为了对付中国的改革者，而是为了对付中国的正规军，他本人曾到现场确认了这一事实，“指挥该地区的法国上校也能够为此作证”。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像好几年前那样，还在渴望我们的合作，他是否还想到了用未来的某些利益为诱饵诱使我们与他合作呢？确实，他曾转弯抹角地让我谈及海南岛，谈及一旦南方中国建立国家形式，法国在这地区安置设施的可能性。

① 皮亚莱(Pialet)。——译者

他目前还没考虑到返回中国,原因便不必说了。

看到过孙逸仙一眼的威森加尔先生,并不对我隐瞒他对此人的好感。他还是很乐意看到他离开曼谷。再说,暹罗政府仿佛根本就不怕在暹罗民众中间散布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也不怕发生曾使好几个亚洲国家动摇不定的那种运动的可能性。阿德维泽将军曾对我说:"如果有一天这里的人要求有一个宪法,无疑国王很容易就会批准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避免给中国的下等人可能造成的过分刺激,避免给北京政府议论一个至今被他们成功地排除了的问题的借口。

德·马士理(签名)

〔法国驻暹罗公使馆　亚洲处　No204〕

一九〇九年

125. 袁世凯失宠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年1月4日,北京)

慈禧太后去世后政治地位颇不稳定的袁世凯前不久失宠了。摄政亲王对他在1898年的叛变耿耿于怀。当时袁世凯受命以武力保证皇帝决定进行的改革顺利实现,然而他率部倒向反对派阵营,帮助太后软禁她的侄子、重新攫取君权。目前的摄政王当时曾与他的兄弟同时受到间接的打击。

很难预料排斥这样一位要人对中国的精神状况是否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是否会引起对目前政体的不满。直至今日,尚未见到任何明确表达出来的舆论运动。

巴思德先生的同行们显得相当地不安。因为在军机处代替袁世凯的是一个满族人,他们担心摄政亲王想给满洲人以一定的优势地位。据说,中国的民众如果发现自己像这样为一个令其厌恶的少数民族作出越来越大的牺牲,那么他们很快便会起义;此外,更因为袁世凯作为一个军机处成员,他的存在对列强说来构成一种安全的保证。

巴思德先生并不赞同这样的忧虑。我们的公使认为,摄政亲王只是为了一泄私愤,而并不是想开倒车。

代替袁世凯的满洲人那桐不是一个有坚定原则的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至于袁世凯在外务部的继承者,是一个广州人,名叫梁敦彦。梁是在美国长大的,对欧洲思想十分开放,他本来就已经是外务部的副主事,这次是越过一个满洲人——廉方——当上了主事。廉方担任副主事的时间比他更长。也许我们合适的做法是,告诫中国政府应当谨慎和节制,或甚至使他们意识到,如果措施轻率,就有可能遭到列强的反对,然而那是各国公

使馆可能采用的最后的办法了。

巴思德(签名)

126. 1909年1月4日的法中协定

第一款，法国当局一旦得知革命者和叛乱分子在印度支那境内进行旨在损害中国治安的集会和集结，当积极采取行动驱散这些集会和集结。如中国当局向法国警卫部队通报了类似情况，或经由领事将类似情况报告了法方，也应立即引起同样的回应。

第二款，法国当局将禁止和严厉镇压在印度支那通过报界或其他出版方式进行的任何反皇朝的或革命的宣传。其主要肇事人将被驱逐出境或按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规章予以追究查办。用本地语发行的报刊如有此类情况者，应吊销其出版许可证。

第三款，所有正在或将在法国领土上往来的武装的叛乱分子或武装的叛乱团伙将被解除武装和加以拘禁。拘禁期限由法国政府决定，并由它预先通知中国政府。期满后，被拘禁者将被驱逐出境。自然，拘禁费用账目应先由法国方面通报中国方面，然后由后者支付。

另一方面，被驱逐出境的革命者，也可能被永远禁止在印度支那或它的属地上通行。将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使这些人不可能再越过中国边界。

第四款，任何曾在中国陆上和海上犯有抢劫案的个人，或触犯普通刑事法的个人，如情况属实，则将按照1886年4月25日公约第十七款规定，经履行引渡手续后，引渡和送交中国当局。中国当局向总督提出引渡要求时须带有该案的完整材料。

如果被控告人以政治罪和与某项政治罪相关联的罪行为由提出抗诉，其所犯重罪或轻罪的情状则应受到特别认真和仔细的审查，以免罪犯提出不符合实际的借口逃避法律制裁。

第五款，如图谋不轨者从事秘密运送武器弹药活动，两国的边境当局均应采取积极和严肃的措施，以阻止这种走私和军需供应。

127. 中国的新主
来自德国报界和情报局的材料
(1909年1月26日)

中国的新主有些不知所措，这在皇帝和太后去世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完全能感觉出来。他听任事物自由发展。实在地说，醇亲王虽然只是摄政，但是一个四岁的小皇帝绝不至于使他竟然毫无作为。

现年仅二十八岁的摄政王，八年前，当他不得不担当起前往柏林谢罪的亲王的角色时，还曾留下过极坏的印象。当他到达巴塞尔的时候，据说，应遵循的各种迥然不同的策

略所产生的影响曾使他左右为难、摇摆不定。然而,今天的摄政王却已具备了我们所说的才干。自巡访欧洲之后,他下定决心埋头学习。他不但学识渊博胜过外交官,而且还是清廷诸亲王中远比他人都更勤勉、更忠诚、更加品行端正的人。他只有一个妻子,但她非常庄重而又很有抱负。在那次赔礼旅行之前,醇亲王还不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人物,一直到日俄战争后,他才取得皇太后的信任,使他于1907年在二十五岁时出任军机处要臣,与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齐位。通过对醇亲王与那两位要人的不同关系的解释,我们便把握了衡量其人的关键,而这种结果近来正打击着袁世凯。在亲王恋恋难舍他的学业的时候,他找到了张之洞这位杰出的、忠心耿耿的顾问。张是当今帝国第一大学者,又因反对袁世凯而颇得人之好感,袁在慈禧统治下是威望显赫的。个人感情以及良师益友的影响,都促使在皇帝和太后两宫驾崩后开始视事的摄政王排斥袁世凯,并以袁氏患病、不得不引退为理由掩饰他的失宠。

醇亲王草拟了一个国内改革的美好计划:提高官员的思想水平,改善财政状况,用巧妙地分配高级职务的办法粉碎宗派乱党。击败袁世凯是否使他对自己的职务的力量产生了幻觉?对此我们当拭目以待。

〔外交部　政治和贸易事务局〕

128. 中国皇帝的葬礼
藩苏纳致外交部

(1909年2月9日,北京)

中国皇帝的葬礼将于4月底举行。藩苏纳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真该感谢日本使它产生了请各国元首派出特使代表他们参加皇帝葬礼的想法。

日本、德国和俄国公使相信他们的君主将派出一名皇族成员作为本国的代表。

美国公使只是请求他的政府给他任命书,给予他特使资格,而且他还对英国公使竭力施加影响,让后者对英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解决办法。柔克义先生对中国政府的要求感到特别恼火,因为在这个十分重视声誉问题的国家里,一个占有头等地位的共和国的大使甚至特使,都会被一个小国国君挤到二流地位上去。因此他对同行们努力做工作,希望来北京的王室成员不要太多。

由于中国人在遇到礼仪问题时总爱询问法国公使馆,藩苏纳先生很希望能从部里收到一份能够对外务部有用的摘录,简单标明对各个列强的代表,根据他们的亲王或特使的资格当给予怎样的礼遇和位置。

藩苏纳

〔外交部　No33〕

129. 唐绍仪特使的使命
法国驻华公使馆致外交部
（1909 年 2 月 9 日，北京）

1908 年 9 月，中国政府委托唐绍仪阁下赴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完成一特别使命。他出使的目的，一方面要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首先是要实现中国财政的改组计划，这份计划的基点是列强同意提高中国关税。

特使是广州人，刚踏上仕途时没有文名，是一员武将。他聪颖过人，他的发迹与袁世凯的发迹息息相关。出国时他在北京的地位很重要，而他的使命将持续一年，也显得意义重大。他持有皇帝致各国元首的委派他为特使的信件。

唐于 1908 年 9 月 24 日离开北京，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受到日本国十分荣耀的接待，并得到天皇的隆重接见。他曾与外务大臣小村就政治问题（阀口门铁路，被否认的从间岛到高丽边境）作过多次会谈。

他在美国的逗留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政府减免了中国 1900 年赔款的余额，以及一年来它试图充当天朝保护者的角色。目前的总统罗斯福先生和下一任总统塔夫脱①先生十分隆重地接待了唐绍仪。唐还同国务卿罗脱②举行了会谈，向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和政治的改革当以财政改革为出发点的理由（货币本位的建立、国内厘金的取消，及其必然的结果——提高关税）。而财政改革是以向美国和欧洲各国借贷十亿债款为基础的。罗脱先生既表示了他的好意，又表示了他对自己官方干预美国各银行的效果的怀疑。

皇帝和太后的驾崩，以及袁世凯的失宠差一点中断唐绍仪的旅程。摄政王只是出于对列强的礼节考虑才没有将唐召回，但他决定取消唐出使的内容，其使命只剩下纯形式的性质。唐在美国的逗留期缩短了，1909 年 1 月初，唐启程赴伦敦。

英国政府并未因此而稍减接待中国大使的豪华排场。唐曾被国王邀请到白金汉宫，并得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和首相的接待。实际上，人们认为，尽管唐的使命目前失去了全部现实意义，但他的官方身份、他的地位的重要性、他的知识才华和他回国后得宠的可能性，都要求欧洲对他的接待规格不低于东京和华盛顿的接待规格。

鉴于我们与中国的领土和财政关系，这些因素对我们的观点具有特殊的价值。最为理想的，显然是在特使到达后由外交部长的代表予以欢迎，总统先生接见，他向总统递交国书并受到外交部长的邀请。唐还要求访问财政部长，希望向他了解我国信贷机构的情况。

况且，重要的是维持政府成员和法国各银行与唐应有的礼貌上的关系。鉴于中国使

① 塔夫脱（Taft），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1909—1913）。——译者

② 罗脱（Root）。——译者

命所带上的纯形式的性质，也鉴于一定不能使唐产生以为能使法国或英国应承当无担保贷款的任何幻想，最大的保留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外交部 亚洲处〕

130. 处理中国革命党人的办法

外交部长致殖民部长

（1909 年 2 月 12 日，巴黎）

本月 5 日，承蒙您告诉我，印度支那总督克罗布柯夫斯基①意欲按 1886 年 4 月 25 日签订的天津协定第五条第四款规定，把由于 6 月份的云南骚乱而被拘禁的一百四十二名中国人交给中国当局，除非我部反对。对这些中国人的海盗活动罪状将一一列出。

我不敢忽视，即将此提议告知我驻北京代办，并请他把他对这一措施是否恰当的看法告诉我。

从藩荪纳先生的回电来看，我们的外交官员终于使讨论进入有关解决我们因云南骚乱而提出的赔偿问题，外务部对讨论这个问题一直断然拒绝，甚至不愿意承认讨论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解决这一事务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再把拘禁在东京湾的海盗交给中国当局，这样更好一些。

我对这种看法只能表示赞同，并提请您注意，我部对压力手段的重要性的认识从未改变，我们手中掌握的数量甚多的中国不法分子构成了这种压力。因此，请您电告克罗布柯夫斯基先生暂缓实施他的意图，直到我们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认为时机成熟再执行，我希望这个时候尽快到来。

另外，我觉得应该告诉您另一条消息，这是本月 9 日藩荪纳先生给我发来的。据这条消息说，锡良已调任满洲总督，他在云南的职务最近将由李鸿章中堂的堂弟李经羲接任。锡良的调离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要求的，它将能排除我们在最近发生的云南骚乱中对中国的主要不满之一，它使藩荪纳先生感到这场谈判出现了新的转机，标志着缓和，使我们能够指望达成令我们满意的协议。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131. 扩大法租界的要求

巨籁达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09 年 3 月 9 日，上海）

我荣幸地收到您今年 2 月 26 日关于将得到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支持的扩大公共租

① 克罗布柯夫斯基(Klobukowski)。——译者

界的要求的第 12 号信。

出于治安和卫生的原因，公共租界提出要求兼并宝山县。同样的原因使我也不得不请您能够请求中国政府同意扩大我们的租界，况且扩大部分已被框在属于我们的道路中，这也只是为一既成事实办理合法手续的问题。正如您所知，那些道路毋庸置辩地是我们的产业。其中有几条是中国政府自己让与的，另有几条是我们得到南京总督批准修筑的，最后还有几条是我们的租界政府找地产主买下的。

我们与公共租界方面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千方百计找中国地方当局的麻烦，令人恼火，而我们的要求却不同于他们的行为。因为，如同这里众所周知的，自我到上海以来，我们一直同中国地方当局和睦相处，凡边界纠纷，我们从来都同他们以和平方式协调解决。南京总督端方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最近，他还为这一事实作出了明显的证明。他以中国警察局在同法国警署的关系中从未遇到困难为根据，正式拒绝公共租界提出的吞并宝山县的要求，因为吞并的借口是在租界和宝山接壤的边界上国际警署和中国警方老是发生摩擦。

所以，您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可以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来我租界外的道路两侧营造住所和定居的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安全，在他们的问题上，某些外国法庭，尤其是英国法庭拒不执行我治安、路政和卫生规定。若能如此提出，我将十分感谢。

其实，我所要求的无非是 1900 年毕盛先生已经提出过的计划，这个计划当时只是由于“法朔大”①事件后英国人对我们竭力反对而未能成功。而今天，英国方面很可能不会再像那样抵制我们的计划，因为，首先，在我们要求得到的这个范围内，我们的管理成绩是确有成效的，我们的改进谁都看得清清楚楚，连我们最激烈的对手都不能否认。

从中国的政治观点来看，我认为，只要治外法权制度还继续允许外国租界在上海存在，中国当局就绝不会愿意让公共租界取得太占优势的影响。公共租界的侵略精神应是中国官员们所害怕的，他们答应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平行发展，让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保持势均力敌，力求当即抵销他们的影响，从而做到在中国地界和洋泾浜以北的外国殖民区之间建立一个真正友好和与人为善的缓冲地带，使我们能够继续像以往那样帮助地方当局。

我们要求得到的部分东至目前的法租界，南至属法国的徐家汇路，西至属英国的徐家汇路，北至北大湾②。

巨籁达(签字)

〔北京致亚洲处急件附件　(抄件)〕

① 法朔大(Fachoda)。——译者

② 北大湾(Great Northern Crique)。——译者

132. 扩大上海法租界的要求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 年 3 月 24 日，北京）

英国公使馆向外务部提出了扩大上海公共租界的要求，边界将包括宝山县在内，到沪宁铁路沿线。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首先是治安和卫生上的原因。而已经开始的谈判还没有实际结果。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抓住了这个机会，来信要我也提出扩大法租界的要求，这封信的抄件同此函附上。他希望能把目前我们只拥有道路的租界外地区全部囊括进来。在答复巨籁达先生的要求之前，我认为应该先请求阁下的指示，因为从我们这方面而言，引起中国人对我租界外情况的注意也许有什么不妥处。

再者，在英国公使馆的谈判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的介入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成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好还是等朱尔典爵士的行动成功后，我们再提出要求，到时候，如果公共租界的扩大已得到允诺，那么我们的要求也就很难拒绝了。

藩苏纳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89〕

133. 上海法租界的扩大计划
毕盛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
（1909 年 5 月 20 日，巴黎）

您在 3 月 24 日的 85 号信中，转来我国驻上海总领事给您发出的、关于把我国租界或许可以扩大到徐家汇，以便能把租界外的道路界限内的土地收进我们的租界的外交急件。

我同巨籁达先生一样认为把我们的租界一直扩大到徐家汇是十分理想的。像这样的措施既可以用我们租界政府在这个领土范围内作出的金钱上的牺牲来说明理由，对住在外租界、在那里付市政管理税和享有选举权的我国和外国侨民又十分有利。

所以，我只有借重您的谨慎和对中国事务的经验，着手谈判，请您负责继续进行争取扩大我租界的工作。

然而，重要的是要考虑，目前进行中的扩大公共租界的谈判会对我们计划中的扩大产生多大的影响。

尽管我并不打算给英国在中国的政策制造麻烦，我却忘不了在 1898—1899 年间，正是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反对使我们的扩大计划险些功亏一篑。也许，最好是摸一下您的英国同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争取得到他保证一旦公共租界得到扩大后，不给我们的要求制造障碍，甚至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很可能将使

我们改变态度。

毕盛(签字)

〔外交部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亚洲处　No87〕

134. 关于中国的现代教育

（1909 年 5 月 28 日，上海）

中国进行多年的、旨在改革教育的努力收效不大。首先，代表耶稣教传道派利益的中国教育联合会对传教士们在教育事业中遇到的对做任何忏悔的障碍表示遗憾。官方人士和好几个地方的洋学堂的努力仿佛都没有取得稍好些的成效。

在那些公立学校当了好几年教员的一个法国人，曾对我们的官员讲述了给中国人施行占优势的现代教育体制的根本错误。教师的漫不经心助长了学生们的不守纪律，教师的助手们的无知无能，使得对年轻一代的努力教育徒劳无功。改变中国的教育面貌，使之达到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水平的日子远未来到。然而对这个问题却不应漠视。我们的对手们对此仍然十分重视，尤其是德国政府。

巨籁达

〔外交部　No30〕

135. 广州的欧洲租界问题
法驻广州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 年 6 月 30 日，广州）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中国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英国驻北京公使可能向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广州英租界的要求。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考虑英国公使所能要求的是哪些地方。其中，我注意到澳门要塞航道全都是石头砌成的码头的西河岸，目前几乎全都被外国“仓库”占满了。

这个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几年前，有一个中国农民定居在沙面的法租界里，他饲养奶牛，提供必不可少的新鲜牛奶供欧洲人消费。由于他安身的那块地上要建造房子，他被迫离开了那个租界。

在英国总领事的再三邀请下，他在紧靠着澳门要塞的地方安顿下来了，附近正是现在几乎全都建上了仓库的运河河岸。英国为他提供最大范围的保护，特别是给他的农场永久性地派上几名沙面英租界的警察。就这样这个农场渐渐变成了租界的延续，并且继而可以用作要求得到包括航道整个西岸地区的起点。

中国农场主拒绝了，他怕同中国当局纠缠不清，因为，他那些费用显然还是全部得交给中国当局的。

然而，且不管英国政府扩大已属于它的广州租界的企图是真是假，德国政府为自己弄一块租界地的企图却是千真万确的。沙面有许多德国人，他们几乎全都定居在英国租界，而同英国臣民的关系又相当糟糕，英国人同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指责他们拼命地同英国商人们竞争。

只是因为我的同行们持续不断地作出奇迹，才避免了在这两个国籍的国民之间始终剑拔弩张的冲突，德国人希望有个安安稳稳的窝也是有鉴于此。这不仅得到他们目前的领事乐斯磊①先生的赞同，而且一直是他的前任们所支持的。而德国传教士团则已经在澳门要塞航道西岸、接近航道入口和沙面的对面，拥有一片相当可观的居住地。紧靠着这块土地，法国传教士团也有很大的一块，而它们向着河道的一面也都已修起了码头。在传教士团居住地的另一头，一直到花地小湾的入口，那里的土地归一些中国人所有。

几个星期前，一位自称是一家德国国籍的联合企业代理人的德国国民去找乐斯磊先生，要求支持他以该联合企业的名义把我上面例举的那些土地全部购买下来，以便能在澳门要塞航道的这边岸上、面对法英租界的地方，奠定德国租界的基础。乐斯磊先生仿佛相当热情地支持这种想法。他甚至还为他的国民提供了某些有关方法的建议，使他在进行过程中能进行他本身的努力，并取得德国政府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他首先肯定要告诉那个国民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必须使哪些成员对他的联合企业的观点产生兴趣。

这位代理人当即就去找了法国天主教传教团和我刚才已提到的那些土地的中国地产主，您将能从所附草图上了解这些土地的方位。对他的开价，修道院院长富尔凯②先生答之以与他的中国邻居地产主们一致的条件，即一平方英尺六元，从而使他那块土地的价值达一百多万元。

这个价并没有把德国联合企业的代理人完全吓倒，他清楚这只是开价，而洽谈的大门却是打开了。

实际上，我相信，如果价钱合适，天主教传教团是不会在出售这块土地的问题上犹豫的。那块目前没有使用的土地消耗大量的利息，对传教团说来，能把它脱手，以取得一笔可以利用的巨款，当然比较合算。

然而，如果要修筑从广州到澳门的铁路的话，这个地方恰恰将是起点，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天主教传教士团一心想迅速做成一笔好交易，他们还是犹豫不决，只怕做得太仓促而使这笔交易完全不利。

德国联合企业的代理人住在沙面英租界的维多利亚旅馆，几星期前曾给他的领事乐斯磊先生写过一信，在信中解释了他和他的联合企业关于建立一个德租界的计划。

他极其秘密地发出了这封信，而乐斯磊先生也没有把这封信给任何人看过，然而最重要的第一页居然被拍成照片送交给了总督，真是绝对说不清楚的怪事！广州部分记者也都有它的复印件，并且正伺机利用之。有一位报纸主编还把那张照片给富尔凯院长看过。

德国人的计划就这样被挑明后，两广总督立即急急忙忙地力求挫败它们，或者至少使之不可能完成。

同时，他让他外务署的官员同我的德国同行谈判，旨在绝对地弄清楚德国政府的意图

① 乐斯磊(Rossle)。——译者

② 富尔凯(Fourquer)。——译者

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它的国民。他派人对中国地产主施加压力，阻止他们出售土地，同样也对天主教传教团施加那种压力。魏晗先生是他在这件事情中的居间人。

总督给富尔凯先生写了不少信，劝他不要卖。最后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我请求您，如果您要卖，那就请卖给一个诚实的中国人，而不要卖给一个洋鬼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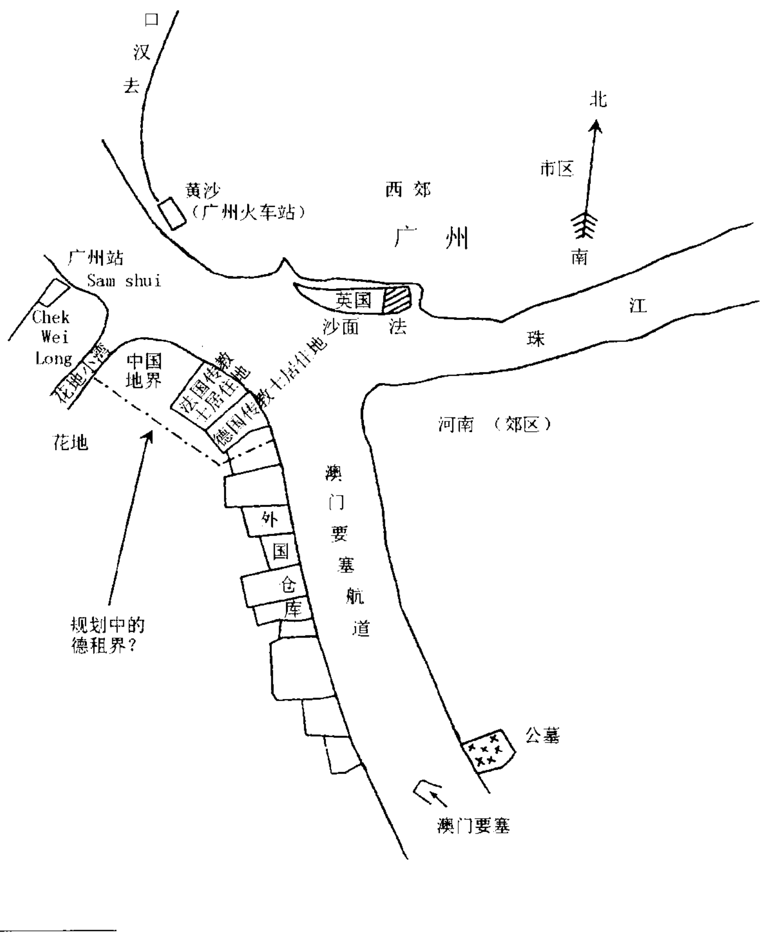
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在广州、珠江岸边安排上一个新的，这一回是德国的租界，对此，我其实是理解的。更由于我上面已经提到了的，这个租界将占有未来的广州到澳门铁路的起点站而使他们倍增反感。

部长先生，这便是我刚收集到的情报，我是从富尔凯先生那里得来的，并马上就向您报告。我将努力最密切地注视这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的发展，并将逐日向您汇报以后我能获得的情报。

（签字）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No127〕

（附图）



① 原文如此。——原注

136. 关于上海租界的扩大问题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 年 7 月 13 日，北京）

承蒙阁下在 5 月 20 日急件中让我了解英国公使对可能扩大我在上海租界一事的看法。

所以，我向朱尔典爵士陈述了您想把法国的外租界并入租界的愿望。我还补充说，为了避免导致他为扩大公共租界进行的谈判失败，如果他能保证对我以后的行动作出有利于我成功的表现的话，我们准备等他们的谈判结束后再提出我们的要求。

朱尔典爵士对我的问题表示惊异。他并不了解英国公使馆 1898 年采取的立场，对此很不明白。

他对我宣称说，如果居住在我外租界上的英国人愿意与我们的租界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的话，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插一手的，他愿意看到我们的租界得到扩大。他对我说：

“如果这个保证对贵国政府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您可以立即提出你们的要求，因为，由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拒绝我对它提出的要求，你们的行动也就不会对我有什么不便了。”

实际上，现在确实不是要求扩大我们的租界的适当时候。本地报刊上尽是些议论赎回原有租界的文章，政府可以以舆论的一致性为依据拒绝我们的要求。

外交使团不得不考虑这种精神状态。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它提请讨论上海公共租界的扩大问题。朱尔典爵士报告了他为把宝山县并入公共租界而进行的谈判的失败。大家决定不再坚持，只要求中国政府系统地采取卫生和治安措施，以改善这个有许多欧洲人居住的地区的情况。

如果中国政府部门对我们的要求没有下文，从而为它的无能或无诚意提供了证据，那么，外交使团就多了一条理由，可以再度提出扩大公共租界问题。目前，外交使团暂且放弃了它的最初计划。

我没有向外务部正式提出扩大我们租界的要求，但我已同梁敦彦谈及这个问题，我并不对我的提议会有怎样的结果抱任何幻想。

中国人实际上比拒绝扩大公共租界更有理由拒绝我们的要求。

公共租界同样也有一个外租界，而如果出于卫生和治安的理由它兼并宝山县的话，那么一旦我们的要求得到批准，它肯定还要提出兼并它那个外租界。

只有等到发生骚乱和纠纷的时期才可能使我们的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藩苏纳（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169〕

137. 北京新政府情况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年8月2日，北京）

光绪和皇太后两宫驾崩，大权落到先帝的弟弟醇亲王手中；此事至今已过去八个多月了。

这段时间已足以使我们了解新政府的倾向。

人们对摄政亲王曾寄托过很大的希望。遣退袁世凯的举动给人们、即使是反对这个措施的人们的印象是，帝国元首是一个刚毅果断的人。今天，我们应当承认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摄政亲王这个抱着崇高的善良愿望的年轻人就他个人而言是无私的，然而出于无知、胆怯和软弱，他把握不了政府，也没有找到一个能人以他的名义去把握政府。

自袁世凯去后，军机处无任何变化，那桐进军机处也没有使之产生多大的更动。

庆亲王、世续、鹿传霖等是些年迈体衰的人，他们是极好的廷臣，从不敢维护自己的意见。张之洞确实还有一定影响，但他经常生病，他只管得了他自己范围内的事务。

那桐目前代理直隶总督，数月前他患了中风症。他是一个投机分子，把他的接连不断的变化记下来倒是挺有趣的。他曾是坚定的义和拳分子。接着，在1900年风潮后的那几年里，他成了外国人的好朋友。近来，那桐又表现为显要人物，为大臣们的要求辩护，支持各省要求赎回从前答应给予外国人的租地。

就这样，英国公使馆差不多快解决了的赎买一个矿山租界的条件问题——这个矿在安徽省，原来是答应给约翰·李斯特·凯依爵士①的——因那桐插手支持该省显要们的申诉，协议未得到批准。

善于见风使舵的那桐采取了这种新态度，可见目前各省的力量比中央政府要强大。

有一天我在外务部抱怨连解决一些小问题都要拖拖拉拉，有人对我说了一句老实话："他们不听我们的。"

摄政王面对各省政务，因为爱惜他的民望而显得软弱无力，而在他的家族面前，他的态度更加怯懦。

由上面述及的人员所组成的军机处在幕后却由某种家族参政院所替代，各种事务均由摄政王、他的几位兄弟和几个"穷亲戚"处理掉了。

摄政王本人极其老实，他很快就被家族中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所压倒。开始他还斗争，后来便厌倦了。据说宫里成了大吵大闹的场所，载洵、载涛二位宗室要求为自己开发财源。

事实是，人们不断看到对这些人的任命。载涛负责建造光绪陵园，这是最肥的肥缺

---

① 约翰·李斯特·凯依(John Lister Kaye)。——译者

之一，同是这位载涛，又被安排领导高级的军谘处。而载洵则被任命为高级专员组织海军。

在此，我谨呈上有关最后那几道任命的政令译文。这些任命引起了一些议论，使汉族人十分不满。人们觉得满洲宗室们占了很多的位置，为自己保留着高官厚禄。

谁都知道，海军事务处和军谘处将负责研究军备问题，将决定选用什么型的火炮、什么型的战舰，将向外国提出大批订货。这两个处的建立甚至就是为了从主管各部收回进行这类活动可能获得的利益①。

就这样，摄政亲王在自己家里不得不容忍他在各部门所追究的流弊。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景象，一个通过财政改革、军事改组等途径，其纲领和原则都以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政府，实际上面对各省却绝对地无能为力，不能迫使它们执行自己的意愿。

最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为这种局面抱憾。他们真心地祈求出现一个有意志力的、善于治理的人。

中国已经产生过几个这样的人物。恭亲王、李鸿章甚至袁世凯都是这类国务活动家。然而目前我们却看不到有谁表现出了担当起中国政府第一号角色的能力。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危险，使我的大多数同行都十分忧虑。

藩苏纳(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189〕

138. 中国订购火炮
藩苏纳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 年 8 月 24 日，北京)

曾经作出巨大努力希望得到允许为中国军队提供全部火炮的克虏伯②商号，最近争取到一项订货。订货数量我国代办不清，但据我武官推测是给御林军的六个炮组。

克罗索③公司的经纪人得知中国政府的意图后，曾请求藩苏纳先生正式介入，要求得到至少是这批订货的一部分。藩苏纳先生没有拒绝作这个尝试。陆军部尚书在答复中承认曾向克虏伯商号订购过几门火炮，并说他的决定得到中国军官意见一致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国官员得知有一份比较试验过德国装备和克罗索装备之后写下的正式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应采用德国火炮。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德国火炮使用简便，更适合目前还没有能力使用太难或太复杂的装备的中国军队。这里所说的火炮是指野战炮，不是山炮。

---

① 清廷于 1909 年夏秋筹设海军部；又仿日本参谋本部例设军谘处。——译者

② 克虏伯(Krupp)。——译者

③ 克罗索(Creusot)。——译者

尽管这个意见并不令人鼓舞，我国代办还是认为，如果认为我们输定了，那也是错的，他希望我们将能利用刘①上校在那里的优势，可以做做工作。

藩荪纳

〔外交部　No219　（保留）〕

139. 业国麟②先生寄来的做商标的中国画给政治和商业事务司的通知

（1909年9月11日，巴黎）

法国驻芝罘领事给部里寄来一组五十幅十分漂亮的中国画，是他让当地艺术家们画的，他认为可以将这些画作为法国出口远东产品的商标和标签。

这些画已转给商业部，该部热烈赞扬我外交官有此独到创举。

行政和技术事务司荣幸地向政治和商业事务司转上让·迪布依③先生和业国麟先生的来信抄件。

〔外交部行政和技术事务司〕

附：

（1）可作远东产品商标及标签的第一组中国画 业国麟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年7月23日，芝罘）

好几位工业家给我来信说，他们将考虑我在去年11月21日的报告里提出的对发展我国在中国市场贸易的实用建议，尤其是我提出的关于创设用于远东的产品商标的益处的观点。有的工厂主甚至要求我给他们设计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标签，我迅速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鉴于别的出口商也可能想到实践我的想法，我请两位本地艺术家运用他们的同胞经常用于构图和象征的表现手法，用他们特别喜爱的形象，画了一百幅商标或标签图样。这些图样可以给国家外贸局，在那里供我国商人们从容研究和借鉴，制定他们的商标。在此，我荣幸地给您寄上第一组图（五十幅），请您费心转交工商部长先生。每幅图画的上方写有几个字，说明这幅画的意思，而在下面，有这些古怪难懂的文字的发音和译文。

大部分画的艺术价值并不很高，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按中国人的兴趣构思的，所以

① 刘（Lieou）。——译者

② 业国麟（Guérin），时为法国驻芝罘领事。——译者

③ 让·迪布依（Jean Dupuy），为法国工商部长。——译者

也将使中国人非常喜爱。那些动物是按照天朝人一般看到的模样或他们想象中的样子构思的,如果我们想打动广大公众的心,想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那就要用这些多少有点奇特的形象,用那些鲜艳夺目的色彩。我深信,把这些形象复制在标签和用法文及中文撰写的广告上,再加上中国式的装饰图案(我打算在寄第二组图画时附上一些边饰图样),将大大地有助于使用这些图案的商品的销售。我给本地商人看过这些图,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

我仅仅需要补充说明,我们的工业家在选择的时候还应该有所区别,他们看中的图案应该尽可能适合于他们想要推出的产品,只有这样,这种新型广告才能充分产生效果,并成为最有渗透力的经销代理人之一。

(2)可作法国产品商标用的中国画

迪布依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 年 8 月 31 日,巴黎)

承蒙您在 8 月 21 日的急件中给我转来法国驻芝罘领事的信和他寄来的可用作法国出口远东产品的商标和标签的五十幅中国画。

我谨向您报告这些转来物品均已收到,我已委托国家外贸局把这些图画供我出口商使用,并由《政府商业导报》发表一个通知告诉出口商们可以前来查看。

另一方面,我赞扬了业国麟先生的创举,我认为,这个创举完满地实现了他在前几份报告之一中提出的旨在促进我国产品在远东销售的建议。

140. 订购火炮的情况

藩苏纳致外交部

(1909 年 9 月 14 日,北京)

藩苏纳先生给部里转来中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译文,报告内容是 1908 年 12 月对克虏伯和克罗索的火炮装备进行的比较试验。

这份报告出自完全倾向于克虏伯的军官们的手笔,细细指明了施奈德①装备的缺点,而矢口不谈克虏伯装备的问题。然而我国山炮的优越性是那么突出,调查委员会对此也无可否认。但是克罗索公司应该了解,受命作出取舍的中国人并不是从技术方面的原因来作决定的。

关于摄政王的兄弟、负责组织陆海军的载涛和醇亲王的品行,外间有些令人不快的传说。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克虏伯公司准备使用一切办法排斥它的竞争者们。

① 施奈德(Schneider)。——译者

再说，我国代办不能完全肯定克罗索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德国的“比埃尔费尔茨和孙洋行”①是否忠实地在为我国利益效劳，他甚至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孙促使我公使馆采取某些他最清楚的不谨慎行动，这将是严重地危害克罗索公司的机会的行动。

潞荪纳

〔外交部　No241　（机密）（保留）〕

141.《泰晤士报》对远东及澳大利亚事务的态度

康盘致外交部

（1909年9月23日，伦敦）

最近几个月来，《泰晤士报》改变了它以前在远东事务，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各次争执中所保持的态度。它直截了当地作出这种骤然之变，其情况与导致它在对澳大利亚的国内政策方面的另一个变化的情况相似。

在远东问题上，这家伦敦报纸开始完全放任它在北京的记者莫理逊②自由处理，他的看法一般都被报纸所接受。莫理逊先生是一个亲华派，在直接关系英国人利益的阀门门铁路事件中，他明显地表示了反对日本的态度。《泰晤士报》在来自日本的、肯定得到英国外交部同意的建议下，今年春天，派它的国外部主任恰洛尔③先生对远东形势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使这家报纸从捍卫中国的观点而转变为捍卫日本的观点。

这个变化的原因已由恰洛尔先生在一组有趣的、题为《中国问题再审》的文章中加以阐明。这些文章是他从北京发出的通讯的补充，他在通讯中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德国人的阴谋诡计、英国金融家在中国铁路事务中的软弱和愚蠢。文章的见解得到《泰晤士报》“领导者们”的赞同，但却引起了“港沪公司”的经理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恰洛尔先生和他的报纸放弃捍卫英国的真正利益，金融家们甚至不放过爱德华·格雷爵士，尽管无从证明爵士曾插手《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对澳大利亚和远东所做的这些事，如果出现在另一份报纸上，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对这个过去特别重视自己的独立性的出版物而言，便是史无前例的了。我们记得在《泰晤士报》总编和英王大臣们之间、在德拉奈④先生和格兰维尔⑤勋爵之间来往的信函，可以表明那时英国内阁对这家大报产生的影响甚微。

我们刚才提及的两件事情并不证明《泰晤士报》已丧失了它往日的地位，但请大家注

① 比埃尔费尔茨和孙洋行(La maison allemande Biel feldt and Sun)。——译者

② 莫理逊(Morrison)。——译者

③ 恰洛尔(Chirol)。——译者

④ 德拉奈(Delaney)。——译者

⑤ 格兰维尔(Granville)。——译者

意，有趣的是，这些事情是在该报的财政改组之后，自从诺斯里夫①勋爵（《每日邮报》的）当上了它的领导人之一以后产生的。

保尔·康盘

〔外交部 No313〕

142. 9月4日中日协定和日本在高丽和满洲的处境 热拉尔致外交部

（1909年9月29日，东京）

9月4日在北京签署的中日协定在中国和俄国都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动，这种不安表现在两国的报刊上。但事情并不只是引起波动而已。

中国方面，在谈判期间及在签订协定后半个月里，中国政府都努力进行了遏制，不无成效。遏制首先通过报界进行，政府要求报界观察最深沉的沉默，接着要求报界注意舆论和各省已准备动用常规军的反对、注意抵制活动。

9月4日协定引起的苦恼和忧虑在俄国表现得最为自由。日本政府已经明白，在这方面，以安定人心为好。

不管9月4日协定在外表上造成了怎样的印象，日本政府已准备在预定期限内执行这些协定。它已采取措施，准备用总领事永泷久吉先生代替原驻扎在间岛的外交代表。永泷久吉先生至今一直是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新领事将同驻扎在间岛指定的四座城市里的副领事或领事代理人一起，监督有关这块土地开放问题的各个条款的严格执行，监督执行关于侨居当地的高丽人的"条例"。9月4日协定中有关满洲的条款，除牵涉到矿业问题者外，还不要求即刻采取执行措施。至于从奉天到安东建造铁路问题，部里知道今年8月19日奉天备忘录中所规定的有哪几点。日本政府当即请南满铁路公司与当地政府商议购买土地和实施工程。至于该铁路本身的运行线，为此而任命的日本和中国的专员在胜乡屯②和奉天之间这最后一段上还未能达成协议。另外，两国政府以后还必须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便是从安东到奉天的铁路本身经过的土地上的管理和治安。

热拉尔

〔外交部 亚洲处 No132〕

---

① 诺斯里夫(Northcliffe)。——译者

② 胜乡屯(Cheng－Siang－tun)。——译者

143. 1909年9月4日中日协定第二款
藩苏纳致外交部
（1909年10月21日，北京）

1909年9月4日的中日协定关于划定中国和高丽边界的第二款规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向外商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

中国政府刚告诉我代办说，这一条款将于明年11月2日起生效。在上面提及的各城镇里，除一处外，为外国侨民保留的土地均已划定。然而，在百草沟，此类措施一条都还没有采取。百草沟所处的地区几乎荒无人烟，寒冷季节到得很早，以至于今年已不可能建造任何工程了。

藩苏纳

〔外交部　No283〕

144. 煽动者孙逸仙
法国驻华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年11月10日，北京）

阁下已经得知孙逸仙对所谓改革的谋划。几年来，孙在华南各省策动反对满清皇朝的风潮，为此，他一直在寻求列强的支持。此人在中国巡警的追逐下到处避难，先后到过具备下述两个条件的所有地方，一是这个地方须临近他想要采取行动的地区，二是这个地方属于外国的司法管辖区，能保护他免受其出生国当权者的迫害。

这位阴谋家在英国殖民地得到过长期庇护。然而，英国政府或者由于了解到孙逸仙的努力纯属无效，或者由于担心从前因康有为在新加坡而引起的纠纷再度出现，要求孙离开香港。过去一直为孙提供可靠庇护的日本最近也向他表示，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容忍他的阴谋活动，请他离开日本国土。

因而，孙逸仙在香港停留后即前往西贡，他很可能再次要求堤岸①区侨民给予他慷慨帮助，这个地区的侨民曾为他提供过巨额援款，再说他访问我们的殖民地也不是第一次，约莫两年半以前，他同我驻香港领事馆主管人和印度支那总督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会谈后就曾到过河内。他当时是来请求允许让他们运给广西叛军的武器弹药自由通过东京地区。他没有受到他所希望的接待，因为博先生告诉我说，我们能够给这个人的只有人身保护，这已经是帮了他很大的忙了。所以他这次又到我们这儿来寻求庇护。然而，也许他的

① 堤岸(Cholon)，在越南西贡附近。——译者

日光看得更远，因为我知道他曾在横滨会见印度支那的一位显要人物，此人新近在远东旅行。他们的会晤还是被日本官员得知，后者急忙把此消息通知中国当局。同样，他在经过香港的时候同布加卑上尉作了一次会谈，上尉已同孙逸仙的好几个追随者有所联系，而中国政府对此也一清二楚。上尉用的是某情报处的名义，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接到部里的任何通知。

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为某个人所牵累是毫无益处的。这个人虽然在一定时间里还曾得到过许许多多他的南方同胞的好感，然而现在却瞧着他的会员人数日渐减少，同时财源枯竭，开始时相信他的人对他的信念也在减弱。

再者，即使他有些成功的可能，我仍然觉得同他保持关系是不谨慎的。正如博先生所十分清楚的，我们不仅有可能投入一场结局未卜的冒险，而且，首先是让我们的对手们占了便宜，而我们自己却一点儿好处也得不到。最后，孙逸仙受到中国间谍的密切监视，北京对他的一举一动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便足以引起皇朝政府对我们所要求解决的大量事务作出无诚意的表现，它完全可以认为我们在支持旨在反对它的阴谋。

因此，在对待孙逸仙的问题上，我只能赞同博先生以前所采取的态度，并向阁下转达上述对任何结局都有用的情报。

〔法国驻华公使馆　政务司　No166〕

145. 中国的铁路贷款

财政部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年11月24日，巴黎）

巴黎证券经纪人协会理事于11月23日一信中通知我说，理事会已宣布，基本上同意交易所的现金和有期债券转让，二万五千份五百法郎的债券，相当于中国皇帝今年8月13日诏书批准的，为完成京汉铁路而借的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利率5%。这是继1898年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后的又一次借款。

这些证券将登入交易所牌价表的第一部分。

在对证券经纪人理事作出回答之前、在财政部门对这一事务将作何决策尚未可预测的情况下，我谨请求您告诉我，所提议的措施从外交观点来说，是否会引起你们方面的异议。

同函附上颁发的有关文件及简要说明。

〔财政部　商务裁判司　商务处　No191〕

附：

(1)1905年利率为5%的一千二百万法郎中国贷款遵照中国皇帝陛下1905年8月13日诏书发行

此诏书根据外务部提议，批准直隶和湖北两省总督、商务部及中国铁路公司总理盛宫保大人呈递的奏折，奏折内容是为完成京汉铁路及其分岔的修筑而缔结的一份合同。

除中国皇朝政府的总债券外，本贷款全部证券均以对利率为5%的1898年贷款归还完成后的京汉铁路、包括卢沟桥到北京的延伸线和分岔的经营纯收益作为担保。这次贷款按照利率为5%的1898年贷款合同和所附经营合同中的所有条文及条件办理。按照这份经营合同规定，负责该铁路及其分岔的经营业务的中国铁路筹划公司将从经营纯收益中扣下必要金额，以便在期限前半年、至少三个月就保证首先能偿付1898年的5%利率贷款，继而能偿付1905年的5%利率贷款。

1905年的5%利率贷款用于完成京汉铁路及其分岔的修筑。

这次贷款以二万五千份五百法郎的债券的形式出现。

这些债券年息为二十五法郎，每半年，即每年3月1日和9月1日各偿付一次。

债券将通过抽签的办法从1909年起开始偿付，二十年付清，票面金额与市场价格相等。第一次抽签将于1909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举行，同年3月1日第一次偿讨。

中国皇朝政府绝不在1907年9月1日前增加分期偿付次数，或偿付全部贷款，或进行折换。

偿付利息和证券将在下列单位进行：

巴黎：

巴黎和荷兰银行，昂丹路3号。

法国工商促进总会，普罗旺斯路54号。

巴黎国立贴现银行，牧女路14号。

法国工商业银行，布德罗路9号。

巴黎联合银行，肖夏路7号。

布鲁塞尔：

比利时总会

巴黎和荷兰银行

全部债券均永远免交目前和将来的任何中国捐税，中国方面也不得作其他任何提取。

巴黎和布鲁塞尔交易所官方牌价的批准手续将予办理。

(2)北京合同的节录
(1905年8月13日)

第二条:这次贷款按照利率为5%的1898年6月26日签定的主要贷款合同和所附经营合同中的所有条文和条件办理,尤其是有关利率、期限、分期偿还等问题。

第三条:这次贷款同前主要贷款一样享有中国政府的担保,而且,有提取偿付1898年主要贷款的必须金额后的京汉铁路经营纯收益,包括属于同一经营的卢沟桥至北京延伸线和一些分岔的经营净利作为特许担保。

(3)致中国铁路筹划公司
(1905年9月27日,布鲁塞尔)

先生们:

我荣幸地告知诸位,外务部于8月18日致函国王派驻北京的公使馆,该函云,8月13日,直隶和湖北两省总督、商务部和盛宣怀奏呈皇上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补充贷款的合同。这项贷款的票面总额为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将用于京汉铁路末期工程。

同一天下达了一道圣旨,钦命按所提议的办理。

按合同第八条规定,外务部电告中国驻布鲁塞尔公使,命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签署二万五千份贷款债券。

致以崇高的敬礼!

德·法弗罗①

(4)中国铁路筹划会
(1905年9月30日,巴黎)

外交部领事和商务处荣幸地告知中国铁路筹划会,鉴于比利时驻北京公使提出的要求,外务部已于1905年8月13日向法兰西共和国驻北京公使发出贷款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有关京汉铁路末期工程的通知。

特奉命告知。

商务科科长　J.德·卡佐特②

① 德·法弗罗(De Favereau)。——译者

② J.德·卡佐特(J. De. Cazotte)。——译者

(5)简　介

用1898年利率5%的借款修建的京汉铁路干线最近竣工，这条铁路线的修筑以黄河大桥落成作为它的结束。

尽管遭遇到异乎寻常的困难，这一长达三千一百米的引人注目的桥隧工程完满结束，完成了全长一千二百六十八公里的铁道线。

南北两部分联到了一起，只等定于11月12日举行的正式通车典礼，便将在全线开始营业。

然而要使全线臻于完善，尚须完成各种工程和建造一些分岔。中国政府为向中国铁路总公司提供建造这些工程和分岔所需的资金，决定设立一项利率为5%的公债，票面总额为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

这项由国家直接典押的公债，其证券有京汉铁路及其分岔为专项担保，1898年公债息金偿付后净收益同样作为对这些证券的专项担保。

从现在起，此铁路南北两部分经营的盈余差额不仅要偿付1898年5%息率公债的利息，而且还应当留出比为偿付1905年公债利息所需的金额更多的盈余。负责经营业务的是中国铁路研究会。

实际上，1905年前七个月此项经营的盈余差额如下：

总收入	6704952.5法郎
经营费用	2298310法郎
净收入	4406642法郎

这与估计七百五十五万法郎的年收益额是相吻合的。

用一个尚未完成的铁路网，而且还只是部分地经营，便已取得了这样的盈余差额，那么，现在这条铁路线已向公众全线开放，充分发挥出它的运输能力，加之它经过的那些富裕的省份，这无疑将获得更大的盈余。现在的盈余额已经超过了最初估计的数字。而全线的生产能力使我们相信，目前所取得的、用于偿付两项借款的利息的盈余额，将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中国铁路研究会

(6)中国借款问题

法国驻英国大使馆致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

(1906年2月26日，伦敦)

内阁总理先生：

外交国务秘书刚刚私下机密地转交给我一份纪要，同函附上纪要抄件。

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我说，有一个法国财团与某英国财团联系，准备同中国洽谈一

笔二千万镑(约五亿法郎)的借款,这笔公债将由法国、德国和英国发行,由法国市场起主导作用。

在这笔总款中,有六百万镑(一亿五千万法郎)将规定用于赎回云南铁路的特许权,八百万镑(二亿法郎)用于发展农业的水土工程,还有六百万镑(一亿五千万法郎)为中国陆海军购买武器军备,最后这项将分别向法国和英国的工业部门订货。

鉴于中国政府对外国企业所持的态度,英国政府对目前向中国提供作如此用途的巨额贷款是否适当表示怀疑。他们希望知道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

英国外交部官员们的看法是,这项贷款是英法金融家们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局势如何是不够关心的,他们所考虑的首先是这笔交易能给他们个人带来多少利益。

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我指出他这一情报的性质十分机密。阁下如能告诉我应如何答复他,我将十分感激。

请接受我十分崇高的敬意。

(签字)

146. 华俄道胜银行的特别使命

乔治·路易[①]致外交部

(1909年11月27日,圣彼得堡)

目前华俄道胜银行的总稽核奥贝尔[②]先生最近被董事会指定担任上海分行的领导工作。本月27日,他出发赴任。

我国大使认为,我们实在不能不庆幸选择了一个能够为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作出最可靠保证的人。奥贝尔先生对远东事务十分熟悉,他不仅带着全体领导人的充分信赖,而且得到帝国财政部的充分信任,财政部认为他是能够胜任的。

奥贝尔先生在出发前曾告诉乔治·路易先生说,华俄道胜银行曾在巴黎与印度支那银行达成一致,将在可能出现的一切重大业务中配合行动。另一方面,为在华俄道胜银行和北方银行之间建立比它同印度支那银行建立的更为广泛的密切联合而举行的谈判,目前应处于比较顺利的发展之中。北方银行是法国工商业发展总公司的分行,1900年由威尔斯特拉特[③]先生建于圣彼得堡。这个联合为华俄道胜银行取得了目前希望得到的优势,当时它打算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合并。在现在的结合中,华俄道胜银行将保留它的名字和个性,然而又能在总公司的支持下,通过发行新证券增加它在目前处境下所必不可少的资本。

最后,奥贝尔先生提请我们的外交代表注意华俄道胜银行在北京设一个代理人可能

---

① 乔治·路易(Georges Louis)。——译者

② 奥贝尔(Aubert)。——译者

③ 威尔斯特拉特(Verstraete)。——译者

产生的好处。这位代理人将负责同中国政府保持最密切的关系，从而了解所有将审查研究的金融和工业计划。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理人，在奥贝尔先生的思想中，应是卡什那夫①先生的合作者和助手。他的存在和行动肯定将有利于卡什那夫捍卫托付于他的利益。再者，他还将尽可能经常地提醒有关人士，中国政府的利益和银行的利益是互为依存的，它们应当切实地联合起来。

乔治·路易

〔外交部　No352　（机密）〕

147. 中国青年的精神状态

德·马士理②致外交部长先生

（1909 年 12 月 25 日，北京）

我国驻厦门的副领事于 11 月 28 日给了我一份报告，同信附上报告抄件，我觉得该报告对部里工作有一定的价值。

正如陆公德③先生说的，所叙及的事件本身是很小的，但它却是对于中国公众的精神状态的一个判断因素，更因为学校青年今后将成为今年开幕的各省参政院、帝国政府和未来的议会中的主导人物，这一因素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国驻厦门的外交代表所提及的事实并不是孤立的。我国驻各地的领事都谈到了类似情况，我的同行们在内地的代表也都提请他注意同样的事态。我之所以感受最深，是因为我初来乍到。部里对此并非无知。然而，这种事态正在逐日激化。

"社会显要"和学校青年竞相表现蛊惑人心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这种情况不仅在广州存在。它使该省官方感到恐惧、使中央政权惴惴不安，宪法上的虚弱使这个政权在几乎是捣乱的舆论和"知识分子"对国家事务的日常干预面前胆战心惊。

我们驻广州领事馆的主管人和公使团在一些信函中分析了新闻界的那几份主要机关报。那些信件周期性地提请阁下注意持续不断地发生在广东和广西的骚乱、广州"自治政府协会"和学校青年的联合行动、自诩为新中国先锋的那些人随意散布的谣言以及那些揭露等等。至于印度支那对云南及与我殖民地毗邻的其他省份的所谓侵略政策，则每天都是这些揭露的内容。

所有被称为"边界的"事件，不管是在满洲，还是在蒙古、西藏、澳门，所有有外国政府或辛迪加介入的事务，铁路、矿藏、军用器材或航海设备的整修，尤其成为那些不合时宜的无礼表现的理由。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而这种民族感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对外国的仇恨，而不是对祖国的爱。

---

① 卡什那夫(Casenave)。——译者

② 德·马士理(De Margerie)，新任法国驻华公使。——译者

③ 陆公德(Lecomte)，法国驻厦门副领事。——译者

这种偏激的民族主义在其他地方也有，它在这里大多数时候是建立在对情况的一知半解之上。值得我们考虑的是，这种一知半解是否比一无所知更糟糕，因为它导致了虚荣心和盲目性产生，导致了对最卑劣的揭发和制造的乐意接受。官吏们为了免得揭发到自己头上而常常装出一种有时实际上并没有的热情，犹如陆公德先生提到的那样，这种热情并不会因此而少解决从前当场解决的许多问题，只是避免了一些不负责任的集团的僭越。

帝国的外务越来越成为官方害怕接触的问题。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至少会被指责为出卖国家。从与日本签订有关满洲事务的协定后和为划定澳门界限而举行的谈判期间，这最近几个月里，在外务部的梁敦彦和在香港的高而谦对此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一个盛行通过批评者们的报刊进行正式揭发的国家里，什么也不做显然是最不会招惹是非的态度。各种事务越来越不好解决，因为采取公正的立场或主张和解的结局，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普遍认为，我们的领事们的工作比过去更艰难了，而且，值得担心的是外务部的怯懦会使公使馆丧失一部分本来应能使用的方法，用以帮助我在帝国内地工作的代表们的方法。

马士理(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20〕

一九一〇年

148. 广州叛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年2月20日，北京）

广州当局在新军中发现由秘密会社“三合会”散发的，旨在推翻清皇朝、恢复明朝君权的革命揭帖后，为防止可能借中国新年之机发难的骚动，似乎认为必须解除各标的武装。各标官兵立即举行叛乱，他们烧毁营房，占领了广州的整个东部，并切断了当地与外界的联系。广州总督在与造反者人数几乎相等的巡警部队的帮助下，致力于恢复秩序，更因对手已被解除武装而显得他的力量强大。三百名叛乱分子被杀，六百名被俘，剩下的散逃山中。而巡警部队仿佛未受到任何损失。极易生事的广州居民显得有些纷乱，但欧洲殖民地的安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影响。

马士理

〔外交部　No48〕

149. 中国的事变和政局

(1910年4月2日31号函附件)

广州：三个标哗变

2月11日，驻扎在广州东面的燕塘的第一团和城市巡警发生了一次普通的争吵，结果导致了三个标总计二千军人哗变。士兵们杀死了他们的军官，开赴市区。市内很快进入防御状态，关门闭户，防御工事上好歹布置了满族士兵和巡警。同时，巧妙地将扎营城外的军队约四千人全部解除了武装，并用无线电向外求来援军。通讯联系自然变得十分困难。

2月11、12、13日，经三天浴血奋战后，叛乱已被控制住，至15日，叛乱最终得以平息。估计叛军方面被杀死三百人，而防卫部队方面死亡二百人。大量俘虏被砍头处决。叛乱分子中自动跑来求饶者得以活命，这是中国人方面独特的宽大。

反叛的部队是属于所谓“新军”的新型部队，它是按1908年圣谕建立起来的，士兵在地区招募。这些部队无任何纪律。中国人以为只要下一道圣旨，买一些武器，或从中获取与欧洲人一样的利益就可以了。这支军队没有任何责罚，没进行过丝毫训练。再者，它粮饷不足，从而产生在中国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应从这种不满中去寻找发生广州叛乱的首要原因。所以，这些部队对政府而言倒成了一种隐患。

这些骚乱在历来仇视欧洲人的广州市民中，并未引起任何排外情绪。仿佛广州百姓开始赏识白种人的好处了。

法国在广西的影响

尽管北京有明确的指令，官吏们仍对欧化试验表现出明显的反感。所以他们对处境艰难的外国教师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恶意。在库西柳①军校任教的法国教师皮里先生便是这样被解雇的。

广州纷纷传说将特许一家法国公司营造一条从北海到南宁的铁路。

直隶：东沟殖民地商行

东沟殖民地商行联合会发行了一笔一百五十万法郎的债券。这笔债券已有半数得到

---

① 库西柳(Kouci Liu)。——译者

认购,第一批款将用于清除压在联合会身上的抵押权、完成浮动设备的保险和建造一艘新的平底驳船。嗣后,湿坞将立即进入正常使用。

东沟殖民地商行的发展将包括:

1. 天津—牛庄沿海航线。目前这条航线上的运输业务由属于联合会财产的惟一的一艘汽轮"大肚子"①和一些临时租来的船只负担(冬季,"大肚子"行驶于北方不冻港和上海之间)。

2. 租下秦皇岛海军一部分场地,这个港口将成为冬季运输的起点站。

3. 用拖驳船在大沽至天津的已有河道上运送旅客,并将此项运输业务扩大到直隶其他可通航的河道上。

4. 使用本地区惟一的湿坞,它将能接纳上溯至天津的大部分船只。

5. 代理法国各家航运公司(运输公司和发货人)的贸易业务,它们在天津已有一家英国商号作代理人。

目前发放的债券成功后,海军不论对于支持法国在中国北方惟一的航海事业而言,还是从它难以为它的场地和东沟船只找到别的租赁者来考虑,它都有利可图。

另一方面,东沟守备军新近撤走,只留下二十人看管军用船舰。东沟殖民地商行联合会得知此撤退计划后,即将重新提出去年已提过的租用部分船只和军用场地的要求。这些场地对扩大它的锚地是不可或缺的。法国只有以军用名义占有的场地。在这一方面,它们与海军营造的租给联合会的建筑物的场地情况是一样的。目前由海军本身占用的那部分,除诊疗所,相反却是法国的地产,这是法国在 1906 年与俄国商人巴图也夫②签订卖契买下的。

各 种 事 件

中国的全国签名运动　人们议论得很多,将举行一次全国签名运动,要求保卫领土。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中国的宪法　北京允诺的宪法正在研究中。不久将召开上议院会议。首都人民对宪法仿佛都不很放在心上。

废黜达赖喇嘛　北京传说二万五千官兵将开进拉萨,达赖将逃跑。

中国海军

一个代表团刚离开中国,去欧洲代办订购战舰事宜。

英国将促使中国接受他们的两名海军顾问。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积极活动,仿佛就是

① 大肚子(Ta－Tou－Tze)。——译者

② 巴图也夫(Batouieff)。——译者

在为这个问题奔忙。驻北京的法国武官请求了解我潜艇最近侦察的情况，以便把这些情况告诉中国的某些要员。他认为，如果我们的船舶建造者们想给中国派出一些既有能力、又有必不可少的权力的代理人的话，他们将产生有益的功效。

秦皇岛土地

这个问题将由法国公使和中国工程矿务有限公司总代表纳逊①先生，以法国海军已接受的书面建议为基础，直接洽谈解决。

附上海军中尉德尔帕尔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150. 谋刺摄政王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 年 4 月 7 日，北京）

近日来，北京流传着有人谋刺了摄政王的说法。尽管与官方有关系的人士都在辟谣，公使馆收集到的情况却令人相信确有其事。再者，这条消息并不为中国公众舆论所怀疑。只是这一未遂罪的细节和肇事人的动机依然难以探明。好像是五六天以前，在摄政王府花园里一座小桥的桥拱下，发现一个烈性炸药筒。炸药筒是从开在围墙上的洞里送进宫去的，并且，至少可以这样设想，送进宫后，运到一个地方，再由皇室成员中的某个同党到那个地方去取。

在未发生新情况之前，这个犯罪行为究竟系革命党所作，或纯属个人报仇行为，尚不可能说清楚。中国政府近来采取的措施说明，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含糊的。目前，在中国反对满清皇朝的各个组织中，明显地流行着某种骚乱不安的情绪。最近，在京汉线上，抵达首都的前一站，发现有十二个人身上带着可疑的器械和煽动暴乱的揭帖，他们被逮捕了。这一事件后，警察局即在这座中国城市里进行了一系列十分频繁的搜查，并从那时起，对各个旅馆客栈实行了特别严密的监视。旅客们必须办理极其严格的身份登记手续。那天以前在宫内一直进行着的对从外国回来的青年学生的测试已经停止。最后，在江苏清江浦驻军中，3 月 28 日爆发了一次与我 2 月 20 日信中向阁下汇报的在广州发生的暴动相仿的军人造反。两个营的叛军几乎被南京派去的军队全歼。某种事态的征兆如此之多，足以说明行刺清皇朝政府首脑的想法并不属于那种不可接受的假设之列。

马士理（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107〕

① 纳逊（Nathan）。——译者

151. 广西骚乱
索西纳①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年4月25日,北海)

我谨向阁下报告,在永淳县(属南宁府)以及横州府新近爆发了骚动。这两个县城与钦廉地区毗邻,所以钦州郭道台向广西边界上最重要的据点派出了军队,以阻止叛乱分子进入钦州和灵山②。

暴动农民的数目估计可达一万余人。据钦州获得的消息云,叛乱分子和官兵之间曾发生过数次战斗,官兵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暴动原因当归于对这个地区已经十分贫困的农村人口抽取新税的问题。

赋税分配极其不平均。在某个县里,某些土地产品或工业产品被课以税款,而同样的产品在邻县却免税。而且,在同一个县里,对某些作物收税,而对另一些又不收。从而造成一种持续的不满情绪,而每当税收制度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便往往变成暴动。再者,在军队中、尤其是在广州派出的部队中发生了多起逃跑事件,这些逃兵在他们短暂的军伍生活中,只记住了火枪的使用方法,他们除了当强盗别无谋生之路。在这些乐于利用一切抢劫机会的逃兵中,声望正盛的叛乱农民很容易从他们中获得所需的支持力量。

几天前,北海传说在玉林州发生了同样性质的暴乱。

我不会忘记将我获得的有关广西南部骚乱问题的确切消息报告阁下。

索西纳(签字)

〔法国驻北海和东兴副领事办公处　亚洲处　No12〕

152. 中国对法国进出口贸易表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年4月26日,北京)

阁下在去年11月8日的第6号通报中,要求公使馆在今年第一季度给阁下一份按新指令撰写的有关中国外贸的报告和一份近五年来中国进口的主要法国产品表。

尽管我主观上愿意严格按上述安排办事,公使馆却不可能在年底前发出年度商业报告,因为帝国海关政府要到被看得很重要的年度结算后六至七个月才发表统计资料。

因而,我只好在此满足于把中国从法国进口的主要商品表和它的出口商品表,以及近

① 索西纳(Saussine),法国驻北海副领事。——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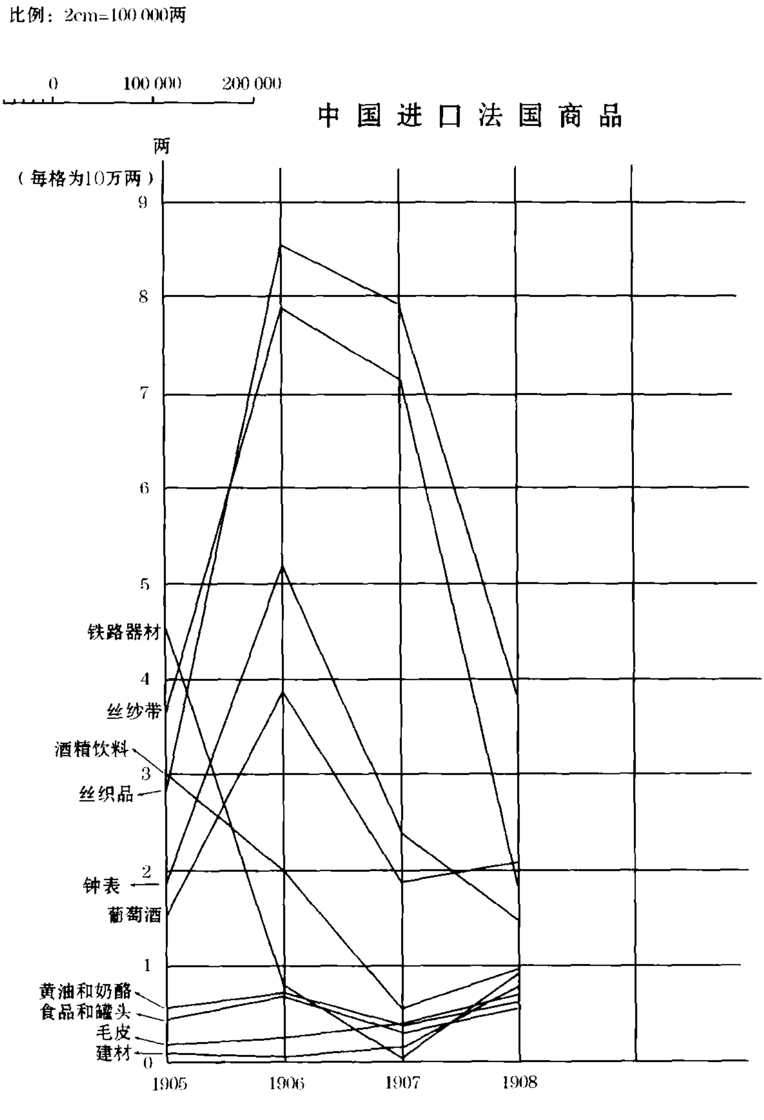
② 灵山(Ling-Chan)。——译者

四年来进口法国商品的变化图寄给阁下。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理由，我们在 1909 年的交易数据要到今年年底才可能发表，届时我将把这些数字立即呈报部里。

马士理(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27〕

(附表三份)



从法国出口

物资名称	海关两价值			
	1905	1906	1907	1908
丝织品	281432	849658	784403	392856
葡萄酒	367741	392383	195017	208606
丝纱带	351819	801562	724507	192107
钟表	192272	528920	244248	149267
铁路器材	454315	83320	7549	90259
建材	9828	7434	21530	81336
毛皮	15474	21705	44096	74460
黄油和奶酪	63741	73116	47756	65740
酒精饮料	302984	215596	42801	64321
食品和罐头	49164	74129	42853	56052
机器	2061	14550	29411	54464
家具	5588	12161	20139	38221
伪称意大利棉织品	165163	35678	25857	36955
各种棉织品	248	17658	2334	32174
车辆,自行车	9908	10955	9372	31410
留声机	2108	382	2252	29362
衣帽	17017	14554	20007	22092
服饰用品	36394	39324	17260	20650
染料	11247	11579	46538	18399
毛棉织物	3339	6183	3691	18266
素色斜纹棉毛织品	602	30516	68805	29954
矿泉水	8955	6256	12423	15352
香烟	18906	26455	36649	15107
其他染料	71	13910	4848	14652
仿真珠宝	17627	22001	57687	14185
其他	……	……	……	……
总计	3811634	4281674	3158626	2403458

向法国出口

物资名称	海关两价值			
	1905	1906	1907	1908
丝厂生丝	4755513	6027783	7239592	7682266
草编	3757286	6012658	7294691	6208009
白色生丝	972125	2670459	2903738	3896118
柞蚕生丝	3002288	2139097	2534025	3406800
芝麻	200372	1573050	645466	1570717
绿茶	214339	418061	621432	1230749
丝废料	1280841	838785	1653405	994721
茧绸	202041	399793	1032055	985844
生牛皮	725126	967508	1830852	732622
黄色生丝	807678	878578	764414	652307
蚕茧废料	392896	305443	410338	573127
猪鬃	259342	239611	254936	423995
菜豆	20	9	6876	356635
蚕茧	282228	21028	159464	330363
麝香	159968	326253	385538	317961
鞣制皮革(羊羔)	215704	82381	315472	282351
锑	67869	139288	78866	268499
绸缎	84754	56717	144801	240627
苎麻	10305	24266	273414	230993
红茶	136169	217625	186778	214131
樟脑	……	1904	35629	209492
生羊皮	261515	151756	182062	195819
其他	……	……	……	……
总计	18872233	25358964	30658585	32129193

153. 1910年前三个月在中国发生的混乱和骚动

《顺天时报》摘要

（1910年4月26日）

1. 广东新军暴动。
2. 苏州新军骚动。
3. 贵州叛乱。
4. 浙江叛乱。
5. 福建革命者发的宣传。
6. 安徽庐州骚乱。
7. 贵州兴义府骚乱。
8. 江苏宜兴县骚乱。
9. 贵州土著部落暴动。
10. 清江浦(江苏)两营新军哗变,开炮平定。
11. 浙江因鸦片问题引起骚乱。
12. 江苏各米店被抢。
13. 广东的革命阴谋。
14. 福建的革命阴谋。
15. 高邮因盐税引起的骚乱(江苏)。
16. 江西青红帮抢劫。
17. 四川土著部落暴动,镇压无效。
18. 巡防队对"红胡子"之战(满洲)。
19. 广州哗变,三标新军遭到巡防营屠戮(广东)。
20. 贵州毁校。
21. 黑龙江畔兴华县暴乱。
22. 江苏被遣散的士兵行劫。
23. 杭州骚乱(浙江)。
24. 清江浦(江苏)因盐税叛乱,被军队镇压。
25. 山西因鸦片问题叛乱。
26. 泰州(江苏)因清查问题叛乱。
27. 江西革命阴谋。
28. 云南革命阴谋。
29. 吉林"红胡子"入侵(满洲)。
30. 长沙和整个湖南的骚动。

154. 中国的骚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 年 5 月 6 日，北京）

发生于湖南的骚乱没有在报刊上引起与它们的重要性相称的评述。各报显然遵从一个口径，即在事件开始便对此保持缄默，接着又竭力减轻它的严重性。现在，它们又把全部过错都推在该省抚台身上，仿佛他本应支持大米的囤积。《北京日报》写道："该员之无能和贪婪将使中国付出昂贵代价，因为尽管这次运动的矛头未曾直接指向外国人，中国政府却肯定须得赔偿他们所遭到的损失。"

这次事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某种不安，并曾一度使它担心对这些事变并非完全陌生的革命者乘机再次兴风作浪。到处都能看到一些革命的宣传比以前有增无减，这仿佛使能说明那些担心的理由。4 月 18 日《中国报》披露，在四川新军中发现好几名革命党人。4 月 22 日《大公报》报道，在广西新兵中逮捕三名革命党人，他们已按总督命令被立即砍头处决。该报补充说，他们大概声称他们的党已完全组成，并准备行动。即使是在北京，警察也抓住了好些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开了一个照相馆，作为聚会的地点。警察在那里搜出了制作炸弹所需的工具。按摄政亲王的旨意，这些人未受到折磨，在审讯中甚至都没有强迫他们下跪。他们没有被判处砍头，只是判了无期徒刑。不过他们也很顺利地供出了他们的计划，某个似乎是他们的头领的姓汪的人宣称："我们打算投放炸弹，那倒不是因为我们对摄政亲王特别仇恨，而是因为中国和所有的官员都麻木不仁。不时地给予诸如此类的小小震动，可使他们略为振作和加快改良运动的步伐。"报界对摄政亲王表现出来的宽厚大加赞誉。《北京日报》写道："那些革命党人其实不该作为普通刑事犯处理。他们的荒唐行径说穿了只是某种本身尚值得赞扬的爱国主义的神经质表现。当然，消灭革命党的最好方法仍然是消灭不满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在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这件事看来令人感到奇怪，那么看到那些新军是在他们的长官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关心政治的，这就更令人惊愕了。我曾向阁下汇报过在湖北发生的反对租借粤汉铁路的运动情况。武昌的士兵成群结队参加抗议集会。他们在集会上讲话，显得比任何人都激动。《北京日报》(4 月 5 日)肯定说，代理总督来电，提及如不满足该省代表的要求，军队将制造骚乱。于是，政府作出了让步。如我另外述及的该省代表凯旋而归，汉口几千人前往迎接，大街小巷悬挂彩旗。如我们所知道的，湖南百姓受这一先例的鼓励，随之也提出要求自己建造穿过本省的那段铁路的权利。四川人不甘落后，他们也激动起来，声称他们反对为建造四川铁路向外国借债的任何决定。他们说："我们比湖北人富裕，湖北人没钱；政府为什么对我们不一视同仁？"他们也准备派代表赴京。

就在湖北人提出抗议的时候，只有梁士诒表现得比较坚决。当其他官员都退却让步，至少也说了一些好话的时候，梁却始终如一地绝对不接见代表，并不断地明确表态赞成借外债。为此原因，他成了中国报界最强烈攻击的众矢之的，他的态度着

一点导致他失宠。

马士理(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144〕

155.中国的形势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10年5月6日,上海)

长沙事件曾在上海引起一些情绪波动,但没有导致任何意外。再说,人们也并不去讨论这些严重骚乱究竟是陌生情绪的一种反映,或者是仅仅因为地区性的不利情况造成的,尤其是因为饥荒的官员们办事无能造成的。人们只是觉得,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没有多大的变化,中国民众的排外远没有被帝国政府和它的官吏们所制止,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而使排外越来越严重。上海的很大一部分官员对与他们无直接关系的事情确实是漠不关心的,因远方的骚动而感到忧虑的只有那些使团、领事和几个批发商。

对这些人说来,目前江苏和邻近各省的形势很难使他们放心,尽管湖南事件的反响也不过如此,就像一些无关紧要的混乱在我们身边爆发,却几乎可以说是未被觉察便过去了。在江苏北部,饥荒再度猖獗。这个地区的军事重镇清江浦,大运河上的工业中心宿迁和建议向国际贸易开放的港口海州,这些地方的疯狂民众威胁要毁坏一切。官方开了枪才使他们住手。仅仅海州一处,包围政府粮仓的穷苦人数达四万之多。离长江南岸不远的泰州,当前官府进行的清查被作为一次暴动的借口。千余间房和好几所学校被焚,官员们无法制止。

在浙江,绍兴附近的上虞和宁波附近的慈溪,出于同样的理由爆发了骚动。骚动之后又抢又烧,使这个地区的八所学校遭到毁坏。人们指控官吏欺压百姓,由于官吏们声称增加税收为建设和维持新学校所必须,民众的愤怒便普遍地转向那些学校建筑。另一方面,用欧洲方法训练起来的军队的无纪律构成了当局新的忧虑。不久前在苏州和清江浦发生了哗变,这几次哗变程度没有广州变乱那么严重,但这两个地方却是长江下游的两个最大的要塞。省府当局一反往常只知应付燃眉之急的常态,它终于关心起济贫救灾的事来了。总督和江苏巡抚下令购买三十万石大米,它们将储存在南京和苏州。另外,将从苏北作为年贡发送的谷物中留下十万石。并还将在南京收集二万石,备作今年夏天将在那儿举办的展览会之用。很有可能,这些粮食将由外国人提供。收成惟有安徽和江西为好,然而这两个省的巡抚担心准许出口大米会招致他们的居民们不满,直至如今,江苏的同僚都还未使得他们采取这个出口的措施。在饥荒闹得最凶的苏北地区,有人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宣称中国将被瓜分,说德国和日本将把最大的部分占为己有。这些传闻又演变出了一种新的说法,说是美国的干预挽救了中国,于是在这个国家里,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外交部 No40〕

156. 湖南骚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 年 5 月 19 日，北京）

在今年 4 月 18 日的第 116 号急件中，我曾向阁下报告了我接到的有关长沙骚乱初步情况的汇报，并告知阁下我已电令阿尔及尔号上溯至汉口，要“杜达尔・德・拉格雷号”① 驶赴现场。

此后我从各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情况，均肯定了我已向阁下提及的那些事实。

骚乱的偶然原因正是米价上涨，十分不正常的、完全是因为投机倒把而引起的上涨。实际上，该省年成不错，还余有相当多的粮食。4 月 13 日，在几小时里，大米每斤上涨了好几文钱。晚上，群众聚集，试图抢劫一家米店。警察局竭力要恢复秩序，逮捕了几名示威者，这一措施使众怒更盛，他们要解救被捕者。巡警道台赖承裕受了致命伤，警方顶不住了。人数剧增的群众在凌晨三点许涌向总督衙门，进行谈判。总督的答复未能令他们满意，群情更为激愤，卫队的抵御软弱无力，各门被攻破，衙门被占，几名最冲动的带头闹事者浇上几桶煤油，火烧外衙。巡抚逃走。

自这一蠢举后，一部分闹事者分散在城里，动手抢劫粮商，另一部分，但也只是少数，怪罪外国产业，抢劫、洗劫和焚烧传教士住地、外国商号和商店，他们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完成这种破坏行为，无人出来制止。阁下可以在 4 月 23 日外务部向我递交的一份急件中看到附有的遭到破坏的外国机关企业登记表。

不过，外国人全都平安无事。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在夜间逃到停泊在港口的船舰上躲避起来了。闹事者向船舰抛掷了不少火把，但都未丢到这些船上。

按照最初的消息，军队和闹事者之间展开了最激烈的斗争，据说双方各有百余人死亡，巡抚已被杀死。这些报道并不确切。相反，奇怪的是军队和巡警方面并没有进行什么抵抗，他们对群氓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对欧洲产业的抢劫和焚烧只是百余人所为。最多也只有十来个人纵火焚烧天主教传教士住所，而在离那儿很近的地方有一名武官和他属下的士兵，他们竟任之从容行事。确实，正如开始时所说，军队并未与闹事者采取一致的行动。在他们长官的命令下，一开始，他们还曾向闹事者放过几枪。就在此时，该省的财务官、职位仅次于巡抚的布政使插手其中，这一事实性质严重，今天仿佛已得到了绝对肯定的证明。巡抚躲了起来，布政使责备和禁止军队行动。并且，为了更明确地表示他的旨意，他下令砍了两名曾经开枪的士兵的脑袋。因此，闹事者能肆意行动便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了，他们以为可以这么想：军队就内心深处而言与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曾有一时担心骚乱会蔓及全省。幸亏后来一点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湘潭附近

---

① 杜达尔・德・拉格雷号（Doudart de Lagrée）。——译者

曾爆发过一些骚动，官兵立即被派往当地予以弹压，三名煽动者被捕和砍头。益阳群氓试图抢劫政府银行分行，当局抓住了主要肇事者，并立即执行了死刑。这一果断行动便足以恢复秩序。然而，该省还远不是平静的，一个月来，不断流传着各种凶险的传闻，人们总在担心哪一天会在某一点上爆发骚动。

岑巡抚至少表现出了他的无能和怯懦，他当即便被革去了官职，由湖北的布政使杨文鼎代替他的职务。然而显要们不欢迎这位命官，他不得人心，老在抱怨他完成使命的难处。金库空虚，他很难组织以正常价出售大米。巡抚已下令先从上海关关税和鸦片税中提取三十万两银子送去，但这是不够的。

运动的主要矛头并不是专门对外国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立即转而反对外国人。

湖南百姓是中国人中最"民族主义"的百姓之一。他们的民族主义首先反对的便是外国人，一般来说他们比帝国其他地方的百姓更不易容忍外国人。这种"民族主义"甚至还被用来对付其他省的中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湖南人今天还在声言，要对毗邻各省的中国人关上湖南的大门。

长沙尽管是对外国贸易开放的城市，在不敢违抗民情的当局的配合下它的居民依然排外。建立实际上属外国人的机构，外国人购买或租借地皮房屋在城里是如此难以办到，以至这类性质的交易实际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即使是在城外的土地上和江边，中国官方想要建立与当地人完全分开和无关的机构的地方，居民们还要制造障碍、百般阻拦外国人的定居。外国人请来建造他们的住处的湖南泥水匠就已形成了这样的"破坏"习惯，那些房子建成后人刚住进去，它们就变质，出现严重损坏。所以外国人渐渐地去找湖北工人，从而在长沙人中引起了强烈的怨恨。考虑到苦力中最贫困者的不可思议的敏感，一旦发生骚乱，这种怨恨问题就严重了。

这种形势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待外国建筑物的方式。

第一天，饥民闹事，他们没有一定的计划，受感情的驱使行事。我们感到那是一场已过去了的愤怒的运动。受到攻击的传教士住处门窗被砸破了，这里那里放上把火，并非要它烧掉什么，不着也就算了。

第二天它便使人感到是有计划和有领导的了。他们的行动并不简单地随怒气的爆发和平息而起落，而是出于破坏的目的。烧便烧个彻底，只有受得住的墙壁没垮。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破坏产业时区分得十分清楚。由欧洲人建造的建筑遭到完全的破坏，对租来的房屋他们满足于使之受些损坏，中国人的产业则保留下来。例如他们对日本轮船公司便只是轻微触及，做个样子，因为富裕的中国显要与这家公司有利害关系。

这便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天强烈的饥饿表示如何从第二天起变成了反外国人的闹事。这次闹事由一些出现得恰是其时的人领导，事实上虽未受到官方鼓励，却也受之容忍，因为当局拥有几千士兵却按兵不动。

据来自日本方面的秘密情报、逐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的情报说明，长沙骚乱和威胁湖南另一些地方的骚乱并不纯粹是地方性的。在闹事者中，人们肯定地说已发现有来自山东、安徽、江苏和湖北的人。不久前，有人还指出其中有二十多名属于会党的煽动者在秘密活动。好几个寄居长沙的欧洲人早就接到警告说有人待机要把他们赶出湖南。最初几

大的骚动过后，当外国人第一次试图返回城里时，到处都贴着反对他们的告示，巡抚还向英国领事声明他不能保障欧洲人在省内的安全。这类事件表明，对外国人的仇恨始终是那么根深蒂固。而如果说十年时间已足够使中国人忘却1900年的事变，那么欧洲人对此保持记忆却不无益处。

"杜达尔·德·拉格雷号"炮舰的出现产生了最良好的效果。大家都因看到它如此迅速地赶到现场而感到惊讶。我们的炮舰用一百二十三小时完成了它的航程，其中还包括三十四小时中途停靠时间。德国炮舰"伐泰朗号"①走完同样路程用了一百八十小时。人们更为惊讶地得知另一艘这么大的军舰竟能在这个季节里一直上溯到位于长沙上游八十公里的李家淀②。这在老百姓和当局身上产生的影响是极微妙的。在这种情况下能让三色旗出现在那些人们从来没见到过任何外国国旗的地区，我以为，那确是件很好的事情。我很高兴地看到冉森③舰长为完成我交付于他的使命而表现的诚意和干劲。他与英国代表们之间互相十分谅解。在同中国当局的谈话中，他十分恰当地指出自己奉命使我们的侨民得到尊重，并且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的话，帮助所有的其他外国人。

阿尔及尔号从另一角度发挥作用，它在汉口停留了几天。它的在场有效地使大量欧洲人得以放心。尽管有总督采取的安定措施，由于外国人的金融活动在湖北已引起恼怒，他们不无忧虑。我们的巡洋舰继而驶往九江、芜湖、南京，我觉得这也是有益的，因为那里的局势也不明朗。阿尔及尔号过后又返回汉口。在这个时候，海军上将卡斯特利④到达上海，他把阿尔及尔号临时召回那个港口。然而我们这个分舰队的司令告诉我说他将给这艘战舰留下明确指令，让它仍受公使馆支配。

另外，此时在汉口有十艘战舰，包括德国的一艘大巡洋舰"纽伦堡号"。

继续采取预防措施有备无患。来自长沙的最新消息重又令人不安。从"杜达尔·德·拉格雷号"舰长最近的报告中，阁下将看到形势依然很不稳定，因为外国人在那里居住五星期后，重又想离开这座城市。我日本、英国、美国的同行接到了类似的情报。美国同行把他从南方旅行回来的武官急急派往长沙。岳州（在长江边，长沙那条河的入口处）海关特派员昨天从他那方面给阿格兰⑤先生发来了悲观的消息。城里将宣布革命党于5月29日暴动。今天已接到通知说，与汉口的电报联系重新中断。

在这种情况下，我已同意我们在那座城市里的领事把"杜达尔·德·拉格雷号"仍然留在长沙。由于水位上涨使快艇逆流上行比较困难，我曾认为可以允许它返回重庆。

马士理（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

① 伐泰朗号(Vaterland)。——译者
② 李家淀(Li－Kia－Tin)。——译者
③ 冉森(Jeanson)。——译者
④ 卡斯特利(Castries)。——译者
⑤ 阿格兰(Aglen)。——译者

157. 中国外务部的法国事务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 年 5 月 24 日，北京）

在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处理中，不只是英国公使馆要埋怨中国政府缺乏诚意。为蒙古和满洲的边界事件纠缠不清的俄国公使也被拒绝接待。外交使团团长以各公使馆的名义发给外务部的报告，也总是被常常婉转得成问题的措辞所拒绝。在北京呆过一段时期的外交官们说，自从那些尚有些威望的人物消失以后，外务部人员成了行尸走肉。

我们的代表提到，他在关于中国驻河内领事馆、云南省的开放和东登到南宁的铁路等问题的情况报告中，曾详述我们的论据，努力解释了我们的观点，可是外务部对一些不容置辩的事实也只是答之以生硬的拒绝。他们根本就不想解释，不想讨论我们的任何一条理由。他们从来就不表示是否读了这些文件，仿佛这些文件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置可否的表现久而久之已是颇不恰当。加上对我们的代表和其前任们的诚意所作的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就更有点不合常理了。直至今日，马士理先生在他的函件中仍在努力保持最克制的口吻。然而，他认为是向他们表示他确实感到没有礼尚往来的时候了，应向他们说明为我们制造的那种种困难和使用的那种口气实在只能使我们感到惊异。

悬而未决的事件太多了。云南省的开放问题未能前进一步，很可能中国政府无视我公使馆的警告而单方面作出决定。

在湖南，我们的代表解决不了传教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所遭遇的各个事件中有一件事使它复杂化了。有一名传教士开了一枪，打伤了一名中国人，后来这个中国人伤重致死。将近半年以来，他们坚持要我们把这名传教士交给中国警方。中国警方声称，不需要其他手续便可把这位传教士送交"天津的领事和中国当局"审判，而拒绝了马士理先生认为必须进行的先决调查，因为各方面的情况都令人觉得被控告人是在进行合法的自卫。

在安徽的传教使团所遭受的损失，其事为时可谓久矣，然而巨额赔款的要求仍然毫无结果。而即在这几个县城中，近来又发生了数起事端，原因可认为是对旧案件不了了之，使惯于捣乱的分子以为官方赞同他们的行动。我们的代表公正地、而且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了在一个革命党人做过大量工作的省份里可能发生的不可逆料的事情，因为中国的现状使民众中得以流传这样的想法，即攻击外国人和外国机构不会受到惩罚。然而，我方代表至今得到的都是相反的答复。

在北海，由于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好几起细小事端的事态在扩大。另外，他们通过新的内务条例，力求废除伯特米①条约，而我们的代表却很难使这个条约得到遵守。产权

① 伯特米(Berthemy)。——译者

的取得在很多地方都已成为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德·马士理

〔外交部　No168〕

158. 革命党人致各公使馆的信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年6月3日，北京）

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大多收到了通过中国邮局从上海寄来的信，该信译文附于后。写此信的是某个叫徐正贤①的人，他自称是三江（江西、江苏和安徽三省）革命军总司令。

该信大肆攻击满清皇朝，并宣布不久将“开始大战”。徐正贤声明他对我们的侨民“视若子女”，将给予保护。但是，如果他们站在爱新觉罗氏一边，他就很难保证他的军队能否尊重他们了。他在信中附了一张石印彩色画片，画中两面交叉的旗帜，四周围着麦穗，也许表示未来政体的繁荣，这是“他的军队的标记”。两面旗帜中的一面是蓝底一颗白星，另一面的底色是红的，上方有一个带有白星的蓝色方块。

英国代办以为把这篇谤文送交那桐阁下一阅为好。那桐仿佛十分震惊。到处都作了一些调查，希望获得有关阴谋的线索。我想，这位外务部的协理大臣真愿付出一定代价，只要能摆脱马克斯·穆勒②先生提出的事情，因为他对于找到那封信可靠与否的来源是没有把握的。

各个公使馆收到这封信后自然有一番不安，再说，公使馆里谁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有根据的意见。各人凭借自己对中国的个人感觉作出判断，这既不可避免，又十分矛盾。然而，从中却可得出一个事实，那便是，不管是在官方人员、商界或传教士中，谁都没有想到竟有一个正正规规的革命组织遍布中国。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但是，还没有出现过任何有计划、有目的（除推翻满清皇朝外）的共同行动的概念。直至今日，骚乱都是地方性的，尽管有时很严重，却并不使人感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尽管如此，在以后出现这种联系并非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徐正贤的信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不能忘记亚美尼亚事件的教训，当时面对的是组织完善的亨察基分子委员会，各个使馆都有些忽略它们收到的警告信。然而，当亚美尼亚人对奥托玛纳银行进行进攻后，再想起最后收到的那封委员会的信，才发现这一切在信中都已打了招呼……

不管怎么样，中央政府和官员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感到不安。朝廷在直隶省规定了特殊的治安措施。当局仿佛已经预见到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严重事变，由于年成不好，而人民对建造学校和各方面开支不断增长所引起的税收增长又正在不满。摄政王的任人唯亲引起了非议，他兄弟们的使命是众所周知的浪费的根源，而他们的贪得无厌已令人愤慨。

---

① 徐正贤（Shu Tcheng－Sian）。——译者

② 马克斯·穆勒（Max－Müller）。——译者

我们驻天津的领事特别收集了在抚台衙门进行的谈话的反响，它们在这方面是有征兆性的。

保定府在上星期进行了军事演习，对被军队毁坏的庄稼所作的赔偿显然微不足道。法布雷格①先生今晨来看我，他对我说市场上对这个问题怨声不绝。

对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的情况我们又能作何设想呢？

马士理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185〕

附：徐正贤信函(译文)

三江(江西、江苏、安徽)革命军总司令
徐正贤致法国驻北京公使阁下函

爱新觉罗氏占我河山二百余年，统治和压迫我人民，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现在，天降灾祸于我国，水灾与旱灾接踵而至，饿殍遍野，到处是一片恐怖景象。

倘若爱新觉罗氏爱护我国人民，对诸多苦难他们岂能无动于衷？我国人民本不应遭受所有这些不幸，如今又岂能默默忍受？

徐某，总司令，对此形势痛心疾首已十年矣，我若不努力将自由归还我人民，则负罪深重。为此而无他法，惟有拿起武器，兴师讨伐爱新觉罗。

我已定了开战日期，与爱新觉罗氏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然而，我担心在即将掀起的风暴中会良莠不分、玉石俱焚。公使先生，我将视贵国侨民若自己的子女，但他们不应设法损害我军。我绝不推卸保护他们的职责，但如果他们听从爱新觉罗氏而为他们效力，那么，尽管我很愿意把他们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国民对待，我怎么可能保证我的军队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呢？

因此，公使先生，我请求您使他们注意起来。

即此问候，云云。

同信附上我军徽号的复制件。今后在我的函件中将以此徽号为信。

159. 广东的革命党人
法国驻广州领事致法国驻华公使先生

(1910 年 6 月 15 日，广州)

在今年 2 月关于军人哗变的报告中，我曾向您汇报，广州总督想要减轻自己的责任和

① 法布雷格(Fabrégues)。——译者

令大由他指挥的镇压的意义，竭力论证这次哗变系由孙逸仙的信奉者策动的。

我对事实作了认真的研究，当时便认为，不管袁大人①怎么说，可以宣布，革命党人开始时并没有参加这次军人暴动，可是后来，他们曾试图让这些事变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然而没有成功。

从那时候起，各种不同事件便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它们仿佛都显示出其中有革命党人的特别活动。近来，我终于认为已掌握足够内容一致的迹象，可以在我对本月7日当地报刊的分析中，申明革命党人正在酝酿反对广州的新行动。

预言总是十分危险的，所以现在我很高兴能把一些可证明我说过孙逸仙的拥护者们酝酿中计划确实存在的确切事实呈报于您。

英国总领事确实给过我一份机密情报，是关于香港秘密警察头子的一份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最近杀死我们的同胞马丁先生的那个中国人的情况，根据这份报告(附上抄件)所说，这个中国人名叫洪索②，是孙逸仙的一名主要的副官。正是这个人，在今年2月23日在“夏尔·哈尔顿号”③汽轮上丢下一只旅行箱后消失，海关人员从箱子里找到19公斤炸药。从香港秘密警察头子的这份报告来看，警方似乎已获得孙逸仙写给他副手的信件的情报，洪索应当用这些炸药炸掉总督衙门，在袁大人身上重复在北京发生的行刺摄政亲王的企图。

洪索这一招未成，便离开广州，前往新加坡他的首领身边，5月中旬又从那儿返回香港。6月4日，他与好几个革命党人一起乘船赴广州。然而，正如我已在6月6日的第70号急件中向您详细呈报过的那样，他一到便被一名海关工作人员马丁先生逮捕，说他身上暗藏武器。他以为自己被认了出来，杀死我们不幸的同胞，接着自杀。他的同伴则都逃走了。

现在已经能肯定，洪索近日返回广州是来执行他的首领关于某次行动的指示的，这次行动已经过长期的酝酿。确实，最近好几个月以来，海关已注意到有很多可疑人物频繁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除香港警察局能抓获的，有大批武器已经运到广州革命党人手中。导致马丁先生被杀和洪索自杀的悲剧又一次使孙逸仙策划除掉总督和所有别的大员的行动流产。

6月4日洪索抵达广州，而北京在同一天里流传广东省府骚乱严重、各衙门被焚的消息，这奇怪的巧合令我怀疑。我觉得应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考虑。北京的革命党人知道洪索负责执行的行动后，禁不住事先便公开广州发生严重骚乱的消息。以我看来，那便是对那些谣言的最说得过去的解释。谣言传得那么凶，以至您觉得有必要向我电询广州形势。

我已能向您肯定，城里秩序十分良好。如果中国警方像它几天来所做的那样，继续逮捕加入革命党的歹徒，那么这种秩序是不会遭到破坏的。搜捕中最有意义的是昨天进行

① 袁大人，指袁树勋，时任两广总督。——译者

② 洪索(Hong So)。——译者

③ 夏尔·哈尔顿号(Charles Hardouin)。——译者

的那次。昨天逮捕了一个人，此人在各裁缝铺订做了七百面红黄旗，这是将举行广州暴动的那些人的联络标志。

三角洲的混乱和海盗活动，华南首府的不稳定局面和慌乱，形势显然十分有利于孙逸仙进行新的尝试，因此最近很可能将听到对他的议论。

〔致巴黎的第65号急件附件　No81〕

附：

关于洪索其人

香港便衣探长汉森①致香港警察局督察总长

（1910年6月13日）

专门警察韩航②已于星期六晚上从广州回来，并对我作了下述报告：

杀死马丁先生的犯人名叫洪索，又名赵罗山，又名易生③，年38岁，出生于顺德县巴果④村。他原是一个很有名的海盗，反皇朝党成员。今年2月23日，他搭乘"夏尔·哈尔顿号"汽轮前往广州，随身携带一只装满用于炸毁总督衙门的炸药的旅行箱。在抵达广州时，一名海关欧洲工作人员要求他把旅行箱打开。他声称去寻找钥匙，躲进一只舢板逃走了。6月4日，他以为那位欧洲工作人员（马丁）已把他认出来了，便杀死了马丁，然后自杀。

2月份，在他的第一次广州之行时，他曾躲了三四天，然后返回香港……

3月中旬，他接到孙逸仙要他去新加坡的一封信，他去了。然后于5月中旬又回到香港……

去年10月，洪索曾与另外几名海盗，在顺德县巴果村攻击一名官员唐叔昆⑤先生，好几名士兵被他们杀死……

便衣探长　J. W. 汉森(签名)

---

① 汉森(Hanson)。——译者

② 韩航(Han Hang)。——译者

③ 赵罗山(Tchao Lo Sam)，易生(Yik Cheng)。——译者

④ 巴果(Pak Kau)。——译者

⑤ 唐叔昆(Tang Su Kwong)。——译者

160. 中国的形势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年6月18日，北京）

在我所有的同仁那里，确实都能遇到那些忧虑，我们所有的代理人、包括在这个国家经历最久的人都那么看。传教士们，因为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而可能把目前的事件和过去的事件作一比较，而且他们同老百姓一直有接触，除了在北京本地区的以外，他们一致认为形势严重。而最后，政府和那么小心地避免作出任何有损于他们的自尊心的姿态的官员们，都不掩饰自己的焦虑不安。近来这种不安在某些人身上都快变成慌乱了。在这个幅员如此广大、而在这以前相对比较安定的帝国里，一段时期以来，骚乱从四面八方大幅度增长，其次数如此之多，以至我们的代理人在他们的来信中只能择要而谈了。

在上海和长江流域，流传着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浙江北部湖州市的一次严重动乱。城里张贴出了煽动性的布告。目前大多数老百姓正忙于收蚕丝，人们担心蚕丝收获季节过后他们便会由言论转向行动。而这种行动又不外乎杀死官吏，焚烧衙门、学校和教堂，这是在这个常规不变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暴动的通常内容。江北饥荒猖獗，尤其是在海州地区，以及在湖南省。我已向阁下汇报了我和我的好几位同仁所曾进行的尝试，希望中国当局借南京展览会开幕之机采取不可或缺的措施。我打算只要形势需要便采取这样的态度：建议中国政府，与其镇压骚乱，不如预防骚乱的发生。再者，十艘战舰停泊南京对展览会能在安定的形势下开幕不无作用，这种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汕头地区出现了同样的混乱局面。在这个港口南面十五公里的潮阳市，除了饥荒还有瘟疫。煽动者们力图发动民众造反，唆使他们去抢劫欧洲商号。人们谈到了福来①闹事，当地官方曾禁止发送货物。在汕头所属的澄海地区，一些布告竭力主张造反。这些布告的作者让本地商人为他们出钱，并保证现在给一两银子，将来还五十两，并且，给商人们立下的投资收据在暴动进入实施阶段时可保护其免受任何恶劣待遇。我国驻广州领事在他的来信中肯定了广东受到饥荒威胁的消息，尽管当局在印度支那和暹罗急忙购买了大米，慈善机构采取措施给贫民提供粮食，但仍无济于事。最后，还有索西纳先生在4月25日的报告中向部里提到的在北海地区爆发的风潮。

在四川，尽管该省有一个特别有力的政府，形势同样是不稳定的。成都有过对外国人采取行动的企图。所散布的谣言内容主要是：盗墓和残害儿童；在传说中这些儿童将作为“洋人”配制化学产品的必须的材料。

---

① 福来（Fou－lai）。——译者

另一方面，犹如我从前提及的，流传中的关于列强计划瓜分中国的谣言已经掀起了一场相当强烈的骚乱。这些列强在中国边疆已有属地或已经在中国插入一脚。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示威活动的首先是学校各界。他们开了几次会，决定在课程内容里增加军训和体操教学。我们可以把社会要人们组织的旨在收集资金归还外债的运动也归人这类概念。清查活动同样被用作散布流言的根据，说将要求普通人都皈依外国宗教。这种捏造那么容易地便被相信了，因为在一般的意见中，外国人正是官方领导的改革运动的支轴，他们把所有进行中的新事物和因为新事物而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民众身上的负担，统统算到了外国人的头上。1909年12月，我国驻成都总领事曾写道："所有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对于在群众中进行的工作能够形成一个概念的人，都一致预言，一旦机会到来，便会爆发严重事变。平静的局面竟能维持如此之久，这甚至是不可理解的。"

〔外交部　政治和贸易事务司　No208〕

161. 威胁云南的危险警报

《危言报》摘要

（1910年7月19日）

驻云南特约记者来信报道，云南局势较之华东三省更为严重。

法国人在每个县、府、道都建起了教堂，表面上进行传教布道，暗地里搞间谍活动。

这个地区的传教士①每天都在研究地形、民意和矿藏性质。

他们在地图上注明山脉平原的形势，定期将这一切寄送给省城的主教府。

每月1日和15日，各县城的全体传教士集中讨论，然后将他们的报告寄给印度支那总督。

他们旨在使云南的行政管理从属于缅甸和印度支那。

他们在省城南部占有整整一个地区，在那里建起了大量的楼房。

他们的影响与日俱增。

我们发出这份通告，以期向政府和住在北京的云南人报警。

〔附件　致亚洲处　No78〕

162. 莱阳暴动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0年7月31日，北京）

本月19日第254号函中，我已向阁下报告了突然出现在山东莱阳的那些事变。

---

① 牧师这个词在这里被用来指新教牧师，或指天主教传道师、教士和司铎，本函作者不了解天主教传道师的各种称呼。——原注

我所获得的关于那次莱阳暴动的新情报说明，它的性质确实十分严重。整个地区与暴动者采取了一致行动。政府不得不调动近三千人马来解决这次仿佛每天都在扩展的叛乱。这次叛乱的参加者估计有五万人。落入造反者手中的九名要人曾去向芝罘道台自荐愿出面调停以止住骚乱。他们的这种干预被接受了。于是在一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重新去莱阳，但他们失败了。这时军队出击，而且中国护卫舰北鹰①号也在海阳港外沿海巡弋，对造反者的形势才有所转机。

最新消息，莱阳城已被克复，造反者有五百人死亡，很多人受伤。他们的头子曲士文和他的六名副手被捕获并就地正法。然而形势依然十分混乱。山东巡抚孙宝琦已要求军队留在莱阳，宣称如军队走了，骚乱便会重新开始。

令人惊讶的是寓居北京的山东达官贵人竟不出面干预。他们指控孙宝琦把一些反对苛捐杂税的示威运动参加者当成革命党来处理，在镇压中表现出了无意义的野蛮，还指责他用德国人来指挥那些军事行动。都察院立了孙宝琦的弹劾奏章，圣旨命直隶总督陈夔龙大人负责查清此事(应该说明，这两位命官是姻亲)。

德国人的合作仿佛是一致确认的事实。

根据从各个可靠来源收集到的相同迹象来看，仿佛确实有十名德国军官即使不能说指挥，也应说参加了中国军队进攻莱阳的行动。这些德国军官是属于青岛城防军的。根据我国公使馆所拥有的多年前的情报来看，这次合作听来惊人，却毫无不正常之处。1898年的胶州公约附有一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早就明确规定，在租借地附近的山东各地若发生骚动，德国有权向中国建议给予中国以军官和军权的帮助。

这种帮助在目前情况下还表现在运送从济南府派出的中国军队一事上，德国让中国借用了它的铁路，通过德国自己的殖民土地。中国军队实际上到高密车站才下车，此站介于潍县和胶州之间，离位于青岛东北偏北方向的莱阳大约一百公里。

另外，德国鱼雷艇还曾在海阳对面的德国殖民土地沿岸巡弋，青岛城防军还曾派出一连步兵和一队骑兵。

马士理(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274〕

163. 中国革命党人的情况

奥古尔②致法国常驻中国高级外交代表

(1910年8月1日，河内)

昨天，我接受了张邦翰的访问。张邦翰，又名张西林，帕维亚学校③毕业生。他从香

① 北鹰(Pei－Ying)。——译者

② 奥古尔(Aucourt)。——译者

③ 帕维亚学校(l'Ecole Pavie)。——译者

港而来，前往云南。

我知道张近来任《中国时报》编辑，这是以孙逸仙为首的中国革命党在远东的主要喉舌。我乘此机会力求获得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党人目前所使用策略的情况。

下面便是张邦翰对我所说的情况概要：

"我们的领袖孙逸仙已从欧洲和美国访问回来，目前在日本。他对我们将遵循的新策略刚作了一些训示。我们以后将不再使用像在南关和河口曾用过的袭击的办法，前车之鉴证明了我们不能依靠秘密会社，依靠那些我们曾为采取行动而从中招募过我们的拥护者的会社。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模仿土耳其青年党人，将用军队进行一次革命。新军的大部分军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积极的宣传活动，我们想，不久，我们就会取得成功。"

张前往云南探亲和筹钱，准备去巴黎留学。他将在云南逗留一个月左右，他但愿在逗留期间不会受到官方的追究。

帕维亚学校的另一个毕业生张映竹现在巴黎，他是思想和政治学院①学生。他通过翻译中文稿，从吉梅博物馆馆长那里每月得到二百法郎。这使他得以维持生计而不加重革命党的负担。

这两个年轻的中国人是帕维亚学校最聪明的两位毕业生，如果革命党获胜，他们肯定将在中国担任重要角色。我相信他们俩对我国都怀着真正的好感。

四年以来，孙逸仙党的知识中心一直在巴黎。百余名年轻的中国人聚集在巴黎学习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制度等等，他们过去在日本东京发行的《民报》，现在在巴黎出版。这份报纸为香港、新加坡、曼谷等地的中国革命期刊提供稿件。他们中某些自称为革命先锋的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机关报是《新世纪》、《新时代》。他们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有联系。

听命于孙逸仙的巴黎的革命党人是好几位法国议会要人所认识并予以鼓励的，他们的要求也为某些报纸所接受。

奥古尔（签字）

〔（机密） （抄件）〕

164. 印度支那和中国风潮

印度支那总督致殖民部长先生

（1910 年 8 月 30 日，西贡）

在 7 月 30 日的 217 号函中，蒙您转来法国驻北京公使 1910 年 6 月 13 日发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一份报告。

---

① 思想和政治学院（l'Ecol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译者

我荣幸地通知您我已收到这份吸引了我全部注意的文件。

最近以来我边界警察局局长搜集到的情报和我驻华南各省领事当局转来的最新消息，进一步肯定了马士理先生对帝国风潮和革命的、反对外国人的思想的发展所作的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支那总督政府必须特别注意：

1. 中国和安南边界的防务须有足够的保证；

2. 在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中，防止任何可能过分刺激中国舆论反对我们的冲突因素，并采取一切措施，使舆论对我们稍微有利；

3. 为侨居印度支那的中国人谋求一定地位，这种地位既要照顾到我国统治的利益，又要满足这些亚洲人的显然是合法的要求。

在此，我将迅速陈述此目的导致我最近采取的那些预防措施。

在边界防务方面，在我们所能支配的兵力允许的情况下，上东京湾各省有好几个哨所的力量加强了，另有一些已重新占领。

从而，在6月和7月发生的广西骚乱中，我们做到了阻止小股武装的中国人对我谅山省和第二军区的一切渗入活动。

然而，我还是通过8月25日的电报，请常驻东京湾的外交代表提出所有他认为其实施对预防云南和两广将发生的比较严重的事件是及时的新建议。

在关于发展问题上，我同您的看法一致，觉得为最有效地保证我们的政治利益和我们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最好让印度支那大范围地满足中国可能对它提出的要求。

法国驻广州领事刚对我提到两广歉收，我便于1910年6月1日把这一情况通知交趾支那副总督和常驻东京湾外交代表，请他们告诉出口商。接着，尤其是从交趾支那，大批的大米发往香港和广州。这些大米十分肯定地将有助于解决已使西江三角洲面临威胁的粮荒问题。

最后，就如我在1910年8月16日1567号函中已向您汇报的那样，我减免了用于救济海南岛本地居民三万石大米的关税。

然而，印度支那目前在出口中还必须注意谨慎，因为本季度雨量不足预兆着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的这次收成不会很好。我并不考虑用决议暂止谷物出口，也许，不到十分严重和特殊的情况下，我不会下决心采取这个措施。但是，倘若农业形势不见好转，是不是应该劝告本地人不要把自己的稻谷储备出销得太快了。

犹如我国驻广州领事在最近给外交部长的一份报告中所述及的那样，我不得不痛苦地看到，印度支那在处理与帝国当局的关系中极其正确的做法和我们的慷慨，都未能建立起对我们较多一些的好感。即使是在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我们还在那里维持着对我们的预算说来是耗费昂贵的慈善机构，而且出于完全无私的目的。云南府的情况也一样，最近，我们驻云南的外交代表不得不就军校青年学生在一个正式节日里对我们所作的令人不快的举动，向总督提出强烈抗议。

我想，尽管目前处于帝国正经受危机的时刻，我们不应该奢望获得真正的好感，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无可指摘的态度，避开任何可能引起非难的原因。

严格执行1909年1月4日签订的、关于镇压在印度支那的革命阴谋的法中协定，一

方面因为我们解除帝国政府的敌人们的武装而使政府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也因我们拒绝把只犯有政治罪的犯罪个体交给满清政府而满足了中国年轻人的情感。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

在关于侨居我领地的中国人问题上，1906年10月16日决定和1907年2月7日和28日决定对有关移居入境的中国人的规定作出了十分明显的改进。移居入交趾支那的中国人特别多。

1908年，博先生为在堤岸用募捐方式建立一个法中中学而发起创办一个社团。我为帮助这一事业的实现，从总预算基金中拨款两万元。这个带有一切现代化起居设备的学校行将建成，不久将举行落成仪式。

对这所虽属私人、却由总督同意的一名法国官员领导和监督的学校，我们有理由希望它在培养中国青年的工作中取得最佳结果。

在许多场合下，堤岸的中国商人都曾要求过在这座城市里建立一个中国商会，负责保护他们的利益。鉴于在交趾支那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商业居然在西贡商会中无一席之地这种奇特的反常现象，我们更难于不考虑他们的愿望。最后，部里在1909年5月29日的电报中告诉我说，中国驻巴黎公使馆也向外交部长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经地方行政首长会商，我于1909年6月9日向您报告说，我准备对于在印度支那建立中国商会的计划作赞成的考虑，条件是它们将按与在外国的法国商会相似的情况开展活动，无公民资格，章程须事先征得行政部门同意并遵循刑法二百九十一条和后续条文的规定。

交趾支那副总督和代理总督正是在这些基础上，考虑对堤岸的中国商会发起人提请他们审查的章程作何答复的。

按照皮基埃先生和古尔贝依①先生表示的意见，我于1910年7月15日，同意了这个商会的章程。章程第一条是这样确定他们的宗旨的：保护交趾支那中国移民在商业上的一般利益，对商业利益进行归类和分级，仲裁愿交其处理的商业纠纷。如同皮基埃先生曾经判断的那样，我想到，由于这个机构将使我们可以不考虑中国政府重新提出的在西贡设立领事馆的任何恳求，既然中国商界的利益从此肯定将有它可能需要的保护，它的建立更显得是合乎理想的。

另一方面，堤岸的中国人恪守当局法令，目前的堤岸市长对他们又确实有很好的影响，这些都是政府不能不对交趾支那的全体中国移民作出他们焦急地恭候着的慷慨行为的原因。

不幸的是，印度支那总督府对待在我领土上安家的中国人的有政策依据的那些观点，总不为我国同胞所理解。西贡某些报纸展开的令人遗憾的反对中国人运动，缩小了政府为这些亚洲人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

一些忠于交趾支那众议员帕里斯②先生的期刊，歪曲他的意愿和他的纲领中某几段主张使交趾支那摆脱中国桎梏而取得经济解放的文字，展开了一场场论战。这些论战恰

① 皮基埃(Picquie)；古尔贝依(Gourbeil)。——译者

② 帕里斯(Paris)。——译者

恰是在特别需要我们谨慎对待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和我们对它的侨民当采取的政策问题的时候，在亚洲民众中制造混乱和不安。当然，总督政府在这一点上同交趾支那可尊敬的议员是完全一致的，希望殖民地的商业逐渐转入我国同胞和安南人的掌握之中。然而，这是一个结果，是我们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对我们的被保护者的进步教育将部分地达到的结果。我重视这个教育，也已把我的意见报告部里。企图通过对中国人已经感觉到的利益加以限制的措施，通过不说明理由地拒绝同意他们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以取得这个结果，将为我们同我们强大的邻国之间的关系招致无可弥补的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我本来也不会把那些论战看得很重要。要不是因为发难者是两位德尚·德·喇伯第先生，他们使这场新闻运动在天生多疑和敏感的中国民众眼里带上一定的可信性，我甚至都不会向您提到它。两位喇伯第先生是我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兄弟，他们在交趾支那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学博士。而且，尽管他们很明确，都是反对派和教权主义者，他们却声明拥护交趾支那的那位议员。

在我提到的那些名字中，还应加上原西贡市长、辩护律师居尼亚克①先生。他在西贡的股份经营曾遭到的最严厉、也是最公正的批评，导致任命了一个市政管理委员会。他目前是殖民地议会的成员，正在倚仗可尊敬的帕里斯先生的名望钻营议会主席的交椅。

然而，那都属于偶然性质的介入，反映了天主教传教会战斗分会对中国人众所周知的情感，它们的表现仿佛只是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和政府，我不得不揭发他们，而未适可而止。确实，这些介入会造成一定的不安，就像曾有一时在同样的反华思潮中，东京湾报界在德博公司的唆使下所干的那样。但是这些介入并不能挫败政府的行动，这种行动我刚才已经陈述，既坚决，又旨在息事宁人。

克罗布柯夫斯基(签字)

〔殖民部　No1746　(抄件)〕

165. 上海的会审公廨
马士理致外交部
(1910年10月30日，北京)

10月份，上海的混合法庭问题重又提到了外交使团的面前。关键在于要弄清楚，在混合法庭里，各国领事是否有权让他自己的陪审官出庭审理同他有关的、牵连到他的侨民的任何刑事案或违警事例。上海的领事使团要求最高使节们就此问题表态。我们知道，按照多年来既成的惯例，目前由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轮流担任陪审官之职，其他国籍的代表从未有过一人被纳入这个三人组合。

混合法庭的工作一般说来是令人满意的。除了倒霉的诉讼人，通常谁也不否认法官

① 居尼亚克(Cuniac)。——译者

们的公正和他们的判决的公道。然而,使人担心的是某一天在法庭的组成中进入一些对于为司法方面的理由所专门肯定的信念不总是那么坚定的人,以至目前如此合乎意愿的事态维持不下去。而且,像这样的人的被招入是必然的,尤其是从要求改变目前的临时协定的那些国家的侨民中进行选拔。从而仿佛便导致了上海的领事使团不敢自作主张解决这个难题和外交使团不愿对向它提出的问题明确表态。

这些理由在国际会议上是不上台面的,因此讨论总是笼罩着某种阴影。最后,外交使团决定如此回答领事们,"由于外交使团认为那些条约的正文对于领事使团提交的问题已解释得十分清楚,所以,并无表态的必要"。

对上海的领事使团说来,所剩的希望便是各公使馆能费心给它的领事解释一下这句有点晦涩的话语的确切涵义了。这句话意味着混合法庭的组织问题已经由那些条约解决了,外交使团不能越权讨论。而那些条约的正文都不予明言地承认各国领事在牵涉到本国侨民的利益的任何案件中有权指定一名陪审官。然而,外交使团希望尽可能地不要改变目前的体制,于是便避免作明确表态。实际上,它是让各公使馆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去决定是否使用那些条约授予他们的权利。

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上海独立自主的处境是我们至今坚持惯例不变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我们并不向混合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以免不得不同意在我们自己的租界上付出相等的代价。

德·马士理

〔外交部 亚洲处〕

一九一一年

166. 铁路风潮:抗议集会;外国人的安全;民众情绪;宜昌印象

每月汇报第七号

(1911 年 6 月,重庆)

在上一次每月汇报(1911 年 5 月)中,我曾说,目前,社会对于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法令完全持无动于衷的态度。然而,应该料到文人们会兴风作浪,搞一个表面看来具有普遍意义的抗议运动。这正是这个月来发生的事情。

抗议集会

成都与其他有关省份一样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立即在重庆（其他重要中心城市也一样）建了一个分会。重庆的委员会立即开始掀起风潮。

本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是失败的。一方面是出于谨慎，另一方面也是怕横生不虞，以及还有……下雨。只有三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并且，除了决定稍迟些日子召开第二次会议外，没有任何结果，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相当胆怯。这次会议像是组织了委员会。

6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情况比较好，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有八百余人。商人、显要和股东参加者相当多，但绝大多数还是各个学校、尤其是各法律学校的师生。

与两类听众相对应的有两种看法。股东和任有官职的人们，他们把铁路收归国有已看作既成事实，不表示反对意见，只关心对他们的钱和利益将会作何处理。学生和文人们奋起反对这些庸人之见，只愿议论如何保卫铁路。激昂慷慨的演说便是由此而发。他们揭发乔树枏和甘大璋是卖国贼，他们列举“中国五处丧权”和“保住铁路的三个办法”。道台从会议开始便来了，并声明他是私下作为听众来的，并且“不介入”。大会解散时决定下一次会议选举派往成都省委员会的代表。

最近的这一次会议曾作出巨大的努力，给所有的社会要人、商贾和文人等分发了一万份措辞十分激烈的会议通知书。通知书译文附于后（见附件二）。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很多，但良莠不齐。三千至五千与会者，主要是低层社会的人，除很多学生外，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还有流浪汉。很多体面的人看到这样的会众，先就退出了没参加。幸亏有一位手里拿一只铃铛的“欧洲式”的主席，有一个委员会等等，表面上还算维持了秩序。据说，人们还都静静地听了讲演，各项建议在欢呼声中得到赞同。讲演比前几次会议的都要激烈。基调是对政府的不加掩饰的仇视，至少带有排外主义。一个演讲者突然建议大家前往道台衙门，让人给中央政府去电，提出民众不容调和的反对意见。事情便这样进行了。人群冲开了那些打手，闯进衙门，他们的言语和方式都相当蛮横。道台只得出来。他不习惯于公众场面，要求安宁和平静，说了几句同意的话。巡警道的口才才驱散了示威群众。（道台兼局长对他们大加称颂，并断然声明忠于他们的事业。）

电文发向成都，总督答复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已多次去电北京，他正等候一道谕旨，他不会忘记把谕旨的意见告诉他们的。这总之是一种不予受理的办法。再者，人们也清楚，皇上最后的几道命令早已打消了王大人①任何介入的想法。

外国人的安全，领事们的活动

另外，成都的一份电报要求巡警道严密注意维持社会治安。因此，后者命令，任何有

① 王大人：指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译者

关铁路问题的公众集会，必须先通知他。这样，曾使重庆当局措手不及的那种示威使不大可能重现了。然而，这座城市的四名领事(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却通过同样的函件提请道台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产业可能遭遇的危险，并请求他，如可能的话，禁止召开有关铁路问题的公众会议和增加重庆现有的人数极为不足的兵员。没有朝廷的命令，从总督上大人到朱道台①的当局，要他们禁止集会是颇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像是"有力方式"的信奉者。如果类似骚乱再度发生的话，与这个问题利害关系最大的美国领事，仿佛准备请他的公使馆向外交部提出交涉，而如果像那天那么激烈地反对外国人的讲话重又出现，则要求逮捕主要肇事人。

民众的真实感情

犹如我在这份报告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些示威活动根本就不符合民众的真实感情。我询问了所有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中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

一方面是那些被迫的股东(也就是那些交纳名为铁路税的土地"附加税"，从而持有股份部分或部分股份的人)，租借能使他们摆脱铁路税，这使他们很高兴，只是担心这笔税款用别的形式或在别的借口下重新对他们征收。

大多数股东，尤其是那些最大的股东，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利息收入，他们同样是满意的。他们更愿意给他们偿还本金，从此与铁路不再有任何瓜葛。重庆股东主席的讲话非常确切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想法(见附件二)。

商人和要人们的经纪人对铁路问题同样漠不关心，他们实际上代表了经济利益。在上海遭受的损失，铁路管理不当的传闻，使他们欢迎新的组合甚至外国人的参加。这能减少对政府企业的不信任。他们也愿意摆脱以铁路的名义加在他们头上的"自愿的贡献"。

这便是代表明智、稳重的部分，民众中的"资产阶级"部分。而另一方面，还有近几次会议的公众，即：

文人们的智囊团、教师、从国外回来的大学生、他们周围同属于学界的一些小股东、跟随着老师的学生、热情的听众，以及还有未成熟的政客。对他们说来，"倒霉的股票"不值什么。最后还有一大批爱在茶馆店里摆龙门阵的二大爷们、流浪汉，以及在那里充数的大量背水扛滑杆的苦力。

在这两种人之间，大量的是百姓群众，小店主、手工艺人、工人、苦力，他们对与他们的饭碗、账本无关的问题根本就不感兴趣。可是他们却在得意地宣传那些捣乱分子的无稽之谈。

我忘了还有据说是拥护政府行动的公职人员。每当别人同这些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仿佛确实是这样的拥护者(或者理解国家的实际利益，或者满足于通过一家贸易

① 朱道台：川东道朱有基。——译者

公司逃过产生中的那些不可避免的"麻烦",或者希望出现有利的局面),但是,目前他们还不敢反对那些示威行动。只要北京还没有下达命令,还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权力和保证,他们便会继续随声附和那些抗议者。

在　宜　昌

重庆以外的运动情况我知道得不多。根据美国领事的情报,宜昌的态度是极不友好的。那里的情况相反,与建造铁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太多了,很多商人在此事中有他们的好处,他们同意铁路工程师们和铁路工作人员的看法,不相信欧洲人诚实和合乎规定的领导。因此,我以为,宜昌的抗议运动实际发自社会显要和商人,符合比较现实的利益。因而,宜昌的这个运动比在重庆更严重。

敌对态度显然将带上反对外国人、尤其清楚的是反对美国人的形式(宜昌人其实知道选用一名美国工程师的事,他们却说:这个美国人要来了?)。

附:

在各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所作的决议

第二次会议(6月28日)

重庆的股东会主席说,反对将铁路收归政府所有将是很困难的,这是个既成事实。但他希望能在关于股东们的本金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将由谁负责偿付利息。这些话激起了文人们滔滔的愤慨之辞。其中之一宣称,你们的本金、利息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反对铁路国有化。一个叫朱叔痴①的特别激动,再者,他也是这次运动的煽动者②之一。他攻击乔树枬③、甘大璋④,同样也攻击政府。乔、甘是四川省府的官员,被牵连在这一事件中。所有的人都应为保路同志会的支出费用认捐。一个演讲者在谈到中国丧失的资源和权力时涕泪纵横。他说,必须以湖北人为榜样,用三种方式强迫政府采取行动:罢课、罢市、罢税。会议除了对"保路同志会"的默认,什么决定也没作出来。几天后将再次聚会选举代表。

---

① 中学堂教师。——原注

② 朱叔痴、周高风(Tcheou Kao fong)及一些教师。——原注

③ 乔树枬,川汉铁路公司驻京总办,他曾因上海遭受的损失而受到强烈谴责。在铁路收归国有中他并不积极,人们责备他软弱无能,其实大家知道他从来就主张国有化。——原注

④ 甘大璋,四川省府官员,他曾呈递了一份主张四川铁路国有化的报告,使政府得以说该省人民拥护这个措施。继而,他被邀请进行与股东们的谈判,以解决他们的资金的使用问题。四川贡院学士赵熙向他的同乡们揭发了他。——原注

巡警道在会议开始时解释说，道台本来应该来的，但因为脱不出身，让他作个代表。他自己在会议开始后几分钟也走了，留下话说，如果有人想同官方代表商量讨论的话，还有候补道在那里。据说，这位官员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当然)没有发言。鉴于那些演讲强烈的反政府性，他的在场便够令人惊讶的了。

我漏了一点，该商会的一名成员宣读了甘大璋的一份电报，电文说，鉴于他被任命为公司股东代表，他想知道股东们是否准备用剩余差额四百万两银于购买国家铁路股票。商会受命作答，人们不承认他为公司代表，股东们将把他们的决定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的代表。

第三次会议(7月8日)

一万份会议通知书分发给了所有的文人、显要、商人等等。后面附上这份通知书的译文(附件二)。

当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巡警道派去了几名秘密警探，他们将汇报会上发生的情况。

与会者除大学生和他们的教师外，均属三教九流，地位低微。很多可尊敬的人、商人、社会名流，看到那些人在那里聚会后即转身而回了。

演讲主题仍是前两次会议的那些，但措辞之激烈无可比拟，而且演讲者也还是那几个。所以语气也更明确地反对政府和反对外国人，声称公开抵抗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谈到了法国和英国的野心，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试图插手铁路了。

会议急转直下，一个演讲者出乎意料地提议去总督衙门。

大多数会议参加者前往衙门，并闯进了公堂，方式和举止都相当蛮横无理(走进了官员们的议事厅等)。道台只得出来，他是个怯场的演说家，用令人听不清的声音应允大家的要求去发电。巡警道正好在那里同道台的一位幕僚共进午餐，他对群众说话，百般允诺，还对他们热心于公众事务大加赞赏，终于使他们满意地四散了。

(对参加者的人数估计相当荒诞。开始有人说有二万，接着又说只有三千。比较正确的数目也许应是四千至五千。)

第四次会议

这次会议于两天后举行，人数较少，也不那么吵吵闹闹了。会上选举了去保路同志会的重庆小组代表。

杂　讯

成都省理事会主席于第二次会议的第二天经过重庆，他向省会发出紧急呼吁。他说的话与股东会主席说的差不多。

重庆最主要的股东之一，在最近一次会议后专门和自动地访问了美国领事，声明主要当事人的观点与煽动者们的观点截然不同，并对后者使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他向领事肯定，这是一次学校师生们的运动，主要商人和社会显要依然是这次运动的陌路人。

安全措施

领事们曾请求道台增加在重庆的兵员。我们的一位与统领钮道台①交好的同胞向我报告说,钮曾对他说他目前手下有一千人马,马上要征招一千人,龙城和云超②已招来。

尽管这些数字是扩大了的,并且给予这些数字明显地是希望它们被转告给外国人听,我们却可以庆幸看到了当局采取的措施。况且,鉴于这个地区的四川人生性平和——至少目前是这样,根本就不用担心真的会发生骚乱。

167. 关于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国的权利问题

中国驻法公使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6 月 13 日,巴黎)

自从帝国农工商部作出关于中国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准和登记的规定以来,这类公司数量倍增,而且其中很多在外国有分公司,目前在法国就有几个。

法国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第一条规定可以在法国建立比利时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条则允许政府把这种优惠扩大到给予其他国家。

此后,许多国家从法国政府争取到允许他们的侨民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令,这些得到许可的公司可以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行使它们的一切权利、进行诉讼。

为了使中国得到恩准的股份有限公司能在法国享有给予其他国家的那种优惠,那就必须由行政法院颁发一道政令,允许它们享受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第一条。

中国公使从中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出发,根据在法国的外国人享有平等待遇的原则,荣幸地请求外交部长阁下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为那些得到帝国政府恩准的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一个同意它们享受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的政令。

〔外交部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附: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正文

第一条,呈报比利时政府并已得到批准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商业、工业和金融联合会可以在法国按帝国③法律规定行使它们的一切权利和进行诉讼。

---

① 钮道台,重庆知府钮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及新巡防营统带。——译者

② 龙城(Long tcheang);云超(Yun tch'aou)。——译者

③ 1857 年的法国是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译者

第二条,由行政法院颁发的政令可以使任何其他国家也得以享受第一条规定的特惠。

168. 南宁的革命党人

普安[①]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6 月 24 日,南宁)

上月底曾以暴力行动在广州当局和人民中间产生过那么强烈的震动的革命党人,前几天秘密地出现在南宁。

这些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对我们怀有恶意的广西居民,无疑是在官吏们的授意下,指称他们来自东京。这个说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而使我觉得确有其事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自广东西部,也就是南宁的南面。那个钦廉地区是一个真正的盗匪窝。

"革命党们"想干什么?他们仿佛自己都不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令人感到相当奇怪的是,这些运动与中国别的那么多运动不一样,它们没有反对外国人的倾向。革命党们怨恨的是官吏。他们怨恨达官贵人的恣意暴虐,而出于简单的报仇心理力求予以打击。然而,如果说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那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对抢劫的爱好、对外国人的仇恨和群氓对他们的支持不会使他们做出更加过分的暴行。

我们的传教士们断言,官员们由于感到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危险而害怕,他们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会力求嫁祸于欧洲人。这在内地是很可能出现的。在南宁,我还没有发现这类事情的真凭实据,尽管个别公职人员也说了这类话。不管怎样,几天来,当权者中一片恐惧。确实,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公然自称的革命党人。但是收到了相当准确的情报,看到了一些可疑的家伙,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衙门里、城门口已经采取了最严密的预防措施。迄今为止,还没发生任何骚乱。

使官员们更其感到害怕的是……他们自己的军队。营防兵是些穿着号衣的强盗,但他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忠于事物的既定秩序。他们早已被派往广州,因为总督只相信他们。这里只剩下七八百新军士兵,这些人对革命一往情深。官员们细心地命令他们扎营城外……而城门则每晚都关上。

至于欧洲人的问题,由于有我们的一艘炮舰在此,危险性较小。这艘"值夜者号"一星期前到达这里,无疑将在港口停靠到 7 月 14 日。在它未接到新的指示之前,我不相信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节外生枝的和可担心的事情。

普安(签字)

〔法国驻南宁副领事办事处 No14〕

① 普安(Point),法国驻南宁副领事。——译者

169. 关于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国的权利问题

行政和技术司致政治和商业司的通知

（1911 年 6 月 28 日，巴黎）

毋庸置疑，法国政府可以按照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第二条授予它的权利，颁发行政法院政令，批准按中国法律组成的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遵循法国法律、在法国行使它们的一切权利和进行诉讼。它可以使用这个权力，甚至不需要对等互惠。

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既没有总的授权法令，又没有外交协定，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迫使政府不让中国的股份有限公司享受这些权利。

最近，1910 年 7 月 23 日的塞纳民事法庭第一庭的一份判决实施了这个原则。萨拉·伯恩哈茨、德·挪迪斯克·福拉格①（1910 年 7 月 24 日《法院报》），由于认为根据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规定，除在比利时组成的合法公司外，其他外国公司如没有外交协定，则必须有行政法院颁发的政令才能在法国得到进行诉讼的权利，决定："鉴于在法国和丹麦之间没有达成过任何诸如此类的政令或外交协定，丹麦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在法国不能受理。"

实际上，如果以为 1867 年 7 月 24 日至 29 日关于公司的法令在通过它的第二十一条、废除商事法典第三十七条、规定法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预先得到政府准许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废除了 1857 年 5 月 30 日法令，那就错了。法国的一些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自由组成，然而，在有关这些公司的问题上，法国公众则能在决定它们构成的法规中找到保证。

我们有权考虑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国的那些公司是否有同样的保证。

为此，最好对中国对于公司问题的法律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了解应由政治和商业事务司开展的这个调查研究的结果之前，对中国公使馆的要求发表任何意见均为时过早。在这种情况下，推迟到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后再作决定比较恰当。

况且，即使有关公司问题的中国法律能给予足够的保证，政治和商业事务司还应从政治上判断现在给予所请求的特权是否适时。

〔外交部　行政和技术事务司〕

① 萨拉·伯恩哈茨、德·挪迪斯克·福拉格（Sarah Bernhardt、De Nordiske Forlag）。——译者

170. 南宁的反法情绪

法国驻南宁代表致亚洲事务处副处长①先生

（1911 年 8 月 10 日，南宁）

我那几份急件已使部里了解"警惕号"之行在龙州造成的骚动情况。最后那份急件宣布那些谣言已经平静下来了。然而它们又很快蜂起。实际上，所有这些传闻、那种煽动，很少有停止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可能引起谣传的事件，我们完全有正当的权利或者存在着应予讨论的疑点，这些都无关紧要。反法分子的敌对行为并没有放慢速度。他们在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时候，便杜撰出最荒诞不经的诬蔑，而且民众绝无二话，既接受又添油加醋，致使这种敌意，与其使它可能会令人感到是啰嗦之词。又一份外交急件的内容，我倒情愿同您谈谈，尤其是今天，在我的范围内，即一般地说在广西，特别是南宁发生的事。

在我到达这里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与我们有关的局势，除开始遭遇到一些小困难外，相对地说是平静的。骚乱差不多就发生在今年年初。我曾对您提及令人头脑发热的军队的阴谋，可是使他们神魂颠倒的却是广州的骚动（4 月 29 日），而"警惕号"炮艇的到来则使所有的反法仇恨全都爆发出来了。

这种仇恨反映在广州、梧州、桂林出版的报刊文章中，也反映在谣言中。那些谣言要不是使我感到它们出自官员们之口，我是不会很注意它们的。因为这种仇恨的因素（而且是主要因素）之一，便是目前紧扣住南方中国当局心弦的对革命党人的极度的恐惧。他们需要有什么东西分散一下他们的心思。谣言把他们治下的百姓的仇恨转移或力求转移到法国人身上（其他欧洲人不是众矢之的）。结果便发生了我对您提及的这次骚乱，而革命党人还是丝毫没有更改他们反对官僚们的计划。

由于我们的传教士们是这里仅有的法国侨民，他们当然承受着这种仇恨的最沉重的压力。一次次要求不是杳无反应，就是遭到粗暴的拒绝。法国在广西遭到嘲弄（在其他省份无疑也一样）。尽管北京、广州和这里的领事馆作出了努力，但毫无办法，也一无所获。惟有实力还有可能挽回这个局面。巴黎对此不可能不知。可是，我们就真的不为挽救我国的荣誉做点儿什么吗？

如果我们想要采用一种"商业"政策，给予贷款，售给大炮，很好。但是，我恳求您，到时候麻烦您给一个字条告诉我一下。我甚至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法国人说来便有必要改变一下行动方式。对各传教团的保护，按照它眼下的形式，与这种商业政策是不相符合的。坦率地讲，最好是修改一下有关我传教士问题的条文。中国人会十分感激我们，而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许多要求，我们还能避开那些困境，否则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以对我们有利的结果摆脱这种困境，尽管明显地我们有充分的

① 贝尔特罗（Berthelot）时为亚洲事务处副处长。——译者

权利……

我不说了，我像是在对传教团作战。我可远没有这种想法啊！我只是想给您介绍一下目前的形势，不加夸大，但也不缩小。一句话，处长先生，我要冒昧向您请教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在相信能被支持到底的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传教团的权利呢？或者能否对那些通过同当局一般性的讨论已捍卫不了的权利的要求略作(至少是实际上的)调和呢？我相信您不会拒不给我答复的。我只考虑我国民和我国家的利益。从我个人来说，没有任何问题需要抱怨。我喜欢南宁，对这里的气候也受得了。有关我们工作的其他细节情况，我将于后另行呈报。即此，处长先生，谨向您再次致以由衷的敬意。

(签字)

171. 上海局势
喇伯第致外交部长①先生

(1911 年 9 月 22 日，上海)

四川骚乱并没有在上海导致任何暴力行为，然而却在这里引起一场轰动。中国公众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变化。他们的全部同情仿佛都是向着造反者方面的，而如果说大多数报刊还没有公开声明自己的倾向，从它们的文章中却能容易地看出它们在暗暗祝愿包围成都的民众集团取得成功。上海报界一贯地大搞假新闻，这一回又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已多次宣布攻陷四川省府、总督及其全家和主要官员被杀、官兵哗变、端方大人在宜昌遇刺等等。毫无疑问，这种种谎言都是革命党人有步骤地宣扬出来的，他们恨不得在这里那里引起别的混乱，浑水摸鱼，可以掀起叛乱活动。

不管是在上海或是在附近各地，都因为忙于寻找粮食而未发生任何风潮。大米到港保证了这个城市的供应。粮价甚至下降。以前，浦东的民妇曾抢劫店铺，现在那里的价格甚至低于那些专门为帮助贫民而开设的销售店。因此目前人们是完全放心的。

商团在利用饥荒威胁引起的动荡中表现出自己更值得为人称道的作用。他们在租界外的所有的中国地区认真巡逻。从而，官僚当局仿佛抛弃了过去对他们的一切成见。当局发给他们数百支枪。我希望道台和府台以后不会因为这个措施而抱憾。

喇伯第(签字)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No46〕

① 塞尔夫(Selves)时为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172. 广东的革命党人

伯威[①]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②]先生

（1911 年 9 月 23 日，广州）

我荣幸地呈上有关 1911 年 4 月 27 日广东革命党人行刺案余波的新记要（从 7 月 31 日至 8 月 5 日阶段的），并对拖了这么久才给您寄上这些记要而请求原谅。

令人不安的谣言仍一直不断地在民众中流传，不仅使老百姓感到惊慌，而且使中国政府也十分担忧。当局的处境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些传闻使总督于 8 月 1 日作出决定，把他指挥下的巡洋舰中的四艘布置在广州几条河流的三角洲要点上，以便一旦发生事变可保这些河道无虞。它们曾对广州的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贸易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目前这种损失还在日益扩大，以致张鸣岐大人打算从他正同汇丰银行谈判的借款里先提取总额为一百万两的款子投放广州市场，以减轻市场压力、恢复正常的贸易活动。这是他最需要的。

尤其是在佛山，广州的这个工业集中的郊区，由于令人惊慌的谣传更迭出现而引起的贸易损失已变得十分可观。在这种形势下，米价又飞速上涨，因为许多担惊受怕的居民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灾祸，急急忙忙地积聚食物。

不断发生大批大批的广州人外逃的现象。人们特别注意到住在总督衙门附近和旗人居住地区的家庭的出走。城里大多数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由于持续不断的逃难呈现出一片寂寞凄凉的景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 月 2 日，一所女子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课。

即在 8 月 2 日前后，仅仅几天里，有一万多广州人踏上通往澳门的道路，躲避据称最近将卷土重来的革命党之乱。逃难者的绝大多数仍是充斥着中国各个省城的数目很大的候补官员，他们一如既往带着全部家眷。

据流传中的谣言说，各革命党人的委员会已选定 8 月 3 日为再次起事日期。这一天，老百姓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凌晨四时，人们发现满洲人居住区有一名旗人巡警被暗杀，并被陈尸在大街上。这个不幸的人当胸中了一枪，还被大刀开了膛。在这种时候，在人们正预计着叛乱者又要大打出手的日子里，像这样的发现实在难以使提心吊胆的人们平静下来。他们从前一天起就已十分激动，因为军政各部开会准备招募四百名现代化装备的士兵，这支队伍将开往澳门。老百姓立即想到这是总督在做准备工作，准备抵御上面提到的这次新的进攻。

8 月 3 日这一天，更有好些小变故来给这种已经到了极点的恐怖火上加油。总督派出十名炮手和一门火炮守在省金库前面，满洲人居住区马路上一道破破烂烂的栅栏作了修葺。这些事马上就使人以为是在攻城。然而，最恐怖的时候是在中午，人们听说有人刚

---

① 伯威（Beauvais），法国驻广州领事。——译者

② G. 斐格（G. Picot）时为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译者

看到从总督府附近的一条阴沟里钻出来一个人。城市巡警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担心那个家伙在阴沟里放上什么爆炸装置。那个人或许也只是在一些白日见鬼的人们兴奋的想象中存在过。巡警们打开阴沟盖，一直搜索到晚上，据中国报刊说，他们挖地六十尺，把泥土污水翻了个个儿。显然，什么也没有找到。

张鸣岐大人感到那天需要用勇敢的行动来安定民心。他十分大胆地只由几名亲兵陪同便在下午三点走出衙门。他先跑遍了他的宅邸所在地区的街道，然后前往码头，造访住在电气照明公司住所的邮传部代表龙建章先生。龙先生是为由国家收回粤汉铁路一事来到广州的。他们谈论了这个问题后，张大人一直沿着码头走去，直至晚上四时才回到家里，安然无恙。两广地区的中国最高长官恰恰是在大家以为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勇敢地走出衙门，对民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他们意识到不该那么轻信无稽之谈。

然而，大批广州人的外出逃难情况即便不比前几天更厉害，也仍然跟前几天差不多。

8 月 4 日，一家广州报纸发表了一篇所谓中国侦探从香港发来的电讯。据这位侦探说，革命党领袖黄兴仅仅是因为身体感到有点不适，使他 8 月 2 日未能到达广州城准备进行 8 月 3 日大家所预料的那个壮举。按照这份电报的说法，那不过是改个日期而已，而日期也是迫在眉睫的，即 8 月 9 日。巡警道赶紧去找发表这条新闻的报纸，让他们立即辟谣，并且同时发表了一份告示，通知民众，凡被发现散布谣言者将即刻严惩不贷。

确实，即便并不成功，当局却始终在尽他们之所能对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那种极度轻信进行着斗争。8 月 5 日，张鸣岐大人被迫召集起他的属员，坚决要求他们不要送走家眷，以安定民心。前一天，他们还得意地公布了前广西提督龙济光将军于 8 月 2 日率数骑驰访广州城天主教传教团的经过。龙将军来传教团的目的是与途经该城的莫里斯①教士相会，长年来，他同这位广西神甫一直保持着极好的朋友关系。龙将军在同富尔凯②神甫交谈的时候曾暗暗提到 2 日或 3 日可能发生不虞的说法，并问我们的同胞是不是感到害怕，对此，法国传教士回答说他丝毫也不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当局拥有的武装力量要粉碎任何叛乱企图都是绰绰有余的。我觉得，在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中显然存在着某种半官方的东西，用某些人精神上的平静对抗中国人的神经质。一旦发生暴乱，这些人的特殊地位使他们面临的危险与威胁那些老百姓的危险相比，即使不是更严重，也是不相上下。

不幸的是，除了当局为平定人心而作的努力之外，还有他们为以防万一而采取的细节应变措施。这些措施往往同那些努力背道而驰，使之徒劳无功，因为它们令老百姓觉得上述当局连自己都不那么相信自己说得振振有辞的安定人心的话。

这类应变措施花样很多。龙将军带两名副将负责全广州各街道的巡视，以便亲自了解维持治安的巡逻队是否尽职。侦缉科长李泽奎③先生的努力卓有成效，他发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内容，他得到了四万两银子的追加经费，用于招募新的侦探和分发奖金，鼓励逮捕革命党人。8 月 2 日，在城里一幢房屋的一口井里找到一枝毛瑟枪，它肯定是在 4 月

① 莫里斯(Maurices)。——译者

② 富尔凯(Fourquet)。——译者

③ 李泽奎(Li Cheu Kouei)。——译者

27日凶案中被一名在逃的叛乱分子丢在那里的。

龙济光将军的兄弟龙浴光统领每晚亲自指挥各巡逻队游弋于大街小巷，以阻止盗贼乘流言引起人心惶惶之机侵犯居民安全。

使军队处于能作战的状态，加强军事力量的必要性是当局始终关心的问题。

李提督仿佛决定带全家到虎门去，他真正的常驻地应在那里，他将带走他手下的两营前卫，并委托朱统领署理他在广州的司令部。这一走又招致众说纷纭，而最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必须使虎门要塞处于防御状态，以便让海军部最近将派往广东的代表、负有查明该省各要塞能否抵御目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袭击的使命的海军部代表，看到虎门防卫森严。然而，在本报告写成前，李提督仍还没有动身。

8月1日，总督委派一名专员监察驻守广州的正规军的管理情况，要军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

同时，张鸣岐大人给朝廷呈递了一折奏章，要求让4月27日凶案后他从广西调来的八个营为确保广州防务常驻该城。而且，他还打算派一名官员去四川补充招募四个营新兵，也用于保卫广州。

广州两名专区区长于8月1日颁发一份公告，下令征用市区附近的公墓地建造野外防御工事，以配合要塞防务。

关于革命党头目们的动静我们知道得很少，或者说一点都不知道。8月4日前后，一名侦探报告说，从4月份起成为革命党主要头目之一的著名强盗头子陆兰清，很可能躲在广州北郊的一幢房子里。总督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想盯住他和逮捕他，但是所进行的搜查毫无结果。

在该省其他地方，前阶段人们大略谈到小斧会的情况。小斧会活动在佛山各县城，由姓周和姓陈的两个先生组织，明显地带有革命的目标。这个帮会的会员规定交纳捐助款0.20元，其中0.15元用于该会的活动，0.05元用于宣传。6月20日晚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八十人。第二次会议集中了三百人。从此每月举行一次夜晚集会。地方显要害怕恐怖的复仇威胁，至今不敢向政府揭发这个革命党团体的活动。

7月28日在香港发生的邮件爆炸事件曾引起不安，开始时人们曾认为邮件是属于一些革命党人的，邮件里有寄往广州的炸弹。此事现已渐渐平息，事件似乎已公正地缩小到它应有的事故的范围。7月30日，中国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伍光中先生曾电告总督说，近期来，他获悉革命党人进口大量炸药，企图用它们装备自己，在最近起事。7月28日的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忙于采取必要措施，以挫败他们的努力。按照伍先生的说法，这次爆炸很可能是由于革命党人为了把炸药搬上驶往新加坡的轮船而招募来的苦力不小心造成的。炸药包被伪装成装祭祀用纸的箱子，一共八只。搬运苦力们突然把一只箱子落到地上，它爆炸了，造成十余人伤亡，其中有一名儿童和两名苦力被炸死。其余七只箱子立即被英国当局截获。这些箱子都被锁上了，钥匙在押运人手中，押运人是个没有辫子的家伙，已经先去广州了。箱子被送往警察局。负责发送这些箱子的过境商号办事员声称，它们来自汕头和嘉应州。即在这份电报里，伍先生告诉总督说，他已请英国当局派人逮捕

证人指出的两名革命党人，他们在炸药箱发送中骗了人，他已请弗雷德里克·吕加尔①爵士给予他们以儆戒性的惩罚。

张鸣岐大人一收到这份电报就急急派出一名代表赴香港，其使命是与英国当局商谈为保障公共安全双方应采取的措施。有人肯定说，那些被截获的箱子和那只爆炸的箱子之所以装上一条驶往外国的船，其目的是要瞒过侦探们，掩盖它们真正的目的港广州。

广州的中国当局很快便抓住了那些箱子的押运人。他们立即派人把他押送到香港。这位雇员立即声明那些箱子里装的不是炸药。那只爆炸的箱子里只是装了四千封铜钱状的鞭炮编成的焰火，所以这些焰火又叫"金钱炮"。那些鞭炮里确实有炸药，可以使它们的目的港喧闹一番，但炸药量绝对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鞭炮是用来给中国孩子们当玩具的，不小心碰撞一下便会引起它们爆炸……尽管这样解释通情达理，英国报纸却仍然顽固地认为肇成祸事的爆炸物质是雷汞。究竟是伍光中先生还是那个中国押运人说的是真话，此事将由英国司法机关勘实。此案之后，中国侦探云集香港，据说他们是去那里守候南海各港埠革命党委员会寄发广州和广东省内地的大量武器和炸弹的。

最后，在这份报告里，我还应提一下对4月27日晚部分地被炸毁的总督衙门的修复。

7月30日，张鸣岐大人命令李展阳②道台停止在原广东巡抚衙门地基上进行的工程，把力量转移到原总督衙门的修葺上。总督衙门内将保留一个大厅，用于高级官员集中议事、处理两广的一切事务。在这道命令中还提到，由于目前省金库空虚，打算最近就进行的省司库和巡抚衙门的出售将延至有关行政部门改革的政令颁布后实施。

7月30日，张鸣岐大人去看了他过去的衙门，亲自看到了工程进展情况，他指定东甬为修建议事厅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

幸亏在原广东巡抚衙门的地基上着手进行的工程迄今为止并不十分浩大。它首先是进行拆除，负责这一工程的李展阳道台于8月2日报告总督说还只用了三千一百两纹银。

据8月5日宣布，张鸣岐大人打算在8月底以前回他的旧官邸。尽管修复工程进展很快，这一点却不大可能这么早就做得到。

〔外交部　第192号急件附件　No221〕

173. 中国政府近况和四川战况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9日，北京）

9月26日，我在通知阁下成都和四川东部、北部地区已得到解救的同时，曾请阁下作好准备，虽然官方报刊作了乐观的声明，但全省平定尚需一定时日。实际上，半个月过去了，尽管官兵每天都在对叛军作战，形势却未见明显好转。

---

① 弗雷德里克·吕加尔(Frederick Lugard)。——译者

② 李展阳(Li tchan yan)。——译者

成都各医院挤满了伤兵,我们的医生人数已不足以完成他们的任务。总督的军队在南部和西部都没有什么进展,那里的造反者仍主宰着广阔的地区。今晨收到的娄金①先生的电报是这样概括形势的:"兵员极少的官军未建寸功,官方报刊只好宣布假胜利。"

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派出了毗邻各省的军队,然而,首都收到的有关他们对政府的情报却颇为不妙。这些军队中有的因开小差,一开始便人员大减,有的则表示不愿对四川人开枪。另一方面,人们曾相信的、因其肩负的四川的使命而一时间威望陡增的端方、以及岑春煊进兵缓慢,显得无意前往战斗地点。如果来自重庆的迹象是可信的话,那么他在那里远没有安定人心,反而使人心浮动,只有岑的抵达也许还会有些用处。可是,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位钦差目前在什么地方。

因而,形势仍然相当复杂,谁也不能预料乱糟糟的局面将持续多久。不安并未在朝廷和阁部中消失,前途尚不明确。然而,迄今为止还没见到有任何排外的表现。这是这场骚动的一个特点。正因为叛乱分子用来为造反行动辩护的理由是外国人参与了铁路国有化,因此这个特点更令人惊讶。外国人本来仿佛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在北京,内阁内部的阁员间继续互相倾轧。如果说盛宫保继续得到摄政王和度支大臣载泽公爵的支持,大多数亲王、尤其是协理大臣那桐却反对他。为了打击他的对手,那桐毫不犹豫地依靠近日内即将召集会议的临时参议院。按照他的观点来说,不听取弼德院的意见便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没有事先征求它的意见就订立借款条约更是不慎之至。而从最近公布的一封信来看,1900 年建议皇太后用毒药摆脱各国公使的那个参政院突然暴露出奇怪的宪法顾忌。

首先,要紧的是阻止盛某同外国人达成交易,使他能平息组成叛乱军队的重要部分的各省铁路股票持有人,从而安抚民众中的开明阶层。这个结果将巩固他的权力。然而,谁都知道,邮传部大臣在弼德院是什么都得不到的。所以,为了争取议会开会前的几天时间,一切都动用了,而谁也不敢在会前作出任何大胆的预测。

相反,外国人完全应该关心旨在帮助这位大臣的行动,因为,一年来,他不顾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制订了一种有利于铁路建造的政策,并使这种政策获胜,从而既为中国对外贸开放,又为发展中国本身的经济力量作出了贡献。所以,我们希望他战胜对手们的阴谋,而正因如此,对他说来是必不可少的贷款至今还未有结果就更令人遗憾了。

乔治·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11〕

---

① 娄金(Lourquin)。——译者

174. 湖北的革命事件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16日，北京）

革命党人一如开始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秩序和纪律性，进行组织安排和乘胜前进。继武昌和汉阳之后，他们于12日攻取汉口，从而把二百多万居民集结在他们的大旗下。

从那时起，他们集中精力，组织自己的军队，准备抵御政府为夺回该省省会而派往湖北的武装力量。在投奔革命党人的原清军将领黎都督的帐下，现已汇集了一万二千人。由于他们占领了汉阳兵工厂，士兵们得以用上质量很好的步枪和拥有必要的弹药，同时有一百二十多门火炮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

同样，新政府从一开始起便致力于维持秩序。我已报告阁下对侵害外国人和商人者科以重刑的命令，其结果是迄今为止未发生不幸事件。汉口陷落时，租界未遭到攻击。在汉阳，欧洲官商均能放心撤离。他们甚至给一名华籍工厂经理数小时时间，让他携家离开汉阳，因为他不愿意厕身于叛乱者的行列。如果在外国人中间尚有人担心会在两军即将对阵的战斗中受到伤害，这种担心有些多余，或者至少这两个方面都十分注意避免伤及他们。

事实上，革命政权也很希望证明他们正在为获得良好的政绩而操心。占领武昌后第二天，他们就在努力修复因前一天的战斗而造成的废墟，并重建信任。他们攫取银行金库里的白银，用从日本来的他们自己的钞票取代不再通用的大清银行纸币，从此城里只流通他们的货币。

这样，从第一天起，新机构便具有了一个既定政府的外表。

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摄政王和他的谋士们才明白应下狠心了。军队已不可靠，公众的信念被突然性的袭击所动摇。如果还想制止这场波及范围已大到令人生忧的运动的话，那么让久经考验的将领来率领官军已是势在必行。14日颁发的谕令任命袁世凯为湖北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委此二人统帅讨伐川鄂两省叛乱分子的军队。

最能说明目前这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恐惧之大的措施，是召回那位被光绪帝遗诏贬谪的要人。实际上，三年来，一旦出现逆境，人们便会提到慈禧这个最后的宠臣的名字，消息灵通人士预报他的重新起用，狡猾的人则取道巴辉。然而，这项措施总是迟迟推行不下去。因为，在强有力的女保护人死后第二天便那么粗暴地把他撵走，以后又去向他托付一切，其影响会有多么沉重，人们是有所预见的。

政府为如此任命的统帅拼凑起一支来自各地的军队以采取行动。它先派出其中一部以最快速度驰赴汉口，同时让临近各省军队迅速赶往现场。三天里有二十四列火车驶往行动展开的场所。而陆军部尚书荫昌将军经几番推迟行期后，于昨日登程，前去临时指挥上述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水师提督萨镇冰接到命令率领可调遣的舰只溯扬子江而上，前去炮轰武

昌。这个消息于13日晨在汉口传开，引起了十分强烈的震动，各国领事立即有所反应。外交使团团长已接到电报，要求他到外务部去做做工作，向其要求在进行这类军事行动前，至少给予撤出租界的时间。朱尔典爵士立即召集各国使节开会，研究这个要求。

大家一致认为，按各国领事提议的那种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大可能的。萨提督在中国水域可随意自由行动。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他采取一切措施，不要把他的敌人的火力引向租界，以免给租界造成损害。英国公使第二天便去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外务部答应就按此意给萨提督去指令。提督今天大概可以与“戴希德号”同时抵达汉口。

因此，上述军事行动不久便将开始，每个人都焦急地等待着它最初的结果，以便估计这些结果对革命运动将来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北京，一切都还平静。只是在皇宫周围所采取的特别防范，以及在各银行钱庄前伫候的人群，使这些街道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然而，在各个阶层中，至少在中国人中间，情绪极为动荡。已经有几位显要人物前来各国公使馆，询问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接待他们。有的人，如外务部侍郎胡维德则已经让他们的家眷动身去上海。另一方面，人们拒收大清银行和欧洲各国银行的纸币。昨天，连北京的入市税征收所都强令一位法国商人用银元支付他应交纳的一笔巨款。人们纷纷涌往出纳处换取银元，各金融机构受到猛烈冲击。

加之政府采取了一些显然不能平定人心的措施。大小剧院按照巡警总厅的命令全都关了门。还有，今天早上各公使馆接到通报说，今后电报局不再受理发往湖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各省的电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地区已经在革命党人的手中。我当即给外务部去了一函，询问作出此项决定的动机，并要求只要线路尚未被切断，保证公使馆和各领事馆之间的通讯联络。我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城里五花八门的谣言流传不息。一会儿有人宣称革命党迅速北进，一会儿又说某省加入了革命运动，或某军投向政府的对立面去了。而且这些消息得到许多热心人来为它们传播，因为或多或少带点伪装的叛党党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而那种微笑聆听对叛党活动进展的宣布也足够说明问题了；人们原来还以为他们是清皇朝的忠实支持者呢。昨天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认识的一位巴黎味儿太重了些的卫队军官受命去印刷厂为他所跟随的亲王取名片，他对名片的印刷质量表示满意，然而却指出名片上少印了目前对印名片人说来是最不可缺少的用语 P. P. C①。

然而，我们却能注意到革命党人的前进运动三天来出现了一个停顿时期。有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以前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是不是杞人忧天。我不愿冒险作出可能被明天发生的事件全盘否定的预测，但我认为应该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就目前看，这次暴乱带有明显的反政府性质，但尊重外国人，可谁也难说它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有哪些影响使它偏离已经走上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应该请目前在日本的海军上将向中国海岸靠拢。公使馆刚接到上海来电，得知我们的分舰队明天将到达吴淞口。另一方面，参谋部人员出去

① 这三个字母印在名片上时意为：特来告辞。——译者

旅行将使这些军官离开直隶占领军半个月，我觉得最好还是把这次旅行推迟到形势比较稳定时才进行，中校赞成我的意见。

根据目前我们能够作出的判断来说，政府所作的努力仿佛应能使它的对手们考虑考虑。几天后，政府将有一支兵员比他们众多的军队与之对垒，而且指挥这支人马的将领善于赢得将士们的信赖。这对于保证他的胜利已足足有余，只要在他周围和内部不发生可能使他的努力全功尽弃的背叛。

乔治·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17〕

175. 扬子江风潮

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16 日，天津)

同函附上我寄呈公使馆的有关扬子江风潮的情报抄件，对此，我没有多少要补充的。

天津各衙门惶惶不可终日。昨天，总督派他的一名书记官来找我三次，问我是否有南方的消息，恳求我一有情况就用电话或派使者去告诉他，即使是在晚上也如此，因为他在外务局安排了日夜值班人员。就从这一情况已可见全豹。

晚上，他还派人给我送来一封很长的密电，密电是给瑞澂总督的，他请我把它发出去，以侯耀先生的名义，请侯耀先生转交，“因为他不相信本地的电报员，他们几乎全都是广州人”。中国衙门历来粗心大叶(汉字报文全都由发报局译成罗马数字，再由接收局借助相应辞典译回汉字)，他们并未注意到电报由一些数字组开头，操作人员对此肯定是很熟悉的，(译文)“瑞总督湖广密报”，它能够不被操作人员读懂，但却不能保证不被中途截走，尽管密电是给侯耀先生的。我觉得我不能不转发这份电报。

我们租界里有好几个中国旅馆，目前那里广州客人往来十分频繁，大多数西装革履，没有辫子，举止诡秘。总督曾让人请求我指出那些可疑分子，并提出可以给我们的警察局长永久性地配一名保安人员。我断然予以回绝，声明我们的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交出属于任何党派的政治嫌疑犯。由于总督的传话人曾问过我，如果“万一需要”，他的家眷和他本人，能不能在租界找到可靠的庇护，而我曾给他下过肯定的保证，所以，我在这一方面的拒绝是很自然的。

今天上午，我拒绝为一张传票并执行认可书，这张传票要传讯一个所谓的地下鸦片馆老板，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南方学生。

我认为，我们在天津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除了有几支外国分遣队，法国租界的地利条件特别好。它与中国地界的来往必须穿过一片田野，并且得从英国军营的眼皮底下过去。而在它与老城区之间则隔着日本租界、奥匈租界、意大利租界和俄国租界，若真有群氓或士兵入犯，即使是从白河而来，也须先侵入上游各租界才可能到达我们这里。

还没有人告诉我老城区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除了有四分之三的在校学生同他们的

老师一起自动停课欢庆南方革命党人告捷之外。总督由于害怕士兵,很想把社会显要们武装起来,这才是一个傻主意。

北京,将御林军和部队遣往永平府的工作正在缓慢地进行着。华北铁路不得不借用津浦线全部设施,津浦线上只有快车和客车继续运行。北京至奉天铁路线上的情况也如此。

从昨晚起,北京站站长已不得不增加车厢,运送从首都逃往天津或途经天津逃往南方的人们。

荒诞不经的谣言四处流传。我们的总督再度向皇上递交辞呈,但没有得到答复。大家不相信袁世凯会接受圣上紧急诏封的两湖总督之职。

扬子江风潮早就在意料之中。仅仅在三个星期前,高而谦先生赴云南就任布政使途经天津时曾肯定地告诉我,由于在"恩准并可延长的一个月省亲假期结束之前便会发生的事件",他是不会到达任所的。高先生还对我进一步肯定广州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这位狂热的帝制拥护者变化真大,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只是说人老了,有了些经验。

总督的书记官之一廖实空①先生,其妻室是法国人。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即使是在衙门里,所有的人也都是反对满族统治的。

消息十分灵通的日本人曾预言扬子江风潮,他们的武官木青将军曾指出,武昌或南京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首义中心。

我的同行小幡酉吉曾对我交底说,两个半月前,上次广东暴动的发起人关②某曾在京津之间来来往往地跑了两个星期。他在天津时住在日租界的一家客栈里。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 亚洲处 No79〕

176. 中国近况

喇伯第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17日,上海)

我荣幸地报告阁下,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德·卡斯特里③仍未到达吴淞口。几天前,他曾从"科贝号"给我发来一电,问我对湖北暴乱作何想法。而由于我答复他说依我看来,形势是比较危急的,他接着告诉我说,他正开航驶往长江口。我从他的电报中无法知道"克莱贝尔号"是否将陪同"迪普莱克斯号"一起前来,但我可以肯定它们将一起来,因为这两艘巡洋舰已经同航线航行了好几个月,在目前情况下,"克莱贝尔号"留在日本是毫无理由的。

---

① 廖实空(L'eao Che Kong)。——译者

② 关(Koan)。——译者

③ 德·卡斯特里(De Castries)。——译者

"戴希德号"大概昨天可以抵达汉口。即在暴乱者攻克武昌后第二天,我一得到消息,就告诉费弗尔①舰长说,我的同行要求它到汉口去。"戴希德号"于10月12日晨5时启航。舰上只有一名驾驶员,赛泰②舰长带病上船。无疑是因为这个原因,舰长不能日夜兼程,而是准备一站一站逆流而上。我确实曾对他说过,欧洲人的安全没有威胁。可只是在他出发后,我才从他让人转交给我的一份摘要中得知,他沿途准备停泊南京和九江。不管怎么样,在到达南京后,他在那里可能收集到的消息会使他明白,他应不惜任何代价加速前进,16日抵达汉口,而不是20日抵达。

目前扬子江上集结起了一支真正的国际舰队③。武汉陷落时,汉口只有五艘炮艇:两艘英国炮艇,"狄斯特尔号"和"南丁格尔号";一艘德国炮艇,"瓦特兰号";一艘美国炮艇,"维拉拉博斯号";以及一艘日本炮艇,"隅田丸"。

下面是自那以后逆江而上的外国战舰名单:

---

① 费弗尔(Faivre)　——译者

② 赛泰(Seité)。——译者

③ 各舰艇原文如下:

英国:纽卡斯尔号(Newcastle),巡洋舰;
　　卡德缪司号(Cadmus),巡洋舰;
　　阿拉克丽蒂号(Alacrity),快艇;
　　伍德拉克号(Woodlark),炮艇;
　　金沙号(Kinsha),炮艇;
　　布里托马特号(Britomart),炮艇;
　　布兰布尔号(Bramble),炮艇;
　　狄斯特尔号(Thistle),炮艇;
　　南丁格尔号(Nightingale),炮艇。
德国:伊尔蒂斯号(Iltis),炮艇;
　　水獭号(Leipzig),巡洋舰;
　　老虎号(Tiger),炮艇;
　　雅瓜尔号(Jaguar),炮艇;
　　多久号(Taku),鱼雷艇;
　　格奈斯努号(Gnesenau),装甲巡洋舰;
　　瓦特兰号(Vaterland),炮艇。
法国:戴希德号(Décidée),炮艇;
　　迪普莱克斯号(Dupleix),巡洋舰;
　　克莱贝尔号(KLéber),巡洋舰;
　　科贝号(Kobé)。
奥地利:弗朗兹·约瑟夫号(Franz Joseph),巡洋舰。
俄国:曼茹尔号(Mandjour),炮艇。
美国:维拉拉博斯号(Villalabos),炮艇。
日本:隅田丸(Sumida),炮艇;
　　达楚达号(Tatsuta),巡洋舰;
　　马基库牧号(Makikumo),反鱼雷艇。——译者

英国:"纽卡斯尔号",巡洋舰;

"卡德缪司号",同上;

"阿拉克丽蒂号",温斯楼①海军上将的快艇;

"伍德拉克号",炮艇;

"金沙号",上游炮艇;

"布里托马特号",炮艇;

"布兰布尔号",同上。

日本:"对马岛",装甲巡洋舰,挂旗舰旗。

德国:"伊尔蒂斯号",炮艇;

"水獭号",巡洋舰;

"老虎号",炮艇;

"雅瓜尔号",同上;

"多久号",鱼雷艇。

法国:"戴希德号",炮艇。

除这些舰艇外,尚有:

奥地利巡洋舰"弗朗兹·约瑟夫号";

德国装甲巡洋舰"格奈斯努号";

俄国炮艇"曼茹尔号",目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以及"迪普莱克斯号",无疑还有"克莱贝尔号"。

最后,日本第三舰队全体舰只都将在中国水域重新集结。这个舰队新近增加了目前在旅顺港的"达楚达号"巡洋舰和新反鱼雷艇"马基库牧号"。

集结在汉口的各国海军力量目前由日本海军司令川岛统一指挥。

部长先生,目前的事变一一证明了我们的远东舰队和需要它在中国水域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地不相称。"迪普莱克斯号"和"克莱贝尔号"的吨位都太大,不能经常在中国使用。这两艘军舰确实能溯长江而上直到汉口,但它们几乎立即就必须顺流而下,也就是说从退潮一开始。总之,我们能一年四季都指望的只有惟一的一艘军舰,那就是"戴希德号"炮艇。因此,我们的地位便完全地低于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因为像这类战舰,他们都有不少在那里供调遣。而我们,从某种观点出发,比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利害关系都要大一些,责任都要重一些。在上海,只有我们拥有一个很大的自治租界,而我们有时却只能指望有一艘法国战舰在这里。德国人和美国人却总是有一艘,常常在法国码头和我们的领事馆前停泊的战舰舰尾上飘扬着德国国旗!武昌陷落后,汉口的法国侨民竟等了七天才等到一艘法国战舰。这个事实肯定会给他们留下十分不快的印象。

湖北事变和革命党的首战告捷在上海和在全国各地一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老

① 温斯楼(Winsloe)。——译者

百姓对此密切关注。然而他们并没有显出过分的激动，仍然十分平静。如果说他们并未公开表现出同情革命，他们热切地希望革命取得成功，这却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是这样做还有点危险，上海全城早就张灯结彩了。

从汉口而来的轮船不折不扣地挤满了逃难的人。这里难民人数迅速增加，增加得那么快，以致房租已在上涨，房产公司"上海土地投资公司"的股票价也突然从九十二两上升到一百零四两。"英法土地投资公司"的股票同样在大幅度上涨，这家公司在法租界拥有很多房屋。然而政治形势也引起了新的金融危机。纸币在汉口已不再通用，各欧洲银行不得不给它们的支行送去大量银洋。从而使这种货币在上海市场价格飞涨。另一方面，湖北政府的纸币已出价到二千五，所有的中国银行都已被它们的主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想把手中的纸币银票兑换成白银。大批中国公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恐。各银行勇敢地承受了这次冲击，大清银行一家昨天一天就付出了三十万块银洋。但是，不管那些银行有多大的家底，它们不可能长期顶住这样的恐慌。所以它们向外国银行呼吁，请求帮助，同意推迟短期贷款的偿付期限。我们希望就此意义上能够达成协议。然而中国人已经惊慌得连外国银行的纸币都不相信了，他们大量购买黄金日元，三星期内当有二百万块日元投放上海市场。

昨天有传闻说吴淞口炮台树起了革命党人的旗帜，江南制造局即将受到攻击。但这个消息是假的。惟一出现的骚乱与政治局势毫不相干，那是棉农和棉商对要求他们的商品不得受潮的新规定表示抗议。

从军事观点来说，上海并不重要。中国军队在上海的人数不多，我认为，在南京和苏州暴动前，上海是不会动的，至少在军队里不会动。

武昌沦陷后不久从该城逃出来的张彪统制昨晚坐日本轮船到达这里。这个以前得到过张之洞保护、偶然当兵吃粮的人，他是否具有军人素质都还值得怀疑。他现在住在法租界珀蒂路一个中国客栈里。岑春煊也回到了上海，并宣称病倒了。帝国政府寄托在他平定四川的能力上的希望落空了。他在近一个月前出发去四川，急急忙忙，却连武昌都没过。直至中国军队暴乱前，他一直在武昌与瑞澂大人会谈。

唐绍仪刚从这里出发去北京。一般消息比较灵通的人认为他同革命党已多少有些瓜葛。确实，有人在提到岑春煊和袁世凯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说法。

我们没有汉口的消息。昨天电报通讯中断了。掌握在暴乱者手中的汉口电信局，只少量地受理外国商号用英语明码写的报文，确实，他们也受理来自各国领事馆的译成密码的电报。我还没收到侯耀先生的音讯。

我们这里对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知道得更少。是伦敦的刘特①夫妇多少给我们一些有关局势的消息。而中国报刊却在大量散布假新闻，对革命党人十分有利的新闻，尽管有道台出来辟谣，它们在老百姓中还是大有市场。我们就是这样得到重庆、天津、保定府等

① 刘特(Reuter)。——译者

地爆发革命运动的消息的……本地报纸这么做无疑是有意的。这是煽动其他地方暴乱的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不管是读中国报纸还是读外国报纸,我们对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便是北京朝廷至少是有些手忙脚乱,他们居然还没有确定派去征讨湖北革命党的军队走哪一条路。《字林西报》说,据权威消息,帝国政府正同中国商会洽谈讨伐军在秦皇岛上船的问题。与此同时,暴乱者却在加强他们湖北的阵地,他们在汉阳兵工厂日夜制造大批军火。凡从汉口来的人异口同声地说革命党人秩序井然,并且迄今为止,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始终是无懈可击的。

他们的领袖仿佛将是:

一、黎元洪都督,他指挥武昌的一个协,他不喜欢张彪,长期以来是张彪的对手。此人身材魁梧,仍属年富力强。他在日本的军校里学过五年,英语和日语都讲得相当不错。他比中国的大多数将官都更聪明些、更有知识些。

二、黄兴(化名),很久以来就是湖北革命党人的领袖。此人目前还年轻。他生于长沙,于1900年和1903年就已经在长沙策动过暴动,都失败了。从那时起他便开始穿西服。他是孙逸仙在中国的右臂。他们是在日本相遇的。各主要秘密会社(哥老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子"等等),后来于1906年,大概在西贡合并成"同盟会"或"革命党"。黄兴在临时政府中的角色据说是外事委员。

三、汤化龙,原省议会议长。他将负责民政管理。

革命运动是否将有巨大发展?满清皇朝是否已没有希望?上海的欧洲人对此争议激烈,意见是不一致的。我承认,我赞同认为目前的暴乱是不可挡的那一边。虽然,暴乱迄今为止还未迅速蔓延,这却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人的胆子不大。但是,只要暴乱者对官兵哪怕取得一点点胜利,都将成为大批暴动的信号。清朝到处都信誉扫地。它不能依靠军队的忠诚。即使是在那些总督们周围,一些高级官吏都早就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朝廷指望借袁世凯的威信阻止叛乱发展,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不管怎样,以为一提他的名字对手们便会发抖,这未免幼稚。

德尚·德·喇伯第(签字)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亚洲处 No54〕

177. 云南情况

法国驻云南代表致法国驻华公使馆

(1911年10月17日,云南)

目前震撼四川的骚乱在云南还没有反响,在这个省城的大量四川人依然十分平静,他们除了给皇上呈送了一封请愿书以外别无表示。这封奏章由定居此地的邻省要人签名,其中最主要的有巡警道;奏章为他们走上歧途的同乡说话,指责赵尔丰愚蠢和残忍。如果真如当局所肯定的那样,在四川的闹事者中间并没有革命分子,牵涉到的仅仅是铁路问题,那么这里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然而,根据我从叙府的来信中得知的最新消息来

看，总觉得那些秘密会团已经把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会把运动转向抢劫和无政府活动，娄金先生13日从成都给我发来的电报证实了这一点。

一直乐观得有些可笑的外事专员和大司库都承认形势已变糟糕了，不过他们仍然像过去那样竭力声辩，说云南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然而我应该记下，夏①先生曾问我，一旦骚乱严重，法国政府是否会让印度支那军队北上。我支吾搪塞地回答他说，这种可能性很难预料，我方只有在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才有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

大理府和漓江府已派出军队保卫北部边界。巡防队的两个营已离开云南府，开赴昭通府和老蛙潭②。今天流传消息说他们会哗变，会杀了他们的军官、越过边界投奔叛乱分子。但是，在掌握更多的情报以前，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相当担心勒让德尔③博士和他的同伴们以及建昌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命运。

在娄金先生的请求下，我今天试着给宁远府发电报，然而本省与四川南部和西部的通讯已经中断。同样我也没有能够同巴塘的钦差通电，向他打听一下邦斯·安迪④先生的消息。

几天前我接到勒让德尔博士9月20日发出的信，当时他在宁远府。他在信中告诉我说，他打算大约在10月15日离开那座城市到这里来休息。

我曾去询问中国当局，告诉他们我的不安，他们对我保证说他们会尽一切可能把情况告诉我，还补充说，目前连他们都得不到消息。

始终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湖北会爆发一场真正的革命。如果真如传说的那样现代化军队暴动、反对政府，如果他们真的胜利了，那我们这里肯定也会发生类似的骚动。总督就如我在其他几份报告中对您提到的那样，对他的士兵，尤其是对他的军官们的忠诚的信赖实在是十分有限的。

〔法国外交部〕

178. 香港的中国居民同情革命党人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19日，香港)

昨天在香港祭祀孔夫子生辰的活动被这片殖民地上的中国民众用作了表现他们赞成革命党人、大声疾呼反满清王朝的借口。并且，这也是昨天那场示威运动惟一的意义，巡警总厅没费什么力气便把它镇压下去了。

---

① 夏(Hia)。——译者

② 老蛙潭(Lao－Wa－Tan)。——译者

③ 勒让德尔(Legendre)。——译者

④ 邦斯·安迪(Bans d'Anty)。——译者

一早，华人区便显得异乎寻常的忙碌。人们注意到主要有两个没有辫子的中国人满街跑着要他们的同胞跟他们走。队伍很快便形成了，朝着飘扬着清王朝旗帜的那几幢房屋走去。王朝的旗帜在那里已经很少了。因为大多数亲皇朝派的中国人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克制着自已没有挂旗。示威者们丢石头，大喊大叫，要求把黄龙旗收回去。最严重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中国商业无限公司①办公处和明确忠于当今政府的（也不是最反对革命的）②报纸《新报》编辑部门前。大门都被砸烂了。巡警赶到才制止了更严重的混乱出现。再说，报社里的人满足了示威者的要求，拿掉了挑衅性的标记。

香港民众的大多数肯定是支持革命党人的。他们白天无时无刻不在读报纸的评论，连最贫困的苦力，都要在工作中停上一时半刻，读读那些报纸，或者请人念一念。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急件电报，加急排印的号外随时准备出版。他们挨家挨户分发叛乱分子领袖的画像，他的面容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了。

鉴于目前的事件，我把香港的中国报纸列了一个表。本地报纸共九种，请阁下看附页上的名单。

《中南商报》③首先是商人读的报纸，读者相当多，态度温和。

《中国日报》④完全是革命党观点。

《华字日报》⑤是香港最老的中国报纸，也是最有名的报纸。它编得好，读者也非常普遍。这是温和派的一个喉舌。

《世界公益报》⑥是革命党的。

《循环日报》和《维新日报》⑦均属温和观点，但后者支持改良派。《新报》情况也一样，该报由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主编，一方面支持改良派，另一方面又明确地反对革命党人。

至于《真报》和《少年报》⑧，这两份报纸都是革命党观点的。《少年报》早上出版，其余统统都是晚上出版的报纸。

总之，在九份报纸中，四份完全同意革命党人，两份同情改良派，另外三份是温和派的喉舌报。但是九份全都是反满清的和反外国人的。

由于我不懂中文，所以没法每天从那些报纸上摘录消息，像在中国的各个岗位上的人们那样做。不过这种翻译工作多少已经由本地英文报刊代劳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名翻译，我却认为，我们最好能有一二名安南人或安南混血儿，他们能够混入中国革命党的内部，如有需要，好给我们帮上大忙。多数革命党领袖以香港为中转站，在这里住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在这里安家。他们到这里来接头，而安南和东京湾的反法党

① 中国商业无限公司（La China Merchants S. N. C）。——译者

② 括号内文字为原文眉批。——译者

③ 中南商报（Tchong Ngoi San Po）。——译者

④ 中国日报（Tchong Ko Yat Po）。——译者

⑤ 华字日报（Wah Tsz Yat Po）。——译者

⑥ 世界公益报（Sai Kai Kung Yik Po）。——译者

⑦ 循环日报（Tsun wan Yat Po）；维新日报（Wai San Yat Po）。——译者

⑧ 真报（Shan Po）；少年报（Siu Lin Po）。——译者

领袖们也是在香港碰头的。印度支那总督先生多次对我发出我们不应失去其趋向，要注意其一举一动的那个人动身来香港的消息。我求助于英国警方，然而英国警方却往往使我向印度支那总督提供了不确切的消息。

形势使我对阁下谈到了中国革命党人在这个地方的企图，所以我便冒昧地请阁下注意到这一点。

（签字）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 亚洲处 No28〕

179. 厦门形势
陆公德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 年 10 月 20 日，厦门）

湖北发生的严重事件自然在这里引起强烈不安，但它只是在商界才有反响。另一方面，民众却十分平静。从别人对我说的情况来看，只要广东省内一片太平无事，这里的民众将仍然如此。

然而这里却不乏革命党人(国民党)，他们的领袖也很有名。但我怀疑他们的机构是否坚强，手中的武器是否充足。半月前上任的新总兵孙①先生被总督电请赴省会，这便引起了一些关于福州形势的令人不安的传说，但至今未得到证实。

我从可靠来源得知，厦门道台接到了几封恐吓信，这些信对这位满族人肯定有一定程度的震动，因为他把原来准备今天举行的为他母亲祝寿的大庆延期了。

已经到这里几天了的一艘中国炮艇“楚广号”②接到电令开赴北方。艇长找道台要五百元给他的船买煤，可道台不给，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这条船什么时候能离开厦门。

骚乱的消息和叛乱分子作的声明说政府银行的纸币将不再通用，引起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持有者们的恐慌，昨天和前天，他们急急赶往这两家银行，要求把他们的钞票换成银元。交通银行不得不找香港银行借支硬币以满足那些要求。两家银行今天发布了一份公告，要公众冷静，说持有纸币的人根本不必害怕，恐慌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去找银行出纳处的人都能立即换到与他带去的纸币等值的白银。

这几天已经相当高的银价明显地上涨了，它已经从一元钱换 0.77 两涨到了 0.73 两。

商业交易已缩减到最低程度，已经几乎完全停止了往北发送货物。

陆公德(签名)

〔法国外交部 No21〕

① 孙(Soen)。——译者

② 楚广号(Tch'ou－Kouan)。——译者

180. 汉口的革命事件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 年 10 月 20 日,汉口)

经过两天的战斗,扎营在十公里站的官军急急撤退,丢下了他们的帐篷和五车皮粮食弹药,好几门小炮也被革命党夺走了。

在十公里站对面巡航的萨提督的舰队不见了。它现在大概会在铁路线二十公里附近,因为官军会在那里筑壕固守。

革命党人的这个胜利使这里的洋人们瞠目结舌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来自保定府的六个营和四千多河南兵获取胜利是很容易的。实际上,从军事观点来看,双方都表现出了没有经验,在士兵身上也都反映出了同样的缺点。然而革命党人真正的热情和取胜的愿望成了这些事件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狙击兵在几门野战炮的支援下不断地骚扰官军,而官军却只是无精打采地反击一下。如果没有萨提督的那几艘巡洋舰在 17 日炮击革命党人的阵地,官军从 17 日起就会被击退。这次炮击的命中率不高,大多数炮弹打得太远,有几颗甚至从我们领事馆上飞过,但它已足以推迟进攻者们的冲杀。

萨提督的副官,一位曾同"戴希德号"上的某些军官一起学习海战的青年军官,曾在舰队启航前一天来看望他的老同学们。他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起提督并不相信他的海军官兵,装上船的弹药也不足,这便说明了那些巡洋舰射击十分缓慢的原因。

另一方面,几位参观了官军阵营的外国人带回来的印象都十分悲观,官军阵营里一片乱糟糟的,军官对他们的士兵信心不足。

官军的撤退显然都是临时的,应该预料到他们不久便会进行反扑,进行比较严肃的搏斗。然而,革命党的初次成功却蕴含着对中国政府说来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必然会在帝国各地,在革命党人已经跃跃欲试的各地,点燃起他们的热情,激励他们作出新的努力。

法租界的情况:

我们毫无危险地度过了动荡的数小时,战斗打得正激烈,炮声隆隆不绝,四野燃起的大火浓烟蔽日。我们深信,我们对交战双方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然而我们却担心溃逃中的军队会躲进我们这里,担心战斗在我们租界里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的全部防务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严格保持租界的中立,不让任何一方的士兵、成群结队的二流子、小偷或放火者进入租界。

18 日早晨,好几名革命党人穿过我们的街道逃跑时被我们缴械或押送出境。幸亏 15 日晚间"戴希德号"抵达这里,我们有了四十名援军,使我们那些已经熬了四个通宵的志愿兵才终于得以休息。

"戴希德号"舰长担任了我们租界防务的指挥。拒马拦住了去中国地界的通道,一门

野战炮安放在马尔西里①圆形据点，控制车站林阴道。法国市政大楼成了我军的大本营，礼堂里安排了最别开生面的宿营地。

我们希望，如果"迪普莱克斯号"不来汉口，那就让它给我们派些水兵来，给我们增加一倍军力。实际上，同其他各国的情况相比，我们的样子太可怜了。日本人和德国人各有一艘巡洋舰和数艘炮艇停泊在那里，而美国人目前停在江边的炮艇不下于七艘。

我很高兴地向您肯定，我们法国的妇女们全都还留在汉口，她们相信我对她们作出的充分保证：我们谁都不会有危险。

我的英国、德国和俄国同事对事件无疑抱定不同的看法，他们全都劝本国的女国民们离开，并且以身作则，遣返自己的太太。我的英国同事还特地给这个劝告加上强制形式。

但是，我也考虑到了最糟的可能性。如果不得不撤离的话，我作好安排，使用亚洲航运公司的趸船，船上可安顿二千人。这条船将由几只小火轮拖往下游，它可以在下游安全地等候这个危险阶段的结束。

其他租界的领事们一个个也学了我的样子，甚至那些为欧洲人服务的仆佣、买办、各种各样的中国雇员也都在趸船上找到了必要时可以暂避的藏身之地。

官兵后退四十五公里进行整编，我们想，在他们卷土重来之前、新的冲突和新的惊恐到来之前，还能休息几天。

〔法国外交部 No67〕

181. 金融危机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 年 10 月 20 日，上海）

我荣幸地向您进一步肯定我昨天的电报。

犹如我已经报告您的那样，由于湖北的革命运动，导致一场金融危机已在上海爆发。各中国银行已无可能应付客户取款，决定收缩支付，并相应地要求外国银行准予延期，尤其是关于那笔估计达八百万两银子的借款。银行只有等逐渐售出资产后才能重新开始支付。估计资产是足足有余的，但在这期间，银行业务将完全停顿，从而导致的损失将十分巨大，尤其是因为这种局面还要延续下去。

各外国银行要求帝国政府紧急介入。它们强调指出，引起危机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投机或本地商界的错误，它完全是因政治事件引起的惊恐造成的，中国政府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为了挽回这个局面，政府只要把目前一半放在南京，一半放在上海的"帝国银行"银库里的四百万新银元存放在上海的各家中国银行就可以了。这一措施可以结束危机，因为

① 马尔西里(Marcilly)。——译者

这个危机仅仅是由于货币减缩引起的。

代办先生,印度支那银行请求您同外交使团一起要求帝国政府迅速以适当方式介入此事。它无疑会是因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或拖延介入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蒙受损失最大的银行之一。

〔法国外交部 No80〕

182. 湖北的革命事件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20 日,北京)

16 日公使馆通过外交急件向阁下报告的向汉口派遣军队一事,四天来一直在进行,而且我们不禁要说这确实是政府作出的认真努力。三十列军车由一条单轨铁路发出。如果说操作上有错,文武官员之间有摩擦,甚至出过事故,使这些车列或多或少都有些延误,但它们都先后到达了目的地。

一支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就这样被运送到了长江边。荫昌将军的最初意图仿佛是要前进到离目的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于是有五列火车便直接卸在汉口城下。但是尚书大人仿佛及时发现了自己的不慎之处,他带着谋士们向汉口靠拢后就折回信阳,此时,部队正在信阳集结。

这一退便使汉口滨江车站一支三四千人的部队孤立了,他们在 18 日晨遭到革命党人的进攻,战斗进行了一整天。而我接到侯耀先生的最后一份电报说,前天晚上,战斗向我国租界接近,我们在租界里解除了逃跑者的武装。所以可见暴乱者已遭到初次失败。但电报突然被切断,公使馆再也没有收到消息。只有铁路上收到的、来自事件发生地点附近各站的几份电报,才使我们了解到自那以后的一些发展情况。

从帮助中国政府工作的我国同胞给我的信息中可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暴乱者的力量削弱后,仿佛重新对政府军占领的阵地发起了攻击。在他们的努力下,政府军甚至还退却了,让出了一些土地,使他们得以占领滠口站。

这些便是昨晚北京得到的消息。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必然地在京城造成了某种不安。大家都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最初的结果有利于哪一方是多么重要,它们对动摇不定的效忠之心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也毋庸讳言,在全国各阶层中希望革命党获胜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或多或少隐藏着自己的愿望。在这个方面,最近对形势仍十分乐观的北京宗座代牧主教对公使馆的一个成员坦白说,近几天,自从官军初战失利,他的感受大有改变,估计北京将发生示威活动。他又说,届时他会要求派一队警卫去北塘保护他的工作。在他看来,整个民族都希望造反者们获胜。这个民族了解了它的苦难以后,从苦力到手艺人都想到将来不可

能更糟，他们希望来个变化。对于认识雅林①主教、曾得以赏识他平时的谨慎的人来说，这种意见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不过目前北京仍然一片太平。也许皇宫周围多了些士兵，到各银行去要硬货币而不是要钞票的主顾比较多一些。可是街上看不到任何形势异常的表现，外国人仍然可以像过去那样穿过偏远地区去散步，不会遭遇丝毫不得体的表示。

再者，袁世凯同意出任湖广总督使人感到政府获得了一股可靠的力量。好几天，某些人只是说他在犹豫，他最后会拒绝的。人们断言说他在提条件：对暴乱者的镇压要适度，1912年召开国民议会，建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和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不管怎么样，昨天已正式宣布他接受了委派他的任务，而今天，铁路上也已接到命令，准备火车22日送他南下。

尽管目前很平静，外国人却仍然仿佛有些紧张，他们担心着还不见任何预兆的危险。

武昌一陷落，公使馆就接到消息说，住在汉口附近的京汉线法方代理人们特别想抛弃这个工作，我因而只好向我国领事强调，希望我们的同胞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擅离职守，现在只能把他们的家眷送回租界。我觉得这里有主动把握他们的未来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因为他们的行为而使局面更加混乱是那么地重要，我们千万不能给中国人造成因外国人的离去而使工作解体了的印象。

从情况汇报来看，这些劝告已被接受，法国人至少没丢下他们的工作。

萍洛②线上的情况也一样，欧洲代理人有几天感到惊恐，但在他们的妻儿去北京后他们显然就平静下来了。埃布莱③先生刚告诉我说，他的合作者们仍留在他们的职守上。

再者，至少是在前阶段，双方对外国人都无意伤害，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在各个省里，也正如阁下对美国大使说的，任何撤往一个港口的措施都是毫无道理的。然而，在某些情况的影响下，形势可能发生变化。政府军的一次败绩，十之八九将足以使许多地方都成为叛乱的策源地。云南府，而且尤其是广州，就等着这个信号亮出暴动的旗帜，谁也难以预料广州民众对租界将采取何种态度。

在满洲，俄国人和日本人正准备乘此时机采取某些军事行动。这两个公使馆都谈到了必须结束红胡子匪帮的强盗活动。近几天来他们正好重新开始行动，这样，那些有利害关系的人便不会被怀疑为此出了力。

犹如我曾在电报中向部里陈述过的那样，我从这两个公使馆的成员那里得知，俄国和日本给了军事当局一定的介入自由，以便结束那些混乱局面，他们肯定会利用为此所给予他们的自由的。

倘若我们在首都也遇上了骚乱，那么，我们不禁会想到，这类行动必然地将对外国人构成主要危险，因为它会激起群众反对外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潮。

然而，迄今为止，各报对将如此采取的主动并未有任何影射的说法，而且，如同我曾向阁下报告的那样，最近以来，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民众对外国人的看法从某种意义

① 雅林(Jarlin)。——译者

② 萍洛(Pienlo)。——译者

③ 埃布莱(Ebray)。——译者

上说有所变化。

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22〕

183. 鸦片调查和总形势
法国驻福州负责人致法国驻华公使馆

(1911年10月21日,福州)

在我的20号信过去后的一个月里,福州没有发生任何突出的事件。至多提一下华盛顿国际改革局①驻天津代表施文②先生曾途经福州。他陪一位美国的百万富翁封·诺登③先生到中国各地作一次关于鸦片的调查研究旅行。他们受到了总督的接待,总督对他们肯定地说,鸦片种植早已从福建根本消失。在这一无疑还有传教士们的报告作证的断言前,他们认为继续在此调查已无意义,所以,在福州作一小住后,他们就上路去广州了。

有关汉口事件的消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影响到社会安定。然而,大家都十分关注这些事件的发展。革命党人乘此机会大肆宣传,他们公开张贴或秘密传阅文告,我荣幸地在本函中给您附上两份。在这两份文告中,他们自然谴责了满清王朝,鼓吹消灭这个王朝,代之以一个产生于民众意愿的政府。我觉得还应该提请您注意用洋文标在一份文告上的革命委员会地址:巴黎,白洛嘉路4号。不过,我想这个组织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签字)

〔法国驻福州领事馆 No33 (抄件)〕

184.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24日,北京)

犹如我在本月20日一信中使阁下预见到的,官军在和革命军的第一次接触中失利了。18、19日两天,双方前锋部队接上了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叛乱分子迫使他们的敌人急速后退四十二公里,并占领了敌军在紧急撤退中丢下的军营、粮草和火炮数门。然后,他们撤回汉口,以加强这个城市四周的防御。

萨提督曾试过炮轰,然而,打得太不准确,侯耀先生说,它对租界的威胁要比对暴乱者的威胁更大。嗣后,萨提督暂时放弃积极行动,率领舰队顺江流而下,也许是要去加煤,也

① 华盛顿国际改革局(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 de washington)。——译者

② 施文(Thwing)。——译者

③ 封·诺登(Van Norden)。——译者

许是战斗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了。

不管是哪一方面，帝国的武装力量显然都没有获得成功。投入的兵力是那么少，后果是不可避免地在全帝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我们只能为之惋惜的是这么快便恢复了和平。

第二天，宜昌就被革命党人占领了。二十四小时后，长沙也落到了他们的手中。21日，他们攻下沙市，而今天又有人宣布西安府（陕西省）军队哗变，同时，尽管流言四起，依然太平无事的南京仿佛已到了抛开皇朝的前夕。

革命运动的力量与日俱增，该是政府用有力措施阻止其发展的时候了。然而，在一次次会议上，政府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比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他们宣布了召回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北总督，所采取的措施却令人能够断定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他们通过同一天下达的诏书，注意到了任命他的对手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把与他们同等的兵权授予企图压倒他的陆军部尚书荫昌将军，他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为促使袁南下的谈判开始了，仿佛还曾有过结果，甚至都已定了22日的火车送他去南方，可总督把票退还北京，并派人去说他以后会通知铁路自己的意图的。实际上，根据来自与他最接近的心腹的秘密情报说，摄政王拒绝了授予他全权改革朝政的要求，而他则认为他为一点点代价返回朝廷毫无意义。

可以推测，官军的再一次败绩必将大大有助于解决问题，届时威胁皇朝的危险会使很多障碍烟消云散。可是，在这期间，他将呆在彰德府。等人家给予他袁世凯大权的时候，他还来得及拯救帝国吗？

革命党初战告捷的消息已在全国传开，这一力量的表现使他们得到许多人的好感。即使在北京，都有许多人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希望和对叛党胜利的祝愿。只是由于害怕混乱、危险和抢劫，才使他们害怕战争，现在大家知道革命党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合法政府，这个政府将标志满族统治的终止，那就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就足以为新的民主共和国赢得一大批的拥护者了。

另外，同以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一样，天上的某些征象标志着皇朝的末日，例如，大白天可以看到某颗星球和星星的汇合说明清朝大限已到。至此，准备欢迎新制度的人数与日俱增又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大有人在，并且越来越公开他们的爱憎，只是他们还缺少领袖人物。

然而，我们还是觉得北京的不安在增长。把金钱存进欧洲人开办的银行的官员很多，他们觉得把钱放进这些银行比放在其他地方好，不会遭到抢劫。恐慌日益严重。昨天半夜三更还有一些人逃出华人区或旗人居住区，逃出流传着最离奇的谣言的地区的人，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外国人居住的区域，来到某些在中国定居已久的欧洲人家里。我们的一位同胞向我透露说，他已经收容了因为臆想的恐惧而来投靠他的三个大商人的家庭。

可见，存在着一种对民众运动有利的精神状态，而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则预告了运动的到来。然而，从首都的表面现象来看，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作出预计的。在目前各国公使馆同我们一样安全，对他们的侨民肯定不存在任何有危险的威胁。

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25〕

185. 中国近况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 年 10 月 25 日,上海)

我荣幸地报告阁下,因两年服役期满而返回法国的“戴希德号”炮艇中尉蒂博迪埃①前天晚上到达上海,他为我提供了有关最近的湖北事件的有趣情报。蒂博迪埃先生曾目击革命党人对官军发起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叛乱军一个炮台的后面。官家的步兵离这个炮台很近,他们向炮台开火,但落点很糟,炮台上只有两个人饮弹而亡。政府军表现得相当差,他们撤出滨江车站后乱糟糟地往后退。革命党人武器弹药十分充足,而且每天都有新兵加入。他们到处都最严格地维持秩序,所以欧洲人可以不带武器跑遍所有的华人地区,甚至在晚间都十分安全。20 日一战之后,萨提督率领他那儿艘炮艇驶往下游,直至九江。也许他弹药不足了,但肯定没有了煤和粮食。海军官兵一部分开了小差,剩下的也不那么靠得住。

蒂博迪埃先生还告诉我说,德国领事曾去公使馆活动,希望能扩大德国在汉口的租界。他所提出的借口很可能是所有的德国机构都在租界的后面,出了租界,即在铁路沿线,它们就会毫无防护地任人焚烧和抢劫。他很希望同行们同他一起行动,要求在同一意义上的各自租界的扩大。蒂博迪埃先生不知道这些活动的结果如何,我觉得这样做罕见地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德国领事大概要求从青岛给他拨五百名德国兵,而侯耀先生大概为了不被他的同行占先,让人对德·卡斯特里上将说,他觉得最好从我们的殖民军中抽调一百人给他。

犹如我已向您报告的那样,湖南省会长沙落到了革命党人的手中。双方没有开火。据说,该省总督已被看押,但是对他仍以礼相待。

宜昌也一枪不发地被占领了。近来宜昌一直在闹事。铁路上雇用的苦力没拿到工资,他们要求开工资。这便为革命运动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昨天上海接到消息说九江已被占领。好几天以前就已经有人在说这座城市正在酝酿起事。对政府来说更为严重的是革命党人还占有了湖口的各个要塞,这些要塞武装齐全,封锁了长江和鄱阳湖的入口处。帝国政府因而便不能再从水路向湖北派遣军队了。再者,从现在起,华商公司的轮船也停止了去武汉的航运业务。萨提督的处境同样很窘迫。他那停泊在九江港外的小舰队对这个城市来说毫无指望,由于既不能逆江而上,又不能顺流而下,他们已处于不可能获得补给的境地。因而,不久如果有他归顺革命武装的消息传来的话,那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南京的形势令人不大放心。这个城里满族人的数量相当多,他们仿佛下了抵抗的决

① 蒂博迪埃(Thibaudier)。——译者

心。兵员众多的守备部队(包括有各种兵器的部队,其中有一个步兵师)让总督很不信任,因此收去了他们的弹药。如有可能办到,他无疑还会解除他们的武装。他曾下达过一道遣散的命令,但未能执行。总督因此十分不安,他从江北调来九千人马旧军(老营),然而,很明显,这些武器很差、缺乏训练的士卒,就算他们还有些斗志,也绝不是拒绝离开大本营的新军的对手。

尽管当局作了那些宽慰人心的公告,富人们还是全都离开了这座城市。挤得满满的火车每天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南京送到上海,总督本人也遣送了他的家眷。

苏州的安宁被九千失业织工所扰乱。经济形势很糟。巡抚给各银行增加了十五万两银子,让它们能偿付给一部分债务人。人们担心民众不久就要攻打各衙门和学校了。

成千上万的难民在镇江和扬州避难,那里的不安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浙江,绍兴这座大城市可以说是不设防的,它只有二百名士兵。在这方面,危及社会安宁的很可能是粮荒。在杭州是硬货币紧缩,它的后果是纸币持有者的惊慌,使得形势十分紧张。

据香港的《华南早报》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广州人准备等革命者一旦掌握长江流域数省省会后即宣布独立。因此,华南商业都会迄今保持的令人意外的平静可能在近日内便告结束。

英国驱逐舰"雅努斯号"、"维拉戈号"、"法姆号"、"奥特号"、"威挺号"从威海卫来到长江水域。"奥特号"和"威挺号"被派往汉口,但肯定已不得不停在长江。来自马尼拉的美国巡洋舰"阿尔巴尼号"②停泊在上海法租界前。

日本人派三艘驱逐舰("初岛号"、"响号"和"千早号")去汉口。"如月号"和"蒲贝号"③留在长江下游。

侯耀先生曾请求德·卡斯特里海军上将给他三十名援兵,以分担"戴希德号"水兵和法租界志愿兵的值勤工作。上将今晚给他派去二十五名,他们带有武器和行李,由一名准尉率领,搭乘"金陵轮"④前往。

上海的形势也一样。从金融观点来看,局面已有所好转。帝国政府给各华人银行使用的那二百万两银子使它们得以应付契约。一家曾中断支付的银行昨日恢复营业。中国民众高兴地获悉革命党最近的胜利消息。革命党有许多密使在上海,他们跑遍店铺,让商人们更改招牌中与满清统治有关的某些方块字。人们继续贪婪地阅读报纸,争抢号外。不管是在租界上还是在中国地界里,秩序都未被扰乱。

已决定定居在国际租界的道台曾来看过我。他要求我准许他搜查在法租界码头抛锚

---

① 华南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译者

② 雅努斯号(Janus);维拉戈号(Virago);法姆号(Fame);奥特号(Otter);威挺号(Whiting);阿尔巴尼号(Albany)。——译者

③ 初岛号(Hatsushimi);响号(Hibiki);千早号(Chihaga);如月号(Kisaragi);蒲贝号(Kamakayi)。——译者

④ 金陵轮(Batterfield and Swire)。——译者

的中国船只,以便如他所称逮捕那些"歹毒之徒"。我已说服他不要这么做,我对他指出,这类行动纯属无益,并且会引起愤怒,他的同胞中的大多数都可被指责为同情叛乱分子。他对我保证说,几天后,政府便将征服它的对手,但我认为他自己都绝不会相信这一点。在谈到金融局势问题时,他问我对宣布强行流通纸币的适时性作何想法。我回答他说,这种方法绝不会有效果,它只会增加惊恐。实际上,上海并不缺少银子。目前上海有二千四百万两银锭和八百万块银元!坏就坏在这些银子根本就不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在本地的四十几家华人银行钱庄里。这些银行实际是与外国银行签订见票即付的借款,再把它们取得的银子以到期偿付的方式借出去,以至一旦出现恐慌,它既还不出外国银行的债,又付不清中国债权人的款,不得不到处求告,宽延期限。所以,纸币和"本地汇兑通知书"的强制流通对这种主要是由缺少法律而引起的情势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裨益的。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亚洲处　急件 No56 之附件〕

186. 中国的骚乱,银行发出的电报
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26 日,天津)

我在今天的电报里已向您报告,天津很可能发生暴乱,但丝毫也不用为租界担心。

我已知道印度支那银行经理昨天给巴黎发了电报说这里出现令人不安的迹象,而万一西蒙①先生向部里报告了悲观主义的消息,我想作个纠正。

作为中国人债主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所担的风险和侨民的个人安全之间毫无相同之处。

尽管在满洲人或革命党人获胜后(肯定只是暂时的胜利)可能会出现变化,目前的运动却并不排外。

目前惟一的危险是,某一方为了损害列强对它的敌人的看法,对外国人犯下某种侵害罪,尔后又嫁祸于对方。

我刚向总督作了一次明确的说明。租界上确实住着一些革命党人。然而衙门一方面答应得好好的,不干预租界的治安;一方面却又派了一些秘密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居住者的姓名、出身、职业等等。

我通知总督说,从今以后,我将让人逮捕和关押那些行为可能有碍市政治安或反政府骚乱的侦探。

他回答我说,天津道台确实有些积极过分了,我的申诉将得到满足。

在别的租界上,衙门的秘密警察已被驱逐出去。

北京满汉两族难民继续向殖民地涌来,旅馆住得满满的,可用的房屋都租了出去,甚

① 西蒙(Simon)。——译者

至租给天津老城区的官吏和显要人物。尽管天津人在华北素有同广州人在华南一样的好闹事的名声，这次消息却至少来得过早了。

今天主要的危险存在于军队之中。而我们在这里却只有保安力量（根据1901年议定书所规定），而且，我们那位丧魂失魄的总督还打算解除他们的武装。卸下他们的保护人手中的武器的想法时时萦绕在官员们的脑际，而这也正是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言行不一致和疑虑重重的最明显征兆。

尽管外务局局长对我肯定说，他们已采取措施要从满洲调来的骑兵团（尤其是七旗）不在本城的两个站（租界站，老城站）停留，可大家确实还是害怕他们会在天津下马。

然而，哗变在天津的这边或那边发生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暴乱发生在别人那里而不是在自己这里使官员们感到满意，而这也是各省或各县的各个级别官吏之间拒绝合作的原因之一。

犹如我多次、特别是在1910年12月26日的96号信中向部里汇报的那样，外国人在这个港埠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在本地老城区可能发生革命运动，而且运动肯定也正在酝酿之中。没有警察的叛变这些运动是不可能进行的，但是，即使有这种叛变，动乱和抢劫也会限制在衙门里。

至于各租界，它们的防守力量是足够的。英国人发电报留下了已经上船准备去印度的英尼司吉林团①，这个团的任务转派给一个沙美西团②。这倒不会有什么坏处，尤其是因为使英尼司吉林官兵们摆脱了他们的拖累（军官和士官们的妻子）。需要时，他们可以用来守卫1900年以来陆续撤离的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沿线各站。

日本人在暗暗地加强他们在这里的兵力。他们那方面可以负责守卫满洲铁路，从而，完成了对北京、海洋和欧洲之间的交通的防护，如果冬季北河被封住了，而骚乱还在继续或越来越严重的话，这条路却还是可通行的。

如果皇族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去寻求避难所的话，他们也可以在这儿找到一条通往满洲的可靠的道路，满洲将在日本人手中变成第二个高丽。这种说法在这里流传颇广，而且也很有可能实现。

有人认为目前的运动是因为有日本人在搞鬼，因为正是这个运动会使不知何去何从的中国接受东京政府的影响。

（签字）

〔中国驻天津领事馆　亚洲处　No83〕

---

① 英尼司吉林团（Le bataillon des Iniskillings）。——译者

② 沙美西团（Un bataillon des Somerset）。——译者

187.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27日，北京）

自24日以来，对峙双方的相应力量未见明显变化，然而在北京，政府周围，强有力的瓦解作用正在完成。没有一点来自南方的消息，官军正逐步接近它的目的地，一场严重的战斗随时都可能爆发，但在京城，大家都料定它会失败，一点信心都没有。昨天，革命党赢得群众，答应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给他们减少赋税，给他们比较公正的官吏。今天登程的军官则公开对公使馆的成员说，他们不会对叛乱分子开枪。外务部官员并不隐瞒他们希望看到革命党获胜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能稳住阵脚那才是奇迹！

然而，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只要荫昌将军得到一次胜利便能解决一切问题。说话太大胆的人会突然变得谨慎起来，官员们重又兢兢业业，皇上的奴才又个个都是忠心耿耿和热忱勤勉的了，又会用东方修辞中最美的语言歌颂他空前绝后的功德。那是因为中国人最缺乏首创精神，在这数不清的人群中，善于行动和指挥的人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罕见。

所以，人们常说，下一次冲击将决定皇朝的未来。这种说法乍一看显得很绝对，但它用不了多久便能得到证实。几天来，不满情绪在各个阶层中的发展是那么快。

然而在北京，街道面貌几乎没有变化。警察们好好地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中许多剃光了头发的人现在戴着假辫子出来。有些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但是群众仍如以前那样激动不安，而各项事务却没有中断。

然而，对未知危险的恐惧在与日俱增，有人提到在土著地区可能发生骚乱。由于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一星期来，已经有大约五百名警察开了小差，这是内务部侍郎昨天对我们的一位同胞说的。但现在仍是一切太平，尽管有过几张立即被警察撕掉的革命党的布告，某些想象丰富的人所预言的事变仿佛还是很难令人相信。不管怎么样，中国人一致认为外国人不会受到威胁，而来北塘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朝廷对局势的危险性是确知的。前天，理藩部大臣寿耆亲王在接见我的时候清楚地表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自太平军造反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处境。"他还影射城里流传的朝廷逃往热河的谣言说："真是疯了。我们谁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一旦离开我们的宫殿，便永远也回不来了。"如果说有的人已经想到了离开首都，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考虑将使他们尽可能地推迟行期。

总之，政府各部院仍然是那么举棋不定。如果说那里还作出了一项决定，那便是对现制度的敌人们的一个让步，例如这次罢免邮传部尚书盛宫保——现内阁要员和铁腕人物。然而，他们却还在犹豫是否应为袁世凯重返朝政作出必要的牺牲。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他们已经占领的各个点周围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力求刺激人们的想象，通过伤害首脑人物使皇朝的拥护者们感到害怕。24日，九江被攻下，九江附近的许多小县城归顺革命运动。前天，在广州，新上任的旗人将军出事。他刚下船没多少时

间，正到达他的衙门，便同其他三十人一起被一颗炸弹炸死，刺客未被抓住。

各地暴乱的发展情况大概如此，而袁世凯则仿佛仍然避而不出。人们枉自寻找着能够阻止暴乱的首领。

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34〕

188. 中国政局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1 月 11 日，北京)

根据前天临时参议院二百名成员中八十四名赞成、无讨论通过并于昨天颁布的宪法，这次议会拥有一切权力，包括选举总理。皇帝只是批准它的决定和担任名义上的军队统帅。同叛乱者的谈判尚在继续，而那些政令仿佛并没有产生所希望的全部效果。另一方面，在参议院和反袁青年军官中正掀起一场强有力的运动，那些青年军官把袁世凯视作旧中国的代表。昨天，上海的中国地界和吴淞要塞被革命党人占领。海军司令派出一支分遣队登陆保护租界。官兵在汉口向前推进。在北京，满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忧虑情绪在滋长，但仍然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危险。

斐格

〔外交部　No114〕

189. 政治形势，上海的临时政府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 年 11 月 13 日，上海)

我在上一份急件中告诉过您，我已正式接到革命党人的通知说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它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我还给您寄上了该政府让我递交的正式信件的译文。今天我想跟您说的是这个新政体的特性和倾向。您肯定会注意到，原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阁下被委任的不只是上海的外事，而是被任命为整个中国的外交部长。一个相应的职衔给了他的助手温宗尧。温在几天前还在南京担任总督的外事专员，他的官阶是道台。我在谈到徐州和江西的宗教事务时，已经对您提到过他。他声望极好，在以前的职位上就已能取得外国人的信赖。

沪军都督陈其美来自武昌，是武昌的黎都督派来的。他在上海颇不为人所知。陈代替李燮和的位置，李则赴南京。李担任的主要角色仿佛是革命游说人。革命在一座城市里成功后，他又到另一座城市。我已经对您谈到过民政总局局长李平书，他留任中国地界市长之职，以及商务局局长虞洽卿。至于财政局长沈懋昭，他是当地一家大钱庄的经理。

从革命党的观点来看，这个临时政府至少在对外关系方面，应是未来的国民政府的核心。他们希望各省在宣布独立以后把它们须与各国商谈的工作交给这个政府处理。据说伍廷芳加入革命运动的消息将会得到外国的热烈欢迎，他的见识和稳重，以及他对西方世界各种现代机构的深刻了解均被认为是十分可靠的保证。这是一个有能力胜任他所接受的职务的再好不过的人选。如果可以相信上海《中国快报》的说法，在美国，人们都把目光注视着他。我已对您说过，他的好感似乎是在合众国获得的，而且毋庸置疑，他本人在华盛顿是受欢迎的人。他曾与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①先生有过一些电报交往，这些电报已由报界发表。卡内基先生祝贺革命党人所取得的成就，伍廷芳给他的回电说："我们感谢您。我们为自由和获得一个好政府而奋斗。请您请求贵国政府承认我们。"伍廷芳收到回电如下："我国肯定是首批欢迎一个兄弟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中国快报》发表了一份华盛顿电讯，宣布说这个承认问题已提请讨论。

显然，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引起列强的注意。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个要人、哪个议会或大会能够声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连代表宣布独立的各省都不行。然而，人们已经相信，促使召开一个制宪会议以决定未来的国家政府的形式，对伍廷芳并不是一件难事。中国革命的结果仿佛只能是建立一个共和国，或者可能性更大的是建立一个由联邦条约统一起来的多共和国的整体。在革命党的领导班子里，没有谁觊觎皇位。内战只进行了一个月，成为新中国的新的天子或立宪君主的野心还未能在被各个事件置于首位的那些人的头脑中萌发。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定居的欧洲人不大相信，因此有谁对他们描绘这个共和国的面貌，他们便以一笑置之。您知道，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对这个国家，对它的历史和人民都毫无了解。他们认为中国的共和党人是在想入非非。《中国快报》发表了伍廷芳在一次记者访问中给他们的答复，他说：

"外国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原因在于他们对现代中国的看法与事实不符。中国人历来受皇帝的统治。然而，这种往往要靠武力来使人民服从的传统，并不妨碍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深深浸透着民主思想的民族。惟一可能存在的君主政体是满洲人的君主政体，而满洲人是为民众所厌恶的。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和对公众思想可能产生作用的大多数重要人物，他们拥护共和政体的心情是真诚的。革命后产生的各个临时政府那么容易地建立起来和发挥作用便是一个明证。它们得到完全的尊重和维持着最严格的秩序。"

伍廷芳还声明说："完整的中国仍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某个省宣告独立绝不意味着它脱离国家的其余部分，而是说明它与帝国政府公开决裂。连广州也绝不会是分离主义的。"这些声明，尤其最后这个声明值得注意，因为伍廷芳是广州人。

伍廷芳和他的合作者们刚给摄政亲王发了一份电报，此电抄件和译文附于此信后。在电文中，他们正式通知摄政亲王说，中华民族向往过共和国的生活，君主立宪对他们是

① 卡内基(Carnegie)。——译者

不能接受的。他们答应，如果皇帝退位和同意承认新政府，新政府将对亲王和皇族成员以礼相待，并保证他们能平平安安地享用他们的财产和受到他们应有的合理的尊重。根据《中国快报》的报道，此电由美国公使馆转交摄政王。电报由伍廷芳、温宗尧、唐文治、张謇签署。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我在谈到美国的某些计划时就已经向您述及过这位要人。如您所知，这是一位著名文人，是值得注意的能处理大量事务的人。

《中国快报》是美国人在上海刚刚创办的报纸。它的消息来源之广、通讯记者人数之多，它的记者们的应酬能力、大胆和顽强，使这份报纸立即便成了上海报界之首。今天，我在这份报纸上读到了一些有趣的文章，文章述及革命运动的形成、孙逸仙的长期准备工作、孙与纽约诸银行家的关系、他从他们那儿取得的贷款是如何予以担保的，等等……我已让人给您寄上这些文章的摘要。还应补充的是，《中国快报》可以被看作是伍廷芳的喉舌。

我在上次急件中曾对您说南京形势令人不安。我们所收到的关于这个城市的消息十分夸张。南京无疑发生过许多暴力行动，也有过冷酷的令人憎恶的凶杀，可是满洲人并没有对不留辫子的汉人进行普遍的屠戮。另外，迄今为止，南京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斗。革命军在离该城五公里外扎营。城里守军是中国旧式军队，来自江苏的北部，由某个叫张勋的将军统率。张勋并不装出清朝捍卫者的样子，但他在进行千真万确的讨价还价，想为他的背叛取得最高的售价。市民们惊恐万状，他们纷纷逃走。欧洲人退到了江边的下关，生活在一些废旧船只上。革命党人要等镇江和上海的革命军汇齐后才会开始进攻南京。

安庆和芜湖未经一战便落到了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们手中，那里一片平静。相反，在江苏的整个北部，一般被称作江北的那块地方，却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清江浦总司令不在，周围没有相当有力的权威人士维持秩序。流民和大兵侵入各城镇大肆劫掠。清江浦以及憩坝和王营泽①的各大市集遭到焚烧和破坏。那里的损失估计达四百万两银子。淮安因有城墙而使这个专区重镇免遭同样的灾难。稍北的宿迁也爆发了相似的骚乱。无政府状态蔓及这整个地区，使南方的重要城市扬州府也受到了威胁。

据11月7日来自汉口的可靠消息说，那里的欧洲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各国海军司令不相协调，领事与领事意见分歧，司令和领事之间也不够了解。据说，德国人同情保皇党人，日本人对他们的态度十分恼火，准备对他们发起一场激烈的新闻战役。

今天，北京来电宣称萨提督的舰队中有三艘战船叛变，官兵投降。同一份电报确实还补充说，人们预料这支舰队将撤往北方。

我的同行侯耀先生来信，要我务必请卡斯特里海军司令亲赴汉口，如果他不能去，至少要他派"伊贝维尔号"②前往。我把侯耀先生所强调的理由告诉了我们的分舰队司令。但是说实在的，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让目前停泊在上海法租界前的惟一的一艘法国军舰驶往汉口是不是合适？卡斯特里海军司令也不同意离开上海，他目前在此担任总指挥。

① 憩坝(Chiba)；王营泽(Wouang－In－Zhe)。——译者

② 伊贝维尔号(Iberville)。——译者

湖北麇集着各国数目众多的巡洋舰和炮艇,我们组成的中国分舰队使我们在那里显得很寒酸。"伊贝维尔号"起航会使我们再度"丧失面子",而这一次却是在上海。我们在上海有与众不同、令人忌妒的地位,在这里,我们拥有地域广阔、有十万零二千居民的租界,现挤满了避难者;我们的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而我们的警察局需维持从黄浦江到离江七公里的徐家汇的秩序。

况且,汉口的形势并没有继续恶化。德国海军司令坐"水獭号"返回上海,英国海军司令坐他的"阿拉克丽蒂号"快艇接踵而至。这位英国海军的副司令温斯洛埃①一到上海后,便将行使上海的最高指挥权。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No86〕

190. 直隶省情况
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1 月 20 日,天津）

我收到的来自该省内部的消息并不是很坏,但也并不好。

遣使会管理财务的教士告诉我说,义和拳分子在保定附近的各个县里重新抬头,小股小股的士兵开始溃散,并在此地生活。这是可以预言的、意料之中的。

耶稣会修道院院长在他的教区作了一番尝试。尽管除了反对物价上涨的示威外,并未发生严重骚乱,人们却还是忧心忡忡。

官员们被弃置不管,他们吓昏了头,希望找个避难所,必要时打算进基督教。我们的传教士要听听我的意见,然而这种意见是很难提的。我一边提请他们注意随机应变,一边这样回答他们的问题:谨慎小心地置身于政治派别之外,任信教的当地人去承担他们的风险,爱参加哪一边便参加哪一边。审慎地召回冒冒失失地进了一些敌对中心的传教士,并在他们集中的住宅里组织好防卫工作,这些住宅大多数都抗住了 1900 年的攻击。接待任何寻找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的避难所的逃亡者,又要不影响自身的安全。这是我们在租界里已经和仍然在做的。逃亡者一旦得到庇护,便不应对他们的敌人继续进行阴谋活动。

迄今为止,可能要求保护的首先是那些保皇党人。贝杜亚中校曾转来一些问题要听我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山海关、秦皇岛和塘沽的分队司令提出来的,当地官员向他们询问,需要时,他们能不能到我们的驻地来避难。

我给他们作了与对传教士们所作的同一意义上的回答。

显然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保持绝对的中立。换一种态度便可能招惹报复,我们的同胞和被保护者便会因此而遭殃,并且没有恢复的希望,因为政府不是一个,而是有几个,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目前到处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人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制度

① 温斯洛埃(Winsloë)。——译者

下，不知道找谁去说才是。

一个责任政府的建立在天津遭到了冷遇，尽管北方人的胆怯还曾使之产生一缕希望的微光。

袁世凯除了他的广州帮(唐绍仪、梁敦彦等)，并没有可靠的拥护者，而这个广州帮也在准备抛弃他。人们指责袁要弄小手腕、收买报界、伪造消息，尤其是对官兵的暴行不闻不问。人们没有忘记袁对改良派的背信弃义，而令人惊讶的是，袁居然还想把一些人召集到他那儿去。那些人是不会去的，因为他们的家族在1898年事件后，曾因朝廷的命令而遭到杀戮。

我同好几位同行一样，接待了天津的主要头面人物：省议会或同业公会的成员。他们每个人都怀着对清皇朝的仇恨，同时又害怕官兵的暴行，他们觉得革命党人要比官兵好些。他们很想像山东那样宣布该省独立。总督已经接到了通知，但他对此不置可否，暗地里却在加强受他统制的兵员力量。外事局局长曾对我说，他们还为这批兵员储备着四个月的粮饷。

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将面临一个动荡不安的冬天，一群群的饥民和散兵游勇将对省里进行定期勒索，而这又并不影响其他政治混乱的掀起。

四十八小时以来，大批北京人又重新涌往天津。这些迁移者仿佛属于十分富足的阶级，在最近这种恐怖时期，他们没法子为自己搞到专列，又没能和不敢搭乘普通列车。

(签字)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　亚洲处　No100〕

191. 云南近况

萨洛[①]致法国殖民部

(1911年11月21日，西贡)

据可靠消息，英军可能会占领腾越。许多迹象表明，目前的平静不会持续。蔡将军可能已被云南分离派所囚禁，并有人说要杀他。传说士兵准备暴动。参谋部好几名军官请求我帮助他们潜逃。我认为严重事件正在酝酿之中，因而催促妇女与儿童提前动身。成都来电说诺瓦莱[②]已到。建昌[③]来的新信使肯定了对勒让德尔考察团的攻击，勒让德尔大概已与德西里埃[④]一起被杀。

萨洛

〔殖民部　No425〕

① 萨洛(Sarnaut)，法国驻云南领事。——译者

② 诺瓦莱(Noiret)。——译者

③ 建昌(Kien Chang)。——译者

④ 勒让德尔(Legendre)；德西里埃(Dessirier)。——译者

192.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1月21日,北京)

几天来还没有发生任何新的情况使敌对党派各自的处境产生显著的变化。袁世凯在北京组阁,有些阁员出自不同原因决定不与他合作,于是袁把他们替换了。一周来,他与使团领导人中的大多数进行了连续接触。前天总理在秘书们的簇拥下,在很多士兵守卫的寓所接待了我。他目光炯炯,语言清晰,并不掩饰他已着手的工作的困难,但他希望能把这工作搞好。为此,他将开始与叛乱者们谈判,力求说服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找一个达成谅解的基础,然后他将采取行动。听他的语气,我完全理解这个行动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目前的运动是外强中干。他已经给大多数中心派了代表,开始与那些新组织会谈,从而求得和解。山东已接受那些建议,其他地方也将这样做。

然而在南方,革命党人方面也在努力创建一个合法政府。在武昌,黎元洪都督宣布自己为共和国代位继承人。他得到了其他都督或多或少地有意识的赞同。黎已把担任新职一事通知各国领事,请求得到正式承认。新政府已召集了一次议会,但却确定不了下次会议是在上海或武昌召开,因为这两个城市都要求成为临时首都,也说不准有几个省响应了他们发出的号召。各省之间已经表现出了不同倾向。运动初期占主导地位的良好秩序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这在好些地方对外国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

盖布里耷主教来电告知几天前卡斯达奈①神甫和两名基督徒在四川会理突然被杀的消息。几小时后,驻云南府领事又报告公使馆说,传闻勒让德尔博士和他的同伴们已惨遭不测。一名中国仆人刚到该城,叙述了考察团有两名成员,无疑是勒让德尔先生和德西里埃中尉,在离宁远府北方五十公里左右的地方遭到攻击,诺瓦莱上尉几天前离开他们去成都了。这个仆人逃出来时,那几个已经受伤的军官退入汶水洞②村。为了营救他们,德昌县尉被杀。维尔登先生补充说,从此官方对越来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无能为力了,他收到一封信说有三名欧洲人遇害,因此对我同胞们的命运可抱的希望也是不大的。他准备把妇女儿童遣送东京,同时送走那些对铁路运行并非绝不可少的法国人。

今天陕西发来同样的消息,兴安府发生了真正的大屠杀,某个叫贝克曼太太的校长同五名儿童被杀,她的学校和邻近的新教教堂被焚毁。官邮局长、一个叫赫纳的德国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他的两名英国助手下落不明。最后还有那些天主教传教士,一段时期以来他们杳无音信。对这些人的忧虑与日俱增,欧洲受害者的数目估计已有四十六人。

某些领事已经在庆贺叛乱者们十全十美的组织,祝愿他们再接再厉,为文明的进步夺

---

① 盖布里耷(Guébriant);卡斯达奈(Castanet)。——译者

② 汶水洞(Woueng Chouei Tong)。——译者

得新的胜利，并希望从现在起便能承认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乐观仿佛还为时过早。从各起义省份的主要情势来看，我们能够肯定的，至少外国人的安全并未有所好转。一旦革命党人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那么值得担心的倒是在其他方面，新政体别给那些早就在为它歌功颂德的人们带来五花八门的令他们失望的事情。从日本或美国回来的新的公职人员很可能会使他们常常怀念那些旧官吏，他们虽然习惯过时，行动迟缓得有时令人恼怒，却至少还讲点礼貌——他们一直很注意的礼貌。要说他们反对外国人，其实，在个人的尊重或别的什么感情面前，他们便会丢开他们的排外主义。这种感情却是新中国的年轻的理论家们所不屑一顾的。

面对着如此不稳定的局势，我认为应当坚决要求海军司令德·卡斯特里放弃12月3日带"迪普莱克斯号"返回西贡的计划，使他得以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海军司令德·克里利斯①，后者将于13日抵达。我确实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这种调动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我已要求他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向海军部呈报我的反对意见，请求海军部对这个问题作出指示。

另一方面，按照来自巴黎的一道命令，印度支那总督需要了解，一组75毫米火炮和二千发炮弹对我是否必要。我告诉他说，我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这批装备会给占领军带来力量的壮大。然而，我觉得更令我向往的是兵员的增加。一次次的遣返回国实际上减少了我们的军队，甚至已经使我们很难参加显然是必要的行动。所以，人员的补充更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可能的话，在人员的增长上再有益地加上所宣布的那个炮组。

现在的北京是比较平静，但它已有很久时间处于不平静之中。恐怖消失了，它却随时都可能再现。政府的处境仍是不稳定的。到处都没钱，国库空虚。士兵拿不到饷银很快便变成强盗，这在中国比在别的国家更厉害。因而，放在新内阁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借一笔款子。有了这笔借款，它就能继续下去，维持秩序和拖垮革命军。我们估计，对持续太久的骚乱厌倦了的中产阶级将离开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下答应给予帮助的国家也便将享有它的一切优待，所以，我们的某个对手已经在用更加诱人的帮助，力图使人忘却我们在一些特别困难的时期所给予的支援。

斐格(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67〕

193. 革命运动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1日，北京)

正如我在11月28日的汇报中让阁下有所准备的那样，攻克汉阳显然已在全国引起

① 德·克里利斯(De Kerillis)。——译者

反响。中国民众虽说素称迟钝,喜怒哀乐的变化却十分敏捷,他们今天因为一些轻易取得的成功而兴高采烈,明天又可以为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垂头丧气。这几天在湖北发生的那些事件便是一个新的证明。

如果汉口最近的几份来电所指出的情况是可信的,那么革命党人会因为他们新近的几次失败而泄气。在轰炸的威胁下,武昌会竖起白旗,乞求停战;黎元洪都督会归附于君主立宪纲领,他会请求给他几天时间,以使他得到各省的赞同。

如此看待事物未免有点太乐观,这么突然地便取得如此完美的成果也仿佛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事变的后果很可能是有限的。我们已经知道,在湖北和湖南的部队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在最近的几次战斗中他们互相指责,有人肯定地说,有好几千湖北士兵情愿转入官兵的行列而不愿与他们的对头并肩作战。斗争事态的变化至少又一次证明了各省之间互相怀着强烈的仇恨,对新政体而言,建立一个军事政府是何其艰难。

不管怎么样,袁世凯的地位因为这一成就而明显地得到了巩固。南京陷落的消息也还没有冲淡它的效果。总理可以希望这一结果将有助于使一些正在举棋不定的省份靠拢帝国,例如在山西,它将促使叛乱者们倒戈。

但是有一点仍是不清楚的,它使前途没有把握。政府与共和政体拥护者们一样,缺少财政来源。共和派取消各种捐税,靠海外信徒寄来的自愿资助过日子,而帝国当局则已在战争中倾尽了最后的资财,必须不断地求助于借债。如果它能通过这个办法获得资金,我们从此便能希望它克服当前的困难,建立新的立宪政体。否则,几天或几星期后,军队将溃散,恐惧将在中华大地上散布开来。

因此,如果能够帮助它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予以拒绝,而使这个国家无可挽回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各列强国对此将负有严重的责任。德国从它那方面已给官兵提供了他们所要求的全部装备,并对军官们帮助官兵的行动睁只眼闭只眼。某些人还肯定说它所做的不止于此,说它已给政府预付了某些款项。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德国在这方面能有多少作为。所以,如果科蒂贷款①有所结果,使袁世凯手头有了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需要的款项,从而得以结束战斗,那么,他的感激对象应是我们。

乔治·斐格(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80〕

194. 攻克南京,革命党人的处境
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年12月5日,上海)

我荣幸地向您进一步肯定江苏和浙江的革命军攻克南京的消息。这支军队已于12

---

① 科蒂贷款(L'emprunt Cottu)。——译者

月2日早晨进入该城。自前夜起，官军停止了一切抵抗。张都督曾提出投降，但条件为战胜者所不可接受，他想带着武器和行李离开。不过，他还是带着一千名士兵从南门逃走了，估计他已渡过长江到达浦口。总督和满族元帅的情况也如此。

南京百姓欢迎革命党人，蓝旗到处飘扬。外国人丝毫未受到骚扰。逃到废旧船只和水上住家躲起来的外国人都回到了他们的住所。相当多的房屋被炸毁。南京攻克后，满族城区被焚毁。南京到安徽的铁路已于昨日恢复通车。

攻克南京的革命军大部分开往汉口。他们由大部分炮艇和一些军用帆船护送，前锋大概已经到达九江。约一万人马顺着新铁路北上徐州府。这支军队可能会遭遇由老将姜桂题统率的师，据说他是袁世凯派往南方驰援南京的。最后，议论得比任何时候都多的是广州的另一支北伐部队，这支部队从海上逼近北直隶湾，它主要的目的是迫使皇朝政府在那儿也分兵防御。

如您所见，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们远没有气馁。相反，他们正打算扩大他们的战果，他们始终希望新的胜利将使他们在北方的支持者们下决心加入行动。

昨天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十三省代表会议，与会者代表了居于各省政府领导地位的军事领袖。他们任命几天前从武昌来到这里的黄兴将军为总司令。黎元洪将军被任命为副总司令。由于黎元洪必须留在武昌对付官兵，大家认为他可以像最高领导那样自由行事。另外还决定把临时政府的首都从武昌迁往南京。至于共和国临时大总统的任命问题，须待孙逸仙到达上海后再予解决。

我从我的英国同行那里得知，共和政府曾从中国南方收到相当多的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解决最初的财政困难。但是，金钱问题仍然是革命运动的明显障碍。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起义的省份一般地比北方各省富裕，从这些省取得较多的收益是可能的。这些收益大致能与满清王公在北京积累起来的财富相抗衡，它当然将用作战争金库。

印度支那银行刚又通知我说中国应付的赔款尚未付清，此项金额到10月份为979400法郎。在此，谨寄上阿尔丹先生来函的抄件。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亚洲处　No98〕

195. 革命运动；摄政王辞职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8日，北京）

我在本月5日有关革命运动的急件中，曾提请阁下注意袁世凯对朝廷的态度，他从此只依靠皇帝和皇后、恢复他对朝廷的坚定信心。本月6日颁布的懿旨仿佛使他十分满意。

正如部里能看到的，该懿旨认可了皇室又一次放弃的它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变成了内阁总理和部长们的特有权限。懿旨提到对于摄政王“在三年摄政期间违背民情行事”，因而导致“一场浩劫”的“内疚”，“产生于这一行为的大量弊端渐渐造成人民与朝廷离心离

德”,“仿佛崩坍散碎的屋瓦”,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威力”;这位亲王的辞职被接受了。今后,官员任命和国务管理将全部由大臣会议裁决,皇帝和皇后接受朝见,幼君的安全将由两位监护人世续和徐世昌负责。

这道由皇太后颁下的懿旨标志着亲王政权的终止,并指示他们“严格遵守皇室规矩,不得逾越界限,向当前的危险进行斗争”。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个新政策不会不遭到亲贵方面的反对。但是直至今日,像这一类的后果似乎还不曾发生,而不管它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它还没有以任何外部的行动表现出来。

相反,这道懿旨似乎并没使革命党人对皇权的看法有多少改变,也没有对温和派们希望与总理达成的和解有所裨益。倘若袁世凯派唐绍仪和杨士琦为代表赴汉口与反对派领袖们建立联系并商讨和解办法,一部分叛乱者不会接受他们的主动接近,甚至会拒绝参加会谈。就在昨天,锡良还曾对我肯定说,像这样派出的代表到头来只能见到黎元洪都督的朋友们,上海共和当局的代表是一个也不会与他们碰头的。锡良原任满洲总督,现任热河都统,是内阁首脑的心腹。

尽管已取得的成果将失去它的重大意义,我们也不能否认,一旦达成某种谅解,对舆论将产生巨大影响。从现在起,这种努力便已初见成效,正如我在本月 7 日的电报中告诉阁下的那样,它已使英国公使放弃他对政府的强硬态度,同意香港银行和另三个财团预支给他们三百万两银子,以应目前之急。这样,他们便能在休战期间确保各行政部门的正常工作,而如果休战时期延长,则将以同样方式为袁提供新的资金,直至战争行为重新开始。这样,他便不再有来日之忧。在目前情况下,惟有这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优势。

然而,来自南方的消息却难以使外国人对预料中的未来放心。盗匪活动在各处都日益猖獗。由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士兵组成的人数众多的集团,为了抢劫的目标而汇聚到一起,纵横驰驱整个地区,对农村采取恐怖手段。河南、陕西、广西、云南的局势都一样,宣布自治的地区越来越混乱。昨天公使馆还接到印度支那总督的通知,说骚乱在我边界蔓延,已使我铁路遭受损失,公司以后还要因此而提出抗议。萨洛先生同时要我告诉他是否觉得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武装干涉云南。

我告诉他说我将把形势给我们造成的后果通知外务部,同时提请这位高级官员注意,开启诸如所提议的那种端倪,我认为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我向他陈明了尽可能地延迟使用这种手段的理由。实际上,将逃不脱这种必然的后果,即本来是一场反满清皇朝的运动突然变成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并且可能给印度支那带来一系列困难,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骚扰边界地区,甚至引起我殖民地内部的混乱。最后,它肯定会被其他列强援引为理由,使它们得以采取直接行动,虽说它们野心勃勃的计划对谁都不是秘密,但要采取直接行动,它们却依然在犹豫不决。

然而,列强政府的克制能持续多久?阅读来自满洲的那些电报有可能令人考虑到这一点。根据贝尔托先生发来的情报,俄国人已把大量增援部队派往边界,在中国东北附近几乎已集中了它的所有车辆,而日本人也时刻准备行动。这便是迹象,如它们能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则能令人预测到即将开始的行动。但错综复杂的情况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尚

难逆料。

乔治·斐格(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94〕

196. 南方铁路

塞尔夫致法国驻河口领事

(1911年12月11日,巴黎)

答复您12月10日来电。

您不应只呆在驻地。

请注意,放弃铁路是最严重的错误。因此您应向中国当局提出坚决要求,这不仅为尊重铁路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也是为了维护通车,任何侵犯、甚至任何阻拦均会导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保卫我侨民的生命和捍卫我们的利益。

我相信,为避免这种可能,中国当局会采取形势所要求的一切措施。

不要对中国当局或印度支那方面明确地说您曾要求给您三百名士兵。如因付不出军饷和缺少资金以致妨碍维持秩序时,我们可以同意预支;您可同印度支那总督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塞尔夫(签名)

〔外交部　电报〕

197. 南方铁路

塞尔夫致法国驻河口领事

(1911年12月11日,巴黎)

提醒中国当局,若他们不能用他们的方式不仅确保尊重我侨民的生命安全,而且保证维护我工作人员进行铁路业务,我们将自己来保护我国侨民和保卫我们的利益。

我相信,为避免这种可能,中国当局会采取形势所需的一切措施。如缺乏资金以偿付军饷和保证治安,我们可以同意预支,为此,您可与印度支那总督协商解决。

在您那个方面,请留在您的岗位上,不再放弃铁路线,不到最后时刻,请不要撤离。

塞尔夫(签名)

〔外交部　电报〕

198. 责任内阁的境况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2 月 11 日，北京）

自 11 月 17 日我向阁下汇报内阁组成那天以来，内阁人员情况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对未来的无把握、尤其是没钱，导致了有些人的变节。

应当承认，在目前的形势下，领导度支部是一项相当地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个部很难找到一个最后的正式任职者。严修仿佛正忙于同革命党人谈判，在他缺任期间，由绍英署理，但他从任命之日起便请了长假。副大臣陈锦涛因为在试图借一笔债款时遭遇困难于前几天辞职。他的继承者是周自齐，外务部左丞。周自齐曾留学美国，他当过驻旧金山总领事，驻哈瓦那总领事，1907 年任驻华盛顿代办，并作为秘书多次陪同载洵亲王出使国外。

沈家本，司法部大臣，他的假请得十分有规律。副大臣梁启超是改良派领袖之一，在内阁中代表进步党，他干脆拒绝赴任，但也没人替代他。没有人替代的还有辞职的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在邮传部，署理大臣杨士琦尚未就职，唐绍仪一直拒绝领导这个部，目前该部由梁士诒主持。唐目前正率领使团与革命党人在汉口谈判。

然而 11 月 30 日的一道圣旨授予各部大臣在紫禁城里骑马行走的权利。这种恩宠过去难得给几位阁老。他们曾想把这种恩宠给了各部大臣后，能提高这种官职的威望。这一算计在现实面前没能站住脚。由于缺乏经费，各部人员都跑光了，部里空空如也。只有外务部、内务部和军事部门还在坚持有组织的工作。整个政治生活便以袁世凯为中心，各种事务全都汇总到他那里，一切决定都得由他去作。内阁由他私人的朋友们组成，阁员中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没有一个省代表或新思想十分突出的代表。作为这样的一个内阁的总理，袁现在在皇太后和幼帝身边的样子真像是政府惟一的工人。

斐格（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400〕

199. 革命运动；上海会谈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2 月 15 日，北京）

唐绍仪在汉口与黎元洪将军讨论了形势问题后，决定将谈判地点迁往上海，他希望在上海能找到一些更有资格的省代表。然而，通过与革命党人的初次接触，他对他们的愿望已有了大概的了解。英国领事正在为双方会晤积极调停。根据英国公使对我谈到的有关情况，会晤包括有三个主要内容：让各省广泛自治联邦政府；给下野的皇族成员以合理的年金；给其他满族人以公正的待遇。没有任何要求是针对政府形式提出来的，也没有提到

对皇帝和皇后的退位最终应作什么决定。然而约翰·朱尔典爵士则认为他们大概会要求君主去较南的地方定居，放弃留在北京。他们希望这样可以使君主与迄今为止迷惑着他的种种影响离得更远一些。

不管是些什么样的迹象，唐绍仪已于昨天白天动身，打算18日到达上海。直至他同运动领袖们的初次会晤后，要对谈判下判断还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很难否认，继续谈判的新场地对和平解决目前的冲突比以前选择的更为不利。朝廷代表在上海实际上将遇到比他们迄今所接触的明显地更为激进的对手，而在唐绍仪和伍廷芳之间的个人争斗还将使本身就已经够复杂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如果与这种预计相反，叛乱者提出的条件仍是在第一次会晤中提到的那些，那就有可能达成和解。照内阁总理的心腹们所肯定的情况来说，袁确实准备作出一切让步，以获得如此向往的结果，而这只须牺牲明显象征中国统一的皇帝和皇后。

在北京的大多数外国使节、尤其是英、德、美三国公使的愿望也倾向于求得这样的解决办法。在一次四方会议上，他们明确地表达出了带有这种倾向的意见。今晨我们对这次会议讨论的形势和作出的决定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看来，由于两派都缺乏资金，使中国目前面临着无政府主义的威胁，并使人觉得这种无政府时期仿佛已近在眼前，而袁世凯则是当前尚能使这个国家避免混乱的惟一力量。

所以，尤其是卡鲁恩①先生和豪森②先生竭力主张用预支款的形式即刻给袁以有效的援助，而不要顾及诸如此类的行动可能会引起的麻烦。我和朱尔典爵士一方面保留我们两国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予答复的权利，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一主张在目前形势下对避免帝国政府被解除武装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对之表示赞同。我们还强调了讨论这个问题应有俄国和日本国代表参加，因为这个问题的经济意义与它所表现的政治意义相比较之下显得完全是次要的。因而，我们已决定请世清先生和伊集院先生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

目前，一切军事行动仿佛都已暂时停息。双方宣布休战半个月，即从本月9日起，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休战状态将于24日结束。然而，在某些地区近日来仍有战斗。例如在山西，官兵遭到叛军攻击，不得不于11、12和13日应战。科拉尔德前去就地观战，从他给我寄来的战报来看，政府军仿佛取得了此战真正的成功。革命党人的司令部所在地、该省屏障娘子关确实已被克复，共和军丢下辎重大炮四散逃窜，太原府官道从此为政府军所打开。然而袁世凯却下令停止前进，只要已经开始的谈判在继续进行，便不要扩大战果。

目前，山西军队在就地待命。但如果上海谈判没有结果，那么我们已能预料，山西省会很快便能克复，而且，鉴于它所辖地区邻近京城，所获得的结果必然会使北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

乔治·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407〕

① 卡鲁恩(Calhoun)。——译者

② 豪森(De Haxthausen)。——译者

200. 云南骚乱，伍廷芳的措施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17日，北京)

自革命运动发端、云南南部发生骚乱期间，有一定数量的欧洲人，其中大多数是法国人，他们的商店和寓所遭到了由士兵和当地百姓结合组成的队伍的抢劫，有些人甚至在遭抢时受了伤。面对这日益严峻的局面，据说是为了恢复秩序，法国政府已决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它为此将毫不迟疑地使用其在印度支那拥有的兵力。

以上传闻使伍廷芳感到不安，本月12日，他通知我国驻上海总领事说，革命政府准备赔偿在这些动乱中遭受的一切损失。但他同时请德·喇伯第先生向我坚决要求法军不要越过边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乘此机会给云南下达明确有力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让云南当局镇压目前的那些队伍，从而在谈判前夕对革命党施加压力，使他们意识到拖延这种骚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所以，我请德尚·德·喇伯第先生告诉伍廷芳，"革命政府对有关动乱负有严重责任"，并请他补充说明，如果"我出于尽可能保持中立的愿望要求印度支那总督目前不要对云南发兵，那是因为我相信革命党会进行有力的干预，以使尽快结束那种局面。那种局面的延续，必将导致严重的纠纷"。

这一通告也许将使上海政府有所考虑，希望它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解决应偿付我们的赔款问题，也使它看到接受唐绍仪为达到最后和解而提出的建议对它的好处。实际上，应该预见到，如果运动发展、骚乱蔓及北方各省，别人不会像我们这样无私，他们会赶快利用这种机会，而不顾及他们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

乔治·斐格(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政治和商业事务司　亚洲处　No411〕

201. 武昌情况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

(1911年12月18日，汉口)

昨天，我利用休战，陪同《时代报》通讯记者让·罗德先生前往武昌，我和他甚至拜访了黎都督，但那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访问。黎都督向我表示了对袁世凯的相当激烈的怨愤，他指责袁世凯反复无常，阻止达成协议。另外他肯定地说革命党绝不会同意接受任何对满清皇朝驱除得不彻底的政府。

我以前没有见过黎都督，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正直的人，思想有些迟钝，在目前情况下，他肯定完全地由那些领导革命党的年轻人所左右。尽管不像很多报刊上所

写的那样称他为他们的囚徒，但我们可以说他是他们的工具。

武昌仿佛恢复了它通常的活动，然而看到最多的是一大群一大群到处跑的士兵。整个城市仿佛变成了兵营，然而这还只是一小部分革命军，他们是自汉阳陷落后从江西、湖南和广西前来扩充黎都督的军队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前御林军指挥、罗①司令陪同我们访问武昌。据他说，武昌和附近的革命军兵员总数超过四万。约一万五千人驻扎在下游六公里的青山，一万二千人驻扎在上游十公里的金口，形成保卫江流通道的势态。在金口的扬子江江面相当狭窄，官兵要想渡江，非常可能在那儿尝试。

最后，还有五六千来自江西的革命军仍然驻扎在汉口下游左岸约十五公里处的阳逻，战争一旦恢复，他们将组成前锋部队，奔向铁路以切断北军与基地的联系。罗司令对我说他已受命指挥这支军队，他显得对最后的胜利很有信心。

革命党人一方面希望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也绝不准备毫无异议地接受别人想强加于他们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武昌之行给了我十分清楚的印象。他们随时准备继续战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那绝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成功。北军近几天来表现出了如此强大的优势，因此不能设想在同等兵力下他们不会继续击败对手。再说，革命军方面已在汉阳失去了几乎全部的大炮。他们确实放出风声说他们收到了强大的野战炮和很多机关枪，甚至还声称拥有一架飞机。我知道其中的底细。如果说确实有两个为黎都督办事的英国人在上海买下了一架伐隆厂的飞机，但这架飞机目前在中国却只有惟一的飞机师尚布勒兹先生才能驾驶。这位先生现在在汉口，他已接到了我不许他离开租界的正式命令，以避免作出任何干预当前冲突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行为。

剩下的便是希望在上海开始的谈判能迅速结束目前的局面了。此时的袁世凯尚能左右和战大局。也许在作出全民族所要求的行动之前，在承担起独裁重任之前，他还想让人再三恳请，显得是为形势所迫吧。也许，革命党人是想以强硬态度"吓唬"这个老国务活动家吧。我们不安地等待着上海的消息，等待着一旦谈判不成将标志着战祸重开的12月24日这个日子。

自汉阳陷落以来，在湖南西部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应付一场反对他们权力的对抗运动。黎都督刚通知我说他无法保证外国人在那里的安全，我不得不去电郴州地区的西班牙传教士，让他们到常德府避难。

〔外交部　No82〕

① 罗(Loun)。——译者

202. 孙逸仙在香港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22日,香港)

从伦敦来的英国火轮“德凡哈号”①昨日抵达香港,船上有将前往上海的孙逸仙博士。

孙逸仙博士在旅途中用日本化名中山,陪同他的有前美军军官荷马里②将军。人们认为荷马里将军曾担任革命党人的军事顾问,而此番前往华北是为了更有效地配合军事行动。

著名改革者抵港的消息在殖民地的中国民众中引起某种好奇的举动,为避开这些,孙逸仙登上了一艘从广州来的中国巡洋舰,在舰上,他将与香港的新总督和几位官员长谈。

孙逸仙博士自离欧洲以来所采取的态度一直未变,在记者的任何一次谈及革命的访问中,他都是以反叛者的面貌出现的。他同《华南早报》一位编辑的谈话情况,其叙述还是相当有趣的,在此我给阁下寄上一份,并附上发表在《香港电讯》上的荷马里将军访问记。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 No41〕

附:

(1)孙逸仙访问记
(1911年12月22日《华南早报》)

我已经将这艘船上下寻找了一遍,但没有发现孙逸仙的影子。我登上“德凡哈号”已经一小时了,离开航的时间只剩下不到半小时。一种极为失望的感觉油然而生。为了能找到访问的对象,我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再挨舱走一遍。正在这时一艘有巨大横梁的双桅中国火轮停靠在这个码头边,从上面下来了许多旅客,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身着西服的中国人,而且都没有辫子。这些当地改革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出现,暗示着孙逸仙此刻可能就在附近。码头上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不一会儿,一位表情果敢的小个子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他面带着笑容,身穿灰色外套,戴着黑色的圆顶礼帽。他登上了舷梯。这便是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孙逸仙博士。船上非常拥挤,不久成群的中国人涌上甲板,我不知道从哪儿一下涌出这么多人,以至于我也被卷入到随这位杰出人物而移动的人流中。这股人流在一群群孙中山的朋友们中间匆匆移动,他们当中不时出现二十年前的老朋友重逢的情景。胡都督是从广州赶来的,他过去曾是孙逸仙的助手。随同来的还有外交司长陈先生,负责交通和商业事务的姚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新政权中的显要人物,他们轮流与未来的

① 德凡哈号(Devanha)。——译者

② 荷马里(Homer Lea)。——译者

共和国总统进行了个别和集体的交谈。

我终于挤到了过道边，这简直是一次战斗。我和其他人一样受到了亲切的握手和友好的致意。“采访，”博士大声说：“是我目前最不乐意接受的事情，不，我不乐意。是的，我知道人们都希望我能说些什么，但你们应该知道我恰好什么也不能说。不久我将告诉你们我有很多话要说，但现在无可奉告。”孙逸仙操着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语。“您将从什么地方告诉我呢？”我问道，“是上海还是北京？”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博士对此恍然大悟，笑着说：“在和谈之后。”我不愿意被搪塞过去，又问道：“您对和谈有何看法？”“我不想谈论和谈之事，在到达那里之前我一无所知，请原谅。我一直在这艘船上旅行，我没有得到有关的消息。”“您对伍廷芳的对外通电如何看？伍告诫外国投资者不要给清政府贷款。”我问道。“他是那样说的吗？”博士露出显而易见的惊讶表情说道，“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很抱歉。”我们的交谈一次又一次被四周那些恳切希望与博士握手并得到他的微笑致意的人们所打断。尽管如此，我仍然问道：“您对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计划有何见解？”这是一个尖锐问题，我期望博士会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反应。“不，”询问又一次被回避了。他不耐烦地耸耸双肩，恳切地说道：“确实很抱歉，我现在不应谈任何问题。在我到达上海之前，我对一切都无可奉告。”我说：“我这里有一篇袁世凯访问记，其中谈到袁世凯赞成许多改革和君主立宪政体。您只要对此说一个字我就满足了。”“你把那份报纸带来了吗？”孙博士问道，“如果你带来了的话，我倒想看看。”我把那份报纸递给他，并催促他对此谈谈看法。“您现在看好吗？”我要求道，但没有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他说。“在开船之前您不能花几分钟时间把它浏览一下？”“我非常抱歉，请你不要再提什么问题了，我想要做的事很多，我不能回答你。”

显然，交谈就要到此结束了。一群人已经聚集在周围，一位摄影师正不耐烦地消磨着时光。甲板上排好了椅子，孙逸仙和他的一大群好友和支持者一起照了相，只拍了几张。这一活动结束后我又与孙博士攀谈了起来，但这是毫无目标的。我承认这次非常令人沮丧，Togo 也不会比他更沉默了。

(2)荷马里将军访问记

(1911 年 12 月 21 日《香港电讯》)

荷马里将军说，革命党请他来中国当参谋长。这条消息是他动身前在伦敦发布的，同时还发表了孙逸仙博士将出任总统的消息。

记者问将军：“您对那些事件和它们的发展作何想法？”将军摇摇头，说：“我没有可靠的情报资料，任何意义上的情报都没有。我知道和能够说的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最卓越的人物都同情我们。我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够对我们的行动将会有怎样的发展作公开的声明。不过，你们将会承认革命的开端是十分出色的。对一个幅员如此广大而又自成一体的国家，实际情况犹如奇迹般顺利。我们现在的愿望是尽早结束一切内战。至于我，我并不认为存在任何不顾自由原则的妥协。如果这些原则在美国是正确的，它们在中国也便是正确的。在自由问题上和在

真理问题上一样，并不存在两种标准。”

问到和谈情况时，荷马里将军答道：“关于和谈问题，在我们到达这里时，谈判已在上海中止了两天，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在新加坡曾有一些电报来往。我们到达上海后，形势也许会完全不同，我们也许要按照与我们原来设想的完全不同的路线行事，这是很难说的。”

荷马里将军说：“我的目的是把拉斐德带给美国的精神再带给中国，我感到在中国的美国人个个都会有这种精神。我们知道自由是什么，自由会带来怎样的安适。我们知道可怜的中国人民已经遭受的苦难，只要那个清皇朝继续掌握大权，中国人民还将遭受多大的苦难。我希望美国能率先承认中国的自由，如同人们在美国已享有的那样。我的愿望实际上就是要使为太平洋所隔开的中华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能够为至少相当于人类三分之一的民众保住人权和自由权。阻止外来干预和协调这几百万人对我们说来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至少我有充分信心，相信能够成功。世界上有谁会支持一个犯下如此种种罪行的清王朝呢？我是不会相信的。”

203. 上海谈判和朝廷让位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1 年 12 月 29 日，北京）

在上海聚会的南北方代表一周会谈的惟一结果是明确了共和派代表的不妥协态度和袁世凯派出的代表、他的大使的软弱无力。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是否完全听命于妥善安排的未来？这尚未可知，然而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时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像这样的决斗者在共和派看来当然不在话下，共和派对他们事业的前途信心十足，更兼有各改良主义党派所共有的热情。所以，从第一天起他们便理解了对手的软弱之处，以及他们能从中得到多大的优势，这个对手的倾向他们是早就了解了的。他们的不妥协态度显然因此而愈益坚定，袁世凯的代表对此也有了日益强烈的印象，他在一份份电文中一味地说明顺从叛逆者的愿望的必要性。

经过几次会议，事情仿佛已变得相当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谈判的结果必然是破裂，重开战火应为期不远。

然而，朝廷为了和平结束中国的危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它刚答应再次让出权力，这一退让使人从现在起便预感到了满清政体的终结。昨天颁布的圣旨表明，清廷将与共和派一起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起草一个选举法，从而选出一个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将尽早召开，负责为国家选择最后的政体。显然，从现在起我们就能够料到它的选择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然而，尽管清廷作了如此重大的让步，尽管这种让步能给革命党人极大的希望，革命党人却没有任何表示，说明他们赞成和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这道圣旨仿佛已下得

太迟，它也只能表现出政府处境是何其虚弱。今晨进步的报纸对它的态度相当冷淡，并普遍地对它将对谈判发展能产生怎样的后果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唐绍仪自昨天就几次来电说，目前在上海开会的各省代表已正式够格，可就中国的政体问题最后表态，因而认为再去召开什么国民大会毫无用处。

因此，这个决定能否产生延长休战时间的后果都很难肯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天后便将重启战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便很难对此视而不见了，一个多次表现软弱的政权领导这场战争的威望已剩不了多少，而它取胜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大减少了。另外，北京政府的国库越来越空，而孙中山却肯定将给上海当局带去一定资金。如果事情又是这样的话，这个优势将弥补共和军在军事上的劣势，而下一战，共和军所具备的条件显然将更为有利。

所以，种种迹象都在使我们相信，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重大事件将改变这里的事物面貌，只要中国人传统的对折衷中庸的爱好不导致他们把任何最后的决定都再推迟几天。

斐格(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430〕

一九一二年

204. 中国西部的动乱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①]先生
(1912 年 1 月 15 日，北京)

我觉得应该概括地一提公使馆近来接到的、有关定居在受革命党暴乱骚扰最严重地区的我国同胞的情况。部里也许可能有机会把这些情况通知到有关人员的家中。

在成都，12 月初的形势已变得相当紧张，迫使领事使团决定撤走全部外国侨民。各国领事一致同意由法国医院医生穆亚克博士领导这次大迁移，结果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变故。

迁移者们总数共一百零七名，于 12 月 12 日离开成都，1 月初到达重庆，博达尔先生也顺利地到达了重庆。5 日，他们从重庆出发，在奥什科纳先生的陪同下顺长江而下，向汉口和上海方向而行。目前在成都同娄金先生在一起的只剩下德国领事、英国领事和天主教传教士。我们的领事曾向传教士们提出可以帮助他们离去，可是他们坚持不愿放弃

---

① 普加莱(Poincare)时为新任法国内阁总理、外交部长。——译者

他们领导的慈善机构，坚持要同他们的中国教徒在一起，仿佛这是他们的传统。这些人包括主教大人迪朗，神甫于尼埃（身患癌症，危在旦夕）、巴荣、布夏尔、布里昂、鲁书兹、泰尔姆、卢梭、克拉维尔以及十六名修女。连日本人也都随了大流。最近以成都为舞台发生的各个事件促使娄金先生下了正式命令，我们的同胞按照这个命令抛弃了他们的寓所。而如果没有我们的领事甘冒同事们一致反对的风险，决定留守职司、等候蓬斯·唐蒂先生，那么现在在四川省省会，恐怕已经再也没有一个领事级外交代表了。

由于医学课已上完，穆亚克博士的离去不会影响学习，别人也不能以此作为借口，如娄金先生所说的那样，给录用一名法国教员的契约延期制造麻烦。相反，医院却将继续没有医生。嬷嬷们尽她们之可能在那里顶替医生。

勒尚德尔和德西利埃两位先生幸好被治愈了他们的伤，与成都的外国侨民同时抵达重庆。蓬斯·唐蒂先生从渝州出发，估计他 1 月 8 日抵达成都。根据他带给娄金先生的消息说，凯里胡尔和奥弗莱在雅砻江右岸安全无恙。反之，在桃符地区，除彰乌、河西、德昌①外，教会住地大概早已被摧毁，传教士们也已成了阶下囚。关于迪加斯特神甫的下落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传说，但成都尚未得到有关这些传说的证明。

重庆的形势还算令人满意，大多数妇女儿童近期来已前往宜昌。云南府和蒙自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措施，只有男人留下。由于作了这些安排，人们对欧洲侨民会有怎样的遭遇所感到的忧虑显然大为减少。只是在陕西，事态仍不明朗，北京一直没有得到由莫列斯主教大人率领的传教使团的消息。

勒尚德尔使团的副使诺阿莱于本月 10 日抵达上海，并于 12 日搭乘法国邮船公司的大型客轮前往河内。当使团遭到攻击、我们的同胞和德西利埃副使差一点殒命时，他没有与勒尚德尔在一起。

德·马士理（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团　亚洲处　No17〕

205. 中国政局与列强反应
外交部长致法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华盛顿大使

（1912 年 1 月 27 日，巴黎）

来自各不同渠道、特别是来自北京的情报说明，中国形势即使还未令人直接地感到不安，却也显得相当混乱。各派的阴谋活动使民众和外国人重新开始感到害怕。

从危机开始时起，袁世凯便看起来对解决的办法颇有把握。尽管满洲人和共和派同样地讨厌他，两派都觉得他靠不住，他却善于使他们觉得少了他不行。他用辞职加以威

---

① 桃符（Tao Vou）；彰乌（Tchangou）；河西（Hosi）；德昌（Techang）。——译者

胁，迫使清廷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直至退位。他给列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惟有他才是威望服众，才能保证国泰民安并维持中央政权。他在军事上对共和派谨慎相待，与共和派谈判，利用其对外来干涉的恐惧，使后者把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奉献给他。

正值清廷准备让位、共和党人即将进入以袁为首的内阁以主持国民议会的会议之际，从两个方面发生了一次分离行动。一方面是满清亲王，他们试图双管齐下，策动满洲军队和影响皇太后，要皇太后宣布日本介入支持满清皇朝。另一方面是孙逸仙，孙也许潜移默化地受到日本的影响而不相信袁。结果发生了一次未遂的谋刺事件，同时，共和党人加倍努力以求得列强承认，从而排斥袁世凯。

迄今为止，六大列强至少分别地表现出了它们不介入的愿望。它们拒绝了对清皇朝的金钱上的任何支持，也拒绝了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任何承认。它们的态度只是在它们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才可能有所变化，而侨民的生命财产到目前为止一直受到帝国分子和共和党人细心的尊重。

法国明确表示了它保持中立的愿望，它表示愿等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和共和派临时政府的谈判结果，等待国民议会的协商。

英国的意见倾向于共和方面，在关于介入问题上，它不赞同日本政府的看法。日本对美国作了同样的试探，结果得到了与英国同样的回答。

德国以军火形式给了清政府以某种支持，它对清廷仍表示好感，但又在担心局势继续混乱下去对其贸易的影响。

俄国反对任何干涉。

最后，日本，开始时它对中国的骚乱从政治观点上看并不感到不快，因为那可能导致它作为列强的代理人出面干预，以恢复秩序。今天，它把经济上的考虑放到了第一位，混乱局面延续下去使它失去了主要市场，有可能对它贸易和财政上的平衡产生可怕的影响。

袁世凯的消失或引退加上继之而来的重启战端，可能引起极度混乱的结果。共和派的临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威望统一中国是值得怀疑的，而分立主义倾向和各省狭隘的地方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使中国四分五裂。

206. 在中国建立银行的计划

（1912 年 1 月）

1. 我提议建立的金融组织包含有两个孪生银行，一个中国银行甲和一个法国银行乙，两个银行的管理互为补充。

2. 银行甲的资本来源：

三分之一由中国政府提供；

三分之一由个人或中国股东们提供；

三分之一由法国资本家提供。

3. 该银行行长或董事由中国政府任命，副行长从另两类投资者中选出。

所有关系银行责任的契约均须由这两位受委托人签署。①

4. 银行乙的资本来源：

三分之一由中国人提供(个人或政府)；

三分之一由英国(或外国)资本家提供；

三分之一由法国人提供。

行长应是法国人，副行长可以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可以是中国政府任命的监察官)。②

5. 中国银行的宗旨是为政府、各个不同集团和联合会以及个人提供贷款。

6. 银行在下列情况下给国家贷款：

(1)购买国库券和短期债券(按待定限额)，开设往来账户，暂时掌握某些税的征收权，等等。为此，银行接受某种特权(以这些资金收入为抵押发行不记名证券)。③

(2)以国家财产或国家抵押的企业为担保的贷款。

(3)以属于国家的、可以存放在银行仓库里的商品(鸦片、食盐、烟草、贡品、谷物、战备物资，等等)为担保的贷款。

7. 银行在一定条件下给各省和团体贷款。

8. 银行给个人贷款：

(1)抵押贷款和交付证券贷款。

(2)以存放在它的仓库和货栈里的商品栈单作抵押的贷款。

9. 中国银行通过下列途径筹措除本金外的其他必要资金：

(1)通过发行小额低息有奖债券。④

(2)通过专项贷款或同银行乙的业务合作。

(3)通过发行银行乙签署的抵押债券。

10. 代表对个人所作的贷款的那些抵押债券以下列物品作担保：

(1)产业的所有权证书。

(2)银行的土地测量员测定的、借款人和地方当局共同签署的小块土地图。

---

① 第二、三两条的拟订实际上使外国资本家能在华人的掩护下拥有银行的实际领导权。建立一家纯属华人的银行能获得很大的行动自由。——原注

② 这两个银行的资本无须很高。——原注

③ 这一节开启了获得各种工矿企业特许权的可能。在中国，所有的冲积地(非常大)都是国家的产业。——原注

④ 中国至今还未办过有奖债券，我相信，有奖债券将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是一个特别讲运气爱打赌的国家。这一条为组织国家奖券赌博打开了大门。——原注

(3)中国政府的背书。①

11. 法国银行的宗旨：

(1)通过发行有关欧洲市场的贷款，随着发展的需要，使将由银行负责的中国政府的流动债务逐步变成固定债务。

(2)普遍地保证中国政府同外国金融界、尤其是同其中最重要的巴黎金融界的接触。

(3)逐步发行和合并抵押债券，把作为典押的产业证书保管在银行保险柜里。②

207. 出售日本武器给中国革命党人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代办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2年2月2日，东京)

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陆军部长宣布，军械库近来通过招标出售给一家日本商号价值三百万日元的过时军火。另外，据新闻界的某些消息说，石元将军似乎并没有阻挠把这些军火转卖给中国革命党人。

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份某日本商号可能向南京政府提供的军火的清单，其中提到有1909年造步枪五万枝。《日本邮报》不无理由地指出这条消息实不可靠。日本政府确实不可能考虑将目前尚在使用的型号的，连它自己的军队尚未能完全配备的武器售出国外。售出的军火显然只能包括1904—1905年获得的俄国武器，也许还有一部分在那场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日本军火。而且，有一部分军火很可能在中国发生

① 这项规定非常重要，应该很好地理解它的经济意义。

目前，中国政府和那些个人一样，都在为信贷问题感到困难，这种困难是他们可以用互相帮助的办法予以缩小的。

政府可以签署契约，它的价值是为外国人所承认的，但却没有真正地容易结算的担保，也难得有经济意义。

相反，个人有价值固定可靠的产业，但是，由于白银贬值和市场的狭隘，却不能从中获得足够的信贷。

由此种种原因，个人让政府使用他们的证书，而政府则在证书上加上它签署的效力，从而导致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

个人可以借到息金为7%到8%的银钱，这个息率对中国说来是相当低的。而政府则可以通过与它有关的银行得到因它所贷款项息率低廉而造成的差额。另外，它还可以直接得到一定数量的保险人酬金。

这种结合，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使新银行成为整个中国土地抵押的垄断者，因为：a. 各外国银行没有在中国进行此类交易的权利；b. 本地资本家不可能以这么低的息率给予贷款。

但我也不愿隐瞒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提出的十分强烈的异议：中国的产业主们愿不愿意把他们的财产证书交到中国某个政府机构手中，他们愿不愿意让国库了解他们的财富来源呢？——原注

② 对那些抵押债券的投资将成为大量利润的来源。这些债券实际上构成真正的国债，外加还有真正的担保物。——原注

动乱之前就已由军械库拍卖交货了。部里应记得1910年年底他们出售武器给埃塞俄比亚政府所引起的事变。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　亚洲处　No11　(北京公报)〕

208. 中国事务:政府和舆论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代办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2年2月11日,东京)

近几个月里,我曾多次提到,这个国家的舆论在有关中国的各个事件和面对种种时机日本的政策等问题上,分别表现出来两大潮流。12月底英日谈判失败后,积极的国际主义政策的拥护者们已不再埋怨。和对其他列强一样,南京政府对日本提出承认的要求。这给反对派和军人党一次新的机会,他们乘机指责政府"缺乏中国政策,没有能力利用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这么有利的形势。它患了瘫痪症,已经不会利用明天将成为天朝帝国的政府的感激之情为自己创造权利"。最近他们在东京一份大报上说:"我们的领导人是民族的刽子手。"民族主义领袖犬养先生在绝食中,他曾是爱国狂热的日本人中极受欢迎的代言人(我已曾向阁下汇报过他的作用)。

政府担心会形成一种轻率的舆论,这种舆论发展下去,将会不顾单独行动的弊病,因为它对危及中国的完整性之处并不清楚,而这种完整性对日本是必须的。政府还担心过早承认一个尚不包括整个中国北方的政府,对于打破列强的默契可能导致的危险认识不足,和误解财政形势所需的保留的意义。因此,政府决定采取行动,通过演讲和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办法向文人、公众和军界解释中国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需要日本采取的政策。

在此,我谨呈报阁下两份资料,我觉得它们在这方面颇能说明问题。一份是关于安里贺博士在高级军校演讲的汇报,博士是政治和国际法方面的权威。我请在军校培训的法国军官勒依多上尉参加了这次演讲会,这里附上的是那位军官的汇报。另一份资料是近日来《国民》上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优秀文章摘录。

毋庸置疑,公众舆论在对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后,如果它尚能摆脱派别的影响,那么不久,它便会理解政府的睿智;深思熟虑的政府不会过早地承认一个虽然大有利益可图但尚不巩固的政权。从元老派日本军官到目前具有无可争辩的能力的法律顾问(副岛博士和照夫先生)对政府的协助,很可能还有东京政府的默契,这些帮助肯定都是相当重要的。此外还有我上次已向阁下作过汇报的各种借款,目前正通过一些个人与银行进行间接谈判。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忘不了日本准备给予清皇朝或他个人的帮助,只要这位总理大臣确实想要。再者,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先生对袁氏——这位对解决主要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依然抱着特别的好感。

〔法国驻日本大使馆　亚洲处　No17〕

209. 退位诏书在武昌的反应
侯耀致法国驻华公使
（1912 年 2 月 15 日，汉口）

武昌共和党人对退位诏书既感到意外，又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给予皇帝和满洲人的条件过于优渥。

据机密消息，上海会议上的王正廷先生近任南京政府中的湖北代表，他将来武昌两天，向这个城市里的共和政府成员讲述孙逸仙和共和党接受这些条件的理由。据这位要人说，袁世凯和孙逸仙之所以达成协议，用十分优渥的待遇让皇帝迅速退位，是为了协同一切力量，对付俄国人和日本人在蒙古和满洲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危险。中国的南北两党对俄国人和日本人侵吞两省确实都表现得慷慨激昂，它们会下决心尽早派兵前去应敌。

所以，当前的退位诏书只能视作是形势逼迫共和党作出的暂时办法，而不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怀疑，曾是革命倡导者的过激分子们对王正廷带来的解释是否会表示满意，他们会不会挑起共和军队的反对。我们在此不太了解在武昌发生的实际情况，然而，几天来内容一致的传闻说明武昌曾发生过一次反对黎都督政府的未遂暴动。可以肯定的是，黎都督一如既往，众望所归。但他被大多数中国人指责为过分懦弱，他的命令常常不为他的部下所接受。我自己就曾在扣押布夏尔先生的小艇一事中，对此有所领教。上周整整一星期，我再次领教了这一点，我从黎都督的那些办公处为京汉线的法国公务人员领到了护照，而这对铁路沿线各新的共和当局来说，恐怕会被视作不可受理的事，他们会给这些公务人员北上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

〔法国外交部 No11〕

210. 法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其与列强军力的比较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
（1912 年 2 月 15 日，巴黎）

承蒙您在本月 12 日告诉我您可能对在中国的法国占领部队和在印度支那的预备队作出的精确编制。关于预算方面的困难妨碍我远东部队的增援，和关于为使我军获得最大收效而作的部署的重要性上，我总的说来同意您的意见。同时，我还是要提一下列强在它们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它们比我军强大的阵地力量，尽管它们的利益并不更大、更接近。

骚乱初期，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包括：(1)公使馆警卫队；(2)直隶省的占领部队；(3)列强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分派各地的兵力。这些外国军队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详情见表A①。

法国10月份的局势初看仿佛比此表所示的情况更弱。您的前任曾在1911年10月23日给我的111号来信中说，我们在直隶的炮兵(八十混成炮组)在积极的行动中几乎毫无作用。梅希米②先生同样表示了这种想法，认为占领军的作用"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并应该缩减到只是为我们的法国公使馆和天津的法租界提供卫戍部队"。

1901年，各列强为保卫公使馆商定的部署，同各国在自己的侨民和政治利益遇到危险时能给直隶或其他地方提供的军力当然没有关系。表A标出了各国在北京的军队人数：1911年10月，俄国(二十五人)，德国(一百二十五人，及五十人在直隶)，美国(一百二十九人)，日本(一百五十三人，及三百四十人在直隶)，英国(二百七十人，及一千六百人在直隶)，法国(二百九十人，及一千零六十人在直隶)。不幸的是我们的局部优势也只是存在于纸上。在离北京一二天路程的地方，有青岛的二千五百名德军和满洲的俄国兵团。至于日本，他们在北京就有二千名预备役侨民，附近还有几个驻扎在城市周围的分队。相反，我们在直隶的一千零六十人中，却应减去五百人，他们的换防在去年10月没有执行。

我们的军力确实还应算上海上力量和用于保护沿海地带和内地的法国人的那些炮艇。法国同英国和德国一样在中国海拥有两艘装甲巡洋舰，然而从所附的10月25日在长江水道上的现有战舰表来看，我们的单位数量很少，即使是为了保护长江两岸的我国侨民，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因为长江既是国际贸易的通衢，又是革命活动的主要道路。在我们的四条战船中，两艘大吨位巡洋舰不得不留在吴淞口；"杜达尔·德·拉格雷号"被困定在重庆不能动，"戴希德号"则停泊汉口。见表B③。

列强全都作了重要的兵力部署，大致情况如下：

日本把它的活动集中在做能使它得以迅速展开大量兵力的准备工作上。10月18日，日本政府命令一个师(也许两个师)随时准备上船。士兵运动在横滨和南方各港之间。中国舰队(第二分舰队)增加了四艘驱逐舰和一艘通信舰。11月23日，八百名官兵被派往直隶，使占领军人数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人左右，而日本的力量在渤海湾因有两艘与驻秦皇岛的日本海军司令持续不断联系的巡洋舰而得以巩固的势态，今年1月又因有四艘装甲舰派往旅顺港(第一分舰队)和山海关而得以加强。就这样，日本人掌握了那些登陆点和从北京到沈阳的线路。凡是有国际军事力量的地方，他们都有军阶最高的军官：如在秦皇岛、山海关、天津。在汉口，最近曾主持防务委员会的海军司令川岛，在他去上海之前，还不顾法国指挥官的反对，使委员会作出决定把各国部队的兵力限定在五百人；他去上海后，一名日本上校率领配备有炮兵的七百五十人正好到达接任国际部队总司令之职。11月和12月，汉阳各工厂和兵工厂上升起日本国旗，一旦发生严重骚乱，国际部队的行动还

①③ 原件缺。——译者

② 梅希米(Messimy)。——译者

不大好办,因为在中国的革命军中有日本军官。再者,到长江江水减退,日本人在汉口的战舰有三或四艘,他们在上海到宜昌段每一个订入条约的港口都有战舰。所以,他们在长江上有数量的优势,而在直隶,他们一旦决定使用武力,目前的兵员将用作登陆部队。

俄国的利益主要在华北和满洲,如果说他们没有海洋上的优势,他们却有陆地上的优势。任何外国军队对中国的干涉都可能导致俄国军队在几天时间里进入满洲。俄国人已经把他们公使馆的警卫人员从二十六人增加到二百六十五人。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准备派一万人来中国。11 月份,北京已有人说他们在满洲的军队达到了一万人。另外,他们在汉口还有两艘战舰。

美国 10 月份在中国的兵员只有一百三十四人,全部在北京。但他们在菲律宾一直有人员和军需储备。10 月底,他们曾把二至三艘吃水很浅的战船派往中国,11 月 13 日,又派去了一支五百人的军队。在这五百人中,有三百五十人留在直隶,其余的都去了北京。11 月,美国政府准备派一个菲律宾人的团开赴中国。另一个团于 11 月底从旧金山派出,以替换前一个团。这两个团曾在马尼拉会师。1 月初,第二支五百人的分遣队抵达北直隶,负责守卫铁路(唐山至滦州段),而美国的装甲舰有能力使足以保护其侨民的兵员立即在中国登陆。美国在汉口、宜昌和长沙有军舰,在广州有两艘炮艇,在上海有一艘大巡洋舰。一有动静,菲律宾还能提供大量军队。例如去年 11 月,菲律宾群岛拥有的运输船便能毫不迟疑地运送四五千人。

英国在直隶的兵力本来就已经是最强的了,他们又把换防部队用作援军,使兵员从一千八百七十人上升到三千人。他们在汉口有二百人和三四艘炮艇。在广州,保卫英租界的士兵有二百五十人,他们来自香港,同驻军会合后组成总数为四百人左右的部队,还不算一支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建起来的预备队(五十人)。香港是英国军队的战舰运动的基地。12 月,英国政府曾决定把印度军队一万五千人派往香港,其中一部分留作中国专用,另一部分派驻九龙。一些重要的调动已经完成:广州—九龙的边界站和粉岭①站(分岔起点)已由八百多士兵占领,火炮掩体已经建立,换防部队不断开赴广州。而且,殖民地拥有的大量轻型汽轮分散在三角洲,负责治安保卫。一艘炮艇已暂调南宁,而我们的那两艘则应警卫我们的租界。军舰不住地来到或经过,12 月,两艘澳大利亚巡洋舰抵达这里,还有三艘来自英国的驱逐舰和从新加坡起就护送它们的"肯特号"巡洋舰,装甲舰"无畏号"(一万八千吨)预期 12 月底可到达,而等待中的"坎布里安号"巡洋舰则来自澳大利亚。相反,"牛头怪号"(一万四千五百吨)则被派往上海,同时被派往的还有几百名士兵和几门火炮。

英国离它的殖民地太远,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它即在中国组成了独立的军事力量。

---

① 粉岭(FanLing)。——译者

德国的处境同我们最相像。它在离北京几小时路程的地方有其殖民地胶州,这是它的优势。10月份就已经在那里的二千五百人仍集结以听从海军的支配。从胶州分到北京和天津的士兵已经更换,而从欧洲来的接防部队将扩大编制人数。秋天时在远东有三艘装甲巡洋舰的德国人,在长江水域上还有整整一个小型舰队。

简而言之,在中国,没有哪个列强不能在朝夕之间整整齐齐地摆出多于我们的军事力量。连葡萄牙都派出了配备有炮兵的六百人增援它的澳门殖民地。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甚至有集结军队的基地,俄国、日本、美国则随时准备派出大量军队。

法国却相反,它能支配的军队只能代表一下它的国旗,或者挡一阵子突如其来的攻击,并不能真正地保护我们的侨民。鉴于法国在华利益十分分散,也出于我们一般政策的需要,我们也许应在下列地点作出行动:(1)在直隶,那里的八个连即将被紧缩为五个连;(2)在长江上,我们的海军分队几乎只够用来守卫上海和汉口的法租界;(3)在云南,我们在那里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因为我们是邻邦,因为我们是大量定居在铁路沿线的法国公民和国民的保护人。铁路本身就是一种国民的产值。

从这些情况考虑,我同意您2月12日函中的结论。我已把此函抄件转给北京。

〔亚洲—大洋洲 (抄件)〕

211. 民国总统易人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2年2月16日,北京)

孙逸仙向南京国民议会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担任此职,国民议会一致通过袁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据英国驻南京领事给他们公使馆的电报云,一个以唐绍仪和伍廷芳为首的代表团将赴京正式通知袁世凯当选并敦请他前往南京。国民议会还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马士理

〔外事电报 No96〕

212. 汉口租界的扩大计划

马士理致外交部长先生

(1912年3月14日,北京)

2月6日,阁下告诉我,赞同我国驻汉口领事为让德国警察局撤离我租界后方由我警察局的安南巡捕占领所采取的措施,阁下还问我是否有可能利用目前形势、经一定时期的占领后使中国承认把各租界扩展到铁路边的原则。

今年1月初我经过汉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曾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时，我完全同意侯耀先生的意见，我们认为，只有我们才有权守卫受我们监督的地区的周围，尤其是那条通往火车站的大马路，它尽管是在中国地界，却是我们出钱出力修建起来的。我曾对坚持如此提出租界扩大计划对我们是否适时的问题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却并不有利。

即使这个计划有利于租界的防卫，即便它如德、英、日三国的海军司令根据他们领事的要求对此发表的看法那样，从此，可以有一条铁路为界，铁路有几段高出附近地面好几米云云，审阅附于侯耀先生11月1日报告后的计划使阁下可以了解，所提出的计划为各有关列强提供的利益是不平等的。一方面，由于京汉铁路的走向，直至德国租界附近，明显地折向扬子江，从而使介于铁路和殖民区或某租界之间的地带越来越狭窄，造成租界与租界之间所扩大的地区差别很大。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地段目前情况是向纵深延伸的，它同铁路之间的空间特别狭小，所以它的扩大部分将是最小的。最后，应该指出，考虑中的计划势必有利于已经占了便宜的租界，因为它们拥有宽阔的临江地带，而有些租界，尤其是我们法租界却只有一个十分狭小的码头。

这种种实际理由也许将足以使我们不赞成一个我们从中得益甚微的倡议，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就比较普遍的意义而言，我觉得，同样也在促使这有关计划的延期。

如果我们曾经希望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政府会同意扩大租界，因为防卫的需要能作为扩大的借口，但北军收复汉口一举早已使最热烈的拥护者们放弃了这个计划。从那时起，不施加重大压力，让北京同意这个计划仿佛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北京特别厚待的那些人难道就不考虑为这么一个利益作出那些必不可少的努力是否值得？所以，外交使团经11月会议后一致决议延期，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对他们的胜利正得意非凡，表现出想重新考虑不久前、在不幸的时代里被洋人们夺走的利益问题的愿望，在这种时候，显然并不存在有利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什么希望。

另外，即使在外交使团内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出现了难以取得一致的情况。有些在汉口没有租界的公使，当时对我们的代办透露，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支持一个不把他们的利益考虑进去的计划，他们不会同意所希望的租界扩大，除非它像上海那样采用万国租界的形式。所以，就这方面考虑，至少可以预料会有不同意见。

在我看来，这些便是对一个仿佛已经结束的问题不要重启端倪的理由；即使对于那些如问题解决顺利，则能从中得到比我们可能指望的利益多将近十倍的人，如英国，这些理由也是成立的。

德·马士理(签字)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大洋洲 No35〕

一九一三年

213. 黎元洪都督会见各国领事
陆公德①致法国驻华公使②先生

（1913年1月25日，汉口）

新年伊始，黎元洪都督向驻汉口的领事使团和停泊该港的外国船舰发出邀请，参加1月23日在武昌举行的“新春宴”。

以我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一反常态地前去吃这一餐，然而，我们的英、日、比利时同行们接受了邀请，致使其他领事很难推托。

黎都督用他素有的纯朴与和蔼可亲的态度接待了我们。我曾同他交谈了几分钟。他告诉我说，一旦国民议会选出来后，他打算旅游欧美。他的话得到了他的秘书的肯定。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打算如传说中的那样辞去目前的副总统之职。事实是，这可怜的人对这一年多来禁锢着他的牢笼大概受够了。这一年多来，他只有一次离开他的衙门，那是为了搬到现在用作他寓所的原总督衙门去。不久前，他曾对一些被遣散的士兵作过一次简短讲话，他不胜感叹地对他们说：“你们就要回家了，你们真幸福。我的职务把我拴在这里，我可真有点羡慕你们啊！”我觉得，这个感叹是真诚的。

对我来说，聚会的意义在于碰见了省里的好几位杰出人物。首先是孙武。此人是革命的原始发起人，1911年10月9日的炸弹差点要了他的命，弹片毁坏了他的容貌，他的脸仍然十分难看。他穿着礼服，戴一顶“折叠式高顶黑礼帽”，使他的模样反而显得更粗野了。这是个第一流的狂热者，黎都督对他都礼让三分，因为他作为共和党领袖，手下有很多拥护者和死硬分子。

共和党的领袖显得有多粗野，民主党的领袖、我邻座的刘先生便显得有多么谦逊，谦逊到几乎卑躬屈膝的程度。刘先生曾留学日本，确切地说，他代表了共和派中的温和主义因素。省议会议长也在场。

黎都督发表了十分亲切的祝酒辞，对我们来说，其中没有提到任何棘手的和为难的问题。领事使团团长、美国总领事顾临③先生作了答辞，他也很有分寸和十分巧妙地回避了

---

① 陆公德，法国驻汉口领事馆主管人。——译者

② 康悌（R. Conty）时为新任法国驻华公使。——译者

③ 顾临（Greene）。——译者

一切可能导致中国人作出倾向性解释的措辞。在此，我谨附上摘自当天《中原快报》①的这两篇讲话的全文。

宴会的结束方式令人感到有点意外。由我严肃的英国同行起音，全体一起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叫《他真是一个好小伙》，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就是用这首歌来结束一切欢乐的聚会的。喜欢大惊小怪的中国人此时并没有为此感到不舒服，宴会在最热忱的气氛中结束。

G. 陆公德

〔亚洲急件 No3 附件一　No6〕

① 中原快报(Central China Press)。——译者

下编　法国陆军部档案

一九〇六年

1.1905年12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年1月5日，天津）

第四部分：关于南方各省的专题研究
——分裂主义运动

为使整个陈述更为一致，在前几个章节中，我叙述了在南方各省已经采取或正在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与陆军及海军的事务有关，也涉及外国的影响和重要的内政问题。

因此，我将用最后这一章来叙述我所了解的所谓“分裂主义倾向”，这方面的研究正属于为我所确定的范围之内。

在寄出的报告中（1905年2月9日No6M通信），我已汇报了导致我与这个运动的首脑建立联系的情况；我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的收获不大，只是得以了解他掌握的资金情况以及他对如何使用资金的打算。

下面将要叙述的内容，是对上个月我与他两人间交换的纯属私人通讯性质的信件的简述。无论提供的这些情报显得如何精确，无论这个我有时将继续称之为“茶代理”的人对我似乎表示了很大的信任，这些情报我认为都还有待核实，目前正在执行任务的瓦德卡和克劳代尔上尉曾对有关材料进行过必要的核实；因此，我还不能提前说这是些可靠的情

报。但是,我已进行过的一些核实工作使我能够在这里说,这些材料所提供的情报至少是可能的。

我们刚到中国就想进一步了解的一个首要问题自然是:什么是秘密会社?会社的目的是什么?对我这个刚到此地居住两个月的人而言,这不是吹牛说可以轻易作出回答的问题。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去力图弄清那些团体喜欢藏身的某些角落,因为获得某一秘密会社的信任,就相当于获得一个卓越的情报机构。有一点似乎是确切的,即比例极大的中国人参加了白莲教或红灯会、大刀会、哥老会、三点会的神秘的宗教仪式,我指出的是一些主要的秘密会社的名称。

中国人素有社会团结的真正天赋,他们一出世便是宗教团体的成员,忠实于同行团体,热衷于互助,他们并不将生活设计在个人主义的圈子里。因此,在政治和贸易等方面都能找到相同的集团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些方面,中国人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这一真理的时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早得多。在秘密会社中,有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宽容,可以公开活动。而其他绝大多数的会社好像基本上是秘密的,从它们为隐藏其存在或作用所采取的谨慎措施这一点可以确定:这些会社所具有的倾向性使政府有充足的理由摧毁它们。

仅仅对会社稀奇特征的纯轶事性的陈述,不是主要的问题所在。诸如表示感谢的示意动作,约定的古怪语言,如"真柳树庄"象征聚会堂,"穿堂风"象征警察,"暴雨"象征军队,"净化桃树根"象征加入,"山雀猎手"象征劫路强盗,等等。如果要确定这些集团——其中如三点会或哥老会等团体认为其成员有几百万人——所追求的目标,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对此问题,为了判断结果,有必要追溯原因。

接近17世纪中叶时,有一个家族在帝国突然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农民运动并立即转为暴动。暴动军占领了南京和北京,使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上吊自尽。皇帝的一名大将军请求满洲人的援救,而一位满洲人则就此坐上了空着的皇位。

明朝后裔及其拥护者们企图恢复失去的王朝,特别是在南方,然而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满洲人的军事才能和聚合力战胜了他们双倍的却又是分散的努力。胜利的满洲人把它的法律强加于人,据说全部不同年龄和阶层的文人中有十分之九的人都宁可自杀。

更为明智的爱国者拒绝以死相抗。以武力不能成功的事情可以用计谋办到。就这样,秘密会社诞生了,它的兴盛发达使得当局不得不对其加以剿捕。

我刚才提到了秘密会社的一些主要名称,这些名称至少是通俗常见的称呼,真实的会名只有会员才知道。会社与会社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最起码,其中有一个会社违背了自己原来的目的,它就是白莲教。

白莲花又名睡莲,白莲教最初在秘密会社的历史中占据着最显著的地位,在它存在的头一百年中,满洲王朝的严厉措施全是针对着它的;山西和山东是它活动的主要中心,在那个时代,它的有众多殉教者的名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洪子"统率下,它的信徒之一曾试图谋杀朝廷的王位继承人。然而,教派领袖却认为应在其教规中引入极端神秘主义的宗教仪式。随着时间推移,礼仪扼杀了宗教,有如文字扼杀思想。今天的白莲教已从往昔的显赫地

位坠落下来,仅仅成为一个由宗教幻想者组成的教派。他们断言依照仅仅只有师父所了解的神奇咒语,可以使自己变得看不见和攻不破;但这些师父的数字总是日渐减少。

“红灯会”同样也不够强大,起初它曾与白莲教联合,并与后者一样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因为宗教信仰更强于政治信仰。红灯会的残余部分分散在北方各省。

“大刀会”几乎只是在湖北、湖南的山民中招收会员,它远离重要城市、北直隶和北京,它的仇恨便更经常地局限在王朝派去巡视或治理的官员身上。它还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平均主义的倾向,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其口号是“夺富济贫”。这可以从其居住地区的贫穷来理解。

目前秘密会社中最为重要的,是哥老会和三合会。前者将其力量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后者则在两广、福建和贵州的部分地区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两个会社加起来共有一千多万人,长江上几乎所有的海军士官,长江以南各省的商人,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甚至云南的士兵都参与其间,而且可以说是全部地加入了这一个或另一个会社。这两个会社都特别强烈和非常完整地保持着它们的政治抱负:推翻满洲王朝。相当严格的法规维系着会社的纪律。这两个联盟会社的明显的民族特点可以在新信徒入会仪式中重新发现,他们朗诵诗歌,回忆明朝灭亡时的流血悲剧,和自那时以来中国人民所处的黑暗时代。哥老会和三合会曾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拥护者。起义失败后,受牵连的主要首领们逃到了美洲和海峡殖民地,在那里,他们的影响继续存在。今天,那儿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他不是某一秘密会社成员的话,就不可能希望在商业和企业中得到发展;他只能期待众多的同会会员的帮助。然而,应当忧虑的是政治上的敌人,其财富和数量将很快战胜只将自己局限于商界而形成的孤立。

最近几年,在这个或那个秘密会社的煽动下,地方性的颠覆企图、局部的阴谋活动很多。例如五年前,哥老会的唐才常想在其政治盟友大刀会及三合会成员的帮助下发动湖北起义,但阴谋在实施之前被目前仍任职于该省的总督张之洞破获。不久,一颗由三合会成员制造的炸弹放进了广州总督衙门,可是炸弹失效了。三年前还有三合会为夺取广州的另一次阴谋,但同样也是再次败露,主要人物为此不得不向外国人求救,其中的一人眼下正在东京。此类事例,不多列举了。

最近的一个事件给予三合会和哥老会的通常是孤立的行动一种复兴的力量:他们的首领,至少是主要首领中的两位缔结了联盟条约,此条约把各个会社的力量联合了起来。磋商是在西贡进行的,两位首领是:三合会的孙逸仙博士和哥老会的黄兴。这一情报是可靠的,因为我是得之于这些人物本人。

从以上可能稍长的提要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于中国的秘密会社来说,某种对欧洲人的憎恶感难道是强加在它们身上的?似乎并非如此。然而秘密会社的出于此种意义上的行动,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各阶段均有表现。最好这样来解释:每当外国人打着支持满洲王朝的旗号出现在中国时,秘密会社的仇恨就会转移到他们身上。特别是正当太平天国起义使秘密会社在一百多年的黑暗中幻想的事业似乎面临成功的时候,欧洲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干涉,成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六十年过去了,很少有人再去

探究原因，大家只看结果，而忽视了应作出必要的区别。

另一个要提出异议的问题是对义和拳的反对意见。义和拳暴动实际是由白莲教所组织的。我曾解释过该会社的宗教幻想者逐渐抛弃它创建目的的基本原因。然而，他们神秘的宗教感情却遭到了触犯，洋鬼子们的铁镐铁锹掘开了埋葬着他们祖先的土地，而满洲统治者又善于利用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的神圣愤怒，使其与我们这些"野蛮人"的合理要求对立起来。在掌握到更多的情况之前，可判断这个运动纯属特殊案例，是问题的特殊表现。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来作结论：中国的秘密会社并无任何反欧洲人的性质；现在它们准备同任何可以帮助它们斗争的人联合，因为这一次的斗争是两百多年来同它们的死对头满洲人进行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也更有准备。

自中日战争以来，反王朝运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北京政府在北直隶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直接行动，能够在各个人口十分密集的、互相关联的城镇保持良好的治安。另外，原有的那些秘密会社已偏离了当初的目的，而且缺乏实际领导者。因此，在北部中国人眼中，满洲统治王朝是巩固的。

南方的骚动者们由于逐渐失去了在北方得到民众支持的希望——北方民众归顺了现政府，也就等于失去了在北方取得胜利的希望，因而他们的期望也就局限于把长江以南各省从满洲桎梏中解脱出来。因此确切地说，反王朝运动是一种分裂主义运动。

我说过，运动的首领们声称他们掌握的是哪一类的经费。他们个人并不缺乏物质利益。但为实现他们的计划所必须的物资如钱、武器和装备，目前均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程度。

那个为首的人叫孙逸仙，他更经常地叫一个日本名字高野长雄博士（实际上他是香港英国学校的医学博士），他还以高①姓为人所知。他是香山人（广东省），大约有四十至四十五岁。

我曾有机会与他接触过，我应老实地说，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属于最聪明最敏锐的那类人物。他身材很小，但并不孱弱。与其说他像中国人，不如说更像日本人。他身着西服，英语讲得很流利，并能在争论中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方式的才能和合适的用语紧紧抓住论题。

孙结束了学业及在香港的英国医院实习之后，便先在该城市继而在澳门从事其职业。他的政治生涯在中日战争后便开始了。北京政府令人难以相信的软弱和它思想的陈旧，由此所造成的不幸后果，都成为他争取南方秘密会社支持的材料。他首先得到了三合会的支持，并很快就成为该会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他把在如前所述的局势中很难实现的推翻满洲王朝的幻想放在一边，而给其拥护者的活动一个更为实际的目标，这就是分裂南方，使各省保持与他省不同的风俗、语言、宗教和种族的相应自治。总之，是要根据美国模式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孙在刹那之间向西方新思想敞开了大门。

---

① 高(kao) ——译者

孙逸仙博士的宣传不乏成果。目前可以说甚至包括北方在内的青年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公开表示拥护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他们之中三分之一的人已发誓支持他。在法国的百余名留学生中,约有三十人发过誓,德国的六十名留学生中有二十人发誓,比利时的一百名学生中有五十人发誓。当然,在日本有几百名参加者:四百名青年明确地加入,另外约有三千学生虽未以誓言与他相联,却是衷心地站在革命者一边。

在上个月,中国的和外国的各地报纸充塞着对留日中国学生的骚动的评论,为此日本公共教育部长只得辞职。有人指出了这一骚动的革命和反王朝的性质。总督袁世凯并未隐瞒他的观点,他说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应作为暴动者对待。无论如何,他们是成群结伙地逃离日本学校;有人说他们结成一两百人一伙回到了中国。他们的归国自然不是为了解除北京政府的全部忧虑。

这个党派的参加者中不缺少政府官员,在卷宗四中的2、5号卡以及卷宗七中的10号卡已记有几个名字,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东京门户的南关边境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南京军事学校领导人以及驻该市的参谋部首脑。

革命依靠广西、广东、湖北、湖南军队的帮助;中国的海军,至少是留任的,都作好了参加运动的准备。在这些希望之中,哪些是有充分根据的呢?此事须加探讨。但应当强调,这一情报肯定是明确的,它是我本人在当事者给我的来信中对此作出过肯定的。

瓦德卡和克劳代尔上尉在旅行中利用这个党的善意感情,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建立一个情报站,努力进行着必要的情报核实工作。我可以立即说,军官瓦德卡在南京已似乎找到了一个组织得相当好的团体存在的证据(见第2号文件),这一发现是在我尚未看到卷宗七的10号卡中所包含的迹象,所以更为使人吃惊。(这些情报已转达给了瓦德卡上尉,让他于可能的情况下在当地审核。)

卷宗四中的5号卡是有关几个活动者的情报,这些人似乎相信新的局势即将来临,在他们中间有土匪首领、秘密会社的巨头、无所不为的人……他们肯定不是党的最严肃的帮手,党的领导人对他们似乎也做了一定的保留。他显然是在利用一种"恶"。当我询问他有什么理由认为应该延续最好是使之停止的骚乱,尤其在广西,以趁此机会麻痹当局的监视,他不无诡谲地回答说,他需要在中国军队的领导阶层中保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在完成交给他们的维持治安的任务之后,能在那时担负起其他职务。

就是这些类似的原因,导致经常在南方各省发生的全部或部分事端。仅在12月一个月内,就有保靖(湖南)巡防兵的暴动,永新(江西)的地方性骚动,太湖地区的抢劫等等,而群众中的三合会、哥老会及大刀会的信徒约有两千万人,首领是与哥老会的黄兴联盟的三合会孙逸仙博士,其下属是些政府官员、军官、大学生(有几百人)和土匪头子。由于缺乏资财,一切都陷入瘫痪了。

孙逸仙肯定地说,只要有一百万美金、一万枝枪、几个炮兵中队和应有的弹药,分离中国南方便是轻而易举的。至于袁世凯的军队,黄兴认为他有不止一种方法取得袁的几乎

全部的协助(我向他询问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据)。

去哪儿找到资金呢？钱，他们还可以找到(见卷宗四的2号卡)，可是只要觉得得不到一个外国列强国多少有些隐密的援助，弹药将会缺乏，尤其是没有将它运到目的地的方法。

孙逸仙肯定他从未请求过英国的帮助。当然，香港的报界在他企图夺取广州的时候(1901年)，没有隐瞒对他个人及事业的好感，然而当时却是由日本向他提供的主要活动经费。钱实际上是存在一家英国银行：香港—上海银行。此事加上报界为了他的利益所作的宣传，使人相信这样的谣言，即这是英国供给他的开支。孙逸仙否认此事。

但是，只要日本不能肯定形势的趋势对于它的发展有利，只要日本怀疑会发生与一个处处令人钦敬的欧洲列强国冲突的后果，而中国在其中又可能作为一方来反对它，那么它就限制了自己对于黄种人世界的野心，认为更谨慎的做法是为中国可能的分离提供方便，这样在必要时吞并可能也会更为方便，因为敌方的盟国力量将因此而减少。然而，自从在可悲的战场上对俄国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和获得了威望那一天开始，日本的野心增强了。它摆脱了一切恐惧感，野心公开暴露出来。它认为把一个它自信能够全部吞入的果实分为两半是幼稚的。于是，日本取消了给予孙逸仙的援款。

自那以后，孙逸仙在等待和寻求，尤其是向法国。去年他在法国发出的号召没人响应。

对于这一切，尚无任何东西可以作出结论。如果要对中国南方的分离主义倾向有明确的了解，那么一切或几乎是一切都须进行核对。

我在努力为此工作。领导们直到现在都在为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的一切调查工作提供方便，我再次重申，他们的行为是令人惊讶的。这就是目前可以肯定的一切。

我在结束对上个月的事件及调查的简述时，列出下面我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提纲：

1. 研究马①将军的部队，它的欧式改造目前正在完成。此项研究1月份可能来不及完成。

2. 研究保定军官学校，结果马上将送给我。

3. 研究南京总督辖区内的一些军事学校，和该省的军队组织及长江上的防御。此项研究在本月只能完成一部分。

4和5. 由克劳代尔和瓦德卡上尉侦察和安置情报站。附页的草图②上有他们的行动路线。克劳代尔上尉于12月28日离开了广州，瓦德卡上尉在1月1日左右离开汉口。

(签名)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名)

〔中国情报处　No30M〕

① 马(Ma)——译者

② 未见此草图。——译者

2. 1906年1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年2月4日，天津）

由于有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在执行任务期间发出的一些通信，我能够在本报告的第四部分增添一些原始材料。此外，本报告如同1月5日的No30M报告一样，是用同样的成分、同样的观点所构成，并用同样的形式写出的。

（略）

第四部分：南方各省专题研究
——分裂主义运动

在进入详述上月所了解到的事实之前，我要重复克劳代尔上尉在广州给我的一些私人信件中的不同情报。

这些情报尚无明确的证据，纯粹只是些印象，但是它却为别的情报作了补充，并在其他场合由一些人作了验证。这使我得出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结论：向我报告这些情报的军官是属于最有知识和职业能力的人。

"1905年末两广的形势特别引人注目。改革思潮每天都有新的进展。这至少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地方民族独立运动，人民、绅士以及军官们都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这一运动，这是无可置疑的。而广州报纸每日都传播这种为各阶层人士公开炫耀的倾向。这家报纸讲话盛气凌人，它随心所欲地展开批评。值得注意而且非常不寻常的事实是，中国当局显然是出于宣传目的，向这家报纸透露当局所作的几乎是一切事情，尤其是关于与外国人交往的性质。这都是用于改变公众舆论的非正式公告，广州的这家报纸确实充当了这种角色。

"岑春煊总督在这里几乎不受任何来自上峰的监督，他全凭自己的意愿行事，革职或替换一些官员。他在人民中被看作是孚众望的，他本人也适时地表示出对人民的兴趣。他籍属广西，和北京所有改良主义者一样，曾于1898年失宠，但他懂得如何取得声望；他在南方为自己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形势。对北京的勾当，他不隐瞒自己的蔑视，对日本人则保持一种恭敬的距离。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目前必须进行的改革，而'革命'一词并不能吓退这种改革，但他坚持不能发生任何性质的混乱。

"在这里，无可怀疑的是，一种由自己并是为自己而改良的南部中国意识已经清晰形成。当然，这根导线很细，这种意识非常软弱，并仍在满洲王朝的控制中。在这儿，人们同样受制于难以预测和预防的事件。

“对美国的抵制比任何时候都坚决，它同时表现出人们对坚强和团结的新的憧憬，这尤其表现在人们担心上海事件将改变运动的和平性质的时候。

“最后的问题是，应确定革命党将如何行动，应清楚地区分在混杂成分中的进步的改良者。

“孙逸仙博士也意识到最恰当的机会临近了。他当然不会由于就快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圣者而感到懊悔，相反，我们现在已能更清楚地想象出他的急迫心情。

“他与他的朋友们在绝大多数(若不是全部的话)改革党员的围绕中，他们站在那些赞同逐步改良的人们对立面，形成了一个提倡迅速行动的派别。但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仅仅是寻找有捍卫他们各自利益的方法即捞油水的机会……

“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孙逸仙博士在明天以南方自治的名义发出反对满洲政府的信号，这种优先的解放行为将给他(和那些与他共命运的人)创造出一种形势，这种形势不可能以他们自认为和平方式的任何手段去获得。

“他预料他的拥护者将不光是那些可称为狂热信徒的人(只有少数)，而且还有极多的不满者：包括所有的那些只想浑水摸鱼者和许多被潮流推动者或不敢反抗的温和派。这其实都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江流域的几乎全部的商人——除广州之外——都参加了三合会，或至少是向三合会各分会缴纳特许费，仅仅是为了避免麻烦。

“这是革命时期一切大胆创举的结果。

“因此，很愿意改革但必须保持和平，因此而分化的改良党派——政府官员及在位者——向暴力派展开激战，他们预见到了危险，特别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将造成的危险结果。

“在整个广西省，军队都保持着警惕，如同我曾向您汇报过的那样。这就是说，总督在提防着，尽管在改革方面他的思想是开明的，但他不愿让别人突然夺走他手中的锅柄，在完全独立于北京的条件下，他正在锅中精心烹调着自己的饭菜。

“因此在这里，表现出了改良或革命的矛盾推理问题。是否存在适合于它的和平改良的例子？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大家都会说，欧洲将不会以赞同的态度看待一个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榜样、荡涤一切的暴力运动。

“不过在此时，问题在于事实的结果而不是在于偏爱什么。很明显，这一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以上所录，均为克劳代尔上尉于12月24日从广州给我的信函中所摘。27日，即在他出发到内地的前一天，在同当地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同一个最近刚从廉州(即发生杀害美国传教士事件的地方)来的人进行了谈话之后，他又给我来信，其中写道：

“当然这只是一人之言，但在经过几次对证之后，即可真正了解某些事情。

“对这些交谈我作了很多笔记，不过今天我只有时间给您写一个简短的概述。

“他(那个中国人)对于两广将产生一个总的运动的可能性持有非常肯定的态度，条件是只要领导者们愿意和睦相处，协调其行动，只须有人给他们分发少量他们所缺的枪弹。他估计有三分之二的民众准备参加运动，从苦力以至显贵，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军官。富有

的人为购买武器而提供大量钱财。这个说法与总督最近采取的措施是吻合的，也与海关为阻止军火走私所采取的方法一致。该措施与方法可能没有达到目的。

“通过此人，我了解到了一些有趣的迹象，是有关最重要的武装土匪集团藏身的主要地点，关于它们之间保持联系的方法，及他们能够联络全国的方法，等等。这是指广西北部及西北部而言。

“此外，此人还肯定地对我说，在广东北部和东部，三分之二的民众多少都有些忠于革命党。

“这时我反问他，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的回答简洁而雄辩：冲击代表剥削者的令人痛恨的满洲王朝官员。如果成功，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些被冲击者呢？对此他毫无所知。这一点对他们也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会比目前的态势要好。

“他还对我说，他们原则上根本不敌视欧洲人，证据就是他承担了他对我所透露情况的全部风险。

“的确，我不相信还有比此人显得更有信心的人，也不相信别人能对问题回答得更清楚。

“政府官员随心所欲地敲榨人民，他认为这种敲榨不可能停止，对于他们中国人而言，忍受如此之久的屈辱是一种羞耻；这儿有一些关于他们款捐的数目及性质的精确资料。

“他向我肯定，那些官员们包括总督在内，完全了解形势，并对所谓制止暴动不抱幻想。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因此在最近一次暴动时武装起来的民军有七成被迫遣散了。另外也由于缺钱，正规军队的组建也没有进展；正好实际上总督没有能力与这个普及了的运动对抗，起先他还以为对抗是可能的，尽管缺乏武器。在这里，老是这样的老调：首领们之间有太多的纠纷，而且他们想到的只有自己。另外，他在广州还了解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正在谋求达到行动的一致性（这与我所了解的情况非常吻合）。”

总之，克劳代尔上尉在当地搜集了一些资料，而这些资料证实了那个党的领导人亲自对我慷慨作出的再三肯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获得的有关分裂主义运动的首脑联盟的情报，我已在上次报告中认为是确实的，这次由完全不同于我所了解的另一条渠道所证实。

瓦德卡上尉在更为简洁的通信中，向我报告了他到处旅行所获得的结果，需要我提醒的是，这位军官的任务，是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建立情报站，指导他挑选代理人的总原则是优先寻找反王朝党的成员。离开上海至今，他先后去过汉口、长沙、武昌、九江和南昌（附有草图）。

编号3、4、5各篇说明，瓦德卡上尉没有空敲我指给他的门。我已汇报过他在南京的成功，他寄给我的一些简短的报告使人推测他在南昌和九江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在长沙则不一定，因地方当局当时在长沙西南几日路程的保靖府逮捕并监禁了十来个反王朝党成员，这类灾祸使很多热情之士冷下心来，即使只是暂时的。

对于第四篇报告,应知道的是刘家运在保定军官学校,该校是一所最宝贵而又最有特色的学校。刘家运是湖北反王朝党的首领,他在保定府军事活动中心的露面已是很清楚的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将可以从他那儿推测出一些珍贵的情报。一般的侦探所得的有关军事学校的情报没有什么价值,了解军事学校需要专门的调查。因此我想,如果依靠刘家运的帮助,在这一方面会获得更好的收获。

为了恰如其分地欣赏瓦德卡上尉所提供的情报,应当说明的是,这位军官属于最认真的那种人,性格极为冷淡,长时期远东的生活使他能比很多其他人更善于判断黄种人的思想状况,而他个人在北京与中国官方人士的交往,使他宁愿对现实和反王朝运动的可能性持某种怀疑态度。

还不应从上述的一切中得出任何结论,因为既没有足够的事实,也没有相当令人信服的事实。然而全面地看,我认为这些情报组成了能使我们的驻北京公使感兴趣的整体迹象。我已向领事先生作过一次口头汇报,我的汇报在某些方面证实或明确了他收到的领事报告的有关内容。他因此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反王朝运动以一个理智的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中国可能是第一次;它最重要的力量是各党派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将把推翻满清皇帝作为他们政治信仰的首要信条。

我还向法国公使汇报了广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在我这儿进行的尝试性活动。这种尝试关系到中国留日学生问题,我完全没有回答的能力,而且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但是这一尝试本身却值得注意。众所周知,为迎合北京政府的需要,东京政府在日本各大学禁止中国学生继续做他们曾经能够做的事情,例如攻击中国目前的政体、创办他们的刊物、发表文章及开会的权利等等,严格的监督措施迫使他们受到警察的搅扰,特别是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这些青年人热爱自由,有点儿陶醉在革新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词句中,有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老师能力不够。因此他们下了决心:他们更想离开那个由于他们的政治抱负而变得如此无情的国家。然而,在约三千名决定辍学的学生中,只有数百名学生有足够的钱去欧洲继续其学业,其他的人则不无焦急地自问该怎样做。中国政府无疑缺乏说服他们重返日本的能力,各地方有时为他们重捡书本提供了方便。袁世凯在把他们视为暴动者之后,接纳他们在其总督辖区的学校读书;广东的岑总督大概被要求为他们开设必要的课程;他们自己力图团结起来,特别是想在济南府和烟台建立学校。所有的这些权宜之计似乎必定是无能为力的,而我陈述广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尝试的目的,是想知道,在他的同学——不仅是中国南方的,而且是全国各省的同学——的提议下,法国政府是否能决定在印度支那开设必要的大学?

在北京的武官告诉了我他最近几份报告中有关广西和广东军事力量的内容,第七和第八篇是其中的节选和对它的概述。

地方报纸(《中国》12月8日)报道说将取消绿营,只保留其中的三处兵营;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以建立二十个以现代方式训练的营。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似乎已经完成,第二

部分的实施无疑要待这批节省下来的资金入库之后。

其他地方的计划也许会改变,广东士兵的本质要予以转变则更费时间。中国南方某一刊物(《中国》12 月 29 日)说:"士兵这一名词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是强盗的同义词,尤其是在广州。东莞县近日即有一个新的例子,在那儿驻扎的士兵抢劫城市之后逃跑了。"

由于受秘密会社的煽动,加上所得极少的饷钱(如果还有饷钱发的话),这些秩序的保卫者们便帮助抢劫,帮助摧毁权力的基础,尽管他们的责任原是要人们尊敬它。这类事情是长期以来尽人皆知的。

目前,总督有时在善良愿望的推动下,能发现有益之事,批准并予以尝试办理。去年他就下令搞过一些改革:疏浚河道,制定民众的教育及卫生条例,成立警察局,创办财贸学校,建立保险公司等等。但是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税收没有增加,因为老是恰好遇上收成差,贸易危机。反王朝的煽动者又以此挑动或制造闹事和反叛,军队又无力予以平息;军队的素质已简述如前。这些众多原因可以解释广西和广东的地方暴乱为何频繁发生。正当上个月整个帝国都去注意江苏、安徽、浙江出现抢劫和士兵暴动以及传教士在四川被杀的消息时,真正的人民起义运动在南方两省爆发,海上抢劫到处都在发生。尤其是在清远(广东)。最后,广州本身也显得非常紧张,我出于提醒而列出这样的传闻:法国部队被派往并暂驻于龙州,以保护我国侨民。

这儿的报纸密切注视着以抵制美国为起因的事件,抵制美国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廉州的事端又插入这一事件中来,而在这一切中又加进了广州—汉口事件,那儿的租借地已从一个美国企业联合组织手中收回。

美国方面的亏盈差额是:与 1904 年的进口相比,1905 年美国产品的进口,进款增加了两倍,征收了相当高的赔偿费,以及为预防中国南方的骚乱而在马尼拉征兵。中国方面的问题更不清楚。由于仅仅信任民族资本,粤汉铁路事件的继续迫使总督制订新税,因此他在全帝国享有的严厉名声首先在这些省引起并加深了不满。另外,他与地方显贵之间为创办企业而采用实际措施的问题加重了分歧,他认为无论如何最好是尽快中止这种情况,便监禁了他的反对者中的两人。克劳代尔上尉的来信对此有一个看法,如果将政客的手法与此联系起来,如果假定岑总督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根据中国的习惯,为了将他觉得聚集在自己头上的人民的风险转嫁给欧洲人,那么倒有可能解释来自广州的自相矛盾的传闻:在那里,人们同时列举反对美国领事及反对总督的致命威胁,同时列举反对地方当局和反对外国的暴动。人们预感到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只是:它威胁着谁?

我留下这个问题不予回答,可能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的下次来信能够讨论这一问题。

瓦德卡上尉于 1 月 13 日离开南昌,他打算于 2 月上旬到广州;我希望能在本月中旬得到他的消息。

克劳代尔上尉已离开广州去桂林府,将由那里重到柳州府,再经贵县返回广州湾。他回到广州湾的时间预定也在 2 月初。

我在上次报告中陈述的正在进行的工作计划，2 月中将继续进行。我希望最好能够在此基础上增加对军事组织和日本在福建省行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以前由上海代办处负责进行。

我想在本月就可得到关于马将军部队的报告和关于保定府学校的报告，在保定府，由于中国春节学校放假的这个月而中断了所有的调查。

（签名）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名）

〔中国情报处　No39M　（机密）〕

3. 关于煽动分子孙逸仙和布加卑上尉

参议院主席兼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

（1906 年 2 月 17 日，巴黎）

在最近转给我的一份关于煽动者孙逸仙的情报中（我有幸在此请您传阅其中一段摘录），法国驻华公使影射此人与布加卑上尉的一次会见；布加卑上尉似乎负责情报服务工作，可能已与好些中国革命党人有过联系。

和我们的公使一样，我部既未得到关于情报服务的情况，也未得到有关负责此项工作的军官的情况。

因此，我切望能得到您所掌握的有关这些问题的情报资料，同时，对于背着外交部和法国驻华公使派遣法国军官到中国南部同样混乱的地区去执行任务所造成的麻烦，我提请您予以特别注意。

鲁维埃

〔外交部　政治事务局　No109〕

4. 1906 年 2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 年 3 月 4 日，天津）

此报告同前几份报告具有同样的观点和同样的形式。在第一部分，特别是在第三、第四部分中，包含有一些原始资料，它们是由军官及正在从事情报工作的代理人提供的。

第四部分：南方各省
——分裂主义运动

刚在广西完成了第一部分任务的克劳代尔上尉，由于他匆忙写就的一些笔记，使我能着手进行反日本间谍活动的重要工作，首先是在我们的东京边境。有足够的迹象证明，我们注意到的线索是正确的，只须借助一些运气将它追踪到底。

克劳代尔上尉在巡游期间，由于其多次表示赞赏的向导的忠诚，使他能够观察到在梧州、浔州、桂林和玉林的四个日本组织的存在。其明确的和各不相同的重要性如下：

在梧州，日本天皇的三位臣民的身份是公开的，两名在理科学校（中学堂）；另一名在小学堂。但据确切的说法，实际有十七名日本人生活在该市。他们做生意，按中国方式穿戴，并有一条鞭样的辫子，自称祖籍直隶或江苏，以替他们的外国口音辩护。

在桂林，一名日本人是巡抚衙门的秘书，两名是一所中国学校的教师，另有至少五名日本人是在经商，像梧州的日本人一样，他们也装扮成中国人。

在浔州，有两至三名日本人在军队中任上尉，其他约十五人自称祖籍福建，故意摆出专心做生意的样子。

最近，在玉林，人们注意到有个外国人——他的一切都使人猜测为日本人——将每天的时间都用以测绘该地区的地图和平面图。

这一切仅仅只是推测，没有任何一点可以给出明确的和肯定的结论：这是一个间谍网。这些推测不过是对很多其他的怀疑补充了新的怀疑。

克劳代尔上尉到达广州湾后，他的姓李的向导了解到该地有一家日本妓馆，是经法国当局赞助，为当地驻军提供最大方便而开设的；他进了该妓馆，并在那儿找到了老板，是一位女人，叫穗原，从前他在东京当学生时就认识，她那时与日本参谋部一名军官长期相好，在克劳代尔上尉的建议下，他不动声色地打听那位过去可能是他情敌的人的命运，结果山崎上尉就是他刚刚重逢的这位穗原的同一妓馆的老板；同时他了解到，他过去在东京的一位老熟人、步兵上尉高桥，在堤岸即西贡的门口，经营着与广州湾同样类型的妓馆。

几乎不可能再有怀疑，而且有最大可能性的是，在该地抓住了日本为掌握所有的秘密而在全中国撒开细密复杂的网中的一个网眼。同时，也可明显地感到，在广州湾被注意到的情报站与梧州、桂林、浔州和玉林各站之间存在着联系，以及在这些地方任职的人员，其工作是以最深入地研究我东京边境为目的。

根据我的意见，克劳代尔上尉谨慎行事，不使任何人起疑，他仅限于对当时不在岗位的山崎上尉进行小心的观察，此人的出现完全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印度支那方面已经得到通知，我打电报请求同意我与广州湾驻军的一位军官联系（已获同意），克劳代尔上尉告诉我该军官将是最能胜利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的人。我将乘下一趟邮船去该地，交给该军官一个密码、一些钱和必要的指示，目的是首先让一切事情保持原状。

实际上应当考虑到，两三年以来，这些情报站都在活动着，它们的工作已经到了很深入的程度。即使让它们少活动几个月，也只能使之有微不足道的损失。而我们则可以利用它们存在的时间，认真地绘出山崎上尉联系者的名单，这样，就有希望逐步地了解日本为其秘密任务而使用的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而后，便可注意抵制它的计划或利用它的意外收获。

由各地汇集起来的情报表明，南方的形势相当混乱，主要的骚动中心是武宣、浔州、象州、马平、柏州、思恩府。岑总督维持着一个恐怖的政体，据说，去年有两万名受害者，它标志着广西的流血纪录的发展。对怀疑者的法令就是使人到处寻找通敌迹象，并证明最为无耻专横的调查的正确性。克劳代尔上尉本人即身经这种调查，他说："从梧州到陆川(玉林的东南部)，我一直不间断地受到严密的监视，在三十六天的三十天中，他们借口我是商人而给我派出护送队。所有的人(五人)实际上是广西巡抚的密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人还可望成为官员。他们可能不时咒骂我，在这个所有自尊的中国人还躺在祖宗祭坛上的时代，使他们出外奔波。

"有好几次，我试图离开这些讨厌的陪伴，并突然改变我原定线路的一小段，但这都只能是白费力气。

"命令来自于上面。在桂林，我根据绝对可靠的消息(巡抚衙门的秘书)了解到，我在梧州和桂林，岑总督的电报均先我而到，命令派人到处跟踪我，而这些命令(我喜欢弄清楚)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像这样日夜地在旅馆和传教士住地，在轿子上或船上，从广西简陋的中式小屋的窗户或舢板、茅舍的隙缝中对我进行的盯梢，的确十分滑稽可笑，然而我不想笑。

"无论如何，这种盯梢有其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天，桂林外事代表派人把我身边的中国人叫到衙门，借口通知他我将于第三日离开的消息。为了他们和我的利益，他们对我进行了一次按严格法律程序进行的审问：籍属，职业，亲属关系，旅行动机，旅行是否获得报酬，等等。

"我受到了半小时的盘问，审问者彬彬有礼，但却提出了最不合适的问题，甚至想叫我在我的一张欧洲名片上写出我到广西所干的事情。我几乎为此发火；被请作翻译的黑诺特神父大概对他说了他的不当之处，他为自己辩白，抱歉地说他有其'应尽的职责'。这样我才明白，广州方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了解到有关我到此地所做的事情。此外，这个可怜虫也一心想得到这份材料；获得材料，他们还需要一个有一定地位的翻译来为他们译出我所从事的关于对中国北方和南方各省的居住环境等等的比较研究工作……

"对中国邮局要绝对小心，至少在两广是这样。不仅有人拆信，并且是公开地拆，信封上的简单邮戳指示出进行偷盗行为的邮局。我利用了这些邮局，目的是为了让当局相信，我只是一个因父亲很有势力而因此受人尊敬的儿子，同时对我所经之处的风景及中国行政官员的彬彬有礼表示赞赏……"

我在此引用克劳代尔上尉纯属私人笔记中的选段，不是因为它表现出的别致风格，也

不是因为它显示出上尉要使人相信所遇困难的详情,我仅仅只是为了指出流行在残暴粗鲁的老岑总督辖区内的积习,此人活像他的前辈,他不正是那个用重复帖木儿的方式来扼杀伊斯兰教民起义的著名的毓英的儿子么?

这个处于永久包围中的地方(官方报纸说该地常驻有四十四个陆、海军营),其贫穷仍然超出了人们能够想象的程度,克劳代尔上尉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相反的说法是令人吃惊的,如同说仇恨和暴动因素不会聚集到这样的土地上的说法那样令人吃惊。对该地的了解越具体,即可发现形势越见严重:政治上的骚动导致财政的混乱,措施的专横和捐税的欺诈接连产生,当局的挥霍和无能到了使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请看:两广的布政使带着他的国库中的几十万现洋竟然像一个普通出纳员一样刚刚逃跑了!还有钻出这个死胡同的办法么?

当然有,——革命者回答说——推翻满洲政府!满洲政府就是敌人,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这个肯定的回答中,可能有真实的东西。以为仅仅靠着许诺一个黄金时代或至少是一个和平时期,就能赢得反王朝者对那些连自己都觉得满洲王朝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的人的好感,是错误的。亲华派的喉舌《China Times》①写道:"形势是严重的,一位两广卸任总督上书皇帝说:'强盗和土匪已在利用严重的形势,其中有一万人已准备暴动,其他省不久也将参加这一运动。'"

克劳代尔上尉写道:"就广东省本身而言,我能够证实整个我刚刚经过的北部,一直到广州附近,盗匪集团的活动已成为灾难,河流上无任何安全可言。因此,这里的行动要比其他地方更为迫近。……我相信普遍的不满情绪,相信秘密会社的存在并相信在某些方面它们是有力量的,但是它们尚未团结起来,尚无共同承认的首领……"(以前我已就此特殊问题表示过我的意见。)

因此,孙逸仙博士的声明(即我在卷宗四中关于南方精神状态的第2、3、4号卡中所重复的那些材料)似乎是值得信任的。同样克劳代尔上尉也有可能去检验关于黄兴会长与孙逸仙博士之间决定性联合的材料,以及关于某些官员(并不是职位较低微的官员)如郭道台参加运动之事。

就是在桂林,正当脚夫、翻译、向导以及克劳代尔本人都遭到上述审问之时,郭道台在蔡国上尉的陪同下前去拜访他:"在那时他们表现出了诚意,我还要说是勇敢精神鼓舞他来看望我的;他们穿着装有马刺的靴子,而且跟随着一队士兵,自然是具有官方访问的幌子。无论如何,这是惟一可以见到我的办法,但这不是理由……

"我立刻感到他们给了我最好的印象。作为道台的郭,在从柳州府—玉林为直径的东部,指挥着几乎半个广西的军队。

"此人高个子,肥胖然而不过分,脸膛阔大,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真正的行动家。我只是将准备好的英文提问交给了他……"

---

① 疑为香港的《中国日报》。——译者

这个人物的重要性是南方分裂主义运动组织的最具典型的事实之一,他本人就是关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的有价值的迹象。克劳代尔上尉已在当地获得了该运动的很多表现:人们正在组织起来,接受有纪律性的训练。看来此事已不应再被怀疑。

剩下来的,是要确切地统计此党的力量以及它的反对党的力量,估计谁是未来的首脑,最后再研究行动的方式。在这里,我特别担心的是总的形势将转为对革命党不利。孙逸仙博士未作任何异议就认可了我的担心,但是,他所说的软弱的手段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无能的手段吗?这将是我正在研究中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况且不能忘记,对于革命来说,人的思想和人心比枪更为重要。

在上份报告中,我已汇报过笼罩于广州的紧张气氛和民众精神过分激动的众多原因。

在朝廷的逼迫下,在督府和张之洞的建议下,可能还应增加一点即人民愤怒的指责,总督至少在一点上作了让步:释放了那些被蛮横逮捕关押的显贵们。但是粤汉线问题似乎并未解决:岑坚持他的官办计划,其结果是将给他留下对财政事务管理的统治大权。爱嚼舌头的人认为这对于他来说是避免财政破产的惟一方法,尤其是如果北京继续反对岑好几个月以来所申请的对外借款的话。事实难道真如人们所传言的那么坏吗?

另外,抵制美国的运动继续保持着高涨状态,目前的一切都使人相信,只有废除美国现行的排斥法案,这种抵制才会停止。若仅仅只有这项运动,它所造成的只能是中国南方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但是由于它与所有已产生的分裂和骚乱因素相联系,就增加了社会的混乱和不安,并且时刻可能引起更严重的事件。

华盛顿政府从美国发来的电报,显示出它是多么关心太平洋彼岸的形势。它的中国舰队将由“戛尔弗斯顿号”和“查塔劳加号”巡洋舰加强,菲律宾驻军大概同样也因增加两个团和一个炮队而得到加强。有人甚至说有一支四万人的远征部队已在美国待命上船,最谨慎的估计是二万五千人。但这一切都应当核实。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节,我要提请注意的是,某些方面对于日本人想以譬如建立保险公司等为手段而渗入这个国家的企图所作的反抗,特别是一个名叫周春的人,领导报界发动了一场积极的运动,已经引起东京政府的重视;东京已将此案提交外务部处理。

最后,上月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措施,可间述如下:在广州,有为满族部队建立一所军事学校的计划(资金尚需筹备);安徽省招收了一千三百名新兵;北京批准动用渎职官员邹龙城①的全部被没收财产用来在广西修建战略公路。

我赴广州湾以及可能还有河内的旅行将需时约一月。在我旅行期间,这里的情报站

① 邹龙城(Tchou—long—Tseng)。——译者

工作由欧吉罗上尉主持，他是在我到达天津之后由驻华部队总指挥官作为合作者派给我的。

不过，下一份月报告将待我返回天津后撰写，因此它到达巴黎的时间将比通常要晚几天。

（签名）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名）

〔中国情报处 No44M （机密）〕

5.1906年3—4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年5月10日，天津）

第四部分 中国总形势
——分离主义运动

从天津回来的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所带来的资料和我本人最近的上海、香港、河内之行收集到的资料，使我得以对中国的总形势、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作一初步的总体研究和介绍。

下述的报告还远不够完整，不少情况尚未得到核实。可我觉得，通过各种渠道汇集起来的资料仍能形成一个整体，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问题的提出已带有许多为找到解决办法而应考虑的动机。

最后，从现在起，我还需要汇报同分离党领袖孙逸仙即高野长雄博士再度会晤的情况。我是在香港碰到他的，从香港到上海途中，我们曾是同路。

在以前的一份报告（No44M）里，我曾详述了在中国死灰复燃的恐慌，因为一系列迹象表明，对欧洲人的敌意普遍上涨。凡看到过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人无不认为，目前接连出现的现象同当初的发展情况几乎一模一样。而我已作了汇报的那些事件在近两个月里发展尤其迅猛，且在中国报刊上和民众的感情里毋庸置疑地表现出对不管是怎么样的外国人的普遍的刻骨仇恨。

我首先将摆出最明显的事实，然后把它们同我因与孙逸仙交往而产生和考虑到的最重要的看法相对照，以此推论出对目前中国的总形势的看法，尤其是对华南形势的看法，那里雷声轰鸣，胜过以往任何时候，暴风骤雨无疑即将来临。

一

人们继续指出，自 3 月初以来，在河南的长县、淮宁县和和县，继而是在安徽的六安、清州①和霍山发生了反基督教运动。

在广东的花地②，美国传教士遭到抢劫。

在福建，漳浦县的几座天主教堂被焚毁，张庙、龙山、龙岩、蔡安③的部分基督教徒遭到毒打，他们的房屋被劫掠一空。据揭发，混乱的制造者是三合会会众，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漳浦，性质是相同的。

在浙江，一次异教节日的庆祝活动中，传教使团遭到指责，夏康发生骚乱。

在湖北襄阳，人们发现一个反基督教阴谋，策动者是"大刀会"，其主要人物已被擒获。

江西的情况与此相反，靖安一些天主教徒发起进攻，冲进县衙，砸烂家具，打了士兵，等等。

四川提督宣布对反基督教运动束手无策。

在浙江杭州，4 月份再度发生闹事；接着，山西来的一些特别消息证实了当地报纸只是部分地提到的事情：在张定府南面的高毅、潞城、赞黄出现骚乱，煽动者当是自 1900 年以来逃匿在山西的拳民，他们在驻扎山东的大师兄们的领导下从未停止过他们的宣传。他们炫耀自己的妖术魔法展开活动，声称能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或是请上天赶走或处死压制他们的官员。

以上是第一组情况，其表现是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各传教使团。

应该说传教士们也有一定责任。亨利·科迪埃④先生在他的《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史》中说："目前培养传教使团成员的方式颇不完善，甚至是不正确的……外国传教使团和遣使会把一些刚刚走出修道院的年轻人派往他们的教区，而这些新传教者往往也只是才放下犁耙，到修道院里走了个过场，因此，这些人毫无处世经验，他们不知道世事的险恶，常常不善于在尚能自由活动的时候逃脱危险。而正是这些缺乏经验的、有时自己都很需要有明智的导师指点的牧师被派往僻远的省份，让他们去指导那些善男信女。"（第三卷，第四百八十九页）

确实，应该把这看成是之所以发生变故的一种解释。但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地方性骚动的特点，只要官府稍有行动，骚乱者就作鸟兽散。不管怎样，这些骚乱所表达的只是贱民的粗野意识，既分散又缺乏条理，不可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调起来。

下面一系列事件属于另一种情况。

首先在保定府有人"神化"前布政使，此人于 1900 年被联军作为拳民处死。

---

① 长县(Chang—Sien)；淮宁县(Hoei—Ning—Sien)；清州(Ching—Chow)。——译者

② 花地(Fa—Ti)。——译者

③ 张庙(Tchang—Mi—ao)；龙山(Long—Chan)；蔡安(Tchai—Ngan)。——译者

④ 亨利·科迪埃(Henri Cordier)。——译者

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学生们威胁说，如果给洋人新的租界，他们将起事造反。

某些报纸或官方人士多次表示了北京政府的愿望：如同外国人能在华享有治外法权一样，也应给予它在外国的侨民以同样的权利。

同中国无任何治外法权协定或在中国无领事代表的国家的侨民应服从中国的司法裁决。这是比较合理的要求。

据说，著名的义和团首领董福祥在他被流放过的新疆握有一支兵员众多的军队。这支军队随时作好准备，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挥麾东进中原。

到处都有表示老百姓仇洋的告示。在保定府，罗斯福总统进了漫画，变成折磨中国人的刽子手。在河南，出现了一篇冗长的告示，报界于4月20日转载了这篇告示的摘要，作了梗概介绍。告示劝说人们给"爱国金库"作无偿和自愿的捐赠，"爱国金库"将把中国从西方的压迫下解救出来。文中说："洋人要这笔钱。如果我们一点都不给他们，他们将率军队占我国土。你们忘了1900年的苦难了吗？直隶省数百万中国人遭到洋人的屠戮或掳掠……从前，明朝灭亡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黄种人，而今天的情况已不再如此，中国人将被杀光……请记住在法国人手中的东京湾，在日本人手中的台湾啊！……"

在广西流传着一些无疑是由留学生们在日本印刷的谤文，这些谤文对欧洲、法国进行了刻毒、过激的攻击，揭露他们占据华南各省的野心。瓦德卡上尉在概述他从广州到四川的旅程的第二部分记要中说："在柳河边彰安的客栈里，我见到一本印刷精良的书，该书把法国人描写得很恶劣，企图以建造铁路为借口攫取广西。作者或作者们劝诫他们的同胞警惕所谓法国人的厚颜无耻和贪得无厌，自己建造自己的铁路。这显然是敌视法国的。

"我询问店主这本小册子从何而来，他对我说是本地官员免费赠送的。为了作出进一步的调查，我去找那位官员，要求他也给我一册。他从一摞同样的小册子上取了一本，和蔼可亲地把它给了我。

"这便是一本免费发放的反法小册子，而读这本书的人思想浅薄，头脑一碰就发热。"

最后，南昌事件：知县江召棠自杀，这个行动被所有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毫无例外地看作英雄义举。这位昨天还默默无闻的中国官员忠于祖国的行为将作为年轻人和后代的楷模，明天一道诏书将使他的名字铭刻在功臣阁和民族英雄祠里。这件事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试金石。异常激奋的民族意识以与它的激烈程度相适应的形式爆发于光天化日之下，过去的沉痛教训和那些条约迫使中国尊敬外国人、尤其是尊重基督教传教士，这种尊敬与中国的民族意识骤然冲突起来。

且不说中国报刊上的许多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已从辱骂洋人转为对他们的讨好和奉承，并詈责北京政府。

北京举行了几次集会，一份特别报告说："其中一次集会有好几千中国人参加。政府怕会后出现骚乱，警察局采取重大预防措施，禁止演讲，加强北堂附近的岗哨。大厅里张挂中国旗，大厅尽头的祭台上放着那位知县的相片，与会者一一到死者像前跪拜。墙上悬挂着二百多副挽联，挽联上写着：

"噫！当今国家拱手让出大权，受命署理县衙的志士再也得不到尊重。

"若再不全力制订一项关于宗教的法律，帝国各地都将成为南昌。

“弱如鸿毛，可怜的年轻人在重于泰山的压力下粉身碎骨；那些人是庖厨，我们是肉糜，全国为此叹息。

“他用鲜血录下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慨然弃世，他献出生命以忠于庄严的誓言。

“哀悼这悲恸的日子我们为他盖上棺椁，把他的名字镌刻青史，我们为后人留下美德的楷模。

“死而留名，我们将以文以画赞誉他，他将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榜样。生于忧患，他羞于贪生，他选择最佳方式找到远不可接的避难所。

“容杀一仕则容杀天下仕，当惧江西从此灾祸蜂起，帝国将受千种磨难。

“宗教争讼如若难决则一切争讼均难解决。昊天并非只生智者，枢密院也并不尽是能人。”

上述报告还说，北堂（在某种程度上，北堂是北京的天主教区）曾有一时显得有些惊恐不安。

这里，本来还应当列出旨在取消各种授予洋人的租界、首先是矿山和铁路的开发特许权以打击欧洲人在中国的资本和活动的没完没了的抗议、企图、决定……这类东西充斥着每天的报纸，如果把它们题目并列出来那就太长了。

我们在这部分里所看到的种种表现，其特点比群氓袭击基督教徒、焚毁教堂，甚至杀戮传教士要文雅一些。

然而不管是在哪一部分，我们都能看到古老中国的官吏们插手的痕迹。他们感到威胁着陈旧的、被蛀蚀了的文明大厦的危险，他们用形式主义传统和繁文缛节的缓慢仪式对抗我们仓促而成的方法，他们用孔夫子的文章对抗电的基本规律。

然而，撰写那些告示、组织那些公开抗议的首先是某些“知识分子”。政府对某些事件不管是无能为力还是胸有成竹都采取容忍态度（关于爱国基金的告示，江召棠追悼会）。在另一些情况下，正是政府自己主动采取措施，旨在缩减或取消一些特许或优惠权。欧洲人以为在中国的权利从此便取得了，不再会有反复，甚至相信合乎法律手续的条约，其实都是大错而特错的。在民族主义的潮流前，中国政府不得不屈从、顺应潮流，同 1900 年完全一样；否则便有可能在窥伺机会的反清党派轻易掀起的民众风暴中覆没。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组情况，它们将说明这个党的生命力，然后我将说一说这个党的力量、活动方式和思想，这是我四个月来研究和探索的体会。

这里，我将只援引公开的事实，即中国或欧洲报纸发表的对远东的看法。在开始不加述评的列举之前，必须记住，暴动策源地在广西和广东，海盗和土匪集团在那里构成该党领袖的一股军事力量。这位领袖容许他们在那里搞抢劫活动，这样既能让他们获得维持生存的手段，又可保持他们的战斗力。而且这样做首先便暗示了军队中对这位领袖忠心耿耿的那些文官武将应该呆在那里，因为他们要率军队对盗匪进行所谓的战斗。他们也知道在必要时打几次胜仗，以维持政府的宠信。然而，一旦发生了暴乱，他们便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受自己指挥的军队给予支持和帮助。

人们提到在广东的平远、南海县、罗定州发生的几次暴动便属这种情况。在广西的平乐、贺县、博孟、钦州、玉林也有造反集团,据说连省会桂林附近都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政府急忙给那里派出援军,这批援军也许是用以取代逃兵的,估计梧州的逃兵人数很大,他们都跑到叛乱者那里去了。

广州出现了一些告示,声称皇帝病了,并宣称应乘他不久将晏驾的机会改变政府形式和任命一位中华共和国总统。几天前,在一次为铁路问题召开的集会上,商人们已经敢于说出"共和国"这个词和谈判"三权"了。

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声明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来一个根本的变革,希望学习欧洲的制度。他们也要求用共和国取代摄政王朝,并阻止外国在中国的任何渗透。

3月份,从旧金山传来的消息说,反满委员会早就要下令在北京采取行动了。不久,人们即听说反满党有人到了北京,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加强了某些警察分署……他们还试图让人在日本暗杀宣传者们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去年10月在北京车站丢了一颗炸弹的年轻人吴樾的老师梁启超。

接着是受到感染的汉口。据可靠情报披露,汉口存在着一个规模颇大的反满中心。

欧洲报刊开始警惕,呼吁注意这场难以逆料的运动。1906年4月3日的《京津时报》说:"只关心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事务的外国人不注意日益发展的中国反清运动。《岌岌》①提请注意好几件事实,在它看来这都是严肃的预兆,例如时而公开,时而又秘密地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健康状况的风声、关于嗣君的选择等等的传说……这些风言的目的在于刺激民众的情绪。各种各样反满清皇朝的小册子在帝国内大量散发,而'天道变异会'②则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官场招募会员。……

"开始被视作空想家的孙逸仙和康有为看到他们的努力开花结果,而现在,妇孺皆知他们不可动摇的愿望是用一自由的开明政府取代目前领导帝国的腐朽皇朝。许多中国人虽不敢公开同情革命党人,暗中却对他们有好感,一旦时机来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完成这一业绩而作出道义上的支持。"

这家报纸又说:"中国政府每天都在反皇朝党面前发抖,而又没有任何行动,诸如揭露秘密会社或逮捕它们的首脑人物。原因无疑是他们中的主要成员都是官方人士……"

《中国评论》指出,一年以来,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发现有大宗大宗的武器弹药买卖,而一段时期以来,反满清党造就了成千上万新党徒。这个党迫使朝廷增加警备力量、迫使达官贵人们为自己的性命发抖,它已经使外国人考虑是否要惧怕这尚未明言的敌人。

连上苍也表示出反对满清。刮风下雪、飞沙走石,在我们看来只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在北京,人们却议论纷纷。最近下了一场黄颜色的雪,使大家回想起明朝被推翻前不久也曾出现过相似的预兆。

最后,谁都知道,凡有闰八月的年份注定要发生大动乱,而1906年从一开始便带着这坏兆头的标记。

① 岌岌(Jih Jih)。——译者

② 天道变异会(The Change The order of Heaven)。——译者

概而言之：当前，以广袤的中华帝国为舞台展开的不可否认的动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是不可能用一个名字加以概括的。从它们不同的起因，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三类，反基督运动，排外运动，反皇朝运动。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所采用的分法尽管与别的分法大同小异，却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分界概念，远不是重新返回对事实的单纯观察中去。这种分法有利于在事变日兴的一片混沌中认清自己的位置，但是，如果有谁硬是要用它的某个字眼完全说明突然出现的某个事实，那么这种分法就不正确了。因为，在杀人的贱民头脑中产生的思想被剥去粗糙的外壳，为中国爱国主义党派的新成员所利用，他们从有利于自己已形成的祖国观念出发普遍地宣传这种思想。而这个祖国即便没有因为同外国的接触而遭到贬低，也因此被缩小了。这种涤除了最初粗糙，甚至本能的思想的新形式又被革命党重新捡起，加以限制，加以引导，指向一个更为特殊、更加直接的目标，用以反对被两个半世纪指作外族压迫、尤其是外族统治者的敌人——满清。只要我们稍微正视现实，这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就能发现，首先是革命党在各阶层拥有分支机构，在它所依靠的秘密会社里有位极人臣的大官，也有最卑微的工匠或干脆是剪径大盗，学生们在里面出谋划策，他们全都是新加入的爱国主义青年信徒，如我刚才所理解的那样。那么，预示着也许不久就要发生大动乱的那些征兆的错综混杂也就好理解了。

我在这份或上几份汇报中叙及的情况和我在第一份报告 No30M 中表示的意见之间表面上似乎存在着矛盾，现在，这种表面的矛盾也因此而不复存在。我曾说，那些秘密会社并没有反对外国人的性质，它们的目标主要是反对满清皇朝。然而，连我自己都提到了很多与这说法大相径庭的事件。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在出差途中与人与物的接触中坚定了他们的信念，认为对外国人的仇恨已成了最明显的特点，到处都如此。我前面展开的论述说明，实际情况丝毫不能削弱那些看法的潜在性。

反满党从它领袖的思想来说并不反对外国人，随着牵动他所有同胞们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孙逸仙出于政治上的理由，也不得不如此。如果他要不顾一切抵制反对外国人的思想，他的十年经营就会毁于一旦。他使这种思想为他所用，从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这是我在下文中要加以说明的。

况且他自己也非常爱国，他肯定考虑到了要把他的国家从欧洲的干涉下解放出来，从现政府特许外国人的不正常的特权下解放出来。这个政府在把它的习俗、法令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时候是那么地野蛮残忍，而在保护他们的时候，却又是那么软弱无能。

然而，孙逸仙也确信，如果他想要获得成功，那就无可置疑地必须赢得欧洲的照顾，至少也须使欧洲保持中立，因此，他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止对洋人生命财产的侵犯。

他明确表示说，即使在迟早要建立起来的新政府领导下，我上面说到的那些特权也必将被取消。应该明白，中国的责任政府不管是什么，外国人的地位都将在短期内出现变化。所以，他们最好还是随遇而安，回复到普通法，接受一个开明政府提供的保证，这个政府已经有能力制定西方各国能够接受的、能使人奉行的普通法了。让满清皇帝去做这样的工作能让人信得过吗？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法国历史学家对今日中国无疑是最了解的，因为五十年来他密切注视这个国家的变化。他又说："我不大相信目前执政的那些人

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1900年的联军首先应该采取的措施是用中国列朝的后裔取代康熙乾隆的不肖子孙。这件事若能做成，我们便能博得许多秘密会社的好感，这些秘密会社主要的、常常也是惟一的目标就是驱逐鞑虏。”

因而，中华帝国——我指的是在思索和发表意见的中国——的民意所向使我们相信，不久即将发生变革或革命，给予这个国家以它所迫切需要的组织机构。这个变化的后果之一将是取消给欧洲人的特许权。因此，改革是由一个被迫进行改革的政府来完成好呢，还是由一个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学习了方法和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人领导的一场革命来完成好呢？从把这场变革进行好的因素存在情况来看，后一种办法仿佛更为可取。这也正是我在下文中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二

我在前几份报告(30M,39M,44M)和案卷四的第2、3、4、5号及案卷七的第10号情报卡中，得以粗略勾画出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博士的品性以及他部下某些人的情况，陈述了他在长江以南广阔的华南各省建立联邦、把对封建统治俯首贴耳的北方各省留给满清的政治主张，我还提到了他打算一试的部分行动要点和让我派往各有关地区的军官对人们的思想状况产生的影响。

这些，我就不再重提了，只是将用最近回来的瓦德卡上尉带来的材料和由孙逸仙博士提供的情况加以补充。由于工作需要，克劳代尔上尉还没来得及结束他在当地进行的工作，就被召回到驻华法军参谋部，因此，这一回他与此已没有关系。

“广州人脱离帝国的决心很大。他们认为自己受中央政府的压榨，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任何好处，这种看法恐怕并非全然错误。因此，他们向往分离，并将真心诚意地参加任何以改变当今政体为目标的运动。

“该党在桂林(广西)的首脑是负责军队和学校的郭①道台(报告44M)。据说他十分聪明，参加运动非常积极，并且颇得上司的赏识。

“广西省地处僻远、交通不便，为中央政权所鞭长莫及。督员们一任接一任，却没有一个能在那里完成三年任期。最近又来了一个，此人原是贵州巡抚。他是否将比他的前任们更精明、更走运呢？

“该省一直处于暴乱之中，这倒并非因为那些秘密会社，在起义组织中有许多新参加秘密会社的成员，自然地培养出批评政府的人。暴乱由于前些年所采取的愚蠢的措施，以及北京政府对这个省的放任不管，它差一点成了政府每年给予津贴的少有的省份之一。因此，如果全面暴乱即将爆发，广西省显然会提供这场燎原烈火的第一颗火星，如同1850年发生的情况那样。

“贵阳(贵州)的党员是一个高等学校的老师，我有过一封带给他的信……这个地方山

① 郭(Ko)。——译者

峦重叠、沟壑纵横，交通十分不便，老百姓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本地人讨厌当今皇朝，犹如他们不喜欢其他任何政权一样。那里同样存在着造反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毗邻省份一样，人们希望复古，恢复到许多独立的小氏族，只是在理论上服从于他们所选择的一个全局的领袖。"

最后，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瓦德卡上尉结识了当地最重要的人物，即该省道台，孙逸仙博士的好朋友。瓦德卡上尉补充说："汉口、汉阳、武昌是骚乱的赞同者、不满分子和流浪汉麇集的地方、未来叛军的核心。听人说，秘密会社在那里有许多成员，尤其是在军队和学校里。"

我们派出的军官当然不可能弄清革命军队的人数，在关于这个特殊的问题方面，从已取得的情报来看，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党。杰出人物在不止一处担任过这个党的领袖，给人总的印象是时局有利于运动的开展。

由此，应把前面已经提到的地方报刊预感到有关这场运动的内容和商人大会在广州召开的会议对照起来看，就是在那些会议上有人说出了"中华共和国"这个词，以及还有斗胆写上这个词的那些布告。

孙逸仙是如此估计他的事业所赢得的群众的：分布国外、远东地区（香港、东京湾，交趾支那，新加坡）的中国人的十分之九，他们不仅是活动分子，而且以他们的财产为他提供资助，有的财产的数目还是很大的。如同克劳代尔上尉那样，我自己在上次东京湾之行中就见到过河内中国商会会长，他是分离主义党在河内的领导。广东、广西两省民众的十分之九，福建、湖南两省民众的十分之六七，贵州和长江中下游各地民众的半数以上。

这种比例所记下的与其说是数字，不如说是概念，它并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犹如我在报告（30M）中所说的，三合会的大首领、哥老会的同盟者孙逸仙认为他的力量已经足够了。所以他不再吸收新会员，就这个意义而言，亦即他不再寻求获得新的信徒，连他本人都退居二线。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得以确认这一点，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却较为人所了解，他在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思想指导属下展开活动的。

他一边在使已经点燃起来的对满清政府的仇恨烈火烧得更旺，一边力求使他的政治纲领广泛传播，这个纲领与华南的社会状况颇为合适，那里的人们至今犹怀念失去的广州和南京的独立王国。他保留了秘密会社"反清复明"口号中的前半句，而对后半部分，则有待于作出改变。犹如他已经说过的，建立一个共和国，尊重那些对地方自治的缅怀，力求把未来的国家并入一个联邦，一个仅是以保证共同体权力的联邦。找不到明朝后裔，北京政府的贪婪凶残，在独立的远景招拂下的地方意识、骄傲和利益的满足，这一切都有利于传播他的那些思想。

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有将近一半赞同革命，其余一半除几百名当今政府的官费生外也都同情这一事业。北京最近取消了对四名留法学生的津贴，因为他们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反清文章。

在转入行动之前，孙努力积聚资金和必要的军火，以便使他的奋斗能维持足够的时间。在这方面，自我在报告（30M）中作出的说明和案卷四的情报卡第2和3号以来有很大的发展。

他对我说，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同盟会支部最近提供了一笔二百万元的巨额资助。再有二百万或相当于二百万的军火他便下令起义。而确实，这二百万才是最难找到的。香港、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所有的社团全部都已尽力提供了他们的份额。这笔钱让他找谁去要？

孙考虑到最后还能求助于欧洲银行，很可能就是法国银行。他朋友们的批发商将为他签字担保，直至借足那个数额，只要借出人允许在几年时间内分期偿还，因为还得考虑到失败的可能。

在前面提到的报告里，我说过孙逸仙博士对北方不感兴趣，这说法并不完全确切。

他恢复和维持同北方各会社的联络，提醒他们自己的组织存在的宗旨。今天在那里有他的同盟者，他们即便不直接参加南方起义，也会在有利的时候把当今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北方。

北洋保安部队和军队在那里是会有事儿干的……也许不用花很多钱，因为他不甚相信他们的力量。不管怎么样，肯定，人们不大会相信，在中国目前的交通状况和这支军队的后勤组织情况下，它对南方有效介入的实际可能性。北直隶士卒的怯懦更使孙逸仙博士放心。再者，我也已经说过，他善于让支持他的秘密会社成员深入他们的队伍，士兵、军官，直至袁世凯的谋士中间都有他的人。他信得过我，把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告诉我，我将同他们取得联系。我希望通过他们能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现在和将来所担任的角色的情况……这就谈到此为止吧。

那便是孙逸仙的主要资财，以及他的力量分布情况。他的计划如何？他信任地给我说了大概。我这就将叙述这个大概，以便特别说明它同军力分布如何协调一致。他的兵力在南方密度较大，长江边上密度较小。这是一项简单而又清楚的工作，几乎完全在预料之中，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并且考虑到了将发生的事件所处的特定环境。

像这样的一场革命，拥护者至少占本地区民众的半数以上，成功的希望先天性地就比较大，尤其要对付的是一个像满清王朝这样软弱无能的政府，而革命又将在同一天内在四面八方同时爆发。

孙逸仙却不这样考虑。他认为，在南方边远省份采取这样的局部行动可能会失败，而稍有不虞，便会通过反冲而对其他方面的强大优势产生影响。他宁肯进行缓慢、循序渐进的行动，从一些他最信得过的，对他、对他的信徒、对他们的数量和质量都最信得过的地区开始。

夺取广州这个文化、军事和商业中心，夺取以广州为首府的两广，解除了可能还在犹豫的福建、湖南和贵州等省人民的忧虑。他说："广州起义获得成功后，我才能在那些地方取得几乎绝对的一致。在初战告捷的声威激励下，长江中下游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拥护我的人民，很快就会赢得对我的计划无动于衷和或许已有好感的另一小部分人。在三个月内解决一切问题。"

出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理由，北京无暇顾及："南京军队已倒向我们一边（参阅报告

30M,附件 No2),他们增援我们的战斗人员为数有限,但足以占领长江南岸,从此时起,南北形成对峙,民众投票将构成我们的屏障,新的国家便建立起来了。"

因此,一切便取决于在广东、广西两省的发轫,尤其是夺取广州。这部分计划是经过最周密的部署的。

官兵在这座城市和它附近的营寨集中了最多一万人马。而孙逸仙在株竹和信州①之间拥有二万条枪,在广西拥有三万条枪,该省正规军差不多将全体加入他的队伍,在西江三角洲各城镇村庄分布有他的八万人马,那里人们议论纷纷的海盗集团也将参加行动。

为了将失败的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行动将从两处牵制攻击开始,一处是在广州东部的丰顺山地,另一处在西面,广西省的东部地区。他们希望能把守卫广州的一万人马中的一部分兵力吸引得远远的。这时再直接进攻广州,西江三角洲的八万人马在广州的对手差不多就只剩下无足轻重的保安部队了,而且要塞中还有内线里应外合。

孙逸仙有点急了,他需要转入行动,他不能无限止地让他的支持者们老憋着一口气,他们等待起义信号已等了一年。

其次,他在官场的那些最可靠的活动家中有几个尽管在官方的公务上表现积极,也会受到北京的怀疑,尤其是郭道台。毫无疑问,他们如被解职将是巨大的损失。

最后,目前国外的政治形势十分有利,这是我在下一节要阐明的问题。

出于这种种理由,孙逸仙打算在年底前,下一个旱季到来的时候开始这场战役。

资金问题并不是推迟行动的惟一原因,孙逸仙博士十分清楚,成败首先如我刚才指出的,取决于欧洲列强对他将发动的起义的态度,而最近几个月来,他本人的注意力也首先集中在列强方面。

他出访欧洲归来,主动对我谈了他在欧洲取得的成果。我根本无法核对他对我提及的事实,我也无法判断他对远东问题所作的政治评论的真正价值。我将不加说明地陈述我同这位中国分离主义党领袖就这个问题的会晤的大概情况,有时也带着一些细节。然而应该指出,他那些计划显然不相调和,在它们的构思中甚至还有谋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思想。相反,这一切都是以列强、至少是对远东事态感兴趣的列强宽厚的中立为基础的,而在暗杀它们的侨民、抢掠他们的财产时,他便不考虑赢得它们的中立了。

实际上,他早就肯定说,革命将尊重欧洲在中国已取得的金融利益,商业和工矿企业可以对它们资本的命运放心,各国也可以对它们所贷款项的息金放心——未来的华南共和国不会否认清帝国借下的债务,共和国提前接受与它治下的民众人口数量成比例的债务部分。

另一方面,被孙称作相当有力、从今后足以占上风的社会和经济纲要所包含的内容中,首先便是推翻中国树起并维持至今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一切障碍,使国家对欧洲的渗透彻底开放,改造旧法规,代之以仿照我们的法规制定的新法规,等等。简言之,这新的中国

---

① 株竹(Tchou—Tcho);信州(Hin—Tchéou)。——译者

半壁江山将完整又迅速地与西方文明同化。

就纯政治观点而言,孙逸仙博士认为俄国和德国对他在江南的行动几乎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这些地区离它们视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太远,与它们有关的利益很少,非常少。

只有三个列强可能阻挠他的计划的执行,它们是英国、日本和法国。他说:

"而英国,我附带提一下,它的同盟会远东分部和我们三合会的中国支部一直是有联系的,尤其是自从英国在长江上作了试探以来。对于征服中国的领土,它肯定不再抱什么幻想了。目前的自由内阁已经抛弃了上一届的、应该说是侵略性的野心。这个内阁首先是个自由贸易派的内阁,所以如果我们给英国贸易保留它宝贵的自由权,中国打算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它的关系是不大的。我本人就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我早就确信,在这基础上,同英国的谅解是能够达成的。我见到了爱德华·格雷爵士,我对他阐述了我的观点。不管我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英国肯定不至于让自己牵累进我所尝试的这种冒险。但是,我从英国外交部争取到了他们绝不反对我的计划的许诺,甚至,如果境遇对我有利,如果我开始取得成功,他们将采取对我有利的立场。从大不列颠方面,我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望,只要他们许诺不作出有利于满清皇朝的介入,即像当初太平军时期反对南京太平天国那样。

"日本的形势同样对我有利,那里也是自由党内阁取代了激进党内阁,另外,我还得到一些个人的赞同,他们过去就曾给过我宝贵的帮助,使我满怀希望,我的主张能得到他们的赞成。不管欧洲怎么考虑,日本并不想冒冒失失地吞并中华帝国。同大不列颠一样,日本只要有商品销路、经济渗透的方便就可以了,而这不仅给日本国创造财富,也给中国创造财富。激进党内阁在这种合理的愿望上附加了一条政治影响更加贪婪的设想,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它的监护,这种设想同西园寺侯爵的观点肯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不要领土租界,不要答允赔款或给予特权,因为这会煽起中国民族主义的仇恨,我估计,我现在(4月28日)到日本去,是能够获得成功的,如我在英国获得的成功那样。我有英日协约的要素之一为保证,我完全有理由,尤其是在目前,相信赢得另一个要素的可能性。不幸,或者也许是可幸的是,自由内阁的日子仿佛不长了,我估计它尚能存在到下一次议院复会。而这也需要我在年底前行动,在日本议会作出变化导致恢复激进党内阁之前开始行动。

"对法国比对日本来说,问题的范围缩小了,也更精确了。可以肯定,新的华南国短期内就将比今日中国更强大,因为它是人民的政府,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它得以支配所有诚心诚意的人们,这是这里人人都确信的事实。所以,它显然将具有满清政府想都不敢想的活动办法。而这个问题,对法国而言,则可以相当确切地归纳成这种简单的说法:在它的属地的边界上存在一个比现在更强大的国家对它是否有利。

"因此,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是新国家会不会侵犯远东地区体现外国因素的东西。绝不会的。首先,中国人不是一个好征战的民族,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常常是反抗外国的政治,但从来不是主动反对外国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很长很长的时期里,这个新国家将进行一整套内务改革,这项工作将耗尽它的全部力量。最后,那些曾在它的诞生过程中帮助过它的人们,凭什么说它会拒绝承认他们的帮助,除了打仗就不会用别的方式酬答他们呢?

"再者，还请不要忘记，我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那种同你们的社会主义差不多的思想意识的人之一，我正在把那些寄希望于我的人往这条路上引导。我可以肯定，新国家将尽一切力量站在文明各国的前列，走在和平的道路上。

"所以，除非法国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想征服中国的南方各省，否则不应该觉得在与它的东京湾边疆交界的地方存在这个强国有什么妨碍，甚至危险。这怎么可能呢？法国舆论好像认为近二十五年里取得的殖民范围大大地够了，一切对中国的新的征服战会令人感到难以理解，况且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欧洲列强方面显然愿意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性。

"还需要说得更明显吗？要不是军费开支浩大，法国会在印度支那保持一支足以使它免遭任何侵略的军队，这对谁都不是秘密。而现在，它至多也只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幻想拥有一个组织，得以坚持一段时间，具体地说，撑持到援军的到来。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好几个月，而它又完全限于守势，那么，它能有多少侥幸呢？在这方面，既然我们谈的是战争和征服，同一个即在东京湾大门口的强国联盟，对你们的印度支那领地不止是多一个屏障吗？法国贸易在这个新邻国里将能得到安全感，在向世界交往敞开大门的制度下，法国贸易还能做到它想作出的延伸，这我就不说了。"

孙在法国大概使一定数量的议员赞同了他的事业，我知道的有德隆克尔①先生。他也许已对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贝特洛②先生详述了孙的部分纲领。他并不隐瞒说，我们暗中的支持即便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十分宝贵的，这种支持使他征得所需的资金和得以更加自由地行动，引进走私军火。我顺便要强调指出在他 10 月的想法和今天的想法之间的这一显著区别：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可能放弃现在的这种帮助，因为英国和日本的中立，一个已经争取到手，另一个指日可待，必要时对他也已足够了。

我没有充分的材料来确切地估计我刚才详述的理论和证明的价值。我只能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听到和判断的只是一组事实和变故。

然而，我努力作出的这个报告要做到不偏不倚还应全文援引瓦德卡上尉的结论，上尉在江南各省巡行五个月后报告的结论。只是必须注意：

1. 这位军官的派遣有点仓促，宣布他到来的命令未及时通知到所有与这次秘密活动有关的组织；

2. 他出发、同长江流域各秘密会社进行接触的时候（12 月份的上半月），这些会社同孙逸仙博士的联盟尚未建立，这个联盟是 1905 年 12 月 19 日在西贡缔结的；

3. 所以，他能够看到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从这份和前几份报告中的引语和他报给我的摘要节选，我们可以判断这一小部分的重要性。

瓦德卡上尉说："在广东，假若一场暴力或非暴力革命成功了，新政府取清政府而代之，民众同新主子是否能更协调一些呢？对此是可以怀疑的。

① 德隆克尔（Deloncle）。——译者

② 贝特洛（Berthelot）。——译者

"倘使他们的愿望完全实现了，也就是说目前的广东省和广西的南部、东南部组成一个如同以前存在过的那种独立王国，我认为，这个国家将构成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个重大威胁。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广东仿佛最明确地表示出了对外国人的敌对态度，尤其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讨厌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定居香港，从而使广州丧失了它旧时的商业霸权。厌恶法国人则是因为他们显然是危险的邻邦，很可能想攫取该省的一部分，广州湾就是一个开端。

"因而一个单由广东人组成的王国很可能显得具有挑衅性。英国人在香港不会受到伤害，而我们将承受一切压力。

"广西有很多民族，广东或湖南去的汉人只占少数，其他都是土著，有些部族迄今依然独立，另有一些虽屈服于太平军的压力却依然怀着独立的希望和愿望。这些人都是天生的反叛者，他们同样也不会容忍别的主子。

"对一个新政府而言，广西有数不清的困难苗子。这一切进一步坚定了我的观点，如果说推翻满清并非难以完成，建立太平天国或什么别的王国却将是一件颇不好办的事。"

总的印象："目前中国明显地有一场反对欧洲人的运动，这场运动对反满清王朝的倾向有很大的独立性。两场运动配合默契，而且我们清楚，叛乱军队的智囊团中，留日学生还以他们的反洋人意识为荣。

"如果革命爆发并取得了成功，未来的政权必将是反欧的。在这将旷日持久的混乱时期，外国人大有可担忧之处。我们法国人应对反法情绪高涨的广东人的侵犯有所准备。

"以我浅陋之见，改朝换代或部分解体对一般的外国人，尤其是对法国人，有百弊而无一利。

"新政权，即使最初得到过去法国的同情，也并不会有丝毫感恩戴德之心，因为左右新政权的将是民众意识，而知恩图报并不是中国人的美德。

"只有具有可靠担保的正儿八经的物质帮助将来对我们也许会有用处，然而，无法逆料，我怀疑孙逸仙博士能在法国找到这种帮助，我国政府估计也不会愿意投入这类规模的冒险，它有那么多问题得靠侥幸才能解决，而最后的结局又是那么值得怀疑。

"况且，我以为这未来的运动结合得不够紧密，没有一个领袖能树立起绝对的威望。不管怎样，革命一旦爆发，也许会成为与思想欧化、只看到推翻既定政府的孙逸仙博士所希望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没有把他同胞们的想法估计进去，他们重整太平天国的旗鼓，把这次运动看作发财和报私仇的手段。我看，难得有几个中国人在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认为的正义事业取得胜利而战斗。"

我在最近几次同孙逸仙博士会晤之前还不了解前面转述的那些结论。在此，我努力协调某些表象，实地考察的军官们有可能没有抓住那些表象的总体或起因，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些方面，孙早就料到了瓦德卡上尉所作的异议，反对外国人的意识，各省的地方主义，新国家可能具有的侵略性，等等。他用他联邦共和国的政纲对抗某些反对意见，如各省的地方主义、改朝换代的不可能性等等。对另一些普通的说法，他则用一些相反的说法，甚至断言加以驳斥……在分析完毕后，我将尽可能仔细地区分我认为已得到证实的观

点和只是产生于个人判断的一种看法，从而作出我个人的结论。

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

1. 分离主义运动领袖孙逸仙大智大勇，有这样的人领导中国革命，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由平庸的私塾教师、自称为"耶稣基督的兄弟"的洪秀全所策动的太平天国起义与这次革命不能同日而语……而这就足以使他大显身手了。这是所有曾接近这位要人的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我本人对他的评价。

2. 道路已经铺平：整个南方，尤其是两广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对此已经有所了解。

3. 不少高级官员（桂林道台、龙州道台、梧州道台）、军官（主要是两广和南京驻军的军官）、学校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留日和留欧学生都赞同起事。前两种人的情况已得到瓦德卡上尉和克劳代尔上尉的印证。

4. 秘密会社将参加南方的运动和帮助北方的运动，在这方面，它们依然遵循着自己百年的传统。孙逸仙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传统，他自己就是三合会的大头领。

5. 孙逸仙所缺的资金总额已不多了，用这笔钱不是着手干、而是继续作出必要的努力。他获得这笔款或省去这笔款都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形势对最近要采取的行动十分有利。

我以为：

1. 该党各组成部分之间观点和推动力的统一已较好完成，两位去考察的军官没能了解这一点，它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些问题上，在无法肯定的情况下，我只能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建立在该党领袖在我身上唤起的信念的基础上，依据他这个问题作出的断言。他以往的声明，凡经受了检验者，无不被公认正确。

2. 满清政府不是南方起义者的对手，广州总督使出全身解数也弥补不了压制运动所需的财政和军事手段上的匮乏。另外，即使是在反满宣传达不到的地方，敲诈勒索、贫困和新的税务负担就足以引起每天报刊都提到的怨愤和骚乱，而这些怨愤和骚乱不管怎样都将是对在帝国四方蜂起的革命，或就狭义说是对分离主义行动的帮助。

3. 在新事态中，欧洲列强不用指望保持它们目前在中国享有的特权、租界制度、治外法权，等等。但是我也坚信不疑，从现在起满清政府自己也倾向于取消这些特权，舆论的压力迫使这里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愿意这样做。总之，这件事无疑同一个比当今政府更开明、更欧化的政府共同解决为最好。

4. 欧洲人在中国的生命、财产没有什么可因为起义而担忧的，除可能出现的某些孤立的地方性事故外。相反，在这一点上，瓦德卡上尉怀疑领袖的权势和威望是否足以抑制他的士兵或参加者的反对外国人的偏见，以免在我租界发生杀人或抢劫事件。对此疑虑，孙逸仙举出1901年由他领导的未获成功的广州进攻战中各会党的表现为例，加以解答。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传教士或其他不管住在多么偏僻地区的欧洲人受到损害。此情况属实。

最后，对法国是否应支持这一运动的问题我暂且不谈。我的职责权限于预防可能发

生的事件和提供原始材料,以便对这些事件的影响和利弊作出判断。

我已将此报告抄件呈交法国驻北京公使先生。但有关孙逸仙博士的行动计划部分我只给了他一个口头通知。博士信任我才把这个计划告诉我,这个问题对他性命攸关,对我们却无关紧要,我不能在中国土地上,不管是在别人的或我的档案室留下笔录,冒有负于他的信任之险。

（签字）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字）
〔中国情报处　No57M　（机密）〕

6.1906年5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年5月30日,天津）

第四部分　中国、尤其是华南地区的总形势
——排外和分离主义运动

我在5月10日的报告(59M)里,为说明中国骚乱各不同形式的特性用过一种简单的分法,这次我仍要保留这种分法,把它们分别称作:反基督教运动,排外运动,分离主义或反清皇朝运动。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反基督教运动的特性在于它是由一些下等人发起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下等人几乎总是受到各不同倾向和来源的破坏分子的煽动。在那些已知或更确切地说已被怀疑到的破坏分子中,有的就是一贯制造混乱的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土匪强盗;还有的是宗派分子、光明异端派,从义和团发家的拳民便是这部分人的典型例子;最后还有满清政府的政敌,他们惟一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给这个政府制造屈辱。

那些可怜的贫民既没有好的指挥,又缺乏资料,连武器装备极差的大多数总督、巡抚都对付不了,他们听任那种蠢举的牵制,很快便累得喘不过气来。在同一点上的骚乱很少有坚持一个月的。某省某个偏僻角落燃起的烈火几乎总是自行熄灭了,然后在几百里外重又燃起,开始其势汹汹,很快便衰减……虎头蛇尾。再者,当地的情况也利于烟消云散。使那些人发动这种短暂骚乱的原因是饥馑、赤贫和捐税的增加,而由于旱魃继续猖獗,收成预计比哪年都糟糕,不安是普遍的,所以,不管什么地方都不怎么闹得起事来。

然而,某些省份的情况仿佛好一些,它们是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各省。

安徽有两座教堂被捣毁，四名传教士遭殴打，甚至听说有人在茅岩界①被杀。在威远，更甚者在贤德②，他们组成团伙，试图焚烧传教士住地，迫使官兵插手干预。就这一次，官兵为著名的洋枪队报了仇。可几天以后，骚乱在九河界东山再起，接着又发生在洪家界、姚岭湖和毛大口③。该省一份告示揭发传教士引起老百姓的仇恨和报复，其中有几段值得转载："赤山，红莲会兄弟布告曰，为扶清灭洋事……

"中华皇朝号令天下。满、汉百姓皆其臣民。不可忍者，邪说子孙定居天朝……

"洋人诋毁孔教学说，废弃科举，偷盗皇陵，开设铁路，他们还输入鸦片毒物，增加关税，令吾等痛心疾首，噫！堂堂中国竟受洋狗欺压！有人心者孰不为之羞赧……

"吾侪以为，不知锄莠草者即不善于耕耘良种，不诛邪恶即不知为良善维护太平。

"今我百姓身罹苦难，势若倒悬。

"吾侪仇洋铭心刻骨，为歼灭洋人招兵买马，情在所迫，不得不耳。拿起刀枪非欲谋取高官显爵，貔貅逐鹿也，非受贫困所驱使也……"

安徽省攻击之激烈，次数之多尚有其特殊原因。位居该省之首的新巡抚恩铭是凶狠的反动派，以反对外国人著称，曾被牵入拳匪之乱。

湖南已有帮会形成，并有确实的毁坏传教使团住所的计划，他们已开始同官兵发生冲突。

河南，巡抚把严州府和中都发生的骚乱归咎于哥老会。

浙江杭州府张贴出一些煽动性告示，地方当局为清查传教使团及其信徒们的财产所规定的专横措施，很可能引起基督徒们的反抗。

在江西的建昌县和南康府，江苏的祝融界，老百姓在一名道士（八卦教教主）的煽动下有不安表现。这个道士真该逮捕法办。然而还有反清分子的挑动，他们利用了增加捐税所引起的不满情绪。

我们接下去要列举排外行动或表现，这些行动或表现与任何宗教问题都无关。除非有时在它们刚产生时将宗教问题作为借口。这种事实，不管我们列举的时候如何一掠而过，都能举出很多。

先说几件小事：

湖南好几个城镇的天地会，通过告示劝诱中国人拆毁铁路。在山西，有人威胁要抢劫各邮政局，因为邮局是洋人主管的。北京出现了一些匿名揭帖，提出1900年使用过的办法，揭帖上只有这么几个字："西洋，兵勇，匕首，水。"在警署撕掉那些揭帖，并且在晚上当场抓住两个张贴者之前，再笨的人也能懂得这几个字的意义。

有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些情况里看到政府的行动，或至少在对待和听任那些评论流传中可以看到政府的照顾。

① 茅岩界(Mo—Yen—Tsien)。——译者

② 威远(Wei—Yuan)；贤德(Chien—Te)。——译者

③ 九河界(Tsieu—Ho—Tsien)；洪家界(Hong—Kia—Tsien)；姚岭湖(Io—Ling—Hou)；毛大口(Mo—Ta—Keou)。——译者

在满洲协二标一哨有三十名官兵发表了一份宣言，提到安南在法国压迫下遭受的苦难，这个问题在中国引起了种种惊人之谈，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例子发生在中国的大门口，毫无疑问，外国人在这里缓缓地推进，其目的或迟或早是要攫取中华帝国，中国对此应有所考虑和防备！"

中国报纸，甚至欧洲报纸都转载了广州、香港、西贡的一些电报，周期性地强调法国无礼占领了法属东京湾边界上的龙州。中国的喉舌引用那些许多人都明知情况不属实的新闻以便再次悲叹时代的不幸。据宣称，道台尹贵曾竭尽一切可能收复失地，《上海时报》说："唉！我们以为，落到虎口里的肉再要拿出来是很难的！"更有甚者，传说法国终于答应吐出它的猎物，代价是给予它从东京湾到桂林修筑铁路的特许权。而如果老说这些倾向性文章的编纂者的目的何在没什么意义的话，中国政府听任诸如此类的谣言四处传播而按兵不动则实在令人惊讶。那些新闻或者就是它自己的敌人的作品，他们这样做是要突出它对法国的摇尾乞怜或软弱无能，企图叫它威风扫地。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为什么不出来辟谣呢？或者它与那些中了邪的人是同谋，他们用这种手段促使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人。

两种推理的第二种说法也许比较接近事实，而最近采取的针对赫德爵士的措施是又一个证明。本月初，我们突然得知皇上发了一道圣旨，让这位署理中国海关四十余年的高级官员服从被任命为总局局长的唐绍仪和铁良的领导。当然，说明这个措施之正确和赫德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的正当理由并不难找，他总税务司的职衔依然袭用，总之只是对旧的事态作了个微不足道的更改，在这个意义上，赫德原来是向外务部汇报，今后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向外务部派出的两位代表汇报。可事实也十分明确，迄今一直在等级顶峰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现在居他之上有两位中国官员，他们的职务和头衔都比他高。而由一名欧洲人领导海关工作本来是被视作一种必要的保证的，因为海关收入是欧洲各国给中国名目繁多的贷款的担保，因此这个问题曾经与有最直接关系的列强各国公使商讨协定。然而，最有趣的是看一看舆论界是如何对待这项措施的。在欧洲人那里，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日本影响的胜利，另一些人则觉得这是袁世凯的个人胜利。中国报界在寻觅这位解围之神中却没有搞糊涂。所有的报刊，所有关系到各官方或其他圈子所"议论的内容"的报道口径绝对一致：对北京有力的爱国创举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肯定说，这只是一个开端，而事实上军机处也已经有人提到谏议皇上任用两名高级官员为帝国邮政总局的总局长。

我们可以用中国报界对待南昌事件解决办法的消息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节，那个解决办法对法国十分有利。这是不难设想的，《京津时报》的一篇文章作了概述，一份十分真实的记要。记要以非常具体的形式清楚表达出所有那些地方喉舌的态度和看法。那些地方报纸不无理由地自诩代表中国舆论："两三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的最有力证明之一是中国报纸数量的增加。它们同欧洲报纸的区别是，欧洲报纸不怕称赞和鼓励在他们的许多企业工作的中国人，而中国报纸却从来没为外国人说过一句好话……在它们满足于沉默的时候是幸福的时候。"

最后要说的是具有反政府性质的那些主要事件。

有一部分仍是偶然原因酿成的：一个地方官员采取的某项激恼人的措施，一桩令人讨

厌的徭役，一种越来越重的赋税。结果是四川闹事，在瓦灶和别的许多地方，因为增加酒税和盐税发生骚乱。湖南湘潭县闹事则是由禁止出口该省稻米引起的。云南麻啦界樵夫策动的闹事，则是因为要他们缴纳一种新的砍柴捐。严重程度各各不同。四川闹事人数达几千，地方性，相对地说还不那么令人担心，几次情况都差不多。关于红胡子的劣迹，我便略而不谈了，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提到过。

其他那几次闹事的原因较令人懊丧。福建伊宁州地区，饥饿煽起了五六千人闹事。湖南某些农作物遭到暴雨破坏驱使宁朝和南平两地农民暴乱，或者干脆说是结伙行劫。

相反，福建的骚动纯属造反，将近一万人的"江湖会"主要集结在安济附近，该省饥民壮大了这支队伍，他们对抗官兵。在西藏边界附近的巴塘和三希，叛乱者已有好几个月使该省民团处于败绩。四川倮倮族造反。湖南张之洞部曾在石邦得手，而那里也一直没有传教士或基督徒遭到殴打……不是还有人说，蒙古亲王家开始鼓吹背叛现王朝，主张蒙古独立吗？他大概已经聚集起了一支小部队，正准备行动呢。

这类表现的冠首当然非广东广西莫属。我上一份报告(57M)对此已作十分详尽的叙述和评论，这次便不再强调了。我仅提一下发出那份报告后发生在那些地区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事情。

广西玉林府附近的形势几乎维持不变，省府桂林同南方各州府的联系几乎有可能被全部切断。在广东，会党掌握了竹竹和九州附近的农村，阳江发生新骚动①。新会县海盗活动再度猖獗，海盗集团和当地百姓勾结行动。

莲坪州知州逮住匪首邹亚竹和他的整整一百名信徒，官军小获成功。岑总督打算组织一次比较逼近暴动者的战斗，特地为此组建了一支游击军，全部由在军中服役至少三年的可靠的老兵组成，这对与南方惯匪拼耐力和勇气倒绝非多此一举。

在我上一份关于华南问题的已经十分冗长的报告里，我不想过分地加上克劳代尔上尉在那里进行专门考察所作的汇报。这一回应该拿出来了。

我们记得，这位军官曾接受对与东京湾边界接壤的各省进行战略考察的使命，考察的目的在于了解东京湾边界的防御工事转同海滨防线后，可能会为某外国列强接触我方属地芒街——高平的侧翼提供方便。

另外，克劳代尔上尉还要在那些地区建立一些情报站，以研究日本人的军事行动的组织方式，日本人注定会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我已经说过，他在完成这些附带任务中是十分成功的，我只要把有关主要资料已取得的结果概括一下就行了。我还将转发他为此而拟的记要(草图 No2)。

"东京湾目前的防御系统大致包括：

① 竹竹(Tcho—Tcho)；九州(Kiou—Tchéou)；阳江(Yang—Kiang)。——译者

"(1)在交趾支那的一个基地,(2)在东京湾的一支机动力量。

"东京湾的机动力量在完成动员后,包括集中在河内地区的一支主力部队和海防、南定方向的一些前哨部队。

"几支分遣队预防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支在安南,其他几支分布在从谅山到老街的中国—东京湾边界上。

"本系统并未考虑、远未考虑边界地区外的任何防御行动,东京湾被缩减的兵力不允许这么做。这个系统充其量只能应付一次中日联合行动。

"在我的规划里,我曾对进行上述可能发生的以芒街和高平之间的边界为目标的联合行动所需条件作了一般的研究。

"撇开中国的次要因素,我作出如下推论:

"1. 日本人可能在广州和芒街之间的中国海岸某处登陆,然后沿海岸公路进军;

"2. 或者在广州登陆,然后取道西江到南江(梧州—南宁)的水路。

"第二种假设经不住推敲。水路长且难走,要求地方上的准备工作(小船组成的船队,内河船船员,等等),不符合迅速到达东京湾边界的要求。它可以构成军事行动开始后的给养线,但也只有这个用途。

"余下日本人在广州和芒街间的海岸登陆的可能。这个范围可直接归纳为广州湾到芒街的范围。

"因为,或者日本舰队完全控制海域,这时,很明显,登陆将在离目的地尽可能近的地方进行(例如,龙门湾,钦州地区)。或者它必须严格注意尽量隐蔽登陆,那么,很明显,它最好是利用由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组成的自然掩蔽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登陆仍是在尽可能近的地方进行为好,也就是说,在广州湾地区。

"就这样,我把日本人登陆地点划在芒街和广州湾之间。而考虑到在龙门、北海、乍头浦、广州湾各地的海岸都不容易登陆,广州湾也就最安全了,因为广州湾登陆后需要走的路程最短。

"不管日本军队准备在什么地方登陆,他们开赴东京湾边界可走三条路,起点都是在钦州,这三条路是:钦州—芒街、钦州—上思—龙州、钦州—南宁—龙州。

"由于第三条路大部分经长年丢在一边的水路,甚为不妥(不管怎样,它是第二条路的延长),最后剩下两条可取之路:

"(1)钦州—芒街,(2)钦州—上思—龙州。

"由于第二条路长得多,而且显得比较难走,所以,考虑采用第一条路线的可能性较大。然而,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日本人在需要的时候会不会用这条线路,而我认为对此的答复明显是肯定的。

"鉴于我们在东京湾的兵力确实很弱,据儿玉目前的估计,有七万五千人。将这些人分成力量相等或不等的两个纵队,毫无不妥之处,我甚至觉得更为有利。例如,有利于在东京湾造成对增援两个受威胁方面的兵力大小和性质几乎是完全不测的感觉,有利于用大幅度包围的威胁使三角洲防卫岌岌可危,有利于通过在殖民地的两个相距颇远的地点上力量的显示,对安南百姓的思想起一定影响。

"以谅山为第一目标，取道钦州—上思—龙州—凭祥的各兵种大部队(一、二至三个师)的行军需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为此需对下列情况作普遍考察：

"1. 交通线路；

"2. 宿营；

"3. 给养；

"4. 尤我方对抗下行动的可能持续时间；

"5. 在哪些地方可能进行最有利的牵制。

"这还包括走完掌握材料十分不足的预计路程，不影响对需要的各地情况作有效的详尽考察。

"广州湾—钦州，钦州—芒街路线的问题也一样，只是把它放在二线，因为我们已经掌握足够情报，差不多已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简而言之，能够使东京湾在得知日军在广东海岸登陆的消息后，根据他们将进行的路线，了解自己可能支配的期限，以及可能作出防御或牵制行动的最合适的地点。"

克劳代尔上尉来不及完成那些问题的详尽考察，便被过早召回天津就职占领军参谋部参谋长，他是善于就提出的难点作详尽考察的。印度支那集团军最高司令官派出另一名军官受中国情报处支配，殖民地炮兵部队科基尔上尉，完成对所寻求解决的方法的调节。

科基尔上尉目前正在现场。我专门为他找了个向导，这位向导将尽可能地使他与一些附近地区的海盗头子和会党巨头会晤。了解一下在我们遭到攻击时或者在以广西为策源地并在广西拥有后备力量的中国革命事件中，他们将起怎样的作用，这是颇有裨益的。

我将注意汇报所得结果。

(签字)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字)

〔中国情报处　No61M　(机密)〕

7. 与印度支那毗邻的中国各省及中华帝国的概况

(1906 年 6 月 20 日制订，副本)

整个华南的局势

中国形势继续日趋黑暗，骚乱、抢劫、哗变蜂起，尤其在长江流域和整个华南地区，令人想起 1900 年的凶险日月；最近发生在长江流域和两广的水灾更加剧了形势的严重性。

从近来充斥整个中华帝国的各种报刊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是三个起主导作用的派别同时行动的结果，它们是政府中的改良派、反朝廷的革命党和所谓新学者派——确切地说，他们是假学者派。

上述改良派和革命派，为实行中国革新，同样都以西方文明为依据。民众头脑简单，难以看出这两派间的区别。也许革命党倒并不为在他们和改良党之间制造混乱而感到恼火。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这个派别的力量显得更加强大，尤其是在洋人看来，而他们又在积极地争取得到洋人的支持。

假学者们踌躇在这两派之间，他们大叫大嚷兴风作浪，只因曾在日本或海峡殖民地生活过几个月，便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了西方文明的全部奥妙。

无疑，这些人都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梦寐以求一个极其强盛的中国，但是他们肤浅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使他们分辨不出哪些才是改善他们国家命运的比较可靠、比较有效的途径。在那些假学者中，革命党人的情况很有利，只要用一些大话连篇的演讲和浮华的词藻便能把他们糊弄住了。

他们的特点是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是由于日本近期来取得的成就引起的。正是他们叫得最响要驱赶洋人，认为外国的科技知识和资本对今后的中国是多余的。改良派的杰出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针对这些人写了下面几句话："尽管中国已经有一些完成有关铁路知识学业的工程师，可他们毕竟还缺乏经验……目前，我们仍然需要暂时地聘用外国工程师……"

改良派即以政府的行动方式为自己的行动方式，革命党则能支配那些秘密会社，这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一方面，近两个月来，政府在南方逮捕和处决了许多人，另一方面，最近在北京车站发生了谋刺案，充分体现出两派斗争的特性。

概而言之，两个势力强大的党派之间在激烈斗争，夹在两派之间的人数众多、吵吵嚷嚷，可本身又没有什么特点的第三集团在游移。尽管如此，这三个派别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是中国人之中国"。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活动，争取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也就是外国人拥有的打官司时可以不在中国法庭露面的特权。这一活动得到了三个不同派别的支持。由一名中国大臣取代赫德爵士的中国海关总督之职的决定，同样也得到了三派一致的赞成。

不管怎样，正由于这些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因而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最深刻的反响。他们从中看到了暴力，自己也变得暴烈起来。

中国南方秘密会社的行动

各秘密会社始终在下层百姓中，在小商小贩、士卒、尤其是流浪汉中吸收门徒，而且是吸收很多门徒，可是该派领袖们要求吸收的官吏会友的人数却甚微，而且他们中几乎可以

肯定还有一些贴着革命党标签的改良主义者,例如龙州道台。

就是带着这么一批乌合之众,孙逸仙一伙还只是刚刚接触西方思想的现实,就企图出来反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既成事实。

如果说政府在广州城的权力已被削弱,我们可不能因此便臆断两广和中国南部地区的情况也都如此。广州是因为受到与它毗邻的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影响,整个中国的其他地方都还是传统地对它的官僚们俯首贴耳。如果革命的大旗目前便举起,它最终必然会在旧的政府和社会机构前一败涂地。

另一方面,我们也难以想象把处于目前状况中的中国民众和1789年的法兰西民族相提并论。当时,实际上,我国已万事俱备,精神上达到了一致,足以使18世纪的哲学思想得到迅速传播,激起每个人心中对自由的向往。

目前的中国却并无丝毫与此相似之处。新思想只为极小的一部分人所持有,比较之下,古老的意识却依然束缚着芸芸众生。

对那些逃兵,形形色色的土匪海盗,对那些多少有点儿被迫加入孙逸仙的革命行列的三教九流人物,能抱有多大的希望呢?

能在这些人身上找到曾成为一切伟大革命行动的动力的那些高尚的情感和那种共同的理想吗?

难道我们面前的不正是一群趣味低劣的野蛮人?他们非常可能在很容易受影响的两广民众中间挑起最悲惨的血腥事件,甚至在东京湾边陲地区引起反响,造成骚乱。然而,倘使真要组织一场因为处在一个过于朽老的世界中而尚为时过早的,本身就已经够难组织的进攻,这批人又不可能听从将令和遵守纪律。

所谓现政府保护下的反洋人行动

5月15日的《中国回声报》发表了一篇攻击外国人的文章的译文,这篇文章在由江西的帮会挑起的反基督教骚乱期间曾在江南一带广为流传。

文章的作者们自称是当今皇朝的人,说他们"怀着对洋人的刻骨仇恨,吁请所有愿作为步骑将士帮助他们的人把所有的洋人都逐出中华"。

就目前情势而言,北京政府是否真的保护这种宣传是颇值得怀疑的,然而,这一件事却应引起注意。

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动

4月8日的《东京湾展望》上登载了一则消息,据称,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将主持一个朝气蓬勃的俱乐部,出版四种期刊,这些期刊将由日本人在中国发行,其目的是不难理解的。

日本人似乎又要在中国大肆活动,据1906年5月17日的《中国回声报》说,有大量日本僧人将在福建讲经传,他们将能在该省吸收三千二百余名信徒。

另一方面,最近路透社的一篇电文说,数量可观的日本人汇聚在湖南省。他们将在湖

南设立长期性的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在那里办学，担任大中小学教师。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①]将在横滨和汉口之间新增每周一次的不间断的航班，将有三艘汽轮走这条新航线，首航时间是6月3日(1906年6月1日的"Ostasiatische Lloyd")。

广东—福建—台湾[②]

一、广东

骚乱种种。骚乱和哗变主要发生在该省东部，它们仿佛是三点会(天地会)的会众们所为，总督已派人特别监视。

哥老会也是督府方面严密监视的对象。一个名叫陶知章[③]的统领因被指控为该会成员而在广州锒铛入狱。

总督出巡。总督曾前往惠州专门视察了陆海军情况。他让陆军当着他的面演习，并对指挥那些军队的军官大加指责。他还让黄埔海军学堂的学员发射鱼雷(《远东日报》)。

据5月17日《东京湾展望》发表的一篇专题通讯说，总督不久后将前去巡视整个东京湾边界地区的中国军队，届时钦州(在芒街东面步行三天的地方)将举行一次大检阅。

几个情况。西江三角洲的几处堤坝被冲垮，从而造成江边县城的严重水灾。总督对某些记者采取了好些严厉的措施后，最后创办了一份《粤东报》，据他说是专门用来对抗那些进行排外运动的中国报刊的。印度支那殖民总督颁发的一条法令允许这份中文报纸进入殖民地。

总督大概已经向外务部提出要求，要求在印度支那设立一个中国领事馆(5月9日《东京湾展望》)。此情况当与本形势报告的第一部分(交趾支那)中就同一问题所提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

二、福建

骚乱与秘密会社。彰浦骚乱的制造者们躲进了福建、广东交界处的一些山洞里(见上一份形势报告)，马将军的军队肯定曾追捕他们，杀了一百多叛乱分子，逮捕了十几个。

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似乎在联手镇压革命活动，事实上，前者肯定曾请求两广总督帮忙驱散那些秘密会社(5月18日海丰通讯)，另外，他大概还曾停止一家报纸的发行(5月19日《中国回声报》)。

5月19日《中国回声报》指出，厦门附近集结着许多可疑的中国人。

另一方面，路透社6月20日电指出，有两名美国人在厦门邻近地区遭到攻击，一名受重伤，另一名轻伤。

4月5日《顺天时报》提到在福建某地新近建立了一个团体叫"江湖会"，也就是在海上和江河上专事抢劫旅行者的会社。既出于诸如此类的社会目标，其会员们的思想面貌

---

①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ippon Yusen Kaisha)。——译者

② 原文福摩萨。——译者

③ 陶知章(Tao Tse—tchang)。——译者

如何则已无庸解释。

三、台湾

台湾岛新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先生大概在6月的上半月离东京赴任所。

6月18日路透社电宣称，日本政府将继续进行战时中断的基隆的防御工程。

广　西

边境治安警察(1895年协定)。靠近朔庄方向边境的中国军队近来有许多军官调任。调任原因不明。

该部司令陆阿宋最近将把他的府邸设在河东，他眼下的府邸在水基。

秘密会社。在上一期形势报告(广西一节)中曾提到的正在形成中的那个帮会，其起因似乎仅仅是因为对龙州道台的不满(见前几期形势报告的有关部分)。这个帮会的帮主是一个叫黄庆鑫的人，此人曾当过派人杀害魏斯盖格中尉的海盗头子的副手(此事发生于1902年2月，纳朗达隆地区。高平边境治安部队分队长4月份报告)。

一个中国代理人、云南铁路工程的招工者曾在隆平地区招收了八十名苦力，然而当地官员禁止他们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边境当局似乎曾叮嘱要尽可能地不让筑路工程招到苦力，借口是此时农忙，抽不出人手(上述边境治安部队报告)。

该省其他地方的情况。平乐府地区继续处于纷乱之中，这个地区的好几座城镇可能落入叛乱者手里，一个由一千多人组成的集团将占领陆泽、安坦、达桥。正规军不敢与这些叛乱者较量(3月底的《中国》)。

叛乱者的两名领袖韩和春和黄友瑞大约在3月底已被捕。

同一时期，在离平乐不远的贺县谷地的一些峡谷里抓获带着许多武器的好几个叛乱分子。

4月4日的《中国回声报》指出，广西有人在大量散发一篇在日本印刷的抨击性文章，这篇文章无疑出自留日学生之手，它对欧洲人在远东的所作所为普遍地加以指责，特别攻讦了法国在广西的行动，要求民众和当局起来反对法国工程师修筑铁路。

西江的航运。6月12日《东京湾独立报》上发表的一篇广西通讯宣布，2月份以来因水位低落而中断的到南宁的轮船业务最近恢复，随着海关和各国领事馆的建立，南宁港不久也将对外商实行开放。

云南—贵州—四川

一、云南

边境治安部队(1895年协定)。河口武官已于5月底动身巡回募兵。他所部兵员人数大大低于规定数，这位军官担心蒙自道台为此对他严加惩办(密使报告)。

河江边境治安部队分队长通知说，日前，在与我第三军辖区接壤的边界地区有二百五十名准备前来参加我云南铁路筑路工程的苦力，他们因地方官员的告示而被阻。

印度支那总督云南之行。3月份,印度支那总督先生在佩纳金①将军陪同下前往蒙自,了解老街到蒙自的铁路工程进展情况。

铁路。据4月4日《中国回声报》上发表的一篇云南府通讯说,3月份,从云南府到波西之间的铁路工程进展情况如下:全线路堤有一半已经完工。

在线路另一端的南底,4月25日铁路已修筑到第二十四公里处。到达二十五公里时即将建立一个仓库,而mafous列车则将从此处驰向蒙自(筑路公司的代理人发来的情报)。

因欧洲人和大量外国苦力来到铁路工地,使食物价格上涨,由此造成的不安一直在发展。

其他情况。根据密使的一份报告说,蒙自有几家属香港中国商号的做棉纱生意的大商店由于惧怕未来的骚乱最近关门。

二、贵州

据6月6日的中文报纸《同文沪报》说,贵州巡抚将一次由秘密会社三点会(天地会)发起的重大叛乱活动呈报北京朝廷,这次叛乱活动发生在大天府附近。

三、四川

目前,地方当局在征收各种捐税,有的用于修筑铁路,有的用于军费开支。前者取自各种收入,后者来自盐税,且后者的征收并非毫无困难。在该省东部的顺庆府地区还曾为此而爆发过严重骚乱,使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镇压(5月2日和4日的《中国回声报》)。

巴塘地区还发生了叛乱活动,这一次很可能是由喇嘛寺引起的。正规军战胜了叛乱分子,但有损失(4月10日和20日、6月3日和6日《中国回声报》)。

据《东京湾独立报》4月3日发表的一篇短讯云,云南铁路公司的代理人在四川招募五千名苦力。

缅　　甸

云南总督报告说中缅边界线已经划定,他即将绘出图本呈报北京(4月19日《新闻日报》)。

印度的英国政府决定为云南人在八莫开设的学校(此事详见1906年2月28日形势报告)目前尚无法开学。八名已经被学校录取的云南府学生一直跑到大理。但到大理后他们接到通知请他们回家,八莫学校尚未建造完毕(据4月28日《中国回声报》上发表的一篇云南府通讯云)。

据路透社最近的一则电讯说,内关—毛淡棉铁路几近竣工,英国人现在计划从毛淡棉到暹罗铺一条线路和在海峡地带建立一些设施。

---

① 佩纳金(Pennequin)。——译者

暹　　罗

日本人在暹罗的活动。法兰西共和国驻暹罗公使馆武官在5月4日的备忘录中报告说，日本人东山再起，企图进行同暹罗较密切的接触。近几个星期的各家远东报纸《日本邮报》、《日本时报》、《暹罗自由新闻》，完全证实了我国武官发来的情报，这些情报可概括如下：

日本驻曼谷公使稻垣先生在暹罗住了八年，目前在东京休假。他在东京展开了一场最积极最巧妙的活动，想把他同胞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暹罗去。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这个王国的繁荣，强调指出暹罗的销售市场，而那里的贸易迄今处于中国人或欧洲人的掌握之中，云云。

他宣称，这个王国确认，为维护其独立，通过发展教育来巩固它的地位是必要的，两三年来，它开办了二十多个规模很大的男子学校或女子学校，以及有关政府管理、法律、海军、陆军和农业的专科学校。已经有一些日本教师在那些学校里工作。

伊纳加其先生带了十一名暹罗学生到达日本，他们已被录取到海军军官学校听课。这些学生中有两名是国王的侄儿，另一名是外交大臣的儿子。

日本驻暹罗代办田边先生最近仿佛已招募五名日本海军军官，他们将出任暹罗海军军官学校教员之职，然而，实际上他们将取代挪威军官，并主持改组和扩大暹罗舰队。

自1903年以来担任暹罗陆军总司令的暹罗王诸，最近在一名将军、一名上校和二名副官的陪同下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天皇最隆重的接待。此行的目的仿佛是要进行为暹罗求得日本教员或教官和军火的谈判。

军事情报。据法国驻呵叻副领事报告说，今年2月，在呵叻和比麦之间地区进行了数次演习。参加这几次演习的兵员（常备军和预备队）达三千人。这些部队的卫生状况很差，因霍乱而引起死亡的有五十六人，许多人因病而留在途中，半个月演习后，暹罗政府不得不遣散预备队，因为从演习计划来看，他们还需要接受更长期的训练。

万象（法属老挝）督府特派员在6月份的政治报告中提到，班—德阿—马肯①的守备部队包括有：

1. 一个由三个连组成的步兵营，包括七名军官和四百五十名士兵，其中三百名老挝人，由一名上校指挥。

2. 一支由八十人组成的宪兵分队，由一名欧洲军官指挥。

在班—德阿—马肯（情报来源同上）储备有下列军火：

六门速射野战炮

十一门榴弹炮

近一千枝步枪和大量弹药。

---

① 班—德阿—马肯（Ban—Deua—Makeng）在万象南面。——译者

其他情况。正如我国驻东京武官在上面提到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所有的远东报刊都宣布了即将开始的日本轮船的航运业务,这艘轮船属"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二千吨左右,航行于香港与曼谷之间,从而延长了日本到香港已有的两条航线。

据法国驻曼谷公使馆随员热纳韦①先生的报告,法国在暹罗的进口额从 1903 年的 890356 法郎增加到 1904 年的 1398216 法郎。另一方面,从暹罗到法国或法国殖民地的出口额则比 1904 年的 897465 法郎增加了 681422 法郎。

即在这份报告中,表达了海洋运输公司认真审查新加坡—曼谷—西贡附属航线计划的愿望。

印度支那集团军总司令　少将　谢瓦利埃(签字)

河内,1906 年 7 月 7 日

作副本用

参谋长(签字)

8.1906 年 6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 年 7 月 5 日,天津)

第四部分　中国总形势
——排外运动和反皇朝运动

为证明我在各不同报告里就分类和解释以中华帝国的许多地区为舞台的骚乱活动时提出的基本论点,在此,看一看两位最有资格发表这方面意见的欧洲人对中国总形势的毫不犹豫的个人见解是很有益处的。

一位是莫理逊博士,伦敦《泰晤士报》记者,他在天朝已定居二十年以上,他以不止一种身份被看作最了解远东情况的欧洲人之一。《中国时报》6 月 4 日发表了对这位要人的记者访问记。从他的声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反对外国人运动所表现的恐惧,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是十分夸张的。按照他的看法,最近发生的骚乱和事件纯属地方性质,它们首先是由于警察和司法机关的管理不当,由于老百姓的无知、轻信所引起的。任何人只要能说会道便可以轻而易举到可悲程度地牵着他们走上穷凶极恶的道路。听命于满清政府的《中国时报》没有发表莫理逊博士的真情实感,没有全部发表他可能对《时报》袒露的一切想法。但我知道博士十分了解革命党的宣传和它的发展,这我待会儿还要作出新的证明,他了解革命党与日俱增的成功希望。从而,我个人的

① 热纳韦(Genevet)。——译者

观点得到了支持，那些秘密会社可以说与所谓的排外运动是没有关系的，理由便是那些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地方性。毫无疑问，如果那是由那些大会社、势力遍及整个中国的大的会党势力搞起来的，那问题的提出便将具有另一种广度。对事实和它们的起因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便可了解这条规律的例外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另一位，温伽特①上校是英国情报处处长。他的结论与莫理逊博士的结论相接近。他在中国中部和北部作了历时数月的旅行，确认外国人可以到处走动，并没有任何危险。他指出，那些排外报纸只是在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埠发行，即使不是日本人出钱，也是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办的。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认为应采用的为介绍和评论那些现象而立的分法是正确的，从那里可以看出黄种人世界的不安，我觉得原因还是我已经指出的那些，只是还能说得简单一些。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保守派旧思想和试图通过多少接受一些西方方法来改造帝国的叛逆分子之间的斗争。

一方面是当今皇朝、旧文人，也许还有少数几个成员极少、影响微不足道的秘密会社，一些宗教狂、宗派分子和如义和团拳民那样的有宗教幻想的人。

另一方面是中国所有的年轻人，所有大的会党势力。

由旱涝灾害造成的饥馑、贫困使老百姓无法接受为建设新军队、新学校、新保安部队，铺设新的铁路和开辟新航线而增加税赋的作法。骚乱爆发了，承认政府有责任会导致的麻烦使官员们无一例外地把错误推诿到秘密会社一伙的什么人身上，而且他们的头目、他们的信徒中谁也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道破这些人的假名为他们平反昭雪。

已经半年多了，我同那些会党中显要人物的交往圈子不断地得到扩大，因为，没有一个不协调的音符能使我怀疑它们始终是斩钉截铁地发表的意见，那些大会党的会众与排外运动一直是无关的。

相反我们也能询问一下我们的同胞，在中国的地位使他们同忠于满清皇朝的显要人物有所交往的同胞们，尤其是同被当今皇朝找去负责按照西方方式培养年轻一代的欧洲人谈一谈，我们就能了解到，由执政党代表的保守因素在要求改革的中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让步的那种明显的勉为其难的态度。

让我们仅以首都北京为例，那里已有不止一个学校教西方科学和方法。首先，有一个令人注意的事实，所有的教师，不管属于哪个国家的教师都发现，他们的学生从接触我们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数学的演绎和科学的归纳之日起，便对中国的旧礼教和试图维护旧礼教的人们表现出直率的深深的厌恶。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是那些教员中最不偏不倚者所不得不接受的，那便是当今政府在创办现代学校的同时专门注意到给这些学校安上最落后、最顽固的"保守"拜物教老朽来当校长，从而清楚表明它尽可能限制新精神给它带来

① 温伽特（Wingate）。——译者

灾难的明确意图。

它是否了解不管是在中国或是在别的地方，前进中的真理是阻挡不住的，诸如此类的手段只能火上浇油、导致危机、导致它彻底完蛋，最不济也会使它在威逼下不得不作出尚能自行决定的、心甘情愿作出的让步。不管怎样，如果有哪些具远见卓识的人，受他们的利益或在保守党内的野心羁缚，预感到了危险，努力要排除危险的话，必定还会有许多分散在中国各地的遗老遗少只听从返祖情感的驱使，在这种情感中对外国人的莫明其妙的仇恨占着主导地位，他们构成导致骚乱的主要因素，折腾着帝国的许多省份。

这一次我就不细述这类事件了，总之，本月报刊列出了这些事件的目录。我只是提醒一下，骚乱的策源地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加上福建。

还应当指出的是，仍然在这些省份里，甚至在西北各省，有不少迹象表明有人在中国几百万穆斯林中进行十分活跃的暴力宣传，其原因和目的我还不清楚。

然而，我首先要说的是那几份报告，报告指出贵州也开始受骚乱之苦，当地的一些书信进一步说明那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更为我在前面发挥的论点提供了证据。"贵州运气好，有三个排外狂人。一个是该省布政使，叫袁开第；另一个是候补道台、首席行政长官，叫年敬之；这三套马车的最后一位是一个云南籍行政长官，叫谢文桥。

"那位司库已经老迈年高，他头脑糊涂、性好记仇，竭尽他一切之能事损害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的利益。不过这位司库若没有他的狗头军师'桂阳坊'①从旁协助，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所提倡的方法也实在高明，它足以令人相信，不管是真的还是诬蔑，从中总能留下些什么东西。

"那些挑唆已见成效。贵州土著造反，反对官僚们借口兴办学堂骗取他们的钱财，敲诈勒索。土著们所知不多，他们以为是欧洲人促使官僚们走上这条道的。因此，现在，承受他们通过杀人和抢劫表现出来的愤怒的首先是基督徒。如果政府能作出强有力的表示就好了！有什么用？他们只恨外国人和他们的信徒，这在中华帝国不乏其人。"

这便是中国保守派在一种具体情况下对官方理论的运用。

为了进行对照，我将全文引用三合会大头领、中国革命的活动家的政治纲领。自从得到长江地区哥老会对他的事业的支持以后，他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目前又得到山东"红灯照"的赞同。三个月来，他在北直隶赢得几千名参加者，扩大了革命力量。其中还有一位亲王，此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怕牵连他的姓氏的威望、高贵的出身，并以他的权势给予保护。下文我还将回到这件事上来。

下面是孙逸仙一封私人信件的译文。

未来的中国革命的政治概况

当今满清政府的无能已毋庸多言，它不可能继续长久地领导幅员广大的中华帝国和

① 桂阳坊(Kouy—Yang—Fan)。——译者

它自己的几百万居民。腐朽的皇朝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倘使目前的那些事件按照它们正常的轨道继续发展，结果必然会导致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蔓延到整个中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防止发生这般的政治劫难，驱除满清皇朝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惟有一场准备就绪和领导有方的革命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中国同盟会致力于此已有多年，现已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中国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都将参加这一运动。

中国同盟会由华南所有的爱国社团和中国人在海外建立的同类社团组成。

目前，有许多省的官员和士兵渐渐投身于这个崇高的事业。

同盟会所拥有的力量已相当强大，使它足以在各地对当今皇朝展开斗争和最终地把清皇朝逐出华南。

这场民众运动的朋友和支持者尚待解决的惟一问题，是在满洲体系的废墟上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和采用何种适于中国的政府形式的问题。

下面叙述的便是革命党人赞同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旨在用一个中华民主政府取代满清当局。由革命政府主持的这场变革将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专政。

从运动一开始起便组成一个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包括各不同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由有资格的本地人和外国学者组成的咨询会议。在这段时期里，出于战争的需要，在从满洲政府手中攻取的一切土地上均实行军事管制法。革命政府将以为除旧制度的一切政治和社会流弊、义务教育、发展农工商业、全国对外贸易开放为基础，准备和实施全部新政体。新国家的民众将反复接受民主原则和政策教育。

第二阶段，国民公会。

当新生的共和国把它的权力扩展到相当广阔的土地上，敌人被赶走了，那里一派井井有序的和平景象，而由革命政府开创的新的政治体系又走上了发展的正道，到那时，民众将以国民公会的形式被邀请参加政府工作。

这个国民公会，一方面是已得到绥靖的土地上的各县代表和革命政府成员组成，另一方面，它将确定政府干预地方事务的界限，并以新的事态为基础，规定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从此时起，每个县都将在国民公会规定的范围内拥有自己完整的自治。各个县的公民使自己行政单位的组织臻于完善后，政府还得授予他们别的权利，如果在县里获得的经验能够说明他们的能力，则让他们监督县以上行政分区的事务。总之，公民将被逐步引导参加县，继而是府、省的行政管理工作。

只要革命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每个县都将尽它们的可能为军队提供所需的人力和财力。

另外，它们应该为革命政府进行的复兴工作提供忠诚的帮助，以便即时完成一个民族的组建。

在国民公会制度下，所有的自治县将构成一个整体，革命政府则为另一个整体。后者扩展它的力量，攻克新的疆土，前者也一样，组织新的自治县，以至二者达到某种互相的平衡状态。

如有哪个县忽略了它对革命政府的职责，革命政府将能够用军力迫使它尽到自己的义务。相反，如果革命政权越出它的权利范围，撕毁宪章，各个县也能联合一致，停止给军队输送兵员和粮饷。就这样，按照这个体系，人民和政府将互为依存，而各自又在自己的范围内有行动的自由。

国家建立起来了，战争结束了，这时就其整体而言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了足够的了解。这时，我们打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通过循序渐进、但是迅速的办法，给一个几百年来屈服于某种绝对奴役状态的人民以民主的宪法。

第三阶段，立宪制。

当共和国在中华帝国的全部或局部最终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战争因为同当今皇朝签订和约或者因为我们战胜了当今皇朝而停止以后，我们将建立一个国民议会。议会由两院组成，参议院以及直接由普选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众议院。这个议会在一切有关国家的事务上当即有全部立法权力。

革命政府在这新阶段中仍继续行使一段时间的职能，时间长短将由国民公会决定，但它将用新的"中华共和国"的称号，并将对国民议会负责。这段时间到期后，这个初级政府将不再存在，让位于按照新宪法章程普选产生的政府。这样，政治变革便完善了。

宪　法

未来的中华共和国宪法将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宪法和美国宪法的某种新的折衷。按一般规则，那些立宪国家采用的原则是把权力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把它分成五个部分，除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外，我们还有"主考权"和"弹劾权"；它们同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政治制度中起了作用的这类机关相适应。它们的组成和作用将略作更动，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目前情况下，这两个权力机构均作为专制政权的一个部门组织起来。在新政体中，它们将恢复自己的独立性，同其他权力机构并肩工作而不受它们的影响。它们在新情况下的组成形式尚未得到完全的解决。

其他三个效仿美国或欧洲制度的宪法权力将按各国现行原则选定和处理。它们的作用，除了为尊重中国传统而增设的两个新的权力机构所引起的某些不同之处外，其他都将是一致的。

主考权力机构的职能是识别凡打算从事各种公职的公民的才能，直至和包括属立法机构的人员、任何被选定晋级的公仆。任何男女公民在被选定、任命或晋升前都应接受这个权力机构的考核以获得资格。然而，它的职权范围也便到此为止，它没有资格自己去选择、任命或晋升什么人。

弹劾权起监督国家机构所有公仆的作用，由它负责检查每个人是否守职尽能。任何成年公民都有选举权，没有纳税额的条件。但是只有当被选举人已得到主考权力机构承认的时候，选举才成为有效。

个人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将得到新政体的充分保证。

允许任何宗教信仰，宪法不给予它们中任何一种以特殊优惠。

保留目前行政划分中的省、府、县，只是"州"和"厅"则归入县属。每一级都将有它自

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我们的对外政策

革命的发起人不是"还我中华"的辩护士，而是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幸福的捍卫者。一旦革命成功，中国将对各国的自由贸易实行全面开放。中国将邀请外国资本给予帮助，以开发国内的天然资源，在全国国土上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我们将求助于外国人的科学和经验，以建立我们所有的公用事业。

凡是由当今政府给予担保的同外国人订立的债务，革命前欠下各国的赔款，新政府将根据拥护它的新法的领土比例予以承认和偿付。

在我刚到中国的时候，革命党还没有在北方作过任何正儿八经的试探宣传。孙逸仙博士安放在我身边的译员，并不对我掩饰他在天津这里因远离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人们，所感到的几乎是完全彻底的孤独。

另一方面，我在最初的几份报告里曾指出，当时，孙逸仙把他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愿望局限在中国的南方，所以他称自己的纲领既是"反皇朝的"，又是"分离主义的"。

宪法草案，犹如我上面所译载的旨在使整个中国都飘扬着未来的共和国的旗帜。这便意味着已有发展，从当初改革一部分中国发展到要改革整个中国。

这同样也意味着，人们产生了希望，对北京加入迄今囿于长江以南的行动已抱有一定的信念。

事实不容置疑。去冬今春在北直隶、山东、山西，甚至满洲开始的反皇朝宣传在那里发展神速，尤其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因制造麻烦而被逐出日本国以来便是这样。这些留学生原则上都是完全赞同革命的。

芝罘和北京是两个主要的活动中心。在芝罘存在着某种"常设机构"，一个"兵站"，所有来自日本或南方的都要到这里报到和接受指令。同盟会在那里开办了一个真正的大旅馆，公开的名义是一所高等学校，并且表面上也真如在进行高等教育工作。在北京，有八百多名信徒分散在各个大学、各部和军队里。

该党在北京完成了一大杰作，争取到皇帝的堂兄弟，龙子龙孙肃①亲王参加它的事业。

看到这么重要的人物，其血缘关系似乎已把他定死在最强硬的忠君保皇立场上的人物投入敌人的营垒，实在是不乏刺激的。而今天我们可以说他已经破釜沉舟。因为他犯了死罪，已不可能回头。这种事在历代的执政皇族中并不是第一次。

其实，驱使肃亲王背叛自己生来便应效命的事业的原因倒是不难找到的。肃亲王聪明过人、思想开放，而且附带说一句，他非常喜欢法国人。1900年事件后，他被封为北京步兵统领，曾在政府各院各部中占有今天庆亲王占有的地位。明智的措施使他得以高度

① 肃(Sou)。——译者

评价人民的力量,也使他迅速获得人民对他生性仁慈真挚的好感。他的名望很快便招致朝廷对他的疑虑,怀疑他日渐扩大的威信,他成了一种危险。在几个星期里,他的大小职务全部被褫夺了。他变得对皇权一无用处,但皇权对此倒并不怎么担心,因为与此同时,肃首先已变成对他自己一无用处了。

且不说由于这些打击他的措施使这位亲王遭受到的精神上的伤害,还应看到他那些职司的经济收入,如北京步兵统领一职,单就其中征收入市税一项,每年的收益数额便能达到几百万两银子。

毫无疑问,肃亲王满腹怨恨,他的物质利益又遭彻底破灭,他自此当然成了革命党易于猎取的对象,革命党没有放过他。

而这个党的运气也是好到顶了。就在亲王投身反皇朝的同时,他在他皇堂兄身边的恩宠失而复得了。他回到了某些院里,并且还派他出使蒙古,现场研究按欧洲方式改组这片广阔属地的行政和军队的最好办法。

大家知道这项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报刊上大吹大擂大肆宣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吗?肃亲王在一群革命党人幕僚的簇拥下招收行动所需人员,以便对北京作出有效的钳制,也许在两广和长江流域烽火骤起的时候还会是对北京的决定性的钳制。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段时期里,除了他从他那方面积累的种种有利条件,还应加上他在北直隶享有的名望。由于自他被迫引退以来,他的继承者们没有做出任何能使人把他忘却的业绩,他的名望更大了。

在以共和原则的名义把他同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协定中,肃亲王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会不会抱有这样的希望,一旦条件成熟,一方面给为他开辟了道路的那些人和思想作出某些保证,一方面窃取革命成果,从这场赌赛中获取一项皇冠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变故能够证实这一点。

然而,在这期间,他的影响,他仍然享有的十分现实的威望却使他出色地帮助着革命党人。各部、各大政府部门,我要指的首先是构成帝国政府的中枢和要害的部门,渐渐地充斥着他们的人,而且是比较积极比较聪明的那些人。天津,袁世凯亲近的人中免不了这种渗透,我可以举出某个当然是中国教员的例子。直隶总督委托他用欧洲方式教导他居住此处的年轻的河南同乡,而他还只是反皇朝宣传主要的地方代表……我以后还将谈到这个问题,谈涉及天津运动的组织和袁世凯亲信人员的情况,也谈北洋军队中的情况,那时,我将收集起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全面的材料,比我现在所拥有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

在本报告开始的时候,我曾再一次表示了我个人对那些秘密帮会是否曾参加长江流域那几次骚乱的看法,我的看法可以说是否定的。然而,即使有这些使我认为结论是不容置辩的论据,这个结论仍远不能令人信服。

为此,我利用正要委托欧吉罗上尉到那些地区出差的机会,命令他在现场作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使这个问题得以水落石出。再说,上尉的出差已成为必要,因为瓦德卡上尉在他刚到那些地区去工作时为情况所迫,这我已经作了详述(参阅 1906 年 5 月 10 日报告

No57M)，他只能在华中各省草创几个组织不完整、不完善的情报站。另外，欧吉罗上尉还应在福建着手组建情报处。在此附上给他的命令和有关通知的抄件(附件 No2)。

在此，我还附上瓦德卡上尉走过的路线详图。从资料角度而言，这个报告的价值和它包含的总的情况使它成为一份珍贵的旅行指南，凡可能到中国旅行的人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讯息。我冒昧提请注意将它刊用在如《殖民军杂志》上的好处。(P. A. No3)

克劳代尔上尉完成了一项类似的作品，但他的作品专门在广西、广东两省。它将由下一次邮班寄上。

(签字)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字)

〔中国情报处　No68M　(机密)〕

9.1906 年 7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 年 8 月 3 日，天津)

第一部分　中国军队(略)

第四部分　总的形势
——反皇朝运动

我在今年 5 月第 68M 号报告中曾指出过帝国西北部伊斯兰教徒中的骚动。新的情报证实了这条消息。在新民(甘肃)，一些回族人利用因汉人的不正当行为引起的不满，沿着每一座清真寺在街上布道；暴动可能已在宁夏爆发。

后一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以前被官方强制去开垦荒地，一旦土地可以使用了，汉族榨取者与当地官员勾结，强迫伊斯兰教农民用丰产的土地交换需要开垦的新荒地：暴动源出于此。而大火一旦燃起，就会扩展到很远的地方。

在 1900 年，伊斯兰教徒确实没有参加义和拳运动，那些最终的残酷镇压，对于他们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们是那些镇压行动的受害者。六年的时间使许多回忆淡漠，而 6 月 24 日的“《南方报》事件”显示出，今天只要出现一点儿威胁北京政府的危险，伊斯兰教徒就将重新拿起武器，从枷锁中挣脱出来。

皇朝军队最近终于制服了巴塘(西藏边境)的暴动者,但是和以前在广东,特别是在骚扰成灾的广西土匪面前一样,军队仍然表现出了无力的状态。

在广西,海盗们攻打并抢夺了巴特费尔德连的汽船“三那号”;还夺取了一些商船,并在抢走货物后把船沉掉。在这里,暴动者和行劫的士兵们控制着贵县、桂昌、武缘、象州、修仁等地区,他们包围着桂平地区衙门所在地,正规军并无法轻易地夺回该地。

另外,上个月出现在帝国其他地方的骚乱至今仍未恢复明显的平静,其首要原因在于一年来非同寻常的水旱灾害所造成的难以形容的破坏。而新的灾害又降临于这些已经喘不过气来的受灾地区,例如牛瘟正猖獗于直隶南部和河南。

粮食价格上涨。在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以及云南,粮食市价比近几年价格高出一倍。贫困是深重的。在山东、直隶和河南,令人发指的把人当作畜牲的非法人口买卖,在不为人知的长时间中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家庭出卖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尽管当局有禁令,却无力阻止中国传统习俗仍予捍卫的这一权力,虽然政府官员有时试图努力挽回这一如此令人不快的形势,强行限制最高市价,临时性地减少或取消厘金税,等等。

饥饿的人群遍布于被饥饿所笼罩的各个省,海盗和土匪在壮大这个队伍。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乌合之众在浙江省的衢州、太平县、余杭、富阳,在江苏省的阴州、江余、东台等地,他们行动的惟一特点就是抢劫商店和粮库;在安徽省的旌德县、摩大口、何家厅,江西省的章县,浙江省的新塍乡,闹事者们沿途抢劫破坏,使当地基督教民也多少受了些损失。

有些官吏因掌握不好分寸而造成很多混乱,因为他们最操心的是税款入库,因此税款入库对于他们来说是首要的大事,他们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对征收税款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宽容和严厉引起了类似暴动的愤怒:在新干府(江西),江余(江苏),骚乱正是由于征收土地税过分严厉而发生的;在张县(保定府的县),行政官员或他的仆从们在为建造学校而征收新税时无益地表现出挑衅姿态;在吉安府(江西),人民游行示威,涌到地方长官的衙门,要求缓交税款,地方官却用武器驱散人民,人民也就用杀人来回答杀人。

四川的来信证实了茂州的暴动是由于官吏在为开办学校征集新税时的敲榨行为引起的,那些官吏手段灵活大胆,借口是为偿还基督教传教团赔款而征新税,从而把民众的仇恨抛向传教团。

以上的例子应当补充进所有的例子中去,以证实这类各地暴动的原因是怎样被歪曲,北京政府的官员是怎样在欺骗人民的真正感情,骗取他们的钱财,并毫不犹豫地使他们感到不能忍受。

对政府官员来说,秘密会社的一切行动都可归结于是对外国人的仇恨,但我们应当作出区别。仇恨外国人有时是无可置疑的,但从来不像官员们所说的那么简单。秘密会社的行动与仇视外国人,二者只有很少的共同点。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不是秘密会社的中国人愿意承认决定西方人在当地存在的特殊法律,而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谋害外国人的性命和侵犯外国人的财产。秘密会社的中国人并不鼓动有时使我

们感到悲哀的浴血的狂热,并没有像张之洞那样赞赏流血的热情。张之洞公开过继南昌县知县的儿子,极力利用那位英雄的自杀以煽起人民对外国人的仇恨。

为了证实这个在我思想上日益坚定的认识,我将在下面抄出欧吉罗上尉寄给我的他到长江流域执行任务初期的私人笔记中一些有趣的片断。他的任务和目的我已在上次第68号报告中予以说明。

欧吉罗上尉的具体任务是核实长江流域秘密会社正在准备暴动的革命军的实力,所有这些力量都团结围绕在哥老会(即"老哥儿们")——最大的秘密会社的周围,另外,他还要搜集他们排外或反基督教的行动材料。

上尉承认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他的那位向导,一个正在度假的新军二级军医。向导同上尉一样也是基督教徒,并在他的中国姓后面,加有一个从礼拜仪式日历上借来的名字。

上尉列席了在武昌举行的秘密会社主要成员的一次会议。

"约有二百名成员,其中穿军服的人有二十五或三十人,有上尉、中尉和少尉,还有几名士兵,有一些大学生,一些显要人物,等等。总之,这些人都有着善良的面孔。他们的年龄不一,有八至十人的年龄为四十五至六十岁。他们没有显出恐惧感,的确,开会的房子位于城市一个隐蔽的角落,并且非常偏僻,尽管如此,门口仍然有一些'弟兄'在放哨。

"……总之,在他们那儿我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他们设法使我愉快,并尽可能不让我花钱……"

在一次仅仅是地方领导人聚集的午餐上,上尉得以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我在情不自禁地按我的想法引导交谈之前,我讲到了'三合会',希望证实他们之间行动的一致性。我的同伴们对我作了如下的声明,这个声明我认为非常重要。声明由刘先生①作出:

"'三合会在两广人数极多,势力很大,我们知道它与我们的会社之间存在着联盟,这对于实现我们的计划是件极好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个同盟是孙文(孙中山的另一名字)的业绩。这种友谊是孙文博士的杰作。当广西和广东拿起武器并向我们发出信号,我们的会社将跟随他们,我们所有的弟兄都将参加战斗。'

"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时间是年底。他们没有向我解释具体原因,可能这一说法是从南方传来的。

"从暴动发生的第一天开始,住在京汉铁路周围的人数众多的哥老会会员将承担捣毁铁路的任务,目的在于阻止袁世凯的部队快速地或可能地到来。

"我提醒他们注意粗暴对待外国人的危险,是可能导致欧洲的干涉。他们对此非常清楚,并且毫不希望再有一支像太平天国时期那样的'另一支洋枪队'来攻打和消灭他们。

"张之洞的很多士兵声明说,如果他们被派遣去打另外的中国人,他们将拒绝从命,并

① 即刘静庵。——译者

将与被攻击者联合起来。那些出生于两湖以外其他南方各省的士兵将返回他们的家乡，与当地革命党人并肩战斗……他们对我肯定地说，其他士兵也将与他们一起战斗，别的人也可能跟随着起来……

“南方士兵希望离开与他们的思想、习俗、工作和愿望过于不同的北方。

“他们估计，两湖哥老会的人数有两千万人①，所有的人都决定在那天来到时行动。他们声称四川的哥老会人数要更多得多。

“在中国的基督教徒中，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人，并不是全部。他们没有告诉我二者的比例。

“在总督周围的大小政府官员中，他们计算出约有十五人是朋友，汉阳兵工厂的中国工程师中则有三十人左右，秘密会社的战斗员有一千余人。张彪和黎将军指挥的两个协是政府军队……

“我让人送来一本在东京出版的中文小册子（印数很大），题目为：

“《公民——中国人民的呼声》

“1. 废除当今的君主专制王朝。

“2. 建立一个共和国。

“3. 在行使权力中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 博爱，人道，实现世界和平。

“第一页是米歇尔·巴枯宁的肖像，他是无政府主义及全球革命理论的创立者。

“第二页是吴樾的画像，他是在北京火车站向五名高级使臣投掷炸弹的伟大暗杀者。

“书中有句名言，用法文来说就是：在工作中生活，在战斗中死去。”

孙逸仙博士用社会主义及人道主义思想指引着他们的道路，他的教育在他们身上获得成果。但可以放心的是，当前革命党的一切努力都是指向斗争，他们主要是准备“在战斗中死去”。

一定数量的走私武器运进了中国，具体数字难以估计。武器的扩散足以使北京政府不安。为监查和断绝这种走私，北京政府向它的总督、巡抚和海关官员重新发出正式禁令。有时候警察的运气不错，近日他们在上海逮住了两辆满载枪枝的汽车，那些枪枝刚从船上卸下来并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脱了海关检查。在汉口也有类似漏查现象……然而，相对于被扣住的几百枝枪而言，又该有多少枝枪逃过了所有的检查？

（签名）

〔中国情报处　No74M　（机密）〕

① 此数字不保险。——原注

10. 1906 年 8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 年 9 月 2 日，天津）

第三部分 革命运动

似乎无可争议的是，满洲政府已经看到革命的危害在明显形成，因此政府准备尽其所能予以对付。

在这方面首先要注意的，是对关于给予中国一个更为自由的政府的题目，政府至少允许了人们去大作广告。自由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珍贵的梦。在帝国中部，所有的官方喉舌的宣传都超出了很好地发挥和评议的程度；毫无疑问，太后炫耀般地叫人宣扬政府正在对制订宪法的目的和方法作出努力，而刚刚结束了巡视欧洲的高级专员们已带回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秘诀；太后打算以此摧毁革命党人的希望，并利用她的那点儿威望，争取几个准备转到敌对阵营中去的善良的人。然而，似乎所有已经宣布过的改革——所得税、废除行政制度上满洲人的优越权、选举议会、组织责任内阁——并无立即付诸实行的势头，改革距离至今仍为政府顽固坚持的传统方式是那么遥远，以致人们应当用心记住在好歹算是坚决的改革诺言中的那些将予实现的条文。

据说刚刚回国的专员们反映在国外考察的时间太少。当然，三个月的时间对做有益的事情无疑是不够的，再派新的巡视团去欧洲时最好呆上三年。另外，不是仍然可以用即将授予他们的各种新职务——他们的政治生命——去教育人民么？

从现在开始用十年时间是不算很长的。在此期间，他们可以关心城镇的事务，管理身边的事情。这种尝试甚至已在天津开始，在那里，一个类似市参议院的机构自本月一日（中国农历）开始工作。但是，所有皇族的子弟以及达官显贵、掌权者，总之这些人目前仅仅接受建立一个由他们及其亲信组成的参议院的可能性；朝廷由此而得到好处。仅仅建立一个具有议会制度外表及保守的原则和作用的参议院，能否成功地使人民受骗呢？可能骗不了多久；然而太后却老了，甚至是很老了，这种欺骗只能延续得与她的寿命同样长，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她全部的要求。

时间是最好的助手，此地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指望它的作用；时间能冷却很多热情，能推迟很多人们认为应立即实施的计划，也能使很多碍事的演员从社会大舞台上消失——这是北京一位高级官员承认的惟一的武器，我们的武官就是向他打听朝廷为反对革命运动所考虑的实际对策。

满洲政府并不把时间的力量列入可以依赖的神明，而是命令采取预防措施，这反映出它的畏惧。张之洞和巡抚及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向朝廷汇报了所采取的紧急谨慎措施。

为人信赖的最可靠的几位警官带着紧急搜索革命党的阴谋及侦获其发起人的命令，已从北京奔赴中部各省；李同门①将军指挥着长江流域所有的警察，他有无限的权力和明确的指示，几乎被他要求协助的地方当局都得服从他的调令，在武昌、汉口，逮捕在大量增加。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这些逮捕是否合法。当局加强了想象中最受直接威胁的附近基地的驻军：杭州、荆州、洪泽口②。

在北方，警察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提醒说有些假日本人来到首都，而这些人正是革命党人。为此仅仅在天津和北京就逮捕了四十七人。被捕者中，有一个身揣炸药的人是在颐和园附近被抓获的，另一人则是北京城的警察。

在凡此种种之上，还应加添一些闻所未闻的预防措施的细节：大人物们万分谨慎，尤其在旅行中他们让人沿着他们并不经过的路途组织纠察，叫人宣布他们的启程时间，而在最后一刻却又改变时间，等等。

刚才讲的防御，现在说说进攻。

我不准备在此重复这个月中发生的一些事端，报界已将其性质和细节公布于众了。总是同样的一些省份与案件有关：安徽、江西、浙江；在两广，海上劫掠行为多年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猖獗过；在贵州，我在 1906 年 7 月 5 日第 68 号报告中提到过的骚乱已爆发；最后在陕西，伊斯兰教民的骚动似乎并未减少。在这些问题中，最有用的是尽可能确切地了解原因：首先是刚刚结束在长江流域和福建省旅行任务的欧吉罗上尉的旅行笔记，然后是本情报所欧洲代理人的一些报告，它们为我至今仍在答辩中的论文增加了新的论据。

欧吉罗上尉 7 月 4 日从长沙给我来信说道："在得知我到达以后，长沙'哥老会'分部头目钟晃③先生，亦名夏林，费心赶到汉口接我，因此我是与他以及我的向导肖先生一起旅行的。

"夏林是一位知名商人，四十岁左右，仪表堂堂，神态聪明且严肃……

"所有这些正直的人都给了我友谊的表示，这至少说明，只需有黄兴的命令，就足以使我到处受到很好的接待，使大家绝对信赖地和我在一起。

"我希望明天见到另外的会员并和他们交谈一下……

"在湖南，'哥老会'又分为三个分部：

"红会由当地的土匪和成队抢劫的士兵组成，拥有的武器很不像样，其情况可想而知。

"蓝会和黑会的人更有名气一些；前者的武器是些通常并无效果的枪，后者用的是汉阳造的毛瑟 74 型枪。

"这三个会联合了此地民众的十分之六。

"在询问为什么这些地方性的'骚乱'在这个省经常发生时，回答说：很难使每个人都保持平静，只要在村镇中有某个官吏滥用权力，或某个官员的恶行足以激怒当地倔强的人

① 李同门(Li－Tung－Men)。——译者

② 洪泽口(Hong－Tchi－kong)。——译者

③ 钟晃(Chung－Hwang)。——译者

们，并使他们的朋友们也投身到反对有关官员——‘万恶王朝的奴才’——的地方运动中去。此外这些混乱几乎从来就没有变得十分严重，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秩序，但这些出于同样原因的骚乱的经常重复，很可以说明人民对来自满洲政府的全部权力的憎恨。

“那些具有反传教性质的闹事，一般均为民众中的败类们所干，其原因是传教士们错误地过于经常地接纳了太多的流浪汉作为新教徒，其惟一目的是‘拯救众多的灵魂’。

“如果中国的基督教徒都是诚实和严肃的人，如果神父在他们的皈依者中作更多的筛选，那么中国绝不会有反传教的骚乱。

“在谈到人们向我介绍过的反王朝的‘白莲教’时，我要求解释他们 1900 年在旗帜上的几个题字‘扶清灭洋’即拯救清朝，消灭洋人。他们回答说，参加过 1900 年运动的‘白莲教’会员全部属于社会下层民众，朝廷向他们施舍大米，偶尔也给钱，以指使他们进行排外运动，作为报答，那些题字几乎是被迫的。据与我交谈者说，‘白莲教’的著名成员不会同意我听说的‘为支持王朝而斗争’的这些事实……”

（7 月 5 日）

“分部首脑钟晃估计，在当地的三千驻军中，已知的革命党人有五百人，还不算那些听到信号就会起来投入运动的人。

“他估计两湖和四川的革命党人数目不下六千万人（我要他重复了三次这个数字），这些人都将参加运动，其中三百五十万人在武昌和这个首府的附近地区……

“这个党派中红会、黑会和蓝会间的仅有的一些区别已如前述（红会会员的社会地位，其他两会的武器装备上的区别）。武器都放在他们房主的家中。

“在这个省南部的衡州，居住着一位‘哥老’，一个过去的将军的儿子，人们对我肯定地说他家里有三千枝枪。

“我还非常秘密地了解到，除非另有命令，运动将在农历九月十五日举行，趁本省的部队调往河南演习不在的时候。

“最后在今天下午将近五点时，我接待了周①先生的来访，此人是本地一所中学的教师。这个中国人是‘同盟会’的首脑，我的向导翻译为‘Same Agreement Society’。据周先生说，该组织仅在湖南的人数就不下八百万至一千万人；周三十岁左右，仪表堂堂，态度认真，深思熟虑，聪明和充满活力。

“当他谈及他的会员们，讲到他们推翻满洲人的愿望时，话语中带着权威性，使人觉得他真的是这么想才这么说的，而且决心已定。

“黄兴去年冬天在信中向我们谈到过的刘亚民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这个会社当然也与别的会社步调一致。

“简言之，我从长沙得到的印象是，湖南人不会容忍现状，我觉得一旦有信号发生，这里人们的响应要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热情……

① 周（chow）。——译者

“我向钟晃先生介绍了××先生，钟晃先生将向他寄去一切他(所)希望得到的情报。

“在武昌的代理人将是我的向导肖先生，此人具备各种所需能力，并且很可靠。”

(7月10日于“□宁号”船上)

“我刚刚在岳州一家难以想象的又脏又难看的旅店里(尽管这还是本城第一家旅店)度过了二十四小时。当地人带点敌意地注视我，一个士兵认为有必要在我逗留的整个期间在我的门口守卫。

“在岳州，我见到了一些属于这个党派的学生和老师；当地的首脑并不在场……

“我见到了一位剪了辫子的学生，他对我说，当他的家庭看到他表示要摈弃这个‘奴役的标记’的愿望时，非常害怕，以致拿断粮来威胁他。尽管这样，他还是把头发全部剃掉了，并在岳州美国传教团那里干一些有工资的工作(教堂执事和本堂区财产管理员)，挣点钱维持生活和继续他的学业，而无需父亲的帮助。然后他向我作了反对当今政府的长篇讲演，并强调必须对中国人民进行训练和教育，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总之在岳州这个有二万至二万五千名居民的城市里，大约有三千名革命党活动分子。驻军有长沙派出的常备军的一个营和作为河流治安保卫的士兵，总共一千余人，其中革命党的坚决拥护者至少有三百人。”

(沙市，7月13日)

“我于11号上午(前天)九点抵达此地。我和朋友们见面，并接待了一位会党分子的来访，此人是一位非常富有的油商和皮毛商，他主持当地的分部；他是在他的侄儿周楼英(约二十五岁)的陪伴下来的。他的侄儿剃了光头，但装了一条假辫子。两个人都是非常积极的活动分子。另外，因为此地靠近荆州的满洲人移民地(相隔六至七公里)，民众的反抗情绪特别激昂。两个种族的捍卫者们经常不断地、几乎是天天都要爆发相骂打架；人们特别向我举出两年至两年半前发生的特别严重的那一次事件。

“我们先已约好在今天召开一个大会，把主要人员集合起来，使我能够看到他们并与他们交谈。但昨晚在他们为我开设的有十五人左右参加的晚餐中，他们得知警察对我在沙市的出现非常惊讶，好像有人在密切地监视我；那么第二天的大会可能会很危险，故而人们决定在晚饭后立即开会。

“因此在将近晚上十点钟时，人们分小组经由不同的路走到一个已改为学校并配有桌和凳的大庙里。经过一段漆黑的小路，我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出口被很仔细地关闭和守卫着。人们安置了一些凳子，还为我安排了一张桌子，另有两支半明不亮的蜡烛，我们就在这种半黑暗中开始低声交谈。当然，人数很少，只有二十余人：商人、教师和大学生。

“他们估计在本城和附近村庄里有一百万‘哥老’，属于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生活在满洲人身边，对满洲人深恶痛绝，认为满洲人的生活就是睡觉、抽鸦片烟和玩乐。

“我所见到的人全部知道孙逸仙博士，还知道他与黄兴的友谊。

“他们还私下告诉我，他们担心下层人在信号发生时会干一些令人发指的事，因为这些下层人不幸地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懂得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值得担心

的是，将来的革命会成为这些人抢劫和杀人的理由。

“同时还缺乏武器，海关的严格检查阻碍着他们获得武器。

“然而，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刻来到时可以用张之洞保存的武器武装起来，这些武器被锁在武昌的军火库里。

“最后他们力图与邻近城市的‘哥老’们建立不间断的联系，因为他们开始明白团结对于胜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汉口，7月16日）

“在返回此地的同时，我得知我本月初在武昌的出现曾使警察大为惊奇，张之洞可能指定了一个官员跟随我并监视我。但是我相信那位官员每次都到得太晚，看不到我在做什么；在所有的场合，我什么也没有察觉，我的向导也没有。而这里的朋友们都肯定他们的消息是真实的。

“人们还告诉我，孙逸仙可能在香港，不久他大概要把长江流域的主要首脑召到身边进行会晤。来自日本的忠告大概提醒了中国当局，后者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监视着可疑人物的来去行踪……”

（南昌，7月21日）

“属于‘三合会’的联系人肯定地对我说，依秘密会社之见，南昌至少有两千名军队成员，拥有一千余枝不同型号的枪，其中的大部分在士兵中间；但他补充说，这些枪支都不那么危险，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士兵们未能用这些枪支保护住法国传教士。

“他知道南昌有不少高级官员属于革命党或至少私下倾向革命党。我未能获得这些名字。

“他说全国都在不耐烦地忍受着满洲人的奴役，希望创建一个以武昌为首府包括南方七省或八省的共和国。此外，如果说江西的大部分人都属于‘三合会’的话，那么还有人数非常多的‘哥老会’和‘红灯会’也和我们一样追求同一个目标。我们等待在九月的暴动信号，那时，我希望在中国产生一个新的状况……

“因为我成了被监视的目标，所以无法见到‘哥老会’的首脑，但我让住在九江的‘红灯会’的大首脑给了我他自己的地址……

“我差点忘了告诉您，我的朋友们向我肯定地说，首脑们无法阻拦因官员们的品行而引起的地方骚乱，这些骚乱是自发的，根本无人领导，国家处在一个无法平息的沸腾状态之中。”

（九江，7月24日）

“途中，我在一艘小艇上与两位中国富商进行了交谈；谈到辫子时，他们告诉我，他们非常憎恶满洲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这个装饰物；他们谴责当今王朝，并向我肯定这一切不会维持多久，因为汉族人已经忍无可忍了。这场小小的交谈显然说明了一些正经人士的思想状况。

"在这里，我的向导原打算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是在此地指挥一个步兵团的姓陈的中校，但陈刚去了胶州，那儿近三个星期来一直骚动不安。这位高级军官可能是一位热情的革命党人。

"我影射的骚乱是因地方上一个官员的敲诈引起的，此人以修建学校为借口强迫民众交过多的钱。民众起来造反，而军队不能到达出事地点，因为该城有人数众多的武装起来了的'红灯会'，他们困住了政府军队。据说会党本身在运动中并没有特殊作用，所有的人全造反了；但是由于我们的朋友们人数众多而又有武器，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自然是他们。

"同样性质的骚乱在离长江和湖南不远的 Choei－Tchang 发生。常备军和随同的援军不能制止骚乱，因为'士兵过于勇敢'，当他们接近该城时就以非凡的方式向后转。人们向张之洞要求派出新的军队……

"'红灯会'的首脑陈泽杰来旅馆拜访我。这是一个六十五岁左右极潇洒的老人，名中医，过去的'太平军'。开始他有些为难，害怕我是警察，之后又担心他的举动会引起当局的注意，似乎他被监视得非常紧。所以他在我这里的时间很短，而且不希望我回拜他。

"他向我肯定说，满洲人被赶出帝国的时间就在近期，本省各处的汉族人都因盼望行动而等得不耐烦了，军队中十分之七的军官和士兵是他的朋友。

"他补充道，在九江周围，他有四万拥护者，一有信号他们就会起义，不幸的是他的枪支很少。

"最后他告诉我，他的党得到大量在外国的华侨的援助……

"他认识孙逸仙，他将与他并肩前进，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鉴于我在九江的联系人外出，我去了传教团，在那里我受到了极好的接待。主教说，他感到中国人民目前正在以非常的方式受到压榨，他预言在某一天将会看到反对政府的起义爆发……"

（南京，7 月 27 日）

"因为没能在此地找到老联系人杨先生，我让人找来我的向导的朋友，他是一位警察中尉，狂热的革命党人。他属于'三合会'，了解孙逸仙的纲领，只期望为之效力。他跟我说，本省的人民非常革命，在农村，连妇女们都说迟早会看到帝国发生一个巨大变化，将永远废除满洲王朝。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武器，但当那个时刻来到时，我们会很快获得南京兵工厂的武器，会得到那里士兵的帮助。

"他甚至向我补充道，这里的很多人都相信袁世凯暗中与孙逸仙有联系，袁将支持他的计划，当然是为了个人目的，但不能不说也是对党的一个帮助。

"人们还认为，康有为与孙逸仙既无一致的思想，又无一致的观点，然而只要康一旦看到光绪的王位摇摇欲坠，他就会转而归附孙逸仙。

"他还说，'哥老'在本省的人数极多，一般来说，他们分为红会和黑会，此外无其他区别。

"这就是我在南京所获的几个情况，我在此地刚刚停留了二十四小时。这里的人也在等待第九个月亮暴动，因此，情报已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重复……"

（上海，7 月 29 日）

"……关于秘密会社参加排外运动之事，在任何地方，人们却向我肯定说不是那么回事。耽于骚乱的群氓参加排外，那或者是自发的，由于地方当局滥用权力，而只要他们狂怒起来，外国人就注定要为此受罪；或者是文人和官员的怂恿，这些人把本来针对着当局的愤怒转到外国人身上，使民众确信就是为了满足欧洲人的不断要求当局才向他们如此经常地要钱。

"鉴于所有自重的中国人都是某个秘密会社的成员，所以当一个村子起来造反，而此村居民的大多数又都隶属于'三合会'时，那么立即就会有人说是'三合会'在挑起运动，这对于其他秘密会社来说也同样如此。

"此外，这样还能使官员们在上司面前解脱自己，不把骚乱归咎于自己的行政管理不善，而是怪罪于秘密会社的行动。

"这些解释是我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得之于许多不同人之口。其中有几人甚至对我说他们对此类毫无意义、经常性的攻击感到遗憾，这些小小的震动削弱了党的力量，而给政府送上了过于容易得到的胜利……

"然而我提请您注意，在欧洲人中间越传越广的消息是，中国人正在酝酿年终的一场大运动。我在'礼矛'船上也听到此说法，那是一位第二者向我转述在前一次旅行中一位过客的谈话。上海遣使会会士们昨天也向我谈到这件事；但人们一般并不了解这个运动确切地说是反王朝的。"

（福州，8 月 2 日）

"途中，我的向导肖告诉我他发现上海公共租界的墙上张贴着众多的革命标语。他没有在我们的租界看到这些东西；不过他没有对此事进行研究。

"这些标语只是白底子上几十个大字，意思是：凡是反对革命运动和不帮助革命运动的各级满洲官吏，从总督到各府道台，都将被处死。

"没有任何签名，没有任何表示来源的标记。英国警察应该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这些标语都没有被毁掉……如果我们现在回转来看'革命与分裂主义运动'的内容，下面就是肖的一位朋友对我说的话：

"'福建人不喜欢满洲政府，他们更加痛恨那些把对金钱的爱看作高于一切其他感情的官员。然而尽管人民讨厌满洲官吏，却又非常惧怕他们，所以在福州没有秘密会社。人人都胆战心惊。实际上，主要是缺少首领。如果有几个强有力的人来增强勇气，他们就会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一大批显赫人士、资产者和下层民；遗憾的是没有首领。'

"他补充说，在这个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尤其在靠近江西的地方，是山区，路途艰难，在那里哥老会有很多拥护者，在各个村庄里就有几千人。他相信有众多的农民加入了'三合会'，但他不能确切地引证，既说不出一个数目，也不知道一个姓名。他本人尽管是满洲人的敌人和狂热的革命者，却不属于任何秘密会社。

"然而他知道孙逸仙的名字，其他两个陪同者也知道这个名字，他们都称之为'出色的

人'，并且他们肯定说，即便在人民中间，大家也都知道谁是孙逸仙以及他在为什么目标而工作。

"他认为，在这里犯下的抢劫行为与秘密会社无关，认为中国的抢劫者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偷盗和抢劫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满足。

"最后我询问了厦门的袭击事件。他回答我说，发生此事件的村庄里的村民都是些穷鬼，目前甚至没有米吃，在袭击两个穿着漂亮的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以为抢走外国人的首饰和贵重物品（他们以为外国人会随身带着的），是一个绝招。

"据林先生（这就是他的姓）所说，这仅是一次平常的抢劫行为，无任何排外意义。

"他补充说，此地人对欧洲人无任何敌对情绪，如果有，那只是麻木不仁……

"我们拜访了领事福理业先生，并在他家用了晚餐。我们没有在那里了解到什么；他担心今后几个月中会发生一次大的运动，但不认为它是排外性质的。他没能够或是不愿意告诉我他是根据什么事实得出这一印象的。除此之外，他给我念了一封他的厦门领事官刚刚给他写来的信，信中，这位官员向他汇报在离厦门很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一个制造炸弹的秘密作坊。警察已在调查这件事的踪迹，因为一名中国人带着一枚炸弹在厦门的街上行走时笨拙地把放在口袋里的炸弹弄炸了，他因此被炸得半死。没有任何其他详情。"

与欧吉罗上尉在长江流域进行调查的同时（我刚才已报告了此调查的主要结果），我在北京的欧洲代理人到离保定府不远的涿州，也就是 1900 年义和拳的大中心去走了一遭，下面就是他返回后给我的来信。

8 月 14 日。"……我来到了莱伯神父和哥达尔德神父的传教团……，前者的中文讲得很好。

"他们询问我，在骚乱的情况下为了自卫该怎么做，用什么方式获得武器，而且为了解释提出这些问题的理由，他们说传教团管理财产的盖洛神父半月前巡视涿州时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浙江、江西和江苏的主教菲朗大人等已命令属于他们管辖的传教团的高级修女们，在不引起注意的条件下，找个什么借口如退省、讲道等，把嬷嬷们集中到离汽船基地不远的修道院去，以便一有信号她们就能上船。两位神父还补充说，修女们肩负监护和领导一些慈善机构的任务，应该说是很必要才采取这些措施的……

"然后莱伯神父对我说，他了解到并听说，南方各省会在一个他认为相当近的时间内脱离北方各省，它们争取以和平的方式分离，同时向皇帝说：'我们都同意建立一个共和国，我们同意不要武器，我们将在一种最好的关系中生活，但是如果您要来进攻我们，我们将会下决心为独立而战。'"

下面我借用 7 月 21 日河内代理人的通信来结束我的欧洲代理人方面的报告：

"'哥老会'的首领黄兴来到了河内。刚刚经过东京到河内后就立即去了龙州。他在龙州的军事学校住了三天，并在夜间与庄道台有两次长时间的会晤，且两次他都持续到凌晨三点。然后他回到河内，并立即派人告诉我他的到达。我见了他三次。

"这是一个显得年轻的人，三十二岁，生于湖南省府长沙，曾是那里的小官吏，可能是国民卫队的指挥官，并在那里发动过两次失败的起义，一次于 1900 年，另一次于 1903 年。

黄兴只是他的化名。他的外表不像孙逸仙那样有风度和穿着得体，当人们看到孙逸仙时那坚定的眼神令人吃惊；而这是一个肥胖的人，特别在他考虑答复问题时，眼皮下垂，上须稀拉且短，他也穿着西装，不再有辫子。

"黄兴对于他的旅行，对于他获得的赞同，对于他的拥护者们作的保证——得到通知的运动时间一到就竭尽全力协作等等，均深感满意。在这个省的每个地方，一切属于'同盟会'的人（您一定知道，这就是孙逸仙的追随者的组织的名称）都来向这个首脑的左右手致敬，或者派来被任命的代表（那些没有来得及去龙州的人都来到了河内），我大概是黄兴特别庇护的人，所以看到了后者中的主要人员。

"在龙州，除道台外，黄兴还见了陆荣廷将军，在此地他叫陆阿宋，指挥边境所有的部队，他与副职陈炳焜上校都属于革命党，两人都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参加运动。

"在河内，我在黄兴那里见到了一位姓王的小军官，目前正指挥南关的哨所，另外两名小军官是从太平府来的，还有个名叫何元诚的军官也从太平府来，但他是代表郑永廷中校，后者似乎指挥三个营，即一千五百人，并可能已加入了革命党；孙逸仙在这个地区有很多会员，一位姓吴的人代表陆阿宋而来，另一位姓方的非军方官员来自佳厅所①，即南宁府西北方向五天路程的地方；后者并非会员，但却来让自己受教育。人们也向私立学校的学生作宣传，目前此校有九名会员。

"他们给这些来听说教的人都发给了在本年内已出版了五个月的、在东京印刷的《民报》。

"我与黄兴的会晤非常真诚和有意思。据他看，住在广西的督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

"财务部右侍郎唐绍仪是孙逸仙党的加入者；

"袁世凯和广州的总督②在运动一旦发起时，都将被卷入；但我大胆怀疑两广总督会卷入，因为此人经常血腥地处死他所逮住的革命党人；

"龙州道台是绝对地被争取到这个党中来了（他对此向我作了保证，我认为他没有骗我，但我不大知道革命发起时他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行事）。

"黄兴对我肯定地说，外国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将受到尊重，由于孙逸仙的纲领中甚至有信仰自由这一条，革命党人将不会触及教堂、新教或天主教的传教团，也不会去触及那些属他们管辖的土著天主教徒。惟一的敌人是满洲人，他们以五千万的人数来压迫四亿汉族人（老一套说法）。

"黄兴还向我重复道，孙逸仙是惟一的首脑，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计划，由他一人确定发起运动的时间，而且他属于共济会，并在那里找到了支持。孙逸仙和黄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正值秘密会社（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等）以同盟会的名称联合之

---

① 佳厅所（Ngan—Ting—Sou）。——译者

② 对此不能保证。因既无任何证据又无任何核实。唐绍仪在该党中有一些关系，但不是参加者；毫无疑问此人目前是一个中立者，将来则是一个朋友。袁世凯仍被孙逸仙的人谨慎地包围着，袁在此事上的行为也必将符合他一生的准则：站在强者一边，而这次要由孙逸仙来证明袁世凯的这一特点。关于广州的岑总督，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之前，我同意我的代理人的意见。——原注

时。这个党的钱存放在香港的上海银行。”

在这一切中主要应把握住什么呢?

1. 我认为已有的证据说明,帝国所有的秘密会社都在孙逸仙博士的指挥下活动。在集中力量这方面的计划进行得是成功的,我想,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找不出类似的情况:欧吉罗上尉见到了三合会、哥老会和红灯会的首脑,我本人在此与山东大刀会的首脑有联系。无可怀疑的是:同盟会是孙逸仙博士的拥护者们的总会,它很好地合并了全部的秘密会社,这意味着有几百万甚至几亿谋反者发誓冲向仅由一个人为他们确定的目标。

2. 为10月份的行动作准备的命令已经下达;不但会员们都知道这个日期,而且准备工作将导致一次最终引起中国政府注意的活动发生。甚至在欧洲人中间,也可看到不止一人得到通知。

3. 此运动的性质非常清楚,所有的首脑都将努力对准它的目标:推翻清朝,同时避免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外国人的中立对他们的成功是最好的保证之一。但这并不排斥在革命激起的风暴中,由于各种可能而发生一些传教士们需要提防的灾祸;该党的不少明智之士也有这样的看法。

因此,通过在此地以及对身份很不相同的人所作的调查,我证实了我以上的几点设想。

关于另外的两点,我能够在相信运动首脑的基础上,事先作出一些判断。我不为这些判断提供根据,但我认为它与调查所获的整个结果是一致的,并已被我的代理人所证实:这就是关于日本的态度和供给革命的必要的资金来源。

“孙逸仙博士在1906年8月13日给我来信说:‘我获得了日本政府在革命可能引起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许诺;该国的新闻界及一切党派都将向着我,对该国会进行武装干涉的担心也可以因此排除了。

“‘我们的工作也接近尾声,不久就要发出总行动的信号。我们还缺一点儿钱来完成最后的行动计划,还差五十万美金……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将试图在近期内投身于运动之中……’”

请不要忘记满洲政府也并不富裕。广州的总督既然已无力制止海上行劫,而使海盗更为猖獗,凶杀更多,那么他还能做什么呢?现在他缺乏兵力,缺少资金。如果岑总督不懂得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权去妓院的话,却至少能够向妓院宣布征收一种税,但根据以前经验,这种税收显然不能应付为两广采取严格安全措施所必须的经费。然而正是两广即将燃起战火,人们对于反叛阵营的极大关注,突然给总督造成了最大的压力。

此外人们向我保证说,孙逸仙想试行一种筹款办法,这种办法不会遭到失败,还会获得比实行其制订的计划所必须的财源更多的款项。目前他借助流通领域,以一美元价格抛出票面价值为十美元的息票,将来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府将按息票付款。在一个奖券赌博如此时兴的国家,不会找不到五十万名买主。另外,不止一人将以这种形势,把自己的每一个铜子都捐献给对他来说是如此高尚的事业,将更有不少忠实于当今政府的人不会对由此取得在明天的政府的眼里看来等于一份公民责任感的证明书而有所犹豫。我想,

如果他对我讲的这件事是真实的，至少我也会为自己买一份息票。

剩下的两个问题看来我永远也不能明确地作出答复，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各种意见分歧最为纷乱。那些对中国素有了解的人怀疑这些大众是否有能力在确定的日期准时奋起反抗，因为久久争论、阴谋策划、凭一时兴致但仅仅是以想象来享受新鲜事物的好处，这就是中国人的伟绩，行动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一次他们能真正行动起来吗？久驻中国的老外侨们对此有些怀疑。

难道是这些怀疑者不了解已经不可否认地发生了的变化？或是他们不相信已行之有效的这种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有点过于限于历史和近代的教训。但我完全承认，由于我对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毫无了解，我不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

然而怀疑论者最多只承认这一条，即运动一开始若在一个地方能取得胜利的话，便会使很多心怀畏惧的人变得大胆，使很多漠不关心的人变得满腔热情。然而正是这一点我们要牢牢记住，因为，正如6月10日我在57M号报告中所述，它恰恰就是孙逸仙行动计划的一个部分：周密布置尽可能使行动在一开始就取得胜利，把行动地点安排在有他最优秀、最长久、最坚定的追随者的地方。

作为结论，我要说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以下未知的两点：

尽管当局恶习重重，不得人心，但它历来受人尊敬，因此在需要正面攻击当局时，人们是否服从首脑的信号？

一旦接受了信号，人们是否具有不可缺少的毅力来克服最初的困难？而且，如果运动在其最初阶段突然因局部的失败不适时宜地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这种失败是否会阻止住他们的行动？

最后，我对上份报告中提及的一些问题作两点注释。

关于我曾提到过的（在7月5日68M号报告中）一位皇族亲王参加革命党及这位新成员的作用引起我的怀疑之事。

后来，在北京的一次旅行中，我见到了这位亲王，并由我自己查证了我得到的一份报告的真实性：由于受到这位皇帝的表兄弟的秘密召见，我从他本人的口中证实了此事。而且当我有意表示出因看到像他这样一个家族的人物也加入企图毁灭他家族的阴谋中而显露的惊奇时，他回答说，他惟一挂念的是他的祖国的利益。由于意识到他的家族所建立的政府满足不了、也无法满足祖国新的需要，无论是通过改良或是改革都不可能实现新生，他便毫不犹豫地转为赞成革命事业，在这个行动中毫无涉及个人利益的考虑。

处于他的角色，他说出了这番话。然而革命党的地方首领（清华学堂的一位教师）在被我的代理人引入同样的话题时，明确说出了亲王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转向新的信仰的。

我在北京的代理人写信告诉我："我与郑（地方首领之姓）作了交谈。郑告诉我，他一直在努力利用亲王目前因被剥夺了一部分职务而不满的机会把亲王吸引到党内来。郑认为如果亲王善意地接受了他的思想，那是因为亲王想在推翻了现在这个王朝以后自己来

做皇帝,尽管亲王自己否认这一点。郑想尽可能地利用亲王的一些好的意愿。

"郑当时还向我解释说,顺治皇帝,即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老皇帝的姘妇的儿子,而这位亲王的先辈却是老皇帝嫡出的儿子,但却被排挤出来了。现在亲王被取消了他的最主要部分的收入,他力图获取钱并想重新夺取权力。

"郑告诉我,这位亲王仍有强大的势力,如果能完全指使他从金钱上和以其个人影响来支持革命党的话,孙逸仙将更有可能达到他制订的目标。郑正在为此作一切努力。"

孙逸仙博士就同一内容给我写过信(此信前面已述),他解释得更加清楚:

"我不认为您在信中谈到的那位大人物能够获得王冠,他对革命事业所表示出的倾向不能使我信服:他对我们口蜜腹剑。另外,他的帮助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宝贵的;但在需要时能够使用他,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这种使用可能仅仅限于帮助我们了解皇帝身边所实际发生的活动。"

然而,事实是幸亏有亲王的斡旋,在连平州革命党把亲王的一名最积极最聪明的成员视作领导人。我自然已与此人取得了联系;另外还有两名在外务部,而且这类人物肯定不止此数。

由此我们确切地知道了革命党对此亲王所期待的东西,以及在必要时为此会对他所作的提防。

最后,我曾多次讲到某些中国官员所扮演的明显的排外角色。我顺便首先提请注意几乎是广州总督的官方喉舌《觉民钟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在广州湾的代理人给我寄来了其中的节录,它是一篇关于法国国庆节的社论,文章的作者说,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夺取海南岛的周年。

"过去是中国的海南岛今天属于法国,我想在法国人举行节日宴会这天,中国商人会觉得他们身上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又重新燃烧起来。任何人都知道,就是在这一天中国人流了血。然而,他们(中国商人)将到这个宴会(由领事和法国商人在 7 月 14 日举办)上去娱乐。那时我们怎样能说中国人热爱他们的祖国并为它担忧呢?"

总之,这只不过是一篇报纸上的文章,仅仅是借用这份报纸的身份才使它变得重要。除此以外这是一篇谤文,我的代理人弄到了一份,我想此份已提交给了我们的北京公使。一名官员,其名其职都列在谤文上,曾因公到南方各省、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中国团体中去就教育问题进行调查,将此文散发到这些地方。

继一个详尽的捐税表之后,这篇抨击文章说,我们海南岛的居民都被这些捐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说实话,所谓的捐税中的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下面就是凭作者的想象,对我们似乎经常使用的镇压手段的描写。

"在一些村庄里,发生了可悲的事。如一些穷得无法交付税额的农民前去乞求法国当局,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卖掉你们的女人和孩子吧!卖掉你们的土地去支付分摊的税额。'农民们则答复说:'我们已经卖掉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一切,我们只剩下了头顶上的一块天。'

"听到这个回答后,法国人笑起来,并让这些诉苦人签订了一个出售合同,并告诉他们

出售的是他们享有的那块天。

“当这些不幸的人回到他们村庄的时候，警察部队把他们赶进自己的房屋，禁止他们走出房间，既然他们从今以后不应再享受天空的景；警察还警告说，谁走出家门去观望法国人的天，就要处以死刑。因此这些不幸的人只得放弃最后的所剩财产去赎回‘天’，以逃脱禁闭生活的痛苦。

“其他的捐税，诸如买卖房产税、一只船、一片小铺子、一座宝塔、一个作坊的税，都要比中国的重一百倍。此外，还有些法国人逼迫良家姑娘进妓院……

“法国人还禁止海南岛人进外国学校受教育，他们建了两所法语学校。教师教海南岛人说法语，直到这些人懂得足够的法语好去做法国人的奴仆。

“如果海南岛人离开本地去受另一外国语的教育，或者仅仅只因为与外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就会被认为是有罪的，并被判为死刑，亲戚的财产要没收，祖宗的坟墓还要被铲除……”

文章的作者刚刚回到中国。为奖励他在公务中妥善表现出的热情，他晋升到广西的一个职位上，而广西又正是他如此尊重的法国的利益所涉及的地方。此人名叫刘岂机。

（签名）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名）

〔中国情报处 No80M （机密）〕

11. 1906 年 9 月总报告
——在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领导下制订
中国情报处处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 年 10 月 2 日，天津）

第一部分 （略）

第二部分 （略）

第三部分 总的形势及革命运动

在帝国的中部和北部刚刚开始的收割季节，使骚乱暂时有了一段时间的缓和，抢劫成风的地区也不大再有劫案，即使在广东、浙江、安徽，抢劫行为在上个月也比前几个月更少。有人在山西的朔平府制止了一场地方暴乱。这是由于一位德国中尉的勇敢行为，此

人在旅行中路过该地,他勇敢地掌握了一些无领袖的中国士兵的指挥权,把他们带交给当地政府。并且他很好地使暴乱转而成为保护处于危险中的挪威传教团。

我不谈"红胡子"。他们总在不时活动。他们刚抢劫了一列在哈尔滨与宽城子之间的火车,使离山海关不远的宁远州的王朝军队遭到失败。但与此相反,他们自己在9月10、11、12日在红树镇遭到了一次更为惨重的失败。

总起来说,在这个月,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革命党的威胁上,没有人再想否认这一事实。中国政府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它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也是非同寻常的:为了争取少数忠实者——即使是这些人,政府也觉得他们有可能或即将背叛——政府愿作的保证变得越来越具体,许诺在变成行动。

果然,9月10日,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北直隶所有的房屋上彩旗高悬,灯火通明,这是为庆祝仿行宪政会议的召开。据说通过会议,帝国君主专制的政体将有所改变,达官显贵及满汉族将会聚一堂,以讨论将来的宪法。

所有的报纸,尤其是中国报纸,都注视着北京的讨论,并满怀热情地进行评述。在开始的阶段,报纸只不过记录了争论中的巨大混乱,以及与会者之间观点的极大分歧。我的下属作出的每月报告简述了有关这方面的最为对立的说法。这种对立一般来自对情况的不完全了解,或是因为错误地评述一些消息。但是,也有些是官方对报纸编辑施加的压力所致。有些编辑因过于匆促地相信中国的新闻自由,正在直隶总督或北京督府的监狱中思考着由轻率的匆促而带来的不幸。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为讨论而集中起来的高级人士,他们不仅讨论,而且还争论。汉族人和满族人有平等讨论权利的情况出现于一次会议中,这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次。然而,最为忠诚的汉人也会想到他不是满人。所有的关于这次会议的内部不和、袁世凯与一些王室成员间可能升级了的激烈争吵的报道,有部分的内容是真实的。不过,我仅仅认为我在北京的代理人给我的如下报告的内容才是正确的。

"铁良、袁世凯出席的在皇宫内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上……开始就为中国制订宪法的问题进行讨论。袁世凯发言说,在谈及主题以前,应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即将来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铁良立即站起来说他永远不容许实行这样的政策,他说目前有七千万满人在行使统治权,他们想保留权力。

"袁世凯对此回答道:'我们有三亿多汉族人,我们想从今以后,你们与我们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人们用动听而又带着刺儿的话语交谈着。

"这些话是当着太后的面说的。太后试图使他们平静下来,她大致对他们这样说:'你们是我惟一能依靠的人,如果你们已经开始斗争起来,你们想要人民怎么办呢,如果你们不和睦,人民将会使自己走到怎样过分的地步。'

"会议到此停止。"

问题一下子就落在了难以解决的争端上。过去的种族对立,分离满人与汉人的仇恨,这些至今仍是革命团体的战斗口号。同样的口号由一位满洲大臣和一位最有实力的汉族官员发出,后者又享有目前政府的最高信任。苗头是严重的。

太后的倾向明显地是在满洲人一边，毫无疑问，袁世凯的发言使她不安。传言而后马上出现，其起因（就像我刚才汇报的）尚不为人所知，无疑它也有一定的根据。人们谈论着，至今还在谈论着要在政府圈子内把袁世凯从目前占据的位置上除掉。人们说，由于给了他过多的高官要职，把他抬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脱离了与现实和与军队的接触。人们还认为袁有能力使军队行动；人们还说要彻底解除袁享有的一切高官要职，是完全的停职处分，甚至是流放。更有甚者，说出了两位可能代替袁的人的名字，可敬的马玉昆将军和一位姓洪①的完全不出名的满洲人。

实际上，在北直隶总督不妥协的态度面前，对袁暂时的不满可能已经控制了朝廷，一时间想在政治上铲除这个由于强大而显得碍事的人物。然而正因为他的强大，人们又犹豫不决。袁世凯则力图在由他引起的反对潮流面前逆流而上。袁是强硬的，并且仍然保持着强硬。袁的倒台也是可能的，那种倒台将是一种行动迅速有力的阴谋事件，而这类阴谋诡计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罕见。

朝廷多次宣称它愿意给予中国一个宪法，这种炫耀不可能是真心的。朝廷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找到拖延办法，来推迟执行制宪委员会的决定，如果后者的决定真能实现的话。忠实的官方人士反对过早地在中国采用宪法的重要根据之一，就是人民的愚昧无知，人民没有能力有效地参与政治。官吏们灵巧地回忆起中国驻俄国公使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了把公众事务交予无知的群众而会引起的一切危险。为了宣传有关议会制度作用的健全思想，人们提倡到各地作讲演。他们吹嘘合理的循序渐进，以在一些小市镇和城市实行自治作为开始。首先在天津，然后将北直隶和河南的个别的城市作为目前的第一批实行点。此中隐讳的希望是，也许城市和农村的人民只要享受一下新型的、响亮的市镇自治，就足以满足他们参与治理国家政府的愿望。

实在地说，人民并非对新的政治信仰缺少思想准备，而是统治集团不愿放弃他们所占据的地位。这个集团最善于管理个人财产，它的每一位成员都极有本领扩展自己的官职所有的权力，并使自己的职务适应于可以开发的财源。这些满洲官员们，只要其忠诚性未被怀疑，就仅仅向上朝金库缴纳一千二百银两的最小款数，作为王朝为中俄边境确定的每年利金收入。他们把五百万银两中的三百万两塞进自己的私囊，而这五百万银两是鸦片总管宣称在该项目中应归于国库的款数；若管理者在其行为中稍稍多有一点诚实品德的话，当不致如此。

由这样的人们来治理一个如此辽阔的帝国，其结果只能是衰败。帝国灭亡进程如此缓慢，倒真是一个奇迹。今天，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极限，这个庞大的肌体对于侵蚀着它的寄生虫已经深感厌倦。问题是：它将以何种方式来使寄生虫们撒手，是好言劝告，还是强行对抗？本身即为寄生虫的当权者们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即按照他们的意愿引导社会

---

① 洪(Hung)。——译者

的改良;民众则以第二种方式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和效果,这种方式即是——革命。

改良和革命是一对敌对的姐妹,她们之间的斗争现已进入了一个激烈的阶段。

革命党首脑在北京出现的消息引起了恐慌,导致这种恐慌产生的谣言更因其不真实而加剧。据说是逮住了该首脑,而后又被他逃脱了。其间报纸刊载了各种细节,巡警部尚书亲自负责调查,并主持搜查了设想中藏着大阴谋家的房子。然而结果如何?

我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写信来说:"有个名叫文奕①的日本籍满洲人,用他日本妻子的名字东同桥梅②很早便去了台湾,在该地警察局工作。不久前(今年1月),他携妻返回北京,想在北京的警察部门谋取一个要职。

"有个在北京巡警总厅供职的中国官员陈柏隆发现了他,该官员既出于自信又为了炫耀,派人逮捕了文奕,并声明他抓住了孙中山。

"文奕是在任《中华报》领导职务时被捕的,人们立刻将他监禁起来。

"人们迅速将他解往天津,在那儿他将不经审判就被斩首。这时,文奕的朋友们才得知消息,赶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公使林董先生告诉中国官员,他希望文奕获释,否则他将派出军队去寻找。中国官员的决定是执行斩首。真玄!半小时后,文奕在将抵天津时失踪了。"

文奕甚至没有参加过革命党。

实际上,警察在执行他们的保卫任务中是无能的。就如我上面所述的例子那样,官员们大肆宣扬由他们造成的耸人听闻的各种逮捕,而实际上那些被捕者只是一些可怜的替死鬼,连配角都称不上。我在上份报告中所述的四十七起逮捕案中,没有一个被捕者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属于革命党人。大多数受害者属于秘密组织保皇会,该组织视康有为为首脑,其宗旨是保护皇帝本人。(我们知道,康有为如今在流放中。他是第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曾在皇帝的帮助下,于1898年试图改革中国,而皇太后镇压了这个运动。)

那么,秘密警察是否幸运一些?最近在天津成立了两个秘密警察局,北京也有两个,上海两个,广州两个,最后在东京也成立了两个。秘密警察专门负责监视革命党人的阴谋活动,革命党人可能的冒失游行示威会使那些迟钝的人们感到吃惊。

《塔克布雷报》的一位临时记者从南京来信提请我们注意:有些传单宣称在农历八月十五日(即是10月),将会发生一次"瘟疫"。记者接着这样写道:"正如长江流域的所有省份那样,江西也是秘密会社的猎物,在该省,秘密会社中的文人数量增加了,那些文人因朝廷取消考试制度而失望,从而站到不满者一边。

"毋庸置疑的是,不满和反抗在长江下游各省到处产生。而在前几年,人们几乎还未曾听说过暴动,暴动是从今年以来开始的。

"秘密会社成员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不仅在下层民众及其拥护者中找到了信

① 文奕(Wenn-y)。——译者

② 东同桥梅(Toung-Tong-Kial-Mei)。——译者

徒，且如众所周知，高级官员们也参加进来。这些情况使得形势更为严重，它即意味着有一部分军队掌握在秘密会社手中。

“另外，听说在最近招募的士兵中有一大批人都是某个集团的狂热信徒。”

秘密会社原来确定的暴动日期，中国政府不会不知道，若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加倍的预防措施，那些措施的细节和人们所知的革命党人设想的进攻内容是吻合的。

因此，皇宫的卫队由袁世凯亲自从第六镇中挑选的三百名最忠诚者组成。另外我在9月2日曾汇报过，有朝一日信号一旦发出，分布于京汉铁路沿线的参加者的任务，就是摧毁铁路以阻止北方部队南下将爆发战火的长江流域。现在请看，政府刚刚撤下了该线上的常驻卫队，临时换上了正规军队来控制。我还汇报过，孙逸仙有意调动政府军队而开展他的行动，现在人们强调说，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不会去调动军队，而根据最初安排，他们本应亲自指挥调动军队的。此中原因并无隐秘之处：人们担心在此形势严重之时，袁、张非得留在他们的总督领地中心不可。张之洞已经以此为理由不参加立宪会议。

然而，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最为了解的教士之一利博神父认为，把两湖总督定在他们岗位上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

一位最近接触过神父的人写信告诉我：“利博神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确信中国的形势越来越混乱，发生一个运动的时刻不会很远了（在这类事情上人们只能这样作出他们的肯定）。

“神父觉得奇怪的是，张之洞并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拒绝赴北京参加讨论宪法这样重大的事情。张是一位中国南方人，他了解南方发生的事情。”神父说：“也许是张愿意对革命党有利，因为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他的行为。张是一位重要官员，他完全应当在宪法讨论中发言，因为宪法可能在今后有损于他的职权。”

与这种观点对立的，是另一位传教士，比利博神父更为有名的上海外国传教团的财务总管罗伯特神父。

欧吉罗上尉写信告诉我：“罗伯特神父认为，要广州商人响应孙逸仙的号召起义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生意破产。尽管他们在抵制美国人的事件及粤汉线事件中表现出了团结和纪律性，但若事关拿起武器反对政府，而且岑总督又是以杀人不眨眼和厉害著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然而，罗伯特神父预测孙逸仙可能会得到广州商人的援助，如果孙成功地说服他们，使之相信他有英国或法国的支持或至少是持友好的中立态度的话。

“运动的产生将可能由于太后或皇帝的死亡而变得更为容易。”

我们见过的岑总督已调离广州；我们同样见过面的孙中山可能正在向广州人夸耀英国可能的中立态度，然而，这些似乎并不曾使中国政府担忧。

我在继上月的报告之后，于9月14日第82M号信函中汇报了一些迹象，至今我尚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答案。9月的信使人猜测10月底发起暴动的命令将可能被撤销。对

此我曾向革命党首脑本人提出问题，但也未得到任何回答。但是在上海，我的地方工作者向我证实了首先从河内传来的那个消息，而欧吉罗上尉在完成任务后于返回途中逗留于烟台时，也搜集了同样性质的迹象。在此我重复如下：

“我了解到，山东省在传播革命的和反王朝理论方面要迟于其他省。山东没有组织机构，大学生们目前正在从事教育人民和传播新思想的准备工作。他们相当平静，警察也不去找他们的麻烦。在这些环境中，袁世凯的影响显然尚未在此地显示出来。

“在这个省，没有‘三合会’，没有‘哥老会’，只有‘红灯会’和‘大刀会’。组织最多的地方是济南府和潍坊。

“尽管在山东有日本教授，但山东人对日本人似乎没有特别的好感，并且还有点不信任他们。

“顺便地说，奇怪的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都找到了同样的理由来推迟行动，即‘人民还没有觉悟’。”

然而，我重复，并无理由认为，推迟革命运动的消息是绝对肯定的。无论如何，有相当多的论据趋向于表明运动即将开始，这些论据为下层领导者们所不知，但却能够使党的首脑坚持第一个决定。我于5月10日第57M号报告中已陈述过这些论据，故在此不再重复。

我将以欧吉罗上尉在福建旅行情况的最后一部分来结束他的任务汇报，在写上份报告时，这些材料尚未到手。在厦门，欧吉罗上尉想努力获得有关谋杀两个英国人的各方面情况的确实情报；像通常的那样，这些情况联系到一些总的原因。有人认为这一事件应由秘密会社负责，想以此证明秘密会社的排外情绪。

“关于一个月前两个英国人受害的袭击事件，我获得了这样一种确实的印象，即不应当从这一件事中仅仅看到排外的表现，这只是一次个人的复仇行为。

“两个英国人中的一个，目前是保险业的代理人，他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曾是厦门警察局高级总监察的助手，因此他会招致当地人的仇恨。甚至他在其新的工作中，也似乎因对一些继承者为他们的一名死去的亲人所付的保险费提出异议而遭到忌恨。

“这样，当人们知悉他将到内地旅行的时候，他们就为复仇而埋伏起来等着他。人们似乎甚至向陪同他一起旅行的医生大叫，要医生逃走，因为医生并非他们憎恶的对象。该医生自然不愿丢下同伴独自逃走，在斗争中，医生受了致命伤，可能随后即会因此身亡，而那位原来的警察现在却已康复……

“在上海罗伯特神父对我证实说，应看到厦门的侵犯事件只是一种复仇行动，并补充说他了解我们在上海的同胞中的一些人，这些人如果冒险到本省内地去而脱离欧洲警察保护的话，也可能遭到类似报复行为。这是他们对待当地人的行为所致……”

欧吉罗上尉搜集的军事方面的情报将直接转交给我们的武官。但我认为应在此把该情报中的两个小段摘录出来。一段是有关福州用以保护中国在南方拥有的主要兵工厂的防卫措施，另一段则是关于厦门的防卫措施。

“福州的炮兵组成第三防御组，以切断进入闽江的通道。但由于并无认真的守卫，因

此没有什么显著的作用。我在登山进入A、B炮组时，哨所中的士兵竟然无所察觉。士兵们关在自己的小木板房里抽烟、玩牌或者睡觉。

“在厦门，经出示过该地哨所职员的介绍信后，我进入B、E、F炮队，在那儿我证实了我们掌握的关于该地的情报是准确的(请看卷宗V之第1号卡)，因此我并无新的补充。不过这儿有一件趣事：当我抵达该地时，国旗杆上升起了一面三色旗，而且伴随有三声鸣炮。

“在悬崖岬角的工事G，我得到了同样的礼遇。我们对该地的情报也同样准确。需要补充的是，这个炮队隐蔽在花岗岩中，一切都安置得很好，炮以及军需掩蔽所(在很厚的岩石的保护下)安营扎寨。所有的四门炮都是全新的，得到了很好的保养，那儿的约一百余人全懂得操作，并当着我的面进行了操作。”

像闽江航道上的如此著名的工事，旁人居然能在大白天登山进入炮组。在那儿，人们接待秘密代理人，扯起外国旗，给以鸣炮的荣誉，这些要比长篇大论的报告更能揭示那些地区的军事组织的内容，也使人们以审慎的方式来观察在练兵处所颁严格命令下的真实情况。

在本报告中，我附上了印度支那部队参谋部的莱都克①上尉有关龙州的旅行报告，这次旅行是在河内参谋部与我的情报处达成原则上的谅解之后进行的。这份资料可能已由殖民地部这一渠道到达陆军部殖民地部队处。尽管我的做法可能是重复的，我仍宁可寄出一份，因军参部可能不会从其他途径得到它。

另外，我收到了印度支那方面的题为“军事形势”的情报，日期是1906年6月20日，编号4145T。这份情报的第二部分，在“关于中国南方的总形势”一段中，对该地区革命武装力量的估计，明显地不同于我这方面所作出的估计。该报告没有引证任何充实的文字资料，因此我认为应恭敬地请求印度支那部队高级指挥官告诉我一些参考资料，最好让我参照那些资料以证实有关结论。对我来说，能把那些参考资料与曾作为依据而使我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材料进行一番对证，将是很有意思的事。

从编号4168T、日期9月3日的来信中，河内最高指挥官告诉我，他不能同意我的请求，因为“这将迫使他们寄来一份由印度支那参谋部的情报处用了三年多时间搜集的大量资料的复印件，而该处人员将用较长的时间来制作这样一份情报卡。要使此事成为可能，这件细致的工作必将落在他们的头上”。

由于这种原因的阻碍，我本人不可能进行这一必要的比较，我原以为这是可能做到的。因此，我现在只能指出那些材料的用途以及在巴黎完成此事的可能性，也许，印度支那的那份“军事形势”及其附属资料均送到了陆军部，或许是殖民地部掌握了这些材料。

(签名)

驻华法军总指挥官阅

(签名)

〔中国情报处　No88M　(机密)〕

① 莱都克(Leduc)。——译者

12. 秘密会社;中国政府对法国的正式抗议;在中国的情报处

布里索·德马耶[1]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 年 10 月 16 日,北京)

中央政府和它的两个心腹总督袁世凯、张之洞开始着手猛烈镇压革命秘密会社。

南京的新总督端方赶到长江地区援助。至于在特别危险的革命中心两广,将实行戒严。遗憾的是,中国政府选择这一时间换掉了以果敢闻名的岑总督而代之以老周馥,而他的麻木迟钝正是使长江下游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原因。

大批的屠杀开始了。人们不用耗费时间审案子,任何官吏、军官、学生、士官生,凡被证实加入会社甚或仅属怀疑,都毫不留情地予以砍头。

一个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将于 11 月初宣告开始。不过,据说反王朝的革命党大首领"孙逸仙"(又名高野长雄博士)刚刚赶到上海撤销了这一计划。他可能已对一家 S. R 通讯社声明延期是由于资金不足,然而这并非主要原因。

王朝为平息骚乱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大肆张扬地宣布立即改革和赐予宪法;对民众宣讲解释,使之懂得政府准备给予他们的、无须用斗争去争取的东西,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和流血的内战以后大概也不能给予的。由此造成了一些革命拥护者的背叛,所有的这些形势,对于高野长雄博士的决定的影响,要比缺少资金的理由重要得多。

实际上,这个革命首脑不可能与他的困惑、犹豫和受惊吓的下级一起展开斗争,他认为谨慎的办法是等待他们重新获得勇气。

我相信应向您汇报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支那总督和我们驻北京的代表不希望赞助革命运动,他们不像某些冒险者那样,认为革命运动将导致在我东京边境北部建立一个南部中国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法兰西慷慨精神的女儿,它将为我们的资本和企业大敞门户! 被派来保护我国利益的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资格来判断远东的人物和事件,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家门口兴起一个强国,其危险大于好处。同时他们也明白,革命的首脑们为实现其宏大目标,将不得不表现出比现政府更加排外的和更彻底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东京的一个大商人最近向印度支那总督要求为中国政府购买经过改造的滑膛枪五万枝,代理总督布罗尼先生请求我公使为他提供关于这桩重要订货的确切情报。

巴思德先生立刻派我到连平府去了解情况,答复是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这桩生意;任何省级政府没有皇帝的批准也不能进行这样的生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发出电报询问

[1] 布里索·德马耶(Brissaud Desmailler),为当时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译者

所有的总督和巡抚。

鉴于时间紧迫,巴思德先生未待各省回电齐集,即发电报告诉布罗尼先生说,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这桩订货。

最后的回电今天收到了,回答也是否定的。

因此,此事正如印度支那政府设想的那样,是秘密会社要购买武器。

10 月 14 日上午,颐和园在开过系列重大会议的这一次之后,太后急遣内阁大学士和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和瞿鸿禨赴巴思德先生处向共和国代表表示,中国政府感谢印度支那方面采取的友谊的谨慎行动,感谢我公使馆善意的干预。

同时,中国高级官员通知巴思德先生说,秘密警察发现有一些法国军官在帝国的中部和南部旅行时与革命党秘密会社的一些领导人有交往。他们要求巴思德先生能够同意核查该事实,并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下令避免同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正由于这一官方行动,我们的代表给外交部部长阁下发出了 10 月 14 日的电报,您一定看到了此电。

中国当局不满地发现巴思德先生已经从另外两个方面得到了同样的通知:

1. 我曾向他转告过袁世凯的侍卫长曼德上校提出的警告。

2. 从公使馆外的一位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该人士是从中国政府中最有力的人物之一那儿得知此事的。

曼德上校 10 月 12 日曾对我申明,14 日又亲自对巴思德先生重复说:有一位不属公使馆和 Lefèvre 将军管辖的法国军官,其办公处在法国参谋部,直属陆军部管辖,他用通信和其他方式与孙逸仙博士及北京、天津不同的中国革命者保持联系,并在不同的时间派出军人密使到中国的南部和中部,这些人到处都被跟踪着,他们同革命党联系,与一些相当著名的人物接触。

其他地方向巴思德先生揭示的情况也同上述。

我对曼德上校声明,我们的一些军官事实上是带着护照旅行的,其目的是学习,我相信中国警察可能误会了他们的意图及其交往。

曼德上校对我说:"显然,您不可能有另外的说法,但总督相信的是他的情报。并且其他的列强国也进行着类似勾当,最近我甚至接到一份秘密促使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天津的命令。袁总督不顾引起风波,他十分希望以绝对友谊的方式毫无声息地解决事端。但总督声明说,如果有关交往不予停止,那么在某次革命集会中若突然发生以共谋现行犯罪为原因的袭击法国旅行者的偶然事件,中国政府显然将不能对此负责。"

我再次回答曼德上校说,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军官会有如此不谨慎的行为。

这一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使我考虑到,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的军事政治情报处是否适当。

我的前任 clèment de Grand－prey 上校认识到建立一种情报服务机构的必要性。当

时正处于大改革的前夕，但在连平州还未产生。

上校曾要求每年五千法郎的经费补助，他得到了批准。当我于 1903 年 11 月接任时，他交给我大约四千五百法郎的余款，同时声明说由于频繁出差，他未能组织起服务机构，而他所获得的一份想要的情报几乎未花分文，也没有求助于其他不可告人的途径。

我到中国时正值军事改革时期，我认为有必要用我所支配的资金建立一个小情报站。这笔资金用了将近两年，在 148 号报告中我曾向您汇报过这笔钱的用途。

一段时间以后，在外交部的要求下，您决定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情报服务处，它有正当理由完全独立于武官管辖之外。

新的服务处建立在利用秘密会社的原则上，是一个少用钱而大获益的方法。一些军官得以负责与秘密会社的代表接触并建立一些情报中心。

趁此机会，我汇报了为这种工作而使用军官的危险性，尽管他们以便衣旅行，也可能被新的秘密警察逐步侦获。

在出现如上汇报的事件之后，很明显的是若无严重的反对，我们不能坚持采用现在的方法。

另外，维持如此专门的情报处是否有绝对的必要性？我认为并无必要。

经过三年认真的观察，我已能通过我本人的正当关系而且始终坚持用正当的途径，获得有关中国军队的足够的大体情况。情报处就是用我的报告作为其基本卡片，因为它的组织工作刚刚完成。

我仅仅承认在东京邻近地区的额外情报的用处。在那里，应当首先采取行动并使用所有的战争方法。

事实上，目前人们对于南方各省的新的军事组织情况掌握了一些什么？

1. 情报处的情报？毫无。

2. 印度支那情报处的情报？只有关于边境地区驻军的几个枝节情况。

3. 武官的情报？迄今为止，我提供的所有报告，仅仅只是重复着王朝的报告、中国报纸的摘要、练兵处的官方信件、赴现场观察有关省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我的同行的无偿通讯。

为弥补情报的不足，我曾要求您批准我去南方巡视，此项计划已获法国公使的许可，您告诉我您看不出我的巡行计划有何不便之处。因此，我将能试图填补这方面原本不应有的空白。

我的侦巡一旦结束并将成绩报告给印度支那以后，将我的报告和报表予以整理，并经东京情报处补充，那将会是有用的，但东京方面的补充的东西不应是边境警察的简单报告或一些报纸摘要，应由我殖民地最优秀的军官赴边境省的内部军营以秘密探测方式作出补充。

总之，我认为应向您作出如下建议：

1. 取消中国情报处，在我看来，它并非不可缺少；或者，至少不让该处使用占领部队的军官，因为有天津秘密警察的监视。

2. 拨款给印度支那情报处，以便使它有更大的发展。

3. 交给该情报组织秘密侦察南方四省的任务。

4. 与秘密会社联系时，仅仅使用当地代理人或非军人代理人。

布里索·德马耶(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274　(机密)〕

13. 秘密会社；外务部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年11月13日，北京)

在第274号报告中，我向您汇报了关于向驻北京的我国代表就占领军的法国军官与中国革命秘密会社交往一事提出的抗议。

我们的公使答以明确的否定。不过，由于中国当局已了解到您下令取消了情报专门服务处，故没有再对巴思德先生强调此事。

因此，可以认为该事件已经结束。

另外，中国的报界未对此事进行任何影射，这证明外务部严守着秘密。

在下面，我复制了在大内阁下令送交抗议的第二天太后发出的政令。该政令显示出中国政府完全了解秘密会社的阴谋，并为镇压其首脑和参加者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

"我们了解到孙文①叛乱并煽动王朝臣民阴谋策划暴动，同时用联盟方式将南方港口和长江流域城市的秘密会社的土匪聚合。为实现他的计划，各类型号的武器已经运送至各口岸。

"在此事件中，最可憎的是那些为政府效力的官员和民间学校、军事学校的学生与该叛乱首领结成联盟。

"各总督和巡抚应为对付一次可能的暴乱而作好防卫，并立即逮捕谋反分子。

"此令应严格执行，不可稍忽。"

(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281〕

14. 关于情报处及革命党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6年12月7日，北京)

我国驻北京公使给我寄来了有关在中国的情报处军官与革命党成员的关系的新材

---

① 又名孙逸仙。——译者

料。

尽管这些材料由于有关情报处已被取消而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参考您上月20日的来信，我认为有必要作为情报在此给您转交一份巴思德先生的快信复件。

授命代部长签名的　全权负责人

（签名）

〔外交部　政治事务局　No773〕

附：

中国的帮会与中国情报处（概要）

1898年，中华帝国刚亲政不久的皇帝宠信了一位思想激进的改良者。这位皇帝一份接一份地颁发各种破坏性的诏书。皇太后幸得袁世凯及其麾下军旅支持，突袭皇帝并重新当政。

从此，受反动政府压制的革命思想的信徒集结成各秘密会社，集结成中国人传统的帮会。

这些帮会很快便因1900年危机而互相串联起来，接受侨居国外（香港、日本等地轮换居住）的煽动者孙逸仙的领导。孙赋予革命运动一个比较严格的组织形式，他集中各路头目，偷运武器，让他的密使们去对官吏、军队直至国家要人做工作，总之，打算在准备就绪时发出将导致中国爆发革命的信号。

这个信号应于1906年10月前后提出，然而时至最后一刻原令却被撤销。这或者是因为资金或武器不足，或者是因为中国政府为扼杀革命运动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准备工作了如指掌。

仿佛由于缺乏足够的联系，有的地方没有及时收到撤销原令的通知，结果还是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运动，这场运动目前蔓及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各省，目前对这场运动作战的是装备相当精良的长江流域的军队。

这便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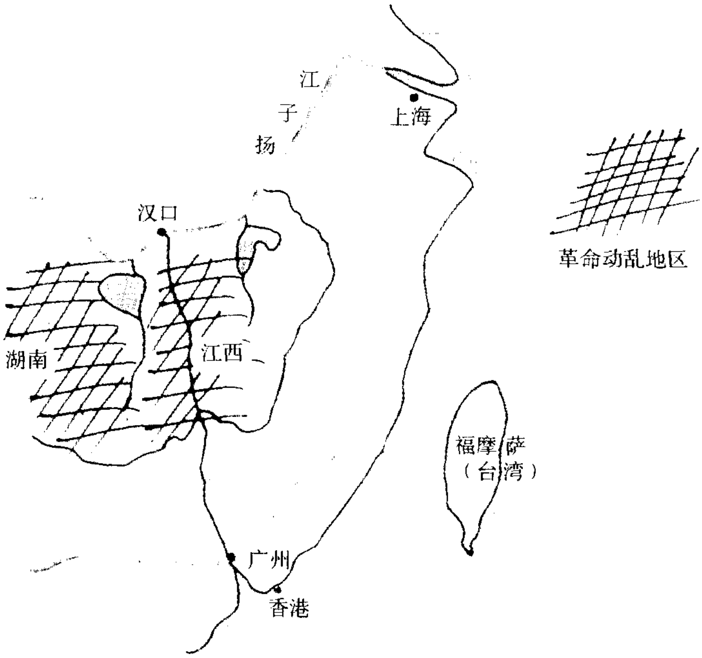
1905年6月——就在布加卑少校——当时的上尉——受命组成和领导一个中国情报处的时候，他曾在从印度支那和香港发来的最初几份报告中陈述过他的计划。他打算同革命党人接触并利用他们的通讯网络取得我们需要的情报。

1905年9月至12月（具体月份未印出）——实际上他已开始同孙逸仙接触，并同他合伙采取一个尚未明确的措施。

提出这种出乎意料的行动方式的报告送到第二局后，当然引起了人们对可能出现纠纷的危险性的估计，它很快又在武官的警告中被强调指出。1906年初——相当频繁的信件就此问题同外交部进行商榷。

1906年6月——给布加卑少校下达了一些限制性指令，劝诫他须特别谨慎。

由于中法两国之间的信函传递十分缓慢，使这个问题变得特别棘手，很难解决。这一



状况必然地给予布加卑少校巨大的行动自由。

1906 年 7 月——很快，少校就派出了好几名中国占领军军官巡回于华中和华南，让他们同各革命中心取得联系（上尉：克劳代尔，瓦德卡，欧吉罗），使情报处规模得以扩大。

显然，非华人谍报人员是很容易被中国政府发现和监视的。布加卑少校一再接到来自第二局，或外交部，或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和巴思德先生的警告。

1906 年 10 月 15 日——最后，中国政府对巴思德先生作出的一次半官方行动，使他明白了他们知道中国情报处的那些谍报活动应该就此收场了。1906 年 10 月 17 日——这时，在外交部的建议下，他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电报，明令撤销那个情报处，并指示让组成那个情报处的官方人员离开中国领土。

按照布加卑少校的说法，下达撤销命令的时候，情报网组织刚得到最终的确定。

这个特别处在它起作用的时候作为有用情报送到第二局的东西，从军事观点上看几乎毫无效果。

一九〇七年

15. 骚乱；秘密会社的骚动；地方官吏被暗杀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7年7月20日，北京）

通过302号报告，我向您汇报了1906年12月在萍乡地区（江西西部）、江西与湖南交界处爆发的反对清王朝的暴乱。今天已证实这两省镇压暴动者的第一批军队令人感到遗憾，他们逃跑和拒绝战斗，因而只好等待武昌和南京的援军来平定局势。如果当时那两三千革命党人有足够的快枪和弹药，骚乱一定会遍及两省。

尽管暴动者已经星散，好几个暴动集团的首脑也被镇压了，但潜在的动乱仍然存在，隐藏在灰烬中的火种又在浏阳地区——距长沙东部4日行程——部分地燃烧起来。当局仍然完全感到意外。如今的秩序就这么维持着。

上月底，严重的混乱（但其严重程度被夸大了）同时在广东南北各县爆发。

汕头内地各县被明显地引向反对政府。在收成似乎受到损害的时刻，蔗糖附加税引起的不满立刻被秘密会社的土匪们利用，仅仅几天时间，民众就站到了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地方绿营军遭到袭击，打了败仗，离汕头东北部一日路程的黄冈镇被起义者占领。潮州和汕头地方当局完全不知所措，他们所武装的"勇"营——英勇的意思——是些苦力和农作物盗窃者，这批人历来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隔着老远就砰砰地放枪。广州陆军乘着两艘租借的汽船到达汕头，秩序依赖他们才得以恢复，甚至都没有发生战斗。广州陆军几乎立刻被派到北海和廉州，在那儿骚乱更严重、更普及。

黄冈事件以喜剧形式结束，欧洲的记者在这一事件中看见了三万革命党人上战场。人们以为已经死去了的那些满洲官吏其实仅仅只是躲藏起来了，他们听凭在自己家中出现的屠杀景象，人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的藏身之处并将他们抓出来。

在廉州，同样被附加税激起的骚乱立即在土匪集团的参与中扩散开来，镇压也是不容易的。巡防部队因措手不及而被击败。土匪不尊重外国人的利益，有两个教堂被抢劫和摧毁。被逐出廉州的土匪窜到了钦州地区，有两次他们试图突袭钦州，甚至差一点成功了（6月21日和22日）。广州陆军还留在该地包围着主要的土匪集团，但军队已有重大损失。广西巡防营驻扎在与广东交界的沿线，以阻止企图侵入的土匪。

厦门（福建）的内地在与汕头地区的骚乱接触时，也有一段时间的动乱，总督立即指挥

一千陆军到达该地,结果任何事端都未发生。

目前,可以说广东的骚乱已被制止。汕头的骚乱显然是孙中山策划的;但是廉州、钦州的骚乱,孙中山似乎并没有插手。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再次重复:这种运动的性质并没有像新闻界报道的那么严重。那些乘机而起的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钱和领导人;但是如果日本认为此中有利可图的话,这种运动是会到来的,它发生的时间将比人们预料的更早。

在四川,拥有众多会员的排外反清的"红灯会"最近试图在开县和万县扩大组织,当地民众因新税收的提高而表现出过分的愤怒。英国和德国的耶稣教传教士们有些不安,他们及时逃脱了,但他们的住宅被烧毁。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某些骚动依然于7月初在浙江的湖州、杭州、绍兴、衢州爆发。巡防部队无力镇压,只得派出杭州的部队分赴各地。这些骚动的原因仍然在于新的税收和米价的昂贵;秘密会社因此也增添了新的信徒。

安徽北部总是多少有些不安宁。一千名用快枪武装的属于"大刀会"的集团正在Huai—yang地区(庐州地区)的一些村庄敲诈勒索。南京大概派出了援军。

1900年的第一个义和拳汇聚中心山东曹州城,在卢将军采取了猛烈的行动后,终于清除了那伙土匪。将军指挥第六镇的一个协,六个月以前到达该地,对民政也拥有完全的权力。在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可怕的痕迹。大部分土匪都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和平的农民,但是一个精明的侦探机关揭露了他们,卓有成效的罗网不断向各个村庄布开。然而那些武装得很好的民军流动队伍到了河南、江苏、安徽和直隶的一些县,它们将等到军队撤走以后再返回山东。

秘密会社在河南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们预料在河南和Houai—tching地区将有骚乱。

在7月6日,一个严重的事件使满族人感到沮丧。

安徽巡抚、以排外保守著称的满族人恩铭,在一个官方仪式中,被安徽巡警学堂的领导人——一个道台——用手枪打死。高级官员参与反叛行动,这还是第一次。

凶手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日本留学了好几年。刺杀成功后,他带领学堂的学生强行夺取了巡抚的军火库;幸亏巡抚的保镖和驻扎在城里的陆军两个营都是忠实的。经过战斗,军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逮捕了那个道台,并处以死刑。临刑时,他为自己属于反清团体而自豪。在他死后,政府官员们立即挖出他的心脏,拿到巡抚的尸体前奉行赎罪祭礼。

巡警学堂的三十多名学生被捕,但而后都被释放了,因为他们只是无意地执行了他们长官的命令。

军队很快在湖北和两江总督的率领下去了南京,以防止因这次政治谋杀而引起的动乱的扩散。

不应对最近爆发、造成不安形势的各种骚乱视而不见。我们对于中国的骚乱已习以

为常，那些长驻的老外交官员们说，以前也总是有骚乱，但生意也照样做。然而，最近的危机需要更认真的对待。

很明显，严重的不满情绪长期以来笼罩在帝国的各个省，尤其在长江下游，那里秘密会社的活动进行得非常出色。他们的组织有了重大的进步，他们有自己的司令部，从那儿向各方面不断派出密使，通过宣传和恐吓招收新会员；另外一些会员秘密监视参加者的忠实情况，并使他们时刻了解总的形势。在领导集团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教员、名人和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军官。

这些秘密会社毋庸置疑地扎根于所有的阶层之中，甚至也在高级官员的圈子中。大部分新军士兵都由于他们的职业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在等待一场极其普遍和持续的灾难，希望从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目前他们大概是忠诚的，但这种忠诚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镇压的运动在组织和装备方面都非常糟糕。

孙中山，又名高野长雄博士，他已经完成了把南部和中部整个秘密团体的总领导权集中起来的壮举。他的联合会"国民党"①，有它的部、分会，它的领导总部，它的联络员。但他们仍然缺乏财务官和富有的银行，还缺少武器和军需装备。

为了使事业成功，孙中山命令他的追随者们尊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他想使他的事业博得人们的好感。

他的宣言仅仅针对满族人，要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联邦共和国。但是他能否使组成部队的绝大多数土匪集团尊重外国人，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些土匪们已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习惯于藐视所谓的对外国人的尊重。

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也开始加入联合运动，但尤其是那些地方，在"大刀会"和"小刀会"里，在"红灯教"里，抢劫的本性和憎恨外国人及传教士的感情占主导地位。

大批逮捕教师、军事学员和大学生的行动，最近在天津、北京和保定府发生。

布里索·德马耶少校(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No332〕

① 应为同盟会，下同。——译者

一九〇八年

16. 中国南部的革命运动；广西南部的骚乱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

（1908年1月6日，北京）

自1906年12月以来，反王朝的革命党"国民党"，在孙中山、又名高野长雄博士的领导下，企图在中国境内各个不同的地方发动起义运动。

第一次尝试于1906年12月发生在萍乡（江西西部），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请看报告第302号）。

然后发生了黄冈事件，在汕头的□□（广东北部），和在钦州、廉州（广东南部）地区几乎同时发生骚乱。对此我已在第332号报告中汇报过。

近三千人的军队在廉州和钦州城进行武装镇压，也仅仅只是将造反集团赶出了骚乱地区，造反者窜向"十万大山"，该地在两广的分界处，属于最崎岖的山脉地带。

据领事们说，广东南部的头一起反抗运动好像不是由孙中山首先挑起的，起因据说是清朝官吏的敲榨和增税，但"国民党"首脑立即利用了这一骚动。那些造反集团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来源于逃兵和广西遣散的士兵，孙中山帮助他们，补充了武器和军需，自1907年9月初以来，他们离开匪巢，重新下山，在广东南部开始他们愚蠢的行动。这一次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国民党"，并有"官逼民反"的字样。

盖上了革命军首脑王和顺印章的反清公告张贴于兵营、城市和村庄，公告号召政府正规部队背叛满族朝廷。（见附件A）

防城地区在卫戍部队瓦解后，轻易地就被革命党占领了；当地官吏和他们的家属被屠杀，衙门被抢被烧，接着钦州城被紧紧封锁了。

那个地区的巡防部队完全措手不及，但他们很快就因广州陆军的到达而得到加强；由水师提督李准，即受到道台郭人漳接济的北海军官俱乐部的将军指挥的机动部队夺回了防城，解除了钦州的封锁，但损失惨重。

其时起义者分为几个集团，连续强占了位于廉州北部的武利、那西和灵山县；他们在再次受到郭道台的打击后，又突然转向西部和西南部，进攻东兴，即古森河与东京的交界处，面对芒街；又被驱逐后，退却并消失于"十万大山"，逃出了郭道台和丁槐将军的包围部队；丁槐将军是广西部队统领，从西部赶来增援的。

起义集团分出一些小队，与正规军进行一场游击战争。游击战向南宁蔓延，直到11

月底，也就是他们重新得到装备，配备了经过孙中山训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员的时期，他们重新集中起来，袭击镇南关的防御工事，该处位于中国边境，离同登的法国哨所约半小时行程。

12 月 2 日，拥有四门山炮的两千名起义者，同时进攻筑有防御工事地区的中国堡垒：镇南关、凭祥、廉城。攻击的主要力量放在“中关炮台”。该处由百余名政府卫防军无力地看守着，很容易就被攻占了。

陆荣廷统领，又名陆阿宋，率领边防荣字军、武靖新军和龙州的防军前往增援，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和十八门山炮，经过七天激烈战斗并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后，才重新夺回工事，把造反者从镇南关、龙州撵走。

那些造反集团由于印度支那总督下令在边境采取了治安措施，不能通过东京撤退，他们向东面的“十万大山”分散。据说他们遭到惨败，有好几个头目被捕斩首。

有趣的是，两位镇压造反集团的指挥官陆荣廷将军和郭人漳，大约一年前，被人在中央政府揭发为孙中山党的加入者。他们在最近事件中的表现似乎为自己洗净了所有的怀疑。

陆荣廷，在东京以陆阿宋闻名，他是海盗的一个旧头目，在组织边防荣字军期间归顺前任苏元帅。陆现年四十九岁，身强力壮，在他的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去年到日本受过半年军训，回到广西后，任边防军统领。有好几次他被人揭发为反清秘密会社成员，每次他都让他的一千五百名忠实的士兵簇拥着到道台那儿去为自己辩白。

陆在夺取镇南关炮台时所表现的魄力似乎使人对他参加国民党表示怀疑。当造反者领导进攻的时刻，他本可以在广西和广东南部响应，从而在南方发起一场总起义；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是他变得忠实了吗？或者也许他实际上是一个“国民党”，但在目前，孙中山和他自己所能够进行的反抗行动都还不能确保取得胜利，因此他不能丢掉假面具，更聪明的办法，是在当前进一步取得当局的信任，消除当局对他的所有怀疑，最终替自己谋取一个更重要的军事地位，以便在下一次的机会中作出更有效的反叛——这些疑问将在今后得到解答。不管怎样，太后认为陆荣廷表现了很强的勇敢和忠诚，因此任命他为总兵，也就是师长。（请看附件 B）

同样，很难说清郭人漳的可靠性，这位桂林军事老道台和广西常备军统领，我指出他曾失踪和被派率领巡防队的支队去镇压“国民党”。应当相信他的忠诚已有过非常严肃的证明，因为当第一批骚乱在该地区爆发的时候，两广总督毫不犹豫地派他去北海和钦州，此后他对政府的热诚从没减弱过。

广西军队的提督丁槐将军，曾在镇压该省的最后一次暴乱（1903—1904）中表现得很勇敢，但目前他的名声却很不好。人们指责他在上个月打击广东造反者时过于软弱，并被最近的一些事情弄得举措不当，没有保持住全部兵力，也未能在他的军营中阻止秘密会社的宣传。太后曾想贬黜他，但广西巡抚张鸣岐替他说情。（请看附件 C）

实际上丁槐将军并不是惟一的罪人。广西省的金库空虚，不能支付兵士的军饷，因此发生了开小差和遣散的事情。在广西，人们常说兵和匪是同义词。既然如此，那些从丁槐那儿得不到饷金的士兵就更容易变成造反者，尤其是孙中山已向他们许诺的饷金比巡抚

按时付出的要多。

太后很了解局势，并免除了广西省今年应付的外国赔款，她给陆两万两发给那些参加最近战斗的士兵作为奖赏。

中国政府声称国民党集团是在东京（即印度支那——译者）领土上组成的，并交给我们在北京的代表一份强烈的抗议书。印度支那政府驳斥了这种论点，还给予了友谊合作的证明。外务部收回了那份措词激烈的文字。

根据革命者领导人的命令，绝不允许起义者掠夺外国人财产（请看附件 D）。然而好像有几个起义小队在中国军队的紧逼下，背着我警卫队进入法国领土，损坏了东京的几个村庄。一份要求赔款的文书已递交给中国政府。

最近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说，他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制止两广的革命运动，并清洗造反集团的避护地“十万大山”。陆军部队将支援巡防队的兵营。

广西巡抚张鸣岐将亲自指挥作战。

尽管显示了这些军事力量，形势仍然严峻。

我汇报过广西兵营的大部分军官和众多的士兵都参加过秘密组织。镇南关兵营的逃兵们为国民党造反者们打开工事的入口。第一次的镇压得以实施当然全靠陆荣廷将军的力量，但是再来个第二次，这样的镇压就不一定能成功，尤其是如果造反集团确实从孙中山那里收到一笔足够的军饷的话。

造反集团被赶出广西，他们将在山中的匪巢里重建队伍，并在时机有利的条件下重新占领乡村。中国新军休息的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不利于政府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从上述已发生过的情况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目前不论出于怎样的考虑，想裁减东京的占领军，尤其是裁减驻守在芒街和谅山境内的军队，都是不谨慎的。同样，在今后裁军也不合适。实际上中国政府已决定（正如你们将会在同日 371 号报告中看到的那样）在最短的期限内在广东建立两个陆军镇和在广西建立一个陆军镇。两省的巡防部队大概在同时期改组。

某些措施有可能是由于担心已经发生的起义运动而决定的。但是也有可能这些措施意在以武力反对在中国领土上的某个外国列强的任何干预意图。在目前北京政府的恼怒状况下，任何边境事故都有导致不愉快发展的趋势。

〔驻华公使馆　No370〕

一九一〇年

17.军事改组
马士理致毕盛先生

(1910年1月10日,北京)

中国政府于1903年重新组建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其核心机构总参部及高级指挥部自那个时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我们的武官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一时期好几年的改革情况进行了分期汇报。皮索·德斯马依①少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密切注视着这项军事改组的每一阶段。中国对这项事业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还有热情的模仿。我们从它近阶段改组活动各方面的表现中注意到,这种模仿经常获得一定的成功。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作为本部的特别情报,记下这一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日期。最近颁布的政令似乎给予这一发展一个决定性的方针:

1903年,成立练兵处军队改组委员会。

1906年,将此委员会改造成现代陆军部,并设有总参谋科和海军科。

1909年7月,建立独立的总参谋部和海军改组委员会,后者对海军部起着原练兵处对陆军部所起的作用。

与此同时,任命两名皇族亲王为总参谋部和海军改组委员会首脑。

自那以后,另外一些措施也证明了肃亲王加快帝国军事复兴、加强满洲王朝的威信及权力的意愿。这些措施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削减总督及巡抚指挥陆军及海军的权力,以维护中央政府的利益。

把军人职业的威望重新提到足够的高度,以使这一职业相近于自由职业,而令这个民族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来谋求它。

与这两项计划相适应的两套改革是:

为限制总督及各省巡抚的权力,取消了他们的大元帅称号和对驻守其辖区的帝国陆军及海军的指挥权。大元帅称号今后专属于君主。那些往昔曾有权指挥部队的巡抚们,现在其职权被严格限制于对非军事事务的领导方面。警察部队仍服从他们的调遣,但即便这一权力也摆在内政部的监督和权力之下,内政部的代表是掌握各省警察及安全事务的由皇帝诏令任命的道台。

---

① 皮索·德斯马依(Brissaud－Desmaillet)。——译者

对各省高级官员权力的新限制，是目前中央集权倾向的令人注目的特点，也是几年以来在一种有耐心的坚韧精神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这种新限制是继将各省主管考官改成由北京任命的简单的国民教育监察员之后，继建立财政总监以负责管理财政官员及盐务道台的财政之后，突然发生的。它标志着帝国政府日益明显的愿望：将巡抚仅仅当作一个由各部任命的专员所组成的委员会的首脑，而由各部的整体构成中央集权，这些部分别是：财政部、陆军部、巡警部、司法部、学部、外交部、民政部、农业部、工商部。这样，而对已经成立的商议咨询议会，慢慢形成了在帝国巡抚这一简单的地方长官主持下的执行任务的行政理事会。

为了赋予新军以明显的王朝特点，为了迫使大贵族对军事感兴趣，最后，为了重新提高直到目前为止仍为中国文人、民政官员和民众本身所蔑视的军人职业，一封敕令将陆、海军最高首脑的称誉及有效的职权交给了皇帝。

为了保证军官对执政王朝的忠诚，一封政令怀着对高贵军人的职业最为阿谀的动机，给予他们与民方官员完全相同的甚至比之更为有利的官职：一位元帅与总督的职位相等，一位师长相当于一位财政官，一位少校相当于道台，上校相当于省长，中校相当于专署署长。

另一政令也确定了士官的种类，包括部队的工长、护士和马蹄铁匠，今后将根据以下方法排列：

上士＝专区长官助理

一级士官＝秀才

二级士官＝地区长官副助理

三级士官＝警监

同时，为了尽力保持军官的忠诚，摄政王决定授予他们到当时为止只授给过外国人的双龙勋章。还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这类仅属荣誉性质的任命，这种方式至今还在中国存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对战争的各种事物怀有敌意的传统国家，这样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遇上某些偏见。文人，和从其中考中的秀才，省长及专署长官助理，他们看到自己摆到与那些鞋匠、裁缝、枪炮匠、木匠、靴匠、乐师、马蹄铁匠等士官同样的地位，便深为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报纸——甚至是进步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一样恼怒。政令中最使官员们不高兴的是这样一条："军官、士官及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可以成为同样等级的民政官员。"相反，军官们对刚刚获得的好处既不隐瞒他们的满意，也不隐瞒他们的骄傲。给予军官们的新的优越条件肯定只能更为方便地布置满洲政体的军队。只要摄政王不在分配军衔时过分宠爱亲王和贵族，已被征服了一半的军官队伍将既无理由又无兴趣地去倾听反王朝秘密会社的宣传。

此外，肃亲王的英明远见还不限于此，为了避免时刻可能发生的朝廷政变，摄政王创建了一个新的满族师作为王室卫队，并当作全国军队的典范和学校。

依靠由他的弟兄直接指挥的卫队和一支对保持其今后新的利益感兴趣的军队，摄政王能够更从容地对付既不懂其意义，又根本不可能有分寸地、聪明地、有益地使用它的人民表示同意了的立宪自由的强烈力量可能引起的革命的、反王朝的或分裂主义的企图。

摄政王改革的愿望虽好，但实行起来遇到的其他困难一点也不比因这个民族的古老传统和偏见所引起的困难少。对于军事改组，中国人民最缺乏的就是战争精神。

为了维持北京的军队、中央行政机构、兵工厂和学校，各省不得不提供额外的御用金，此外，还得被迫为实施海军第一计划和行政改革掏钱。几乎所有的督抚都发出请求，有的要求减免部分分担钱款，有的要求财政部的援助，以便保障已有军队的给养，和为实施重组军队的总计划而筹建新军，该计划包括新建三十六个师。

对于减免的请求，陆军部的答复是限定他们不仅要缴纳当年应付的款项，还要缴清去年或前几年未付完的钱，违者将予以重罚。对于要求支援，财政部告诉他们，由于国库情况不妙和国家需求的不断增加，各省只能依靠自己的财政力量，在规定期限内把军事计划的实施彻底完成。

为应付王室新卫队的费用，以及为了给克虏伯的大炮付款，财政部不得不取消原定给满洲里军队的军饷津贴费。

有几位总督及巡抚要求宽限期限，但帝国政府命令他们遵循已有的命令，若在规定时间中没有严格执行，将由他们个人承担责任。

不幸的是命令和威胁都未能将分散于官员私账上的银钱收回国家银行。应当寻找更稳固一些的财源。

1909 年，整个帝国的军队以及海军开销上升为六千万银两（约合一亿八千万法郎），1910 年的军费开支还要上升。为了补偿用于战争预算的鸦片税收的减少，政府命令再增收每斤四铜板的盐税。这项额外进款的一半，据估计为五百万银两，将用于军队建设，其余的一半留给各省支付继续改革的费用。由于鸦片税务局不能够继续为汉阳兵工厂（湖北）提供必须的二十万银两，而财政部又没有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各省只得按其收入比例负责分摊。这其实并不算很重的负担，却让人感觉到帝国政府用自己的财政防备即使是最小的不测也有困难。

可能用于海军部建设的印花税大概没有执行多久，因为害怕引起严重的骚乱。各省议会以及行会对之持续表示的敌意已达到不可制服的程度，以致总督们不顾北京发出的最紧急的命令，声明无法对付他们。

但如果没有印花税，海军计划的实施会变成什么呢？

铁良大臣倡议推行一种“国防税”，按可耕土地和商人及富人的收入来征收，但是他们不敢使用增收土地税的方法，也不敢把乔装打扮的税加到收入上，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中国资本流入外国银行。

人们还讲到要给奢侈品征税，然而什么是奢侈品，又如何分类呢？

最后，有人认为摄政王和亲王们似乎是相当自愿地提出将他们收入的一半提供给海军预算计划。部长和高级官员们将会积极效仿。但这类大公无私的行为也不能每年来一次。

因此，形势是十分紧急的，并由现在起就使人怀疑三十六个师的创建计划是否能在最初计划的期限内完成，也就是在 1912 年。除非交通部为国防建设提供铁路收入的五百万或六百万利润，然而这就等于停止正在建设的工程和取消修建奉天—绥远铁路。

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惟一摆脱窘境的办法就是商谈对外借款。但是，要中国人的自尊心屈从于这种必须性，看来不太可能。就算这种需要变为不可避免之时，他们还将得过且过，尝试各种权宜之计。像财政部和交通部一样，铁良也想有一个军队银行，这是他很久以来谋求建立的机构，可能马上将获批准。实际上政府同意建立一种军队总银行，在各省建立分行；银行置于陆军部的监督之下，负责向军队汇款、收款及分配基金。新的银行机构能否由它的运转来弥补其应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财源，是值得怀疑的。

马士理（签名）

〔法国驻华公使馆　亚洲处　No3〕

一九一一年

18. 广州革命暴动
高拉尔德[①]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6 月 19 日，北京）

梗　　概

4 月 27 日晚，两百名革命者烧毁了广州的总督公署并企图夺取城门。他们被迅速地逮捕或枪杀。

一个在郊区行动的反叛集团也同样被消灭。

旧式军队和新军都表现了对朝廷的忠诚，居民保持中立。

这个严重的事件加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其他事件，使当局和民众普遍感到不安。

可以预料，另外的骚乱将会发生；我们的军队和炮兵在此时比任何时候更显得有存在的需要。

高拉尔德（签名）

我荣幸地向您递交一份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在广州发生的事件的扼要叙述。

---

① 高拉尔德（Collardet），为当时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译者

根据只有我们的领事才能获得的非常确切的情报来判断，该事件虽然严重，但也只是在一个总是动乱不安的地区中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

应当注意的是，革命者们属于上等阶层，他们是该地区的外来人，他们的支持者或者说同谋者们既不是民众，也不是旧式军队或新军，这一情况似乎表明，暴动者们缺乏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因为像这类谋杀行动，非得有至少是一部分群众和军队的参加才有成功的可能。

不管怎样，革命者的阴谋使朝廷和地方当局感到不安。

这就是我最近在中部各省侦察时能够得出的结论。

这些外国侨民也同样感到不安，来源于众多的已被平息的或不太为人了解的事端；它反映了民众和军队的精神状况，反映了由于政府的借款政策、饥饿和摧毁了好几个省的水灾而引起的激愤情绪。

普遍的不安情绪使得我们的军队和炮兵很有必要留下来，留在这个骚乱将不断扩大，而使我国侨民的生命和利益都处于危险状况的国家里。

事件简述

4 月 27 日晚上 6 点，十多个革命者让人用轿子抬着到了总督衙门，他们用炸弹在大楼中放火，并进攻总督的卫队。总督从后墙的缺口逃跑了，他与他的家属躲在水师李提督的官邸中，在那里他能用电话下达命令，他的卫队则拖住那帮进攻者。

同时，革命者们的四个小组（大概共有二百人）冲向不同的地点：军火库、满族人区和城门，但他们很快就被已组织起来的警卫队及后来因总督的命令赶到的军队抓住。

为了阻挡革命者逃跑和其他的袭击队进城，城门被关闭了。29 日白天消灭了最后一批暴动者，搜查了可疑的住宅。在佛山郊区，一个暴动集团成功地夺取了警察的枪支，但他们也在战斗中被从广州来的军队和海军消灭。

5 月 1 日，一切危险都最后解除。旧式军队和新军都表现得很忠诚，有两艘巡洋舰赶到，而且听说有广西的援军，地方保安队组织起来，正常的生活重新开始。

政府的行动是非常迅速的，因为它对于这次暴乱并非完全没有预料。自满洲将军被刺以来，4 月 8 日，巡警局就报告说已注意到有些可疑的人到达，甚至在 24 日就逮捕了一些人。可以认为，革命者的计划因此而被打乱了。群众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很多家庭都躲避到香港和澳门。

暴动者们是批知识青年，他们是从邻省来的。他们使用的炸弹是在他们中某人的家中制作的，他们的枪支，那些白朗宁手枪，可能是西贡（?）一家商行向他们出售的。

暴动者们声称他们并不隶属于孙中山，他们把孙看作一个野心家。

所有的暴动者都勇敢地死去——他们对居民的财产和生命没有任何妨害。

政府召来的军队是满洲军，李提督的水师，然后是新军，不过这些军队仍然驻在城外。而后，从南宁又调来四个营。

试想一下广州新军曾在 1910 年叛乱，南宁的军队也曾于 1911 年 1 月叛乱，可见形势

是严重的。政府急忙分发粮食和金钱酬谢士兵的忠诚、奖赏军官。

租界的平静没有被打乱,也许是多亏有两门蹲在那儿的法国大炮。28 日和 29 日,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炮舰都到了。从第一天开始,李提督就派了两艘炮舰保护并无防御的英国租界。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58〕

19. 中国国内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9 月 16 日,北京)

在临时资政院会议后一度好转的中国国内形势,几个月以来又变得严重了。

继广州 4 月革命暴动之后,骚乱在甘肃回教徒中发生,同时一个普遍的动荡不安在湖北、湖南和四川出现。在四川,这种骚乱近日又重新爆发并招致了严重的事端:火烧总督衙门、杀害重要调停者、新军叛变等等;交通的中断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了解四川省最近几天的情况。

骚乱的一般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用不着在此重提;在当前的形势下,又增加了三种新的原因:借款政策、赎回铁路的条件和摧毁六省的水灾。

骚乱的原因

盛宫保(正式名字为盛宣怀)的掌权曾是一个新政策①的起点,只有它才能得到一些结果:向外国借款,以便完成财政改革并积极着手修建铁路网。

但与这个政策相反,实际运动一开始就基本上全是反对外国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倒退分子,一方面是冒失自大的"少年中国"的信徒的参与,而后是所有的银行家和以外汇交易为生的投机商,最后还有显贵们,都指望从修建铁路中找到收入和清闲的职位。

5 月 9 日和 22 日的政令宣布铁路国有化并确定了赎回铁路的条件,这使铁路股东们的愤怒达到极点,因为在某些铁路线上,资金已被浪费;资金的偿还没有利息(广东);或者甚至仅仅只偿还股票的百分之六十(四川);而在那些工程尚未开始的地方,仅仅退还股票(湖北、湖南)。

骚　　乱

骚乱立刻在湖北、湖南和四川发生。总督们转交了各省谘议局的要求,但是朝廷决意

① 这个新政策几年前由张之洞开始,后来因为公众的舆论而放弃了。——原注

不受愚弄，它责令总督和巡抚们制止由煽动者们挑起的骚乱。然后它求助于端方以挽回显贵们的名望（端方为直隶旧总督，以前是湖南省巡抚）。端方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负责去当地研究赎回铁路的条件和组织铁路工程所应当继续施行的步骤。

有一段时间人们好像平静下来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到了 8 月底，骚乱重新在四川开始，立刻就具有激烈性质。新总督赵尔丰尽管有着强有力的威望，但他在对付暴动军的行动中表现出了犹豫不决。这一畏缩的最可能的原因，无疑在于他感觉到部队与煽动分子勾结在一起，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谈判而不是借助武力。

确实，根据所获的最新情报，新军已卷入闹事行动，成都城中的驻军（第六十八步兵标、炮兵大队、工兵营、辎重连）已去会合驻扎在北面五公里处的两个步兵标（六十五标和六十七标），统制因无力阻止他们而自杀。总督衙门被烧毁，重要的调停人被杀，城市遭到包围。总督只有巡防部队（旧式军队）的几个营可以支配，那几个营是他从西藏远征军中带回来的，是忠诚于他的。然而也有可能这些部队足以挽救形势，因为只有他们能获得装备。一些外国人逃到了船上，受到在叙府的英国炮舰的接待，并被送回。我国的侨民听从副领事的意见，都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政府的措施

在这些暴力面前，政府先是颁布一些政令作为答复，它力图用这种方法来安抚人心。它还派遣端方带两个营的护卫队作为调解者。只是在这些方法都用尽之后，政府才决定借助于起用一个人来进行威胁，这个人的名字是血腥镇压的代名词。

通过 9 月 16 日的政令，两广和四川前总督岑春煊、原庆亲王①的告发者，被指定与端方和赵尔丰一致行动并"用法令的一切威力"制止反叛。人们指望依靠他毫无怜悯的果断威信使那些误入歧途的人重新返回职守。这些措施可能还不足以与维持了半个多月的反叛者进行商谈。当调解者们到达时，赵尔丰也许已死去或独自战胜了暴动军。人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

新军，正如我在所有的报告中陈述的那样，是完全靠不住的，第十七镇的叛变仅仅是继许多先例之后的可悲事件之一。湖北和湖南的旧式军队对于维持那两个酝酿着骚乱的省是必要的，安徽、江苏和河南的旧式军队则忙于牵制饥民和援救灾民。只是在北京附近才有一些部队可供支配，但人们不太敢放走这些部队，再说他们要去也太晚了。

国家机器的弱点也在事件中突出地显示出来，预言王朝即将结束的悲观谣传似乎已得到证实。

人们指出，在四川铁路骚乱的背后隐藏着革命，这场革命即将蔓延到湖北、湖南，还有它经常爆发的策源地广东；还指出甘肃回教徒的骚乱、饥饿威胁下的遭受水灾之害的省份。人们徒然地寻找着政府的支持，而那个政府原是幸亏群众的麻木和政府官吏及显贵

① 关于此人在 1906 年北京王朝中的作用，请参看布里索指挥员的报告，把他召回到庆亲王的麾下，表明了政府担心的程度。——原注

的贪财才得以生存的。如果政府的利益脱离了满洲人，这个让人讨厌的政体就会完蛋……

以上的担忧似乎有些过分，毫无疑问，没有人能预测满洲政府与无数不满者党派间自去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战斗的结局。然而目前的局势并不是绝对的新奇，中国的历史总是充满着暴动与反叛。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它认为它拯救危机的行动是一种保持力量的表现，这种表现将使人们存在幻想。这种认识就是它在铁路问题上作出反抗姿态的原因。

依靠当地不愿失掉自己职位的人，依靠摄政王昨天检阅过的王朝禁卫军，依靠比新军受过更多战争锻炼的旧式军队——它们只有通过镇压暴动才能达到掠夺的目的；但特别是如果进步党因缺乏共同利益而不能联合一致，可能使满洲人再次摆脱动荡形势。

然而，我们停止作为战斗旁观者的那一天可能不会太远了，那时中国政府的权宜之计已经使完，将转而求助于外国的支持。到那一天，应取的对策并不是让日本独自首先提供援助、既而变成重要保护者，外国占领军也应参加救助，以在这里维持欧洲人的影响和权利。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0〕

20. 革命起义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16 日，北京)

梗　　概

正如我已经汇报过的(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告，编号 70，1911 年 9 月 16 日)，自 8 月底以来，严重的、越来越具有反王朝性质的骚乱在四川发生。软弱的总督和他的少数忠诚的心腹部队留在省城。造反者控制了那个省的南部并日益扩展。从邻近地区派出的援军还没有到达造反者们占领的地盘。

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暴乱之火刚刚在湖北萌发。

10 月 10 日晚，在政府当局逮捕和杀死了几个谋反分子以后，革命者和武昌驻军的大多数士兵(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发动了起义。总督和统制逃跑，藏到了一艘炮舰上。被指挥得很好的革命者们 11 日就成了城市的主人，第二天，又成了拥有武器弹药军需品的汉阳兵工厂的主人。13 日，他们占领了汉口的中国城区。

这次起义是反对王朝的，但绝不是反对外国人的；秩序有条不紊；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黎将军是起义军首领；组织者是个姓黄的人，他是 4 月广州谋杀的发起者。

中国政府经过犹豫，派遣了陆军部大臣率领两个正在集中操练的镇，直接开去反击新

的起义者。

海军萨提督乘军舰溯长江而上。最后，人们求助于被视为惟一能拯救一切的政府要人：刚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袁世凯和被任命为四川总督的岑春煊。

然而中央政府的财力不够，人们怀疑军队的忠诚程度并预料起义运动将蔓延到其他省。

尽管政府当局小心翼翼，动乱仍然可能在北京发生。

预测这次运动的最后意义及其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形势很严峻。这些事件有可能引起列强的干预。

一个月前我曾指出其严重性的中国国内危机最近突然变得尖锐了。

湖北的省城已落入革命者手中，他们在那儿找到了一部分驻军的支持；四川的造反者也有进展，非常可能他们也属于革命党。人们认为革命党已准备好在其他地方行动，令人极为不安的谣言到处流传。

政府召唤所有的力量。它将两省的权力授予最有威望的政府官员：袁世凯任湖广总督并指挥陆军和派遣到该省的海军。

已经在赴四川路途中的岑春煊被任命为那个省的总督。陆军大臣指挥的两个镇出发去汉口，海军萨提督指挥的长江军舰经由长江到达汉口。

到处都在谨慎行事：不可靠的军队被缴械，警察力量得到加强。

一、四　川

以下简述事件经过。

铁路国有化是这次运动的第一个原因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在抗议失败的局势下，骚动者们决定采取行动。决定性的事端是政府收回了铁路公司的领导权，并授予公司领导者以高官。这个挑衅性的措施使保路同志会于 8 月 24 日宣布了商人罢市和大学生们的罢课。抗议者假装把政府的决定当作是与光绪皇帝的旨意背道而驰的，他们带着光绪的牌位在街上游行。

形势直到 9 月 6 日几百名骑兵从西藏赶到成都之前都是稳定的。那些骑兵忠实于他们的老领袖赵总督，总督当时自以为有了足够的行动力量，他把同志会的首脑召到他的衙门，那些首脑当时仍然是他的朋友，然后他叫人当场把他们抓起来并宣布将判处他们死刑。

激动的群众涌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囚者。赵尔丰的警卫队朝群众开枪：一阵排枪打死三十人，打伤五十人，足以驱散人们。但流血斗争的时期由此揭开了序幕。反抗者们求助于城外的民众，好几千名自愿者武装起来。自 9 月以来，常规性的战斗未曾停止。人们原指望新军的背叛，但尽管谣言持续不断，新军中似乎并没有出现叛乱；反叛者们原来预料较容易获取的胜利并没有取得。从那天开始，战斗双方都互有胜负。总督 9 月 20 日获得了从西藏省来到的一些援军（两千人）。

政府给总督所派的援军：

1. 湖北：四个营两个连，目前到达万县附近；

2. 陕西：约一千二百人，他们自9月24日从西安府出发后，至今无任何消息；

3. 贵州：两个营，到了泸州。

由于消息矛盾百出，很难估计叛乱者的力量和武器装备，同样也很难知道他们是否都属于革命党。半个月以来，他们的成功缓慢但是稳固，他们连续占领了新津（成都南部三十五公里）、嘉定府、雅州府和叙府（岷江和长江的河谷），甚至还占领了成都北部的一座桥。重庆及四川东部目前还是平静的。在重庆大约有三百人、尤其是有好几艘欧洲炮艇在保护外国人。

政府最初任命端方去解决各方赎回铁路股份的问题；大概明白了骚乱有着更广泛的原因，它召回了被任命为特派员、之后又任命为四川总督①（10月14日敕令）的原四川总督岑春煊。

湖北发生的事件使人想到岑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人们认为他对四川人有巨大的影响，四川人喜欢他的廉正和对满洲人的毫不容情。但对他的任命可能太晚了，以至于不会有效果。现在岑在汉口，还不能很快到职。

二、湖　北

我在关于湖北武装力量的报告中（1911年7月5日，62号报告），曾指出第八镇被认为是革命者精心训练的部队，但我从未获得任何证据。

自从无纪律的兆头出现以来，在9月份已发生过两起小叛乱，最后一起相当严重，使得当局收缴了部分军队的枪。派往四川的军队有很多逃兵。第四十二标的两个营调赴长江左岸以保护汉阳。

10月10日那天，军队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1. 赴四川的有：

　　四个营和两个连；

　　端方的警卫队；

2. 派遣去：

　　宜昌
　　岳州　　四个营两个连；
　　京汉铁路

3. 汉阳左岸：

　　两个营（第四十二标）；

4. 武昌：

① 原文如此。——译者

第八镇
- 四个步兵营
  - 第二十标两个连；
  - 第三十标两个连；
- 马队第八标；
- 炮队第八标；
- 工程第八营；
- 辎重第八营；

第二十一混成协
- 一个骑兵连；
- 一个炮兵队；
- 一个工程连；
- 一个辎重连。

10月9日夜间在汉口和武昌有一些革命者被逮捕，其中的三名立即被斩首。第二天晚上武昌爆发了起义。步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大概还有一部分炮兵在兵营里放火并冲向总督衙门。总督和张彪将军成功地逃跑了。战斗中忠诚的军队大概是有秩序地撤退了。第二天，革命者渡过长江，特别是因第四十二标的合谋，几乎毫无抵抗地夺取了汉阳兵工厂，他们在那里获得了一百四十门大炮、许多武器弹药和制造别的武器的工具。反叛者企图轰炸总督所乘的炮艇，但因日本海军元帅的干涉而停止，以避免发射的炮弹落入租界或外国船只上①。

自那以后，佩白袖章的革命者组织起来。他们大概招收了新兵，人数估计上升到一万二千人。他们的领袖是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黎将军（尽管他不愿意，据说），许多下级军官都是那个协的。

运动的组织者宣布了他们王朝的第一个年号②。组织者为一名姓黄的湖南人，他4月份曾领导过广州的叛乱。他们极力使人相信他们打算尊重外国人的财产和现有的条约。他们成功地维持了秩序，并预见到可能的货币恐慌，在武昌发行了通用纸币。

武昌的起义使正在筹备军事大演习的政府完全措手不及，经过几番犹豫，它决定采取激烈行动。

陆军部大臣荫昌将军在保定府的军队（第十一协）和河南的军队（五百人）乘三列火车在一天之后，于10月15日离开北京。他大概指挥如下组成的两个师：

第十一混合协（有一部分到达了目的地，约一万六千人，四十八门大炮，二十四挺机枪）；

第二混合协（15日由开平启程）；

第四镇将于17日启程。

海军萨提督大概13日率两艘巡洋舰和四艘炮艇从上海出发，19日可到达汉口。

萨提督的极为现代化的海军要把革命者赶出阵地似乎是困难的，但它能够使一部分革命者陷入瘫痪，而使随之而来的正规军得以顺利行动。

---

① 目前汉口有一艘日本巡洋舰和七艘外国炮舰，其中"决定号"来自上海。——原注

② 不是为了自封为皇帝，而是为了区别于满清王朝；革命者的理想是建立联邦共和国。——原注

荫昌将军打算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信阳(汉口北部二百公里远)。前锋部队在汉口北部六十公里处下车①。反击汉口的正式行动看来将在十二天后开始。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昔日对军队的影响,希望他恪尽职守召回一批起义军并维持住游移不定的人们②。

对事件的进展的任何预见都将是轻率的。

据传言,革命者正整装待发,以便在天津北部和在北京采取行动。南方各省——我们都知道那儿的游击部队众多——将首先响应起义号召。

然而明显的敌人也许并不是对政府最有危险的,最可怕的是那些隐藏在参谋部和政府部门的人,他们期待着在向他们的党提供了所有的服务后公开叛变。到处都不可靠,新党在所有的衙门里都有信徒。

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行动是困难的。它不太清楚应当依靠谁,只见它的烦恼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财政方面很糟糕,如果没有一笔紧急借款,就不能为这个将要长时间、耗费巨大的战役支付必需的资金。各列强国的态度尚不明确。

尽管人们都曾预见到将发生这种性质的运动,但除了日本人之外,大概没有任何人相信运动会来得如此之快。日本的副武官和川岛海军元帅分别于 7 日和 11 日到达汉口,人们很难将此看作是偶然的巧合。

元帅获得了租界的指挥权,人们通知说从日本开来了两艘巡洋舰。这一切说明,日本人将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取得一种有影响的地位,并有可能把自己打扮成王朝的救世主。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2〕

21. 革命起义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20 日,北京)

分　　析

10 月 16 日至 19 日,整个形势处于不明朗状态。武昌的革命者们与荫昌将军那些临时聚集起来的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在距离汉口北面不远的地方进行着。

由于电报中断,(战斗的)结果尚未得知。

海军到达汉口两天以来没有任何行动;人们思忖着他们不采取行动的原因。

还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任何新的暴动中心,但我们预料,革命者们的起义确实成功的消息一旦传开,在河南、广东和云南将会爆发骚乱。

---

① 据我们在汉口的领事说,有两千人已在该城市北部十公里处下车。——原注

② 第四镇的两营步兵据说今天拒绝上车并带着他们的行李和武器逃跑了。——原注

袁世凯已经正式接受了交给他的使命，他宣布22日出发去南方。

政府准备派遣第二支援军，它由满洲和山东的部队组成（两个镇），用海轮运至上海。

财政形势恶化。

日本可能正准备运送一个师。俄国军队接到在满洲采取强有力行动的命令，目的是镇压“红胡子”。

高拉尔德（签名）

人们普遍预计，在中国中部人口最稠密的三个大镇——武昌、汉口、汉阳——如此容易地突然陷落之后，起义最近将会在南方各省迅速发展。

但一直到现在，预测还没有得到证实。革命党人没有利用他们对铁路终点站的控制，来截断南北铁路，并保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定。

在对于为什么革命党人不采取行动的种种揣测之中，最说得过去的理由似乎是：一次大大超出他们希望的成功使他们惊诧失措。

革命党的组织者黄兴，他可能不在湖北而是在四川，他仅仅委派了自己的同志们在武昌发动革命运动，以阻止政府派遣湖北新军反对四川的革命运动。

人们说：怯懦的总督在受到攻击之前就离开了他的衙门；而张彪将军的迅速逃走，使得忠实于他的部队的防守瘫痪，从而使得应当仅仅是一次小冲突的事件变成了革命党的胜利。

可能阴谋者们没有预料到荫昌将军的部队到达得如此之快，而这些部队输送的迅速是由于有由欧洲人管理的可靠的铁路线。此外，没有任何人预料到政府的军队会在革命者的第一批援军到达的时候发起攻击，这真是一次出人意外的果敢的行动。

我们应当从他们双方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完全不同于我们军事观点的行动。

1. 运　输

北方的军队13日开始从开平（直隶）运送：这些军队的大部分都由于军事演习而在那里集结，大约有一万四千人一直运到了北京；有一万二千人尚在京汉线上，18日，约有三千士兵在汉口（江岸）码头下船；五千或六千士兵随约二十列火车分布在从信阳州司令部（距汉口北面二百公里）至前锋营地之间；其他的则被分批运至各重要铁路站。这些军队属于第三混成协和第四镇；同属于这些军队的第十一混成协应于20日从保定府出发。

在汉口，原来仅仅只有于16日以后到达江岸的八百名河南士兵与从本地纠合的四百名巡防队进行着保卫政府的事业。

军队运输工作从下至上都在很好地进行，在列车上的士兵和牲畜有些拥挤（六十至八十人一节车厢；十二至十三匹马一节货车）。路途间临时兵站的给养是有保证的，在那儿，士兵们能够得到米饭、馒头和茶，牲畜则有稻草和水。

在司令部那边，由于指挥权分掌在军官们手中，统一的命令很快就被漠视，可能即将出现铁路堵塞、装备滞留的状况。

2. 战斗(见草图)

由于电报多次中断,有关发生过的小战斗的消息就不够详细和确切了。

双方的军事接触只是到了18日上午才开始。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革命者们并没有攻击他们面前的软弱的军队,而是决定只试图阻止军队从江岸码头下船。

好像是革命者们在战斗中先向着租界方向退却,时间已经是晚上了,胜利的政府方面及总的舆论因此都表现出了非常的乐观。但在半夜,似乎是受到武昌援助(海军丝毫也没有阻碍他们通过长江)的革命者重新发起了攻击。在19日上午,他们的进攻使军队一直退向滠口。乘火车直达滠口的荫昌将军在18—19日间的夜里返回了他的信阳司令部。

自19日上午以来毫无消息使人设想政府方面的惨败,而完全出于利害考虑的政府却宣布了自己的一次胜利。

3. 海　军

舰队按照萨镇冰海军统制的命令于17日到达汉口,它包括两艘巡洋舰和六艘炮舰。舰队停泊在租界的下游,也就是说它停泊于革命者炮火的射程之外。

关于舰队轰炸武昌的传闻已被证实是谣言,好像海军并没有设法去阻止起义运动。人们断言在萨镇冰海军统制与革命者的领袖黎将军之间将会有一些会谈,但现在很难知道究竟是海军统制期望革命者们投降呢,还是革命者希望萨统制站到他们那边去。我们不了解舰队的军官和船员们倾向于哪一派。

4. 政府的措施

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及武装镇压部队大元帅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项任命将有助于阻止其他的暴动发生。但正如过去那样,人们很快对袁是否会接受任命持怀疑态度。袁大概提出了一些条件:缓和对于暴动的镇压,政治让步(立即召开议会,组织一个责任内阁)。最后他公开宣布接受任命,并定于22日动身。如果说,是尚未被人所知的初期战斗的结果改变了袁的决定,那他毫无奇怪之处。

岑总督决定返回上海,这自然是在表示拒绝。但即使如此,他也还是有可能完全改变态度。总之,四川已经被放到了第二位,尽管实际上四川的形势要比湖北严重得多。这个问题只能放到很久以后去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湖北骚乱的形势造成的。

19日晚,皇帝发出敕令,宽恕所有的造反者,允许这些卷入造反运动的人们归顺政府。人们等待着这一宽大措施有好的结果。

参谋部决定组织起由军咨使冯国璋将军指挥的第二支援军。这支军队包括:

驻扎在长春(奉天省)的第五镇之第五协;

驻扎在奉天的常驻第二十镇之第四十协，但此时自然是在直隶的演习场上；

驻扎在济南府(山东)的第五镇。

这些部队将在秦皇岛和大沽上船，经由上海到汉口。

荫昌 18 日胜利的假消息使得运输中断。

第三支军队包括禁卫军和第一镇，它将留在北京听候载涛的命令。

在其他的省，已经采取了谨慎的措施，南京和云南府的新军被解除了武装，拖欠的军饷也已偿付，同时加强了旧军队与警察的武装。

政府准备应付最紧急的情况，为了避免混乱导致金融危机，已向市场投放了一部分国库的货币。

政府在想方设法洽商一笔绝不可少的借款以维持军队。骚乱事件所需的耗费及今年的水灾，使政府陷入一种几乎是绝望的境地，它不能不靠外国借款人的帮助来从绝境中自拔。

5. 革命者们

全中国的眼睛都盯着汉口。人们可以根据这个地方的沦陷或者说反抗来推测布满帝国的革命者们的态度。

毫无疑问，希望的出现使很多人表示出他们的同情。军队中隐藏着很多革命军官，在知识阶层也同样如此。

人们对这个运动是赞同的，他们希望因此而减轻其深重的苦难。革命党有力量，但他们似乎缺乏骨干和热情，过强的个人主义感情使他们不能对共同的事业具有很多忠诚。

最可能发生起义的省份好像有：湖南、广东、云南和长江流域，从新军被解除武装一事大概足以预测这次运动。

据非可靠的消息，黄州(位于长江流域，东经 114°55′)似乎已经掌握在革命者手中。

四川的南部和北部也同样在革命者掌握中。到处发生的流血战斗所显示出的中国人的勇敢，超过了我们对这一品质的一般估计。

6. 列强的态度

与中国接触密切的两个强国似乎在准备一些尚难预测其内容的行动。

一个时期以来业已结束了修订俄满边境的俄国，悍然侵犯双方公认的国境线，并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命令马尔基诺夫指挥铁路防卫队(十七个营)镇压在北方活动的“红胡子”。鉴于“红胡子”的敲诈勒索行为近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这就尤其像是为了一个粗暴的行动而找的借口。

在日本方面，中国的形势对它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故此它似乎不甘于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观众的角色。日本不满足于第一个派遣一艘巡洋舰到汉口，它现已有四艘鱼雷艇在天津(18 日晚间到达)；最后，根据一些情报，第十七师(尾子山)大概已接到了整装待

发的命令。

驻扎在辽东的第五师的两个团也能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运送到天津。

日本几乎能随心所欲地拯救或是毁掉清王朝，在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它不管怎样也能在中国取得更加占优势的地位。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3〕

22. 中国发生的事件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21日，巴黎)

昨天从北京来的消息指出，袁世凯最终接受了任命。

帝国军队在汉口周围向革命军发动的第一次战斗，其胜负尚未见分晓。如果帝国军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就要担心广州和云南省的骚乱反应，在那些地方，动乱刚刚开始。

这一令人不安的推测因上海来的一份电报而使人更加忧虑，该电报根据可靠情报，报告说在汉口的政府军队已遭失败。

另外，我们的总领事补充道，至今为止，还看不出动乱会马上对外国人的安全构成危险；对于敌对的双方而言，最为妥当的是谨慎地对待外国人；危险只能来自于无政府的局势，而目前的事件还不能使人预测这一局势的发展状况。

另一方面，日本和俄国借口骚乱而给其驻扎满洲里的军队当局以一定的行动自由的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

(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No1094〕

23. 中国发生的事件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22日，巴黎)

我收到了您在北京的代办发来的如下电报：

"两天以来，北京与汉口间的电报通讯中断，因此我们得不到直接的消息。从上海来的消息说，首次战斗对王朝军队不利，张可能已被革命军抓获了。"

(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No1093〕

24. 革命起义;10月20日至23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23日,北京）

1. 总的形势

荫昌将军的先遣部队在汉口城下冒险遭受失败的消息渐渐传开了。中国的新闻界几乎全部倾向于革命者,它散布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传闻,在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以前就报告一些城市被攻克了。汉口上游的宜昌和沙市相继落入暴动军之手,这些地方的陷落将四川和湖北的暴动联系起来。根据上海来的一份电报,陷落的还有江西的省府南昌。

同时,根据报道和信件,已弄清了暴动军的行动目的,他们采取行动好像不是出于仇恨,没有复仇精神。民众安下心来,他们带着好感注视着这场既没有骚乱又没有抢劫的解放运动。革命军鼓起勇气推动着这场运动,党派的力量已经表现出来,他们的初步成功给了人们信心。

2. 军事形势

还缺乏关于18日和19日的战斗和随后军队调动的细节。

但是仍可以确定的是:(1)帝国的先遣部队因为在到达汉口江岸下车时没有足够的防护,遭受了一次重大失败;(2)海军直到现在为止,在他们可及范围内的战斗中,无论是对反叛的城市或是对革命者们其行动都表现出软弱无力。

但北方军——革命者期望着他们的反叛——直到现在还是忠诚的。

荫昌的军队从各地得到一些补充,人数增至二万二千至二万八千人(包括交通部队)。

荫昌把他的司令部改设在离汉口一百公里处,并把一部分兵力铺展到离叛军很近的地方。这一匆忙的行动似乎有损于最后的胜利,最好是为了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而等待时机,同时首先考虑组织自己的部队。

在荫昌对面,革命军在原地等待着。据说他们招收了许多新兵并抓紧予以训练。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不冒险作大胆的进攻,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好一次这样的进攻。也许他们在期待其他暴动军队的支持,那些部队在河南暴动,可能从背后和侧翼作出攻击。持这种见解的人们指出从广州来的革命军在罗山(信阳州东部四十公里处)投入战斗。

第二军已补充好了装备和物资正整装待发,人们还在犹豫是用海运或是铁路输送这批部队。从满洲派遣部队到如此遥远的战场上去,将会有许多人开小差(人们已指出在长春的第三镇有一百多人逃跑)。

在北京,已集中起来的军队(禁卫军镇和从通州来的武卫左军镇)约有二万人。禁卫

军占据着皇宫和满洲城区；通州镇占据着满洲城区和中国城区；仅有几支骑兵队在城外。警察共增至一万多人，都用枪武装了起来。

英国公使电请伦敦暂时留住应在10月25日出发的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代替它的沙美西团已经到达中国，此团的一个营于25日晚到了北京。因此，英国人目前在直隶有三个部队（一个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一个沙美西轻步兵团，一个巴鲁奇斯坦步兵连）。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5〕

25. 中国的叛乱；日本的态度
贝尔当[①]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0月23日，东京）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在对清政府造反。

一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江流域的水灾造成的贫困和饥饿，使暴动周期性地在四川、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爆发。骚动是由秘密会社组织的……终于，危机以武装暴动的形式爆发，有相当数量的正规军参加了暴动。革命党人指责北京政府轻易地将铁路、工业和煤矿的开发经营特许权让给外国人；他们要求赎回这些特许权，废黜无能的和窃取权位的满清王朝，并宣布恢复过去的明王朝。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和廉正的治理机构。

总之，反叛者们善于在国内甚至在外国侨民中赢得众多的支持。

试图镇压运动的帝国军队似乎处于劣势。帝国政府的处境似乎很困难：军队的忠诚值得怀疑；武器的匮乏显示出危机；财政收入很不稳定。外国列强大约都被试探性地询问过是否愿意提供资金甚至物资援助。

此种情况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里的人们总是担心外国将操纵中国。在每日印发的报纸或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中，可以辨别出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

在政府方面，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元帅对天皇的秘密觐见。同时，在此星期中，10月15日至22日，有两至三次部长会议召开。这些活动和高级人物的会晤，其结果一点也没有公布，然而报界说：日本政府已同意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进行干预，并与其他列强一致行动。这一声明重复出现在报纸上而未遭审查，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试探气球，以探测国内外公众舆论的反应。无论如何，武装干涉的设想已在政府的考虑之中，陆军部和总参谋部于17日国庆节这天仍在办公，22日星期天也未休息。根据一个初步情报，具体措施正在准备过程中，第一次的征调将派第十七师出发。我已将此情报立即转告了我的代办克劳斯先生。此后，我又了解到出发的可能是第十一师和第十师。几天

① 贝尔当(Bertin)，为当时法国驻日本公使馆武官。——译者

之后我才能证实所获的消息,若消息确实,我将发出电报。

总之,这并不是一次号召预备役军人的认真的动员,而是派遣和平时期的部队,并从其他师抽调人马予以加强。从东京和北方出发的支队已在横滨的铁路上向南方运行,官兵的领章和部队的番号都摘掉了。一些应于下月即 11 月 3 日参加天皇检阅的部队(骑兵队和炮兵队)可能是为了掩盖部队的空缺,将不在那一天出现。

另一方面,尚未集中任何运输用船,仅仅是佐世保的海军兵工厂于 15 日接到命令:组织额外的煤供给。被派出部队的目的地可能是满洲,其任务是代替在中国的驻扎部队,这样后者即可腾出手来对付暴动军。这类行动很难设想事先未得到俄国的默契,但经我询问的我的俄国同事肯定地说,他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协议。

另外,已近退休年龄的军参部首脑奥保巩将军于 22 日被任命为元帅,这使他能按天皇的意愿延长任期,因为他们想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进行高级指挥官的人事调动。

海军的表现更见活跃。它的被称为第三舰队的中国舰队,在川岛元帅指挥下,刚刚由四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加强;为了加强其参谋部,当局还给元帅派去了一名以才智闻名的海军中校(名叫谷口,海军学院教授)。

报纸上公布了派遣比英国元帅温斯罗史老的井上良馨元帅去汉口,该英国元帅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着长江国际舰队的指挥。他的出发与伊形①总参谋长的出发是同时进行的,后者是佐世保要塞司令,可能已于 15 日由门司乘船去中国。

最后,此间正在谈论经中国政府同意,东京的一家私人银行可能借款给中国政府。

以上均为我们所知道的来自于官方的全部情况,它们显示,如果某一时刻来到,人们将对干涉具有思想准备,并准备予以行动。昨天我遇见了陆军部长石本将军,他与我相识已有二十年,因此能作一定程度上的诚恳交谈。我向他询问对于中国危机的出路持何看法,他回答说,就他而言,清朝政府的最后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还有一般银行家、工业家及政界人士的意见,这些意见彻底地反对一切干涉,这是由于考虑到插手中国事务的直接后果,将在华南或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刹那间引起持久地抵制日货的行动。这种意见反映在各大报纸的文章中。其中最有名的一篇登载于 10 月 16 日的《中外商报》上,署名者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国际法学家有贺长雄教授。他的结论是"不要干涉"。他用了很多法律论据来支持他的结论,其中最能说服日本人的是这样一条:"自 1854 年到 1860 年,日本继与列强国和将军幕府签订条约之后逐渐对外开放。我们从那时起经历了一个内部斗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以恢复合理的君王、日本天皇王族的最高地位结束。外国人物资上的强大那时大大超越我们,他们只知道将军幕府王朝即条约的签订者。如果他们为了将军幕府的利益而干预,那么合理君主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呆在自己的国家,不要去那个我们没什么可干的地方作干预吧。"

---

① 伊形(Igata)。——译者

在这个惯于保密的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我将继续注视可能派遣军队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再留几天，如果得到有关此类问题的情况，我将给您发电报。

（签名）

〔驻日本公使馆　No152〕

26. 有关中国革命党人骚乱的最新消息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24 日，巴黎）

我们的中国代办刚通知我，10 月 23 日，革命党人的骚动已逐渐逼近北京，致使各公使馆内的悲观态度占了上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战斗消息。沙市已为暴动军夺取；听说暴动者还占领了南昌和陕西省的西安府。在北京，尽管民众拥护革命党人，但城市仍保持着平静。

（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No1100〕

27. 中国的革命骚乱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26 日，巴黎）

我们的中国代办刚通知我，虽然在北京城内，各街道表面保持着平静，但在满洲人中，不安情绪在增长。一直没有关于战争的消息，但九江已被革命党人占领；本月 25 日，满洲新总督刚到广州上任，即被炸弹炸死。谋杀发生后，城市仍保持平静。

（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No1113〕

28. 革命起义；10 月 23 日至 30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30 日，北京）

（A）总的形势

革命运动出人意外地跳跃式地发展着，在几天中扩展到了一些新的省。人们不能从

它的进展中看出一个事先策划的战略，好像各省的革命组织并没有接到一个总部的强制性命令，似乎它们是听从于革命鼓动或者顺从了当地的形势。

江西——

24日，驻守在那儿的团攻克了九江。但运动尚未在首府南昌开展，总督下令关闭了城门。

陕西——

同日西安府被攻占的消息到达北京。那里的骚乱由伊斯兰教徒开始，人们认为他们是为了战胜新军协。一支强大的队伍集合起来，听从一个集团的首脑（王天纵）指挥，此人归顺了革命运动，并从潼关向河南府进军。

广东——

27日，广州的一个绅士委员会与总督就满洲人投降于临时政府的问题展开谈判，他们希望不经过流血而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因为民众已完全被这一新形势征服。有可能是凤山将军一到广州就被刺杀的事件在引起官吏和满洲人恐惧的同时，也使群众顺从这一和平解决方法。

山西——

昨天，29日，太原府的混合协也反叛了。他们进入城中攻击满洲营，取得胜利后，掌握了石太铁路线。同时为了保证线路畅通，他们向领导要求保留那里原有的人员。

集中在滦州军事演习场的第二十镇①，拒绝上火车去南方进攻同胞。它的首领来到北京与参谋部进行商谈。

在上海，被自己的无能情绪弄得惊慌不堪的中国当局向外国领事们表示，允许外国人占领城区、防御工事和兵工厂。外交团只能拒绝这个可能会违反中立态度的建议，最后决定观察形势。

相反，外交团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中止1900年外交协定中关于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城的条款。

实际上，我们既不能毫无防御地向革命者提供这条通往北京的大道，也不能保证中国军队的占领将有利于满洲政府。

为了应付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政府向所有的要求让步。它接受了临时参议院贬黜邮传部大臣的要求，为了平息人民的仇恨情绪而牺牲了邮传大臣；它授予袁世凯为湖北陆海军最高统帅的头衔并使之享有充分的权力。尽管荫昌刚刚取得了成绩，洗刷了最初的失败，他仍然被召回，而任命了袁世凯的两个心腹：冯国璋为第一军统帅，段祺瑞为第二军统帅。

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撤职，政府大赦暴动军，假装不知道他们的革命目的。

开始为用于紧急开支的借款进行谈判，它可能形成阴谋，人们从这一结果中期待的是拯救而不是军事行动。

---

① 该镇统制张将军好像是这次造反的鼓动者。他首先在沈阳控制了两个步兵标，并能够在滦州集合他的整个镇。他是革命首脑黎将军的同学。——原注

(B)军事形势

可以说,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新军。我的前任与我一样,曾强调过许多青年军官的政治倾向,但是尚难弄清反政府分子是否能够发动起麻木不仁的群众,高级军事首脑是否会加入运动。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北方军对于去南方打仗感到厌恶,反过来也一样。

事实上,军队的态度取决于当地的形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预测这个或那个部队的行为。

曾在1910年2月反叛的广东混合协,在1911年4月的谋杀事件中是忠实的,今天它重新被革命运动传染。

曾被错误地报告说已经叛变的四川第十七镇,在勇敢地、至少是灵活地与人数大占优势的暴动军战斗。

派到第一军去的第二、第四、第六镇的一些部队直到现在仍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在27日取得了夺回汉口的胜利,暴动军现在被围困在汉阳和武昌。

与此相反的是,一个镇(在武昌的第七镇)、五个混合协(湖北的第二十一混合协;湖南的第二十五协,该协的统领因反对这个运动被杀;江西的第二十七协;山西的第四十三协;陕西的协)都与革命者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第二十镇(沈阳)和广州第二十五镇的一些部队态度鲜明地反对满洲人。

政府直到现在都得力于旧式军队的支持才防止了部分的反叛,哪里的总督能够及时地集中那里的旧式军队,他们就能在那里操纵形势。现在政府召来直隶的后备军,其中的十个营将受袁世凯指挥。这些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都劣于新军,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战斗最经常的是肉搏战或者快速的拳击。

如果政府方面不气馁,如果它能找到几个有力量的奴才,它仍然能够在较好的条件下反击散乱的革命军小部队,但是,军事战斗将可能代替谈判和在这个国家经常获得成功的拖延手段。

(C)外国列强的行动

似乎列强采取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直接保护其国民,不如说是在为权势的斗争而忧虑。可能他们也是顺从了轻率的冲动而把可调遣的全部军事力量派遣到受到威胁的地方去。实际上,目前在汉口的一定数量的巡洋舰和炮艇已完全超过了安全所需要的比例,而上海、天津和广州却没有警戒。法国的海军力量已最好地部署下来,加斯蒂[①]元帅与他的两艘巡洋舰在吴淞,而"决心号"在上海,我们其他的巡洋舰在通常的基地:大沽、重庆和广州。

---

① 加斯蒂(Castries)。——译者

俄国在满洲北部的行动尚无明显表现，人们仅仅通告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守卫军增加了一万人。日本也没有泄露它的计划，它好像赞成革命运动，并可能等待无政府状态在帝国盛行以便采取行动。

(D)外国侨民的状况

在外国人与革命军接触的许多地方、在军队的势力范围内，还没有发生任何麻烦的事端。

法国的男女人员都呆在成都和汉口。在京—汉(北京—汉口)、汴—洛(开封—河南府)、石—太(石家庄—太原府)的铁路线上，法国的(和比利时的)工程师和职员保证着服务，他们的妻儿都送回了北京或者即将送到。

在天津，占领部队的统帅们守卫着租界。在北京，美国人得到从马尼拉派来的一个连的增援。一个四十人的警卫队从今天开始占领我们北堂的居地，它因在皇宫脚下的地理位置和邻近满洲天主教徒而特别突出。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6〕

29. 朝廷决定性的让步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0 月 31 日，北京)

皇帝军队在 10 月 27、28 日取得的胜利，曾给王朝带来过一点希望。然而相反的事件同时发生：太原府被攻占，山西新军屠杀满洲人，保定府的军队和第二十镇拒绝去南方，广州的分裂主义运动正在进行。

政府意识到只有决定性的措施才能制止运动。和往常一样，它宁愿协商和让步。通过一系列在 30 日晚间颁布的敕令，王朝假装承认错误，并同意临时参议院的要求。

1. 建立责任内阁，允诺立即将宪法基本条例呈交议会讨论。

2. 辞去内阁中的皇族人员。

3. 给流放的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以彻底的赦免。

4. 撤销预防性的逮捕及放弃满洲人的特权。

这些巨大的让步是及时的吗？它们能够使这场运动停止吗？这很难预言。可能革命者由于看到自己的确定目标——推翻外族人的王朝——眼看达不到，就试图在北京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武力把自己从无论变得多么轻也不愿再戴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然而缓和的希望同样存在。袁世凯已于 30 日从彰德府的退隐地出发去前线。他在形势对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已到绝望的时刻出来参与战斗，似乎是经过了最精心的计算的。人们已经预料他即将被召来组织新内阁。他的忠诚者之一赵秉钧被任命为内政部长。

剩下要知道的是，改良党是否会原谅袁的背叛。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7〕

30. 革命起义；10 月 31 日至 11 月 5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1 月 6 日，北京）

总 的 形 势

10 月 30 日的敕命包含着一些允诺，极容易失望的公众舆论对此表示怀疑。政府想采取断然措施把这些允诺立即付诸实施，自 11 月 1 日起就公布了一些亲王放弃职权的声明和任命袁世凯为总理的消息。政府希望能同时平息资政院的对立，使曾向上朝提出条件的第二十镇重新遵从自己的职守。

但是资政院想由它来制定宪法基础，军队等待着允诺的全部实现。摄政王顺从而无异议地立即接受了资政院在 11 月 2 日会议中仓促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个方案自称以英国的宪法为模式，但它大大超出了那个模式，并没有给皇帝保留任何监督权和领导权。同日的另一敕命重新提出由人民来治理国家并放弃用军队制止目前运动的允诺。继此之后，5 日又指示立即准备选举和随即召开议会。革命者被视为一个政治党派，他们的领袖不排除在承担政府职务的人选之外。

在这些剥夺一些人而向另一些人展示出意外希望的事件面前，各党派组织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组成、它们的目标都是不明确的和变化不定的。但是也可以作出区别：

1. 反动党：几乎是清一色的满洲人，还有皇太后和载涛，他们想求助于集中在北京的满洲军队的力量。

2. 摄政王和袁世凯党：得到旧军和新军一些部队的支持。

3. 改良主义或康有为①党好像在政议院中占有多数，可能有一些青年军官。

4. 革命党：尤其在新军中人数众多，还包括南方各省的一些学生甚至民众。

其中没有任何一党目前具有绝对的优势，并有能力独自取胜。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任何两党联合好像都是困难的，因为积怨和领导人之间嫉妒的野心会使之分裂。

同样也不能忽视近几天来出现在南方各省的日趋明显的分裂主义倾向。

革命政府在五个或六个省府（武昌、长沙、西安府？南昌？太原府、杭州、云南府）和苏州、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成立。

---

① 康有为，1898 年政变时被流放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原注

惊慌笼罩着已经受到第二十镇和山西协反叛威胁的北方。自一个月来，有十万人离开北京去天津和上海租界避难。

满洲人与汉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因为一些过分的行为而增大，报纸匆忙宣传各种传闻：满洲人申诉革命党人在武昌和太原府屠杀满洲人①；汉族人指控满洲人在荆州的残酷行为并火烧汉口的老城区。其实对第一件事尚无任何真实的证据，而在第二件事中，也没有满洲人的任何罪证②。

似乎很难抱有即将全面缓和的希望。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一个持久的缓和不能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与由暴力获得的过分让步的基础同样不牢固——那么很多人将会预测帝国的分割和一个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毫无疑问，在正规军和暴动军队的后面，平常就难以遏制的偷盗集团将会抬头，他们的过分行为将把国家洗劫一空。

军 事 形 势

在北京，人们乐于这样想：袁世凯去战场可能会决定立即停止战争状态。结果什么也不曾发生，人们把缓和的希望一直保持到那个日子，但大流血的战斗的继续仍然是真实的。

王朝军队拥有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的优势，并有海军支持；起义军则以英勇无畏和非凡的热情来弥补他们的缺乏经验。他们在因重大伤亡而软弱不堪的时刻，得到湖南部队的帮助（几个营?）。如果他们保持从汉口和上海的兵工厂获得武器补给的可能性，他们的反抗会持续很长时间。

汉口中国城区的烧毁使人预见在几周战斗之后人们能够期待于这个部队的东西。人们已经知道，没有留下俘虏，所有的人都将被枪决或斩首。

在山西，由于第四十三协的暴动和向京汉铁路进军，使王朝特别惊恐不安。它的行动好像在与吴禄贞将军谈判之后停止了；吴这个因过去和革命联系而很有名的军官，似乎成功地使暴动军重新服从，并将他们带回太原府，在那儿吴被任命为代理巡抚。

政府似乎决定同样地与一直留在滦州的第二十镇商谈。在滦州的这个镇的态度同时威胁着天津和北京。它的统制将被任命为一个很高的职务，政府指望这样来获得这个毫无顾忌地阻止南运装备和部队的军队的顺从。然而对于这些曾在军事大演习期间密谋刺杀摄政王和参谋部官员、以便而后进军北京的士兵，能给予怎样的信任呢?

在其他地方，新军几乎到处表示革命。在云南府，第三十八协烧毁军营，在经过一次相当激烈的战斗以后（五百人战死或受伤），夺取了总督衙门和兵工厂；它选举它的协统蔡将军为军政府都督，然后杀害了总司令和另外几个官员，并将总督赶跑。

在南昌（江西）、苏州（江苏）、杭州（浙江），军队都参加了暴动。在上海，没有中国军队，但有义勇军攻占城市、兵工厂和吴淞的防御工事。

到明天，其他南方省府失陷的消息又会传来，暴动军将在他们的红旗上增加几颗五角

① 人们说有六百至八百名满洲人在武昌被杀，两千人在太原府被杀。——原注

② 公众舆论指责 Tich—Tchong 将军，满洲人，武昌参谋部组织办公室主任，为报其家属被革命军杀害之仇，煽动火烧汉口。被火烧死的人可能很多。——原注

星。但这些地方上的胜利不会持续很久。

好像没有任何团结的因素来联合不同省的军队,因此建立一个南方共和军队的机会很小;极为可能的是一个没有共同领导的内战时代由此开始,并迅速地蜕化为无政府状态。

外国的行动

中国最初骚乱的消息使得大多数列强国派遣战舰到达汉口。目前有一千名海军士兵警戒着该港口租界的安全。

在上海,似乎是在适当的时候也只有一百名法国水手,他们与一千名志愿军和两千名国际警察一道,在加斯蒂元帅的指挥下维持着安宁。

在天津及其近郊,常规的占领军只是由最近到达的英国换防营和二百名俄国人(和一挺机枪)增援。

在北京,除了美国卫队增加了一个连(九十人)以外,卫队还是通常的人数。

在广州,由于炮舰的停泊,一些海军士兵上了陆地。

这些措施直至今日好像足够维持外国人的安全,因为革命运动不是反对他们的。不过最好能考虑以下可能性并迅速准备对策:

A. 骚乱在我东京边境发生。

B. 财政形势导致列强国为偿还其债券而索取抵押。

C. 骚乱发展到具有排外性质,迫使发生一次解脱或惩罚性的出征。

极有可能的是这些最后的假设已经被其他列强国看到,他们的军事行动手段要比我们的范围更大(请看第75号报告)。

为了便于记忆,我提出通常驻扎在中国直隶省以外的外国军队的人数:

在青岛:二千名德国人

二万二千名俄国人(铁路护卫军)

一万八千名日本人(第五师和铁路护卫军)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8〕

31. 革命的进展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1月9日,北京)

总的形势

近几天人们主要是在谈判;政府尽可能大度的措施似乎到处都与毫不妥协的反叛者

发生着冲突。

在汉口，袁世凯的建议已于11月6日被黎将军拒绝。双方继续进行着成效甚微的炮击。宽裕地付给士兵军饷的革命者看到新兵的数字正在上升，他们保持着对最终胜利的信心。

在山西，谈判失败得更为悲惨。刚刚接受了山西巡抚任命的吴禄贞将军——朝廷以该项任命奖赏他的卓越功绩——甚至没能到达他的省府。就在他应为各党派主要首领举行调解宴会那天的前夜，他在石家庄被人谋杀。到处都像是在控诉满洲人犯此谋杀罪，但没有一个人有可靠的凭据。由满洲人组成的那个标因害怕报复而逃散。这件新闻在北京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同时它又激起了新的种族仇恨并重新引发了革命军将进攻北京这种未经思考的恐怖。

第三个威胁中心是第二十镇，它的首脑曾向王朝递交过陈情书，提出了一些条件。虽然那些条件全部被接受，但该部队仍不明确的态度令人担忧，这些忧虑还没有消失。

被任命为调解者派去长江流域完成缓和任务的张将军拒绝了这一荣誉。他似乎与他的一部分军官有分歧，后者是明显的革命派，他们指责张对皇族的忠诚。

尽管南方有更坏的消息，它却没有使首都特别惊慌，倒是对谋杀或直接进攻的担忧使京城的人们透不过气来。

朝廷为了重新征服边远的省而听任战争长期进行，但它的存在与否要取决于各方各省的态度。

因此，山东省议会的独立声明要比沿海城市接连失陷的消息更叫朝廷不安。人们几乎看到一个个新政府到处在轻而易举地建立，但只有那些满洲高级官吏受到了被仇视之苦，积怨最频繁的理由是他们的贪污。虽然很轻易地改换了政府的首脑，群众却对此表现出满不在乎和麻木不仁，然而这些更换如此容易，其本身就应当引起思考。

一次反对革命的行动也能同样轻易地进行。那些由满洲军队保卫并维护他们生命的城市可以作为一种例子，如在南京，该城市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仍然掌握在满洲军的手里，还有一些地方如汉口，那里的革命热情是被首脑的影响和持续的战斗激励起来的。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对于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前者已被遗忘，后者尚不为人所知，每个人只想着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放弃是出于加倍的胆怯，背叛则是由于更加无耻。旁观者们感到王朝已缺乏支持，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满洲人的胜利或者失败，而是满洲人结束的方式：自杀还是逃走。这些仅仅只是一种印象。也许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和干练的人来改变命运，并且再用一些时间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实际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几乎没有动用：政府还没有调动旧式军队。

特别是时间，这个能在毫无生气的国家中成事的重大因素，它还没有能够——但也许将会——利用人们的热情造成新党中的不和，使旧派中的摇摆者安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混乱将长期存在并给予外国列强以多次的干预机会。

军事形势

汉口：在租界后面，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11月3日，任何党派都没有进展，革命军虽然遭到王朝军队的炮击，他们仍然坚守着汉阳。

11月4日和5日，双方仅仅进行了连续的炮击，有好几颗炮弹误射进租界。

6日，黎大都督拒绝了袁世凯的建议，袁提出立宪政府和大赦。

以后的消息还没有得到肯定，可能双方都有些缺乏军需（京汉线中断了两天）。一部分海军开往上海，在那儿它们将得不到供给，因为军械库已落入革命者手中。

暴动军似乎接纳了大批新兵，虽然遭到了失败，人们仍然把他们描绘成对成功充满信心。他们企图用很大的赏额（五十美元）作为诱饵，以战胜王朝的军队。紧张形势不像就要结束，它还将延续很长时间。

山西：吴禄贞将军的谈判好像达到了目的，他决定用自己的部队与反叛军换防。然而在最后的时刻，反叛军中的不信任情绪占了优势，他们拒绝随便地恢复铁路线。新巡抚把他的部队带回石家庄，接着他在那里被人谋杀了。此案成了第二十三标的汉族人和第三标的满族人之间一场战斗的信号。后者丢下武器逃散了。第四十二协坚守着他们的山隘（在娘子关，距石家庄七十公里）。

直隶：在四十三协对面的正定府，第二军统帅段将军力图集中大军，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保护北京的通路。他即将支配正在运输途中的第三镇（长春）。几天来对天津和北京造成最直接威胁的第二十镇好像还没有明确决定它的态度。属于预备队的约五千名新兵大多是在直隶招收的。另外的五千名来自河南府。最后，姜桂题将军在通州也集中了同样数目的军队。

北京：由于第二协煽动反对汉族人，政府只得将它调离禁卫军，派遣去颐和园。

因各省的消息太不确切，不能在此叙述。

外国的行动

仅仅在几个条约港仍有外国的特遣军队。

汉口：约一千名海军士兵和二十多艘战舰。

上海：几天来，加斯蒂元帅的一百名海军士兵守卫在那儿；已有一艘美国巡逻舰到达，运到了三百五十名射击手。

天津：两百名俄国人和两挺机枪，另有五十名德国人增援常规部队。

在福州和广州，有一些水兵登陆。

人们的兴趣在于俄国人和日本人在等待干预，对他们来说，机会实在像是太吸引人了。

他们的行动似乎将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以免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俄国人已

经叫人在报上登出了关于齐齐哈尔骚乱的照会,我们不久将会得知交给马尔提诺夫①将军的任务的完成情况。

至于日本人,他们的行动很难弄清楚。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在到处都可以碰到他们,就在昨天,佐藤上校——他们在满洲的最积极的代理人之一——穿着中国军服和二十镇的一队军官一起从滦州回来。在北堂附近碰到一些煽动分子,一位上校曾是武昌参谋部的。然而发现他们的最后目的是不容易的。我们仅仅提醒:人们通知说有三千人分乘两艘运输船于9日从横滨出发,去一个尚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有两个营在沈阳,有一个协在辽阳。人们觉得,其他的列强国要阻止日本预先策划好了的行动将会是不容易的。

然而,美国有五千人在马尼拉(距上海五天海程)已作好准备。英国有五百人在香港。我们最好能在印度支那集中足够的兵力,以满足人们催促下的不可避免的军事行动的需要。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79〕

32. 革命起义;11月10日至16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1月16日,北京)

梗 概

代表这个时期的现象是对立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革命者正在占领南方一些尚未表态的省,五个独立的共和政府宣告成立,而汉口王朝军队的努力乃至袁世凯与黎元洪将军的谈判均告失败。

另一方面,朝廷对山西和第二十镇的起义部队(这些部队掌握着通向首都的铁路)共同向北京进军的恐惧正在消失;汉族人与满族人之间具有威胁性的冲突已经被避免;袁世凯回到北京,他的到达重新唤起了皇室的一些希望。王朝缺乏远见,摇摆不定,它竟情不自禁地重树信心,而形势却变得更加严峻,人民与王朝之间的分裂加剧了。

紧接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仅限于集中兵力以指望军事上的胜利和组织一个内阁,它的领衔人袁世凯使人民中的一部分温和主义者产生信心。惟有一个较为坚强和能表现出实力的政权才能获得拥护者,目前因为害怕受牵连,这些拥护者们尚未暴露他们的态度。

这是自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二次间歇,它似乎再次带来了希望,皇室及其成员因此

① 马尔提诺夫(Martinoff)。——译者

轻易地从中得到好处。

已经有些逃亡天津的居户返回北京，要求在外国公使馆避难的高级官员也减少了。

然而我们只要开始用心观察事件本身，就不难明白这种乐观情绪的依据何在。

沿海各省一个接一个地宣布独立并建立临时政府。广东广西继云南之后，山东继福建之后自称共和国，具有国家性质。在天津、开封府甚至在皇族的诞生地奉天，也都显出了分裂主义情绪。不再有一个省，即便是遥远的甘肃或者荒凉的贵州，人们也不再挥动革命的火把。

在战场上政府也并非更有运气。在汉口，尽管王朝军队残暴地毁掉了城区，但他们在毫无用处的谈判之后，最近又在企图夺回汉阳山头的战斗中屡遭失败。它的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的优势并没有使它战胜勇敢顽强的南方军队。曾给予王朝军队以大于实际帮助的精神支持的舰队也陷入分裂，最终落到革命者手中。在山西，革命者恢复了他们在起义军中的领导地位，并在太原府招收和训练新的军队，自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妨碍皇室的看法：形势并不比 10 月 10 日更可悲。也就是说，皇室对于面临一个决定性的和直接的打击的恐惧几乎消失，关于在石家庄下车的山西部队将进攻北京、第二十镇将进攻天津、铁路截断致使北京陷入孤立、第一军失去交通线等等，所有这些威胁在短时间内好像都被排除了。

缺少事先计划或者由于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吴禄贞将军的消失，也许说明革命领导者们放过了一个也许是仅有的对王朝进行根本打击的机会。

现在，皇室认为袁世凯的出现对它是一个支持，此人于 13 日晚回到北京。皇室获得了第二十镇及其首领的顺从，后者已被调动去永平府。天津总督在城市附近召集了旧军队中的几千人，他希望这样就能控制城市。最后，满洲的军队（第六混合协）终于能够在山西铁路的交会处石家庄集中。

被摄政王所信任的袁世凯，他的能力能否得到证实，以及袁这个政治家是否准备忠心地解救王朝，未来将会作出判断。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有任何信仰可以作为根本联系的国家，在一个人才极端缺少的国家，旧总督中的这样一位要人是政府能够遇到的最好的支持。

袁世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成立他的内阁，使他的一部分老合作者、一些享有很高威望的官员（萨统制）和著名的改革派人物等进入内阁。这是一种集权性质的内阁，它将重新聚合许多摇摆不定的人。

内阁在军事方面可能很快便会作出努力，合理集中兵力以保证必要的胜利，用以显示政府的力量，并打击革命的中心。

人们指望从上述有力的措施中得出结论，而不是 11 月 14 日告示中提出的：派遣调解者去暴动地区，召见各省代表，进行甜言蜜语的劝告等。在重新谈判前应当做的是：猛烈的打击和显示出令人生畏的力量。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81〕

33.雷让德尔使团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1月23日,北京)

自四川骚乱开始以来,我们的代办关心地派人通知军医雷让德尔①的使团,应当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可能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的同胞没有实现去云南的计划,因此关于他们的相当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公使馆。

我们在云南府的领事打电报来说,一个为使团服务的男仆在离开了他的主人们之后到达了那个城市,男仆说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的主人们正躲避在一座庙中抵抗当地人的进攻。那时雷让德尔医生和德里耶中尉已经受伤,当地政府长官在援助他们时可能被杀。此事发生在宁远府的南边(四川省的东南部,北纬28度,东经102度)。

尽管应当有保留地对待这个道听途说的消息,我仍然坚持向您报告而不等待证实。不幸的是,我们的同胞的死亡好像是可能的,因为有三个欧洲人在那一地区被杀的风声也从别的地方传来了。

卢瓦赫②上尉没有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他已安然无恙地到达了成都。

现在还不知道这次谋杀及杀害传教士加斯达勒③神甫的确定是什么人,而且在将近同一地方和同一时间还有两个中国基督教徒遇害。有可能是革命运动转向排外,但更可能的是那些在骚乱时期中的大胆抢劫分子们干的,或者是那些野蛮的"倮倮"④干的,他们总是把那个地区弄得很危险。

如果把这些消息和在西安府(陕西)的几个外国人被杀的消息对照起来看,大家很害怕一个以骚乱开始的时代将会同时是一个过多地杀害外国人的朝代。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83〕

---

① 雷让德尔(Légendre)。——译者

② 卢瓦赫(Noiret)。——译者

③ 加斯达勒(castanet)。——译者

④ 当时对西南摆夷少数民族的不敬称呼。——译者

34. 革命起义;11 月 17 日至 26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1 月 27 日，北京）

梗　　概

如果对袁世凯的忠诚不抱怀疑，可以说几天来的形势对政府而言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 11 月 22 日的敕令，内阁获得独立；26 日，摄政王郑重宣誓忠于宪法。

更重要的是，已与北京政府脱离了两个星期的山东省据说由于受到德国的干涉威胁而重新归顺北京。

在汉口，王朝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夺回了汉阳的几个山头和汉阳城(11 月 27 日)。南京虽然被近两万名叛乱分子包围着，但它仍在坚持。

不能保证其忠诚程度的军队好像直到现在尚未表现出任何不守纪律的现象，而新的军队正在逐渐组成。

如果政府能找到资金来供给它的军队并支付给它的官员，似乎它还能够在北部中国维持现状。

外国列强正在采取措施维护它们的利益和保护本国侨民，那些侨民受到了在各省出现并将继续发展的骚乱的威胁。

各公使馆卫队的总人数将达到两千人。每个国家都在加强它的部队或者正准备这样做。两个强国在秘密地行动：

日本：它的许多侨民甚至军官在暴动者中间，但是它反对满洲宣布独立。

德国：相反，它希望促使王朝胜利，向王朝提供军事装备和教官。

总 的 形 势

在接受调停者的使命之日，袁世凯对他的一位参事说："我将在两个月内解决此事。"这句话似乎表明总理对他的名字所能起的作用及对形势的严重性抱有幻想。

自到达北京以来，袁遭到了召请他来相助的皇室的猜疑和持续不断的仇恨，据说这种仇恨甚至发展到危及他生命安全的境地。如果说一些年轻的亲王好像还顺从于他，众多的满洲人却丝毫未减对他的敌意。

另一方面，在袁的许多朋友那里，他听到了已经商定的意见：如果他脱离王朝而走向共和国，他们打算使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那些人的这种举动与其说是想以袁的迅速上升来保证国家的很快安定，还不如说是希望从中获取私利。

袁既然不为皇室容纳而又不能得到自己的拥护者们的支持，他似乎还在寻找自己的出路。他的犹豫不决可以从他有时令人失望的迟缓行动中表露出来。

由于对在袁的周围策划的不计其数的阴谋所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所有行政机构的几乎是完全混乱的状况缺乏了解，应当说，袁所遇到的许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困难都为我们所不知。

只是在 11 月 22 日才发表了一个给予内阁权限的敕令：取消除内阁大臣之外任何其他人晋见摄政王的权利和免除御座副署总理的决定。

获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功是两周前宣布独立的山东省回到政府手中；山东省重新归顺朝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害怕德国的干预。这个转变很好地说明了在中国人身上，除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之外，对于国家政治并没有任何深厚的感情。

在军事方面，形势直到 11 月 26 日都是稳定的。26 日王朝军队成功地在汉水右岸登陆，他们占据了最好的地理位置以进攻汉阳。今天，王朝军队在付出了一个月流血战斗的代价以后，终于拿下了汉阳几个山头和汉阳城。

这一胜利将对今后的战争产生巨大影响。一则它使进攻武昌变得容易了，二来它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因为人人都曾相信，革命者的那个阵地是不可攻克的。

南京的战况恰恰相反，革命军向被迫关闭在城中的张勋将军大举进攻。

山西的形势依旧，陕西的骚乱却日趋严重，致使政府被迫从北京卫戍部队中抽出六个营匆忙赶去增援。

然而，即使军事胜利能产生对政府有利的影响，问题的关键仍然在财政形势方面。由政府签署的一项借款使它能够维持它的军队、购买武器装备及支付官员的费用，同时将帮助它保持北部中国，并等待有利时机慢慢夺回那么统一和强大的南部各省。如果弄不到钱，政府就会看到它的士兵开小差，迅速变成类似拳匪那样可怕的集团，从而使外国的干涉变得合理。

军事形势

双方军队在三个主要地方对峙着：汉口前方、南京和山西省。

汉口：在毫无结果的谈判进行了几天之后，战斗重新打响并好像不会立即有任何决定性的结果；11 月 25 日传来消息说王朝军队已经成功地横渡汉水并占领了一个山头。有了这个基础，他们因此能在 27 日上午夺得龟山和汉阳城。

我们还不了解胜利的详细情况。这一胜利可以用军队干部、武器装备的优势（速射野战炮和反野战榴弹炮）和军事训练及可能的人数优势来解释。刚刚受到三千人（第四镇的五个营、一个辎重队，第一镇的两个炮兵连）增援的第一军计有二万五千到三万人。它可能配备有（据某些消息）四门 15 英寸的榴弹炮和二十门 10 英寸的榴弹炮，其中有五门炮是新近从德国运来的。

在汉口的革命军队很难估计。它们根据需要招收新兵，但由于缺乏训练和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从战争开始就受到了残酷的考验；他们没有机枪，几乎只有汉阳制造的劣

质的野战炮炮弹。

南京：南京是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南方城市，直到现在，张勋将军还与七八千旧式军队坚持在那儿。军队的组成情况如下：

长江水军十八个营（每营三百人），约四千人（除去一千五百人的派遣部队）。

江阴水军
江阴巡防队 } 二千三百人

新兵：四个四百人营，共一千六百人。

总督卫队：三百人。

铁良统帅的满洲军：八百人

共计：九千人。

经过前几次战斗以后，现减员为七千至八千人。

面对着张勋部队的是革命的第二军，其构成如下：

由于战斗而减员的第九镇：九千人。

第二十三协（缩减为一个步兵标）：三千人。

浙江混合协：三千人。

江西混合协的一部分：三千人。

共计：一万八千人。

这支军队分为两个纵队向南京进军。政府军在26日夺回了位于城市东北方向的山岗，而南方军则由南门和西南门到达。

政府曾考虑派遣第五镇增援南京，如果使用已经几乎完工了的天津—浦口铁路新线，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山东省的骚乱打乱了这个计划。

革命者掌握了已举起革命星旗的舰队，此舰队和上海—南京的铁路能够保证部队和弹药的运输。

南京的形势与汉口目前的形势相反，革命者在那儿拥有人数、组织和指挥上的优势。他们的首脑是第九镇的统制徐绍桢将军，而且起义部队的干部编制几乎是完整的。

山西：山西省的形势是：第十二协和第五协（两个协都减员为标）在石家庄保护铁路线，使之避免受到驻扎在娘子关的起义军的攻击。

但政府从张家口派出了两个营与大同府将军指挥下的四营巡防队会合，将直接开往目前几乎已完全撤走了部队的太原府。但是这儿如同山东一样，人们首先等待着与暴动者谈判的结果。

四川、陕西：最后还有两个次要战场四川和陕西，但是关于它们的情报极不完全，以至不能看清事实。最近的消息说，赵总督在成都附近取得了一些胜利，而重庆则落入革命者之手。

在陕西，众多的小集团（其中可能有混合协的部分士兵）对潼关地区实行恐怖手段。姜桂题将军的约二千五百名军队（从北京卫戍部队中抽出）最近刚被派去打击它们（这支军队有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大队，一个辎重队）。不幸的民众将不再能希望什么，因为这些保卫者几乎和他们要去摧毁的那些人同样的掠夺成性。

外国的行动

虽然没有在外表上显示出武装干预的迹象，外国的行动仍在有力地进行着。两个强国——日本和德国——作出了相反的决定。

中国的革命首先植根于军官和从日本回国的学生中，因此他们在他们的日本老学友中获得了很大的好感。在前几份报告里，我强调了类似佐藤上校的日本军官们的情况，佐藤上校身穿中国军服并生活在众所周知的革命军官当中。到处都有人告发这种密谋，而且袁世凯就在今天宣告说，有很多日本人在汉阳暴动者的行列中一道被杀。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满洲的行动似乎是反对中国革命的。也许日本政府满足于他们在满洲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得到了中国现政府的承认，他们不希望民族主义因素出现。

德国则相反，它站到了王朝那边。由于害怕出现不利于它的商业上的报复行动，德国在表面上并没有如此承认，但它全力以赴地维持着满洲人政权。目前，德国不仅向政府出售装备和弹药，还帮助它训练军官。如果相信非官方的说法，那么山东省复归王朝的功绩应当归于德国，原因是如果山东省要维护它的独立，德国就要作出干预。

鉴于上述政治原因，德国无意作进一步的干涉，它仅仅打算调青岛的一个连到北京来。

其他列强都准备着，一旦形势需要就立刻行动。据报纸上说，有三艘美国巡洋舰（“加利弗尼亚”、“马里兰德”、“南达科他”）本月 20 日离开了旧金山。美国驻北京公使要求派驻守马尼拉的一个团来中国，或像我已经着重说明过的那样，有五千人已准备完毕待命上船。

日本有一支包括五个连和六挺机枪的部队出现在直隶省附近。

俄国大概加强了它在满洲的人员。目前它仅仅派了第二支援军（五百人）来京。

次等列强国仅限于派遣巡洋舰。

外交使团决定，各大列强国在北京城区的卫队将分别增至三百人，总人数大约为两千人。

无法预测中国民族的结果以及战争延续的时间，应当预料到严重的国内骚乱几乎是肯定的，因为地方政权逐渐消失以及调动，以及因受到挫折和即将被贫困所瓦解的众多的兵力存在。不管怎样，目前最重要的是掌握必要的兵力保证北京和海上的联系，尤其是使山海关地区避免遭到日本的蚕食（日本的这个意图太容易预测了）。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87〕

35. 中国的革命
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1 月 27 日，巴黎）

我荣幸地通知您，据我们的东京代办的来电，日本将于 12 月 2 日或 3 日向其直隶占领部队增派一千二百四十三人的援军。

另外，我云南代表转来一份 11 月 23 日发自成都的电报，该电报提到我们的总领事自 9 月 20 日以来一直被阻拦于打箭炉，不能与外界联系，但在成都的欧洲人全都安然无恙。城内布满王朝军队，他们包围了嘉定。另一方面，来自云南的情报说，雅州地区已被革命党掌握。重庆的来电说，共和国在没有任何骚乱的情况下已宣布成立了。

在云南府，尽管有些令人不安的传言，但仍然是平静的，因为军政府还有钱。然而，我们的代表还是通过铁路线把妇女和儿童送了出来，他还从政府获得了枪支弹药以分配给欧洲人。

最后，一份 11 月 24 日来自北京的电报说，帝国军队已开始进攻汉阳。

（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No1243〕

36. 革命起义；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 年 12 月 1 日，北京）

梗　　概

正当上海在召开由十四个起义省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而且每个代表都认为必须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的时候，北京仍然保持着达成君主立宪政体协议的希望。

袁世凯是王朝的惟一支柱，他用他的威望保护王朝。如果相信他的一位心腹人士的说法，袁现在仍然坚定地忠实于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与革命者达成协议的新的尝试将会进行，协议也有可能建立，条件是把摄政王当作牺牲的替罪羊。

王朝军队在汉阳取得的意外的胜利（这个胜利应归功于革命阵营内的意见不和），使得黎将军的骄傲自大有所收敛。人们希望这一次轮到山西的暴动者们在集中于石家庄的王朝重要军事力量的威胁面前作出让步（石家庄是山西省铁路的起点）。

王朝政府是北方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它已有可以信赖的军队，可疑的军官都逐渐被袁的亲信代替了。对他们来说，考虑有计划地夺回失去的省区（其中有几个省已经在对它的

不慎重的暴动表示懊悔)是有可能的。

然而希望的脆弱性也在这里:这些微小的希望仅仅建立在一个人的力量和机敏之上,只要有一颗炸弹或者一次政变就能使这个人消失。为了不至于犯错误,我们应强调指出这一点。

独立的愿望同样扩展到边远的省份,如甘肃,据说它宣告了一个"西边的"皇帝,还有那些附属地:蒙古和西藏的君主或喇嘛都在准备摇动他们已经忍无可忍的枷锁。

无论是对于"帝国的"中国还是"共和国的"中国,人们都预料将有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它的邻居们是不会忽略千方百计满足他们的贪欲的。

因为急于要给新政府一个具体形式,革命党通过外交特使伍廷芳把暴动省的十四个代表召集到上海。每省的两名代表(满洲和殖民地除外)将决定新政体的形式和宪法。人们预测新政体将是联邦共和制。人们首先希望他们迅速研究新的税收制度,用以代替在创造必要的财源以维持军队和正常行政机构之前就被轻率地取消了的赋税和厘金。

但是正当共和派认为这样就能解决国家命运的时候,北京的袁世凯好像终于择定了他要走的道路,这使他能很好地去完成所肩负的重任。根据袁的一位顾问曼德将军对我透露的秘密,袁同太后的一次会见大概决定了总理的忠贞。裕隆太后似乎表露出她对三个王公(摄政王和他的两个兄弟)的三头政治不再信任而把她所有的期望寄托在袁的能力和忠诚上,她对袁是盲目服从的。被这种信任感动了的袁,可能决定了要用他的兵力来维护小皇帝的王权。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袁没有接受朋友们的坚决要求的原因,袁甚至粗暴地把与暴动者有牵连的自己的儿子遣送回家乡。袁的朋友们想把他拉到天津,既是为了使他摆脱宫廷——他们害怕宫廷翻脸——也是为了方便他与共和派人物达成协议。

只要排除了摄政王,不论袁是否被任命去接替那个位置,他最终都将成为政府的第一号人物,在尽量满足他本人野心的同时,他将满足于因有摄政王这个牺牲品而增加的与革命党和解的机会。

另一方面,王朝军队在汉阳取得的意想不到的胜利,能使人们希望得到至少是部分冲突的结局。这个归因于黎将军和革命首脑黄兴之间的不谅解和湖南湖北军队之间的相互嫉妒的胜利,除掉了暴动军指挥整个长江中游的一个阵地,同时使革命者们丧失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最重要的是动摇了他们在任何一次失败中都不曾动摇过的信心。

因此,将有可能看到很多变节行为在革命党中发生,这个党即将在财政窘境中挣扎,财政窘况将是最严重的争论的先兆。

在此期间,袁继续用威胁手段来支持他的协议提案,并在山西起义军前面集中整个第三镇,同时从北部扰乱他们。如果袁成功地把这个新省份重新拿回朝廷,形势将会有完全重大的改变。总而言之,这些极迅速变化着的事态,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袁世凯在他众多的忠诚者中激起的信心,他逐步把所有的重要职务交给这些人,他已经这样替换了几乎所有的北方军将领,并且能同时依靠新军和旧式军队。

但是若要判断形势使人产生的希望是何等脆弱,只要想想这些希望都是集中在袁一

人的身上,只要一次失宠或须时刻提防的谋杀就会使希望化为乌有就够了。此外,目前就考虑夺回被上十万军队保护着的除北方各省以外的其他省的问题,是不大现实的,因为南部和西部地区好像长久地被掌握在乱党手中,尽管其中有某些地区希望回归于中央政府。

最近报界说甘肃已宣布了一个新皇帝,而且人们都知道居住在该省的回民有能力作出怎样的反抗。

蒙古的君王们去年夏天已经去圣彼得堡表示他们希望摆脱从北京派来的满洲官员的贪婪,目前他们正准备恢复独立;这只能是一个幌子。最后,四川和湖北骚乱的消息一直传到了拉萨,这些消息大概使西藏人决定串通起来赶走他们共同的敌人,并召回他们的达赖喇嘛。

人们还不能预测中国是否能在帝国的形式或共和国的形式下维持它的统一,但它可能将遭到某些损害并失掉它以辛勤和耐心的努力作保证的对附庸国的统治。

高拉尔德(签字)

〔驻华公使馆 No88〕

37. 中国的骚乱;日本采取的军事措施

贝尔当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5日,东京)

在最近一个星期,我们注意到报纸上一系列的在授意下写成的或是半官方性质的文章,均竭力为日本武装干涉中国事务作国内外舆论准备:

"日本贸易在长江流域遭到残酷的不幸。"

"满洲里的无政府状态使日本占领军至多只能在它守卫的铁路附近维持秩序和治安。在国内设立增援警察是必要的。日本贸易惨遭损害。"

"对于了解中国形势的人来说,干涉没有什么可惊诧的,既然日本只不过是效仿了公开支持帝国政府的德国。"

以上就是被视为接受政府旨意的主要报纸上的基调。

我无需对此政治问题的实质去进行探讨,这不属我的工作范围。我只是陈述直至目前我所了解的一点点关于为可能支持政治和外交行动而采取的军事措施。

A. 确切消息

11月25日上午10时,陆军部长受到天皇接见,后者批准派遣日本军队去加强在北直隶的日本驻军。

该驻军在1901年有一千六百人,后逐渐减少至五百人(约一营),是从第三师(名古屋)调出的。

上月28日晚7点半,一辆军用列车从名古屋出发,载走了步兵第三十三团的第三营

（四个连）。这辆火车于同日晚 9 点半顺路带上了从津开来的同一师第五十一步兵团的机枪连。

部队在宇治度过 29 日夜，于 30 日下午登上“桦太岛丸”部队运输船。12 月 4 日到达秦皇岛。

该部将由日本占领军指挥官阿部旅长指挥。其管辖范围如下：北京一个连，天津三个连和机枪连，一个分队在山海关。

包括已驻扎在中国的三个连在内，整个情况如下：

北京——两个连。

天津——五个连和机枪连。

山海关——一个分队。

从名古屋出发的分遣队组织情况如下：

步兵三十三团第三营（四个连）

营长：铃木少校 副营长：左野中尉 一级附属军需官：奥田 二级附属军医：金原 三级附属军医：五味	参谋部

第九连上尉：义田

中尉：日野田、立松、拜志

第十连上尉：长川

中尉：星野、组户、安冈

第十一连上尉：宗象

中尉：金须、川村、鲑延

第十二连上尉：保利

中尉：左太、桥本、涌拔

士兵，非作战人员及辎重队共五百六十人（连队的非作战人员约一百四十人）。

马：三十六匹。

车辆：十三辆（情报不可靠）。

步兵五十一团机枪连的构成情况：

军官：步兵上尉野口。

三名中尉。

部队：一百零八人，其中六十人为机枪服务人员。

马：三十六匹。

跟随小分队军官：

辎重队上尉井田；

骑兵上尉加庭。

据说辎重队第三营即将受命出发。

最后，第三师即将于11月底退伍的那些军人，可能接到了继续留在军队以听候可能的召唤的命令。

满洲里：

驻守在大石桥的铁路护卫营派遣一个连去守卫营口。

B. 略有根据的传闻

近一个月，大家都在谈论首先可能派遣去中国的是第十七师，后来又说是第十师和第十一师。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有某师将要出发，那就是名古屋的第三师。

第二师（在朝鲜）和第五师（在满洲里）留下了应于11月底退伍的步兵。这一措施是合法的，因为两年服役期只是对步兵的照顾。这两个师的新兵已于12月1日进入该部队在日本的兵站并接受军训。

我个人认为，陆军部已采取措施派遣预备军去增援驻满洲里的第五师。尚不知道该师是否因为派去四期最年轻的预备役军人而达到了作战人数，但我相信，在最年长的预备军（神户）建立一或两个旅的方案已着手研究。因此，他们采取了这两个措施中的第一个，同样是符合逻辑的。

（签名）

〔驻日本公使馆　No143〕

38. 革命起义；12月1日至7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7日，北京）

概　　要

汉阳和南京两城的相继被攻陷并没有使形势明朗化，妥协的可能性或一场长期战争的结局都还不能确定。

（A）政治形势：经过12月6日的敕令，太后收回了载沣亲王——皇帝的父亲——摄政王的职衔。这一措施将进一步巩固已经十分强大的袁世凯的地位，但它好像并没有使人民明显减弱对满洲人的积怨和更有利地造成与起义者达成妥协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上海，属于十三个省的代表——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人被看作是本省同胞的真正代表——在12月3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宪法预示着将召集新代表组成参议院并选举临时总统。

每一个党派都在与最尖锐的财政困难搏斗：失去往日财源的政府正在设法签订借款

协议;在革命者方面,他们不能够征收已经被自己取消了的捐税,只得求助于他们的拥护者们半自愿提供的捐助。

在政府军夺取汉阳以后的休战期间进行的谈判还没有结果,似乎没有可能达成协议,因为具有温和倾向的起义首脑们为其他人所强迫而不肯让步。

在此期间,骚乱在南方的一些省——云南、广西、广东——加剧。一些大土匪集团几乎成为安徽与河南的主宰者,正如他们已经部分地在四川和陕西显示的那样。

(B)军事形势:北方总计拥有九个镇和两个混合协,南方有四个镇和六个混合协。另外一些部队因离得太远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此外,武器装备的优势在王朝军队这一方。

双方士兵对他们军旗的忠诚和纪律都值得怀疑,如果说曾有一些起义军和许多皇帝军队英勇战死,这都不能保证将来也会有同样的激情和团结一致。当军饷不再能发出的时候,肯定会发生很多逃跑甚至集体变节的事件,他们将成为大土匪集团而且能进行毁灭国家的暴力活动。

(C)外国的行动:虽然外国干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列强仍然维持他们的中立态度并仅仅是加强公使馆的卫队和在开放口岸的海军力量。日本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向政府出售战争物资,同时又派它的军官支持革命者,这些军官们在粗暴行为面前毫不退让。

俄国在等待它的时机并在边境协议的问题上表现出随和姿态。

其他没有土地奢望的列强国可能拒绝出借必要的款项来支持王朝政府,其原因或者是以此向俄国和日本表示好意,或者是害怕革命党人的报复。然而这样一来,列强国很可能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不幸。这会使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得势并将进一步损害列强的利益,因为无政府状态的首批牺牲品将是外国人。

(A)政治形势

王朝军队没有把他们胜利的战争进行到底,没有利用起义军的士气低落而攻占武昌,而是接受了黎将军提出的停战要求。在此期间,革命军取得了攻占南京的胜利,使他们从由于汉阳失败造成的惊慌中恢复过来。因此,整个形势仍像八天之前那样模糊不清。

在北京,正像我在上一份报告中预测的那样,袁世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使太后罢免摄政王而没有其他人来取代那个职位。12 月 6 日的敕令仅仅任命了皇帝的两个人监护人:徐世昌和世续,一个汉人,一个满洲旗人。

王朝这次似乎作了最后能够作出的让步,这一新的牺牲是否比上次的牺牲更令人赏识,是否明显地有利于和王朝的敌人达成妥协,仍是值得怀疑的。

在中国,每个人都知道摄政王并不是一个进取型人物,反对政体的积怨并不是凝结于他本人的身上。

在上海,暴动者成功地组织了十三个省的代表,其中有一部分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地区。因此,不应把这些代表在 12 月 3 日通过的有二十一条款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看得非常重要。只有在将来才能知道,各省的感情是否与这个议会的感情吻合。

然而袁世凯在尝试着组织一个新的议会,地点不是在气氛特殊的上海,而是在战争力

量更集中，恐怖现实更惊人的武昌。他希望向那些代表们表明他们的努力是无益的，并使他们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令人惊讶的结果。

唐绍仪在这件事上大概是袁的代言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唐是否能成功地使会议召开。

每一党派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政府现在只能获得三个省的税收，由于维持作战部队和购买武器弹药，国库已空。政府希望用借款来维持自己并削弱没有税收这一办法的对手。革命党人已快耗尽从美国和马来亚列岛的中国富有侨民那里筹集来的捐款，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征收取消了的赋税，而且，对资金的需要会导致他们对存在外国银行中的海关收入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

洪水造成的苦难在扩大；众多的帮会正在成立——正是这些帮会在四川和陕西反对政府当局，其中有一个人数多达三千人的集团掌握了河南西部，而另一集团刚刚在张勋将军的背后截断了天津—浦口的铁路线。在南方，海盗即将成为广东和广西的主人，而云南则已经受到了骚乱的折磨。

(B)军事形势

王朝军事力量的分布因需要派遣更大的兵力去对付陕西暴动军而有了明显改变。第十二协从石家庄运至河南府，并被从长春和吉林来的第三镇代替。

极不可靠的第二十镇回到了它在沈阳和新民府的营地。

第一军由于在交战中的损失及溃逃而减员，现在它得到了增援。张勋将军的部队原驻南京，已减员为三千人，现经天津—浦口线到达徐州(江北)。

汉阳前方的停战并没有影响南京和山西，在山西，从北方派去的王朝军队在大同府遭到失败。

总之，如果仅仅只是计算新式军队，王朝现在拥有九个镇(卫队，第一、二、三、四、五、六、二十和二十三镇)，其中有五个镇已投入了战斗。有两个混合协(第二和第二十九协)，其中的一个协还未被动员起来。

与之相反，起义军只有四个镇(第七、九、二十一、十镇)，其中的三个镇已投入战斗。五个混合协(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三十一、四十三协)都已参战。

另外的部队目前不能列入计算之内，驻地之远使他们的参与作用不能肯定。因此，北方享有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和武器及团结一致的优越感。

政府军有一条先进的交通线，由北方铁路和北京—汉口铁路线组成，并有直接从德国和日本取得武器弹药的可能性。

南方党的交通线只有与前线平行的长江，上海—南京铁路的几段和上海—杭州线。

在天津—浦口线上两党占有各自的终点站。

预测未来的行动计划是相当困难的。王朝军队的目标大概会在夺取武昌后，经长江右岸下取南京；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如果敌手进行某些行动的话。

(C)外国的活动

尽管减少了对北京和天津的骚乱的忧虑，列强国仍在继续增强公使馆的卫军和在中国北部的占领部队。

自12月1日以来各国兵力的增加数：

七百名日本士兵和六挺机枪(第三、第五步兵营)；

二百名德国士兵；

一百名美国士兵；

四十五名荷兰士兵。

还有二百五十名俄国士兵与两挺机关枪将来北京，二百八十名士兵和两挺机关枪将去汉口。

日本人继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众多的侨民在革命党人的队伍中，其中有三人由于在沈阳扔炸弹而被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政府向王朝军队提供武器弹药(最后一次运送了至少二百万发子弹、五千五百枚炮弹和五十挺机关枪)。

俄国曾经需要解决在满洲里城附近的边境纠纷，它接受了和解，让该城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俄国外交家们大概认为分裂这个大帝国的时机尚未到来。

其他列强国好像还没有决定是否帮助袁世凯以避免王朝的崩溃，即签署惟一能够解救王朝形势的借款协定。如果缺少金钱，两党即将看到各自的部队松垮下去并转向抢劫活动。人们虽然不能因此就说王朝将在那时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中垮掉，但可以肯定，那种将危及外国人利益和生命的后果会导致耗费极大的流血干预，在这一点上，列强国以后将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补偿。

高拉尔德(签字)

〔驻华公使馆 No89〕

39. 山西的战事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17日，北京)

概 要

10月29日，山西省的混合协反叛并占领了太原府，然后朝着北京—汉口铁路线前进，威胁着王朝军队的交通，甚至还威胁首都。

派去反击它的是吴禄贞将军指挥的部队。吴与暴动军勾结以图进攻北京，但因吴的被杀而使阴谋失败。革命军回到他们的山隘，在那儿坚守了一个多月。

第三镇被派去对付山西暴动军，但双方没有采取敌对行动，为使叛军重归朝廷的谈判已在进行。

谈判的失败使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12 月 8 日开始进攻。为了了解战况，我到了作战地点。在 10、11、12 日进行的战斗并不大，而后，革命军在几乎未遭损失的情况下放弃了非常坚固的阵地，经由铁路向西逃散，他们没有严重地破坏铁路，而是把畅通的铁路留给了王朝部队。由于全面停战，对他们的追击停止了。摇摆不定的民众重新树起皇旗，我甚至在王朝军队到达之前就随着革命军的足迹进入了太原府城。

起义军溃退的原因尚不清楚，我们自问究竟是什么缘故使他们如此丧失斗志，几乎不加反抗就放弃了曾被认为是不可攻克的阵地？不管怎样，山西省如同山东省一样，人们对这种仅仅依靠一些军官和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活动好像不感兴趣。

如果根据第三镇来评价清朝军队，它没有表现出人们本可寄予更高期望的新的军事素质。纪律和战术在军队中很不完善，似乎只是在组织和武器方面有所进步。这使人隐约感到，目前还存在外国干预的便利机会，如果干预能被引起的话。

（签名）

在开始叙述标志着山西省叛乱结束的事件以前，我作为这些事件的目睹者，认为有必要提供一份自革命发生以来的一系列事变的扼要简述。

10 月 29 日上午，驻扎在太原府外的第四十三混成协拿起武器进入城中，攻击满洲城区。在一次小战斗之后，有二十多名满洲人被杀，剩下的人投降或逃跑了。暴动军涌向总督衙门，杀了总督及其家属。革命军成了城市的主人，其首脑阎将军成为新都督。而后他们把两个辎重队（四百人，八门山炮）带到位于山西省铁路终端约四十公里处的井陉县阵地。

这一事件在北京造成恐怖，人们认为暴动军意图摧毁京汉线（北京—汉口）并向首都进军。第四十协在滦州（天津东北方）的出现使恐怖感更为加重，该协的部署令人不安。

政府立刻向石家庄派遣了从保定府和北京调集的四千五百人的军队（第十二混成协和第一镇的第三步兵标），这些兵力受第六镇指挥官吴禄贞将军的统率。

吴禄贞立刻与没有采取任何进攻措施的革命军谈判。吴将军打电报给北京说他已与暴动军取得了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基础的协议；作为对吴的能力的奖赏，他被任命为山西省署理巡抚（11 月 3 日的政令）。

实际上，长期以来吴禄贞即以思想过激著称，他曾和革命军首脑商定，由他自己鼓动第十二协反叛，并与暴动军以及大概同时从北方南下的第二十镇共同进攻北京。

朝廷获悉了这一阴谋，使人在 12 月 7 日晚太原府的部队下至石家庄开始进军北京的时候，杀死了新巡抚吴禄贞①。这一迅速的行动打击了暴动军的士气，他们在那天晚上抢劫了第六镇的弹药，掠夺了火车站，并且盲目地炮击了铁路线上的一座桥梁之后，回到了太原府。

满洲兵的那个标则由于害怕暴动军的进攻而朝北方逃散，第十二协却不敢戴上标志

① 谋杀是第六镇某骑兵上尉干的，此人已经招供。将军的头颅被送到北京，其尸体第二天被暴动军抢走运回太原府。人们起初对谁是将军死亡的肇事者无法判断，因为满洲人与革命党人互相指控。——原注

反叛的白色臂章。

第二军的指挥官段祺瑞将军被派往石家庄，人们正迅速地把第三镇的一部运到那儿(11 月 7 日至 10 日)。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五里铺(一个营，一个炮兵连，一个辎重队)，面对驻扎在北方离此地约 20 公里处的暴动军前哨。革命军控制了非常险峻的山隘，人们认为它非常坚固，不付出巨大代价绝不能将其攻克，所以人们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

袁世凯一到北京，立即任命张锡銮为新的山西巡抚(11 月 15 日政令)，开始谈判。当汉口收复、然后是汉阳的恢复使政府对山西的暴动军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时，谈判仍在无结果地进行着。于是新的提案向暴动军指出，如果在三天内他们不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的话，将采取战争行动。同时，政府从张家口派遣了姜桂题将军的两个营，大概是经大同府和雁门关从北面进军太原府。这两个营在大同府被打败，又因得到一千名左右的旧式部队的加强而重新前进。政府原想在太原府的南面也采取同样的进攻行动，但陕西恶化的形势需要派遣第十二协去河南府(12 月 7 日)，在石家庄仅剩下曹将军指挥的第三镇，因段将军被召到两湖总督的任区去了。

最近的一些事件

12 月 8 日，由于协议未能达成，第三镇(除一个营和一个炮队留在原地外)由铁路线运至五里铺，这个镇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在 9 日上午是：

第五协 { 第九标
第十一标(第十标在北京作袁世凯的卫队) }

第六协　第十二标

十八挺机关枪

两个炮队 { 一组 57 英寸山炮
一组 75 英寸快击山炮 }

第三骑兵标(三个辎重队)

工兵标
辎重标 } 它们的小分队分布在铁路线上

即是大约共有六千名战斗员和两千名军用人员①。

革命军占领着娘子关和壶关的山隘，这两个关口控制了仅有的两条进入山西之路。他们的前哨安排在井陉县和乏驴岭方向的地方(请看草图)，其兵力好像至少有三千人，包括第四十三协的一部和众多的新兵。步兵的武器双方都相同(7m/9m 或毛瑟枪)，但暴动军的炮兵仅有十八门山炮和几门旧式炮，他们既没有机枪也没有骑兵。

9 日，双方均很不正规的前哨接上了火；

10 日清晨，被派往井陉县去的约一个营的王朝军侦察队与沿着河右岸前进的两个革

---

① 兵站仍留在原驻地，这说明了兵力的虚弱。——原注

命军连队打了一场小仗，王朝军队没有取得进展，但第二天（11日），他们与第五协一起向井陉县进军，与第六协向壶关进军。

第5协统领卢将军把两个炮兵连放在井陉县的北部高地，把十一标展开在城市对面，第九标在左侧作为增援，而一个营的侧卫和一个炮兵连开往卢家口。

战斗打响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整整一天。也许是榴霰弹和机关枪给了革命军以深刻印象，他们放弃了自己坚固的阵地，一部退至娘子关，另一部在破坏了一点儿乏驴岭的高架桥之后撤向壶关。当天晚上，革命军阎将军和姚将军乘火车向太原府退却，不久大多数部队都跟随而退。

当我得到这个正在准备的军事行动的消息以后，我离开北京，于11日晚到达石家庄并在那儿得到了目击者的这些情报。12日上午，我乘专列去乏驴岭，打算在娘子关附近观看一场真正的战斗，因为那儿是构成暴动军主要战线的几乎是不可攻克的阵地。

但是，当我们到达乏驴岭的隧道口的时候，仅仅看到了战斗的尾声。革命军几乎全部消失，我们附近第九标某营的枪仅仅是对着逃兵射击。当天夜晚，第十一标直进娘子关，而第十二标攻克了壶关。我们在战场上找到了几门炮和一些炮弹箱，以及暴动军丢下的子弹和少量的尸体；伤员（五十多个）已用火车运到太原府去了。

12日晚和13日上午，工兵连总工程师叫人修好乏驴岭的高架桥，我们乘坐有轨车紧跟着先头部队出发。追击结束后，第十一标的主力在娘子关驻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金属桥梁遭到炮击的破坏，但临时性的修理即可开始。

王朝军队只受到了微不足道的损失（四十八人受伤，约十人死亡），由于铁路线恢复正常，他们本来可以迅速扩大胜利成果的，然而袁世凯的命令阻止了继续行动，命令由调停者段祺瑞带来，建议休战并恢复谈判。

14日，我们去查探杨庄的铁路（一百二十公里），第十一标的侦察分队刚刚占领它①。所有的火车站都遭到了抢劫，电话、电报机被砸坏，但铁路完好。在杨庄，我们遇到了太原府的藩司派来表示他们归顺的两位知名代表（财务官原先投靠了革命党），和前来与调解者商谈的两位革命党军官。

根据到处搜集的情报并经铁路警察证实，暴动军乘五列火车回到太原府（约有两千人），并立即分散了；有些人开始在附近抢劫，非常不安的百姓们希望王朝军队和巡抚能马上赶到以保证秩序。

第三镇坚守在娘子关和井陉县的阵地上。重要的是尽快恢复铁路的运行，尽可能地阻止匪团和散兵对铁路的掠夺和损毁，使当局放心。为此，我自信地向工兵连工程师要求让我乘专列去太原府，以便同时了解铁路状况和山西省府的安定情况。工程师同意了我的想法，我即于15日到达了太原府，同往者有一位英国军官和一位翻译。在王朝军前哨至太原府之间一百五十公里的路途上，楼房饰以王朝的龙旗，铁路警察和职工戴着黄色的

① 这个小分队当晚撤回，并差点儿谋害了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因担心他们与前来寻找我们的火车相撞而将他们扣留。士兵们非常害怕夜间的孤独无援，尽管警察保证说暴动军已经全部撤走了。——原注

徽章。铁路未遭破坏。除了他们(或者是土匪们)在平原上的一些村庄中放火剩下的灰烬以外,没有看到暴动军的其他痕迹。

当我们在天黑时到达太原府时,城门已经关闭。为了进城,只好交涉。一天前刚刚重掌政权的旧当局非常不安,它命令禁止下午5点钟以后在灯火辉煌的街上的所有通行;街上到处是武装的警察巡逻队,被询问的人们一致证明革命军已经逃散,并声明他们只是害怕偷盗者的抢劫。

如果像应当估计的那样,仍然掌握着山西省北部雁门关山隘的暴动军,在得到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失败的消息后将会逃散的话,那么政府有可能在几天以后和平地重新掌握整个山西省。

在了解了暴动军反叛的原因之前就来评价他们的行为还为时过早;同时也不能根据第三镇的行为来进一步评价中国军队。

但是可以从上述的事件中和没能在叙述中提到的细节里得出几点有用的意见:

1. 至少在北方,正如已由山东事件证明了的那样,群众对政治变动完全不感兴趣,运动没有其他的基础,它只是一些军官和几个野心勃勃的文人的行动。

2. 新军具有的素质仅仅显示在外表上,一进入战斗,纪律、组织和战术都停留在他们过去的水平上,仅仅存在着物资上如武器和设备上的进步。部队的一致性大大超过他们十年前的样子,但士气和训练依然如旧,这使得我们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能够期望获得和过去同样容易的成功。

高拉尔德(签字)

〔驻华公使馆 No90〕

40. 1911年11月汉口的战斗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26日,北京)

概 要

通过在当地核实过的情报,我们有可能看清汉口之战。那场战斗11月围绕着汉口展开,继而王朝军队又夺取了汉阳。这一几乎立即就被南京的陷落所抵销的胜利,标志着第一阶段的战争状态的结束。

从搜集到的情报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参战者能力的几点意见:

1. 指挥。在王朝部队方面是优柔寡断;在革命军方面则表现出无能,他们满足于防守,从不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

2. 军队。人们一致对双方的勇敢表示敬意,然而惊恐使暴动军的防御在11月27日陷入瘫痪,正如两周之后在山西出现的惊恐一样。这反映了那些没有受过什么纪律训练

的军队缺乏精神上的联系，使人预料如果面临一个训练得更好，被使用得更为得当的外国敌手，中国军队将很快就出现士气低落。

王朝军队还表现出了关于现代战争程序的某些知识，但是双方的炮兵水平则明显地低于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待，他们不能与外国的炮兵作任何比较。

战　斗

王朝军队拥有大约二万五千人（第三协、第四镇、第十一协）；革命军有三万至四万人，但其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受过训练。在10月底，王朝军队掌握着汉口，革命军则占领着汉阳和武昌。

在王朝军队为从正面进攻汉阳而进行的几次毫无成效的试攻与革命军的局部防御之后，冯国璋将军决定从北面包抄阵地。他把这一战斗任务交给了他的预备队（第十一协），该协从北面五十公里处出发，经过五天未受扰乱的行军后（其中有一天休息），与暴动军交火。这时，冯将军让第四镇越过汉水进攻汉阳。经过三天的战斗，冯终于从侧面夺取了阵地。南方军因内部一部分人的背叛而丧失士气，虚弱不堪，不予防守就放弃了他们本可长期阻挡敌军的防御工事。

在被王朝军队的机关枪和大炮扫射的江面上，革命军由于混乱的逃跑而丧失了很多生命。但是王朝军队却没有利用胜利的时机在第二天就立即进攻武昌。

几天后，南京落入暴动军的支持者们手中的消息提高了武昌暴动军的士气。自12月2日以来，正当人们在上海寻找妥协的基础时，汉口休战的消息接踵而至。

我荣幸地向您提供一份在11月间王朝军队在汉口前方的汉阳取得胜利的战斗报告。这些情报是经过在接近当月底到达汉口的意大利武官和一位荷兰上校当场查核过的。

虽然没有可能了解战斗的详情并记下关于对峙军队在战术上的有用资料，但已收集的情报对于参战者们的军事才能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观察。这些观察补充了我个人曾在山西作的现场观察。可以这样来简述它们：

一、指　挥

从王朝军队方面来讲，将军们在决策和行动方面都显得极为缓慢，但他们懂得如何组织须有相当判断力的战斗，并全力将它进行到底。

与此相反，革命军的首脑从没表现出进攻的意向，这种意向本来能使他们在一开始就做到远距离地阻止王朝军队，然后打垮开始从侧面包抄而与主力没有联系的那个孤立的协。他们满足于进行示威性进攻（部队太弱不能取胜）和注定最后要失败的消极防御。

二、军　队

A. 精神素质　双方部队都显示出令外国人有点意外的勇敢，尤其革命军充满了士

劲，直到后来惊恐慑服了他们的头脑并将他们摧毁。这使人想到，这类惊恐的结果还将经常在中国军队中产生，即当他们与外国军队作战、外国军队以在战术和训练上的优势进行冲击和兵力调度使他们感到吃惊时。这就是在前几次战斗中发生了的事情并使人把中国士兵看作缺乏勇敢的士兵的原因。

纪律训练在王朝军队中也很不够，但是还没有看到士兵大批逃跑的情况，本来，有许多军人、尤其是军官的思想意识是令人担忧的。革命党没有纪律甚至没有明确的等级是他们最弱之处。

B. 个人素质　王朝军队的步兵在使用地形（总的说来是有判断力的）和展开队形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战争程序的知识。由于部队的训练总是被忽视，故而实战射击的命中率很差，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

在革命军方面，新兵没有得到任何训练，因此死亡率很高。

骑兵用来进行联络或者参加步兵的搏斗，他们被当作骑着马的优秀步兵。

双方的炮兵都表现出了最差的武器训练水平。在一个月的短距离轰炸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炮组能对准固定目标修正射击偏差。但是王朝的炮兵拥有较好的装备，因此对他们的敌手保持了一定的尤其是精神上的优势。王朝军有相当多的机关枪，它给战斗的胜利帮了大忙。

工兵主要是为通过汉水而修桥，他们为此使用就地取得的舢板和他们自己的物资（铁架帆船）；桥在部队通过以后就散开了，要载回炮兵是很困难的。

军队主要是打阵地战，用组织火线和隐蔽射击的方法；中国人偏爱这些方法。

三、后　勤

这个问题要等到有关卫生处的更详细的情报之后再一起研究。

四、战　斗

10 月 27、28 和 29 日的战斗使王朝军队占领了汉口租界北面的地方，这时他们还未曾完全占领汉口的中国城区，一些暴动军小组还坚持在那些地方。

11 月 1 日，形势如下：

1. 对峙的兵力

王朝部队：第三混合协和第八步兵标的几部，第四镇（其余的王朝军队，第十一协在北面的交通线上）。总共大约有二万五千人。

革命军：第八镇和武昌第二十一协的几部；湖南第二十五混合协（10 月底到达）；众多的新兵。总共三万至四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未受过训练。

2. 阵地

王朝军队的前哨在中国城区内；主力在租界、跑马场和高尔夫球俱乐部之间；预备军和后勤在十公里外的火车站和七里沟之间。

这些地方大体都保持到11月17日，当时革命军企图渡过汉水迫使王朝军队退却。中国城区部分地被炮火及王朝士兵和抢劫者放的大火烧毁；城区曾被暴动军当作能靠近北军阵地进行干扰的前沿。长江左岸的王朝军炮兵队只是在海军叛变之后才建立起来，海军直到那时(11月12日)一直在保护王朝部队的左侧。

革命军占领着汉水左岸、武昌和长江下游处的右岸，从他们炮队的位置能够判断出来。他们缺少骑兵勘察以保证安全。

3. 武器

王朝军队：日本式6m/5m步枪。

野战炮：克虏伯75m/mT·R·

史内德加林75T·R·

有坂75

克虏伯87m/m(?)

山炮：汉阳造57m/m

不同型号的机关枪。

革命军：毛瑟枪7m/9m

野战炮：有坂75

山炮：汉阳造的克虏伯57m/m

要塞炮：两门12英寸炮(老型号)——龟山；

两门不能用的旧炮。

在11月的前半个月中，谈判的结果是使战斗简化为革命军的一些小动作和缓慢的炮击。

革命军在夜间进行了两次袭击：

a. 第一次是在11月3日，一个支队渡过长江在汉口下游标准油站周围登岸，守卫在那儿的王朝军队没有感到吃惊，他们轻易地击退了暴动军的这个支队。

b. 第二次在11月11日至12日夜间，上千名暴动军在靠汉水趸船的地方渡过汉水，直到11月20日以前未能被驱走。

11月12日，海军站到了暴动军那边并沿江而下，不时在王朝军队的炮兵前面出现，但是它的大胆并没有弥补其无能。

革命军的进攻：

11月17日。在11月16日至17日晚，革命军加强了汉水的前哨并占领了约翰·格里菲斯中学和堤防。

驻扎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的王朝军步兵展开队形进军，经过散落着小村庄的沼泽平原，从早晨7点半开始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下午3点，王朝军队用拼刺冲锋拿下堤防和中学，但未能夺取趸船。

11月18日。黎明时分，暴动军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反攻，夺回了他们前一天丧失的阵地，整整一个白天他们都在坚守那些阵地。

11月19日。当日无战事。

11月20日。王朝军队夺取了汉水左岸所有的阵地。暴动军后撤的部分原因应归咎于他们听到了第十一协从北面他们的左侧迂回包抄过来了的消息。

王朝军队的进攻。

革命军在汉阳的军队非常坚固,很难从正面攻击,因为汉水上既无桥又无可涉水渡河的地方,加上革命军的炮兵从正面和侧面(从武昌)炮击周围地带,因此非得从北面进行一次迂回运动不可。这种迂回由于下列原因是很困难的:

(1)沼泽地带中只有很窄的狭长地带可以行走;

(2)吴家山迫使作大幅度的运动,并且不能与正面进攻取得可能的联系。

王朝军队首先维持在原阵地参加战斗的兵力,而后让其预备队第十一协从侧面进攻。第十一协由孝感县(汉口东北部五十公里处)出发,经过两三天行军,于19日晚到达蔡甸,在那儿乘帆船过汉水。正是这一运动的消息使得暴动军沿汉水左岸退却。

第十一协20日休息,21日和22日行军以便在23日能加入战斗。革命军没有利用该协的孤立去歼击它,或至少将它驱回原地,使之遭受重大损失。

23日,炮战在长江左岸的王朝军炮队和右岸革命军炮队之间展开,同时也在以棺木山和歆生为一方、龟山和武昌的革命军炮队为另一方之间进行。

步兵间的战斗在吴家山附近进行,这些山头受到第十一协和晚间由舵落口过江的第四镇的进攻。

带到汉口的伤员属于第二十一标和第二十二标(第十一协),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标(第四镇)和第八标(第四协的一部)。

因此,在汉江左岸只剩下了第三协(及第十六标的大部),第五标带足子弹从汉口火车站向着南面和东面出发。24日,战斗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11月25日。为供给弹药和准备汉江上的渡桥,炮战在继续。

11月26日。休息。

11月27日。王朝军队成功地夺取了汉阳城西部地区并从背后威胁革命军。自上午11点到下午2点,惊恐的革命军开始跳上小船沿江而下,对此王朝军队的机关枪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杀戮,尤其是在靠近汉阳的小湾处。

革命军的惊恐来自于王朝军队的突然袭击,也来源于湖南暴动援军由于不和而背叛,在夜间撤离阵地的行为。①

五、舰队的行动及它向王朝军队交通线的进攻

舰队在战争开始时负责守卫王朝军队的左侧(东面),为此它停在靠近七里沟的地方,仅仅与革命军互相炮击过几次。

11月12日,舰队投入暴动军一边并下驶至阳逻。它毫无作用地留在那儿直到11月

① 他们抱怨在前些日子承担了战斗的全部重量。他们上船重返长沙,在那儿大部分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原注

19日。那天，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鱼雷艇沿江而上。鱼雷艇被炮火击中，而后在武昌附近搁浅；巡洋舰在对王朝军的炮队进行了一番短射程的猛烈而连续的射击之后，丝毫无损地下驶而去。

24日，出于同样企图，舰队的炮火意外地击中了美孚洋油栈，燃起的大火延续了好几天。

舰队同样的活动在25日又重复了一遍，为的是掩护几支革命部队渡江（五百人左右），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一些铁路桥。但这些企图均告失败。

29日，革命军以更多的兵力向同一座桥梁进攻，但他们被击败并遭受了惨重损失。

六、夺取汉阳以后

11月27日，王朝军队占领了汉阳和龟山。

28日和29日，一场相当猛烈然而毫无效果的射击，在王朝军与革命军的炮队之间进行着。

11月30日和12月1日，炮击缓慢下来。2日，炮击完全停止，同时南京陷落在革命军手中的消息传到汉口。

12月2日至9日。签订了两次休战协定：第一次是四天，第二次是三天。

12月9日至31日。休战从七天延长至十五天，是为了上海的谈判。

休战期间，好几千名江西革命军向在黄陂（汉口北部四十公里处）的王朝军侧翼卫队发起攻击，但被击退至阳逻，他们现在仍然在那儿。各个方面的人都埋怨说休战没有被遵守，部队不顾协定而在继续进行着军事行动。

高拉尔德（签字）

〔驻华公使馆　No91〕

41．12月29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1年12月29日，北京）

梗　概

政治形势

今天颁布的敕令将政府的形式托付给国会去确定。人们思索着袁世凯在终于取得王朝这一新的让步的同时，是否想以此争取时间而使敌对党土崩瓦解，并希望由于预料中的骚乱导致外国列强的干涉？或者，袁总理是否会为了他的野心和积怨而牺牲满洲人？

共和派是否接受这个新的延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政府妥协的愿望正证明了它的虚弱。但无论如何，好像除了四川以外，没有人愿意重新进行目前已搁置起来了的在整个帝国进行的战争行为。

经济问题对于两个对手来讲都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并使人担心军队即将瓦解，因为军饷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由于没有得到外国贷款，袁世凯试图从政府官员身上筹措爱国义务借款以获得财源，然而由于缺少强制性手段，这一办法看来仅仅只能筹得很少的钱款。

拖延政策的施行，王朝军队陷入瘫痪，使骚乱在北方省份蔓延，那里抢劫成风。它也给帝国的附属领地造成获得某种自由的机会，蒙古已宣布了它的独立，而且毫无疑问，伊犁、新疆和西藏将随之效仿。

军事形势

王朝军队总的兵力部署变化不大，但是革命军利用休战的延长在长江流域招收和聚集新的部队。

目前的部署是：

湖北省：有二万五千至三万名王朝军队在汉口和铁路线上；在他们对面，有三万至四万名革命军守卫着武昌和当地的长江渡口。

南京和上海的另外的革命军兵力，有两万至三万人，其中有八千名广东士兵。人们认为他们计划从天津—浦口线进攻北京，这条线只有五千名王朝军队守卫以及因被海所拦可在直隶登陆。为了防备万一，袁世凯在秦皇岛聚集了大约三千人的军队。

山西省：第三镇把它的冬季宿营地设在靠近石家庄的平原上，休战不允许它去太原府；在北面，向大同府进军的五千人的纵队在张家口停住了。

陕西省：有五千至六千名王朝军队在潼关附近等待着进军西安府的命令；甘肃的部队也在向西安府进军。

四川省：不太为人所知的形势由于护送端方的部队的叛变而变得更加严重，端方就是被叛变部队所杀害的。

外国的行动

除了加强在直隶的分队和派遣船只去南方各港，列强国在战争中仍然是旁观者。

蒙古的独立对于俄国是一个巨大的和平的胜利。

日本没有表现出任何企图，仅仅是准备在必要时迅速从秦皇岛登陆。它的侨民有很多在革命军内部。

（签名）

政治形势

一个让步接着一个让步，袁世凯使王朝提前接受了关于国民会议的意见，成立国民会

议的这个决定似乎是确实的。

人们不得不猜测袁决定这个政策的动机：是遮掩着的背叛和个人野心，是利用时间的效力来分离共和派和制造事端以使外国干预，还是仅仅由于缺少钱款而无力行动？

似乎王朝所有的这些让步都促使共和派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保持自己的野心。因此共和派可能会拒绝组织国民会议所需要的期限并强迫立即驱逐王朝。但不管怎样，大概也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希望重新进行战争；在这里人们能重新看到亚洲人对于争论所持的众所周知的偏爱。

在此期间，国库已经空虚，每个党派的财政处境都变得更不稳定，以致外国担心地注视着拖延中的局势，人们害怕这样的时刻即将来临：无饷可发的军队将去扩大抢劫集团。根据情报，政府可能每月需要一千万银两，即：

发军饷两百万两；

支付军官、高级官吏和公共事业部门二百万两；

军需品、武器弹药和民政费六百万两。

尽管这些数字有点夸大，但相当高的需求若无特别手段获得则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正由于没有获得外国贷款，袁世凯在试用一种强制性的“爱国借款”，所有的官吏都须按其薪金的比例签署一定数额的票券。但这个措施似乎并没有提供较大的收入，因为政府不敢严厉地执行它，害怕失去自己最后的拥护者。

虽然人们尚不能确切地了解共和派的财政情况，但很容易从某些迹象中得出它们也陷入绝境的结论。已经有几支部队反叛，原因是缩减了曾经向他们许诺过的很高的军饷。

山西和陕西的延长休战阻止了去夺取这两个省的王朝军队，它们本来可以去维持那儿的秩序。当政府这些不起作用的兵力由于逃跑而减员，纪律在无所作为中丧失的时候，革命军考虑到他们在交通上的劣势，从陆路和海路将其军队运往长江，因为在那儿他们能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只有直隶是平静的，在其他地方，到处是加倍疯狂的抢劫，如山东南部、河南南部、安徽、江北和满洲等，这还仅仅是说到长江以北的地区。蒙古、新疆和西藏在准备它们的独立。

军 事 形 势

在主要战区：

王朝军队兵力照旧，即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处于湖北总督段祺瑞的指挥下。在他们对面，黎将军的军队由于广西、江西、湖南的增援而达到四万人；其分布如下：

一万五千人在青山（武昌下游六公里处）；

一万二千人在金口（武昌上游十公里处）保卫着长江上的一座渡桥；

八千人在武昌；

五千人在阳逻（武昌下游十五公里处）。

最后的这批人用于在京汉铁路上运动。为预防此举，王朝军队把大约三千人从北方

重新部署在靠近祁家湾(汉口北部五十公里处)的地方。

据说革命军得到了山炮和机枪。他们甚至买到了(通过两名英国人)法国飞行员瓦隆(Vallon)的飞机,该飞行员几个月前在上海自杀了。

南京:徐将军胜利的军队准备通过天津—浦口线进军北方,或者准备向武昌派遣援军。为抵抗这些调动,从南京逃出的张勋将军掌握着至多为四千至五千人的军队;他得到了第五镇的小增援(五百名步兵,三百名骑兵和八门炮)。这些兵力驻扎在徐州(江北)。在张勋的部队与革命军之间的,是安徽的抢劫集团,他们在固镇(在浍河岸边)和临淮(在淮河边)两处切断了铁路。

上海:有将近八千(?)名广东士兵到达那里,人们预料这批士兵将通过海运到达直隶,因此王朝军队在秦皇岛聚集了三千人(第四十协,骑兵第二十标)。

山西:被休战阻止的第三镇返回,把冬季宿营地扎在石家庄和彰德府,而总督尚不敢去已摆脱了暴动军的太原府。

负责从山西北部行动的分队停在靠近张家口的地方,它约有五千人,即:两个营,一个骑兵队,一个工兵连和第一镇的一个辎重连,加上旧式军队的三千人(毅军和卫军)。

在陕西的公路上,有第十二协,姜桂题将军的六个营,第二十九协的一个营和一个骑兵队,约六千人。该部大概夺取了潼关,并准备攻取西安府。

四川:形势好像越来越趋向于无政府状态,从湖北去的护送端方的第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的士兵因为杀了端方,都站到了暴动军一边。

仍不知道成都的情况,从该城得到最后消息的时间是11月19日。

总之,在湖北、山西和陕西获胜的王朝军队在能够扩大他们的战绩之时被阻止了,而革命军则从士气不振中恢复过来,聚合起新的兵力。

外国的行动

各列强国至今仍忠实于他们最初所抱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仅仅满足于保持其在中国有更多的军队和舰只。

俄国因蒙古宣告独立而刚刚获得一个成功,伊犁、新疆随后也将可能宣布独立。这种和平的结局满足了俄国的不容他国染指的野心。

日本的行动很难明确判断。当人们每天发现日本侨民或军官活跃于革命军队中时,它却好像并不想让其政策看起来与其他列强国有所不同。但从现在开始,它在为一个迅速的干预行动采取措施,如果干预变为必要的话。

岸本上校为了准备军队的登陆而待在秦皇岛,那批部队只要有信号就会从旅顺港出发。此外,将有一艘巡洋舰整个冬天都留在这个港湾。

第五镇已接到不要遣散退役兵的命令。

高拉尔德(签字)

〔驻华公使馆 No92〕

一九一二年

42. 1912 年 1 月 8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 年 1 月 8 日，北京）

概 要

1. 政治形势

为两方所接受的由制宪会议来决定政府形势的协议，还没有取得期望中的一致，因为双方对选举方式和会议地点尚存异议。

袁世凯在指责唐绍仪超越授权指令的同时，承认了几乎是难以忍受的条件：王朝军队后退一百里，因此而撤离汉口及汉阳的要塞。

在共和派方面，他们组织起来于 1 月 1 日选举出了一个设于南京的临时政府。新总统孙中山发誓推翻王朝，而后将他的权力交给……①

清廷的财政形势略有好转，袁世凯从朝廷获得了几百万钱款。

南方党使用没收忠于王室的官吏财产的办法寻求其财政收入。

2. 军事形势

一个新的叛乱在驻扎于秦皇岛附近的第四十协中爆发。造反的团队在受到从石家庄赶来的第三镇的武力攻击后迅速逃散。

人们惊讶地看见汉阳的王朝军队撤退，他们放弃了用极大代价夺得的阵地，人们不再想了解这些军队了。通过铁路迅速进行的撤退行动导致第一军在孝感县（汉口东北部六十公里处）的集结。

这支军队的对立面是增强了的湖北革命军，其总数为三万至四万人。

南京：第二革命军补充了八千名广东士兵，大约有两万至三万人，它可能计划由天津—浦口线进攻。一些非正规的小部队在淮河以北保护着铁路线，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张勋

① 原文此处有遗漏。——译者

将军的七千至八千人。

陕西：双方军队隔着潼关要隘对峙，兵力大致相等。

山西：在上个月分散开的革命军力图向该省南部发展。王朝军队第五协刚刚占领太原府。

政府可使用的后备正规军减少，但它招募了大约一万二千人，其中大部分是退役士兵。

3. 外国的行动

在中国北部的外国军队超出了七千人之数。大约有七百人为了防止新的交通中断，根据1901年的协定书刚占领了北京—山海关铁路线。

这条线路分归英、汉、德、日的军队所有，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分给它的防御区（它从马尼拉调来了一千名士兵）。日本已作好应付任何可能事件的准备，但至今他们的行动与其他列强国保持着一致。

在广州，英国人在沙面租界周围营建防御工事。

政 治 形 势

人们再次发现王朝的让步可以理解为虚弱，它只能造成敌方新的索价。王朝对其权力的放弃和提前承认国民会议的决定并没有获得它期望中的谅解。唐绍仪自谈判一开始就似乎违背了他的职权，他承认自己对共和政体有好感。他提出辞职，他所签定的协议也因此没有得到袁世凯的认可。

袁世凯直接与伍廷芳继续进行着不连贯的谈判，尚不知道谈判的明确基调。在确定制宪会议的代表人数和地点问题上双方很难达到一致，除非政府方面作出新的让步。

在此期间，在人们不清楚停战是否还将延长的情况下，袁世凯按照王朝军队（至少是对于第一军）后撤一百里的协议，命令部队撤出汉口和汉阳，此令现已执行。

共和派希望自我了结内部不愉快的纷争，选举出了孙中山总统和一个内阁。新政府设在南京。1月1日，孙中山庄严宣誓推翻满洲王朝，然后辞去他的临时职务。

至今人们仍把袁世凯的游移归因于他的财政窘况，这种窘况由于从朝廷获得了新的经费——大约五百万银两——而暂时摆脱，并且袁希望爱国借款也能汇集大致相等的数目。南方党是否拥有可观的资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企图借款和颁布严厉措施，如通告所说将忠于王室的官吏财产充公，强迫商人缴纳捐税等。

军 事 形 势

革命党的最终计划好像是同时发动在山东的第五镇和暂调滦州和秦皇岛（直隶）的第四十混合协暴动，然后它们将从铁路线与南京派遣的登陆部队一道进军北京。

第二十镇前任统制张绍曾将军，是躲避在天津的革命煽动者，他正在准备第五镇的暴

动，数日前张在济南府被捕。第二十镇的两名高级军官成功地带走了第七十九标，但得到消息的政府及时阻止了他们夺取唐山车库机车车辆的行动，并派遣驻天津的旧式军队去对付叛军，同时召集在石家庄的第三镇。

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反叛者们，有一部分溃退了，剩下的人受到攻击并被包围；八名叛军军官被斩首。第四十混合协所剩下的人没有参加任何战斗。至于应当从海路到达的革命军（据说是受蓝天蔚将军指挥的一个协），人们说他们还没有从南京出发。①

目前兵力的部署如下：

（1）湖北：在胜利时被阻止的王朝军队，为执行停战协定，已撤至汉口北面六十公里处集中。人们还说尽管该部队抢劫了汉口和汉阳，却还能相当有纪律地按规定到达集合地点，并准备参加战斗。

他们的对手是黎将军三万余人的强大部队，这支部队已从武昌跨过了长江。

（2）在天津—浦口铁路线上：张勋将军的兵力仅有八千人和几门炮，面对着徐将军强大的部队（约三万人）。驻扎在徐州和南京的两军之间，有些自称革命军的军队，掌握着淮河和清江浦的铁路线。这毋庸置疑是北方党最薄弱的地方。

（3）陕西：残余的山西革命军增强了这里的暴动军，他们坚守在潼关一带的山岭上，兵力可能与王朝军队相仿（约六千人）。

（4）山西：政府用保护使用的借口向太原府派遣了第五协。一个月以来，那儿潜在的革命也好像结束了。

（5）在直隶海湾：第三镇（第九标、第十二标，两个辎重队、三十六门炮、两个工兵连）在秦皇岛附近监视着第二十镇保持中立的小部队（第八十六标，三个辎重队，五十门炮）。

原供政府支配的新军就这样缩减为宫廷卫队、第一镇的分队、第二混合协和第二十三镇。第五镇的忠诚程度值得怀疑。为应付这种形势，政府组建了二十五个营，其中的一部分由预备役军人构成，这些营可能会在北京和郑州（河南）汇集。

外国的行动

滦州的反叛，叛军阻塞铁路的企图和他们使交通中断两天的行为，表明我们已到了保卫北京—山海关铁路即执行1901年条约的时候了。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的措施已于1月6日付诸执行，铁路线由从驻中国北部的七千名外国军人中调出的约七百人守卫着。

美国从马尼拉调来一千人以保障对它的地区的守卫，这些地方暂时托付给英国人看守着。

日本继续保持其谨慎的态度并使其行动与其他列强国一致。正如我已强调过的那样，它有三艘巡洋舰停泊在秦皇岛和旅顺岛，它们用无线电报联系，并一旦有事发生便能

① 应当注意到在这种与两个月前同样危急的形势下，北京并无惊惶之相，态度上的不同似乎应该不可争辩地归功于袁世凯的出现。——原注

在二十四小时内运送一至二个团的兵力。

另一方面,我们驻广州的领事示意采取比英国更为细致的预防措施来保卫沙面(用沙袋、铁丝网等设施)。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93〕

43.1月15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年1月15日,北京)

梗　　概

政治形势

袁这个善于把人们从王朝那儿夺得的权力握到自己手里的政治家,现在好像想要完全取代王朝,人们预料他将迫使皇帝退位。

当前的冲突也可能就这样迅速解决,中国可能会采用共和的形式,也可能会保持君主政体,但那将是一个新的王朝。

军事形势

停战再次延长十五天。王朝军队的第一军撤至汉口北面二百公里处,并减少了一个协(第三混合协),它被派到河南府去对付排除在停战之外的陕西和山西的土匪。

从上海由海路北上的一个革命军的标等候在芝罘,据说它将从这里向济南府进军。

外国的行动

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于由国际军队占领的北京—山海关铁路线上。

法国是所有大列强国中在中国拥有兵力和船舰最少的国家。

俄国力求获得中国承认它作为蒙古的某种保护国的地位。

政治形势

在上星期中,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且日益明朗,这似乎使人们把皇族的自动退位看作是极为可能和即将发生的事情。

贵族们缺乏高贵的感情,而人民则缺乏忠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能产生一个没有激起什么感情而仅仅触及利益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法。

在等待时机到来作一个转变以挽回面子的同时，袁世凯撤回部队以避免所有的战斗，并削弱王朝反抗的机会。

已决定再延长停战十五天。

使人们对其暴烈行为感到恐惧的两个满洲人师，一个远离北京（第一师），另一个（卫队）由于溃逃而减员三分之二。

所有的革命党人能否承认由袁世凯来做一个类似专制的新政府的首脑？这还是个不可预测的问题。

新疆是伊宁协发动叛乱的地方，满洲人在那儿遭到杀害。可能该附属地也同样会宣布它的独立。

四川省府在和平地过渡到共和国一方之后，一直被新军和旧式军队之间的斗争所扰乱，外国人只得放弃成都，那儿目前只剩下了领事和天主教教士（修女和传教士）。

军事形势

（A）整个王朝第一军从湖北向北撤，这样就避免了被在停战期间继续活动的革命军包围的威胁。正在执行中的军队调动可能形成军队在信阳州北部的集中（汉口北部二百公里处）。

（B）第三混合协调离第一军，经铁路运送去河南府。因为陕西和山西聚合的暴动军正威胁着那儿。那些在西安府和潼关干过很多暴行的集团被排除在休战团体之外并被视为土匪，这可能使得北方政府能夺回那个省。

向河南府进军的王朝军队兵力目前大概增至一万多人。

（C）第二十镇和第三镇（除第五步兵协之外）驻扎在直隶的沿海地区，以抵抗革命军可能的登陆。

由于两个营反叛，第七十九标被解散了。但第三营除外，它被派到了永平府。

（D）在以天津—浦口线为中心线的战场上，形势是稳定的。在徐州的张勋将军现在可能拥有一万二千人。

（E）一个去芝罘的远征部队已从上海出发，它是一个有八挺机关枪和三门山炮的步兵团。除非第五镇出现叛变行为，这个部队进军济南府可能会很容易地被阻止因而不能构成严重危险。

（F）关于其他情况尚无任何变化。

外国的行动

对北京—山海关铁路的占领至今未招致任何事端。为了尽量避免与中国的王朝或共和军队发生任何冲突，外交使团会议细致地研究了应向承担这一任务的部队所下的命令。

一个五百人的美国营于19日在秦皇岛待命，为了守卫唐山—滦州防区。

因此从在中国的可支配的军队人数这一点来看——无论是海上或陆上兵力——法国

都将是所有列强大国中受惠最少的国家。

俄国抓住了蒙古分裂主义运动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了目的是使中国放弃它在蒙古的所有权力、甚至是拓殖权力的建议,这等于承认俄国是蒙古的事实上的保护国。这一行动可能是在日本和英国政府的同意下采取的,那两国政府将分别在满洲和西藏得到补偿。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94〕

44.1月22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年1月22日,北京)

概　　要

政治形势

王朝尚未作出让位的决定;满洲军队动荡不安,可能试图攻击袁世凯;对袁已经策划过一次谋杀。

总理等待着皇族不可避免的顺从,并考虑在天津建立一个可能有南方党首脑参加的临时政府。袁把驻河南的军队(三千人)调来北京保护他。

革命军从海上派遣了八千士兵到达芝罘,从那里他们可以进军济南,或去北直隶湾北部作一次新的登陆。

掠夺和骚乱的消息从国内各省传来。应当警惕在东京边境地区败退的土匪进入我殖民地。

军事形势

兵力的分布情况,除上述所指出的之外,没有其他变化。

在北京,满洲兵和袁世凯的卫队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骚乱。军队人数为:

a)满洲军队{新军约一万人;旧军约一万三千人。

b)反满洲军{袁世凯的卫队四千五百人;武卫左军的协六千四百人。

外国军队二千一百五十人。

外国的行动

最后抵达的援军为:

美国军队一营和19日在秦皇岛登陆的一个炮兵连；

六百名葡萄牙士兵(和印度士兵)在澳门；

我们得知，英国已有一千名援军出发赴印度和中国。

政治形势

关于皇帝退位问题，一周来未见任何决定。

一颗炸弹扔向袁世凯，当时他正由皇宫返回，炸弹使他身边数人受害。

据具有一定可靠性的情报，谋杀的行使者们是受皇族某一成员的委托，该皇族成员一直激烈反对总理。

王臣们的御前会议在皇宫举行。在第一次会议中，老亲王充当了退位的辩护人，只有很少的人反对他。但在第二次会议时，老亲王改变了观点，并带动了皇族会议的好几个成员和所有的蒙古亲王附和于他。人们把观点的根本改变归因于三十多个满洲军官的要求和变得强大起来的禁卫军，以及袁欲摆脱王朝的态度和南方暴动军的态度。禁卫军的新统帅冯国璋将军似乎无力把握住他的士兵。

袁世凯获得了几天的休假，他因此能够等待太后的决定而不显出是在强迫她。他打算在皇帝退位后皇族仍可能呆在北京的情况下，把他的临时政府所在地搬至天津。这样，他能够突出与旧政体决裂的既成现实，并可使他更少地遭受到新的谋杀。袁也许希望同南京政府的部分成员共同组成他的政府，但对方能否赞同这一项协议是值得怀疑的，并且，王朝的退离可能留下同样复杂的形势和分裂的机会。

在此期间，袁调动了大约三千士兵来北京，加上他的护卫队(第十标)，看来可使他免受满洲军队的攻击。很难预测忠诚的军官们的阴谋是否将导致一场冲突，或者一切都是否将以闹剧形式结束。

在其他方面，共和派继续从南方向北派遣军队。五天以来，近八千人(?)分为三个梯队经海路到达登州和芝罘府。有人认为该部队将进军济南；也有人认为该军计划在北直隶的北部海湾葫芦岛①登陆，在守卫沿海地区的军队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下(这一点很像是真实的)，他们可以通过铁路从那儿去奉天或者天津。

从帝国西部和南部省新来的军队仅仅使骚乱情况变得更为确定，在骚乱状态中，这些地区陷落了。

在四川，前任总督赵尔丰最终用他的头颅偿还了铁路同盟会成员对他的仇恨。一些城市相继落到有着不同名称的集团手中，但所有这些集团的目的都是抢劫。

云南府领事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云南省当前的主席蔡将军准备和七千人一起出征四川，其借口是支持四川的共和派事业，但更为可能的是逃离那个他感到并不安全的省。

---

① 也叫连山的新港，位于靠近锦州的地方。——原注

我们东京前哨的指挥官报告了因广西众多土匪集团的出现而引起的危险。应该预见到,实力最弱的土匪集团由于被驱逐,会到我殖民地去寻找藏身处,继续他们的抢劫行为。

军 事 形 势

兵力的部署自上次报告以来没有明显的变化,除了关于:

1)南方北侵军队的海上远征。在 1 月 22 日,有三辆军列到达山东。

a. 三百人抵登州府(芝罘府西北方七十公里处);

b. 二千五百人抵府,有八挺机枪和三门山炮;

c. 五千人①于 21 日抵府。

这些部队受原奉天第二混合协统帅蓝天蔚将军指挥。

2)为保卫袁世凯,河南和直隶的一些部队来到北京。

a. 彰德府的一个营;

b. 保定府的一个辎重连和一个营;

c. 正定府的三个营(或辎重队)。

总共约有三千人。

北京的兵力情况如下②:

1)城外的满洲新军(颐和园和北苑):

皇帝禁卫军:八千人(比正常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

第一协两千人:
- 三个步兵营
- 一个骑兵中队
- 三个工兵连
- 三个辎重连

2)城内的满洲旧式军队(一万三千人左右):

六千五百名警察(部分中国警察);

四千名两翼旗军;

二千名蓝旗军。

人们不知道警察部队是否已表明了态度,但其最高首脑即巡警部尚书是忠实于袁的。

3)武卫左军师(姜桂题将军):

八个营的三千二百人分布于各城门处;

通州:四个营,一千六百人(新兵);

南苑:四个营,一千六百人(新兵)。

这些军队加入了反对满洲的队伍,但可能被王朝收买。

4)袁世凯的卫队:

---

① 此数字未经证实。——原注

② 外国各公使馆卫队人数升至总计为二千一百五十人。——原注

和袁同时到的：
- 河南的五百人；
- 第十步兵标的一千人。

1 月 20 日至 23 日抵达的三千人(详情请看上述)。

如果这些军队或者它们之中的一部分终于动起手来，那将可能是号召所有的歹徒抢劫城市的信号。

外国的行动

正如以前预告的那样，美国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中队于 19 日在秦皇岛登陆。约有一百八十人将被派去守卫铁路线，其余的人将驻扎在天津。

约六百名葡萄牙和印度士兵将增援澳门驻军。

12 月 29 日，估计将有近千人的步兵和炮兵援军从奥尔特肖特向印度和中国进发。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96〕

45. 1 月 29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 年 1 月 29 日，北京)

概　　要

政治形势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中，满洲党试图推翻袁世凯而用满洲总理取代他；他们还授予袁侯爵之位，此举在共和派看来是在损害袁的名誉。

袁怂恿将军们向朝廷递交请皇帝退位的申请书，并挑唆现在与他立场一致的共和派发出最后通牒。

一颗炸弹炸死了满洲党最有威信的成员之一良弼将军，这一新的谋杀事件使首都震惊。

王朝似乎不再有任何对抗普遍压力的办法，因为日本没有作出人们所希望的支持。满洲军队对未能保护他们的有特权的王公大臣和对中国人可能同样感到不满，他们可能不太愿意为拯救王朝作出牺牲。

军事形势

皇帝的军队——它也同样变成了共和派军队——不愿意战斗；已于昨日满期的休战

据说又延长了十五天。

第一镇由于士兵逃跑而大量减员，该军已退至汉口北面二百公里处。

第三协将到北京，以保护袁世凯免受满洲军的伤害。

五千名蒙古士兵到达满洲，总督在那儿招募了几个新的营。

共和派军队向北方挺进，一路均无战事。

外国的行动

王公大臣们似乎在徒劳地请求日本作出干预行动，但这个强国拒绝进行孤立的和已经太迟的行动。日本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与所有其他列强一起帮助中国重建秩序，倘新政体的无能终于被人们的预见证实了的话。

政治形势

青年满洲党继续进行着反袁世凯的阴谋，同时它要求日本为了王朝的利益作出干预（有人为此事的真实性担保）；它还派出一名代表去满洲总督赵尔巽处，向他提供总理职位，并使之任命临时参议院的新主席。另一方面，为了损害袁在共和派中的名誉，——大家都知道他正在与共和派议和——朝廷用三道敕令强加给他一个侯爵的称号，但却遭到袁的顽固的拒绝。

所有以上措施没有制服住这个主宰形势的机敏的政治家。当袁把其他列强国的注意力引向日本单独干预的危险用以吓唬日本时，他让四十七名将军向朝廷递交了一份申请书①，申明战争不能继续，对王朝而言最好的办法是退位，那样人们将会向它提供好的条件。

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受袁世凯的指使，伍廷芳用共和派的名义，以最后通牒形式向王朝发出了一份威胁性电报。

为了支持这些情况，袁将秦皇岛地区的第三师调来北京（目前正在运输途中）。

革命党进行过两次谋杀：一次是对军咨府军咨使良弼将军，他被错误地看成满洲党的不可制服的首脑之一；另一次是对天津统帅张怀芝将军，因该将军表现出对于归顺共和国的犹豫。前一次谋杀炸掉了眼下已濒于死境的受害者的一条腿，给了民众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看作目前阴谋的中心人物的满族元帅铁良立刻返回天津租界，否认他与各种事件有任何关系。惊慌情绪重新笼罩北京，许多将军和高级官员离开了京城。

完全有理由考虑到王朝的退位会即将发生。革命军在前进途中不再会遇到障碍，并在必要时可能来北京以强迫王朝退位；朝廷最好能避免这种状况。人们曾相信会作出一些反抗行动的满洲军队，现在正在极为愤怒地指控王公大臣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他们作为牺牲品，在此情况下，该军队不可能向王朝提供任何支持。

---

① 该书似乎是在袁世凯自己的办公室中炮制的，并未征求许多签名者的意见。禁卫军统帅冯国璋和天津统帅张怀芝因害怕满洲人的报复，没敢在该书上签名。——原注

军事形势

不久前还被人们描述得急于重新参加战斗的朝廷军队，现在好像被革命党人的宣传征服了。

在湖北的两千士兵（尤其是第十九步兵标），几天前站到了革命党方面，尽管段祺瑞将军采取了预防措施，将部队撤至汉口以北二百公里的湖北—河南交界处（位于广水和信阳州之间）。

在天津—浦口线上，粗暴的张勋将军（满洲人曾指望他夺回南京）似乎并不想阻止革命军的前进，他是向朝廷递交申请书要求退位的签名者之一。

在山东省，人们还不清楚被派赴潍县的部队（七个营）的态度；该部是用以阻止蓝天蔚将军在芝罘和登州府登陆的共和派军队的。

为了防止朝廷和满族贵族的绝望举动，袁世凯将目前在兰州制止叛乱的第三协的一些分部调回北京。已有三千多人（第九步兵标，两个骑兵辎重队，一个炮组，第三工兵营）抵达此地。

现在仅仅只有满洲总督还控制着几支能赞同朝廷的部队，它们是第二混合协和第二十三镇。

满洲总督接受了五千名蒙古骑兵的增援，并招募了几个新兵营。他尽力为王朝将那些曾是王朝发源地的省份保护到最后一刻。现在他已叫人在奉天处决了革命运动的一些首脑。然而，该总督的努力并不能影响事件的必然结局。

外国的行动

无法去分析处于神秘转变中的日本外交，人们可以从日本在北京的代表们的一致声明中得出结论：日本谢绝了满洲人要求于它的干预行动；这也许是由于危险的单独行动导致其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测的缘故。但是，各列强国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作出共同干预以防止中国即将进入的无政府状态，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应当预计到，第一次冲向自由的抑制着的个人利益及各省间的猜忌会重新出现在其所有的力量中，并引起纠纷，妨碍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

人们可以想到，日本可能会有些担心地看到一种新的政体传入它的邻国；它想利用时机以确保其在满洲的地位。人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它麻木不仁地允许俄国准备将自己当作外蒙保护国的态度的。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97〕

46.2月25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年2月25日，北京）

1.政治形势

人们只是怀着对于如何维持中国军队的一般的担心来看待满洲王朝的消失。尽管袁世凯与南京政府间的谈判在顺利进行，值得忧虑的是，后者对选举总统所提出的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将造成分裂。

对袁来说，政治家的声誉和在北方军队首脑及南方党某些协中获得的实际支持，使他希望尽快地被人承认，并在财政方面得到外国列强的支持。在革命党方面，对于日本可能进行干涉的恐惧战胜了他们对于接受一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首脑的反感。

袁在孙逸仙辞职后被南京参议院一致选为总统。袁将会巧妙地把副总统黎元洪所代表的武昌党的野心与想迫使袁到南京以获承认的南方激进党的野心对立起来。他获悉南京政府已向北京派遣一个八人的议会成员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将于明日到达北京。袁已收到了所有的省的赞同信；在北京的喇嘛和尚们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他致敬，一个蒙古王公贵族集团则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参加共和国。

几个不肯妥协的满洲君主主义者的阴谋，在太后本人的请求下也停止了。仅仅只有甘肃的伊斯兰教徒和以端郡王（1900年被流放的觊觎王位者）为首的满洲人加上由旧都督阎将军领导的一个革命军集团，分别威胁着西安府（陕西）和太原府（山西）。

因此，国内的统一与和平似乎指日可待。现在的问题在于组织一个包括南京政府成员并能够向全国发号施令的联合内阁。四国财团似已决定给予临时政府必要的贷款以使它继续存在，因为三个月来，大多数的省实际上已停上了税款的上缴入库。

2.军事形势

尽管宣布了成立共和国，两党的兵力仍在好几个阵地对峙着，但有关两方部队撤回原籍省的命令似乎已经发出。

目前军队总的形势如下：

北方军：

皇帝禁卫军：颐和园（第二标，其中一个纵队在北京）。

第一镇：仍分散在地区、河南南部和北苑（北方猎园之意）。

第二镇：保定府（除了第七、八标的一个混合营在北京之外）。

第三镇：北京（除第十一标和一个炮兵大队在太原府之外）。

第四镇：马厂和小站（位于天津南部和东南部）。

第五镇：山东。分布在济南府、徐州府（第十八标已成立）。

第六镇：{第十一协仍在信阳州，
第十二协仍在保定府。

第二十镇：新民府。

第二十三镇：长春和吉林。

第二混成协：奉天。

武卫左军镇：北京、通州。

张勋将军的巡防队：徐州府。

南方军：

湖北军：（在湖北北部边境与长江之间。六个师（？）。从其他省来的小部队大概将返回各自的地区。）

江苏军：（在南京和淮河线之间。四个师均在遣散中。）

登陆部队：在山东的芝罘和登州府（在黄县的一次失败后，在满洲的八百人到了大沽）。

除以上已知的军队之外，还存在着一大批急忙征募和武装起来的新的义勇军部队，它们根据暂时的需要而布置。仅一个广东省就可能有上十万这样的义勇军。

云南派遣了约六千人去四川的叙府地区，三百人去贵州。

党派之间的斗争似乎要重新在陕西进行，其首府受到伊斯兰教徒和希望替在运动初期被杀的兄弟们报仇的满洲人的威胁。袁世凯原已把所有的北方军队撤至潼关（河南—陕西交界处），现在他可能向黎元洪将军要求派遣自己的部队到西安府援救混合协的小分队。

最后在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阎将军的反攻。这个阎在12月时曾如此可笑地守不住娘子关隘，而现在却威胁着太原府。

在北方军队中重建纪律的问题，解除南方义勇军的武装并予遣散的问题，是政府最为严重和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摆脱那些义勇军可能付一笔钱就够了（以津贴名义发给两到三个月的军饷），但是很多人将重新返回他们原始的"抢劫"职业中去。重新控制北方军队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精力，但可以期望袁世凯将会完成好这个任务，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

3. 外国的行动

并非所有列强国都同样满意地怀有在中国即将重建秩序的愿望，它也许妨碍了北面和东面邻国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它们宁愿利用它们所指望的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骚乱。可以设想，这两个邻国的外交是否会屈服于它们掌握的达到某种结果的各种手段。

据一些情报说，满洲的动乱被人为地维持着，最微不足道的事端对日本人而言都足以

成为占领某些铁路沿线城市的借口(铁岭、彰德府、开平)。

另一方面,有人报告说,对王朝的崩溃表示喜悦的蒙古准备加入中华共和国,不是以臣服的身份,而是以参加联邦的身份。如果真是如此,俄国把外蒙以及日本把内蒙作为保护国的希望将破灭。因此,应当预计会有一些阴谋,可惜的是,其他的列强国要反对它们却很困难。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101〕

47. 北京的骚乱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 年 3 月 1 日,北京)

在近段时间里,有不少军队出现在北京,干下了一些坏事,如单独的抢劫之类为不守纪律的军队已相当习惯的暴力活动,但这类活动没有引起注意。批评政府变更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而且没有引起事端,本地居民和外国侨民都已慢慢放下心来。

因此在 2 月 29 日晚 8 点左右,当枪声在满城东南区鸣响,接着又响起虽不猛烈但来自四面八方的排枪声、同时大火在不同的地方燃烧起来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了惊诧。

为了保证本国同胞的安全,法国公使立刻发出指令,让住在外边的人进入公使馆区,并亲自率领一个巡逻队去寻找住得更远的人。

城内在晚 10 点至凌晨 1 点显示出的场面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离公使馆区八百米处的一个大商业市场和邻近的房屋被焚毁,当时在大火周围,各种级别的中国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抢劫着小商店和居民;开始时不明原因的枪声,主要是用以吓唬居民及方便警察和士兵们从事抢劫行动。

无风的天气限制了大火的蔓延及其损害;而相当一部分的损害应归咎于那些众多的饥饿者和迅速利用时机的偷盗者。

接近清晨的时候,一些抢劫者把赃物装上两列火车直运保定府(第三列火车奉他们的命令甚至已在长辛店组成;他们抢劫了车站),其余的人朝丰台方向或郊区消逝。天亮后才出现平静,情况也变得清楚了。

法国公使去向袁世凯表示祝贺,祝贺他幸免于难(人们当初认为反叛是针对袁个人的),并询问将采取什么措施以阻止类似骚乱的再次发生。

总统把事端归咎于流传在第三协某些军队中的谣言:军队即将解散,袁本人将出发去南京。

根据另外的情报来源,抢劫的起因同时可能是由于命令部队在两周内剪掉辫子。

不管怎样,其中没有任何政治因素,深刻的原因不是别的,仅仅是由于几个月的乡下生活使军队的无纪律性大为发展,士兵在乡村里处于完全和有害的无所事事状态中。可以加上的一点是:还因为害怕看到长期以来对抢劫皇宫和北京衙门所抱的希望落空。

据了解,没有一个外国人受打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公使馆区找到了庇护所。公使馆区已采取了防御措施,因为骚乱也可能在今晚继续发展。尽管袁的亲信似乎认为该抢劫事件的参加者限于炮兵大队和工兵营、辎重营(共约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然而好像所有的部队都多少参与其间,并且,要找到可靠的部队来钳制其他部队是很困难的。

论及事件本身,它们是全国各地每日均在发生的那些事件的重复,并显示出了重建秩序将会遇到的困难。这种事件突出了采取下列措施的必要性:解除最坏的军队的武装,采取有力而持续的行动将纪律带回留下的部队中去。毫无疑问,如果类似骚乱再次出现,它将非常容易地被某些列强国引为一次干预的借口。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102〕

48.3 月 4 日的形势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 年 3 月 4 日,北京)

1. 总的形势

北京 2 月 29 日事件——只有通过迅速而强有力的镇压才能防止它的反复——第二天在首都重新发生,并蔓延到直隶的其他城市:天津、保定、永平。在所有这些城市中,士兵和恶棍们放火抢劫。

在北京,抢劫者只是换了城区,在城内的西部和北部行动。然而,仍然留在满城区的第三镇所部已被当局控制住,新的作恶者似乎主要是警察和武卫左军的一些部队。袁世凯对属于他自己的卫队中的一定数量的行劫士兵无能为力,那些士兵并无畏惧地把他们抢劫的成果带回外务部大院;总统只能做到把最爱闹事的人调出北京。两天来,他把第九、第十二步兵标和炮兵标调往良乡县。姜桂题将军重新监督他的军队,在警察的帮助下,负责阻止抢劫活动,把当场拿获的抢劫犯斩首示众。因此,在经过城区时可以看到明显地摆在十字路口的尸体,以及挂在柱子上的头颅。

这种迅速的逮捕和处决似乎使强盗们震动,城市在 2 日至 3 日间及 3 日至 4 日间更加安宁了。然而,听说这种逮捕常常是随意的,可以肯定,它没有打击到最初的犯罪者:逃兵。

那些逃兵把恐怖带到了市郊,特别是铁路沿线。他们无所畏惧地阻挡天津—北京间的火车,掠夺行李物品,使交通运输部分中断。

在天津,2 日至 3 日晚间,作恶的士兵们改穿便衣但拿着武器在中国城区内放火,尤其是在总督衙门放火。一位德国医生在援救受威胁的朋友们时被杀死。租界没有遭到攻击。

从保定府来的消息虽不全面,却也使人担心:城市被洗劫,一部分传教团驻地被烧毁。在永平,类似的场面也有发生,传教士们的命运如何尚不清楚。

预计北京的骚乱还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出于同样原因,各省军队把已经不算小的骚乱引向了极端。

政府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是无力摆脱这种状况的。

2. 外国的行动
它的必要性,它的办法

对于不想利用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投机的列强国,表明其"支持现有政府"的态度已成为必须。听任一个似乎属于袁世凯的权力崩溃,可能造成整个国家遭受抢劫和分裂的后果。目前还没见到任何严肃的政治反对派,似乎可以肯定总统一职将属于最易掌权并足以迅速恢复国内秩序的人。不过,我们仍然倾向于向他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

财政的支持首先会使袁去收缴武器并解散纪律松弛的军队,这样做虽不能完全阻止士兵的抢劫,但至少可减少其危险性。其次,财政支持可能使袁获得警察中的精华部分和新、旧军队的好感,而有了这批军队,他能够逐渐平息骚乱。

在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外国军队的临时占领变为必要,但应相当稳固地占领的是一些重要的战略基地:

在北方:天津、北京,或许还有保定府;

在长江上:上海、汉口,或许还有南京;

在南方:广州。

应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来占领这些地方但不参加战争行为,并要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这可能是一个精神上的有效方法,毫无疑问它将对恢复秩序大有帮助。

用这种方式也许能成功地防止排外运动;如果骚乱延续下去,排外运动必然会出现。

两年来,在多次报告中,我都设想会有一次外国的干预,我一直把它视为不可避免之事。干预应尽可能保持一种国际性的特征,这样我们就能得以参与,甚至在我们的利益不那么重要的北方,然而在北方的行动将更为显著,更易引起反响。在目前的形势下,似乎有必要给第十六殖民军增加几个连(二至四个),并准备派遣我远东海军部队和一个登陆小部队去某一个挑选出来的军事基地。

从我们印度支那殖民地抽调一个准备好了的土著营也许足以代表我们的态度。在这个季节将土著营派赴南方或长江流域不再有不便之处,而且比抽调白人军队要更少地削弱我们在殖民地的力量。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四个外国列强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派遣出重要的兵力来华;可以预料英国、美国、俄国的援军会紧随日本的援军而来。第一批日本援军(七百人)将于明日到达大沽。这些列强国都拥有众多的军舰,德国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与这些兵力去作比较,然而我们的利益和声誉都要求我们的旗帜至少要出现

在重要的基地上。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103〕

49. 日本出售武器给中国革命者
参议院议长兼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年3月5日,巴黎)

我们在东京的代办于2月7日给我发来一封关于中国革命者在日本购买武器的快信。

我荣幸地将格罗斯先生这封信的复制件转呈给您。

(签名)

〔外交部　政治和商务司　亚洲处　No263〕

附:

日本出售武器给中国革命者
格罗斯[①]致参议院议长兼外交部长先生

(1912年2月2日,东京)

在最近一次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陆军部部长宣布,最近军械库把一批武器降价拍卖给了一家日本商行,其售价为三百万日元。据新闻界消息,石本将军并不否认这些武器被转卖给了中国革命者。

上海的一份英文报纸就此事公布了一份日本商行提供给南京政府的武器名单,上面列有1909式步枪五万枝。《日本日报》令人信服地使人注意到这条消息的不确实之处。事实上,日本政府不会想到将它目前仍在使用而且尚不足供给它自己军队的武器卖给外国。被出售的武器显然只能是在1904年至1905年间缴获的俄国武器以及可能在那次战争中用过的一部分日本武器。另外,很有可能武器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发生骚乱以前就被军械库拍卖和交付出去了。这件事使本部回忆起1910年日本出售武器给埃塞俄比亚政府所引起的事端。

〔No10　(复制件)〕

① 格罗斯,为当时法国驻日本公使馆代办。——译者

50. 外国在中国的兵力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
（1912 年 3 月 22 日，北京）

我荣幸地向您提供于 3 月 20 日公布的中国北部外国驻军表。

这些军队的布置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

a)守卫北京公使馆：约二千五百人。

b)保证北京与海上的交通联系：约有一千一百人分布于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沿线①。

c)在天津，有一支有能力进行初次干预的别动队，该部队同时保证那个城市租界的安全，约有六千三百人。

d)占领威海卫和胶州(没有依靠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兵力)。

如上兵力集中起来的总数目现在上升为大约一万三千人，其中仅在直隶就有一万一千五百人。若将此数与19□□年保持的军队数目(四千三百人)相比，可以看到兵力增加了两倍。

另外，秦皇岛、芝罘、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重庆、福州、汕头、广州、北海等港均有军舰占据，其数量明显增加。汉口和广州有登陆部队。

因此，可以说列强国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行动，而且它们隐约预见到了一次更为重大的干预行动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干预的威胁对许多因革命者经常描绘的图景而陷入忧虑的人们而言，它可以排除出于各种原因的冲突，以避免外国的利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对资金的需要将总是迫使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尽可能谨慎地对待它所期望获得财政援助的国家。然而，目前的反叛，无论在正规军队或是在志愿部队，都使我们担心不能长期地指望这个国家顺从来自任何一种权力的命令。尽管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地方的外国人都得到了谨慎小心的尊敬，但可以肯定，他们的安全随时可能变得不那么保险。

在这儿的常驻外交代表们几乎一致认为，排外情绪隐藏在所有中国人的灵魂中，不管是“旧式的”或是“少年中国”时代，某一次事端、一个谣言或仅仅是骚乱的延长，都足以使排外情绪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列强国认为，有必要尽可能地将他们的侨民带到沿海地区或是防御得很好的中心地点，这是美国和英国人采用的办法。我国侨民对自己的职责有着另外的观念。无论他们是属于领事团或中国政府部门如铁路、学校、医院、海关、邮局等，还是如大多数人那样属于天主教传教团，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岗位是不可脱离的荣誉岗位。如

① 由于解冻，保卫塘沽与山海关之间的部分铁路不再具有同样的必要性，但它保证着与西伯利亚铁路线的直接联系，为此，此段守卫维持了下来。——原注

果一种排外运动发生，他们可能是第一批遇险者。

因此对我们来说，目前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如果说我们的贸易利益比其他几个列强更少的话，那么我们侨民所面临的危险和威胁却比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列强作出干预的时间和方式尚难以预料，只有与事件及与其他列强国的行动联系的必要性才能对此作出决定。不过可以设立以下几项作为原则：

1. 外国军队的介入行动能够防止孤立的个人暴力或一伙狂热者的暴力。

2. 积极干预的一种直接反响，可能是各省军队中威胁外国侨民生命的民族主义感情的爆发。

3. 目前混乱局势的延续必然导致反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

从以上考虑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必要从现在起占据尽可能多的通商港；我们在那些地方的出现不能算作一种挑衅。

不幸的是，我们在远东的战舰力量十分有限。倘若我们不想让我国侨民依靠其他列强国保护的话，最好能将东京的土著警察召来占领最容易招致危险的一些领事馆和租界，如汉口、福州、汕头、北海、云南府和蒙自。这一办法虽说需要耗费资金却不致动用我们为一次可能的行动所必须保持聚集状况的军事力量。小分队尽管很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足以使人不得不肃然相待；他们可以用来保证在反叛期间对我国侨民而言是极为困难的警戒，并组成在遭到攻击时的反击核心。由于不可能从实力上保护其他值得关心的地方，我们将仅仅指望我国侨民用谨慎和冷静的态度来避免地方冲突。

以上报告，一方面是干预即将引起的反响，另一方面是目前危机延续的危险，将外交置于艰难的抉择之中。过早地干涉将白白送掉许多性命。有力地支持现政府重建秩序，将能阻止难以补救的不幸。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将努力选择适当的时机，以使受害者减到最少的数字，不同的列强国有责任向它提供它认为是必要的办法。

高拉尔德（签名）

〔驻华公使馆　No105〕

附表：中国北部外国军队的力量及其分布①

① 原件不清晰，略。——译者